

국제학술회의

역사적 관점에서 본

‘동아시아세계’의
아이덴티티와
다양성(Ⅱ)

날 짜: 2009년 11월 6일(금)~7일(토)

장 소: 그랜드힐튼호텔(홍은동)

공동주최: 동아시아사연구포럼, 동북아역사재단

목 차

【Panel 3-1 社會變動과 아이덴티티(Identity)】

- 身份转换、权威认同与财产观念 张一平 (ZHANG Yiping) 5
- 近代中国区域城市的经济关系 鄭 忠 (ZHENG Zhong) 31
- 前近代中日西学进程的差异 赵德宇 (ZHAO Deyu) 73

【Panel 3-2 戰爭, 植民 經驗과 正體性 形成】

- 日露戦争とナショナルヒストリー 中村 政則 (NAKAMURA Masanori) 93
- 顏智在台 陳偉智 (CHEN Weichi) 121
- 한국전쟁의 기억과 탈냉전: 한국전쟁 사진집을 중심으로
..... 정근식 (JUNG Keunsik) 131

【Panel 4-1 ‘越境하는 東아시아(Asis)와 아디덴티티(Identity)】

- 中日战争初期日本的“东亚新秩序”
..... 臧运祜 (ZANG Yunhu) 159
- 「満洲」の中国化—19世紀後半から20世紀前半期の奉天地域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形成
..... 上田贵子 (UEDA Takako) 195
- 近代上海日本居留民社会中的妇女团体
..... 樂 敏 (LE Min) 225
- 양안화해시대, 대만의 정체성과 동아시아
..... 백지운 (BAIK, Jiwoon) 247

身份转换、权威认同与财产观念

■ 张一平 (上海财经大学) ■

身份转换、权威认同与财产观念

— 1950年代前期中国农民的社会心理变动

张一平（上海财经大学）

〈目 次〉

- 一、身份转换：从乡民到阶级
- 二、权威认同：日常生活中的话语构建
- 三、财产观念：求富抑或均平？

摘 要：1950年代前期中国的土地改革不仅改变了乡村原有的土地制度，而且对农民的社会心理产生了深刻影响。特别是在江苏南部，农民的身份特征由乡民转向阶级，日常生活中新的权威话语开始树立，私有财产观念受到冲击，由此导致了国家—农民关系的重构。

关键词：土地改革 身份转换 权威认同 财产观念

土地是传统中国最稀缺的生产要素和社会权力再生产的基础，土地分配和围绕土地的利益冲突是20世纪中国乡村动员与结构变迁的重要动力。在前承清末民国、后继改革开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全国的土地制度改革结束了传统的统治秩序，成为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形成的前奏，并对农民的社会心理变动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试以1950年代前期苏南土地改革为个案，从身份转换、权威认同和财产观念的视角来考察这一变化及其影响。

一、身份转换：从乡民到阶级

梁漱溟曾把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称之为“伦理社会”，而费孝通则将其特征表述为“差序格局”，在这种“差序格局”中，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远近、亲疏，受到血缘和地缘，尤其是血缘的影响。¹⁾然而，形成中国传统社会关系差序格局的基础，实际反映了一种中国农村社会中对稀缺资源进行配置的方式或格局。²⁾尽管伦理本位给日常乡村生活罩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薄纱，村民之间存在着从农业生产、砌房造屋到婚丧嫁娶的广泛的互惠合作，甚至平素的食物也礼尚往来。但是乡村资源的稀缺极易造成利益冲突，往往鸡毛蒜皮之事即可成为邻里纷争的导火线，礼尚往来的背后往往是还礼过头，两不相欠。由于生存空间的约束，村落内部构成了一种紧张而又微妙的平衡。

1)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

2) 孙立平：《“关系”、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5期

土地改革正是在这些特征中找到了契机——生存伦理——强调经济利益的不平等，从而打破了原先的“和谐”。通过把阶级划分当作改造农村的出发点，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摧毁了原有精英的社会和经济基础。³⁾特别在诉苦运动中，通过把“自然状态的‘苦难’和‘苦难意识’加以凝聚和提炼”，使其“穿越日常生活的层面”，建立起与“国家的框架”的联系。⁴⁾诉苦中注意进行农民与地主的对比教育，使农民“找到穷是如何来的原因，认识到两个阶级到底是谁养活谁”的道理。通过这样一种道德色彩浓厚的经济挖根，阶级划分给农村社会打上了长达几十年的政治烙印。⁵⁾

首先，这次成分划分，改变了农村社会原来的权力结构、阶级与身份地位的认知评价。阶级身份被固化并成为判定每个人政治态度、社会地位及各种权利的标尺，那么这种理论上的阶级概念就会在实践中出现“符号化”的趋向。⁶⁾甚至还会出现对于“身份符号”的竞争，譬如过去农民认为兵是保镖和刽子手，土改后则抢着当兵。松江专区在土改结束后抗美援朝的参军热潮中，报名参军的超过原定名额六倍以上。审查时非常严格，以至于农民反映：“国民党抓丁抓不到，共产党参军像考秀才。”又如“劳动”一词，过去农民没有自觉认识到劳动的光荣，土改后便完全明白了，而且对主要劳动与附带劳动、有劳动与没有劳动，有了新的理解。⁷⁾无锡县江溪乡军属普遍受到尊敬，逢年过节均受到慰劳与慰问。⁸⁾

其次，经过阶级划分重新厘定了乡村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并使国家权力在解放后再次下移。这种新的国家—社会关系和政治结构的出现，完全不同于旧的国家、士绅和村庄的三角关系。阶级划分“增加了国家（和共产党）的直接影响，扫除基于财产和地方积累起来的权力之上的权威，把对血亲的忠诚转向对新发展起来的法人团体即集体的忠诚”。⁹⁾同时，大批积极分子进入政权系统，他们具有联系大多数农民的能力，也能坚决执行党的政策。

再者，这种阶级划分的理论，可以追溯到1925年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它“主要根据占有社会财富的多少即生活富裕的程度来划分。评定这些阶级的历史作用，也主要不是看他们维护何种社会生产力、何种生产方式，而是根据他们的富裕和贫穷程度，判定他们分别为反革命、半反革命、对革命守中立、参加革命、革命主力军”。如果仅仅局限于分配份额和分配方式的改观，而不强调农民主体性的“个性自由、个性解放”，不注重生产力的发展，那么，只会造成“越穷就越富有革命性”观念的复制和不断强化，从而导致贫穷的普遍化和全部陈腐的东西死灰复燃。¹⁰⁾因此农民虽然打破了传统的宗法枷锁，获取了发展的机会，但这种发展是由身份界定为出发点的。辅仁大学教授叶苍岑在苏南察觉到了农民的这种话语变化：“你是地主！你是地主！”而当叶教授问一个10岁左右的小女孩：“你喜欢做啥个样的人？”小女孩答道：“雇农。”¹¹⁾从此，阶级身份“广泛的政治和社会内涵”，“通过男性血统带给

3) 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顾速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67页

4) 郭于华、孙立平：《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载《中国学术》第12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33页

5) 参见陈益元《建国初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5：以湖南醴陵为例》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第156—159页。

6) 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顾速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页

7) 《我所见到的苏南土地改革运动》，1951年9月，第152、154页。

8) 无锡县江溪乡土改后农村阶级经济情况变化调查报告，1951 10 2锡山档案馆档案B1 1 1

9) 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88页

10) 姜义华：《理性缺位的启蒙》，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15、376页

妻子和子孙。那些划为地主和富农的儿孙们面临着折磨和当替罪羊，而阶级成分越低微（贫农、雇农），则其新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就越高。”¹²⁾这种主观性和政治色彩较浓的社会分层模式，奠定了此后几十年的中国社会结构的基础。

阶级划分还给地主家庭出身的青年带来了巨大的心理震动。一些学生为了表明自己的进步，不惜与家庭决裂。新苏师范一个地主家庭的学生“和平”如此表白：“我是一个出身在地主家庭的子女，我知道我家的财产、土地和房屋是农民的白骨堆成的；就是我自己的身体也是以农民的血泪哺育起来的！我的祖父是家乡的地主，我父亲是中国人民的叛徒，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对农民进行了残酷的剥削，而不断增加了自己的财富和土地。……我要做一个地主家庭的叛徒。”¹³⁾金坛县白塔区化龙乡的大地主夏朝鼎逃往无锡后，在复兴路上被其女儿夏梅君——钟荣庚诊所的医学生——碰见并扭送至派出所。¹⁴⁾

土改后地主与农民的心理对立长期存在，并随着政治形势而变化。如苏州唯亭镇朱益稔、勤辛大队王阿惠让其子女牢记斗争苦头，将来要“翻本”。尤其在1962年夏天蒋介石企图侵扰东南沿海时，有的地主威吓干部：“蒋介石过去，先杀大干部，后杀小干部。”新民大队大队长吴根寿（党员）还特地请地主马纪康为自己兄弟写分家书，把土改时自家38亩田写上，并对其兄弟讲：“现在毛主席领导，我是大队长，你们靠我，如果蒋介石过来，我们也有了后路，不用怕。”¹⁵⁾浙江临海县有个地主，带上儿子去认土改时被分掉的土地、房屋，有的地主则保留着“变天账”、“冤仇登记簿”，传给子孙报仇。¹⁶⁾江宁县东山公社共有成年地富子女306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前，“72.9%的人和家庭划不清界限，同党和贫下中农存在隔阂；9.2%的人本人受毒较深，‘站在家庭的反动立场上’，仇视党、仇视贫下中农；17.9%的人思想比较进步，拥护社会主义，跟党和贫下中农比较靠拢，但他们不少人对自已的前途也有苦闷。”不少干部群众则称地富子女为“小地主”、“小富农”。¹⁷⁾

周晓虹指出，土改之后地主、富农，以及与此相应的雇农、贫农和中农，实际上只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一种阶级身份符号，已不具备原来的意义。“实事求是地说，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为了巩固新的基层政权和维护土改的积极成果，防止已被推翻的地主及富农阶级的反抗和破坏，继续使用这一阶级身份符号体系原本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¹⁸⁾但是这种阶级身份符号体系的使用不仅延续了30年，并且被夸大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二、权威认同：日常生活中的话语建构

11) 《我所见到的苏南土地改革运动》，1951年9月，第152、154页。

12) 弗里曼、毕克伟、赛尔登：《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陶鹤山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47页

13) 《地主家庭的罪恶》，《新苏州报》1950 10 25。

14) 《夏梅君检举了逃亡的地主父亲》，《晓报》（无锡）1951 5 21。

15) 吴县唯亭公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工作总结——储江同志在工作队全体干部会议上的总结报告，1963 9. 17，载于中共苏州地委办公室编印：《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资料》，1963 10 15。

16) 柳荣昌、余边编：《地主是怎样剥削和压迫农民的》，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版，第76页。

17) 中共江苏省委办公厅编印：《江苏社教运动简报》，第141期，1965 10 7。

18) 周晓《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59页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这样描述法国的小农：“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¹⁹⁾神授力量和官府权威是传统农民日常生活的主宰，由于缺乏政治参与实践和主体意识，他们对于命运的迷信、神的崇拜和政权的感知主要就是“权力保护”、“雨水和阳光”，实利主义的生存需求很大程度上规定着农民的行为方式。

随着土改对传统乡村利益格局的打破，农民的敬仰对象发生改变，新的权威性话语开始广泛建立。吴江一带的农民原来烧香拜佛的风气很盛，震泽镇的香店经常满堆着香和纸箔。土改后香店生意逐渐清淡下来，许多农民自动退出道、会门，不再烧香拜佛供灶神，而改为敬奉毛主席像。²⁰⁾因此苏南“坊间印行的毛主席像，销路好极了！”²¹⁾在太仓县双凤区的庆祝大会上，新毛乡贫农朱小狗说：“毛主席是我侬亲大人，把我侬穷人从地狱救到天堂。”一位张姓农民说：“从前年卅晚，讨债逼租，弄得家里一粒米都冇没，今年年卅分到了多余粮食，手忙脚乱放处，真是翻身，今朝我要谢谢毛主席。”即对着毛主席恭敬地鞠了几个躬。妇女代表金妮大说：“毛主席来了，我侬男女全翻了身，第一得到了土地和财产，第二，我侬穷人得到了天下”。军属代表江老太说：“我侬到区里县里开会，县长区长都来迎接我侬，献花敬酒，像做喜事一样，真是到处受人欢迎。”²²⁾南汇县新建乡农民说：“不是毛主席订的政策好，我们那里能分得到？”60多岁的季余氏甚至表示：“这次我分到分不到东西无所谓，反正我已翻了身了。”²³⁾这真切地反映了农民在新政权下得益后的满足心理。

金坛县直溪区自1951年1月中旬结束土地分配工作后，提出“想想过去，比比今天，认识将来”的口号，引导农民诉苦，“干部群众对于日汪蒋的滔天罪行，激起了无限悲愤，参加会议的都痛哭流泪，普遍的进一步的提高了阶级觉悟，这样群众一面对今天翻身表示喜悦，感谢共产党、毛主席，感谢解放军，一面对美蒋表示万分痛恨（均表示态度），愿意参军拥军优属，加紧生产支前，管制好地主阶级。”²⁴⁾昆山花溪乡贫农在土地分配后说：“以前我们这种人有钱也买不到田，今天靠毛主席领导，分到田了。”对于政策，群众相信“毛主席的政策总是为人民打算的。”太仓庆丰乡分田中，农民到田里去看田时，把毛主席像扎上彩抬到田里说：“叫毛主席看看我侬分田。”该乡先分户高培良分田后对儿子说：“阿小，记牢，你大了可对你后代说现在我侬是怎样翻了身。”西郊镇一老头分了5亩田后领着孩子去田里看了三次，对孩子说：“这块田是我侬每年出力耕种给地主交租，今天毛主席领导分给我侬，你可不要忘了毛主席。”²⁵⁾

普通农民的交往圈极为狭小，他们了解的多是自己身边的情况，知识的匮乏和模糊的感知使农民难以辨识阶级的概念，外界信息的传播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他们的认知。打倒阶级敌人的言说，其实质是从日常生活来提升农民对党和毛主席的认知，进而认同国家的合法性。不过农民国家观念与民主意识并非同步发展，而是仍旧受到权力运作的影响。翻身感的树立，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5页。

20)《我所见到的苏南土地改革运动》，1951年9月，第152、154页。

21) 潘光旦、全慰天：《苏南土地改革访问记》，三联书店1952年版，第114页

22)《苏南土改情况》第36期，1951 3 19。

23)《苏南土改情况》第33期，1951 3 8。

24)《苏南土改情况》第37期，1951 3 23。

25)《苏南土改情况》9期1951 330。

目标是获得反对旧秩序的集体共识。这要求每个人的参与和一致表态而不能保持沉默，构成了农民心理集体化的前奏。

在此话语环境下，农民顺势还学会了把增产归功于新政权。无锡县怀五乡浦文兴互助组1952年小麦获得丰收后，组员笑咪咪地说：“这都是听了毛主席的话：多壅了肥料，多花了功夫，开沟排水做得好，不然，小麦哪能丰收！”²⁶⁾无锡西漳区老农刘秋宝对记者说：“自从解放后，分得了土地，在人民政府正确领导下所以生产量大大提高，人民政府为了维护我们的利益，提高农业品的价格，不使我们吃亏。……你想想，要不是毛主席来了，要不是共产党来了，我们能过到这样好日子吗？”²⁷⁾显然这是一种追随主流话语的感恩表态，表明农民的政治参与度在扩大，但其主体性尚未真正构建。

不仅如此，农民对毛主席的感恩宣传还借助报刊扩大其话语影响。1951年在苏州市虎丘镇安乐村农民致毛泽东的信中提到：

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奋斗，消灭了中国大陆上的蒋匪帮，打垮了封建势力，消灭了地主阶级，把我侬穷人从苦海中救了出来，得到了自由解放，现在我侬当了家，作了主，这全是您的英明领导得来的。……

现在，我侬已分得了土地，从此不会再受压迫、剥削了，种出来的东西，可以快快乐乐地自己享受了。最近，我侬开了一个大会，订出了爱国公约，保证：一定要选好稻种，多积肥料，做好合式秧田，捕捉螟虫，保证每亩要增产百分之廿五。一定要严厉镇压反革命活动，深入扩大抗美援朝运动，为支援中朝战士、保卫世界和平而斗争。²⁸⁾

苏州城东区娄东乡合心村第四组农民在给毛泽东信中谈到解放前受地主剥削压迫，解放土改后生产提高时说：“毛主席，我们一想到您，我们的心就特别兴奋，手头就特别有劲。您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太关心我们了，您比我们的爷娘还要亲。”²⁹⁾农民用近乎奉承的话来表达自己的忠诚，这仍是国家与农民“庇护”关系的某种延续。新政权还圆了农民的清官梦。太仓利民乡长泾村农民吕阿福、吕阿祖兄弟俩解放前为争一分竹园，被抓去吃官司。土改中通过村长和村民帮助协商，强调这是旧社会的祸根，国民党政府不但不为农民做事，反而小事弄大，敲诈勒索，于是双方互让一半解决。农民因此反映几代弄不清的事，毛主席来了，一句话就弄得清清爽爽。伍胥乡农民则说过去事情弄到衙门里，越弄越大，钱先到者先胜，现在毛主席是青天，一文钱不化就解决了大事情。³⁰⁾

程歙先生指出，农民具有普遍的权力崇拜意识，如依赖心理、畏官心理和趋权心理。³¹⁾解放军长驱南下统一中国的壮举，新政权一系列雷厉风行的行动，土改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都给苏南老百姓留下了深刻印象，而面对领袖“毛主席”这样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向其表示敬畏和忠诚，正符合农民寻求保护和日常社会调节的需要。

农民也开始表现出积极参与政治的姿态。如新泾乡召开人民代表会时，代表蒋福全在儿子快死的情况下仍去参加会议，一直坚持到会议结束。另一代表冯全根第一天结婚，第二天就

26) 《听了毛主席的话，小麦才得到丰收》，《苏南农村青年》（无锡），1952 7 11。

27) 《翻身不望（忘）共产党，丰衣足食喜洋洋》，《晓报》（无锡），1951 6 25。

28) 《虎邱镇安乐村全体农民写信感谢毛主席》，《新苏州报》，1951 5 25。

29) 《毛主席比爷娘还要亲——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娄东乡合心村第四组全体农民给毛主席的信》，《新苏州报》，1951 6 29。

30) 《苏南土改情况》第50期，1951 5 29。

31) 程歙：《晚清乡土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0—51页

出席代表会议，并说：“我今天能这样还不是靠毛主席，开会讨论大家事情，怎能不去？”怀西乡一个常缺席会议的农民闵金元说：“我靠毛主席靠住了，分到了四亩田，毛主席靠我没靠住，土改后我开会也不到，我对不起毛主席，对不住自己的良心。以后开会我第一个到。”³²⁾不过对于这种权威崇拜，仍需利益诱导，否则农民有可能采取实用主义的疏远态度。如武进县鸣凰区雅田乡农民在土改后认为“土地回了家，农会不参加”，“干部要换换干”，“开会老一套”。同时还抱怨：“人民政府一百样九十九样好，就是公粮重。”“解放军创家当是对的，不过做得太急！”“毛主席当老板，我们当雇工，吃饭做工。”³³⁾江阴利港乡在土地分配基本结束时，农民对参加组织的认识仍很模糊，如九村贫农张山林等说：“我们穷人一天不做，一天就没饭吃，参加农会要常常开会，不去还不是一样分田”。³⁴⁾正如简·奥伊所言，在当代中国农村的政治发展中，“有意义的政治参与的正式渠道”是很弱的。³⁵⁾

作为一个巨大的社会变革和利益调整过程，土地改革在改变着农村经济秩序的同时，也在建立着一种新的社会政治秩序。³⁶⁾农民敏感地调节自己并迅速适应着新权威，但他们对认识和改造旧秩序的思索是有限的，更多是受到无形的“政治正确性”的压力，这种权力的幻觉决定了农民是被动而非真正的自主参与。

三、财产观念：求富抑或均平？

苏南土地改革完成后，在国家行政权力的主导下，农村的生产资料进行了重新分配，农民又站在一个更加均衡的起跑线上开始了新的竞争。基于原有的基础和新的政策影响，各阶层在生产态度上发生了异变，这正反映了他们对财产分配的认识。

中农 青浦县盈中乡南安村中农不买田、不放债、不做生意，怕升为地主富农，作为自耕农主要是“怕负担”、“怕冒尖”、“怕共产”，余粮大多用于生活生产和培养子弟。³⁷⁾吴县富裕中农在思想上有顾虑，觉得“富裕”两字不好，认为和富农差不多。³⁸⁾太仓县新建乡大同村部分中农抱着种种吃吃的思想，生产技术上不图改进。³⁹⁾又如青浦县砂碛乡周家村唐福根土改后连续索还债米12石，经常坐茶馆大吃大用。中农在互助合作中怕吃亏，给贫雇农占了便宜，担心不如贫农吃得开，贷不到款。⁴⁰⁾常熟县扶海乡中农普遍存在怕富、怕算剥削心理。⁴¹⁾再如宜兴县前红乡孙宝章叫穷，谎称麦种吃光却没拿出来晒，结果全蛀坏了。邵天喜、邵玉才在评丰产时实收600多斤，却自报450斤，女人说只有400斤。杨老三三年来卖掉了半条牛、

32) 苏南第二批十一个乡民主建政典型试验工作综合材料195111月，江苏省档案馆档案3006 长 26

33) 武进县鸣凰区雅田乡民主建政工作初步总结，1951 12 1武进档案馆档案1 1 26 1

34) 《苏南土改情况》第33期，1951 3 8。这种搭便车 (free ride) 的现象，反映了农民在政治参与中的利益取向

35) Oi, Jean C. 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llage Governm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36) 黄道炫：《洗脸：1946年至1948年农村土改中的干部整改》，《历史研究》2007年第4

37) 《江苏省农村经济情况调查资料》，1953 2 20，第150。

38) 吴县各阶层生产思想动态，1951，江苏省档案馆档案3070 短 9。

39) 《江苏省农村经济情况调查资料》，1953 2 20，21。

40) 《江苏省农村经济情况调查资料》，1953 2 20，第240。

41) 常熟县南丰区扶海乡土改后农村阶级经济情况变化调查，1951 10 2，江苏省档案馆档案3006 短 33

两把大铁耙、一只新甩桶，生活上较浪费，生产上很少施肥。周盘生、邵金才听说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土地要并家，1952年比1951年少追肥一半。同时向往富农的经营方式，认为参加互助组没好处，一样出工资，还是雇短工称心。参加了互助组的，又往往抬高耕牛工资，压低人工工资，或以占有生产工具换取贫雇农劳力，有的暗中放债，出租土地，想做生意。⁴²⁾

地主 在吴县，一种是老老实实学种田的地主，这里地主大多没有什么社会关系，不种田没有其他出路，又不会做生意。一种是外边有办法活动，用点资本做小生意，不愿从事农业劳动。还有些地主不想做别的事，也不愿种田。⁴³⁾常熟县扶海乡地主一般是被迫参加劳动改造，如杨同豪妻子以前照料小孩也要请女佣人，现已学会种田和推车。个别的地主还存在着消极抗拒思想。⁴⁴⁾青浦县盈中乡南安村地主一种是劳动改造，求得温饱；另一种是荒废生产，听凭摆布。如石牛村地主俞仲鱼，拒绝修圩，积肥要政府命令。⁴⁵⁾宜兴县前红乡良庄村三户地主，均系村组干部门房氏族，有二户地主出租土地10.81亩，由互助组包种，另一户以畜工换互助组人工，生活水平高于中农，思想上均不愿接受劳动改造。⁴⁶⁾

富农 一种是相信政策的富农，生产比较积极，如浒关东桥乡富农王福根垂肥比往年多，他说：“多收政府并不多要，为什么不多化点本钱呢？”一种是对政策还有怀疑，认为生产发财将来要升地主，如唯亭区湖南乡富农周竹山生产不起劲，怕多收了缴粮重和二次土改，陆墓区徐庄乡富农朱阿三不肯鬻泥，每天都坐半天茶馆。部分富农则认为：“共产党喜欢劳动，不劳动是不行的，将来成份会评为地主。”甬直明镜乡富农朱寿清有两条牛，因谣传分田就想把牛卖掉。⁴⁷⁾常熟县扶海乡少数富农还存在“怕富”、“怕算剥削”、“怕提升成份”、“怕吃大锅饭”，如包茎贵在参加互助组后，因评进的人工较多，顾虑“政府知道了，要当我不劳动的”；沙鸿模、陈金元则少请了人工，造成田间草多，影响了生产。⁴⁸⁾

青浦县盈中乡南安村富农浦永先担心“迟早要共产，土地要归公”，因此上城学簿记，预备转行；有的甚至减少雇工带病劳动，认为“现在不剥削，将来也许要好一些”。还有一种是拉拢互助组，如浦焕文送船借车给王吉祥互助组，希望在政治上取得地位。⁴⁹⁾太仓县新建乡大同村富农周秀甫在调查时说：“我泥土改中分进田（租田变自田）还算富农呢？”并少报历年雇进人工。该村富农龚家藏哭穷：“家里空空的，评我富农真冤枉。”⁵⁰⁾奉贤县砂碛乡周家村富农土改中送田22.6亩，怕评地主和公粮负担，同时不敢借贷，囤积了多余棉、粮，不卖给政府。⁵¹⁾

贫农 相对于富农、中农的怕冒尖，部分贫农则盼望“社会主义”的到来，如太仓县新建乡大同村贫农龚二官说：“希望社会主义早些来，到了社会主义大家可以一样了。”经济未上升

42) 《江苏省农村经济情况调查资料》，1953 2 20，第1 115

43) 吴县各阶层生产思想动态，1951，江苏省档案馆档案3070 短 9。

44) 常熟县南丰区扶海乡土改后农村阶级经济情况变化调查，1951 10 2，江苏省档案馆档案3006 短 33

45) 《江苏省农村经济情况调查资料》，1953 2 20，第150。

46) 《江苏省农村经济情况调查资料》，1953 2 20，第115

47) 吴县各阶层生产思想动态，1951，江苏省档案馆档案3070 短 9。

48) 常熟县南丰区扶海乡土改后农村阶级经济情况变化调查，1951 10 2，江苏省档案馆档案3006 短 33

49) 《江苏省农村经济情况调查资料》，1953 2 20，第15 15。

50) 《江苏省农村经济情况调查资料》，1953 2 20，21。

51) 《江苏省农村经济情况调查资料》，1953 2 20，第24 24。

的贫农，由于底子亏，生产资金不足，生产、生活较困难，想依赖政府贷款。⁵²⁾奉贤县砂碛乡、青浦县盈中乡也有这种情况，部分还存在着单纯依赖救济的思想。⁵³⁾个别贫农无发家要求，生产不够积极，如宜兴县前红乡良庄村万富根过去一贯好赌懒做，土改后生产仍不够积极，产量很低，生活没有提高。⁵⁴⁾吴县少数贫农因分得的是远路田，不高兴种，不大到田内去做工，要把田还给政府。还有嫌田不好就不肯出力种，如陆墓区胡巷乡顾家华分得7亩田，村长要他放堽壅，他说：“肚皮都吃勿饱，还堽什么壅！”还有一些得田户实在缺乏肥料、种籽、农具，对种田没信心。此外还有一些二流子得到田不想种，如甬直湖东乡二流子曹阿水分了田自己不种要放出去，湖北乡二流子张道立不肯鬻河泥。⁵⁵⁾奉贤县砂碛乡生活困难户周寿均不安心农业生产，想改行做生意，已两次贩柴到上海出售。⁵⁶⁾

小土地出租者 希望参加互助组，解决缺乏劳力、农具的困难，因达不到目的而发愁。如宜兴县前红乡良庄村蔡秀英说：“就愁人家能到社会主义，我不能到社会主义。”个别的年老垂死，无嫡系亲属，肥料不愿多堽，怕生产了自己却享受不到。⁵⁷⁾

由此可见，熔铸了国家意志的财产分配动摇了土地产权的边界，冲击着农民的私有观念，导致了他们极为矛盾的生存心态。土改后农民的发家求富心理的侧重点是“发家”，这与互助合作的共同富裕取向是矛盾的。这一矛盾表现在对生产关系变革的态度上，即是农民对单干感兴趣，而对“组织起来”十分苦恼。⁵⁸⁾一般得田户都愿努力生产，如吴县黄埭区倪会乡贫农尤良四，一家四口分得9亩多田，打麦压土，麦田上了9船白河泥的肥，菜籽田也上了粪，开好灰潭，修好农具，和人合买了一条耕牛，积极进行生产。⁵⁹⁾据苏南11个乡调查，土改后干群较多地存在“麻痹松懈”、埋头生产、不问政治的思想，农民反映：“毛主席领导我们分了土地是为了生产，不生产要饿死，不开会不要紧。”⁶⁰⁾太仓县新建乡大同村农会主任贫农龚守元，1951年辞去干部后埋头生产，兼做杀羊副业。奉贤县砂碛乡周家村汤涌泉原系乡委员，土改后连会议都不参加。⁶¹⁾经济上升的贫农，要求发家致富享受生活，如宜兴县前红乡良庄村邵寿洪土改后，农、副业生产提高，新造了房屋，买了轧稻机，参加互助组怕吃亏，退组单干，干部动员几次，仍不肯参加，娶媳妇铺张用去稻3000斤。⁶²⁾

农民在土改后无论是埋首生产还是态度消极怕冒尖，往往会被视为重视眼前利益的自私性或平均主义，尤其强调农民具有平均主义的思想特征。周晓虹认为，尽管土地改革彻底摧毁了封建的土地占有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但土改以后以土地为主的农村社会的经济条件比以往要更为平均，而更为重要的是土改还强化了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土地改革弱化了乡村社会的血缘关系，却通过平分土地将一部分流出土地的农民又拉回到土地上，强化了广大农民对私有土地的依附性，强化了他们的平均主义的“乌托邦”理想。因而地缘关系又得到

52) 《江苏省农村经济情况调查资料》，1953 2 20，第213

53) 《江苏省农村经济情况调查资料》，1953 2 20，第241。

54) 《江苏省农村经济情况调查资料》，1953 2 20，第115

55) 吴县各阶层生产思想动态，1951，江苏省档案馆档案3070 短 9。

56) 《江苏省农村经济情况调查资料》，1953 2 20，第240。

57) 《江苏省农村经济情况调查资料》，1953 2 20，第115

58) 李立：《土地改革与农民社会心理变迁》，《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4

59) 吴县各阶层生产思想动态，1951，江苏省档案馆档案3070 短 9。

60) 苏南第二批十一个乡民主建政典型试验工作综合材料，1951月，江苏省档案馆档案3006 长 26。

61) 《江苏省农村经济情况调查资料》，1953 2 20，第21240

62) 《江苏省农村经济情况调查资料》，1953 2 20，第115

了强化。⁶³⁾他还指出, 如果从社会心态的角度来剖析平均主义的内涵的话, 那么, 可以说是重视“有限资源”。表面上的平均分配只是平均主义的一个方面, 它的另一个方面则表现为非常嫉妒他人发财。⁶⁴⁾

卢晖临也认为, 在正常秩序下, 对财产的敬畏和尊重是明面, 平均主义是暗面, 后者潜伏在农民心理的角落, 即或表现, 也是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细节中。但是在暴力打破正常秩序的特殊情况下, 平均主义就可能陡然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泛滥。像暴动中的杀富济贫一样, 土改运动也体现了农民的这种平均主义。⁶⁵⁾

这些观点看似辩证, 实则忽视了农村不同阶层的内部差别, 尤其是土改后步入正常生产阶段的情形。其实农民个体小生产者与平均主义本质上处于对立的地位。私有财产是个体农民的本质属性, 诚如毛泽东所说, “私有”是农民的“天性”。⁶⁶⁾而这种私有“天性”却正是“公有”与“共有”的对立物。列宁指出, 在商品经济的作用下, “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的和资产阶级的。”⁶⁷⁾个体小农经济产生之后, 它作为一个生产单位, 一方面将劳动好坏与劳动报酬紧密相联, 另一方面则与商品经济共存, 自身就具有自发的竞争激励功能、求富向上的欲望和市场基因。农民作为小生产者, 生性决定了它与平均主义的根本对立。⁶⁸⁾

同时所谓的平均主义是与生存状态相关联的。当部分农民濒临生存危机的边缘时, 均富贫的动机特别强烈, 其实质乃是“平进来”而非“均出去”, 或较富有的农民出于安全考虑也会帮助和救济穷人。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 个体小农作为一个生产单位, 绝不是追求平均, 他们追求的是一家一户的发财(正如崇拜赵公元帅), 贫农希望成为中农, 中农再想成为富农, 发财致富才是他们的“天性”, 只不过方式有正当与不正当之别。他们既不轻易允许别人来分享自己的财产(从家产继承的纠纷可见一斑), 也不敢随意侵犯别人的财产。如在陕北骥村土改时, 勤劳致富的女劳模巩兰对村里有人到地主家抢东西表示不屑:“这斗地主那阵, 咱不跟那(地主们)要什么, 咱自己下来挣下(钱)就对了。(那些人)背人家(地主)的那, 人家挣的嘛, 咱把人家抢了去?!”⁶⁹⁾相反在集体化过程中, 农民对一大二公的生产分配方式是一次次的抵制。这是一种生存伦理, 而非平均主义所能概括。⁷⁰⁾我们对农民财产观念的评价, 必须从他们的生存状况来考察, 简单地以平均主义概括既不公正, 也容易陷入“进步”或“落后”的二元评价。

63) 周晓《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第154、156、160 162页

64) 周晓《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第69页

65) 卢晖《革命前后中国乡村社会分化模式及其变迁: 社区研究的发现》, 《中国乡村研究》(第一辑), 商务印书馆2003, 第161页。

66) 毛泽东:《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 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第492页

67)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列宁选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第181页

68) 参见温锐:《理想·历史·现实——毛泽东与中国农村经济变革》,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版, 第180 186页

69) 李放春:《北方土改中的“翻身”与“生产”——中国革命现代性的一个话语 历史矛盾溯考》, 载《中国乡村研究》(第三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第271页

70) 或许平均主义更符合农业经济时代国家对稳定的考虑, 伴随着王朝重建的往往是自耕农的复兴。

신분이동과 권위인정 및 재산관념

- 1950년대 초 중국 농민의 사회적 심리변화 -

张一平 (上海財經大)

〈目次〉

1. 신분이동: 향민에서 계급으로
2. 권위인정: 일상생활 속 말의 형성
3. 재산관: 부의 축적인가, 평등인가?

개요: 1950년대 초 중국의 토지개혁은 농촌의 전통적인 토지제도를 바꾸어놓았을 뿐 아니라 농민의 사회적 심리변화에도 많은 영향을 미쳤다. 특히 장쑤(江蘇) 남쪽 농민의 신분은 향민에서 계급으로 변화했고 일상생활 속에서 권위를 갖는 새로운 말들이 형성되었으며 사유재산에 대한 개념 역시 변화했다. 또한 이러한 현상들은 국가와 농민의 관계를 다시 자리매김하도록 했다.

핵심 단어: 토지개혁, 신분이동, 권위인정, 재산관

중국에서 토지란 전통적으로 희소성을 지닌 중요한 생산요소였을 뿐 아니라 사회적 권력을 만들어내는 기반이 되기도 했다. 20세기 중국의 토지분배로 인한 이익의 충돌은 농촌의 노동력 동원과 구조를 변화시키는 주요 동력이 되었다. 청에서 중화민국으로 그리고 개혁개방을 이룬 중화인민공화국을 설립하기까지 중국의 토지제도는 전통적인 통치질서의 종결, 농업협력화, 인민공사 설립 등을 거쳤으며 이는 농민의 사회적 심리변화에도 많은 영향을 미쳤다. 본문은 1950년대 초기 수난(蘇南)지역의 토지개혁을 예로 신분이동, 권위인정, 재산관의 시각에서 그 변화와 영향에 대해 고찰해보았다.

1. 신분이동: 향민에서 계급으로

양수명(梁漱溟)은 중국의 전통적인 향촌사회를 '윤리사회'라 칭했고 페이샤오통(費孝通)은 그 특징에 대해서 '차서격국(差序格局, 중국인들의 서로 소원하면서도 가까운 인간관계를 표현한 말-역주)'이라 표현했다. '차서격국'을 특징으로 하는 사회적 관계의 멀고 가까움, 친밀함과 소원함은 혈연과 지연의 영향을 받았고 특히 혈연의 영

향을 더 많이 받았다.¹⁾ 하지만 중국의 전통사회에서 이러한 차서격국을 특징으로 하는 인간관계가 형성된 진정한 이유는 농촌사회의 한정된 자원을 분배하는 방법이나 패턴 때문이었다.²⁾ 물론 논리적인 사고는 마을 주민들 사이에서 크게는 관혼상제에서부터 작게는 농사일을 하거나 집을 짓거나 음식을 나누어 먹는 등 상호 협력하는 온정 넘치는 농촌사회를 만들어내기도 했다. 하지만 자원의 부족은 결국 이익충돌로 이어졌고 사소한 일이 이웃간 분쟁의 도화선이 되었으며 서로 주고받으며 예를 지키는 습관은 종종 서로가 감당하지 못할 정도로 그 도를 지나쳤다. 생존공간의 제약으로 긴장과 균형이 미묘하게 공존하고 있었던 것이다.

이러한 상황에서 이루어진 토지개혁은 경제적 이익의 불평등을 강조하며 생존의 논리를 강조했고 전통적인 ‘조화’를 깨버렸다. 계급분할은 농촌 개조의 시작점으로써 중국공산당 당원들은 기존의 우수한 사회적, 경제적 바탕을 파괴하는데 성공한 것이다.³⁾ 특히 쑤쿠운동(訴苦運動, 중국인민해방군이 진행한 계급교육의 방법으로 농민을 폄박했던 구사회와 반동분자를 규탄하고 억울함을 호소함으로써 결속력을 다지려 했던 운동-역주)을 벌이는 과정에서 자연상태의 ‘고난’과 ‘고난의식’을 응집시키고 다듬어 그것이 ‘일상생활을 넘어서 국가의 틀과 연계’되도록 했다.⁴⁾ 억울함을 호소하는 과정에서 농민과 지주에게 각각 상이한 교육을 진행해 농민들이 ‘가난의 원인을 찾고, 두 계급 중 누가 누구를 부양하고 있는 것인지’를 자각하도록 했다. 이러한 도덕적 색채가 농후한 경제 뿌리뽑기를 통한 계급분할은 수십 년간 농촌 사회에 정치적인 영향을 미쳤다.⁵⁾

첫째로 계급분할은 농촌사회의 전통적인 권력구조와 계급, 신분에 대한 이해와 평가를 변화시켰다. 계급은 사람들의 정치적 태도와 사회적 지위, 각종 권리의 확립과 판단의 척도가 되었다. 그리고 이러한 이론상의 계급관은 실천 과정에서 ‘부호화’되는 경향을 보였다.⁶⁾ 심지어 ‘신분부호’에 대한 경쟁이 생기기도 했다. 예를 들어 과거 병사란 호위병이자 사형 집행인일 뿐이라 여겼던 농민들이 토지개혁 후에는 앞다투어 군대에 입대하려 했다. 그리고 쑹장(松江) 전(專)구에서는 토지개혁 후 항미원조(抗美援朝)를 위한 중군복이 붙어 정원의 6배가 넘는 인원이 군입대를 희망하기도 했다. 그 결과 엄격한 심사가 이루어졌고 농민들 사이에서는 ‘국민당은 강제 징집을 해도 군사를 모을 수가 없는데, 공산당은 군입대를 인재 선발하듯 한다.’는 말까지 돌았다. 과거 ‘노동의 기쁨’을 알 수 없었던 농민들이 토지개혁 후 노동의 기쁨을 알게 되었고

1) 페이샤오통(費孝通)의 『향토중국 생육제도(鄉土中國 生育制度, 베이징대학출판사 1998년 발행 판 제 26쪽

2) 쑤리핑(孫立平)관, 사회관계와 사회구조(社會關係與社會結構) 『사회학연구(社會學研究)1996년 제5쇄 발행

3) JameRTownsend, Brantl Womac의 중국정치(中國政治, 구쑤(顧速) 외 역자, 장쑤인민출판사 2003년 판 제 267쪽

4) 귀위화(郭於華), 쑤리핑(孫立平)의호소: 농민의 국가관 형성의 중간 매커니즘(訴苦:一種農民國家觀念形成的中介機制에 실중국학술(中國學術 제 12집, 상우(商務)인쇄소 2002년 판 제 133쪽

5) 천이위안(陳益元)의 건국초기 농촌의 기층정권건설에 대한 연구 1949-1957: 후난성 리링현의 예(建國初期農村基層政權建設研究1949-1957:以湖南省醴陵縣爲個案참고, 상하이사회과학원출판사 2006년 판 제 156~159쪽

6) JameRTownsend, Brantl Womac의 중국정치(中國政治, 구쑤(顧速) 외 역자, 장쑤인민출판사 2003년 제12

중요한 일과 부차적인 일, 일이 있다는 것과 일이 없다는 것에 대한 이해를 새롭게 한 것이다.⁷⁾ 그런 이유로 우시(無錫)현 장시(江溪)의 향군은 존경 받는 위치였고 설 등의 명절마다 위로와 위문을 받았다.⁸⁾

둘째로 계급분할을 통해 국가와 사회의 관계에 대한 향촌의 의식이 재정립되었고 해방 후 다시 국가권력의 하이(下移)현상이 일어났다. 이러한 새로운 개념의 국가사회의 관계, 정치구조의 출현은 과거의 국가, 지역유지, 촌락의 삼각구도와는 분명히 다른 것이었다. 계급분할은 ‘국가(그리고 공산당)의 직접적인 영향력을 늘렸고, 재산과 지방에 축적된 권력 지상주의적 권위를 타파했으며, 혈육에 대한 충성을 새롭게 발전하고 있는 법인단체 즉 집체(集體)에 대한 충성으로 전환시켰다.’⁹⁾ 또한 새롭게 정권을 손에 쥔 진보세력들은 국가와 농민을 연결시켜주는 역할을 했을 뿐만 아니라 당의 정책을 집행할 수도 있었다.

셋째로 1925년으로 거슬러 올라가 마오쩌둥의 『중국사회 각 계급의 분석(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을 보면 계급분할을 이렇게 정의 내리고 있다. ‘주로 사회적 재산을 점유하고 있는 정도, 즉 생활이 얼마나 부유한가에 따라서 나뉜다. 이러한 계급의 역사적인 역할에 대한 평정(評定) 역시 그들이 어떠한 사회적 생산력과 방법을 옹호하느냐가 중요한 것이 아니라, 그들이 부유하거나 빈곤한 정도에 따라서 그들을 반(反)혁명, 반(半)혁명, 중립적인 입장, 혁명 참가, 혁명 핵심세력으로 나눈다.’ 만일 단지 할당량과 방법의 개선에만 국한되어 농민의 ‘개별적인 자유와 개별적 해방’을 강조하지 않고, 생산력의 발전을 중요하게 생각하지 않았다면 ‘가난할수록 혁명적이다’라는 생각이 만연해 빈곤의 보편화와 시대에 뒤떨어진 것들이 다시 득세하게 될 것이었다.¹⁰⁾ 그렇기 때문에 농민이 비록 전통적인 종법(宗法)에서 벗어나 발전의 기회를 잡기는 했지만 이는 시작에 불과한 것이었다. 예창천(葉蒼岑) 푸런대학(輔仁大學) 교수는 쑤난(蘇南)에서 농민의 말이 이렇게 변화했음을 발견했다. “너는 지주이다! 너는 지주이다!” 그리고 예 교수가 십대 소녀에게 “어떤 일을 하는 사람이 좋으니?”라고 물었을 때 소녀는 “고용농”이라 답했다.¹¹⁾ 그때부터 계급신분은 ‘광범위한 정치적·사회적 의미를 지니게 되었고’, ‘여자와 아이들은 남자의 혈통을 따르는 방법으로 지주와 부농을 나누는 자들은 후대에 고통을 당하고 희생양이 되었으며 빈농, 고용농 등 계급이 낮을수록 정치적·사회적 지위는 높아져갔다.’¹²⁾ 이러한 주관적이고 정치적 색채가 농후한 계층분할 방법은 그 후 수십 년간 중국 사회구조의 기초가 되었다.

7) 내가 본 쑤난의 토지개혁운동(我所見的蘇南土地改革運動, 1951년 9월 제 152, 154쪽

8) 우시(無錫)현 장시(江溪)향의 토지개혁 후 농촌계급의 경제상황 변화에 대한 보, 1951-10-2시산(錫山)구 기록보관소 기록:B1-1-1

9) Rozma 중국의 현대화(中國의現代化 중비교현대 부분 번역, 장쑤인민출판사 1998년 판 제 488쪽

10) 장이화(姜義華)의 이성결여의 시작(理性缺位的啓蒙, 상하이산롄(三聯)서점 2000년 판 제 215, 376쪽.

11) 내가 본 쑤난의 토지개혁운동(我所見的蘇南土地改革運動, 1951년 9월 제 152, 154쪽

12) Edward Friedma, Paul G. Pickowic, Mark Selde의 중국향촌, 사회주의 국 中國鄉村, 社會主義國』, 타오허산(陶鶴山) 번역, 사회과학문헌출판사 2002년 판 제 147쪽

또한 계급분할은 지주가정 출신의 청년들에게 심리적 충격이 되기도 했다. 그 결과 일부 학생들은 자신의 진보성을 증명하기 위해서 서슴없이 가족과 결별하기도 했다. 신쑤(新蘇)사범학교의 지주가정 출신 학생인 허핑(和平)은 이렇게 말했다. “나는 지주가정에서 태어났습니다. 나는 우리 집의 재산, 토지, 가옥이 모두 농민의 뼈와 살이라는 사실을 잘 알고 있습니다. 나 자신 역시 농민의 피와 땀으로 자라났습니다! 나의 조부는 고향의 지주였고, 부친은 중국인민의 역적이자 일본 제국주의의 앞잡이였습니다. 그들은 농민들을 약탈해 자신의 부와 토지를 늘렸습니다.....나는 그런 지주가정의 반역자가 되고자 합니다.”¹³⁾ 또한 진탄(金壇)현 바이타(白塔)구 화룡(化龍鄉)향의 대지주 샤차오딩(夏朝鼎)은 우시로 도망갔으나 푸싱로(復興路)에서 중룽경(鍾榮庚) 의원의 학생으로 있던 그의 딸 샤메이쥘(夏梅君)에게 발각돼 파출소로 연행되기도 했다.¹⁴⁾

토지개혁 후 지주와 농민의 심리적 대립은 장기화 되었고 정치적 상황에 따라서 변화했다. 예를 들어 쑤저우(蘇州) 웨이팅(唯亭)진의 주이런(朱益稔)과 친신(勤辛) 부대의 왕아휘(王阿惠)는 자식들에게 투쟁의 고통을 잊어서는 안 된다며 향후 ‘잃은 것들을 되찾아야 한다’고 당부했다. 특히 1962년 여름 장제스(蔣介石)가 동남쪽 연해로의 침략을 계획하고 있을 때 일부 지주들은 간부들에게 으름장을 놓으면 말했다. “장제스가 돌아오면 우선 지도자급 간부를 처단한 뒤 나머지 간부들도 처단할 것이다.” 또한 신민(新民) 부대의 부대장이자 당원이었던 우근소우(吳根壽)는 지주였던 마지강(馬紀康)을 불러 자신의 형제를 위해 토지개혁 당시 38묘의 밭이 있었다는 내용의 분가서(分家書)를 쓰도록 했다. 그리고 형제들에게 이렇게 말했다. “지금 마오 주석이 지도자로 있고 나는 부대장이며 너희들은 나에게 의지하고 있다. 만일 장제스가 넘어오더라도 우리에게는 빠져나갈 구멍이 있으니 걱정할 필요는 없다.”¹⁵⁾ 저장(浙江) 린하이(臨海)현의 한 지주는 아들에게 토지개혁으로 분할되는 토지와 가옥에 대한 승인을 하도록 했고, 또 어떤 지주는 ‘변천장(變天帳, 세상이 다시 바뀌면 되찾아야 하는 재물에 대해 기록한 장부·역주)’과 ‘원한 등록부’등을 아들과 손자에게 남겨 원수를 갚도록 하기도 했다.¹⁶⁾ 장닝현(江寧縣) 동산공사(東山公社)에는 모두 306명의 지주의 자녀가 있었는데 사회주의 교육운동을 실행하기 전에는 ‘72.9%의 사람과 가정의 범주가 명확하지 않았고, 당과 가난한 중하층 농민 사이는 거리가 있었다. 9.2%의 사람들은 안 좋은 영향을 받아 ‘가정의 편에 서서 반동입장을 취했으며’, 당과 가난한 중하층 농민을 적대시했다. 생각이 비교적 진보한 17.9%의 사람들은 사회주의를 옹호하고 당과 가난한 중하층 농민에 가까이 다가섰지만 자신의 앞날

13) <지주가정의 죄악>, 1950년 10월 25일쑤저우바오(新報)

14) 《샤메이쥘이 도주한 지주 아버지를 고발했다》, 1951년 5월 21일쑤야오바오(曉報)무시(無錫)편

15) 우(吳)현 웨이팅(唯亭)공사 사회주의 교육운동 시범작업 총괄 작업반 전체간부회의에서 추장(儲江)동지의 총괄 보고196년월1, 중국 쑤저우 지역위원회 사무실에서 출판한농촌 사회주의 교육운동 자료(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資料에 실린 자료196년11

16) 뤼룽차(柳榮昌), 서벤벤(邊編)의지주는 농민을 어떻게 착취하고 압박했는가(地主怎樣剝削和壓迫農民的, 중국청년출판사 1963년 판 제 76쪽

에 대해서는 역시 걱정하는 태도를 취했다.’ 그리고 대다수의 간부들은 부유한 지주의 자녀들을 ‘소지주(小地主)’ 혹은 ‘소부농(小富農)’이라 불렀다.¹⁷⁾

취샤오홍(周曉虹)은 토지개혁 후 지주, 부농, 고용농, 빈농, 중농(中農)은 역사적으로 남겨진 일종의 계급신분을 표시하는 것일 뿐 이미 전통적인 의미를 지니고 있지는 않았다고 말했다. “실사구시적으로 말해서 새로운 기층 정권을 공고히 하고, 토지개혁의 긍정적인 성과를 옹호하며, 전복된 지주와 부농계급의 반항과 파괴행위를 예방하는 차원에서 이러한 계급신분 부호체제를 일시적으로 지속 사용하는 것은 어느 정도 긍정적인 의미를 지닌다.”¹⁸⁾ 하지만 중국에서 이러한 계급신분 부호체제는 30년 동안이나 계속되었을 뿐 아니라 신뢰를 잃어버리는 지경까지 갔다.

2. 권위인증: 일상생활 속 말의 형성

마르크스는 『루이 보나파르트의 브뤼메르 18일』에서 프랑스의 소작농을 이렇게 묘사하고 있다. ‘그들은 자신이 자신을 대표할 수 없고 반드시 다른 사람들이 그들을 대표해주어야 한다. 그들의 대표는 그들의 통치자이고, 그들보다 높은 권위를 지니며, 권력의 제한을 받지 않는다. 이러한 권력은 그들이 다른 계급의 침범을 받지 않도록 보호해주며 그들 위에서 빛과 비를 내린다.’¹⁹⁾ 하늘이 내린 힘과 관료의 권위는 농민들을 통치했고 정치적 참여와 실천, 주인의식의 결여로 그들은 미신을 믿거나 신을 숭배했으며 정권에 대한 인식은 주로 ‘권력보호’와 ‘비와 빛’에 있을 뿐이었고 실리적인 생존에 대한 요구는 농민의 행동방식을 규정하고는 했다.

토지개혁이 전통적인 향촌의 이익패턴을 파괴함에 따라서 농민의 존경의 대상은 변하기 시작했고 새로운 권위를 지지는 말들이 형성되기 시작했다. 우장(吳江) 일대 농민들은 불상 앞에서 향을 피우며 기도하는 것을 즐겼다. 그래서 전저(震澤)진의 향가게에는 항상 많은 향과 지방이 쌓여있었다. 그러나 토지개혁이 있을 뒤 향가게의 장사는 점점 단출 해졌고 대부분의 농민들은 더 이상 불상 앞에서 향을 태우며 기도를 하지 않았으며 조상에게 제를 올리지도 않았다. 반면 마오 주석의 초상화를 섬겼다.²⁰⁾ 그런 이유로 쑤난(蘇南)에서는 ‘마오 주석의 초상화가 불티나게 팔렸다!’²¹⁾ 타이창(太倉)현 수양평(雙鳳)구에서 경축대회가 열릴 때 신마오(新毛)향의 빈농 주샤오거우(朱小狗)는 이런 말을 했다. “마오 주석은 나의 주인이고 나를 지옥에서 구해 천국으로 보내주었다.” 또한 장씨 성을 가진 한 농부는 이렇게 말했다. “지난 해 30일

17) 중국 장쑤성 위원회 사무실에서 출판한장쑤 사회운동 브리핑(江蘇社會運動簡報, 제 141회, 1965년 10월 7일)

18) 취샤오홍(周曉虹)의 전통과 변천-장저 농민의 사회적 심리 및 근대이후의 변천(傳統與變遷-江浙農民的社會心理及其近代以來變, 산렌서점 1998년 판 제 159쪽)

19) 마르크스-엔겔스 전 제 4권, 인민출판사 1972년 판 제 295쪽

20) 내가 본 쑤난의 토지개혁운동(我所見的蘇南土地改革運動, 195년월 제15, 15쪽)

21) 판광단(潘光旦), 쉐웨이텐(全慰天)의 쑤난 토지개혁 방문기(蘇南土地改革訪問記, 산렌서점 1952년 판 제 114쪽)

은 임대료를 내느라 집에는 먹을 쌀이 한 톨도 없었는데 올해 30일에는 많은 양의 식량을 분배 받아 몸 둘 바를 모르겠다. 상황이 너무 좋아졌다. 마오 주석에게 감사할 따름이다.” 그리고 마오 주석에게 허리를 굽혀 절을 했다. 부녀자 대표였던 진니다(金妮大)는 또 이런 말을 했다. “마오 주석이 온 뒤 남녀 모두의 상황이 개선되었다. 첫째로 토지와 재산을 얻었고 둘째로 가난했던 나는 천하를 가질 수 있었다.” 군속(軍屬)대표였던 장라오타이(江老太)는 “구와 현에서 회의가 열리자 현장과 구장(區長)은 경사가 난 것마냥 꽃과 술로 나를 환영해주었다. 나는 모든 곳에서 환영 받는 사람이 되었다.”라고 했다.²²⁾ 난휘(南匯)현 신젠(新建)향 농민은 이렇게 말했다. “마오 주석의 정책이 없었더라면 우리가 어떻게 이런 것들을 얻을 수 있었겠는가?” 60여세의 지위스(季餘氏)는 심지어 이런 말을 하기까지 했다. “내가 얻고 얻지 못하고는 아무 의미가 없다. 어찌되었든 나는 자유의 몸이 되었다.”²³⁾ 이 모두는 농민들이 새로운 정권 하에서 얻은 이익에 대해 얼마나 만족했는지를 반영하는 예들이다.

진탄(金壇)현 즈시(直溪)구에서 1951년 1월 중순에 토지분배 작업이 끝난 뒤 ‘과거를 돌아보고, 오늘과 비교하며, 내일을 인식하라(想想過去, 比比今天, 認識將來).’는 구호가 제창되었고 농민들은 그 동안의 고통을 호소했다. ‘간부와 대중들은 장제스의 죄악에 대해 끝도 없는 분노를 표출했으며 회의에 참가한 모든 이들은 목놓아 통곡했고 일반적이거나 진일보한 사람들은 계급에 대한 자각을 제고시켰다. 이렇듯 대중들은 오늘날의 해방에 대해 기쁨을 표했고 공산당과 마오 주석 그리고 해방군에게 감사를 표했다. 또한 미국과 장제스에 대한 증오를 나타냈으며(모두 태도를 표명했다.) 군입대를 원했고 군대와 혁명군인가족들을 우대했다. 또한 생산에 박차를 가하기 전에 지주계급을 단속했다.’²⁴⁾ 쿤산(昆山) 화시(花溪)향의 한 빈농은 토지를 분배 받은 뒤 말했다. “과거 우리 같은 사람들은 돈이 있어도 밭을 살수 없었다. 하지만 이제 마오 주석의 지도하에 밭을 분배 받았다.” 정책에 대해서 대중들은 “마오 주석의 정책은 모두 인민들을 위한 것이다.”라고 칭송했다. 타이창(太倉) 칭핑(慶豐)향에서 밭이 분배되고 있을 때 한 농민이 자신이 분배 받은 밭을 둘러보러 와서는 마오 주석의 초상화를 보고 “마오 주석님 제가 밭을 가졌습니다.”라고 말했다. 같은 향에서 먼저 밭을 할당 받은 가오페이량(高培良)은 또 아들에게 이런 말을 하기도 했다. “아들아, 명심해라! 네가 크면 오늘날 네 아버지가 어떻게 해방되었는지를 너의 후손들에게 꼭 알려야 한다.” 시자오(西郊)진의 한 노인은 5묘의 밭을 받은 뒤 세 차례나 아이들에게 밭을 보여주었다. 그리고 이렇게 말했다. “과거에는 이 밭을 열심히 일궈 지주에게 생산된 모든 것을 받쳤는데 이제는 마오 주석의 지도하에 내 것이 되었다. 절대로 마오 주석의 은혜를 잊으면 안 된다.”²⁵⁾

22) 쑤난의 토지개혁 상황(蘇南土改情況 제 36회, 1951년 3월 19일

23) 쑤난의 토지개혁 상황(蘇南土改情況 제3회195년월

24) 쑤난의 토지개혁 상황(蘇南土改情況 제3,195년월2

25) 쑤난의 토지개혁 상황(蘇南土改情況 제,195년월3

일반적으로 농민들의 교제범위는 협소했고 그들이 이해하는 것이란 자신의 주변 상황이 전부였다. 이렇듯 지식이 부족하고 감정이 모호한 농민들이 계급의 개념을 이해하기란 쉬운 일이 아니었고 그렇기 때문에 사실상 외부의 영향을 많이 받을 수밖에 없었다. 계급의 적을 타도한 사람의 말에 따르면 사실상 일상생활을 통해 농민들은 당과 마오 주석에 대해 알게 되었고 더 나아가 국가의 합법성을 인정하게 되었다고 한다. 하지만 농민의 국가관과 민주의식은 이에 발맞춰 나가지 못했고 여전히 권력의 영향을 받았다. 해방감 수립의 목표는 구질서에 반대하는 단체의식을 형성하는 것이었다. 그래서 모든 이들이 침묵하지 않고 참여하도록 했으며 이렇게 해서 농민 심리의 단체의식을 형성하게 되었다.

이러한 말들을 통해 농민들은 대세에 따르며, 생산증가의 공을 새로운 정부에게 돌리는 방법을 배웠다. 우시현 화이우(懷五)향 푸원싱(浦文興) 호조회(互助組, 생산·작업·학습 등을 서로 돕는 소그룹역주)의 구성원들은 1952년 밀 수확이 풍년을 이루자 입가에 웃음꽃을 피우며 말했다. “이 모두는 비료를 많이 주고, 더 많은 노력을 기울이며, 도랑을 만들어 물을 대라는 마오 주석의 말을 들었기 때문이다. 그렇게 하니 과연 밀이 풍작을 이뤘다!”²⁶⁾ 우시 시장(西漳)구 농민 뤼취바오(劉秋寶)는 기자에게 이렇게 말했다. “해방 후 땅을 분배 받은 뒤 인민정부의 올바른 지도 덕분에 생산량이 대폭 늘었다. 인민정부는 우리의 이익을 보호하기 위해 농업품의 가격을 올려 우리가 손해 보는 일이 없도록 했다……나는 이런 생각을 해본다. 만일 마오 주석과 공산당이 없었다면 우리가 이렇게 좋은 날을 맞이할 수 있었을까?”²⁷⁾ 물론 이러한 감사의 말들이 주류를 이루었고 농민의 정치 참여도 확대되었지만 진정한 의미의 주체성은 여전히 형성되지 않고 있었다.

뿐만 아니라 농민의 마오 주석에 대한 감사는 신문 등 그러한 종류의 말을 확대 선전하는 매체의 영향을 받았다. 1951년 쑤저우시 후취(虎丘)진 안러(安樂)촌 농민이 마오쩌둥에게 보낸 편지를 보겠다.

중국공산당과 마오 주석의 뛰어난 지도 때문에 그리고 중국인민해방군의 용기와 기백으로 중국 대륙에서 장제스 패거리를 몰아냈고 봉건세력을 타파했으며 지주계급을 타도하고 나와 같은 가난한 사람들이 고통의 바다에서 구조받아 자유를 얻었습니다. 그리고 저는 주인이 될 수 있었습니다. 이 모든 것들은 주석의 뛰어난 지도 때문입니다……

현재 저는 이미 토지를 분배 받았고 그로 인해 더 이상 핍박 받거나 착취당하지 않고 내 손으로 기른 농작물을 내가 향유할 수 있게 되었습니다. 최근에 저는 대회를 열어 애국공약에 서명했고 법씨를 잘 씻고, 비료를 많이 주며, 못자리를 잘 사용하고, 명충(螟蟲)을 박멸시킬 것을 약속했습니다. 또한 한 묘당 백분지 이십오만큼 증산할

26) 《마오 주석의 말을 따르니 밀 농사가 풍작을 거뒀다》, 1952년 7월 11일쑤난농촌청년(蘇南農村青年(無錫편))

27) 《해방은 공산당의 덕이고, 넉넉한 생활에 기뻐하다》, 1951년 6월 25일샤오바오(曉報(無錫편))

것을 약속했습니다. 반드시 반혁명활동을 엄격히 진압하고 항미원조 운동을 확산시켜 중국과 북한의 군사를 지지하고 세계평화를 수호하기 위해 투쟁할 것입니다.²⁸⁾

쭈저우 청둥(城東)구 뤼둥(婁東)향 허신(合心)촌 제 4조 그룹의 농민은 마오쩌둥에게 보내는 편지에서 해방 전에는 지주에게 뽕박과 착취를 당했다 밝히며 토지개혁 후 생산이 증가할 때 이렇게 말했다. “마오 주석님, 당신을 생각하면 기쁘고 온 몸에서 힘이 쏟아냅니다. 주석과 공산당의 지도하의 인민정부는 우리에게 많은 관심을 보여주고 있습니다. 우리에게 주석님은 부모보다 더 친밀한 존재입니다.”²⁹⁾ 농민은 거의 아침에 가까운 말로 자신의 충성을 표했고 이는 국가와 농민의 ‘비호(庇護)’관계의 지속을 의미했다. 새로운 정부는 농민들의 꿈인 청렴하고 공정한 관리가 되어준 것이다. 타이창 리민(利民)향 창징(長涇)촌 농민 루아푸(呂阿福)와 루아주(呂阿祖) 형제는 해방 전 대나무 밭을 얻으려 했다 고소를 당했다. 하지만 토지개혁 과정에서 촌장과 촌민들은 이는 구사회의 잔재라며 국민당 정부는 농민을 위해 아무런 일도 하지 않았을 뿐 아니라 작은 일을 크게 만들어 사기 갈취하였기 때문에 양측이 서로 한발씩 양보하는 방향으로 일을 처리하도록 했다. 그렇기 때문에 농민들은 몇 대에 걸쳐 해결하지 못했던 일들을 마오 주석이 온 뒤 말끔하게 해결할 수 있었다. 우수(伍胥)향 농민은 과거에는 사건을 관청에 신고하면 오히려 일이 더 커지고, 먼저 뇌물을 준 사람이 승리하고 했는데 마오 주석이 집권한 뒤에는 돈 한푼 들이지 않아도 척척 일이 해결된다고 말했다.³⁰⁾

청샤오(程畝) 선생은 일반적으로 농민들은 의존심리, 관료를 두려워하는 심리, 권력편향심리 등 권력승배의식을 갖고 있다고 말했다.³¹⁾ 해방군이 빠르게 남하하며 중국통일의 쾌거를 달성하는 등 새로운 정권의 신속하고 단호한 행동과 토지개혁으로 인한 엄청난 변화는 모든 쭈난 주민들에게 깊은 인상을 남겼다. 또한 ‘마오 주석’이란 최고 권위 앞에서 경외감과 충성을 표하게 되었다.

또한 농민들은 적극적으로 정치에 참여하는 태도를 보였다. 예를 들어 신징향에서 인민대표대회가 열리자 장푸추안(蔣福全) 대표는 아들이 사경을 헤매는 상황에서도 대회에 참가해 끝까지 자리를 지켰다. 또 펑추안건(馮全根) 대표는 대회가 열린 첫날 결혼을 했지만 둘째 날 대회에 참가해 이렇게 말했다. “내가 오늘 대회에 참가한 이유는 마오 주석 때문만이 아니다. 대회에서 논의되는 일들은 바로 우리 모두의 일이기 때문이다!” 화이시(懷西)향에서 회의에 참석하지 못한 농민 민진위안(閔金元)은 이런 말을 했다. “마오 주석 덕분에 4묘의 밭을 얻었는데 나는 마오 주석을 위해 아무것도 한 것이 없다. 토지개혁 후 대회에도 참가하지 못했다. 마오 주석에게 죄송할

28) 《후취(虎邱)진 안러(安樂)촌 전체 농민이 마오 주석에게 감사의 편지를 쓰다》, 1951년 5월 25일쑤신쭈저우바오新報

29) 《마오 주석은 부모 보다 더 친근하며 공산당의 은혜는 끝이 없다 뤼둥향 허신촌 제 4조 전체 농민이 마오 주석에서 보낸 편지》, 1951년 6월 29일쑤저우바오(新報)

30) 쭈난의 토지개혁 상황(蘇南土改情況 제 50회, 1951년 5월 29일

31) 청샤오(程) 의완칭향토의식(晚淸鄉土意識, 중국인민대학출판사 1990년 판 제 50~51쪽

따름이고 이는 나의 양심에도 위배되는 것이다. 앞으로 열리는 회의에는 내가 가장 먼저 출석할 것이다.”³²⁾ 하지만 이러한 권위숭배는 그로 인해 얻게 되는 것이 있었기 때문에 유지되는 것이었다. 그렇지 않았다면 농민들은 실용주의의 입장에서 다소 소원한 태도를 보였을 것이다. 예를 들어 우진(武進)현 명황(鳴皇)구 야텐(雅田)향 농민은 토지개혁 후 ‘토지는 얻었지만, 농민협회는 참가하지 않겠다.’ ‘간부를 교체할 필요가 있다.’ ‘회의는 예전과 다를 바 없다.’라고 생각했다. 또한 “인민정부는 다 좋은데 한가지 문제가 있다면 너무 많은 현물세를 내야 한다는 것이다.” “해방군의 문제는 일 처리가 너무 급하다는 것이다!” “마오 주석은 사장이고 우리는 고용농이며 밥을 먹기 위해 일을 하는 것이다.”라는 원망의 소리도 있었다.³³⁾ 장인(江陰)현 리강(利港)향의 토지가 거의 분배됐을 무렵에도 조직참가에 대한 농민들의 인식은 여전히 모호했다. 예를 들어 지우(九)촌의 장산린(張山林) 등의 빈농들은 “우리 같이 가난한 사람들은 하루 번 것으로 하루를 먹고 산다. 그런데 농민협회에 참가하고 시시때때로 회의를 열어야 한다. 가지 않는다고 받은 분배 받지 못하는 것은 아니다.”라고 했다.³⁴⁾ 이는 Jean Oi의 말대로 현대 중국 농촌의 정치발전에서 ‘의미 있는 정치참여를 위한 공식적 루트’는 드물다는 것과 일맥상통하는 것이다.³⁵⁾

거대한 사회변혁과 이익을 조절하는 과정에서 토지개혁은 농촌의 경제질서를 변화시켰고 새로운 사회적·정치적 질서를 만들어냈다.³⁶⁾ 농민들은 민감하게 자신을 변화시켰고 신속하게 새로운 권위에 적응했지만 구질서를 바꾸겠다는 생각에는 여전히 한계가 있었고 대부분이 무형의 ‘정치 정확성’의 압력을 받았다. 이러한 권위에 대한 환상은 농민을 피동적으로 만들고 진정한 자주적 참여를 방해했다.

3. 재산관 : 부의 축적인가, 평등인가?

쭈난의 토지개혁이 끝난 뒤 국가 행정정권의 지도하에 농촌의 생산자원에 대한 재분배가 진행되었고 농민들은 더욱 균형 잡힌 출발점에서 새로운 경쟁을 시작하게 되었다. 전통적인 바탕과 새로운 정책의 영향으로 각 계층은 생산태도에 있어서 상이한 반응을 보였다. 그리고 이는 재산 분배에 대한 그들의 인식을 반영하는 것이기도 했

32) 쭈난 제 2그룹 11개 향의 민주건설을 위한 모범적 시험작업에 대한 종합자료, 1951년 12월 쭈난성 기록보관소 기록:3006-26

33) 우진(武進)현 명평(鳴鳳)구 야텐(雅田)향의 민주건설을 위한 초기작업 총괄, 1951년 12월 12일, 우진구 기록보관소 기록:1-1-26-1

34) 쭈난의 토지개혁 상황(蘇南土改情況 제 33회, 1951년 3월 8일. 이러한 프리 라이딩(freeride) 현상은 정치 참여 과정에서 농민이 추구하는 이익의 동향을 반영해준다

35) Oi, Jean C. 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llage Governm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36) 황다오웬(黃焯)의 세: 1946년부터 1948년까지 농촌 토지개혁 과정에서 간부 정리(臉: 1946年1948年農村土改中的幹部整改, 역사연구(歷史研究 2007년 제 4회

다.

중농(中農, 경제적 지위가 빈농과 부농 사이인 농민·역주) 칭푸(靑浦)현 잉중(盈中)향 난안(南安)촌의 중농들은 지주나 부농이 될 것을 염려해 받을 사지도 않고, 이자를 놓지도 않으며, 생업을 하지도 않았다. 자작농으로써 주로 ‘책임을 꺼리고’, ‘눈에 띄는 것을 싫어하며’, ‘공산당을 두려워했다.’ 남은 식량은 대부분 생활하는데 사용했고 후손을 육성하는데 사용했다.³⁷⁾ 우(吳)현의 부유한 중농들은 사상적으로 꺼리는 것이 있었다. 바로 그들은 ‘부유’라는 단어를 싫어했고 이는 부농과 별반 다를 것이 없다는 생각이었다.³⁸⁾ 타이창현 신젠향 다통(大同)촌의 일부 중농들은 이런저런 생각들 때문에 생산 기술력을 개선시키려 하지 않았다.³⁹⁾ 또한 칭푸현 샤치(砂磧)향 쥐자(周家)촌의 탕푸건(唐福根)은 토지개혁 후 12석의 쌀을 값을 것을 요구하고 찻집에서 시간을 때우고는 했다. 중농들은 상호협력을 하는 과정에서 손해를 보지 않을까 걱정했고 빈농과 고용농들에게 밀려 차관을 받지 못하거나 그들보다 못한 생활을 할까 우려했다.⁴⁰⁾ 창수(常熟)현 푸하이(扶海)향의 중농은 한편으로 부유해질까를 걱정하면서 또 다른 한편으로는 착취를 당하지 않을까 고심했다.⁴¹⁾ 또한 이싱(宜興)현 치안홍(前紅)향의 손바오장(孫寶章)은 자신의 빈곤함을 주장하며 보리 씨를 모두 먹어버렸다는 핑계를 들며 태양 벌에 말리지 않았고 그 결과 모든 보리 씨가 벌레를 먹어 못쓰게 되어버렸다. 샤오텐시(邵天喜)와 샤오위차이(邵玉才)는 풍작 상황을 평가할 때 실제로 600여 근을 수확했지만 450근만을 보고했고 부인은 400근밖에 없다고 말했다. 양라오산(楊老三)은 3년 동안 반 마리의 소와 두 개의 씨레, 한 개의 솔통(甩桶)을 팔아버리는 등 재물을 낭비하고 밭에 비료를 거의 주지 않았다. 저우관성(周盤生)과 샤오진차이는 농업생산협력사를 조직한다는 말을 듣고 토지를 합쳤고 1951년에 비해 비료를 반으로 줄였다. 또한 부농의 경영방식을 동경하고 호조회에 참가하는 것은 아무런 이점이 없다고 생각했으며 계속해서 노임을 주며 품팔이꾼을 고용하려 했다. 호조회에 참가한 중농의 경우에는 종종 밭갈이 소의 노임은 올리고 사람의 노임은 내리려 하거나, 소유하고 있는 생산도구를 빈농이나 고용농의 노동력과 맞바꾸려 했으며 일부는 암암리에 이자를 놓거나 토지를 임대하며 장사를 하려 했다.⁴²⁾

지주 우현에는 여러 부류의 지주가 있었는데 그 중 성실하게 농사 짓는 법을 배우는 지주도 있었다. 이들은 어떠한 사회적 관계도 없었고 농사를 짓지 않으면 살길이 없었으며 장사를 할 줄도 몰랐다. 또 다른 지주는 외부에서 활동을 했고 자본을 가지고 장사를 했으며 농사일을 하려 하지 않았다. 그리고 일부 지주들은 다른 일을 하고

37) 장쑤성 농촌 경제상황 조사자료(江蘇省農村經濟情況調查資料, 1953년 2월 20일짜 제 150쪽
 38) 우현 각 계층의 생산에 대한 생각(吳縣各階層生產思想動態), 1951년, 장쑤성 기록보관소 기록3070-短-9
 39) 장쑤성 농촌 경제상황 조사자료(江蘇省農村經濟情況調查資料, 1955년 2월 2일짜 제 21
 40) 장쑤성 농촌 경제상황 조사자료(江蘇省農村經濟情況調查資料, 1955년 2월 2일짜 24
 41) 토지개혁 후 창수현 난핑구 푸하이향 농촌계급의 경제상황변화에 대한 조사(常熟縣南豐區扶海鄉土改後農村階級經濟情況變化調查, 1955년 1월 2장쑤성 기록보관소 기록:3006-短-33
 42) 장쑤성 농촌 경제상황 조사자료(江蘇省農村經濟情況調查資料, 1955년 2월 2일 제 111

싫어하지도 그렇다고 농사를 하려고도 하지 않았다.⁴³⁾ 창수현 푸하이향의 지주는 일반적으로 노동을 통한 개조에 참여할 것을 강요당했다. 예를 들어 양통하오(楊同豪)의 처는 과거에는 아이를 돌보는 식모를 고용했었는데 이제는 농사 짓는 법과 수레를 미는 법을 배웠다. 또한 지주 중 극소수는 소극적인 반항심리를 지니고 있었다.⁴⁴⁾ 칭푸현 잉중향 난안촌의 지주 중 한 부류는 노동을 통한 개조를 통해 윈바오(溫飽)를 추구하고, 또 다른 부류는 생산을 등한시 했으며 배치되는 대로 따랐다. 예를 들어 스니우(石牛)촌의 지주 위중위(俞仲魚)는 시장이 서는 것을 거부했고 정부의 명령에 따라서 비료를 모았다.⁴⁵⁾ 이싱현 첸홍향 량장(良莊)촌의 세 지주는 모두 전통적으로 촌 조직의 경비업무를 맡는 씨족이었는데 그 중 두 지주는 10.81묘의 토지를 임대해 호조회가 맡아서 파종하도록 했고, 다른 한 지주는 가축을 빌려주는 대가로 호조회 사람들의 노동력을 빌려 생활수준이 중농보다 높았으며 사상적으로는 노동을 통한 개조를 받지 않으려 했다.⁴⁶⁾

부농 어떤 부류의 부농은 정책을 믿고 비교적 적극적인 자세로 생산에 임했다. 예를 들어 후관(滸關) 동차오(東橋)향의 부농 왕푸건(王福根)은 옛날 보다 더 많은 비료를 주며 이렇게 말했다. “수확이 많다고 정부가 더 많이 요구하는 것도 아닌데 더 많이 투자하지 않을 이유가 있겠는가?” 또 다른 부류는 정책을 의심하는 부농으로 재산을 많이 모우면 앞으로 지주가 될 수 있다고 생각했다. 예를 들어 웨이팅(唯亭)구 후난(湖南)향의 부농 쥐주산(周竹山)은 더 많은 곡식을 납부한다거나 2차의 토지개혁이 있을까 걱정이 되어 생산이 기쁘지 않았다. 뤼무(陸墓)구 쉬장(徐莊)향 부농 주아산(朱阿三)은 반두로 진흙을 건져내려 하지 않았고 매일 찻집에서 시간을 보냈다. 일부 부농들은 “공산당은 일하는 것을 좋아한다. 일하지 않으면 안 된다. 향후 계급은 지주라고 평가 받을 것이다.”라고 생각하기도 했다. 루즈(甬直) 밍징(明鏡)향 부농 주셔우칭(朱壽清)은 두 마리의 소가 있었는데 토지를 분할한다는 소문을 들은 뒤 바로 소를 팔 생각을 했다.⁴⁷⁾ 창수현 푸하이향의 소수 부농들은 여전히 ‘부자가 되는 것을 두려워했고’, ‘착취당할 것을 두려워했으며’, ‘계급이 올라갈 것을 걱정했고’, ‘업적에 상관없이 모두 똑같은 대우를 받을 것을 우려했다.’ 예를 들어 바오징귀(包莖貴)는 호조회에 참가한 뒤 진보적인 인력이 너무 많아 ‘내가 일을 하지 않았다는 사실을 정부가 알았을 것이다.’라며 걱정했고 샤홍모(沙鴻模)와 천진웬(陳金元)은 사람을 적게 부리고, 밭 사이에 풀이 무성하도록 해 생산에 영향을 미쳤다.⁴⁸⁾

칭푸현 잉중향 난안촌의 부농 푸용셴(浦永先)은 ‘머지않아 공산화가 되어 토지가

43) 우현 각 계층의 생산에 대한 생각(吳縣各階層生產思想動態), 1951년, 장쑤성 기록보관소 기3070-短9

44) 토지개혁 후 창수현 난핑구 푸하이향 농촌계급의 경제상황변화에 대한 조사(常熟縣南豐區扶海鄉土改後農村階級經濟情況變化調查, 1951년1월2장쑤성 기록보관소 기록3006-短33

45) 장쑤성 농촌 경제상황 조사자료(江蘇省農村經濟情況調查資料, 1951년월2일 제15

46) 장쑤성 농촌 경제상황 조사자료(江蘇省農村經濟情況調查資料, 1951년월2일 제11쪽

47) 우현 각 계층의 생산에 대한 생각(吳縣各階層生產思想動態), 1951년, 장쑤성 기록보관소 기:3070-短9

48) 토지개혁 후 창수현 난핑구 푸하이향 농촌계급의 경제상황변화에 대한 조사(常熟縣南豐區扶海鄉土改後農村階級經濟情況變化調查, 1951년1월2장쑤성 기록보관소 기록3006-短33

국가에 귀속될 것'을 걱정했다. 그래서 도시에 가 부기를 배워 전업하려 했다. 또한 일부는 심지어 고용농을 줄이고 아픈 몸을 이끌고 일을 하며 '지금 착취하지 않으니 아마도 앞으로는 좀 좋아질 것이다.'라고 생각했다. 또한 어떤 부류는 호조회를 끌어 들었다. 예를 들어 푸환원(浦煥文)은 왕지샹(王吉祥)은 호조회에 배를 보내고 차를 빌려주는 방법으로 정치적 지위를 얻으려 했다.⁴⁹⁾ 타이창현 신젠향 다통촌 부농 쥬쉬푸(周秀甫)는 조사에서 이렇게 말했다. "나는 토지개혁 과정에서 밭을 분할해 나누어주었다(임대하던 밭을 자유롭게 사용하도록 했다). 그런데 내가 아직도 부농이라 할 수 있는가?" 그리고 여러 해 동안 고용했던 인부를 줄여서 보고했다. 같은 촌의 부농 공자창(龔家藏)은 "집안이 텅텅 비었는데 나를 보고 부농이라 하다니 정말 억울하다."며 우는 소리를 했다.⁵⁰⁾ 평셴(奉賢)현 샤치(砂磧)향 쥬자(周家)촌 부농은 토지개혁 과정에서 22.6묘의 땅을 내놓았고, 지주라는 평가를 받을까 걱정했으며, 현물세를 걱정했다. 또한 돈을 빌려주려 하지 않았고 많은 양의 면화와 곡식을 쌓아놓고 정부에게 팔지 않았다.⁵¹⁾

빈농 부농과 중농이 두드러지는 것을 두려워하는 것과는 반대로 일부 빈농은 '사회주의'의 도래를 간절히 바랐다. 예를 들어 타이창현 신젠향 다통촌의 빈농 궁얼관(龔二官)은 "사회주의가 빨리 오기를 바란다. 사회주의가 되면 모두가 똑같아질 수 있다."고 말했다. 경제가 아직 좋아지지 않았던 빈농들은 기반이 없고 생산자산이 부족하기 때문에 생산과 생활이 어려웠고 정부에 의지해 돈을 빌리려 했다.⁵²⁾ 평셴현 샤치향과 칭푸현 잉중향에도 역시 단순히 구제 받기를 기다리는 경우가 많았다.⁵³⁾ 하지만 극소수의 빈농은 집안을 일으키려는 생각이 없었고 생산에도 적극적이지 않았다. 예를 들어 이싱현 첸홍향 량장촌의 완푸건(萬富根)은 변함없이 도박을 즐기며 게으른 생활을 했고 토지개혁 후 생산에서 적극적인 자세를 취하지 않아 생산량이 낮았고 생활은 전혀 개선되지 않았다.⁵⁴⁾ 우현의 일부 빈농은 분배 받은 땅이 너무 멀어 밭에 가서 경작하기가 힘들자 땅을 다시 정부에게 돌려주기도 했다. 혹은 밭이 기름지지 않아 경작을 꺼리는 경우도 있었다. 예를 들어 뤼무구 후샹(胡巷)향의 구자화(顧家華)는 7묘의 밭을 할당 받았는데 촌장이 비료를 주라고 하자 "먹어도 뱃가죽이 부르면 안 되는데 비료는 무슨 비료!"라며 지시에 따르지 않았다. 또한 땅을 받은 가정 중 일부는 실제로 비료와 씨앗, 농기구가 부족해 농사를 지을 수가 없었다. 이 밖에도 일부 건달들은 밭이 있어도 일굴 생각이 없었다. 예를 들어 루즈 후둥향의 건달 차오아쉬(曹阿水)는 땅을 받았으나 일구지 않고 방치했고, 후베이(湖北)향의 건달 장다오리(張道立)는 반두로 강바닥의 진흙을 건져내려 하지 않았다.⁵⁵⁾ 평셴현 샤치향

49) 장쑤성 농촌 경제상황 조사자료(江蘇省農村經濟情況調查資料) 195월2일 제1515

50) 장쑤성 농촌 경제상황 조사자료(江蘇省農村經濟情況調查資料, 195년월2일자 21쪽

51) 장쑤성 농촌 경제상황 조사자료(江蘇省農村經濟情況調查資料, 195년2일자 2424

52) 장쑤성 농촌 경제상황 조사자료(江蘇省農村經濟情況調查資料, 195년월2일자 제21쪽

53) 장쑤성 농촌 경제상황 조사자료(江蘇省農村經濟情況調查資料, 195년월2일자 24,1쪽

54) 장쑤성 농촌 경제상황 조사자료(江蘇省農村經濟情況調查資料, 195년월2일자11쪽

55) 우현 각 계층의 생산에 대한 생각(吳縣各階層生產思想動態), 1951년, 장쑤성 기록보관소 기록3070-短9

의 생활형편이 좋지 않았던 쥐소우권(周壽均)은 농업을 통한 생산을 믿을 수가 없어 장사를 시작했고 장작을 구입해 두 차례나 상하이에 내다 팔았다.⁵⁶⁾

소토지 임대인 호조회에 참여해 인력과 농기구 부족 문제를 해결하려 했으나 뜻대로 되지 않자 걱정했다. 예를 들어 이싱현 첸홍향 량좡촌의 차이쉬잉(蔡秀英)은 “걱정했던 사람들은 사회주의에 진입했지만 나는 사회주의에 진입하지 못했다.”고 말했다. 극소수는 연로해 사망했고, 직계 친척이 없었으며, 퇴비를 많이 주지 않았고, 생산한 것을 자신이 향유하지 못할까 걱정했다.⁵⁷⁾

이렇듯 국가의 의지 하에 재산분배가 이루어졌고, 토지재산권의 경계가 흔들렸으며, 농민이 받은 사유개념에 대한 충격은 그들의 모순적인 생존심리를 이끌어냈다. 토지개혁 후 농민들은 집안을 일으키고 부를 축적하려 했다. 이는 호조회가 제창한 함께 부유해지자는 취지와 상호 모순되는 것이었다. 이러한 모순은 생산관계 변화에 대한 태도에서 분명히 나타났다. 다시 말해 농민들은 개별적으로 일하기를 원했고 ‘조직을 만드는 일’에 대해서는 부담스러워했다.⁵⁸⁾ 일반적으로 땅을 받은 가정은 열심히 생산하려 했다. 예를 들어 우현 황다이(黃埭)구 니휘(倪會)향의 빈농 여우량스(尤良四)의 네 가족은 9묘의 밭을 할당 받아 밀밭을 일구고, 9척의 백하(白河) 진흙의 비료를 뿌렸으며, 채소 밭에도 퇴비를 주었고, 회탄(灰炭)을 뿌리고, 농기구를 수리했으며 사람들과 함께 밭을 경작할 소를 구입하는 등 적극적으로 생산활동에 임했다.⁵⁹⁾ 쑤난의 11개 향을 조사한 결과에 따르면 토지개혁 후 간부와 대중 대부분이 ‘무감각하고 느슨해졌고’, 생산에 몰두하고 정치사상에는 관심을 두지 않았으며 농민들은 ‘마오 주석이 우리에게 토지를 할당한 이유는 생산을 위한 것이기 때문에 생산하지 않으며 굶어 죽어야 하고 회의를 열지 않는 것은 급한 일이 아니다.’라는 반응을 보였다.⁶⁰⁾ 타이창현 신젠향 다통촌 농업협회 주임이자 빈농이었던 궁셔위안(龔守元)은 1951년 간부직을 그만둔 뒤 생산에 몰두했고 부업으로 양을 도축하는 일을 했다. 평셴현 샤치향 쥐자촌의 탕용quan(湯涌泉)은 원래 향위원이었지만 토지개혁 후 회의에 일절 참가하지 않았다.⁶¹⁾ 경제 상황이 호전된 빈농은 집안을 일으키고 풍요로운 생활을 누리려 했다. 예를 들어 이싱현 첸홍향 량좡촌의 샤오셔홍(邵壽洪)은 토지개혁 후 농사와 부업이 모두 향상되어 집을 새로 짓고 새로운 농기계를 구입했으며, 호조회에 참여해 손해 볼 것이 걱정돼 탈퇴 후 단독으로 일을 했고 간부들의 동원명령에도 응하지 않았다. 그리고 아내를 얻는데 3,000근의 벼를 들여 걸치레를 했다.⁶²⁾

56) 장쑤성 농촌 경제상황 조사자료(江蘇省農村經濟情況調查資料, 1951년 2월 2일자 24쪽)

57) 장쑤성 농촌 경제상황 조사자료(江蘇省農村經濟情況調查資料, 1951년 2월 2일자 11쪽)

58) 리리즈(李立志)의 토지개혁과 농민의 사회적 심리 변화(土地改革與農民社會心理變遷, 중국공산당역사연구(中共黨史研究) 2002년 제 4회)

59) 우현 각 계층의 생산에 대한 생각(吳縣各階層生產思想動態), 1951년, 장쑤성 기록보관소 기:3070-短9

60) 쑤난 제 2그룹 11개 향의 민주건설을 위한 모범적 시험작업에 대한 종합자, 1951년 1월, 장쑤성 기록보관소 기록:3006-26

61) 장쑤성 농촌 경제상황 조사자료(江蘇省農村經濟情況調查資料, 1951년 2월 21, 24)

토지개혁 후 농민들 사이에서는 생산활동에 매진하거나 눈이 떠는 것이 두려워 소극적인 태도를 취하는 등 종종 눈앞의 이익만을 중요하게 생각하는 이기심과 평등주의가 만연했다. 특히 농민의 경우 평등에 대한 갈망이 있었다. 쥐샤오홍(周曉虹)은 토지개혁은 봉건적인 토지점유제도를 타파하고 ‘경작자가 땅을 소유’하도록 했고 토지개혁 후 지주를 핵심으로 하는 농촌사회의 경제적 조건은 과거보다 한층 더 평등해졌으며 농민의 평등주의 사상을 강화시켰다고 한다. 또한 토지개혁은 향촌사회의 혈연관계를 약화시켰고, 토지를 평등하게 나누어 농민들이 다시 토지로 돌아오도록 했으며, 농민들의 토지사유에 대한 종속성을 강화시켰고, 그들의 평등주의에 대한 ‘유토피아적’ 생각을 강화시켰다. 그런 이유로 지연관계는 더욱 더 강화되었다.⁶³⁾ 그는 또한 만일 사회심리적 시각에서 평등주의를 해부한다면 ‘유한한 자원’을 중요하게 생각하는 것이라 말할 수 있다고 밝혔다. 표면적으로 균등한 분배는 평등주의의 일부일 뿐이고 또 다른 측면은 타인이 재산을 모으는 것에 대한 질투의 표현인 것이다.⁶⁴⁾

루휘린(盧暉臨) 역시 정상적이 질서 하에서 재산에 대한 경외감과 존중은 밝은 측면인 반면 평등주의는 어두운 측면이라고 말했다. 후자는 농민들의 마음 속 한편에 숨어있거나 일상생활의 사소한 부분을 통해 겉으로 드러나기도 했다. 하지만 폭력이 정상적인 질서를 파괴한 특수한 상황에서 평등주의는 갑자기 제방이 터져 홍수가 난 것마냥 범람했다. 폭력을 행사하며 부자를 처벌하고 가난한 자를 구제하는 것처럼 토지개혁 운동 역시 농민의 이러한 평등주의를 실현시켰다.⁶⁵⁾

이러한 관점은 변증법처럼 보이겠지만 사실은 농촌의 각기 다른 계층간의 내부적인 차이를 등한시 했기 때문이다. 특히 토지개혁 후 정상적인 생산단계에 들어간 상황에서는 더더욱 그러했다. 사실 개별적으로 생산을 하는 농민들은 평등주의와는 본질적으로 대립하는 위치에 있었다. 재산을 사유하려는 특징은 농민의 본성이었기 때문이다. 마치 마오쩌둥이 말한 것처럼 ‘사유’란 농민들의 ‘타고난 천성’인 것이다.⁶⁶⁾ 그리고 이러한 사유 ‘본능’은 ‘국유’나 ‘공유’와는 대립하는 것이었다. 레닌은 상품경제의 작용으로 ‘소생산은 자주, 매일 매시간, 자발적으로, 대량으로 자본주의자와 자산계급을 만들어낸다.’고 했다.⁶⁷⁾ 개별적인 소농들은 경제생산을 한 뒤 자신이 하나의 생산단위가 되어 한편으로는 수익을 최대한 높이려 하고 다른 한편으로는 상품경제와 함께 공존하며 자발적으로 경쟁을 부추겨 부를 축적하려는 욕망과 시장적 요소

62) 장쑤성 농촌 경제상황 조사자료(江蘇省農村經濟情況調查資料, 195년월2일11쪽)

63) 쥐샤오홍(周曉虹)의 전통과 변천-장저 농민의 사회적 심리 및 근대 이후의 변천(傳統與變遷-江浙農民的社會心理及其近代以來變遷, 15, 15, 1616쪽)

64) 쥐샤오홍(周曉虹)의 전통과 변천-장저 농민의 사회적 심리 및 근대 이후의 변천(傳統與變遷-江浙農民的社會心理及其近代以來變遷, 6쪽)

65) 루휘린(盧暉臨)의 혁명 전후 중국 향촌사회의 분화패턴 및 변화: 지역사회 연구의 발전(革命前後中國鄉村社會分化模式及其變遷: 社會研究的發展, 중국향촌연구(中國鄉村研究(제 1집), 상우인쇄소 2003년 판 161쪽)

66) 마오쩌둥의 토지문제와 반 부농 전략(土地問題與反富農策略, 중국사회과학원 경제연구소의 중국 현대경제사팀 의제 1, 2차 국내 혁명전쟁 시 토지투쟁에 관한 사료 선집(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土地鬥爭史料選編, 인민출판사 1981년 판 492쪽)

67) 레닌의 공산주의 운동 중의좌의 소아레닌선 제 4권, 인민출판사 1960년 판 181쪽.

를 가지고 있다. 농민은 작은 단위의 생산자로 천성적으로 평등주의와 근본적으로 대립하는 것이다.⁶⁸⁾

또한 소위 말하는 평등주의는 생존과 연관되어 있다. 일부 농민들은 생존의 위기에 직면해 있을 때 부유해지려는 동기가 특별히 강했다. 실질적으로 그들은 ‘평등해지는 것’을 바란 것이지 ‘균등해져 가는 것’을 바란 것이 아니었다. 혹은 부유한 농민은 안전을 고려해 가난한 사람들을 돕거나 구제하기도 했다. 일상적인 생산활동에서 개별적인 소농은 하나의 생산단위로 절대로 평등을 추구하지 않는다. 조공명(趙公明, 재산을 관할하는 신-역주)을 숭배하는 것만을 보더라도 그들이 추구하는 것은 한 가정을 부유하게 만들고 일으켜 세우는 것이었다. 빈농은 중농이 되기를 바랐고 중농은 부농이 되기를 희망했다. 돈을 모아 부를 축적하는 것이 바로 그들의 ‘천성’인 것이다. 단지 방법이 정당한지 부정당한지의 차이가 있을 뿐이었다. 예를 들어 산베이(陝北) 지(驥)촌에서 토지개혁이 있을 당시 근면 성실하게 부자가 된 여성노동자 모궁란(模鞏蘭)은 지주가 약탈당하는 것을 보고도 아무렇지도 않게 말했다. “저 지주와 나는 다르다. 나는 그들처럼 무언가를 원하지도 않았고 정당한 방법으로 돈을 벌었다. 그들이 벌어진 돈을 그들이 가져가는데 무슨 상관인가!”⁶⁹⁾ 이와 반대로 집단화되는 과정에서 농민들은 규모를 늘리고 공유수준을 높이는 생산분배방법에 대해 반대했다. 이는 일종의 생존윤리이자 비평등주의로 귀납되는 것이다.⁷⁰⁾ 우리는 농민의 재산관에 대한 평가를 반드시 그들의 생존상황에서 고려해야 한다. 간단히 평등주의로 귀납시키는 것은 공정하지 않은 처사이며 ‘진보’와 ‘낙오’로 이원화시키는 오류를 범하는 일이다.

68) 원위(溫銳)의 *이역현실-마오쩌둥과 중국 농촌의 경제변화(理歷現實-毛澤東與中國農村經濟變遷)* 참고, 산시(山西) 대학연합출판사 1995년 판 180~186쪽.

69) 리광춘(李放春李放의복쪽) *토지개혁 중의해과생-중국혁명의 현대적인 말과 역사적 모순 고찰(北方土改中飜生-中國革命現代性的一個話語_歷史矛考)*, 중국향촌연구(中國鄉村研究(제 3집)에 실림, 사회과학문헌출판소 2005년 판 271쪽

70) 아마도 국가의 안정을 위해서는 농촌 경제의 평등주의가 필요한 듯하다. 그렇기 때문에 왕조의 복건에 동반되는 것은 항상 자작농의 부흥이었다.

近代中国区域城市的经济关系

■ 郑 忠 (南京師範大) ■

近代中国区域城市的经济关系

— 基于对上海与无锡的互动考察

郑 忠（南京師範大）

〈目 次〉

上海无锡间的商品流通
上海无锡间的人力资源流动
上海无锡间的资金流通
上海无锡互动经济关系分析
基于锡沪经济关系基础上的深层思考

内容提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无锡经济快速发展，被称为“小上海”，其成功得益于与上海经济的互动联系。本文通过对锡沪城市之间物资、资金、人口以及信息等经济要素流通的具体考察，运用区域经济“增长极”和“增长中心”理论分析锡沪间经济互动关系的特征。得出结论：无锡是由于上海“增长极”的创新功能作用而成长起来的新“增长级”。两个城市之间经济要素流动越复杂，双方间经济互动关系愈密切。双方相互依赖，各自在对方的扶助下获得了协调发展的契机，从而奠定了不同等级区域中心的地位。这种变化不仅仅是个体城市的转型，更是区域城市体系结构的变革，同时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区域城市发展的一个缩影。

关键词增长极：增长中心；互动；城市经济关系

区域城市作为一个有机、开放、动态的系统，与周围环境时刻处于不断输入和输出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的过程之中。这一事实越来越引起国内外区域经济史研究学者们的关注。因为，展开对区域城市经济联系的探索，不仅可以突破施坚雅过分从经济地理学的角度分析区域经济的传统思路，还可以拓展以综合性、整体性、动态性、联系性为特色的区域经济史学的研究路径，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¹⁾故本文选取民国时期快速发展

1) 关于近代城市经济互动的研究，目前比较重要的成果胡光明的《清末民初京津冀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历史探源与启示》（《河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周俊旗、刘红娟的《试论塘沽新港的兴建与津塘关系的变化》（《城市史研究》第4辑，1991年）、竺菊英的《论近代宁波经济与上海的关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5期）、竺菊英的《从近代宁波轮船航运业的产生和发展看沪甬两地经济互动关系》（《学术月刊》1994年第9期）、皮明麻、李策的《近代申汉经济互动论略》（《城市史研究》第7辑，1992年）、隗瀛涛、谢放的《上海开埠与长江流域城市近代化》（《城市史研究》第10辑，1995年）、戴鞍钢的《近代上海与长江流域城市市场网络的架构》（《复旦学报》1996年第4期）、《近代上海与苏南浙北农村经济变迁》（《中国农史》1997年第2期）、《上海开埠与苏南地区经济格局的变化》（《史林》1990年第2期）以及《近代上海与周围农村》（《史学月刊》1994年第2期）等

的长江三角洲中等经济城市无锡为研究对象，具体考察它与长江三角洲中心城市上海间的物资、资金、人口以及信息等经济要素的流通状况，并运用区域经济“增长极”理论分析两地间经济互动关系的特征。认为：无锡是因上海“增长极”的创新功能作用成长起来的新的“增长级”。两大城市之间经济要素流动越复杂，双方间经济互动关系愈密切。双方相互依存，各自在对方的扶助下获得了协调发展的契机，从而奠定了不同等级区域中心的地位。²⁾而无锡城市中心地位的确立和发展也体现着近代中国区域城市经济关系变动的形式。

上海无锡间的商品流通

毫无疑问，上海无锡间便捷的交通运输成为两地经济快速成长并发生互动联系的重要因素。根据以往研究³⁾，抗战爆发前，上海与无锡间的交通运输业就已经形成了航运、铁路、公路为主体的近代交通运输体系，其中两地间的铁路运输（沪宁铁路）主要担负着部分物资的长途转运和旅客中转任务，汽车和轮船则起着联系邻近各市县、各集镇及广大农村与大都市上海经济关系的作用，担负着物资的集散和短途转运任务。这样一个陆路有火车、汽车，水路有轮船、快船、帆船、便船的多层次的交通运输网络，为民国以来上海无锡两地经济互动关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上海无锡两城市间最基本的流通要素就是商品的流通。流转的商品主要包括国内消费的农产品流转（如米）、作为工业原料的农产品流转（如豆、麦、茧等）、日用工业品的流转、以及盐、煤、竹木、建材物资的流转等等。就消费性农产品、原料性农产品的物流而言，无锡市场为上海的经济提供所需原材料，上海需要无锡支持。而就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物流而言，上海则为无锡原材料供应和产品销售市场，无锡对上海市场存在着相当程度的资源依赖性。

明清以来，无锡传统的城市商业就是与封建财政相联系的粮食贸易，曾存在着一个规模较大、体系较为完整的米粮市场。民国以来，随着沪宁、沪杭、津浦和陇海铁路相继建成以及无锡近代加工工业的兴起，苏北、皖北、华北、东北的小麦、大豆作为工业原料源源输往无锡，无锡由原来纯粹的粮食集散地一跃成为稻谷、豆麦的生产消费地和米、粉、油产地及输出区域。

与无锡成长为国内大米市的同时，上海也因城市工商业兴起和发展，人口急剧增加，粮食消费能力迅速增长，成为近代中国最大的稻米消费市场。上海食米，大半仰赖国内及国外之供给。国内主要是长江上中游地区的两湖、江西、安徽的稻米。这些稻米顺江而下，一部分分流苏南地区，一部分又与苏南部分产粮县之稻米汇流无锡，经过储存、加工后再输往上海，或通过上海向同样缺粮的浙江和沿海其他城市转输。这样，无锡就成为这些粮食运转上海的中转市场。据估计，上海每年在无锡坐庄采办的稻米达150万石，占无锡输出稻米总量的33.71%，这还不包括分散运销部分。⁴⁾

2) 关于无锡在二十年代成长为长江三角洲经济中心城市的研究，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有顾纪瑞、唐文起等学者就撰文进行过相对全面的分析。（顾纪瑞：《无锡在二十年代形成经济中心的原因及其职能》，《历史档案》1985年第4期；唐文起：《无锡经济中心的形成和发展》，《上海经济区研究论文集》第二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所，第215页）此后相关研究无出其右

3) 顾纪瑞：《无锡在二十年代形成经济中心的原因及其职能》，《历史档案》1985年第4期

4) 羊冀成：《无锡米市调查》，社会经济调查所1935年，第10

小麦、黄豆是面粉业、榨油业重要的工业原料。同米粮转运一样，无锡也是北方豆麦流转上海的重要中转市场。无锡及邻近地区并非小麦、黄豆的主要产地。无锡市场小麦、黄豆主要来源于苏北、皖北、华北、豫东、鲁南等地区，特别是苏北小麦输入较多。无锡到货小麦部分销售于本地面粉企业，部分销往其他地区，其中，最主要的是销运到上海供应面粉厂，如上海阜丰、福新等面粉厂长期在无锡采办小麦，并与无锡堆栈、粮行建立着固定的储存和购销关系。⁵⁾无锡所以形成苏南地区小麦集散地和粉麸供应基地，一是无锡粮栈设备翻晒便利，栈租低廉；二是无锡经济组织完备，货物储入粮栈，即可向粮栈支款，便于交易流转；三是无锡近邻上海，一遇上海麦价高涨就可以迅速将小麦运抵上海，博取厚利。

长江三角洲蚕茧的交易流转基本上也是以上海、无锡为中心运转的。大工业时代的上海丝厂极为发达，但上海“既非产茧丰富之区，……故茧子不得不境外是求。查上海茧子之来源，以来自苏省之无锡、江阴等县，及外省之浙东、浙西、安徽为多。”⁶⁾每年五月份，蚕茧成熟时，茧商从上海带现款到无锡采购，采购量约占无锡产茧量的20-30%。⁷⁾无锡是长江三角洲地区优质茧的主要产区，由于上海与周边各工业城市缫丝工业兴盛，蚕茧经销十分繁兴，不仅产茧量高，而且“自铁路通轨以来，如江阴、宜兴、武进各路干茧，无不惟有锡地应市求售。”⁸⁾无锡已成为沟通上海与经济腹地蚕茧交流的华东地区蚕茧集散中心和最大的干茧市场。

民国以来，特别是1920-1930年间，无锡蚕丝产量占江苏全省总量的25%-30%，渐趋发展成为苏南地区机器缫丝工业的重要基地。江阴、宜兴、靖江等地的蚕茧经无锡缫丝工厂的生产加工也成为优质的“白厂丝”，几乎全部通过上海出口，少数也经由宁波、广州输出。根据1928年的统计数字，上海出口生丝108021海关两，占全国缫丝总出口量的59.9%。其中由无锡输出就达21210海关两，占上海出口总量的19.6%⁹⁾，无锡丝厂生产的生丝运销上海，一般通过生丝掮客——丝号与洋行贸易，或厂商直接与洋行交易，然后出口国外。尽管1930年以来，上海成立了不少华商生丝出口公司，从事出口业务，但无锡生丝出口贸易仍主要由洋行经营。上海丝号只充当了厂商与洋行之间的贸易中介。

无锡棉织业所需要的棉纱也常需从上海进货，尽管无锡本地棉纺织企业所生产的棉纱产量足以满足本地棉织所需，但由于品种、价格等一些因素，棉织业所用纱常依赖上海市场，贸易量约在几千包至万包之间。这些棉纱或为上海工厂产品，或为国外进口棉纱。¹⁰⁾

另外，无锡一部分工业原料和燃料，如煤炭、石油、油漆、玻璃、化学剂等也基本上购自上海市场。无锡地区燃料资源比较贫乏，如果说在传统生产结构下燃料供给尚未形成很大问题，那么，现代工业发展起来后，燃料缺乏则成为一大制约因素。长期以来，无锡城市生活及工业用燃料完全依靠外地供给，仅煤炭一项，1929年，无锡全县就需煤313415吨，平均每日需煤859吨，缫丝业、纺织业也是用煤量最多的两大生产部门。¹¹⁾这些用煤一部分直接

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无锡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无锡文史资料》，第16辑第96-97

6) 葛文灏：《上海丝绸调查报告》，《江苏实业月志1919年7月第4

7) 实业部国际贸易《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四编第，民国2年

8) 钱耀兴：《无锡市丝绸工业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398

9) 根据徐新吾《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2）高景岳、严学熙《近代无锡蚕丝业资料选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80所列数据计

10) 实业部国际贸易《中国实业志·江苏省》《各县进出口贸易》，105，民国2年版

11) 根据1930年《无锡年鉴》、《无锡市政》第1号、《无锡近百年经济概览》（1987年版，第150

从苏北、安徽煤产地输入，相当一部分还要从上海市场购买。

近代长江三角洲日用机器工业品的流向，则呈现出从产地城市或进口口岸向内地城市、农村逐渐扩散之态势。上海工商业发达，其大量机器工业制品则是通过无锡、镇江等城市中转向腹地农村扩散的。如日用机制棉布，1894年以前，进口棉布主要由上海商人向内地推销，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越来越多的内地商人来沪采办货物，于是大量批发商号出现，以适应大批量采购之需。无锡棉布的营销就是部分以上海，部分以本地纺织业为依托，通过众多棉布商号和批发交易市场向腹地流通的。流通的趋向，“除销本地区外，大部分销往北方诸省及东南亚各地”。另外，“江阴、常熟乡间手工织成的土布，常由无锡土布店收购销往苏北。”¹²⁾无锡机制棉纱在区域市场内也颇具影响，“苏北、泰兴、靖江、江阴、苏州等地，都要看无锡的棉纱行情，作为他们变动棉纱销价的依据”。¹³⁾而无锡纱号纱价则以上海纱价为枢纽，市场纱价都参照沪价决定升降。

除棉布外，其它如五金商品、钟表商业、西药商业等都形成了较具近代化的营销体系，进货、批发、零售功能市场大都发育成形，商流通畅。如三十年代上海西药商业就形成了大药房一级批发，外地药房或分号支店二级批发，乡镇药房三级批发的多层销售网络。上海西药、日用商品已遍及南北乡村的小店、简铺。据有关数字统计，到1936年时，上海四家大药房在全国各城镇设分处达112处，其中长江三角洲地区江浙两地就达48处，约占43%。这些领牌联号星罗棋布，构成了上海各大药房在全国范围内的商业推销网。¹⁴⁾无锡外省所产中药和进口西药就是通过这种途径从上海、苏州购进，再传输到腹地农村的。

上海无锡间的人力资源流动

近代无锡经济发展不仅为上海的经济提供了工业原料、出口货物及销售市场，同时也为上海近代工业发展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原因就在于，上海工业区域的劳动生产率远远高于周边传统的农业区域。工业区域可以提供比农业区域高得多的工资，会吸引周边地区农业劳动力大量转向工厂。¹⁵⁾有统计数字表明，从1910年到1935年，在上海公共租界中，除1920年前后江浙籍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不足80%外，在正常情况下，都在80%以上。而且，各地来沪人口籍贯构成中，广东、安徽、山东、湖北、福建、河北、河南虽逐年增加，但基本上都不超过20%。上海已经成为“江浙人”的上海。¹⁶⁾其中，无锡人也是重要的一员。根据调查，在无锡礼社，离村“569人中尤以赴上海者为最多，约在400左右”，占外出人数的70%。¹⁷⁾

151) 有关数据

12) 茅家李祖法《无锡近代经济发展史论》企业管理出版198年版9

13) 过炳泉，张泳泉：《无锡纱号业的历史概况》，无锡市政协编《无锡文史资料》第9辑，1984年，47页

14) 上海市医药公司等编著《上海近代西药行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198年版98-99

15) Gang Deng, *The Premodern Chinese Economy: Structural Equilibrium and Capitalist Sterility*, p.1

16) 参见邹依仁著《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198年版，11页

17) 《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索引》，《新创造1932年第1、2期》，第176另据《无锡年鉴》的统计离锡赴沪农占外出者的76.68%参见《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中华书局1966年版，62-63

无锡迁移上海的劳动力大多具有一定的技术成分。无锡到上海工厂工作的工人中，相当多的一批是被无锡到上海开办厂家的企业家带去的，特别是技术工人和骨干工人。如上海申新系统和庆丰、丽新、广勤、合丰等厂的工人70%以上从无锡招去。20年代，荣氏进入上海发展，申新、福新各厂纷纷扩容，不少无锡农民通过委托介绍的方式进入上海。据统计，30年代无锡籍贯者在申、福各厂的比例是分别为31%-91.5%不等。¹⁸⁾另外，上海的铁行业也几乎为无锡籍资本家所垄断，所谓“铁鬼子”一半以上是无锡人。而1865-1910年，上海外商船厂中，祥生、和丰、瑞榕等厂的打铁领班全部来自无锡南门。整个上海的中等企业主中，无锡人最多；上海的产业工人中，无锡人也占27%。¹⁹⁾

近代上海工业发展迅速，还吸纳了来自外省异市的技术人才，如中国近代化学的先驱徐寿和参与设计我国第一艘轮船的华衡芳就曾长期在江南制造局从事科技活动，他们都是无锡人。在商业领域，不少地区农民离村进城后，职业选择余地大大拓展。随着上海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与城市相关的商业和服务性职业越来越多。上海这类行业达204个之多，分成租赁服务、棉毛丝呢、五金、建材、衣着、百货、文教、文娱、食料、饮食、酿造、燃料、日用杂品、烟皂、火柴、南北土产、运输仓库等23大类。无锡进沪农民几乎包占了整个上海五金业和南北土产业。²⁰⁾

当然，长江三角洲地区劳动力流动并非单向，随着长江三角洲上海周边城市工业的发展，该地区劳动力还呈现出从上海这个中心市场向外围回流的趋势。²¹⁾如无锡第一座丝厂裕昌开办时，“在上海招募无锡的前州和玉祁籍的工人来锡工作”。²²⁾而荣氏在申新三厂施行企业管理改革，所聘新派管理人员汪孚礼、余钟祥、楼秋泉等也都来自上海中外纱厂，其管理改革亦借鉴了沪上纱厂的改革经验。这种智力劳动者的流动显然带有明显的技术传播的趋势。通过这种流动，上海把已有的技术优势逐步扩散到全国，有力地促进了周边地区经济与上海的共同发展。

劳动力资源的互通也带动了上海无锡间的信息沟通。最初是两地民间信件交流是通过民信局航船来传递的。但自1883年始，清政府在津沪线无锡段设电报子店，开启了上海无锡两地电信交流的新方式。1926年，京沪长途电话线上海至无锡段架设完成，两地信息交流更加便捷。20年代，由于无锡工商业发展迅速，商界除利用电报传递信息外，主要还利用电报局附设长途电话处与电话公司长途转接台的长话来互通商情。至1930年，无锡长话去话业务量约2万次，其中南京约960次，武进、吴县各约4000次，常熟约100次，上海9000次。可见其与上海商务信息联系之紧密。²³⁾

人才流动还带动了技术与管理信息的传播。无锡工业的技术和管理信息多源于上海。上海由于坐拥进口商之便利，常常较早引进国外比较新式的生产设备，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所

18)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荣家企业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17、289

19) 汤可可：《市场：要素的流动和组合》，胡平主编《近代市场与沿江发展战略》，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325-326

20) 许晓青：20世纪20-30年代苏南农村结构性社会流动探析——以无锡县为例《近代中国，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11辑，第153

21) 根据马俊亚的研究，从上海回流到江南其他地区的劳动力，受过教育的智力劳动者或技术工人移动的现象非常明显。马俊亚《混合与发展：江南地区传统社会经济的现代演变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22) 萧宗汉：《周舜卿系统的缫丝厂》（手稿）

23) 张锡明：《抗战前的无锡邮电》，无锡市政协编《无锡文史资料》3辑，8页

以无锡一向注意委派员工去上海见习，吸收先进的经验、技术。如上海申二、申五、丽一、丽三等厂都多次为无锡厂培训过技术工人。而有些绸布业商家，为吸引顾客，竞相搜罗新颖的花色品种，甚至派人站在上海大光明戏院门前，观摩当时群众的新式服装。²⁴⁾无锡经营最出色的荣、唐、薛等资本集团，都在上海设总管理处，依靠上海获取国内外市场和生产技术的灵通信息，遥控指挥无锡的生产、购销。特别以荣氏兄弟为代表的一批企业家首先在上海发迹，初步积聚资本、积累经验后，再回到无锡开厂，或在无锡致富后又把事业扩大到上海，带去无锡组织和管理企业的有效经验，也在上海增添新的活力，得到了更大发展。²⁵⁾值得注意的是，无锡纺织工业企业引进上海机器设备，多是上海厂机器设备更新替换下来的设备。而无锡工厂在采用电力织机等新设备后，又把原有的铁木织机转移到周围市县，这样，在这些设备的让渡过程中，整个地区的经济技术水平得到了整体性的提高。

上海无锡间的资金流通

无锡钱庄、银行与上海间的汇划、调度以及工商业间的资金挹注对于促进上海无锡两地经济发展起到稳定的作用。

在大宗物资流动过程中，货币资金的汇兑、融通服务影响着物资分配和流量。无锡工商业就是通过申汇的方式与全国性的金融中心上海保持着紧密的资金联系。由于无锡外地粮商在售粮后多往上海采购日用商品，需要大量申票，而本地许多工厂的产品销售和头寸调拨也是以上海为中心，因此常有申票出售，故无锡钱庄的申票进出和与上海的汇划往来十分频繁，对盘活资金流通、促进工商业发展、繁荣市场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上海借贷资金对于无锡丝茧商业及缫丝工业的支持亦极为重要。一般来说，每年5月18日-6月4日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出茧时间，所需现洋为数巨大，收鲜茧“自开秤至停秤，仅有十余日”²⁶⁾在短时间内集中巨额资金供江浙茧商使用，每年都成为上海钱业的重要事务之一，其间恰逢茶季，更增加现银的需要量。据估计，20年代初期无锡茧市所需大批银元70%由上海运来，其余30%在苏州、杭州等处通融。1926年以后，国内银行兑换券信用升高，蚕农逐渐接受纸钞，于是上海一批银行纷纷到无锡设立分支机构，与苏州、镇江钱业的衰落相对应，无锡以因银行的活跃而成为苏南地区货币资金调度结算的中枢。²⁷⁾

19世纪末上海工业化兴起初期，浙江宁波及江苏无锡、苏州、南通等地的商人就纷纷来沪投资，为上海工商各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如无锡荣氏兄弟就是在无锡保兴面粉厂(后改组为茂新厂)和振新纱厂的基础上在上海创办起申新一厂(1915)、申新二厂(1917)的。荣氏福新系统的8个面粉厂中，其中7个都设在上海。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无锡布绸业获得发展，资金积累也相当可观，有些企业投资本地甚至上海工业，如世泰盛股东张孟肃、钱保稚等人投资到上海，创设了华丰布厂等。无锡工商业资本呈现出向上海工业资本转移的一种

24) 无锡市工商联会：《解放前的无锡布绸呢绒业》，《无锡文史资料》2辑，1988年，83-88页

25) 汤可可：《市场：要素的流动和组合》，胡平主编《近代市场与沿江发展战略》，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32页

26) 沧：《丝业与金融之关系》，《银行周报》卷4号1911日

27) 汤可可：《市场：要素的流动和组合》，胡平主编《近代市场与沿江发展战略》，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325

趋势。当然，鉴于上海发展实业面临地价高、劳动力价格不够低廉等原因，也有不少精明的上海企业家更多地向长江三角洲上海周边靠近原料产地的无锡、镇江等城市拓展业务，投资建厂，从而呈现出一种资本往回挹注的情况。如1904年上海无锡籍缫丝企业家周舜卿就在无锡东绛创办的裕昌丝厂，开启了无锡现代缫丝业的先河。截至1936年，无锡共办有丝厂45家，总资本额达192万元。²⁸⁾无锡因此而成为全国的“丝都”。另外，无锡棉纺织业、化学工业等行业也有类似的情形。不少实力雄厚的工商业者甚至一个人就在长江三角洲各省市同时创办多种企业，资金相互挹注，成为跨区域性的企业集团，如当时的祝大椿、荣宗敬、荣德生等等。

上海无锡互动经济关系分析

上述长江三角洲上海与无锡城市间经济要素的流通主要借助了两地间轮船铁路交通、电信通信、金融汇兑等近代化经济联系手段，组成了长江三角洲中心城市与区域城市间相存相依、共生共荣、不可分割的关系网，而且两地随着经济联系的日益加强也产生了明显的互动作用。具体分析这种互动经济关系，本文作者认为，“增长极”和“增长中心”理论可以给予比较妥帖地解释。

所谓“增长极”是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提出的一个概念，后来不少学者进行了补充，被认为是一个或更多的有创造力或推动力的工业部门及与之相联结的一群或一组工业部门聚集的地区，这种地区常常是大城市中心。而“增长中心”则是鲍德维尔(J. Boudeville)于1957年和其他许多英美学者提出的一个空间概念，认为，厂商和行业之间的亲和力将产生外部经济效果，会使厂商和企业地理位置上急剧地发展，从而出现增长中心的趋势。²⁹⁾

“增长极”与“增长中心”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是生产要素和产品的流动中心或聚散中心，均指具有一定经济规模且增长较快的区域城市等。但“增长中心”又不同于“增长极”。“增长极”概念侧重于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的作用，指的是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或在经济政策的引导下，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和部门聚集于一处，形成了中心地，属于创新型的少数先发地区。而“增长中心”概念偏于外部经济效果的作用，指的是某一经济部门中的某项企业或一组产业综合体，这些企业本身常常不具备创新能力，属于学习型的后发地区。更具体一点说，“增长极”是探索创新式的“第一行动地区”，“增长中心”是学习模仿性的“第二行动地区”，其他地区则属扩散、带动或跟进型的“第三行动地区”。其中，“第二行动地区”的“增长中心”还具有将经济要素由增长极向“第三行动地区”扩散的中转传输功能。

以此理论比照上海与无锡的经济发展，可明显地判断出民国以来上海作为长江三角洲“增长极”性质和无锡作为“增长中心”的性质。上海是国内最早的现代工业发源地和工业的中心，其工业和商业部门的创立和扩展，常常取决于自身的创新力量。这些新企业和行业不断开发与创造出一些新的产品、新的技术、新的产业、新的市场、新的组织、新的管理体制、新的生产方式、经营方式和新的消费方式、生活方式等等，并向其他地区示范和扩散。于是，创新

28) 汤可可：《市场：要素的流动和组合》，胡平主编《近代市场与沿江发展战略》，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32页

29) 汉森：《区域格局中的发展理论》，《开发研究1988年，期，19 2页

带来了巨大的先发利益，而先发利益驱使上海成为民国以来超前或领先发展的大都市。

而无锡现代工业恰是在上海的扩散效应中成长起来的。其现代工业企业和行业的创办均迟于上海，是学习和模仿创新者上海而出现的“集群追随者”。时人龚骏在分析中国近代新式工业产生时就认为，“上海不特为我国军械、缫丝、棉纺织业之自创，其它各业之滥觞于此者，为数极多。”³⁰⁾穆藕初就最先在上海德大、厚生纱厂引进西方科学管理方法，成为当时包括无锡在内的中国各纱厂的样板。而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方面，由于上海不少企业走在全国的前列，也引发了上海及全国各地企业的争相效仿。各企业纷纷将引进新设备作为中外产品竞争的积极手段。他们“渴望获得最新工艺技术，这可以从多数工厂采用外国机器设备一事得到佐证。”³¹⁾无锡的不少资本集团都因此在上海设总管理处，依靠上海获取国内外市场和生产设备与技术信息，进行大量的购销活动，体现出对新生产力的强烈追求。这些实力强大的资本集团，之所以成为增长型的模仿者，而非创新者，是因为：学习模仿成本小于探索创新成本，要扩大自身企业发展的规模和提高市场占有率，就必须尽可能又多又快地获取增长所带来的后发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无锡这个“增长中心”就是由于上海“增长极”的创新作用而成长起来的，同时，还带来了上海“增长极”影响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效应之一——支配效应，即上海“增长极”运用自己在技术、经济、管理方面的先进性，通过与无锡、苏州、南通等周围地区的投资关系和商品交换关系产生支配作用，从而成为辐射长江三角洲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心”。无锡、苏州、南通、杭州、宁波等中等经济城市则成长为受控于上海长江三角洲城市系统次一级的“增长中心”。

当然，无锡“增长中心”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在上海“增长极”乘数效应的作用下，民国无锡也出现了由“增长中心”向新“增长极”演化的趋势。这是由于受经济循环累计因素机制的影响，增长极对周围地区经济发展的支配作用不断强化和扩大，进而影响范围和程度相应增大所导致。20年代以来，随着无锡工业体系的形成和经济技术水平的提高，无锡企业以及整个经济的创新能力增强，特别是创新过程中企业家群体逐渐形成，并发挥了重大作用，表明20年代后期无锡城市“增长极”式的功能渐已形成，³²⁾取代了苏州而成为苏南地区的产业中心、商品集散中心、金融中心和信息中心。同时无锡周边的其他“第三行动地区”也在一定时期内被动地获得一定的增长速度。江阴、宜兴、常熟、溧阳、金坛、靖江、吴县、武进等地的经济活动，都围绕它而旋转。这样，民国以来，在长江三角洲，以上海为龙头，上海周边无锡、南通、常州、苏州、宁波、杭州等中等经济城市为第二级市场，腹地小城市、乡镇为第三级甚至更低一级的市场的“城市群”开始初具雏形。依靠这些城市间、城乡间的人口流动、商业贸易、金融沟通、信息交流，长江三角洲区域基本上实现了城市间的相互影响、相互辐射，共同推动了自身与区域经济的大发展。

上海“增长极”的溢出效应也不容忽视。这一效应主要包括极化和扩散两种作用。极化作用能吸引周围地区的生产要素和经济活动不断趋向增长极，以加快增长极自身的发展。扩散则是增长极向周围地区进行生产要素和经济活动的输出，以带动周围地区的经济发展。极化和扩散的综合影响称之为溢出效应。如果极化大于扩散，则为负值的溢出，对周边地区的经济

30) 龚骏：《中国都市工业化程度之统计分析》，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193年版，2页

31) 徐雪筠：《上海近代社会经济概况1882—193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198年版，28

32) 汤可可：《市场：要素的流动和组合》，胡平主编《近代市场与沿江发展战略》，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32页

发展不利。典型如近代以来上海、无锡等工业中心对苏州商业资本的强力吸纳，苏州成为苏南地区极其重要的存款码头，一旦沪上钱市发生变化，无锡常州工商企业有所亏倒，苏州钱业都会有“性命难保”的谑语³³⁾。而商业资本的抽空也使得苏州本地工业化进程由于资本的匮乏而发展缓慢。如扩散大于极化，则为正值的溢出。³⁴⁾一般来说，正值溢出效应的出现往往是其他区域新一轮聚集效应的开始。也就是说，正是上海增长极在生产方式、技术设备、原材料、资本和经营经验上对无锡地区的扩散作用大于极化作用，终而成就了无锡新的“增长极”的出现。

区域中新的增长极出现，必然会导引区域内原料、能源、资金、市场等要素需求的相互矛盾与制约，因此，作为新增长极（如无锡等）与老增长极（上海）城市间的分工与合作就不可避免。这主要是通过市场调节，最终达成区域内部市场结构的自然平衡。如在长江三角洲的区域纺织产业结构中，上海拥有较为发达的轻纺、机械、五金等工业，能为其他城市提供一定的技术设备。无锡是纱、线、花布生产为主，印染、色织较具优势的次级城市。常州则生产灯心绒、条飘府绸，南通生产花线布、常熟有条格布等，都各具特色，各城市发展各有侧重，共同构成为中国近代棉纺织工业的一个基地。³⁵⁾这种产业定位，便于各城市扬长避短，组织规模经营，提高行业的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然而，分工并不意味着彼此割断联系，上海与无锡等周边的城市还存在着相互依仗的合作关系。如上海纱厂的原棉、包装材料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南通、无锡，而各地所需的设备、机物料、及高档细织纱，则大多取给于上海。另外，其他行业方面的横向联系与相互借助在长江三角洲区域城市间也屡见不鲜。

综上所述，长江三角洲区域中心城市上海与周边城市无锡的经济关系，不但表现出内容丰富的互动性，而且因互动因子众多，数量巨大，形成了流通便利、信息畅达的多层次的结构体系，不仅有利于近代上海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更有助于无锡城市向近代化迈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20年代以来无锡工业的发展更增强了城市的经济吸引力和辐射力，加上陆上交通的开辟，以及后来的关税自主、厘金裁撤、国内埠际贸易日益兴盛，无锡的商业腹地向内地大大扩展，进而导引出锡沪之间的物资流通范围更广（更多是以工业原料、工业产品为内容），数量更大（是环绕机器大工业的大宗商品流通），加之依赖着更加现代化的运输手段、通讯方式、先进的企业经营管理模式以及巨额的资金融通、挹注。因此，至抗战爆发前，无锡已形成近代苏南地区二级区域城市中心并非虚言。

5. 基于锡沪经济关系基础上的深层思考

传统中国城市的功能结构主要体现在军事防御和政治中心方面，这类城市之间的联系常常表现为一种缺乏横向联系的垂直结构。城市与城市之间主要是一种行政统属关系，其联系的纽带是行政指令而不是商品要素的相互流通。不同行政区划之间城市无论在政治、经济或生活文化方面都鲜有交往。城市发展体现出一种自我封闭型式，区域城市间的联系十分微弱。

33) 胡觉民：《苏州钱庄史杂缀》，《苏州文史资料》，第1-5合辑，1990年，第55-56页

34) 李京文：《走向21世纪的中国区域经济》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第66-67页

35) 汤可可：《市场：要素的流动和组合》，胡平主编《近代市场与沿江发展战略》，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32页

然而，近代以来，伴随着口岸城市开放，进出口贸易发展，市场流通机制的演变，特别是新式工业在城市的兴起，以及交通条件的变革，打破了城市自我循环发展的封闭模式，在城市经济功能得到显著增强的同时，“城市彼此发生联系”，“使最初的地域局限性开始逐渐消失”³⁶⁾诸如无锡、南通等传统的封闭区域行政城市逐渐向开放横向经济中心城市转型。而据此生存的城市结构体系也发生着剧烈的改变。上述无锡城市经济中心地位的转变以及与区域中心城市上海之间的经济互动关系的形成正说明了这种新的变革。

鸦片战争以前的长江三角洲区域城市系统，与中国其他地区的传统区域城市系统一样，是一个以省、道、府、县序列大小不等的统治阶级政治中心与税收中心为骨架的城市等级网络。不少城市既是出于地方行政管理目的由政府建立的，同时也是由于不断进行经济和交易活动而形成的。如明清时期的苏州、镇江、常州、杭州、南京就既是区域的贸易中心，又是当时府一级的行政首府，而南京在明代一度是全国的政治中心，至清代还是江苏（南直隶）的政治中心；而无锡只是苏州、常州两大行政首府中间的一个小镇（隶属常州路），南通亦是偏隅江苏通州的一个县城而已。由于这一时期长江三角洲区域商品市场经济逐渐发育成熟，区域内农村集镇发展迅速，这些中心城市也相应成为具有相当聚集功能的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结点，因此，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城市格局中的城市序列与层级变化与其行政中心地位基本保持着一致。正因为如此，近代发展迅速的上海仅仅排列为这个序列体系的最低的县城一级。由于整个区域内部人口、资金、信息等城市要素的流动规模较小，这一时期长江三角洲区域地缘经济整合功能还相对较弱。长江三角洲城镇体系尚处于雏形阶段。

步入近代，随着资本主义的经济入侵，长江三角洲传统的区域和城市都发生了变化：

首先是上海、无锡、南通等一些具有发展潜质的城市，由于商品经济得到了发展，交通结构出现了变革，社会化大生产也纷纷建立。各区域城市地位因此发生了巨大的位移。尤其是上海，由于它的崛起和中心城市地位的确立，不但翻开了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开发史上新的一页，还对该地区的区际经济关系和地缘经济格局包括行政区与经济区的关系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³⁷⁾交通运输条件的变动、国际、埠际贸易的扩张、工业化的兴起，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成长为长江三角洲乃至中国的贸易、金融、和工业中心的极为重要的原因。而这三大中心地位的确立，也标志着一个“在全国居超前地位，门类齐全，体系完整，既同内地、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联系十分密切，又直接同国际接轨”³⁸⁾的近代城市市场体系在上海这个大都市形成。而且“在产销和融资、接纳和传导以及示范和辐射等方面都不同层次地对长江流域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这些影响的交互发生打破了以前被局部分割的局面，使长江流域经济日益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³⁹⁾其中紧靠上海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作为它的第一层次的经济腹地，这种互动关系更加强烈。这样，上海通过发达的市场对周围地区和城市进行经济整合，其地缘经济整合程度相应得到了极大的强化，长江三角洲区域城市的整体性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突出了。因此，有学者认为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区与行政区的关系是有机的统一起来的。尽管上海市场的形成还带有一些被迫的成分。⁴⁰⁾无锡、南通则是受上海强烈辐射影响而成长起来的二级区域中心城市，它们在接纳上

3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0页

37) 张仲礼：《上海城市经济的近代化对长江流域经济的影响》，《上海社会科学院季刊》1999年期

38) 张仲礼、沈祖炜：《近代上海市场发育的若干特点》，《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9年期

39) 周克瑜：《走向市场经济——中国行政区与经济区关系及其整合》，复旦大学出版1999年版，23页

海口岸推销过来的棉布、棉纱等廉价工业品的同时，还将大批茶、丝、棉花等工业原料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上海市场，连通了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商品流通大市场，由此形成了中心城市与腹地城市之间的强力联动关系。加之两地工商业大发展，无锡已由常州路治下的小县城取代常州而成为苏南地区的产业中心、商品集散中心、金融中心和信息中心。周围地区的江阴、宜兴、常熟、溧阳、金坛靖江、吴县、武进等地的经济活动，都围绕它而旋转。而南通因工业、交通、商业的发展，也迅速取代原来苏北商业中心扬州的地位，成为苏北商品云集之地。这样，随着两地城乡经济与上海经济一体化联系加强，在长江三角洲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完整的以上海为中心的区域市场网络体系。其中，上海成为这一区域城市市场网络中的第一级市场中心，无锡、南通则成为依附于上海并受其经济辐射的第二级市场。

当然也有诸如镇江、扬州、常州之类，原为地区区域中心，地理位置曾经优越，却因铁路这一新式交通的出现以及运河运输功能的弱化而改变了自身的命运。如常州近代城市经济地位所以下降，先是由于境内运河河道淤塞变窄，商旅视为畏途；再是沪宁铁路通车，原为常州经济势力范围的宜兴、溧阳、江阴、金坛等地及江北的货物纷纷转经无锡至上海，北方货物也大量经铁路运往无锡、上海。原为长江三角洲区域中心城市、内河商港的苏州，由于运河机能的丧失，近代以来，先后被具有江河海运功能且腹地广阔的海上海及有着良好的水运、铁路运输能力的无锡所超过、取代。而原为华东商业巨镇的镇江更是因为京汉、胶济两条铁路的先后通车，来镇江集散的豫东、豫南的货物半往汉口、半往青岛。津浦铁路一通车，南京又分占了它的部分商务，最终趋向衰落。一兴一衰，都发生在长江三角洲区域范围内，原有的明清城市网络格局得以重新整合。那些作为经济活动中心最优区位的近代化城市迅速成长，成为区域城市实力竞争的赢家。而作为各级权力机构象征的城市，也逐步让位于由各种新式产业组成的城市，行政城市终于让位于经济城市，而且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变化还是在行政权力之外，自下而上“自发”地进行的。这种区域城市系统表现出的越来越明显的内在经济联系性与层次定位性，受非经济因素影响和干预越来越少，与传统区域城市系统鲜明的政治层次形成了较大的反差。

更值得注意的是，整个区域城市系统因经济相互依赖而生存，因相互补充而发展，改变了传统区域城市体系垂直层次进行行政管理，同级城市间缺乏经济需求的状况。如无锡、南通、苏州等城市企业之间、企业与钱庄之间就有着密切的联系。通纱大量供给无锡纱厂，锡厂纱也到南通销售。而苏州钱庄与无锡、常州钱庄之间联系紧密，通、锡、常三地是苏州钱庄放款的主要地区和对象。⁴¹⁾无锡、常州钱庄业和工业的兴衰对苏州影响至大，在苏州钱庄中一向有“无（锡）常（州）一倒，性命难保”之说。⁴²⁾

于是，伴随着长江三角洲区域内城市间、城乡间的经济流动性和互补性不断增强，传统的以行省为单位的行政区划的外延开始被打破，而且在区域间的经济分割中不断被调整。区域城市正走出区域市场的范围，向全国性市场起步。而且区域城市系统还越来越表现出功能综合的态势，改变了传统区域城市系统中城市功能单一，城市辐射能力差的状况。城市地位往往由工业、商业、对外贸易、水陆路交通和文化教育发达水平等综合优势决定。城市层次取

40) 周克瑜：《走向市场经济——中国行政区与经济区关系及其整合》，复旦大学出版1999年版，232-233页

41) 江苏金融志编辑室：《江苏典当钱庄》，南京大学出版1999年版，9页

42) 马俊亚：《规模经济与区域发展——近代江南地区企业经营现代化研究》，南京大学出版1999年版，24页

决于自身功能的大小和全面与否。典型如上海，之所以上海形成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多功能经济中心，就是因为上海突破了闭关自守的封建政策的束缚，在实行对外开放过程中大力发展大规模的对外贸易和埠际贸易，充分利用国内国外资源，吸收国内外资金和技术，积极建设有利于城市发展的交通运输、电讯通讯、能源电力、市政基础等良好的外部环境，注重企业科技与人才的投入，在竞争中改革近代企业管理意识和制度以促使城市工业产生更大的聚集效应，尤其是通过经济活动主体——“上海人”的聪明才智、企业家民族精神、竞争意识、创业精神等才能的能动发挥使城市经济效益得到最大限度的提高，而实现的超常城市近代化道路。所有这些动力因素的积累与整合都为城市经济的高效益提供了条件和保障。至今，我们在建设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的过程中，这些经验仍值得借鉴。

另外，在近代整个长江三角洲区域城市系统中，无论在对外关系上还是系统内彼此间的关系上，还表现出明显的开放性（虽然这一开放性是在外力压迫下被迫形成的），与传统区域城市系统对内对外完全封闭形成了强烈反差。这种开放性也成为近代长江三角洲区域城市系统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总之，这场变革不仅仅是个体城市的转型，更是区域城市结构体系的变革，同时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区域城市发展的一个缩影。尽管这种“由各区域中心城市与区域内其它大中小城市之间的联系构成它们相互之间的联系不具全国性意义，但却是全国性城市间联系形成的基础，是城市成为各区域发展中心的最基本体现。”⁴³⁾因此，在此基础上展开对近代以来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区域城市间经济关系以及城市结构体系的变动进行研究，对于今天探索中国区域城市可行性发展道路都有着积极地现实意义。

43) 陈炜：《略论中国近代区域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2005年第1期。【作者简介】郑忠，1968年生，历史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兼职副教授
【联系方式】 zhengzhong_127@126.co

근대 중국 지방 도시의 경제 관계

- 상하이(上海)와 우시(無錫)의 상호관계 고찰을 기반으로 -

정중 (南京師範大)

〈目 次〉

상하이-우시 간 상품 이동
상하이-우시 간 인력 이동
상하이-우시 간 자금 이동
상하이-우시 경제 관계 분석
상하이-우시 경제 관계를 기반으로 한 심층 사고

내용요약 : 192,30년대 중국 우시(無錫)는 놀라운 경제 발전으로 '작은 상하이'라는 이름을 얻었다. 우시의 성장은 상하이 경제와의 역동적인 상호관계에 힘입은 것이었다. 본고는 우시와 상하이의 물자, 자금, 인구 및 정보 등 경제 요소 흐름을 구체적으로 살펴보면서, 지역 경제 '성장극'과 '성장중심' 이론을 적용하여 양자간 역동적인 상호 경제 관계를 분석한 결과, 우시는 상하이라는 '성장극'의 혁신 기능을 통해 성장한 새로운 '성장극'이라는 결론을 얻었다. 두 도시의 경제 요소가 복합적으로 이동하면서 양자간 역동적인 상호 경제 관계는 점점 긴밀해졌으며, 서로 의존하면서 각자 상대방의 협조 속에서 조화로운 발전의 계기를 확보하면서 서로 다른 레벨에서 지역 중심적 지위를 구축하였다. 이는 개별 도시의 전형적 성장일 뿐 아니라, 지역 도시 시스템의 변혁이자 근대 중국 지역 도시 발전의 축소판이기도 하다.

키워드 : 성장극, 성장중심, 역동적 상호관계, 도시 경제 관계

일종의 유기적이고 개방적이며 역동적인 시스템으로서 지역 도시가 주변 환경과 늘 물자, 에너지, 정보를 끊임없이 주고받는 흐름을 유지하는 사실이, 최근 국내외 지역경제사 연구자들의 주목을 받고 있다. 이는 이론적으로나 실용적으로나 경제지리학 시각으로만 지역 경제를 분석하는 기존의 틀을 벗어날 수 있을 뿐 아니라, 지역 도시 경제 관계를 통해서 종합적, 통합적, 역동적, 관련성을 특징으로 하는 새로운 연구 방법론, 즉 지역경제사학을 모색한다는 새로운 의미를 갖는다.¹⁾ 따라서 본고는 중화민

1) 근대 도시 경제의 상호 관계에 관한 연구로는, 현재 대표적인 논문으로胡光의 末民初京津冀城市化快展史探与示(『河北学』, 199년 第1期), 周俊旗 & 刘의 试塘沽新港津系化(『城市究』 第, 1991년), 竺菊英의 近经济上海系(『華范学』, 1994년 第5期), 竺菊英의 近船运生展经动系(『学月刊』 1994년 第9期), 皮 & 李策의 「近代汉经动略」(『城市究』 第7辑, 1992년), 隗瀛涛 & 谢放的 「上海开埠江流域城市近代化」(『城市究』 第1,

국 당시 빠른 발전을 보였던 창장강(長江) 델타에서 중간 레벨의 경제 도시였던 우시를 연구 대상으로, 우시와 창장강 델타의 중심도시인 상하이의 물자, 자금, 인구 및 정보 등 경제 요소의 흐름을 구체적으로 살펴보면서, 지역 경제 '성장극' 이론으로 두 지역 간 상호 역동적 경제 관계의 특징을 분석하였다. 그 결과, 우시는 '성장극'으로서 상하이의 혁신 기능의 역할에 힘입어 성장한 새로운 '성장극'으로 분석되었다. 두 대도시의 경제요소 이동이 복잡하게 이루어질수록 양자간 상호 역동적 경제 관계가 긴밀해졌다. 양자는 상호 의존하면서 서로 상대방의 협조에 힘입어 함께 발전하는 계기를 확보하였고, 그 결과 서로 다른 레벨에서 중심으로서의 지위를 다졌다.²⁾ 이 가운데 도시 중심 역할을 확립하고 발전한 우시는 근대 중국 지역 도시 경제 관계 변동의 새로운 형태를 보여주었다.

상하이-우시 간 상품 이동

물론 상하이와 우시의 신속한 교통 운송이 두 지역 경제의 빠른 성장과 상호 역동적 관계에 중요한 요인이 되었다. 기존의 연구에 따르면³⁾, 항일 전쟁 시작 이전에 상하이와 우시 간에는 이미 수운, 철도, 도로를 중심으로 근대 교통 운송 시스템을 형성하였다. 이 가운데 호녕(滬寧: 상하이-난징 구간) 철도가 주로 화물 장거리 운송과 여객 중계를 맡았고, 자동차와 선박은 근처 시, 현, 집진(集鎮) 및 농촌과 상하이의 경제 관계를 잇는 역할을 하면서 물자의 집산과 단거리 운송을 책임졌다. 이렇게 기차와 자동차를 중심으로 육로와 화물선, 쾌속선, 범선, 간이선 등 수로로 이루어진 교통 운송망은 중화민국 초기 상하이와 우시 간 역동적 상호 경제 관계 구축에 탄탄한 기반이 되었다.

상하이와 우시의 가장 기본적 유통 요소는 상품이였다. 주요 유통 품목은 국내 소비용 농산품(쌀 등), 공업 원료로서의 농산품(콩, 보리, 고치 등), 일상공업용품 및 소금, 석탄, 대나무, 건축자재 등이 있었다. 소비용 농산품과 원료용 농산품 유통의 경우, 우시 시장이 상하이 경제 발전에 필요한 원료 공급을 맡았으므로, 상하이는 우시의 뒷받침을 필요로 했다. 생산 원로나 생활 용품의 유통의 경우는, 상하이가 우시로 원자재 공급 및 상품 소비 시장의 역할을 맡았으므로, 우시 역시 상하이라는 시장의 존재에 상당히 의존한 셈이였다.

명청(明清) 이후 우시의 전통적 도시 상업은 봉건 재정과 관련된 식량 무역으로서,

1995년), 戴의 「近代上江流域城市市场网的」(『』, 1996년 第4期), 「近代上南浙经济变」(『国』, 1997년 第2期), 「上南区经格局」(『史林』, 1990년 第2期) 및 「近代上围」(『月』, 1994년 第2期) 등이 있다.
2) 20년대 창장강 델타 경제 중심 도시우시의성장을 다룬 연구로는, 비교적 종합적인 분석을 한 1990년대顾瑞, 唐文起 등의 논문이 있다.顾瑞,在二十年代形经中心的原因及, 『』, 1985년, 第4期; 唐文起, 经中心的形成, 『上经济区文』 第二集, 省究所, 215쪽). 이후 관련 논문은 이를 넘어서지 못했다.
3) 顾瑞,在二十年代形经中心的原因及, 『』, 1985년, 第4期.

한 때 나뭇의 시스템을 갖춘 상당한 규모의 미곡 시장이 있었다. 중화민국 탄생 이후 호녕, 호항(滬杭), 진포(津浦), 농해(隴海) 철도가 잇달아 완공되고 우시의 근대 가공 공업이 발전하면서, 장쑤(江蘇) 북부, 안후이(安徽) 북부, 화북(華北), 동북(東北)의 밀과 콩이 공업 원료로서 끊임없이 들어왔다. 본래 양곡 집산지였던 우시는 이제 곡물의 생산 소비지이자 쌀, 밀가루, 식용유의 산지 및 수출 지역으로 떠오르게 되었다.

우시가 중국 국내 미곡 시장으로 발전할 당시, 상공업 발전으로 인구가 급증하던 상하이의 식량 소비도 빠르게 늘면서 근대 중국 최대의 곡물 소비 시장이 되었다. 상하이의 식용 곡물은 대부분 국내 및 해외 공급에 의존했는데, 국내 공급처는 주로 창장강 상류의 후난(湖南)과 후베이(湖北), 장시(江西), 안후이었다. 강을 따라 내려가면서 장쑤 남부 지역으로 들어간 쌀은 다시 그 지역에서 생산된 곡물과 함께 우시로 모여들어 저장 및 가공을 거쳐서 다시 상하이로 재수송되거나, 상하이를 거쳐 역시 식량이 부족한 저장(浙江)과 동부 해안의 다른 도시로 재운반되었다. 이렇게 우시는 상하이로 운반되는 곡물의 중계 시장이 되었다. 통계를 보면 상하이가 매년 우시를 통해 사들인 미곡이 150만 석에 달했는데, 이는 우시 미곡 판매량의 33.71%였다. 이 통계는 게다가 산발적으로 상하이로 들어간 양은 포함하지 않았다.⁴⁾

밀과 대두는 제분업과 착유업에 중요한 공업 원료였다. 곡식 운송과 마찬가지로, 우시는 상하이로 운송되는 북쪽 지역의 밀과 콩의 주요 중계 시장이었다. 우시과 인근 지역은 밀과 대두의 주요 산지는 아니었으므로, 우시 시장의 밀과 대두는 주로 장쑤 북부, 안후이 북부, 화북, 허난(河南) 동부, 산둥(山東) 남부 등지에서 생산되었으며, 특히 장쑤 북부의 밀이 주종을 이루었다. 우시로 들어온 밀은 현지 제분 기업에 일부 판매되고 나머지는 다른 지역으로 팔려나갔는데, 가장 큰 공급처가 바로 상하이의 제분 공장이었다. 특히 푸핑(阜豐), 푸신(福新) 등은 장기간 우시에서 밀을 구매하면서 우시의 임시 창고와 곡물 도매상과 고정적 거래 관계를 맺었다.⁵⁾ 우시가 장쑤 남부 지역의 밀 집산지이자 밀기울 공급 기지를 형성한 배경은 다음과 같다. 첫째, 곡물 창고 설비의 건조가 편리하고 임대료가 저렴했다. 둘째, 경제 조식을 갖추고 있어, 화물이 창고로 들어가는 즉시 창고 비용을 지급하였기 때문에 거래 유통이 편리했다. 셋째, 부근에 상하이가 있어, 상하이 밀가격 변동에 따라 신속하게 상하이로 밀을 공급해 큰 이윤을 보장받았다.

창장강 델타의 누에고치 유통 역시 기본적으로 상하이와 우시가 중심이 되어 중계되었다. 기계공업 시대로 접어들면서 상하이에서 제사 공장이 발달했다. 하지만 상하이는 “고치가 풍부하게 생산되지 않았으므로,고치는 다른 지역에서 구해야 했다. 상하이의 고치 공급원을 조사해보니, 장쑤의 우시, 장인(江陰) 등지였고, 다른 지역으로는 주로 저장 동서부와 안후이었다.”⁶⁾ 매년 5월 고치가 다 자라면, 고치 상인이

4) 羊冀成, 『米調』, 会经济调所, 1935년, 1쪽.

5) 人民政会市员文究员, 『文』, 第1,99쪽.

상하이에서 현금을 가지고 우시로 찾아 왔다. 구매량은 우시에서 생산하는 고치의 20~30%를 차지했다.⁷⁾ 우시는 창장강 델타 지역의 주요 고치 생산지로서, 상하이와 주변 각 도시의 제사 공업이 발전하고 고치 매매가 활발해지면서, 자체 생산량뿐 아니라 “철도가 놓이게 되면서 장인, 이싱(宜興), 우진(武進) 등지의 고치까지 모조리 모여들어 판로를 찾았다.”⁸⁾ 우시는 상하이와 다른 경제 배후 지역의 고치 교역을 중개하는, 중국 동부 최대의 고치 집산 및 교역 시장이 되었다.

중화민국 이후 특히 1920~1930년, 우시의 잠사 생산량은 전체 장쑤성에서 25%~30%를 차지하였고, 점차 장쑤성 남부의 주요 기계 잠사 공업 기지로 성장하였다. 장인, 이싱, 징장(靖江) 등지의 고치는 우시 제사 공장을 거쳐 가공되어 우수한 품질의 비단실로 거듭나, 거의 전부가 상하이를 통해 수출되고 나머지는 닝보(寧波), 광저우(廣州) 등을 통해 수출되었다. 1928년 통계에 따르면, 상하이 생사 수출량은 108,021 냥으로 전국 총수출액의 59.9%를 차지하였다. 이 가운데 우시에서 수출된 양이 21,210 냥으로 상하이 총수출액의 19.6%를 차지하였다.⁹⁾ 우시 제사 공장에서 생산한 생사는 상하이로 운반되어, 일반적으로 생사 전문 거래인을 통하거나 공장에서 직접 양행(洋行)을 통해 수출되었다. 1930년 이후 상하이에 중국 생사 수출 회사가 탄생해 수출 업무를 시작했지만, 우시 생사 수출이 주로 양행을 통해 이루어지면서 상하이 생사 상인은 그저 공장과의 무역을 중개하는 역할에 그쳤다.

우시의 면방직 산업에 필요한 면사 역시 늘 상하이에서 사들여야 했다. 우시 현지 기업이 생산한 면사로도 현지 면방직 수요를 충분히 감당할 수 있었지만, 면사의 종류나 가격 등의 요인으로 인해 필요한 면사 공급은 대부분 상하이 시장에 의존했다. 무역량은 약 수천 포(包)에서 일만 포 정도였다. 대부분 상하이 공장 제품이거나 외국 수입품이었다.¹⁰⁾

이 밖에 석탄, 석유, 페인트, 유리, 화학 약품 등 우시의 공업 원자재와 연료 역시 기본적으로 상하이 시장을 통해 조달되었다. 우시 지역은 연료 자원이 부족한 곳으로, 기존의 생산 구조였다면 그다지 큰 문제가 되지 않았던 연료 부족 문제가 근대 공업이 발전하면서 심각한 제약 요인이 되었다. 오랫동안 우시는 생활 및 산업 연료를 완전히 외부 공급에 의존했다. 1929년 우시의 석탄 수요는 313,415톤으로 매일 평균 859톤의 석탄이 소비되었다. 잠사 산업과 방직 산업은 또한 석탄 소비가 막대한 대표적인 산업이었다.¹¹⁾ 일부 석탄은 장쑤 북부나 안후이 등지의 석탄 광산에서 직접 사들였지만, 상당량을 상하이 시장에서 구매하였다.

근대 창장강 델타 지역에서 기계 공업으로 생산된 일용품 유통은 생산 도시나 수입

6) 葛, 「上綱調」, 『実月1919년 월』, 第4.

7) 实国际易, 『国实』, 第第, 民国2.

8)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년, 39쪽.

9) 徐新吾의 『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년 30쪽), 高景严熙의 『近业选』(人民出版社, 1987년 38쪽)의 데이터를 근거로 계산한 것이다.

10) 实国际易, 『国实』, 『縣出』, 10쪽, 2.

11) 1930년 『市』 第, 『近百经济概』(1987년, 150~151쪽) 관련 자료.

항구에서 내륙 도시나 농촌으로 점진적으로 확산되는 형태를 취했다. 상하이 상공업이 발달했으므로, 상하이의 기계 생산 일용품은 대부분 우시나 진장(鎮江)의 중계를 거쳐 내륙 농촌 지역으로 확산되었다. 1894년 이전에는 수입 면포가 주로 상하이 상인을 통해 내륙 지역으로 판매되었지만, 19세기 말에서 20세기 초가 되면서 내륙 지역 상인들이 상하이로 와서 화물을 구매하기 시작하였다. 이에 따라 대량 조달 수요를 감당할 만한 숫자의 도매상들이 나타났다. 우시 면포 공급의 경우, 일부는 상하이 방직업으로 나머지는 현지 방직업으로 조달되었고, 면포 상인들과 도매 시장을 통해서 내륙 지역으로 유통되었으며, “현지 유통 물량을 제외한 대부분이 북부 지역과 동남아 각지로 팔려나갔다.” 이 밖에 “장인, 창수(常熟)의 시골에서 수공업으로 직조된 면포는 대부분 우시에서 사들여 장쑤 북부 지역으로 판매되었다.”¹²⁾ 우시의 기계 공업으로 생산된 면사는 지역 시장에서 큰 영향력을 발휘했으므로, “장쑤 북부의 타이싱(泰興), 징장, 장인, 쑤저우(蘇州) 등지에서 모두 우시의 면사 동향을 예의주시하면서 자체 면사 가격을 조정했다.”¹³⁾ 하지만 우시의 면사는 상하이 면사 가격을 잣대로 삼았으므로, 시장의 면사 가격은 결국 모두 상하이 가격에 따라 오르내렸다.

면포 외에 기타 금속 제품, 시계, 제약 등도 근대적인 영업 시스템을 형성하면서 재고, 도매, 소매 시장 등을 갖추면서 활발하게 거래되었다. 30년대 상하이 약품 산업은 대약방이라는 1차 도매 시장, 외지 약방이나 분점 형식의 2차 도매 시장, 시골 약방의 3차 도매 시장의 다층적 영업망을 갖추었다. 상하이의 약품과 일용품은 이미 중국 전역의 시골 점포에까지 널리 보급되었다. 통계를 보면 1936년까지 상하이 4대 대약방이 전국 각 도시에 연 분점이 112개였으며, 이 가운데 창장강 델타 지역에만 43%에 해당하는 48개가 집중되었다. 이렇게 상하이 대형 약방들은 전국적 지점망을 통해 상업적 영업망을 구성하였다.¹⁴⁾ 우시 등에서 생산한 중국약과 수입한 서양약도 역시 이러한 영업망을 통해 상하이나 쑤저우에서 사들여 다시 내륙 농촌으로 팔려나갔다.

상하이-우시 간 인력 이동

근대 우시는 상하이의 경제 발전에 필요한 공업 원료, 수출 화물, 소비 시장을 공급하면서 발전하였을 뿐 아니라, 상하이 근대 공업 발전을 위한 저렴한 노동력의 공급까지 맡았다. 그 이유는 상하이 공업 지역의 노동 생산성이 주변 전통 농업 지역보다 훨씬 높았기 때문이다. 공업 지역에서는 농촌보다 훨씬 높은 임금을 지불하였으므로 주변 농촌의 많은 인력이 대거 공장으로 모여들었다.¹⁵⁾ 관련 통계를 보면, 1910년부

12) 茅家琦&李祖法, 『近经济展』, 管理出版社, 198년, 쪽.

13) 炳泉泳泉, 『纱号概』, 『市 역음文』 第, 1984년, 4쪽.

14) 上海医公司 외 편저, 『上海近代』, 上海院出版社, 198년, 99쪽.

15) Gang Deng, 『The Premodern Chinese Economy: Structural Equilibrium and Capitalist Sterility』, p.1

터 1935년까지 상하이 공동조계의 저장 출신 인구 비율이 1920년 전후 잠시 80% 아래로 떨어졌을 뿐, 일반적으로 항상 80%를 넘었다. 게다가 각지에서 상하이로 온 인구의 출신지를 보면, 광둥(廣東), 안후이, 산둥(山東), 후베이(湖北), 푸젠(福建), 허베이(河北), 허난(河南) 등지는 해마다 늘어나기는 했지만 한 번도 20%를 넘기지 않았다. 상하이는 이미 ‘저장인(江浙人)’의 상하이가 되었고,¹⁶⁾ 이 가운데 우시인(無錫人)이 중요한 구성원이었다. 조사에 따르면 농촌을 떠난 “569명 가운데 상하이로 이주한 자가 가장 많아 약 400명으로”, 유출 인구의 70%를 차지했다.¹⁷⁾

우시에서 상하이로 간 노동력은 대부분 어느 정도 기술을 가지고 있었다. 우시에서 상하이의 공장에 일하러 간 노동자 가운데 상당수는 상하이에 사업을 시작한 우시 출신 기업가가 데려간 기술자와 간부들이었다. 예를 들어 상하이 선신(申新), 칭핑(慶豐), 리신(麗新), 광친(廣勤), 허핑(合豐) 등 공장 노동자의 70% 이상은 우시에서 모집되었다. 20년대 상하이에서 성공한 룡씨(榮氏)가 선신(申新), 푸신(福新) 등 공장 규모를 확대하면서, 우시의 많은 농민들이 위탁 소개 형식으로 상하이로 들어왔다. 통계에 따르면 30년대 우시 출신자가 두 공장의 각 작업장마다 각각 31%~91.5%까지 분포했다.¹⁸⁾ 이 밖에 상하이의 철강 업계 역시 우시 자본가가 거의 독점하다시피하였다. 1865~1910년 상하이 외국 선박 공장 가운데 상생(祥生), 허핑(和豐), 루이룽(瑞榕) 등의 주조반 매니저는 모두 우시 출신이었다. 상하이 중등 규모 기업주 중에는 우시인이 가장 많았고, 상하이 노동자도 우시인이 27%를 차지했다.¹⁹⁾

상하이 근대 공업이 빠르게 발전하면서 다른 지역과 도시의 기술 인력도 흡수하였다. 일례로, 중국 근대 화학의 선구자인 쉰서우(徐壽)와 중국 최초의 선박 설계에 참여한 화형광(華衡芳)은 강남제조국(江南製造局)에서 오랫동안 과학 기술 분야를 책임졌는데, 모두 우시 출신이었다. 상업 분야에서도 많은 농민들이 도시로 들어와 직업 선택의 폭이 크게 넓어졌다. 상하이의 도시화가 가속화되면서, 관련 상업 및 서비스 분야의 직업이 점점 늘어났다. 204개가 넘는 직업을 분류해보면 크게 임대 서비스, 제사, 금속, 전자재, 의복, 잡화, 문구, 오락, 식자재, 식음료, 양조, 연료, 일용잡화, 비누, 성냥, 특산물, 운수광고 등 23개 업종으로 나뉘며, 금속과 특산물 산업은 우시에서 상하이로 들어온 농민이 거의 독차지했다.²⁰⁾

물론 창장강 델타 지역의 노동력이 한 방향으로만 이동하지는 않았다. 상하이 주변 도시의 산업이 발전하면서, 그 지역 노동력이 상하이라는 중심 도시에서 주변으로 역류하는 추세도 나타났다.²¹⁾ 일례로 우시 최초의 제사공장인 위창(裕昌) 창립 당시 “상하

16) 依仁 《上海人变》,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년, 11쪽 참고.

17) 「江村衰落的索」, 『1932 第2期』, 17쪽. 이 밖에 통계에 따르면 우시에서 상하이로 간 농민은 유출 인구의 76.68였다. 『上海民族机器』(上), 局, 1966년, 66쪽 참고.

18) 上海经济研究所, 『家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2년, 11, 28 쪽.

19) 可可, 「要素的」, 胡平主 辑, 『近代场沿』, 国经出版社, 1996년, 3232쪽.

20) 许晓, 『20—30年结性探一』, 『近代』, 上海院出版社, 2001년 第1, 15쪽.

21) 의 연구에 따르면, 상하이에서 창장강 남쪽기 지역으로 돌아온 노동력은 주로 교육을 받은 지식 노동자나 기술

이에서 우시의 첸저우(前州)와 위스(玉祁) 출신 노동자를 모집했다.”²²⁾ 또한 룡씨(榮氏)가 선신(申新) 제3공장에서 경영 개혁을 실시하면서 초빙한 새로운 관리자들인 왕푸리(汪孚禮), 위중상(余鐘祥), 러우추첸(樓秋泉) 등도 모두 상하이의 국내외 제사 공장 출신이었다. 그들이 실시한 경영 개혁 역시 이러한 상하이 공장의 개혁 경험을 따른 것으로, 지식 노동자의 이동은 기술 전파를 수반했다. 이를 통해 상하이는 자체 기술력을 전국으로 보급하면서 주변 지역과 상하이의 공동 발전을 힘있게 이끌었다.

노동력의 상호 교류는 또한 상하이와 우시 간의 정보 교류를 수반했다. 본래 민간 우편은 민신국(民信局) 선박이 담당했지만, 1883년부터 청나라 정부는 진호(津滬) 철도에 전보자점(電報子店)을 설치하고 상하이-우시 간 전보 통신을 시작했다. 1926년 징후(京滬) 장거리 전화선의 상하이-우시 구간이 가설되어, 두 지역의 정보 교류가 더 원활해졌다. 20년대 상공업이 빠르게 발전하면서 우시 상업계에서는 전보 외에도 전보국에서 부설한 장거리 전화를 활용해 상업 정보를 서로 교환했다. 1930년대 약 2만 회의 우시 장거리 전화 통화량 가운데 난징 약 960회, 우진과 우쑤 각 약 4000회, 창수 약 100회, 상하이 9000회였다. 우시와 상하이와의 상업 정보가 가장 활발하게 전달된 것이다.²³⁾

인력 이동은 또한 기술과 경영 정보의 전파를 수반한다. 우시 공업 기술과 경영 정보는 대부분 상하이에서 왔다. 상하이는 수입 항구의 잇점에 힘입어 늘 남보다 먼저 새로운 생산 설비를 들여와 앞선 제조 기술을 활용했다. 이에 우시는 상하이로 견습생을 보내 앞선 경험과 기술을 흡수하고자 애썼다. 일례로 상하이 선이(申二), 선우(申五), 리이(麗一), 리산(麗三) 등 공장은 대부분 우시 공장을 위한 기술자 교육 훈련을 실시했다. 제사 방직 업계에서는 고객을 확보하기 위해 새로운 색상과 종류를 경쟁적으로 도입하였으므로, 심지어 상하이 대광명(大光明) 극장 입구에 직원을 상주시켜 당시 시민의 패션을 관찰하기도 했다.²⁴⁾ 우시 상업계에서 가장 두각을 나타낸 룡(榮), 탕(唐), 쉘(薛) 등 자본 그룹은 모두 상하이 관리본부를 통해 최신 국내외 시장 및 생산 기술 정보를 확보하면서 우시의 생산과 판매를 총지휘했다. 특히 룡씨 형제 등 기업가들은 먼저 상하이에서 사업을 시작해 초기 자본을 모으고 경험을 쌓은 이후 다시 우시로 돌아가 공장을 세우거나, 우시에서 성공한 후 사업을 다시 상하이로 확대하면서 우시의 조직 및 경영 경험으로 상하이에 새로운 활력을 주입하면서 사업을 더 키워냈다.²⁵⁾ 주목할 만한 사실은, 우시 방직 기업이 도입한 상하이의 기계 설비는 대부분 상하이에서 설비를 업그레이드하고 남은 기계였다. 우시 공장은 전력 직조기와 같은 새 설비를 도입하면 기존의 철목조 직조기를 주변 도시로 이전했다. 이렇게 설비를 넘겨주는 과정에서 지역 경제가 전반적으로 같이 업그레이드되었다.

다., 『混与展：江南区传会经代1900-1950』, 出版社,2003.

22) 周舜卿』(수고).

23) 明, 「前」, 市 履음文』 3,8쪽.

24) 市 工, 「解放前绒」, 文』 2,1988년,88쪽.

25) 可可, 「:要素的」, 胡平主 履음, 『近代场沿』, 国经出版社,1996년,32쪽.

상하이-우시 간 자금 이동

우시 전장(錢莊)과 은행은 상하이와 환송금 및 업무 조율 그리고 상공업 간의 자금 유통을 통해, 양 지역의 경제 발전을 안정적으로 뒷받침하였다.

주요 물자 유통 과정에서 화폐 자금인 환어음과 용자 서비스는 물자의 원활한 유통에 영향을 미친다. 우시 상공업은 전신환의 방식으로 전국적 금융 중심인 상하이와 긴밀한 자금 연계성을 유지했다. 우시의 외지 미곡상은 곡식을 팔고나면 대부분 상하이에 머물면서 일용품을 구매했기 때문에 많은 어음이 필요했다. 또한 현지 공장의 제품 판매나 자금 조달 역시 상하이를 중심으로 이루어졌다. 따라서 우시 전장의 어음 거래와 상하이의 어음 교환을 위한 왕래가 매우 빈번했다. 이는 자금 유통과 상공업 및 시장의 변영에 모두 긍정적으로 작용했다.

상하이의 자금은 우시의 고치 거래와 제사 공업을 뒷받침하는 역할을 담당했다. 매년 5월 18일~6월 4일은 창장강 델타 지역에서 고치가 나오는 시기였다. 당시 막대한 현금이 필요했는데, 생고치 수매는 “시작부터 마감까지 겨우 십여 일”²⁶⁾이면 끝났다. 짧은 시간 동안 거액의 자금이 저장 지역 고치 상인에게 집중되었으므로, 이는 매년 상하이 금융업의 중요한 업무였으며, 마침 차 거래기와 겹쳐 현금 수요가 급증했다. 추정에 의하면, 20년대 초 우시 누에 시장에서 필요로 한 은원(銀元)의 70%는 상하이에서 조달되었고, 나머지 30%는 쑤저우나 항저우 등지에서 유통되었다. 1926년 이후 중국 국내 은행의 태환권 신용이 커지면서 누에 농가가 어음을 받게 되자, 상하이 은행들은 앞다투어 우시 지점을 열었다. 이는 쑤저우나 전장 금융의 쇠퇴와 맞물려, 우시는 쑤저우 남부 지역 화폐 자금을 조율하고 결산하는 중추가 되었다.²⁷⁾

19세기 말 상하이 공업화 초기, 저장의 Ningbo와 장쑤의 우시, 쑤저우, 난통(南通) 등지의 상인들의 투자가 상하이 상공업 발전의 자금원이었다. 일례로 우시의 룡씨 형제는 우시 바오싱(保興) 제분 공장과 전싱(振新) 방직 공장을 기반으로 상하이에서 셴이(申一, 1915)와 셴이(申二, 1917)를 설립했다. 룡씨 푸신(福新) 휘하 8개 제분 공장 가운데 7개도 상하이에 설립되었다. 하지만 2차 대전 이후 우시 방직업이 발전하고 상당한 자금 축적이 이루어지면서, 기업들은 현지 심지어 상하이 공업에까지 투자하였다. 일례로 스타이성(世泰盛)의 주주였던 장명샤오(張孟蕭), 첸바오즈(錢保稚) 등이 상하이에 투자하여 화평(華豐) 방직 공장을 세웠다. 우시 상공업 자본이 상하이 공업 자본으로 전환되는 흐름을 보인 것이다. 물론, 상하이의 비싼 지가와 더 이상 저렴하지 않은 임금 등의 요인을 감안해 선견지명을 가진 몇몇 상하이 기업가 역시

26) 业金融, 行』卷 4191년1월日일).

27) 可可, 「:要素的」, 胡平主 엮음, 『近代场沿』, 国经出版社, 1996년, 32쪽.

원산지에 더 가까운 우시나 진장과 같은 도시에 투자하여 공장을 짓는 등 사업을 확대하면서, 자본이 재역류하는 상황도 나타났다. 일례로 1904년 상하이 우시 출신 제사 기업가 저우순칭(周舜卿)이 우시에 설립한 위창(裕昌) 제사 공장은 우시 근대 제사 공업의 선구자였다. 1936년까지 우시에 설립된 제사 공장은 모두 45개로, 총자본금만 192만 위안에 달했다.²⁸⁾ 우시는 이렇게 전국적인 ‘제사 도시’가 되었다. 이 밖에 우시의 면방직업과 화학공업 등도 비슷한 양상을 보였다. 상당한 재력을 갖춘 상공업자 심지어 개인이 창장강 델타 각지에서 동시에 여러 기업을 세워 자금을 서로 융통하면서 지역을 넘나드는 대기업 그룹을 형성했다. 주다춘(祝大椿), 룡중징(榮宗敬), 룡더성(榮德生) 등이 대표적인 사례였다.

상하이-우시 경제 관계 분석

이상과 같이, 창장강 델타에서 상하이와 우시 간 경제 요소는 주로 선박과 철도 교통, 전신 통신, 어음 금융 등 근대적 경제 연결 수단에 힘입어 왕래하면서, 창장강 델타의 중심 도시로서 상호 의존, 공생 및 불가분의 관계망을 형성하였다. 나아가 두 지역은 날로 긴밀한 경제 관계를 구축하면서 뚜렷한 상호 역동적 역할을 확보하였다. 이러한 상호 역동적 경제 관계를 분석한 결과, 본고는 ‘성장극’과 ‘성장중심’ 이론으로 타당한 설명이 가능하다고 보았다.

‘성장극’은 프랑스 경제학자 프랑소아즈 페루(Francois Perroux)가 내놓은 개념으로, 후에 많은 학자들이 이를 수정 보완하였다. 이 이론에 따르면, 하나 또는 다수의 창조력이나 추진력을 가진 산업 분야와 이와 연결된 산업 분야 그룹이 밀집된 지역을 ‘성장극’으로 보는데, 이러한 지역은 대부분 대도시 중심이다. ‘성장중심’란 포드빌(J. Boudeville)이 1957년 다른 영미 학자와 함께 내놓은 공간 개념으로, 생산자와 업계 사이의 친화력이 외부 경제 효과를 창출해, 생산자와 기업이 지리적 위치에서 급격히 발전하면 성장중심으로 나타낸다.²⁹⁾

‘성장극’과 ‘성장중심’의 유사점으로는, 모두 생산 요소와 제품의 유통 중심 또는 집산 중심으로서 일정한 경제 규모와 성장 속도를 갖춘 지역 도시를 가리킨다는 점 등이 있다. 그러나 ‘성장중심’은 ‘성장극’과 다르다. ‘성장극’ 개념은 혁신 능력을 가진 기업의 역할에 주목하며, 성장극이란 시장 역량의 역할 또는 경제 정책의 지휘 하에서 창조 능력을 가진 기업과 부서가 한 곳에 집중되는 중심지로서, 새로운 소수 선구자에 속한다. 이에 비해 ‘성장중심’ 개념은 외부 경제 효과의 역할에 주목하며, 성장중심이란 어떤 경제 분야에서 몇 기업이나 종합 산업체를 의미한다. 이러한 기업 자

28) 可可, 「:要素的」, 胡平主 译, 『近代场沿』, 国经出版社, 1996년, 32쪽.

29) 森, 『地域格局中展』, 『开发』, 198년, 期, 12쪽.

체는 혁신 능력을 갖추지 않는 경우가 많기 때문에 학습형 후발주자에 속한다. 보다 구체적으로 말해, ‘성장극’은 혁신을 모색하는 ‘제1행동지역’이라면, ‘성장중심’은 학습 모방형의 ‘제2행동지역’이고, 나머지 지역은 이것이 확산되면서 뒤따라가는 ‘제3행동지역’이 된다. 이 가운데 ‘제2행동지역’의 ‘성장중심’은 경제 요소를 성장극에서 ‘제3행동지역’으로 확산시키는 중계 거점 역할까지 갖는다.

이 이론으로 상하이와 우시의 경제 발전을 돌아보면, 중화민국 이후 창장강 델타 지역에서 상하이가 ‘성장극’의 성격을 갖고 우시가 ‘성장중심’의 성격을 갖는 것으로 보인다. 상하이는 중국에서 가장 일찍 근대 공업이 시작된 곳이자 공업 중심지로서, 상하이 상공업의 형성과 발전에 결정적인 역할을 한 것은 대체적으로 자체 혁신 역량이었다. 이러한 새로운 기업과 업종은 새로운 상품, 기술, 산업, 시장, 조직, 관리 시스템, 생산 방식, 경영 방식, 소비 방식, 생활 방식 등을 끊임없이 개발하고 창조해, 다른 지역에 모범을 보이면서 확산시킨다. 따라서 혁신이 막대한 선발 이익을 수반하고, 선발 이익은 상하이가 중화민국 이후 누구보다 앞서서 선구적으로 발전하는 대도시가 되는 원동력이 되었다.

이 때 우시 근대 공업이 마침 상하이의 확산 효과 속에서 성장하기 시작했다. 우시의 근대 기업과 업종의 설립은 모두 상하이보다 늦었고, 혁신자인 상하이를 모방하고 배워 출현한 ‘집단 추종자’였다. 당시 중국 근대 신식 공업 탄생을 분석 평가한 궁권(龔駿)에 따르면, “상하이는 스스로 중국 군수품과 제사 방직업을 탄생시켰을 뿐 아니라 다른 업종에서도 무수히 많은 기업이 나타났다.”³⁰⁾고 하였다. 무오우추(穆藕初)는 상하이 더다(德大)와 허우성(厚生) 공장에 서구의 합리적 경영 방법을 가장 먼저 도입하여 당시 우시를 포함한 중국 각 제사 공장의 모범이 되었다. 해외 선진 기술 설비 도입에서도 상하이 기업들이 선례를 보이면서, 상하이 및 전국 각지 기업이 이를 따르게 되었다. 각 기업은 국내외 제품과 경쟁하기 위해 속속 새로운 설비를 도입했다. 그들은 “최신 제작 기술을 갈망했다. 이는 대다수 공장에서 외국 기계 설비를 도입한 것으로 방증된다.”³¹⁾ 우시의 자본 그룹은 모두 상하이 총관리소를 통해 국내외 시장과 생산 설비 및 기술 정보를 얻으면서 대규모 관측 활동을 벌이는 등, 새로운 생산력에 대한 강렬한 열망을 표출하였다. 막강한 실력을 갖춘 이들 자본 그룹이 혁신자가 아니라 성장형 모방자가 된 이유는, 배우고 모방하는 비용이 혁신 탐색에 드는 비용보다 적었기 때문이었다. 그들은 기업의 규모를 키우고 시장 점유율을 높이기 위해 앞선 상하이를 바짝 뒤따르면서 최대한 후발 이익을 확보해야만 했다. 이러한 의미에서, 우시라는 ‘성장중심’은 곧 상하이라는 ‘성장극’의 혁신적 역할로 인해 성장한 것이며, 동시에 상하이라는 ‘성장극’이 창장강 델타 경제 발전에 영향력을 발휘하도록 하는 효과, 즉 지배 효과를 수반했다. 다시 말해, 상하이라는 ‘성장극’은 자체 기술, 경제, 경영 측면의 선진적 성격을 활용해 우시, 쑤저우, 난통 등 주변 지역의

30) 龔, 『都市化程度统计』, 书万有 本, 193년, 2쪽

31) 徐雪筠, 『上海近代经济概1882-193』, 上海院出版社, 198년, 28쪽.

투자 및 상품 교환 과정에서 지배적 역할을 하면서, 창장강 델타 나아가 중국 전역의 사회 경제 발전에 영향력을 갖는 ‘중심’이 되었다. 우시, 쑤저우, 난퉁, 항저우, 닝보 등 중간 규모 경제 도시는 상하이의 창장강 델타 도시 시스템에 속한 한단계 낮은 등급의 ‘성장중심’로 발전했다.

물론, ‘성장중심’으로서 우시의 지위가 결코 절대불변은 아니었다. 상하이라는 ‘성장극’의 승수효과(multiplier effect) 속에서, 중화민국 당시 우시에도 ‘성장중심’에서 새로운 ‘성장극’으로 발전하려는 양상이 나타났다. 이는 경제 순환 누적 요인 기제 때문으로, 주변 경제 발전에 대한 성장극의 지배적 역할이 끊임없이 강화되고 확대되면서, 그 영향력의 범위와 수준이 함께 발전하면서 나오는 결과이다. 20년대 이후 우시 공업 시스템이 형성되고 경제 기술 수준이 향상되면서, 우시 기업과 경제 전반의 혁신 능력이 강화되었다. 특히 혁신 과정에서 점차 형성된 중소 기업가 그룹이 중요한 역할을 발휘하였다. 이는 20년대 후반 우시에 ‘성장극’과 비슷한 기능이 점차 형성되어³²⁾, 쑤저우를 대신해 장쑤 남부 지역의 산업, 상품 집산, 금융, 정보 등의 중심이 되었다는 의미였다. 동시에 우시 주변의 기타 ‘제3행동지역’ 역시 한동안 어느 정도 성장 속도를 확보했다. 장인, 이싱, 창수, 리양(溧陽), 진탄(金壇), 징장, 우셴, 우진 등지의 경제 활동은 모두 우시를 중심으로 돌아갔다. 이렇게 중화민국 이후 창장강 델타 지역에서는 상하이를 필두로, 상하이 주변의 우시, 난퉁, 창저우, 쑤저우, 닝보, 항저우 등 중간 규모 경제 도시를 제2급 시장으로, 내륙 소도시와 농촌을 제3급 시장으로 하는 ‘시장 그룹’의 형태가 어느 정도 갖추어졌다. 이러한 도시와 도시 그리고 도시와 농촌 간의 인구 이동, 상업 무역, 금융 유통, 정보 교류에 힘입어, 창장강 델타 지역은 기본적으로 서로 영향을 미치면서 자신과 지역 경제의 발전을 동심원적으로 확산시키면서 함께 이끌어나갔다.

상하이의 ‘성장극’으로서의 파급효과(Spillover Effect) 역시 주목해야 한다. 이 효과는 주로 거점화와 확산이라는 두 가지 역할을 포괄한다. 거점화 역할은 주변 지역의 생산 요소와 경제 활동을 흡수하여 성장극으로 끊임없이 흐르도록 하여, 성장극 자체의 발전을 가속화한다. 확산이란 성장극이 주변 지역으로 생산요소와 경제 활동을 보내면서 주변 지역의 경제 발전을 이끄는 것이다. 거점화와 확산의 종합적인 영향력을 바로 파급효과라고 부른다. 거점화가 확산보다 커질 경우를 마이너스 파급효과라고 하여, 주변 지역의 경제 발전에 불리하게 작용한다. 전형적인 예는 근대 상하이와 우시 등 공업 중심이 쑤저우 상업 자본에 대한 강력한 흡수 효과를 발휘하자 쑤저우가 장쑤 남부 지역에서 중요한 저축 기지가 되었지만, 일단 상하이 자금 시장에 변화가 일어 우시와 창저우(常州) 기업이 파산하자 쑤저우의 금융업이 모조리 ‘목숨을 보장받지 못하는’ 상황이 나타났다.³³⁾ 상업 자본이 외부로 유출되자 쑤저우 현지 공업화 역시 자본 부족으로 낙후되었다. 확산이 거점화보다 클 경우에는 플러스 파급

32) 可可, 「:要素的」, 胡平主 譯, 『近代场沿』, 国经出版社, 1996년, 32쪽.

33) 民, 庄杂」, 州文』, 第1-5, 1990년, 55~56쪽.

효과가 나타난다.³⁴⁾ 일반적으로 플러스 과급 효과의 출현은 다른 지역에서 또 하나의 밀집 효과가 시작되는 시기인 경우가 많다. 다시 말해, 상하이라는 성장극이 생산 방식, 기술 설비, 원자재, 자본, 경영 노하우 측면에서 우시 지역에 대한 확산 기능이 극대화 되면서, 최종적으로 우시라는 새로운 ‘성장극’의 출현을 이끌어내는 것이다.

지역에서 새로운 성장극이 나타나면 필연적으로 지역 내 원료, 에너지, 자금, 시장 등 요소 수요가 서로 겹치면서 갈등을 빚는다. 따라서 새로운 성장극(우시 등)은 기존의 성장극(상해)과 도시 간 분업과 협력이 필요하다. 이는 주로 시장을 통해 조절되며, 최종적으로 지역 내부 시장 구조의 자연스러운 균형을 달성한다. 예를 들어 창장강 델타의 방직 산업 구조를 보면, 상하이는 비교적 앞선 경방직, 기계, 금속 등 산업을 보유하고 있어 다른 도시에 어느 정도의 기술 설비를 제공할 수 있었다. 우시는 방적사, 사라사 생산을 위주로 염색과 칼라 방적이 앞섰고, 창저우는 코르텐과 포플린, 창수는 강감 등 각자 주력 제품을 가지고 함께 중국 근대 면방직 산업 기지를 형성하였다.³⁵⁾ 이러한 산업 포지셔닝은 각 도시가 자신의 장점을 발휘하면서 규모의 경력을 이루어 업계의 기술 수준과 노동 생산성을 높이는데 편리했다. 그러나 분업이 서로의 관계 단절을 의미하지는 않았으며, 상하이와 우시 등 주변 도시는 서로 의존하는 협력 관계를 여전히 지속했다. 상하이 방직 공장의 원면과 포장재는 대부분 난통, 우시 등에 의존했으며, 각지에서 필요한 설비, 자재 및 고급 세사는 대부분 상하이에서 조달했다. 이 밖에 다른 업종에서도 수평적 관계와 상호 협조는 창장강 델타 도시 사이에서 얼마든지 찾아볼 수 있다.

결론적으로 창장강 델타 지역 중심 도시인 상하이와 주변 도시 우시의 경제 관계는 풍부한 내용을 갖춘 상호 역동적 관계일 뿐 아니라, 편리한 유통과 원활한 정보 교류가 가능한 다양한 역동적 인자를 가진 대규모 다층적 결속 구조를 형성하였다. 이는 근대 상하이 도시 경제의 빠른 발전을 이끌었을 뿐 아니라, 보다 중요하게는 우시의 근대화를 가속화했다. 특히 1920년대 이후 우시는 공업 발전을 통해 경제 흡인력과 과급력을 강화하였다. 여기에 육상 교통이 개통되고 후에 독자 관세와 청나라 지방통과세의 폐지가 실시되면서, 국내 도시간 무역이 날로 활발해져 우시의 상업 기반은 내륙 지역까지 크게 확산되었다. 이에 따라 상하이와 우시 사이의 물자 유통 범위가 한층 넓어지고(대부분 공업 원료와 공업 제품 위주) 수량이 늘어나면서(기계 공업 주종 제품 유통 중심), 근대화된 운송 수단, 통신 방식, 앞선 기업 경영 관리 모델 및 거액의 자금 유통과 투입이 이루어졌다. 따라서 항일 전쟁이 일어나기 전까지, 우시는 이미 쑤저우 남부 지역에서 2차 지역 도시 중심을 형성했다고 해도 과언이 아니다.

34) 李京文, 『走向21的国经』, 西人民出版社, 199년, 66~67쪽.

35) 可可, 「:要素的」, 胡平主 译, 『近代场沿』, 国经出版社, 1996년, 32쪽.

상하이-우시 경제 관계를 기반으로 한 심층 사고

중국 도시의 전통적 기능은 주로 군사적 방어나 정치적 중심으로 나타났다. 이러한 도시 관계는 대체적으로 횡적 연대를 결여한 수직 구조로 표현되었다. 도시와 도시 사이는 주로 행정적 종속 관계의 일종으로, 그 유대는 행정 지령이었지 상품 요소의 상호 유통은 아니었다. 다른 행정 구역에 있는 도시는 정치, 경제 심지어 생활 문화 영역에서도 거의 왕래가 없었다. 도시 발전은 자아 폐쇄형으로 이루어졌으며, 지역 도시 사이의 연관성은 매우 취약했다. 하지만 근대 이후 항구 도시가 개방되고 수출입 무역이 발전하면서, 도시 유통 기제에 변화가 생겼다. 특히 신식 공업이 도시에서 일어나고 교통 여건이 변화되면서, 도시의 자아 순환식 폐쇄적 발전 모델이 극복되었다. 도시 경제 기능이 뚜렷하게 강화되면서, “도시 사이의 연계가 생겨나”, “과거의 지역적 한계가 점차 사라졌다.”³⁶⁾ 그 예로 우시, 난통 등 폐쇄형 전통 지역 행정 도시가 점차 개방형 수평적 경제 중심 도시로 변화했다. 이에 의존하는 도시 구조에도 급격한 변화가 생겼다. 상술한 우시의 도시 경제 중심 지위의 변화 및 지역 중심 도시인 상하이와의 긴밀한 경제적 상호관계의 형성이 바로 이러한 새로운 변화를 설명한다.

아편전쟁 이전의 창장강 델타의 도시 역시 다른 지역의 전통 도시 시스템과 마찬가지로, 성(省), 도(道), 부(府), 현(縣)의 위계 질서에 따라 통치 계급의 통치 및 징세를 골간으로 하는 도시 등급망을 구성했다. 대부분 지방 행정을 관리하기 위해 정부가 구축한 도시이면서 동시에 끊임없는 경제 및 교역 활동으로 인해 형성된 도시이기도 했다. 명청 당시 쑤저우, 전장, 창저우, 항저우, 난징(南京)이 바로 지역 무역 중심이자 당시 지역 행정 중심지였다. 난징은 명나라 때 한 때 전국적 정치 중심이었다가, 청나라에 이르러 여전히 장쑤[南直隸]의 정치 중심이었다. 우시는 본래 쑤저우와 창저우라는 양대 행정 중심에 끼어 있는 작은 읍(常州路 직속)에 불과했으며, 난통 역시 장쑤 통저우의 현성(縣城)에 지나지 않았다. 당시 창장강 델타 지역에서 상품 시장 경제가 점차 싹트고 발전하면서, 이 지역의 농촌 집진(集鎮)이 빠르게 발전하였고, 이들 중심 도시 역시 이에 따라 상당한 응집 기능을 갖추면서 지역 경제 발전의 집결점이 되었다. 따라서 명청 시대 창장강 델타의 도시 구조 속에서 서열과 변화는 행정 중심 지위와 기본적으로 일치하였다. 그렇기 때문에 근대 빠르게 발전한 상하이는 이 서열에서 가장 낮은 1급 현성(縣城)으로 분류되었다. 이 지역에서 내부 인구, 자금, 정보 등 도시 요소의 유통 규모가 크지 않았으므로, 당시 창장강 델타의 지정학적 통합 기능도 상대적으로 취약했다. 창장강 델타의 도시 시스템은 아직 맹아단계에 머물렀던 것이다.

근대에 접어들어 자본주의 경제가 도입되면서 창장강 델타의 전통 지역과 도시에

36) 마르크스 엥겔, 『마르크스 엥겔스 전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년, 60쪽

모두 다음과 같은 변화가 나타났다.

먼저, 상품 경제가 발전하고 교통 구조가 개혁되면서, 상하이, 우시, 난통 등 일부 발전 잠재력을 가진 도시에 사회화된 대규모 생산이 하나 둘 형성되었다. 이에 따라 각 지역 도시의 지위에 커다란 자리바꿈이 나타났다. 특히 상하이가 두각을 드러내며 중심 도시의 지위를 확립하면서, 창장강 델타의 경제 발전의 새 역사를 열었을 뿐 아니라, 이 지역의 경제 관계 그리고 행정과 경제를 포함한 지연 경제 구조에 모두 깊은 영향을 미쳤다.³⁷⁾ 교통 운송 여건 변화, 국내외 무역 확장 및 공업화는 1930년대 상하이가 창장강 델타 나아가 중국의 무역, 금융, 산업 중심으로 성장하는데 매우 중요한 요인이었다. 이 3대 중심 지위의 확립은 또한 “전국에서 가장 빠르고 다양하면서 완벽하게 내륙 특히 창장강 델타와 창장강 유역과 긴밀하게 관계를 맺으면서 동시에 직접 세계와 발맞추는”³⁸⁾ 근대 도시 시장 시스템이 상하이라는 대도시에서 형성되었다는 의미였다. 게다가 “생산 소비와 금융, 도입과 보급 그리고 시범과 파급 등 분야에서 모두 창장강 유역 경제에 긍정적인 영향을 미쳤다. 이러한 영향이 중첩되면서, 과거 잘게 쪼개져 있던 창장강 유역 경제는 나눌 수 없는 하나로 결집했다.”³⁹⁾ 상하이와 가까운 창장강 델타 지역은 상호 역동적 관계가 가장 긴밀한, 상하이의 1차적 경제 기반이 되었다. 이렇게 상하이는 시장 발전을 통해 주변 지역과 도시에 경제적 통합을 진행하였다. 그 지역 경제 통합 수준이 극대화되면서, 창장강 델타 지역 도시의 통합적 성격이 과거 어느 때보다 부각되었다. 따라서 당시 비록 상하이 시장 형성에 어느 정도 강요된 부분이 있다고 해도⁴⁰⁾, 창장강 델타의 경제 구역과 행정 구역의 관계가 유기적으로 통일되었다고 보는 학자도 있다. 우시와 난통은 상하이의 강렬한 파급 효과에 따라 성장한 2급 지역 중심 도시였다. 이 도시들은 상하이 항구에서 들어온 면포, 면사와 같은 값싼 공업제품을 받아들이는 동시에 차, 방적사, 면화 등 공업 원료를 끊임없이 상하이 시장으로 공급하면서, 중국 전역 심지어 세계까지 연결되는 상품 유통 시장과 연결되면서 중심 도시와 내륙 도시 사이에서 강력한 연동 관계를 형성하였다. 게다가 두 지역의 상공업이 크게 발전하면서, 우시는 이미 창저우루(常州路) 소속의 작은 협성(縣城)에서 창저우(常州)를 대체해 쭈저우 남부 지역의 산업, 상품 집산, 금융 및 정보의 중심이 되었다. 주변 지역인 장인, 이싱, 창수, 리양, 진탄, 징장, 우셴, 우진 등지의 경제 활동은 모두 우시를 중심으로 돌아갔다. 난통도 공업, 교통, 상업의 발전으로 본래 장쑤 북부의 상업 중심이었던 양저우(揚州)의 역할을 재빠르게 대체하면서 북부 상품 집산지가 되었다. 이 두 지역 경제와 상하이 경제 통합이 강화되면서, 창장강 델타 지역은 점차 상하이를 중심으로 하는 거대한 지역 시장망을 형성하였다. 이 가운데 상하이는 이 지역 도시 시장망의 제1급 시

37) 上海城經的近代江流經的, 『上海院季』, 199년, 期

38) 沈, 「近代上海場育的若干特」, 『上海學季』, 199년, 期

39) 周克瑜, 『走向場經——行區與經濟區系及其整』, 旦出版社, 199년, 23

40) 周克瑜, 『走向場經——行區與經濟區系及其整』, 旦出版社, 199년, 2323쪽

장 중심이 되었고, 우시와 난통은 상하이에 의존하면서 그 경제적 파급 효과를 얻는 제2급 시장이 되었다.

물론 진장, 양저우, 창저우처럼 지리적 입지가 뛰어나 본래 지역 중심이었지만, 철도라는 새로운 교통 수단이 나타나 운하의 운송 기능이 약화되면서 스스로의 운명이 바뀐 경우도 있었다. 창저우의 근대 도시 경제 지위 하락은, 일단 지역 운하에 흠이 쌓이면서 좁아져 점점 외면당했고, 또 호녕 철도 개통으로 본래 창저우 경제권이던 이싱, 장인, 진탄 등지와 창장강 북부의 화물이 우시를 거쳐 상하이로 들어가게 되고, 중국 북부 화물 역시 대거 철도를 통해 우시와 상하이로 운송되었기 때문이었다. 본래 창장강 델타의 중심 도시이자 내륙 운하 요지였던 쑤저우는 근대 이후 운하 기능을 상실하면서, 수운 및 해운 기능을 겸비하면서 보다 광활한 배후 지역을 가진 상하이에 추월당하고, 다시 수운과 철도 운송 기능이 뛰어난 우시에도 추월당하게 되었다. 본래 화동의 상업 거점이던 진장은 경한(京漢), 교제(膠濟) 철도가 차례로 개통되면서, 본래 이 곳에 모여들던 허난 동남부 화물을 각각 한커우(漢口)와 칭다오(靑島)에 완전히 빼앗겼다. 진포(津浦) 철도가 개통되자 난징이 다시 그 일부 상업 기능을 가져가면서, 결국 진장은 쇠퇴의 길로 접어들었다. 이러한 엇갈린 운명이 창장강 델타 지역에서 나타났다. 과거 명청 시대의 도시 네트워크가 새롭게 조정된 것이다. 경제 활동 중심으로서 최전선에 선 근대 도시가 빠르게 성장하여 지역 도시 경쟁력의 승자가 되었다. 또한 권력 기관의 상징이던 도시는 새로운 산업으로 구성된 도시에 점차 지위를 물려주면서, 행정 도시는 결국 경제 도시에 지위를 양위하였다. 게다가 부정할 수 없는 사실은 이러한 변화는 행정 권력의 바깥에서 아래에서 위로 ‘자발’적으로 진행되었다는 점이다. 이러한 지역 도시 시스템은 내재적 경제 연관성과 포지셔닝의 층차성을 점점 더 뚜렷하게 나타내면서, 비경제 요인의 영향과 간섭이 점점 줄어들었다. 이는 전통 지역 도시 시스템의 뚜렷한 정치적 층위성과 대조적이었다.

주목할 만한 점은, 전체 지역 도시 시스템이 경제의 상호 의존에 힘입어 지탱되었고 서로 보완적으로 발전했기에, 수직적 행정 관리와 동급 도시 사이의 경제 수요 결여라는 과거의 지역 도시 시스템을 변화시켰다. 일례로 우시, 난통, 쑤저우 등은 도시 기업 간 그리고 기업과 전장 간 긴밀한 관계가 발생했다. 난통의 방적사가 대거 우시 방적공장에 공급되었고, 우시 공장의 방적사 역시 난통으로 팔려나갔다. 쑤저우 전장은 우시나 창저우 전장과 긴밀한 관계를 유지하였으며, 난통, 우시, 창저우는 쑤저우 전장의 주요 대출 고객이었다.⁴¹⁾ 우시와 창저우 금융업과 공업의 흥망성쇠는 쑤저우에 큰 영향을 미쳤으므로, 쑤저우 전장 사이에 “우시나 창저우가 파산하면 목숨을 보장 못한다.”는 말이 돌 정도였다.⁴²⁾

따라서 창장강 델타 지역 도시와 도시 간, 도시와 농촌 간의 경제 교류와 보완성이 날로 강화되면서, 행정(行省)을 단위로 하는 전통적 행정 구분의 외연이 깨지기 시작

41) 金融编室, 『当』, 南京出版社, 199년, 9쪽

42) 经济与展——近代江南业经营代』, 南京出版社, 199년, 24쪽

하고, 지역 간 경제 할거 국면 역시 끊임없이 조정되었다. 지역 도시는 지역 시장의 범위를 벗어나면서 전국 시장을 향해 첫걸음을 뗐다. 게다가 지역 도시 시스템 역시 점점 더 기능 종합적 양상을 보이면서, 단조로운 도시 기능으로 파급 효과가 떨어지는 기존의 도시 시스템을 변화시켰다. 도시의 지위는 공업, 상업, 대외 무역, 수륙 교통, 문화 교육 발전 수준 등을 종합한 경쟁력에 따라 결정되었다. 도시 레벨은 자체 기능의 크기와 균형으로 결정되었다. 전형적인 예로 상하이로 근대 중국에서 가장 중요한 다기능 경제 중심이 된 데에는, 폐쇄적인 봉건 정책의 속박을 벗어던지고 대외 개방 과정에서 대규모 대외 무역과 국내 무역을 발전시키면서 국내외 자원을 충분히 활용하고 국내외 자금과 기술을 흡수하여 도시 발전에 필요한 교통 운송, 전보 통신, 에너지 전력, 시정 기반 등의 우수한 외부 환경을 적극 구축하고, 기업의 과학 기술과 인력 투자에 집중하면서 경쟁 속에서 근대 기업의 관리 개념과 제도를 개혁함으로써 더 막대한 도시 공업 결집 효과를 발휘했기 때문이었다. 특히 경제 활동 주체인 ‘상하이인’의 총명함, 기업가의 민족 정신, 경쟁 의식, 창업 정신 등의 재능을 능동적으로 발휘하여 도시 경제 효과가 극대화되면서 실현된 독특한 도시 근대화 과정의 역량이었다. 이러한 동력이 축적되고 통합되면서 효율적인 도시 경제를 보장하는 기반이 되었다. 오늘날 상하이로 중심으로 창장강 델타 도시 경제를 구축하는 과정에서도 이러한 경험을 참고해야 할 것이다.

이 밖에 근대 창장강 델타 지역의 도시 시스템은, 대외 관계든 시스템 내부의 상호 관계이든 모두 뚜렷한 개방성을 보였으며(이 개방이 외부 압력에 강요된 것이라고 해도), 이는 대외적으로 완전히 폐쇄적이었던 기존의 지역 도시 시스템과 대조적이었다. 이러한 개방성 역시 근대 창장강 델타 지역 도시 시스템의 발전 기반이 되었다.

결론적으로, 이러한 변화는 개별 도시의 구조 전환을 넘어선 지역 도시의 구조 변화였으며, 동시에 근대 이후 중국 지역 도시 발전의 축소판이기도 했다. 비록 이러한 “각 지역 중심 도시와 지역 내 기타 대중소 도시 간의 연관 관계로 구성된 상호관계가 전국적 의미는 확보하지 못했지만, 그래도 전국적 도시 간 연계성을 형성하는 기반이 되었으며, 처음으로 도시가 각 지역의 발전 중심이 되었다.”⁴³⁾ 따라서 이를 기반으로 전개된, 근대 이후 상해를 중심으로 하는 창장강 델타의 도시간 경제 관계 및 도시 구조의 변화에 대한 연구는, 앞으로 중국 지역 도시의 타당성 있는 발전 모델을 모색하는 데 현실적으로 긍정적 의미를 갖는다.

43) 陈, 「近域经济」, 《西右江民师专》, 2005년, 第1期. 【저자 약忠, 1968년 출생, 역사학 박사, 난징사범대학 역사학과 부교수, 푸단대학 국제현대화과정연구센터 겸임 부교수】연락 zhengzhong_127@126.com

近代中国地域都市の経済関係

—上海と無錫の相互作用に関する考察に基づいて—

鄭 忠(南京師範大)

〈目 次〉

上海・無錫間の商品流通
上海・無錫間における人的資源の流動
上海・無錫間の資金流通
上海・無錫間における相互作用関係の分析
無錫・上海の経済関係に基づく深層考察

内容要旨 : 1920~30年代、中国の無錫は急速に経済発展を遂げ、「小上海」と称されたが、その成功は上海経済との相互作用関係によってもたらされた。本論文は地域経済の「成長の核(growth pole)」理論と「成長中心」理論を使って、無錫・上海間における物資・資金・人口・情報などの経済要素の流通を具体的に考察し、両地間の経済的な相互作用関係の特徴を分析したものである。そこで得られた結論としては、無錫は上海という「成長の核」がもたらした効果によって成長してきた新たな「成長の核」であった。二つの都市間で経済要素の流動が複雑になればなるほど、両者の経済的相互作用関係はより密接になった。この変化は単に個々の都市が変化したものではなく、地域都市間におけるシステム構造全体の変革であり、同時に近代以降における中国の地域都市発展の一つの縮図でもあった。

キーワード 成長の核；成長中心；相互作用；都市経済関係

地域都市とは一つの有機的・開放的・動的システムとして、その周囲の環境とたえず物質・エネルギー・情報が入り出る流れの中に存在している。この事実は近年ますます中国内外の地域経済史学者たちの注目を集めている。なぜなら地域都市の経済関係研究を深めることは、これまで難しかった経済地理学の方から地域経済を分析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だけでなく、総合性・全体性・動態性・関係性を特色とする地域経済史学の研究方法を发展させることも可能となり、これは理論的にも現実的にも極めて重要な意義を有している*1)。よって本論文では、民国時代に急速に发展した长江デルタ地域の中等経済都市・无

1) 近代都市における経済的相互影响の研究で、いま比較的重要な成果としては、胡光明「清末民初京津冀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历史探源与启示」（『河北大学学报1999年期）、周俊旗・刘红娟「试论塘沽新港的兴建与津塘关系的变化」（『城市史研究』辑1999年）、竺菊英「论近代宁波经济与上海的关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期）、竺菊英「从近代宁波轮船航运业的产生和发展看沪甬两地经济互动关系」（『学术月刊1999年期）、皮明麻・李策「近代申汉经济互动论略」（『城市史研究』辑1999年）、隗瀛涛・谢放「上海开埠与长江流域城市近代化」（『城市史研究』1辑1999年）、戴鞍钢「近代上海与长江流域城市市场网络的架构」（『复旦学报1999年期）、「近代上海与苏南浙北农村经济变迁」（『中国农史1999年期）、「上海开埠与苏南地区经济格局的变化」（『史林1999年期）、「近代上海与周围农村」（『史学月刊1999年期などがある

錫を研究対象として取り上げ、当地域の中心都市・上海との間における物資や資金・人口・情報など経済要素の流通状況を具体的に考察し、あわせて地域経済の「成長の核」理論を用いて、両都市間の経済的相互作用関係の特徴を分析する。結論を先取りすれば、无锡は上海という「成長の核」の新規創造作用によって成長してきた新たな「成長の核」であった。二つの都市間における経済要素の流動が複雑になればなるほど、両者の経済的相互作用関係はより密接になった。両者は相互依存しており、それぞれ相手の助けがあってこそ协调发展するチャンスを得、それにより异なったレベルでの地域の中心的地位を确立したのだった*2)。无锡という都市がそのような中心的地位を确立し、発展してきたことは、近代中国における地域都市経済关系が変動する新形式を体现したものであった。

上海・無錫間の商品流通

上海・无锡間における交通運輸の高速化が、両都市の速やかな経済成長と相互作用関係を発生させる重要な要素であることは言うまでもない。先行研究によれば*3)、抗日戦勃発以前に、上海と无锡を結ぶ交通運輸業はすでに水路・鉄道・自動車道路を主とする近代交通運輸体系を形成しており、そのうち鉄道運輸（沪宁铁路）は主に长距離貨物の中継輸送と旅客の乗り継ぎ業務を担い、自動車と蒸気船は近隣の各市县・各集落・农村と大都市上海とを経済的に結びつけ、貨物の集散と短距離の中継輸送を担っていた。このように陆路の汽车・自動車、水路の蒸気船・快速船・帆船・便船という重層的な交通運輸ネットワークが存在し、民国以降に上海・无锡が経済的に相互作用関係を确立する基礎作りがなされていた。

上海・无锡の二つの都市間で最も基本的な流通要素は、商品の流通であった。その商品は主に、中国国内で消費される农产物（消費性农产物。例えば米）、工业原料となる农产物（原料性农产物。例えば豆、麦、茧など）、日用工业品、及び塩・石炭・竹木・建材物资などであった。消費性农产物と原料性农产物について言えば、无锡市場は上海の経済発展のために必要な原材料を提供しており、上海は无锡の支えを必要としていた。生産要素・生活必需品の物流について言えば、上海は无锡にとって原材料供給と生産物販売の市場であり、その資源依存度はかなり高いものだった。

明清以来、无锡の伝統的な都市商业といえ、封建财政と关系ある食粮交易であり、以前から大規模な、体系だった米谷市場が存在していた。民国以降、沪宁・沪杭・津浦・陇海鉄道が次々と建設され、无锡で近代加工工业が兴ると、苏北・皖北・华北・东北の小麦・大豆が工业原料として续々と无锡に輸送されるようになり、もとは単なる食粮集散地であった无锡は、一躍米谷・豆・麦の生産消費地、精米・制粉・制油の产地、及び輸出地

2) 无锡1920年代、长江デルタ地域の経済中心都市に成長したことに关する研究は、早く1989年代に顾纪瑞、唐文起らが全面的分析を行っていた。（顾纪瑞「无锡在二十年代形成经济中心的原因及其职能」，『历史档案198年期；唐文起「无锡经济中心的形成和发展」，『上海经济区研究论文集』第二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所p.21）その後彼らを超える研究は出していない

3) 顾纪瑞「无锡在二十年代形成经济中心的原因及其职能」，『历史档案198年

域となった。

无锡が中国国内の一大米谷市場になるのと時を同じくして、上海もまた都市工業・商業の興起・発展により、人口が急激に増加。食糧消費量はにわかに増大し、近代中国最大の米谷消費市場となっていた。上海で消費される米は、大半を国内外からの供給に頼っており、国内では主に長江上中流域の湖南・湖北・江西・安徽の米であった。これらの米は長江を下って、その一部は苏州南部地域に流れ、一部はその苏州南部地域で生産された米とともに无锡に流入し、貯蔵と加工を経て、上海に送られた。あるいはその上海から、同じように食糧が不足している浙江やその他の沿海都市に運ばれることもあった。このように无锡は食糧を上海に運ぶ交易中継市場であった。見積もりでは、上海が毎年无锡で買い付ける米は150万石で、无锡が出荷する米全体量の33.71%を占めており、しかもこれは上海から他の地域に分散する量を含みぬ数字であった*4)。

小麦と大豆は、制粉業・制油業の重要な工業原料であった。米の運送と同じように、无锡は北方の豆・麦を上海に運ぶときの中継市場でもあった。无锡とその近郊は小麦・大豆の主要な生産地ではなく、无锡市場で扱われる小麦・大豆は、主に苏北、皖北、华北、豫東、魯南地域から来たもので、特に苏北の小麦は多かった。无锡に入った小麦は、一部が現地の制粉企業に卸されたほか、他の地域にも売り出され、中でも上海の制粉工場の需要に応じて出荷されることが最も多かった。上海の阜丰・福新などの制粉工場は、长年无锡の小麦を仕入れており、无锡の倉庫業者・谷物問屋と一緒に、貯蔵と仕入れ・販売システムを確立させていた*5)。このように无锡が苏南地域における小麦の集散地となり、かつ小麦粉の供給基地となったゆえんは三つあった。一つは无锡の谷物問屋が天日干しに適した設備を備えていて、保管料も低廉であったこと。二つには无锡の経済組織が完備していて、物資が倉庫に収納されると、すぐさま業者への支拂いが行え、流通・取引に便であったこと。三つ目として无锡は上海の近郊にあり、上海で小麦価格が高騰したとき、素早く小麦を上海に運び、大きな利益を得ることが出来るからであった。

長江デルタにおける蚕の茧の交易流通は、基本的に上海・无锡を中心に行われた。大工業時代、上海の制糸業は非常な発展を遂げたが、上海は「養蚕が盛んな地域ではなく、……ゆえに茧は他の地域に求めざるを得なかった。上海における茧の出所を調べると、同じ江苏省の无锡・江阴等の県、及び他省の浙東・浙西・安徽から来たものが多かった。」*6)毎年五月、蚕の茧が成熟するとき、茧商人が上海から現金を持って无锡を訪れ、買い付けを行う。その量は无锡における茧生産量の20~30%を占めていた*7)。无锡は長江デルタ地域における良質な茧の主産地で、上海と周辺の各工業都市で制糸工業が盛んになったことから、茧の取次販売もかなりの活況を呈し、単に茧生産量が上がったのみならず、「鉄道が開通して以来、江阴・宜兴・武进で干乾しされた茧は、无锡市場で売り出される他無かった。」*8)无锡はすでに上海と、経済的後背地として養蚕をおこなっている華

4) 羊冀成『无锡米市調査』，社会経済調査所193年，1頁

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无锡市委文会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无锡文史資料』，1輯，96 9 頁

6) 葛文瀨「上海丝绸調查報告」，『江苏实业月志191月期

7)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江苏省』，第四編第二章，民2年版

8) 钱耀兴『无锡市系绸工业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年版，39頁

東地域を結びつける蚕の一大集散地、最大の蚕市場となっていた。

民国以降、特に1920～30年の間、无锡の蚕糸生産量は江苏省全体の25～30%を占めるようになり、苏南地域における機械制糸工業の重要据点となった。江阴・宜兴・靖江などの蚕は、无锡の制糸工場で生産加工され、良質の「白厂丝（白色の機械取り生糸）」となり、そのほとんどすべてが上海から、残り少しが宁波・广州から輸出された。1928年の統計によると、上海から輸出された生糸は10万8021海关两で、中国全体の生糸輸出量の59.9%を占めていた。そのうち无锡から上海にもたらされた量は2万1210海关两に達し、上海からの輸出全体量の19.6%だった*9)。无锡の制糸工場が生産した生糸は上海に運ばれ、一般的には生糸仲買人―糸号―を通じて洋行と、あるいは工場主が直接洋行と交易を行い、そして国外に輸出された。1930年以降、上海には中国人による生糸輸出会社が多数成立し、輸出業務に従事したが、无锡の生糸輸出貿易は依然として洋行によって経営されていた。上海の糸号はただ生産業者と洋行の間を仲介していただけにすぎなかった。

无锡の綿織物業が必要とする綿糸も、常に上海から仕入れられていた。无锡における綿紡績企業の綿糸生産量は、現地の綿織物の需要を満たせなかった。それだけでなく品種や価格といった要素からも、綿織物業が用いる綿糸は、常に上海市場に頼っていて、その取引量は数千～1万包であった。これらの綿糸は、あるいは上海の工場生産品であり、あるいは国外から輸入されたものだった*10)。

そのほか无锡における工業原料や燃料、例えば石炭・石油・塗料・ガラス・化学药品なども、基本的に上海市場で購入された。无锡地域は燃料資源が乏しく、もし伝統的な生産構造下で燃料供給を語るだけならばそれほど大きな問題はないのだが、近代工業が発展して以降は、燃料の欠乏は工業生産を制約してしまう要因となりうるものだった。長いあいだ无锡の生活用・工業用燃料は、完全に外地からの供給に頼っていた。わずかに石炭だけを取っても、1929年における无锡全县の石炭需要は31万3415トン、一日平均859トンで、制糸業と紡績業は石炭使用量が最も多い二大産業であった*11)。これら石炭の一部は直接苏北・安徽の石炭産地から運ばれたが、かなりの部分はやはり上海市場から購入されていた。

近代长江デルタ地域で日用品として使われる機械工業製品の流通は、生産都市あるいは輸入港から内地の都市・農村に漸次拡散していく形を示した。上海の商工業が発展すると、その大量の機械工業製品は无锡・镇江などの都市を経て、内地の農村に拡散していった。例えば日用的な機械制綿布について言えば、1894年以前だと輸入綿布が主に上海商人の手で内地に向けて売りさばかれていたが、19世紀末～20世紀初めになると、内地の商人が上海に来て買い付けを行うようになった。そこで多くの卸売業者が出現し、大量の買い付け需要に応じた。无锡における綿布の経営販売は、一部を上海の、一部を无锡の紡績業によって担われ、多くの綿布業者を通じて卸売市場を経て、内地地に向かう流れができていた。流通の方向は「現地で売りさばかれるほか、大部分は北方の諸省及び東南アジア各

9) 徐新吾『中国近代繅糸工業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30頁）、高景岳・严学熙『近代无锡蚕糸業資料選輯』（江苏人民出版社198年版、38頁）所掲のデータにより算出

10) 実業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実業江苏省」、『各县进出口貿易』、10頁、民2年版

11) 193年『无锡年鉴』、『无锡市政』号、『无锡近百年經濟概覧』198年版、150 15) の関係データに基づく

地に売り出された。」そのほか「江阴・常熟の手織り綿布は、つねに无锡の綿布商が買い取って苏北に販売された。」*12)无锡の機械制綿糸も、地域市場にかなりの影響をもたらしており、「苏北・泰兴・靖江・江阴・苏州等の地は、いずれも无锡の綿糸相場を綿糸の販売価格を決定する基準としていた。」*13)そして无锡の綿糸業者が定める綿糸価格は、上海の綿糸価格を基準にしており、市場の綿糸価格は上海での価格を参照してその上下が決定されていた。

綿布以外では、金属制品・時計・西洋医药等の商业が、より近代的な経営販売システムを持ち、仕入れ・卸売り・小売りといった機能を有した市場が形成されていて、商品流通はスムーズに行われた。例えば1930年代上海の西洋医药业は、大規模药局が最も大量に卸売りをを行い、外地の药局や支店がそれに次ぎ、乡镇の药局はさらに小規模の卸売りをを行うという、多层的な販売システムが形成されていた。上海の西洋医药と日用品は、すでに南北乡村の小規模店に行き渡っていた。関連資料によると、1936年に上海の四つの大药局が全国各城镇に置いた支店は112カ所に上り、そのうち长江デルタ地域の江苏・浙江には48カ所あって、43%を占めていた。これらのチェーン店は広く分布しており、上海の大药局による全国規模の商业販売网を形成していた。*14)无锡以外の地域で生産された汉方药と輸入された西洋医药は、まさにこのルートを使って上海・苏州から购入され、内陆の农村に運ばれたのだった。

上海・無錫間における人的資源の流動

近代における无锡の経済発展は上海の経済発展のために、ただ工业原料や輸出貨物、販売市場を提供しただけではなく、同時に低廉な労働力も提供した。その原因としては、上海の工业地域における労働生産率が、周辺の伝統的な农业地域よりもはるかに高かったことにあった。工业地域では农业地域よりもはるかに高額な賃金を支拂うことができ、周边地域の大量の农业労働力をひきつけ工場に向かわせた*15)。このことをはっきりと示す統計があって、1910～35年のあいだに、1920年前後の一时期を除いて、上海の共同租界の总人口に占める江苏・浙江籍の割合は、常に80%を超えていた。しかも各地から上海に来た广东・安徽・山东・湖北・福建・河北・河南の人口割合が毎年増加していたにもかかわらず、基本的にずっと20%を超えることがなかったのである。上海はすでに「江苏・浙江人」の上海となっていた*16)。その中では无锡人も重要な構成員であり、調べによると无锡の礼社では、村を離れた「569人のうち上海に行った者が一番多く、およそ400人ほど」で、出て行った者の70%を占めていた*17)。

12) 茅家李祖法『無錫近代經濟發展史論』，企業管理出版198年版，頁

13) 过炳泉，张泳泉「无锡纱号业的历史概况」，无锡市政协编『无锡文史资料』辑198年，4頁

14) 上海市医药公司等编著『上海近代西药行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198年版，98 9頁

15) Gang Deng, The Premodern Chinese Economy: Structural Equilibrium and Capitalist Sterility, p.1

16) 邹依仁著『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年版，11頁）を参照

17) 「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索引」，『新创造193年期』，17頁。別の『无锡年鉴』の統計によると、无锡を

无锡から上海に移った労働力の多くは、ある程度の技術を伴っていた。彼らのうち相当数は、上海で开业した无锡の制造业者が連れて行ったもので、特に技術労働者と基干労働者であった。上海申新紡績公司の系列である庆丰・丽新・广勤・合丰等の工場労働者は、その70%以上が无锡から来た者たちだった。1920年代、荣氏は上海に進出して事業を发展させ、申新・福新の各工場を次々に建設すると、多くの无锡の农民を委托・紹介によって上海に呼び寄せた。統計によると、1930年代、申新・福新の各工場で无锡に本籍を持つ者の割合はそれぞれ31～91.5%であった*18)。そのほか、上海の铁道业も无锡の资本家によってほぼ独占されていて、いわゆる「铁鬼子」の半分以上が无锡人であった。1865～1910年上海にある外国資本の造船所のうち、祥生・和丰・瑞榕などの工場の钢铁铸造责任者はみな无锡の南门から来た者たちだった。上海の中等企业主の中では无锡人が最も多く、上海の产业労働者のうちでも无锡人は27%を占めていた*19)。

近代上海における工业发展の速度は迅速だったが、やはり他省の技术人材を受け入れていた。例えば中国における近代化学の先驱者徐寿と、我が国初の蒸气船设计に参画した华衡芳は、长きにわたって江南制造局で科学技术活动に従事したが、彼らは二人とも无锡人であった。商业の世界では、多くの地域で农民が村を离れて都市に進出し、职业选择の可能性は大変广かった。上海の都市化の速度が増すにつれ、都市に关系する商业とサービス业はますます多くなった。上海におけるこのような職種は204種類もの多きに达し、大きくはレンタルサービス・繊維（メリヤス・シルク・ラシャ）・金属・建材・服装・百货・文教・娱乐・食料・饮食・醸造・燃料・日用杂货・タバコ・マッチ・地方特产品・运输仓库などの23种に分けられた。金属と地方特产品に関する職種は、无锡から上海に移った农民らがほぼ独占していた*20)。

しかし当然ながら、长江デルタ地域の労働力の流れが一方通行であったわけではない。长江デルタの上海周边都市が工业的に发展するのにしたがって、この地域の労働力も、上海という中心市场からその周围へUターンする逆流现象が现れた*21)。无锡で最初の制糸工場である裕昌工場が开业したとき、「无锡の前州と玉祁を本籍とする労働者を上海で募集し、无锡に呼んで作业をさせた。」*22)荣氏は申新第三工場で企业管理の改革を実行したが、よそから招聘して管理員となった汪孚礼・余钟祥・楼秋泉らは、みな上海にある国内外の紡績工場から招かれた者たちで、その管理改革も上海の紡績工場で行われた改革の経験を参考にしたものだった。このような头脑労働者の流动が、技术の伝播を伴ったことは明らかである。この種の流动を通じて、上海がすでに有する技术の优位性は次第に全国に

离れて上海に移った农民は、离村者76.68を占めた。『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中华书196年版，66页）を参照

18)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荣家企业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年版，1128页

19) 汤可可「市场：要素的流动和组合」，胡平主编『近代市场与沿江发展战略』，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年版，3232页

20) 许晓青2世20 3年代苏南农村结构性社会流动探析—以无锡县为例』，『近代中国』，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年版，1辑，15页

21) 马俊亚の研究によると、上海から江南のその他の地域に逆流した労働力としては、教育を受けた头脑労働者、或いは技术労働者の移动现象が非常にはっきりしている。马俊亚『混合与发展：江南地区传统社会经济的现代

演变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年版

22) 萧宗汉『周舜卿系统的缫丝厂』（手稿）

扩散し、周辺地域と上海との共同发展をうまく促進してきた。

労働力資源の交換は、同時に上海・无锡間の情報の共有化をともなっていた。当初、两地の民間郵便は民信局の定期船によって運ばれていたが、1883年に清政府が津沪鉄道の无锡区に電報局を設置し、上海・无锡間で電信という新たな通信方法が開始された。1926年、京沪長距離電話線のうち上海・无锡間が開通し、两地の情報通信はますます便利さを増した。1920年代无锡の商工業が飛躍的に発展すると、実業界では電報を使って情報をやりとりする以外に、主に電報局に付設された長距離電話局と、電話会社の交換台にある長距離電話を利用して商況を連絡しあった。1930年无锡の長距離電話の電話回数は約2万回あり、そのうち南京にかけられたのが約960回、武进・吴县がそれぞれおよそ4000回、常熟が約100回、上海が9000回であった。ここからも上海との商況連絡の緊密さが窺える*23)。

人材の流動は技術と管理情報の伝播をともなった。无锡の工業技術と情報管理方法は、多く上海に基づいていた。上海はその輸入の便の良さから、常にいち早く国外の最新生産設備を導入し、先進の工芸技術を採用できていた。そこで无锡はこれに対する注意を欠かさず、職員や労働者を上海に派遣して実習させ、先進の技術を吸収させた。上海の申二・申五・麗一・麗三などの工場はみな、たびたび无锡の工場のために技術労働者を育成・訓練した。また一部の絹布業者は顧客を惹きつけるために、競って斬新な柄・色の製品を探し集め、人を派遣して上海の大光明劇場の前に立たせ、街ゆく群众の最新ファッションを観察させることもあった*24)。无锡の経営者でも特に優れた荣氏・唐氏・薛氏の財閥集団は、みな上海に管理本部を構えて、国内外市場と生産技術の情報をいち早く手に入れ、遠くから无锡の生産・仕入れ・販売を指揮していた。特に荣兄弟に代表的な无锡の企業家たちは、まず上海で出世の糸口をつかみ、資本を集積し、経験を積んだ後、再び无锡に戻って工場を開業した。あるいは无锡で富を積んだのちに上海で事業を拡大させ、无锡での組織と企業管理の有益な経験を持って行った。そして上海で新たな活力を得ることで、さらなる発展に結びつけることが出来た*25)。注意すべきは、无锡の紡績企業は上海の機械設備を導入したが、その多くは上海の工場が機械設備を更新したときに出る中古の設備であったことだ。次に无锡の工場が電動織機などの新たな設備を採用したとき、もとの鉄制織機は周辺の市県に轉移した。このようにこれらの設備の譲渡過程において、全地域の経済技術レベルは、全体的に向上することができたのだ。

上海・無錫間の資金流通

无锡の钱庄（私营金融机关）・銀行と上海との間の为替送金（汇划）、資金調達、及び商工業間の資金調整は、上海と无锡の経済発展の安定化を促進する役割を果たした。

23) 张锡明「抗战前的无锡邮电」, 无锡市政协编『无锡文史资料』3辑, 8页

24) 无锡市工商联合会「解放前的无锡布绸呢绒业」, 『无锡文史资料』2辑198年, 83-84页

25) 汤可可「市场:要素的流动和组合」, 胡平主编『近代市场与沿江发展战略』,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年版, 32页

大量に物資が流動する过程中、货币资金の为替取引・融资业务は、物资の分配と流通量に影響した。无锡の商工业は「申汇」（上海の为替）を通じて、全国的な金融の中心上海と緊密な资金关系を保持していた。无锡に来た外地の米谷商は米を売り捌いたあと、上海に行って日用品を購入していたため、大量の「申票」（上海の为替手形）が必要となった。そして現地多くの工場がその製品を販売するのにも、资金を調達するのにも、上海が中心となっていたので、常に申票が売りに出された。よって无锡の钱庄が持つ申票の出入りも、上海との汇划の往来もかなり頻繁であった。このことが资金流通を活性化させ、商工业の発展を促進し、市場を繁榮させることすべてに積極的な作用をもたらしたのだった。

上海の貸付资金は、无锡の茧商业と制糸业を支えるものとして極めて重要であった。一般的には毎年5月18日～6月4日が长江デルタ地域における茧の出荷期間で、このとき必要となる现洋（現金）は相当な額になる。生茧を收获し、「计量・買い付けが始まってからそれが終わるまで、わずか十数日であった。」*26) 短期间に巨額の资金が江苏・浙江の茧取引に集中して使用されるため、毎年上海の金融業には重要事務の一つとなっていたが、その期間はちょうど茶の季节とも重なっており、现銀の需要量はさらに増加する。おそらく1920年代初期の无锡茧市場が必要とした银元のうち、70%が上海から運ばれ、残り30%は苏州・杭州などで融通されていたと思われる。1926年以降、国内の银行兌換券の信用が高まると、养蚕农家は次第に兌換券を受け入れるようになり、ここから上海の银行が次々と无锡に支店を開いた。苏州・镇江の金融業者が衰退するのに対し、无锡は银行の活跃によって苏南地域の货币资金の調達・決算の中心となった*27)。

19世紀末、上海の工业化が始まったころ、浙江の宁波及び江苏の无锡・苏州・南通などの商人が、续々と上海に来て投資を行い、上海の商工业の発展に大量の资金を提供した。无锡の荣兄弟は无锡にあった保兴制粉工場（のちに茂新工場に改組）と振新紡績工場の基础の上に、上海で申新第一工場（1915）・申新第二工場（1917）を创设した。その後も荣氏の福新系列の8つの制粉工場のうち、7つは上海にあった。第一次世界大戦後、无锡の绢布业は発展を遂げ、资金の蓄積も相当な量にのぼり、企业の中には无锡ばかりか上海に投資を行うものまで現れ、世泰盛の株主であった张孟肃・钱保稚などは上海に投資して华丰织布工場などを创设した。无锡の商工业资本が上海の工业资本に移る状況が現れていた。当然上海が発展すると、実业界は地価の高騰、労働力価格の上升という事態に直面し、そのため抜け目ない多くの上海の実业家が、长江デルタ地域にある上海近郊の原料产地无锡・镇江などの都市に业务を扩张・投資し、工場を建てるようになった。そのため资本が以前とは逆に流れる状況をもたらした。例えば1904年上海・无锡籍の制糸企业家・周舜卿は、无锡の东绛に裕昌制糸工場を创立し、无锡における近代的な制糸业の先驱をなした人物である。彼は1936年までに无锡に45の制糸工場を所有し、总资本額は192万元にのぼった*28)。无锡はこれにより全国規模の「丝都（シルクの都）」

26) 沧「丝业与金融之关系」、『银行周报』卷4号1911日)

27) 汤可可「市场：要素的流动和组合」，胡平主编『近代市场与沿江发展战略』，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年版，32页

28) 汤可可「市场：要素的流动和组合」，胡平主编『近代市场与沿江发展战略』，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年版，32页

となった。その他无锡の綿纺績业・化学工业なども同じような状況にあった。实力ある多くの商工業者たちは、たとえ一人だけであっても、长江デルタ地域の各都市で、同时期に様々な企业进行し、資金を互いに融通しながら、地域をまたぐ大企业集团を成立させた。当時の祝大椿・荣宗敬・荣德生などがそうであった。

上海・無錫における相互作用関係の分析

先に述べたように、长江デルタの上海・无锡間における経済要素の流通は、主に交通（蒸気船・鉄道）・電信・金融为替といった近代的な経済連絡手段を使ってなされ、长江デルタにおいて中心都市と地域都市との相互依存・共存共栄・不可分の関係を構築し、しかも两地の経済関係が日増しに強くなるのと同時に、明らかな相互作用が生じてきた。この経済的な相互作用関係を具体的に分析するとき、「成長の核」理論と「成長中心」理論を利用すれば、より適切な説明を行うことが出来ると考えられる。

いわゆる「成長の核」とはフランスの経済学者フランソワ・ペルー (Francois Perroux) が唱えた概念で、その後多くの学者がその論を補強したが、創造力・推進力を具えた一つの、あるいは複数の工業部門と、それに関連する一群・一組の工業部門が集まった地域は、常に大都市の中心となる、というものだ。一方「成長中心」とは、ブードヴィル (J.Boudeville) が1957年、多くの英米学者とともに提出した空間概念で、制造业者と业界の間の「亲和力」（化学反応で元素の化合を引き起こす力）が外部に経済効果を生み出し、制造业者と企業が存在する地理的な位置に急激な発展がもたらされ、そこから成長の中心が出現するとする*29)。

「成長の核」と「成長中心」は、いずれも生産資源・生産品の流動の中心あるいは集散の中心という点で似通っており、どちらも一定の経済規模を持ち、かつ成長が速い地域都市を指している。しかし「成長中心」は「成長の核」と同じではない。「成長の核」概念は、新規創造能力を持つ企業の役割に重点を置くもの、つまり市場力学の作用と経済政策の指导下で、企画力ある企業と部門を一カ所に集め、中心地を形成した、少数の先進地域に分類される。それに対し「成長中心」概念は、外部における経済効果の役割を重視する。つまり不特定の経済部門の企業、あるいは不特定の産業複合体のことを指していて、これらは最先端技術を受け入れる能力を保持しておらず、学習型の後発地域に分類される。やや具体的に言えば、「成長の核」は新たな方法を模索する「第一行動地域」で、「成長中心」は学習・模倣する「第二行動地域」、その他の地域は拡散・促進・同調に分類される「第三行動地域」である。そのうち「第二行動地域」の「成長中心」は、経済要素を「第三行動地域」に拡散する中継伝達の役割を担っていた。

この理論を上海と无锡の経済発展に当てはめてみると、明らかに民国以降の上海は长江デルタの「成長の核」に、无锡は「成長中心」にあたると思われる。上海は中国国内で最も早い近代工業の発祥地・工業の中心で、その工業・商業部門の創立と拡大は、常に上

29) 汉森「区域格局中的发展理论」,『开发研究198年,期,19 2页

海自身の創造力によってもたらされたものだった。これら新企業・新業界は、新製品や新技术・新産業・新市場・新組織・新管理体制・新生産方式・新経営方式・新消費方式・新生活様式等々を絶えず開発・創造していくとともに、その他の地域に対するモデルともなり、これらを拡散させていく。ここにおいて新事業は巨大な先発者利益をもたらし、その先発者利益こそが、民国以降、先行発展した大都市の地位に上海を押し上げたものだった。

対して无锡の近代工業は、上海の拡散効果の中から成長してきたものだった。その近代工業企業の成立は常に上海に遅れており、創造者である上海を学習・模倣して出現した「集群追随者」であった。民国時代の学者龔駿は、近代の新工業発生を分析したとき、「上海はただ兵器・制糸・綿紡績業を自ら生産しただけでなく、上海が発祥となった産業は極めて多数存在する。」*30)また穆藕初は、上海の徳大・厚生紡績工場で最も早く西洋式の科学的管理方法を導入したが、これは当时无錫も含めた中国各地の紡績工場のモデルとなった。国外の最新技術・設備を導入した面においても、上海の多くの企業は中国全土の先蹤となり、各地の企業はそれに引き付けられ、争って模倣した。各企業は次々と新たな設備を導入することで、国内外で積極的に生産競争を行った。彼らは「最新の工芸技術獲得を渴望した。多数の工場が外国の機械設備を採用したことは、その何よりの証拠である。」*31)无锡の多くの資本集団は、みな上海に管理本部を設け、国内外市場と生産設備の技術情報を得て、大量の仕入れと販売を行い、新たな生産能力を猛烈に追い求めた。これら実力ある資本集団は成長型の模倣者であり、新たな創造者ではなかった。その理由は学習・模倣に必要な資本が、創造を探索する資本よりも少なくてすむからで、もし自身の企业发展の規模を拡大し、市場占有率を上げようとするのなら、できるだけ多くかつ迅速に、その成長がもたらす後発者利益を獲得する必要があるだろう。この意味から言えば、无锡という「成長中心」は、上海という「成長の核」の創造効果によって成長してきたものであり、同時にまた、上海という「成長の核」が長江デルタ地域の経済発展に影響を与えた重要な効果の一つ——支配効果をも受けていた。つまり上海という「成長の核」は、自己の技術・経済・管理方面の先進性を用い、无锡・苏州・南通など周辺地域との投資关系・商品交換关系を通じて支配効果を生み出し、そこから長江デルタないしは全中国社会に効果を放射する経済発展の「中心」であった。无锡・苏州・南通・杭州・宁波など中等経済都市は、上海には及ばない、長江デルタ都市の中では第二級の「成長中心」に成長していた。

当然无锡の「成長中心」の地位は、一定不変のものではなかった。上海という「成長の核」の乗数効果により、民国時代の无锡も「成長中心」から新たな「成長の核」へと役割が変化するようになった。これは経済要素の循環的・累計的メカニズムの影響を受けたことによるもので、周辺地域の経済発展に対する成長核の支配作用はたえず強化拡大され、影響する範囲と程度もそれに呼応して増大した。1920年代以降、无锡の工業体系が形成され、技術水準がレベルアップするにしたがい、无锡の企業・経済全体の創造力は増強され、特に新規創造過程で、企業家たちが次第に形成され、重大な作用を發揮するようにな

30) 龔駿『中国都市工业化程度之统计分析』，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193年版，2頁

31) 徐雪筠『上海近代社会経済概況1882—193』，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198年版，28頁

る。1920年代後期、明らかに无锡の「成長の核」的機能は形成されつつあり*32)、苏州に取って代わって苏南地域の产业・商品集散・金融・情報の中心となっていた。同時に无锡周辺の「第三行动地域」も一定の时期内に知らず知らず一定の成長速度を得ていた。江阴・宜兴・常熟・溧阳・金坛・靖江・吴县・武进等の経済活动は、いずれも无锡を中心に回っていた。このように民国以来、长江デルタでは上海をリーダーとして、无锡・南通・常州・苏州・宁波・杭州などの中等経済都市が第二級市場、内陆の小都市・乡镇が第三級、もしくはさらに低級の市場であるような、このような「都市群」がそもそもの雛型であった。これらの都市・农村間において、人口流动や商业取引・金融融通・情报交換が行われることにより、长江デルタ地域は基本的に都市間の相互作用・相互辐射を実現し、各都市と地域経済の大発展を共同で促進してきたのだった。

上海という「成長の核」が持つ「浸透効果」も轻视できない。この効果は极化と扩散の二種の作用を含んでいる。极化作用とは、核が周辺地域の生产要素を引きつけ、経済活动はたえず核に向かい、核自身の发展が加速される作用である。扩散作用とは、核が周辺地域に生产要素と経済活动を出すことで、周辺地域の经济发展をもたらす作用である。极化と扩散がもたらすトータルの影响を「浸透効果」と称する。もし极化が扩散よりも強くなれば、浸透効果はマイナスとなり、周辺地域の经济发展にとっては不利になる。典型的には、近代以降の上海・无锡などの工业中心地が苏州の商业资本を强力に引きつけ、苏州が苏南地域の極めて重要な「预金商业都市」となったことがそうだった。いったん上海の金融市场に事があれば、无锡・常州の商工业は大打撃を受け、苏州の金融业はみんな「生命が保ちがたい」と揶揄されていた*33)。商业资本が吸い取られたことは、苏州の地の工业化过程に影響を与え、资本欠乏によって工业发展は缓慢であった。もし扩散が极化よりも大きければ、浸透効果はプラスとなる*34)。一般的に言えばプラスの浸透効果の出现は、往々にしてその他の地域で別の集积効果が生まれることでもあった。言い換えれば、まさに上海という「成長の核」は、生产方式・技术设备・原材料・资本・経営経験の点で、无锡への扩散作用が极化作用よりも大きく、最終的に无锡という新たな「成長の核」の出现をもたらしたのだ。

地域の中に新たな成长核が出现することは、その地域の原料・エネルギー・资金・市场などの経済要素に対する需要が、先の成长核との間で互いに矛盾し、制约しあう事态を引き起こす。これにより新成长核（无锡など）と旧成长核（上海）の都市間で分业と合作が行われることは不可避であった。これは主に市场调整机能によって、最終的には自然に均衡のとれた地域市场构造を成立させる。例えば长江デルタ地域の纺绩业における产业构造は、上海が比較的发达した轻纺绩・机械・金属などの工业を有し、その他の地域に技术设备を提供する。无锡は绵糸・绵布の生产をメインに、押し染め・彩色织りが得意な二级都市であり、常州はコールテン・ポップリンを、南通は刺绣布を、常熟はギンガムを生産するなど、各々特色をもって、各都市がそれぞれ得意とする分野で发展しており、それらが集

32) 汤可可「市场：要素的流动和组合」，胡平主编『近代市场与沿江发展战略』，中国财政经济出版199年版，32页

33) 胡觉民「苏州钱庄史杂缀」，『苏州文史资料』，1 合辑199年，55 5页

34) 李京文『走2世纪的中国区域经济』，广西人民出版199年，66 6页

まることで中国近代綿紡績業の一大産地を共同で構成していた*35)。この種の産業は、各都市が短所を避けて長所を伸ばし、組織規模で経営を行い、技術水準と労働生産率を上げたものである。ここで分業というのは、それぞれの関係を断ち切るという意味では決して無く、上海と无锡等周辺地域には相互依存の合作关系が存在していた。例えば上海の紡績工場の原綿・包装材料は、南通・无锡に相当程度依存しており、各地で必要とする設備・機械材料・高級細綿糸は、多くが上海から供給されていた。その他の方面でも长江デルタ地域の都市間での横のつながり・相互依存はしばしば見られるものだった。

以上をまとめると、长江デルタ地域の中心都市である上海と周辺都市である无锡との経済関係は、単に密度の濃い相互作用性を有したというだけでなく、影響する要素が多数あり、その数量も巨大であったことから、流通の便が良く、情報伝達も速やかな多层構造関係を形成していた。これは近代上海の迅速な経済発展に有利だったばかりでなく、无锡という都市が近代化に迈进することの助けにもなっていた。最も注目すべき事は、1920年代以降、无锡の工業発展は都市の経済的吸引力・輻射力をさらに増強させ、加えて陆上交通の開設や、その後の关税自主権の确立・厘金税（清末民国初の国内关税）撤廃・国内における都市間交易の隆盛もあって、无锡は商業的に内陆に向かって大発展を遂げた。无锡・上海の物資（多くは工業原料・工業産品）の流通範囲は更に拡大し、数量（機械工業を中心とする主要商品の流通）も更に多くなった。その上近代的な運輸手段・通信方法・先進的な経営管理モデル・巨額の融資・資金移転によって、抗日战争开始前に、无锡が近代苏南地域の第二級地域都市の中心となっていたことは間違いなかった。

無錫・上海の経済関係に基づく深層考察

伝統的には中国の都市は、主に軍事的防御面と政治面にその機能構造が現れていた。この種の都市同士の関係には、横の関係がなく、縦の構造を示していた。ここには行政的な統属関係があるだけで、その関係を結びつけたのは行政的指令であって、商品要素の相互流通ではなかった。当然ながら異なる行政区画の都市間には、政治的・経済的・文化的な交流がほとんどなく、都市の発展も閉鎖的で、地域都市間の連絡はかなり稀薄であった。しかし近代以降は、沿岸都市の開放と貿易の発展、市場流通構造の変化、特に都市における新たな工業の勃興、交通条件の変革にとともに、都市は自己内で循環発展する閉鎖モデルを打破し、都市経済機能は著しく強化された。と同時に「都市は互いの関係を発生させ」「そもそもの地域的限定性は次第に失われ始めた。」*36)例えば无锡・南通などの伝統的には閉鎖されていた地域行政都市は、開放的で横のつながりを持つ経済中心都市へと変貌を遂げていった。これを生き抜いた都市の構造も激烈に改変された。今まで述べてきたような、无锡という都市の経済的中心の地位変化、及び地域の中心都市である上海との間の経済的相互作用関係の形成は、このような新たな変革のことを説明したものだ。

35) 湯可可「市場：要素的流動和組合」, 胡平主編『近代市場与沿江发展战略』, 中国財政経済出版199年版, 32頁

36) マルクス・エンゲル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年版, 6頁

アヘン戦争以前の長江デルタ地域の都市体系は、中国のその他の伝統的地域都市体系と同じように、省・道・府・県という序列ある、大きさの異なる都市で、統治階級にとって政治の中心・税収の中心ということをも基本にした階層的な都市体系であった。そして多くの都市は地方行政管理の目的から政府によって設立されたものであると同時に、絶えず行われる経済・交易活動によって形成されたものでもあった。明清時代の蘇州・鎮江・常州・杭州・南京は地域交易の中心であり、かつ当時の府クラスの行政首府でもあった。南京は明代に一度全国的な政治の中心（首都）になったが、清代になっては江苏（南直隶）の政治中心だった。しかし无锡は、ただ蘇州・常州という二つの行政首府には含まれた（常州路に属する）一小镇であったし、南通も江苏の通州に属する一县城にすぎなかった。この時期、長江デルタ地域の商品市場経済はようやく発展成熟し始めたところで、地域内の農村集鎮が急速に発展していったが、南京などの中心都市もそれに応じて相当な集積機能を有する、経済発展の重要据点となった。したがって明清時代の長江デルタ地域においては、都市構成中の序列・階層の変化と、行政中心としての地位は基本的に一致したままであった。まさにこのことから、近代には急速に発展を遂げる上海は、最も低い序列の県クラスとされていた。地域内における人口・資金・情報といった都市要素の流動規模は小さく、この時代の長江デルタ地域の地縁経済整合作用はかなり微弱なものだった。長江デルタの都市システムはなお初期段階にあった。

近代に入ると、資本主義の経済的影響を受けるようになり、伝統的な長江デルタの都市もみな変化を来した。

最初は上海・无锡・南通など発展可能性を秘めた都市におこった。商品経済の発展・交通手段の変革から、社会化した諸産業が次々と建設された。各地域都市の地位はこれにより大きく変化した。とりわけ上海は、急成長を遂げて中心都市としての地位を確立したが、これは単に長江デルタ地域における経済発展史に新たな1ページを開いただけでなく、他の地域との経済関係や地縁経済の構造に対して、行政区と経済区の関係も含めて、極めて深刻な影響をもたらした*37)。交通运输条件の変動や国际贸易・都市間交易の拡大、工業化のはじまりは、1930年代の上海が長江デルタ、ひいては中国全体の貿易・金融・工業の中心に成長した重要な原因だった。三つの中心としての地位が確立したことは、「全国でも先進的地位にあって、組織体系が整然と備わっており、内地特に長江デルタ・長江流域との関係が密接で、かつ国际市场と直接リンク」*38)した近代都市市場体系が、上海という大都市を形成した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かつ「生産販売と融資、受容と波及、模範と輻射、という側面から、異なる次元で長江流域の経済に積極的な影響をもたらし、それまで部分ごとに分割されてきた局面は打破され、長江流域の経済は日増しに分割できない一つの統一体となっていった。」*39)その中で上海に隣接する長江デルタ地域は、第一の経済的後背地となり、その相互作用関係はさらに強力であった。このように上海は発達した市場を通じて、周辺地域・都市と経済的に統合し、その地縁経済と極めて強く結びつけられていた。結果、長江デルタ地域の都市との一体性は、それ以前のいかなる

37) 張仲礼「上海城市經濟的近代化对長江流域經濟的影响」、『上海社会科学院季刊』1999年期

38) 張仲礼・沈祖焯「近代上海市場发育的若干特点」、『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9年期

39) 周克瑜『走向市場經濟—中国行政区与經濟区关系及其整合』，復旦大學出版1999年版，23頁

时期よりも突出していた。よってこの时期、长江デルタの経済区と行政区の有機的な統一が始まったと考える学者もいた。ただし上海市場の形成は、ある種そう迫られた部分があったのであるが*40)。无锡・南通は上海の強烈な輻射の影響を受けて成長した第二級の中心都市だが、これらは上海港で販売されてきた綿布・綿糸など廉価な工業品を引き受けるとともに、大量の茶・生糸・綿花等の工業原料を絶えず上海市場に輸送して、全国ひいては全世界の商品流通大市場とつながっていた。これにより中心都市と内陸都市の間に、強力な連動関係が形成されていた。その上、两地の商工業が大発展すると、无锡は常州路治下の小县から常州に取って代わり、苏南地域の产业・商品集散・金融・情報の中心となった。周辺地域の江阴・宜兴・常熟・溧阳・金坛・靖江・吴县・武进等の経済活動は、すべて无锡を中心に回轉していた。そして南通は工业・交通・商业が发展し、もともと苏北地域の商业の中心であった扬州の地位にすぐ取って代わり、苏北における商品集積地となった。このように两地の経済が上海経済と一体化して连系が強まるにつれ、长江デルタ地域は一つの巨大で秩序だった、上海を中心とした市場ネットワークを形成しつつあった。そこでは、上海はネットワーク第一級の中心市場で、无锡・南通が上海の経済的輻射を受けた第二級市場であった。

当然ながら镇江や扬州・常州といった都市は、もともと地域の中心であり、地理的な位置もかつては便利なところにあったが、鉄道という新たな交通手段が出現して、运河の輸送効率が低下すると、状況は一変した。例えば常州の近代都市としての経済地位が低下すると、まず領域内の运河に土砂が堆積して狭くなり、行商人らはこれを避けるようになり、次いで沪宁鉄道が开通すると、もとは常州の経済勢力範囲であった宜兴・溧阳・江阴・金坛や江北地域の货物は、无锡を経て上海に運ば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さらに北方の货物も大量に鉄道を使って无锡・上海に運ば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また、もと长江デルタ地域の中心都市であり、内河の商港であった苏州は、近代以降、运河機能が失われると、河川・海上运行能力を備え、広范な内陸部を有する上海と、やはり良好な水运・鉄道运输能力を持つ无锡に凌駕され、取って代わられた。さらにもと华东の大商业都市であった镇江も、京汉・胶济の二つの鉄道が相次いで开通すると、镇江に集まった豫东・豫南の货物は、半分が汉口に、半分が青島に運ばれた。次いで津浦鉄道が开通すると、南京が镇江の商业事务の一部を分担したが、最終的には衰退していく。长江デルタ地域内での都市の兴衰は、明清時代の都市ネットワークを整合し直した。経済活動が最も盛んな地理的位置にある近代都市の成長は迅速で、地域都市間の实力競争で勝ち組となった。各レベルで权力机构を象徴していた都市は、各种新产业で形作られた都市に次第に地位を奪われ、行政都市は経済都市に取って代わられた。かつ否定できないのは、この種の変化は行政权力の及ばないところでおこっており、下から上に「自发的に」进行したものだ。この地域都市体系が表しているのは、次第に明らかになってきた内在的な経済关系性と阶层定位性であり、経済以外の要素からの影响・干涉は次第に減少してきた。これは伝統的な都市体系が明確に政治的阶层性によって形成されていたことと比べて、かなり大きく違っていた。

さらに注意すべきは、すべての地域都市体系が経済的な相互依存によって生き延び、相

40) 周克瑜『走向市场经济—中国行政区与经济区关系及其整合』，复旦大学出版199年版，232 23 页

補的に発展してきたことで、伝統的な地域都市体系が階層的垂直方向に行政管理を行い、同クラスの都市間での経済需要が欠けていた状況は変化してきた。无锡・南通・苏州といった都市企業の間や、企業・钱庄間には密接な関係が存在していたし、南通の綿糸は无锡の紡績工場に大量供給され、无锡の工場で作られた布は南通で販売されていた。苏州の钱庄と无锡・常州の钱庄との连系は緊密で、南通・无锡・常州の三都市は、苏州の钱庄が貸し付けを行う主要地域・対象であった*41)。无锡・常州の钱庄業と工業の興廢が苏州に与える影响は極めて大きく、苏州の钱庄の間には「无（锡）・常（州）が倒れれば、命もたない」という説がずっと言われてきた*42)。

长江デルタ地域の都市・农村間の経済流動性・相補性が強まるにつれて、行省を単位とする伝統的な行政区画は打破され、かつ地域間における経済区の分割方法は流動的であった。地域都市はまさに地域市場の範囲を超え、全国的な市場へと歩みを始めた。その体系はますます総合的の姿勢を示し始め、伝統的地域都市の単一的な機能、都市の輻射力が低い状態を変化させた。都市の地位は往々にしてその工業・商業・对外贸易・水陆交通・文化教育の发达レベルの優位性によって決定される。都市の階層はその機能の大きさ、全体性によって決まる。典型的には、上海が近代中国最重要の多機能な経済の中心となり得た理由は、そこが封建的な鎖国政策の束縛を打破して、対外的な開放性を持ち、大規模な对外贸易と国内交易を強力に展開したこと、また国内外の資源を十分に利用し、資金と技術を吸収し、都市の発展に有利となる交通運輸・電気通信・電力エネルギー・都市行政の基礎などの外部環境を積極的に建設したこと、さらに企業への科学技术・人材の投入を重視し、競争の中で近代的な企业管理の意識・制度を改革して、都市工業が更なる集積効果を生み出すよう促進したことによる。とりわけ経済活動の主体—「上海人」の睿智・企業家的民族精神・競争意識・创业精神などの才能が能動的に発揮されて、都市の経済効果が最大限まで高められ、群を抜く都市の近代化が実現されたのだった。これらすべての力学的要素の蓄積・統合が、都市経済の高利益のために提供された条件であり、保障であった。現在我々が上海を中心とする长江デルタの都市経済を建設する時でも、これらの経験はなお手本とする価値のあるものである。

ほかにも、近代の长江デルタ地域の都市体系は、対外関係か内部関係かを問わず、明らかな開放性（この開放性は外的压力から迫られて形成されたものではあるが）を示しており、伝統的な地域都市体系が対外的にも対内的にも完全に閉鎖的であったことは、極めて大きな違いであった。この種の開放性も、近代长江デルタ地域の都市体系が生存し発展するための基礎となっていた。

以上述べてきたことをまとめると、この変革は単に一つの都市が変化したものではなく、地域の都市体系が変革したものであり、同時に近代以来の中国地域都市発展の一つの縮図である。この「各地域の中心都市と、地域内のその他大小様々な都市との関係は、その関係を構成すること自体には全国性を具えてはいないけれども、全国的な都市関係形成の基礎であり、都市が各地域における発展の中心となる最も基本的な体现であった。」

41) 江苏金融志编辑室『江苏典当钱庄』，南京大学出版199年版，9页

42) 马俊亚『规模经济与区域发展—近代江南地区企业经营现代化研究』，南京大学出版199年版，24页

*43) によってこの基础の上に、近代以来、上海を中心とした长江デルタ地域の都市間の経済关系、及び都市の构造体系の変动について研究を展開すれば、今日中国の地域都市において采算性を持った发展の道を探るのに、积极的・现实的意义があると想われる。

43) 陈炜「略论中国近代区域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200年期 【作者介绍】 郑忠196年生、历史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兼职副教授
【联络先 zhengzhong_127@126.co

前近代中日西学进程的差异

■ 赵德宇 (南开大) ■

前近代中日西学进程的差异

赵德宇(南开大)

在西力东渐的潮流中，1517年葡萄牙殖民者闯入中国广东，1543年到达日本的种子岛。此后，1549年沙勿略赴日，1581年利玛窦来华。从此，中日两国便开始面临汤因比所说的“西方问题”了。如何迎接这次挑战，将成为中日两国重要的历史课题。在16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这一历史阶段的不同时期，中日两国对西方文化的反应各有不同，尤其是在这一历史阶段的后期，中日两国对西方文化挑战所采取的不同态度，成为两国近代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主要原因之一。

(一)

在这次挑战的第一个时期，也即16世纪后期至18世纪前期，中国对以耶稣会为主的西方传教士以及与之俱来的西方科学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保持了冷静的态度。

徐光启在《泰西水法·序》中，针对当时将科学技术视为末业的传统认识，指出传教士们的学问中“更有一种格物穷理之学，凡世间世外，万事万物之理……丝分理解……格物穷理之中，又复旁出一种象术之学，象术之学，大者为历法，为律吕；至其他有形有质之物，有度有数之事，无不赖以用，用之无不尽巧极妙者”。¹⁾ 简而言之，徐光启认为西方科学的特征是“重实证、求实用”。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于明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译成《几何原本》前六卷，其旷世名著《农政全书》既是以科学精神为基础的经世致用的典范。

徐光启不但对西方科学知识身体力行，而且察觉到西方科学以形式逻辑为指导的定理化的方法，并认为这正是中国科学中所缺少的思维方式。他指出：中西数学的差异不在“法”而在“义”，西方之“义”是以《几何原本》为代表的演绎逻辑体系，即它“能传其义也”²⁾。他希望通过“由数达理”的途径，使中国科学走向更高的层次。这也正是徐光启要把《几何原本》介绍给中国人的原因。正是沿着这一思路，李之藻帮助傅凡际（Franciscus Furtado, 1587-1653）翻译了介绍西方逻辑学著作的《名理探》。当时部分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重视形式逻辑的，从而接近西方科学的思想核心。

李之藻一生参与翻译的西方科学技术书籍，总计达三、四十种，内容涉及数学、天文、历法、水利等领域，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寰有诠》、《名理探》等。李之藻还热心编辑刊印他人的著作，其中以1682年刻印的西学丛书《天学初函》影响最大。该丛书共辑录了西学书籍20种，分为理编和器编两大部类，而器编皆为科学书籍。

士大夫如此，明末清初，万历、崇祯、顺治、康熙各朝，也对传教士的正常传教活动采取了开明政策，同时通过传教士积极地摄取西方科学文化，表现出一种名副其实的“天国气度”。利玛窦去世后，万历皇帝特赐与墓地。当时有人向礼部尚书叶向高提出异议说：“自古

1) 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上册，中华书196年，6页

2) 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华书198年，26页

外人来我中国，未有钦赐葬地者，何独厚利玛窦？”叶答曰：“他且勿论，只观其所著《几何原本》一书，发古人之未发，功在万世，仅此一事，即当钦赐葬地。”³⁾由此可见当时知识界对该书的重视，同时也说明当时皇帝及士大夫阶层尊重先进外来文化，虚心向上的求实精神。清朝入关后，因推崇汤若望于天文历法领域的成就，任命其为钦天监监正。顺治帝更呼汤氏为“玛法”（满语：师父之意），认为中国历代历家“实不及尔（汤若望）”⁴⁾，并时常召其至禁殿询问关于天象或朝政等问题，并亲临其邸，仅1656—1657两年间就有24次之多。⁵⁾

康熙更是尊重西方科学的一代帝王，在位期间，对西方传教士基本上采取的是宽容、利用的政策。钦天监案的结局具体表现出康熙注重实学的理智态度。1664年杨光先基于“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洋人”的观念，以“历法荒谬”、“谋反”等罪名参劾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一时兴起钦天监大狱，拘捕传教士，处汤若望以绞刑。然而杨光先制历不利，康熙亲政后于七年（公元1668年）命杨光先与南怀仁同测正午日影，结果杨氏所测不验，而南怀仁的推算则不差分毫。杨光先仍扬言：“中国乃尧舜之历，安可去尧舜之圣君而采用天主教历？若用西洋历，必至短促国祚，不利子孙。”⁶⁾在科学面前，康熙做出明断，革去杨光先钦天监监正职务，以南怀仁为钦天监监正，并开释所有在拘传教士。

康熙自己也对诸如天文历算、物理、医学、地理、测量等西方科学，颇感兴趣，对传教士中“凡有一技之能者，往往被召至蒙养斋”⁷⁾。康熙曾长期随传教士学习上述各门学科，而且“对欧洲科学和向他施教的传教士赞不绝口”。⁸⁾

由于皇室对西学的推崇，这一时期引入了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地图测绘、物理、机械、医学等各门科学，还有建筑、绘画、音乐等西洋艺术。据王韬《泰西著述考》统计，仅1552—1674年间，传教士用汉文介绍西洋知识的著作，就有211种。据梁启超《西学书目表》收录，这一时期翻译西书达86种（不含宗教类）。另据笔者统计，《四库全书》收录了《天学初函》20种书籍中的19种（见表1）。此外，自1644年汤若望任钦天监监正直到1805年，有11名传教士担任钦天监监正一职，在这160年的时间里，传教士几乎壅断了这一职务⁹⁾。当然这时传入的西方科学技术尚属近代科学以前的体系，而且也还只限于士大夫阶层，但它终究为中国带来了可供吸取的新的科学知识来源。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使中国对外部世界保持了一定限度的了解，防止了盲目自大的愚妄意识的滋生。

在这一历史时段里，日本却没有中国那么幸运。由于当时日本历史环境的原因，自1543年耶稣会士来日本传教至1639年德川幕府彻底驱逐传教士的近一个世纪，是日本历史上的“天主教时代”，而西方的科学技术仅仅是作为副产品而存在的。

1467年开始的应仁之乱将日本推入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战国混乱之中，使日本陷入文化虚脱状态。值此日本文化的灰色时期，1549年天主教耶稣会来日本传教，将异质的天主教文化传入日本列岛，并强烈地吸引着处于文化饥饿状态下的日本人。日本人对天主教趋之若鹜，信徒人数直线上升，一般估算，最多时达七十五万人，而且波及到从大名以至乞丐的各个社会

3) 刘准：《天主教传行中国考》，中国河北献193年，14页

4) 《清史稿·汤若望传》

5) 魏特著、杨丙辰译：《汤若望传》第一册，台湾商务印书196年，22页

6)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年，38页

7) 《清史稿·艺术列传序》

8) 《清史史料》辑，中华书198年，16页

9) 荣振华著、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下，中华书199年，7676页

阶层。在这一时期的日本，也曾经接受了一些随传教活动而夹带进日本的西方科学知识，诸如医学、天文学等领域，但是就其规模和对当时知识界的影响，是无法与同期中国相比的。当然，另一方面它对后来日本的兰学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¹⁰⁾

<表 1> 《四库全书》收录《天学初函》各书之概要

理 编				器 编			
书 名	作、译者	初版	采择	书 名	作、译者	初版	采择
天主实义	利玛窦	1603	子部存目	泰西水法	熊三拔 徐光启	1612	子部全录
西学凡	艾儒略	1623	子部存目	简平仪说	熊三拔 徐光启	1611	子部全录
辨学遗牍	利玛窦等	1609	子部存目	浑盖通宪图说	利玛窦 李之藻	1607	子部全录
唐景教碑书后	李之藻	1625		同文算指	利玛窦 李之藻	1613	子部全录
畸人十篇	利玛窦	1608	子部存目	几何原本	利玛窦 徐光启	1607	子部全录
交友论	利玛窦	1595	子部存目	圜容较义	利玛窦 李之藻	1614	子部全录
二十五言	利玛窦	1604	子部存目	表度说	熊三拔 周子愚	1614	子部全录
七克	庞迪我	1604	子部存目	测量法义	利玛窦 徐光启	1608	子部全录
灵言蠡勺	毕方济 徐光启	1624	子部存目	天问略	阳玛诺	1615	子部全录
职方外纪	艾儒略 李之藻	1623	史部全录	勾股义	利玛窦 徐光启	1608	子部全录

这一时期传教士们带来的西方文化中，表现为正价值的是科学技术，而他们的宗教观念总的看来则属于保守落后的中世纪思想。至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康熙皇帝因“礼仪之争”而禁止天主教，其间虽发生过南京教案和钦天监教案，但后来都予以平反，总的说来传教士基本上受到了公正的待遇。然而即使是在康熙年间宽容的气氛下，在数倍于日本人口的中国，信徒人数也仅有16万余人（公元1664年）¹¹⁾，相当于日本天主教时代繁荣期75万信徒的22%。但是当时中国对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学技术的兴趣却远远超过了日本。综观这一时期中日两国对西方文化的取向是不同的，即日本是宗教的，中国是世俗的；日本注重贸易利益，中国憧憬科学价值；传入日本的西方科学科技只是副产品，而在中国，西方科学是摄取的主要对象。正如德富稣峰所言：“在当时日本的耶稣教信徒中，能够达到像李之藻翻译《西学凡》那样学力的人，一位也没有。”¹²⁾ 在日本随着严酷的禁教政策，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

10) 有关日本天主教时代天主教和西方科学的传播情况，请参阅拙稿〈试论南蛮文化〉，世界历199年第一期

11) 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书199年，2324页

12) 转引自郑学稼：《日本史》第三卷，台北黎明公197年，36页。此处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李之藻还是徐光启，无疑具有相当高的理解西方科学的学力，不过他们还不通西语，他们的“翻译”还不是独立进行的，而是通过传教士的口述，而“笔受”记录而成

南蛮文化也随之夭亡。在中国虽也有过排耶之举，但从未走到日本那样的极端，而且也不曾涉及科学技术领域。

由此，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这第一期与西方文化的接触中，中国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和反应，从而成功地完成了历史的答卷。相比之下日本则收获寥寥。换言之，当时中华民族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反应能力大大超过了日本。更令人深思的是，这一时期吸收先进外来文化的主体正是作为儒家文化载体的中华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和士大夫阶层。明末清初西学输入的历史澄清了一个历史事实，即当时士大夫阶层中的有识之士并不象我们在一个时期不加区别地形容的那样“冥顽不化”，而是恰恰相反，他们对先进的西方文化表现出谦虚好学的宽容大度，连康熙皇帝都将学有所长的教士请进宫来做“家庭教师”。

(二)

从前述史实不难看出，历代皇帝和士大夫阶层的上下呼应，中国大有进入近代科学阶段的可能性。然而遗憾的是，与中国的宽宏相反，罗马教廷却表现出偏狭的排他性，终于酿成北京朝廷与罗马教廷之间的“礼仪之争”。

1704年教皇克莱孟十一世命圣职部向在华传教士发布了禁约七条，其中包括：不许用天或上帝称天主¹³⁾；禁止教徒进入孔庙、祠堂祭孔祭祖；禁止在家安放亡人牌位等¹⁴⁾，并要求中国皇帝认可。对此，康熙严正旨谕，传教士必须服从中国礼仪，并需持有朝廷准予传教的印票，否则不得在中国传教。同时康熙派在华耶稣会士赴教廷，劝戒教皇收回禁约，但遭到拒绝，康熙不得已于1720年敕令禁教，朱批曰：“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¹⁵⁾ 就事论事，导致清廷禁教的责任与其说在中国方面，不如说在教皇方面更公允。然而，历史并不单单裁判这个事件本身的谁是谁非，重要的是，这次事件造成的历史性转折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1720年正是日本德川幕府八代将军德川吉宗下令放宽洋书进口限制的年头，大凡西洋书籍，除宣传基督教者外，不再禁止。由于德川吉宗的“洋书缓禁”政策，至江户时代（1603—1868）中期，在日本知识阶层中出现了以荷兰语为媒介，研究、摄取西方近代学术的学问体系——兰学。它以研究西方近代科学为开端，逐渐扩展到西方社会思想等领域，成为江户时代日本人了解外部世界的媒介，并在幕末维新时期产生了积极的历史影响。而中国自此以后，却经历了雍正、乾隆时代的严厉禁教，致使中西文化交流几乎中断。其后虽有少数传教士滞留宫中及钦天监，但是其活动受到严格限制，形同软禁，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奄奄一息。1720年遂成为中日两国对西方文化态度位向逆转的开始。

继1774年由前野良泽（1723—1803）、杉田玄白（1733—1817）等人译述解剖学著作《解体新书》刊行之后，作为西医基础理论主要分科的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先后传入日本。通过兰学家们的上述学术活动，近代西方医学在日本确立了地位。而宇田川榕庵（1798—1846）又在其撰写的植物学著作《菩多尼诃经》和《植学启原》中，将瑞典著名植物学家林耐（Carl von Linné）的植物组织理论及林耐分类法介绍到日本，从而在日本建立起近代植

13) 天、上帝皆为中国传统概念，有特定的含义，因而教廷恐怕出现“同名异神”误解

14) 萧致治、杨卫东编撰：《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湖北人民出版社198年，1313页

15) 故宫博物院编：《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教王禁约释文》

物理学理论。在天文学领域，本木良永（1735-1794）于1774年和1793年先后翻译了《天地二球用法》、《新制天地二球用法记》，专门介绍了哥白尼的太阳系理论以及经刻卜勒、伽利略直至牛顿的地动说的发展情况，并指出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是旧学，而哥白尼创始的太阳中心说是新学。本木良永的弟子志筑忠雄（1760-1806）译成著名的《历象新书》（原书作者是牛顿的学生凯尔Tohn keill），将牛顿的天体力学体系移植到日本，构筑起近代天文学及天体力学的理论基础。1825年青地林宗（1775-1833）著《气海观澜》，描绘了十九世纪初欧洲基础物理学的概况，使物理学在日本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1836年帆足万里撰成《穷理通》，该书最大的特色在于试图建立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世界观体系化，日本学者称其为日本自然科学史上划时代的著作。至天保年间（1830-1843），化学也以舍密（chemie的音译）学的名称形成独立的学科。宇田川榕庵撰《舍密开宗》（1837年）全21卷，内容包括无机、有机和分析化学，并以被称为近代化学革命的元素概念为中心，论及化学反应和试验方法，将西方近代化学体系输入日本。

从以上兰学自然科学各领域的成果不难看出，西方近代科学的主要成就已大体移入日本，以至有日本学者认为兰学促成了科学的新时代¹⁶⁾。到化政时期（1804-1830），兰学的研究领域已超出自然科学的范围，发展到唯物主义自然论与合理的社会思想统一的阶段，最终产生了对封建幕府的批判意识。

山片蟠桃（1746-1821）的代表作《梦之代》（1820）不仅摒弃了地心说的旧体系，而且还提出了恢宏的“大宇宙理论”。¹⁷⁾他认为宇宙间排列着大小无数个与太阳系类似的恒星系，并推测在其它恒星系中也存在着人类社会，从而指出了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山片蟠桃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孕育出他先进的社会思想。针对神代史中“先有君而后造民”的传统谬说，山片蟠桃依据唯物主义思想直截了当地指出：“有天后有地，有地后有人，有人后有仁义礼智、忠信孝悌，有庶民后立君，一旦君立，万民皆为其所使”。¹⁸⁾从而唯物地解释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从上述可以看出蟠桃以近代自然科学为基础形成了新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具有近代意识的社会思想。如果说山片蟠桃从西方近代科学中发现了唯物论，那么司马江汉（1738-1818）思想的特点则是从近代科学中引申出社会平等观。他认为，自然万物皆禀“天气”（太阳之火）和“地气”（水）和合而成，进而提出了鸟兽草木皆从此理，人类也不外是宇宙之虫的生物平等理论，而这种理论的归结点是人类社会平等观。司马江汉针对江户时代严格的等级制度，提出：“上自天子将军，下至士农工商非人乞丐，皆人也。”¹⁹⁾司马江汉的思想已经开始触及幕府统治秩序的根基。此外，司马江汉还指出了“我日本技术不及欧罗巴人”的根源在于“吾国之人不好穷万物之理”，“虚构文章以为文雅，不述信实”²⁰⁾，尖刻地批判了当时腐儒们的空理空论。这也正是司马江汉兰学研究的社会价值。

兰学在社会思想领域的发展，终于与封建幕府爆发了正面冲突。19世纪30年代后，在天保大饥馑（1833-1836）和英国东渐势头加快的内外危机形势下，渡边华山（1793-1841）依照兰学知识，明确提出了社会变革理论。统观渡边华山有关西洋的论著，颇具冷静的分析和清晰的思想体系。他是站在人类文明发达史的高度来分析世界历史并把握当时世界现状

16) 有马成甫：〈司马江汉的自然科学业绩〉，载《兰学资料研究会研究报告5号195年

17) 山片蟠桃：《梦之代》，载《日本思想大系4，岩波书197年

18) 同上

19) 司马江汉：《春波楼笔记》，载《日本随笔大成》第一期第二卷，吉川弘文197年

20) 司马江汉：《春波楼笔记》

的。首先是：“亚西亚四十度以南之地，自远古教化开，文物盛。……古代南方尊，北方卑，后来南方之教化次第扩至北方”，由此“北方剽悍诡黠之俗一变而为强勇深智之国”，而南方“高明文华之地成疏大浮弱之风。……唯今欧罗巴诸国于海外无不到之隅，以押领四大洲诸国。”²¹⁾那么，西洋变强的原因何在？对此，渡边华山精辟地指出：“西夷皆专于物理之学，故而，审度天地四方，不以一国为天下，而以天下为天下，因是，颇有广张规模之风气。”（《外国事情书》）简而言之即是“穷理精神”和“世界视野”。那么在剧烈变动的世界中，日本该如何应对？对此，渡边华山主张要向西方学习，以适应世界大势之剧变。西洋在变，世界在变，日本也必需要变。我们可以从渡边华山的洋学论著中，梳理出其要求变革的一系列愿望。即，古来华夷之辩的“井蛙之见”（《慎机论》）要变为“以天下为天下”（《外国事情书》）；“高明空虚之学”要变为“万事议论皆专务穷理”；面对西洋向东亚的攻势，“唐山御戎之论、我邦神风之说不足恃，”因之“专于内患、不虑外患”（《诸国建地草图》）的海防体制也要变；“不痛不痒的世界”（指日本国内状况）要变为“忧勤国政、内外慎密”（《外国事情书》）之局面。渡边华山这种以兰学知识批评、变革社会现实的意识已经大大超出了迄今为止的任何兰学家，也是至开国为止兰学社会批判意识发展的最高峰。

（三）

如果说至16世纪止的科学史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影响还不很重要的话，那么进入17、18世纪，西方科学革命即进入高潮。在这种革命力量的催动下，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风行，工业革命在欧洲各国相继兴起，由此大大改变了人类历史的面貌，为人类指出了一条不同于以往几千年文明史发展定规的新方向。中国恰恰在这个历史的重要关头阻绝了吸收西方近代文明的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日两国对西方文化态度位向的逆转，正是两国近代走向不同道路的开始。

日本兰学的发展恰好出现于世界历史大转折这一重要时期，这不能不说是日本民族的历史的幸运。日本学者在论及兰学以前的日本科学时认为：“近世以前，在日本文化中科学思想是极其稀薄而贫困的”²²⁾；“日本古来几乎没有称得上科学的东西，是兰学使日本人开始接触科学”²³⁾。从兰学有形成果看，仅译书一项，自1744—1852年即达480部，参加翻译的人数115人²⁴⁾。另据大槻如电统计，至明治初年，译书达700种²⁵⁾。上述数字在当时欧美以外的国家中是足以令人吃惊的。此外据日本学者不完全统计，到明治维新前，有34所兰学塾培养了9000余名塾生²⁶⁾。

由于中日两国这次历史性的转换，日本通过百余年兰学的发展，在科学技术和观念上为明治维新后全面走向世界奠定了历史性的基础。而清朝在这关键的一个世纪里自囚于新文明之

21) 渡边华山：《外国事情书》。以下有关渡边华山论著的引文，皆采用佐藤昌介校注：《华山·长英论集》（岩波书197年）本

22) 渡边敏夫：《近世日本天文学史》上，恒星社厚生198年，序言

23) 家永三郎：《检定不合格日本史》，三一书198年，16页

24) [日]穗亭主人：《西洋学家译述目录》，载图书刊行会编：《文明源流丛书》第三名著刊行196年，4648页

25) 辻善之助：《日本文化史》VI，春秋195年，29页

26) 青木岁幸：〈信浓兰学的展开状况〉，载《实学史研究》I，思文阁出版，1313页

外，致使中华民族学习先进文明的热情荡然无存，学界一片沉闷，即使在所谓乾隆盛世，其学术成就充其量也仅限于训诂考证。然而这样的学问是无法应付近代西方文明挑战的。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最可悲的莫过于在历史变革的关键时刻不了解它的发展方向和自己所处的位置。短短几十年的闭关锁国就使得中国知识界对外部世界变得孤陋寡闻，丧失了对外部世界的正确判断和反应能力，竟把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各国打入“朝贡国”的名册。中国就是在这种夷狄观和“华夷秩序”观念的指导下来迎接西方势力第二次冲击的。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政府为打破这种“华夷秩序”，并把中国纳入资本主义体系，派使团前来北京。7月英使马嘎尔尼于大沽登陆，9月谒见乾隆皇帝，献上了洋枪和当时英国巨舰的模型，之后提出了关于通商的六项要求。就在这前一年，俄国使节拉克斯曼也为要求通商而来到日本。在这次历史性考验面前，日中两国的反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日本依靠兰学积累起来的海外知识，通过这次冲击听了历史的脚步声，从而作出了积极的反应。幕府老中松平定信亲自指派官吏广泛搜集洋书，以学习西方之“理”，认识到西欧国家秩序与大君（将军）外交体制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由此产生了民族危机感，断定为对付欧洲的挑战就必须加强海防，着手制定具体措施。而乾隆皇帝面对英国炫耀近代工业技术、武器和试图打破华夷秩序的双重挑战，却向英王宣示了中国帝国的愚钝：“天朝抚有四海，珍奇宝物，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贡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朝……无需尔国制办。尔国王惟当善体朕意，益励款诚，永矢恭顺，……共享太平之福。”²⁷⁾可见，在乾隆眼里，英国是同所有传统夷狄番邦同等的朝贡国，并没有察觉到这是西欧冲击的开始。这道谕旨实际是在宣告近代中国的厄运。及至鸦片战争爆发，道光皇帝与群臣不知英吉利在何处。正如当时较开明的清吏姚莹所言：“吾中国曾无一人焉留心海外事者，不待兵戈之交，而胜负之数已较然矣。”²⁸⁾

由上述可知，日本依靠一个多世纪积累起来的近代文明基础和健康的观念，在民族兴衰的紧要关头与时俱进，“在主要来自西欧的文明诸要素大量引入日本时，日本已经有了对其可以纵横自如加以支配的驾驶员”²⁹⁾，由此日本终于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相反，中国在这一个多世纪里积累起来的是对外部世界的无知和虚狂自大，且又延宕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鲁迅描述了清末一般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态度：“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更加倍地奚落而且排斥的。”³⁰⁾因此，清末一般文人政客闭目塞听，“若问以亚洲之地舆，欧美之政学，张口瞪目，不知何语也。”³¹⁾这种对世界先进文明不屑一顾的无知，使中华民族错过了历史机遇，从而不得不经受鸦片战争以来屈辱的一个世纪。

27) 《大清高宗皇帝实录》卷一四三五，第十一至十四页

28) 姚莹：《东溟文后集》卷八。转引自王晓秋：《近代中日启示录》，北京出版198年，2页

29) 梅棹忠夫著、王子今译：《文明的生态史观》，上海三联书198年，9页

30) 鲁迅：《呐喊》，人民出版197年，页

31) 康有为语，转引自冯天瑜：《明清文化史散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年，16页

전근대 시기 중일 양국의 서학 진행과정 차이점

차오더위 (南開大)

서양세력의 동점(東漸) 속에서, 1517년 포르투갈 식민지 개척자들은 중국 광둥(廣東)에 상륙했고, 1543년 일본의 다네가섬(種子島)에 도착했다. 그 뒤 1549년 프란치스코 사베리오(Francis Xavier)가 일본을 방문했고, 1581년 마테오 리치(Matteo Ricci)가 중국에 왔다. 이로부터 중일(中日) 양국은 토인비가 말했던 ‘서양 문체’에 직면하게 되었다. 이 도전을 어떻게 받아들일 것인지가 중일양국의 중요한 역사적 과제임은 말할 필요도 없을 것이다. 16세기 중엽에서 19세기 중엽까지의 역사적 시기에 중일양국의 서양문화에 대한 반응은 각각 달랐다. 특히 후반으로 갈수록 서양문화의 도전에 대해 양국은 다른 태도를 취했으며 이것은 양국이 근대에 서로 다른 발전의 길로 나아가는 중요한 원인 중의 하나가 되었다.

(一)

서양 문화 도전의 첫번째 시기, 즉 16세기 말기에서 18세기 전기까지 중국은 예수를 중심으로 하는 서양 전도사 및 그들과 같이 들어온 서양 과학 문화의 중국 내 전파에 대해 냉정한 태도를 유지했다.

서광계(徐光啓)는 『태서수법·서(泰西水法·序)』에서 당시 과학기술을 말업(末業, 수공업을 가리킴)으로 여기는 전통적인 인식에 대해 전도사들의 학문 중에 ‘격물궁리(格物窮理)의 학문이 있어 무릇 이 세상의 안과 밖의 만사 만물의 이치를 ...자세하고 조리있게 이해하고 ...격물궁리 가운데 상술지학(象術之學)이 나타나며 상술지학의 큰 부분으로는 역법(歷法)과 율여(律呂)가 있다. 그외 형(形)과 질(質)이 있는 사물과 도(度)와 수(數)가 있는 일에 대해, 사용되지 않는 바가 없으며 사용함에 있어 지극히 교묘하다.’¹⁾ 간단하게 말하면 서광계는 서양과학의 특징이 ‘실증을 중시하고 실용을 추구하는’ 것이라고 생각했다. 서광계와 마테오 리치는 명나라 만력(萬曆) 35년(1607년)에 함께 『기하원본(幾何原本)』 전(前) 6권을 번역했으며, 시대를 대표하는 명저 『농정전서(農政全書)』는 과학정신을 기초로 한 경제치용의 모범이다.

서광계는 서양 과학지식을 몸으로 받아들이고 실천했을 뿐 아니라, 형식논리를 기반으로 하는 서양 과학의 공식화 방법을 깨달았으며, 이것이 바로 중국과학에서 부족한 사유방식이라고 생각했다. 그는 중국과 서양 수학의 차이는 ‘법(法)’에 있는 것이

1) 왕중민(王重民)집교(輯校) 『서광계집』 상책, 중화서국 1963년, 66쪽

아니라 ‘의(義)’에 있으며, 서양의 의는 『기하원본』을 대표로 하는 연역 논리 체계로, 이것이 ‘그 의를 전할 수 있다’고 여겼다²⁾. 그는 ‘수(數)에서 출발하여 이(理)에 도달’하는 것을 통해 중국과학이 한 단계 높은 경지에 이르기를 희망했다. 이것이 또한 서광계가 『기하원본』을 중국인에게 소개한 원인이기도 했다. 같은 논리로 이지조(李之藻)는 퍼타도(Francisus Furtado, 1587-1653)를 도와 서양 논리학 저서를 소개한 『명리탐(明理探)』을 번역했다. 당시 이미 일부 중국의 지식인들은 형식논리를 중시하기 시작했으며 이로부터 서양과학의 사상 핵심에 접근하였다.

이지조가 평생 번역에 참여한 서양과학 기술 서적은 총 3,40 여 종에 달하며 내용은 수학, 천문, 역법, 수리 등 다양한 영역에 걸쳐 있다. 그 가운데 비교적 유명한 것으로 『환유전(寰有詮)』 『명리탐(明理探)』 등이 있다. 이지조는 타인의 저작도 열정적으로 편집, 출판했으며 그 가운데 1682년에 인쇄한 서학총서 『천학초함(天學初函)』의 영향력이 가장 크다. 이 총서에는 서학 서적 20종이 수록되어 있으며 크게 이편(理編)과 기편(器編) 두 부류로 나뉘어 있는데 기편은 모두 과학서적이다.

사대부들의 상황은 이와 같았고, 명말청초의 만력·숭정·순치·강희제 역시 전도사의 정상적인 선교활동에 대해 개방적인 정책을 취했으며 동시에 전도사를 통해 적극적으로 서양 과학문화를 받아들이는 등 명실상부한 ‘대국의 도량’을 보여주었다. 마테오 릿치가 세상을 떠난 후 만력제가 그에게 묘지를 하사하자, 당시 누군가가 예부상서엽향고(葉向高)에게 이의를 제기했다. “과거 외국인이 중국에 온 이래 묘지를 하사한 적이 없었는데 어찌 유독 마테오 릿치만 후대하는 것이오?” 예부상서가 대답했다. “그 사람 자체는 차치하고라도 그의 저서 ‘기하원본’만 놓고 봤을 때 선인들이 밝히지 못한 것을 밝혔으니 그 공이 만세에 널리 전해질 것이오. 이 일 하나만 보아도 당연히 묘지를 하사하는 것이 당연할 것이오.”³⁾ 이 이야기를 통해 당시 지식인들이 이 책을 얼마나 중요하게 생각했고, 또한 당시의 황제와 사대부들이 선진 외래 문화를 존중하고 겸허한 자세로 배웠음을 알 수 있다. 청나라는 아담샬(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의 천문역법 분야의 성과를 높이 평가했기 때문에 그를 흠천감(欽天監) 감정(監正)에 봉했다. 순치제는 아담샬을 ‘스승’이라는 뜻의 만주어 ‘마법(瑪法)’이라고 불렀으며, 중국 역대 역학자는 ‘실로 그대(아담샬)에게 미치지 못한다’⁴⁾고 했다. 그리고 항상 그를 금전으로 불러들여 천문과 조정에 관한 질문을 했으며, 직접 그의 자택을 방문하기도 했는데 1656년에서 1657년 사이에만 무려 24번을 방문했다.⁵⁾

강희제 역시 서양과학을 존중한 일대 제왕이었으며, 재위기간 동안 서양의 전도사에게 기본적으로 관용과 이용 정책을 병행했다. 흠천감 사건의 결과로부터 강희제의 실학을 중시하는 이지적인 태도를 충분히 알 수 있다. 1664년 양광선(楊光先)은 ‘중

2) 서종역(徐宗譯)명청간야소회사역저제요(明清間會士譯著提要, 중화서국 1989년, 269쪽)

3) 유준(劉準): 『천주교전행중국고(天主教傳行中國考)』 중국하북현현(中國河北獻縣) 1937년, 145쪽

4) 『청사고탕약망진(淸史稿·湯若望傳)』

5) 바트Alfons Vät저양병진(楊丙辰)역: 『湯若望傳[아담샬전]』 제1책, 대만 상무인서관 1960년, 220쪽

국에 좋은 역법이 없을지언정 양인이 있어서는 안된다'는 생각에 '역법이 황당하다' '번역을 피했다' 등의 죄명을 씌워 아담살, 베르비스트(Ferdinand Verbiest) 등 전도사를 고발했고, 순식간에 흠천감 사건을 일으켜 전도사들을 체포하고 아담살을 교수형에 처했다. 강희제는 친정 7년(1668년)에 양광선과 베르비스트에게 동시에 정오의 해 그림자를 측정하도록 했다. 그 결과 역법에 능하지 못한 양씨의 측정결과는 신통치 않았고 베르비스트의 계산은 추호의 착오도 없었다. 그러나 양광선은 여전히 “중국은 요순의 역법을 쓰는데 어찌 요순과 같은 성군의 역법을 버리고 천주교의 역법을 취할 수 있겠습니까? 만약 서양역을 쓰신다면 반드시 국운을 재촉하여 자손에게 이롭지 않을 것입니다.”라고 큰 소리를 쳤다.⁶⁾ 과학을 중시했던 강희제는 현명한 결단을 내려 양광선의 흠천감 감정의 직위를 폐하고 베르비스트를 흠천감 감정에 봉했으며 구금되었던 선교사들을 모두 석방했다.

강희제 자신도 역시 천문역법, 물리, 의학, 지리, 측량 등 서양과학에 상당한 흥미를 가지고 있었으며, 전도사들이 '하나의 기술만 가지고 있어도 몽양재(蒙養齋)로 불러 들였다'⁷⁾. 강희제는 일찍이 장기간 전도사에게 상술한 과목들을 배웠고 '유럽의 과학과 그를 가르쳐 준 전도사를 입이 마르도록 칭찬했다.'⁸⁾

황제가 서학을 숭배했기 때문에 이 시기에 서양의 천문, 역법, 수학, 지리, 지도 측량 및 제작, 물리, 기계, 의학 등 여러 과학을 받아들였고, 이 밖에도 건축, 회화, 음악 등 서양 예술이 중국에 들어왔다. 왕도(王韜)의 『태서저술고(泰西著述考)』의 통계에 따르면 1552년에서 1674년까지 전도사가 중국어로 소개한 서양 지식 관련 저술이 211종이나 된다고 한다. 양계초(梁啓超)의 『서학서목표(西學書目表)』에 따르면 이 시기 동안 번역된 서양서적이 86종(종교 서적 제외)이다. 필자의 통계에 따르면 『사고전서(四庫全書)』에 『천학초합』 20종 서적 중 19종 (표1 참조) 이 수록되어 있다. 이 밖에도 아담살이 흠천감 감정으로 재직하던 1644년부터 시작하여 1805년까지 11명의 전도사가 흠천감 감정으로 일했는데, 근 160년 동안 전교사가 거의 이 직책을 독점하다시피 했다⁹⁾. 물론 이 시기에 들어온 서양과학기술은 근대과학 이전의 체계에 속하고 게다가 사대부계층에 국한되기는 했지만 어쨌든 중국이 받아들일만한 새로운 과학 지식의 근본을 제공해 주었다. 더욱 더 중요한 의미는 중국이 외부세계를 꾸준히 이해하여 맹목적으로 자부심을 가지는 어리석은 의식이 생겨나지 않도록 도와준 것이다.

이 시기동안 일본은 중국만큼 운이 좋지 않았다. 당시 일본의 역사적 환경 때문인데, 1543년 예수회 전도사들이 일본에 전도하려 온 이후 1638년 도쿠가와(德川)막부가 전도사를 완전히 쫓아내기까지 근 1세기 동안은 일본 역사의 '천주교시대'였으

6) 심복위(沈福衛) 『중서문화교류사(中西文化交流史)』, 상해인민출판사 1987년, 380쪽

7) 『청사고예술열전서(淸史稿·藝術列傳序)』.

8) 『청사사(淸史史料)』 제6집중화서국 1985년, 162쪽

9) 요셉 데헤르규(Joseph Dehergn)저, 경승(耿昇)역: 『재화야소회사열전급서목보편(在華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 하, 중화서국 1995년, 760-761쪽

며, 서양의 과학기술은 단지 부산물로 존재했다.

1467년 시작된 ‘응인(應仁)의 난(亂)’은 일본을 100년 가까이 전국(戰國) 혼란 속으로 밀어넣어 문화허탈상태에 빠트렸다. 일본문화의 회색시기인 1549년, 천주교 예수회가 일본에 건너와 전도를 하면서 이질 천주교 문화를 일본열도에 전파하고, 문화기아 상태에 놓여 있던 일본인들을 크게 매료시켰다. 일본인들은 천주교에 빠져 들기 시작했고 신도수가 날로 늘어나면서 가장 많을 때는 75만명에 달했다. 그 뿐 아니라 다이묘(大名)에서 거지에 이르기까지 모든 사회 계층을 흡수했다. 이 시기의 일본은 전도활동과 더불어 일본에 들어온 의학, 천문학 관련 서양의 과학기술을 받아들였지만, 그 규모와 당시 지식계에 미친 영향은 같은 시기의 중국과 결코 비교할 수 없다. 다만 물론 다른 한편으로 훗날 일본의 난학(蘭學, 네덜란드학) 발전에 있어 중요한 역사적 역할을 담당하였다. 10)

10) 일본 천주교 시대의 천주교와 서양과학의 전파상황에 관한 내용은줄 시론남만문試論南蠻文참고, 세계역사 1996년 제1기

표1 『사고전서(四庫全書)』에 수록된 『천학초함(天學初函)』 각 서적의 개요

이 편				기 편			
서명	저(역)자	초판	채택	서명	저(역)자	초판	채택
천주실의 (天主實義)	마테오 리치	1603	자부존목 (子部存目)	태서수법 (泰西水法)	우르시스 (Sabbatini de Ursis) 서광계	1612	자부전록 (子部全錄)
서학범 (西學凡)	줄리오스 알레니 (Giulios Aleni)	1623	자부존목	간평의설 (簡平儀說)	우르시스 (Sabbatini de Ursis) 서광계	1611	자부전록
변학유독 (辨學遺牘)	마테오 리치 외	1609	자부존목	혼개통헌 도설 (渾蓋通憲圖說)	마테오 리치 이지조	1607	자부전록
당경교비 서후 (唐景教碑書後)	이지조	1625		동문산지 (同文算指)	마테오 리치 이지조	1613	자부전록
기인십편 (畸人十篇)	마테오 리치	1608	자부존목	기하원본 (几何原本)	마테오 리치 서광계	1607	자부전록
교우론 (交友論)	마테오 리치	1595	자부존목	환용교의 (圓容較義)	마테오 리치 이지조	1614	자부전록
이십오언 (二十五言)	마테오 리치	1604	자부존목	표도설 (表度說)	우르시스 주자우(周子愚)	1614	자부전록
칠극 (七克)	판토하 (Pantoja)	1604	자부존목	측량법의 (測量法義)	마테오 리치 서광계	1608	자부전록
영언여작 (靈言蠡勺)	삼비아시(Sambiasi) 서광계	1624	자부존목	천문략 (天問略)	디아즈 (Emmanuel Diaz)	1615	자부전록
직방외기 (職方外紀)	알레니 이지조	1623	사부전록 (史部全錄)	구고의 (勾股義)	마테오 리치 서광계	1608	자부전록

이 시기 전도사들이 가져온 서양 문화 중 긍정적인 가치로 나타나는 것이 과학기술이며, 그들의 종교관은 보수적이고 뒤떨어진 중세기 사상에 머물러 있었다. 강희 59년(1720년)에 이르러 강희제는 ‘예의지쟁(禮儀之爭)’으로 인해 천주교를 금지했고 그 동안 남경사태와 흙천감사태가 발생하기도 했지만, 결국 다 시정되었고 전체적으

로 보면 전도사는 공정한 대우를 받은 셈이었다. 그러나 강희 년간의 관대한 분위기 속에서도 일본 인구의 몇 배가 넘는 중국의 신도 수는 16만 명에 불과했는데(1664년)¹¹⁾ 이는 천주교 번영 시기의 일본의 75만 신도의 22%에 불과한 것이다. 그럼에도 당시 전도사가 소개한 서양과학기술에 대한 중국의 관심은 일본을 훨씬 능가했다. 이 시기의 서양문화에 대한 중일 양국의 경향은 완전히 달랐는데, 일본의 경우는 종교적이고 중국은 세속적이며, 일본은 무역 이익을 중시한 반면 중국은 과학적 가치를 숭상했고, 일본에 들어온 서양 과학 기술은 단지 부산물에 불과했지만 중국은 서양 과학 중심으로 서양 문물을 받아들였다. 도쿠도미 소호(徳富蘇峰)가 지적한 것처럼 ‘당시 일본의 예수교 신자 중에서 『서학범』을 번역한 이지조 수준의 학식에 도달한 사람은 한 사람도 없었다.’¹²⁾ 일본이 잔혹한 종교 금지 정책을 시행함에 따라 과학 기술을 포함한 남만문화가 더불어 사라지게 되었다. 중국에서도 종교를 배척하기도 했지만 일본처럼 극단적으로 차단하는 않았으며 과학 기술에 영향을 미치지 않았다.

이로부터 서양문화와 접촉한 첫번째 시기에 중국은 정확한 판단에 따라 올바르게 반응했으며 역사의 답안지를 올바르게 완성했다는 결론을 내릴 수 있다. 상대적으로 일본의 수확은 미미했다. 바꿔 말하면 당시 서양 과학기술에 대한 중화민족의 반응능력은 일본보다 훨씬 뛰어났다. 더욱 중요한 것은 이 시기에 선진 외래문화를 받아들인 주체가 유가문화를 매개체로 하는 중화제국의 최고통치자와 사대부 계층이었다는 점이다. 명말청초 서학 도입의 역사를 통해 당시 사대부계층의 지식인들이 우리들이 일괄적으로 형용하는 것처럼 ‘완고’하지 않았다는 사실을 증명할 수 있으며, 오히려 그들은 서양 문화를 겸허하고 진지하게 받아들이는 등 관용적인 태도를 보였고 심지어 강희제는 학식있는 전도사들을 궁으로 불러 들여 ‘가정교사’로 삼기까지 했다.

(二)

앞서 언급한 역사적 사실을 통해서 역대 황제와 사대부계층의 호응 하에 중국이 근대과학의 단계로 진입할 가능성이 많았었음을 알 수 있다. 그러나 유감스럽게도 중국의 너그러움과는 달리 로마교황청은 편협한 배타성을 보여주었고 마침내 중국조정과 로마교황청 사이에 ‘예의지쟁’이 벌어지게 되었다.

1704년 교황 클레멘스 11세는 성직부에 명하여 중국에 있던 선교사들에게 금약7조를 공포했다. 그 내용은 하늘(天) 또는 상제(上帝)라는 말로 천주를 칭해서는 안되며¹³⁾, 신자가 공자묘와 사당에 들어가 공자와 조상에 제사 지내는 것을 금하며, 집

11) 서종택(徐宗澤) 『중국천주교전교사개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상해서점 1990년, 238-240쪽

12) 정학가(鄭學稼)에서 인용일본제3권. 대북여명공사(臺北黎明公司) 1997년, 368쪽. 여기에서 설명할 필요가 있는 것은 이지조이든 서광계이든 모두 서양과학을 이해하는 상당한 학식을 가지고 있었으나, 외국어를 할 줄 몰랐기 때문에 그들의 번역은 독립적으로 진행된 것이 아니라 전도사의 구술을받아 적 형식으로 이루어졌다

13) 하늘, 상제는 모두 중국의 전통적인 개념으로, 특정한 함의가 있기 때문에 교황청에서는같은이름의 다른 신 [同名異神이라는 오해가 생길 것을 걱정하였다.

안에 고인의 위패를 두는 것을 금지하는 것으로¹⁴⁾, 교황은 황제에게 이를 허락해 줄 것을 요구했다. 이에 대해 강희제는 전도사들은 반드시 중국의 예의를 따라야 하며, 조정의 전도 허가 증서가 있어야만 중국 내에서 전도를 할 수 있다는 내용의 조서를 내렸다. 그리고 중국 내 예수회 전도사들을 교황청에 보내 금약을 철회해줄 것을 건의했다. 그러나 교황청은 이를 거부하고 강희제는 1720년 ‘앞으로 서양인들이 중국 내에서 종교활동을 할 필요가 없으며, 또한 금지해도 되는데, 이는 번거로운 일들을 피하기 위함이다’ 라고 금교 칙령을 내렸다.¹⁵⁾ 사실을 놓고 볼 때, 청나라 조정이 종교를 금하게 된 책임은 중국에 있다기보다 교황청에 있다고 말하는 것이 맞을 것이다. 그러나 이 사건 자체의 시비 책임을 가리는 것 보다 이 사건으로 일어난 역사적 전환이 가져온 심각한 결과가 역사적으로 더 중요한 일이다.

1720년은 일본의 도쿠가와 막부의 제8대 쇼군인 도쿠가와 요시무네(德川吉宗)가 서양서적 수입 제한을 풀어준 해로서, 기독교 서적 외에 모든 서양서적이 일본에 들어올 수 있었다. 도쿠가와 요시무네의 ‘양서해금’조치 덕분에 에도시대(1603-1868) 중기까지 일본 지식인층에서 네덜란드어를 매개로 한 서양 근대학술의 학문체계를 연구, 도입하는 난학이 생겨났다. 서양 근대과학 연구를 시작으로 점차 서양 사회사상 등의 영역으로 확대되었고, 에도시대의 일본인들이 외부세계를 이해하는 매개체가 되었다. 또한 막부 말엽 유신시기에도 큰 역사적 영향을 끼쳤다. 반면 중국은 이후 옹정(雍正), 건륭(乾隆) 시기의 엄격한 종교금지를 거치면서 중국과 서양문화간의 교류가 거의 중단되다시피 했다. 그 후 소수의 전도사들이 궁궐이나 흙천감에서 머물기도 했지만 그들의 활동은 많은 제약을 받았고 연금과 진배없었으며, 서양과학의 중국 내 전파는 고사 위기에 처했다. 1720년부터 서양 문화에 대한 중일 양국의 태도가 역전된 것이다.

1774년, 마에노 료우타쿠(前野良澤, 1723-1803), 스키타 켄바쿠(杉田玄白, 1733-1817) 등이 번역한 해부학 서적 『해체신서(解體新書)』의 출간을 계기로 서양 의학 기초 이론의 주요 과목인 해부학, 생리학, 병리학이 일본에 전해졌다. 난학자들의 학술활동을 통해 근대 서양 의학이 일본 내 지위를 확립하게 되었다. 우다가와 요우안(宇田川榕庵, 1798-1846)은 그의 식물학 저서 『보타니카경(蕃多尼訶經)』과 『식학계원(植學啓原)』에서 스웨덴의 저명한 식물학자 린네(Carl von Linné)의 식물조직이론과 린네 분류법을 일본에 소개하여 일본 근대 식물학이론 체계를 구축하였다. 천문학 분야에서는 모토키 요시나가(本木良永, 1735-1794)가 1774년과 1793년에 각각 『천지이구용법(天地二球用法)』과 『신제천지이구용법기(新制天地二球用法記)』를 번역하여, 코페르니쿠스의 태양계이론과 케플러(Johannes Kepler), 갈릴레오에서 뉴턴에 이르기까지 지동설의 발전상황을 중점 소개했으며 톨레미(Ptolemy)

14) 소치야(蕭致治), 양위동(楊衛東)편찬: 『아편전쟁전중서관계기사(鴉片戰爭前中西關係紀事)』, 호북인민출판사 1986년, 130-131쪽

15) 고궁박물관 편: 『강희와 로마사절관계문서·교황금약서문』

의 지구중심설은 구학문이며 코페르니쿠스가 창시한 태양중심설이 신학문임을 지적했다. 모토키 요시나가의 제자인 시즈키 타다오(志筑忠雄,1760-1806)는 유명한 『역상신서(歷象新書)』(뉴턴의 학생인 존 킬(John Keill)의 저서)를 번역하여 뉴턴의 천체역학체계를 일본에 소개하여 근대 천문학과 천체역학의 이론기초를 정립했다. 1825년 이오치 린조(靑地林宗,1775-1833)는 『기해관란(氣海觀瀾)』을 저술하여 19세기 초 유럽의 기초물리학을 개괄적으로 소개하면서 물리학이 일본에서 독립된 학문으로 자리잡는데 일조했다. 1836년 호아시 반리(帆足万里)가 『궁리통(窮理通)』을 내놓았는데, 이 책의 최대 특색은 자연과학을 기반으로 하는 세계관의 체계화를 시도한 점이며 일본학자들은 이 책을 일본 자연과학사의 중요한 획을 그은 대표작이라고 부른다. 천보 년간(1830-1843)에 이르러 화학 역시 사밀(舍密, chemie의 음역)학이라는 이름으로 독립된 과목으로 자리잡게 된다. 우다가와 요우안의 『사밀개종(舍密開宗)』(1837년) 전 21권에서는 무기, 유기와 분석 화학을 다루고 있으며 또한 근대 화학 혁명이라 불리는 원소개념을 중심으로 화학 반응과 실험 방법을 언급하면서 서양 근대화학의 체계를 일본에 도입했다.

이상 난학이 자연과학의 여러 분야에서 거둔 성과를 통해 서양 근대과학의 주요 성과가 대부분 일본에 들어왔으며, 일본학자들이 난학이 과학의 신시대를 창조했다고 생각했음을 짐작할 수 있다¹⁶⁾. 화정(化政)시기(1804-1830)에 이르러 난학의 연구 분야는 자연과학의 범주를 넘어 유물주의 자연론과 합리적인 사회사상이 하나가 되는 단계까지 발전하며 결국은 봉건 막부에 대한 비판 의식이 생겨나게 된다.

야마가타 반토(山片蟠桃,1746-1821)의 대표작 『유메노시로(夢の代)』(1820)는 천동설의 체계를 포기했을 뿐 아니라 방대한 ‘대우주이론’을 정립했다.¹⁷⁾ 그는 우주에는 태양계와 유사한 수없이 많고 크기도 다양한 항성계가 있다고 생각했고, 기타 항성계에도 인류사회가 존재할 것이라고 추측하면서 나아가 우주에서의 지구의 위치를 언급했다. 야마가타 반토의 유물주의 자연관은 그의 진보적인 사회사상을 낳았다. 신대사(神代史)의 ‘임금이 먼저 있고 그 다음에 백성을 만들었다’라는 전통적인 황당한 논리에 대해 야마가타 반토는 유물주의 사상에 입각해 단도직입적으로 지적했다. ‘하늘이 있고 난 후에 땅이 생겨났고, 땅이 생겨난 다음에 사람이 생겨났다. 사람이 있고 난 다음에 인의예지와 충신효제가 있고, 백성이 있고 난 후에 임금을 세운다. 일단 임금을 세우고 나면 만민은 임금의 부림을 받게 된다.’¹⁸⁾ 유물적으로 인류사회 발전사를 해석한 것이다. 이로서 야마가타 반토가 근대 자연과학을 기초로 새로운 유물주의 세계관과 근대의식을 갖춘 사회사상을 형성했음을 알 수 있다. 만약 야마가타 반토가 서양 근대과학에서 유물론을 발견했다면 시바 코오칸(司馬江漢,1738-1818) 사상의 특징은 근대과학에서 사회평등관을 도출해 낸 것이다. 그는 자연만물은 모두

16) 아리마 세이호(有馬成): 시코오칸의 자연과학업, 『난학자료연구회연구보고』 52호 게재, 1959년

17) 야마가타 반토: 『유메노시(夢の代)』, 『일본사상대』 43 게재, 이와나미서점岩波書 1979년

18) 상동

‘천기’(태양의 불)와 ‘지기’(물)가 합쳐져 만들어 졌으며, 초목(草木)과 금수(禽獸)도 모두 이 이치를 따르고, 인류 역시 우주의 곤충에 지나지 않는다는 생물 평등 이론을 제기했다. 그리고 이러한 이론의 귀결점은 인류사회 평등관이다. 시바 코오칸은 에도 시대의 엄격한 신분 등급제도에 대해 ‘천자 쇼군에서부터 사농공상, 거지에 이르기까지 모두 사람이다.’라고 일갈했다.¹⁹⁾ 시바 코오칸의 사상이 막부 전통 질서의 뿌리까지 건드린 것이다. 이 외에 시바 코오칸은 ‘우리 일본의 기술이 유럽인에 뒤지는’ 이유가 ‘우리나라 사람들은 만물의 이치를 파고들기를 좋아하지 않으며’, ‘허구의 글을 우아하다고 여기며 진실을 서술하지 않기’ 때문이라고 주장하며²⁰⁾, 당시의 부패한 지식인들의 공허한 이론을 날카롭게 비판했다. 이 역시 시바 코오칸의 난학 연구의 사회적 가치이다.

사회사상 분야에서 거둔 난학의 발전은 마침내 봉건 막부와 정면 충돌했다. 1830년대 이후, 천보 대기근(1833-1836)과 영국의 동점(東漸) 가속화라는 국내외의 위기 상황 속에서 와타나베 카잔(渡邊華山, 1793-1841)은 난학적 지식에 근거하여 사회변혁이론을 제기했다. 와타나베 카잔의 서양에 관한 저술을 살펴 보면 냉정한 분석과 분명한 사상체계를 갖추고 있음을 알 수 있다. 그는 인류문명 발달사의 관점에서 세계 역사를 분석하고 당시의 세계 상황을 이해했다. 우선 ‘아시아 40도 이남의 땅은 예로부터 교화가 되었고 문물이 풍부했다...고대에 남방이 존귀했고 북방은 비천했으며 훗날 남방의 교화가 점차 북방으로 확대되었으며’, 이로서 ‘북방의 거칠고 교활한 지역이 일순간 용맹하고 지식이 뛰어난 나라로 변모했다.’ 그리고 남방의 ‘우수하고 번성한 지역에 경박하고 약한 풍조가 형성되었다. ...오로지 지금 유럽의 여러 나라만이 해외에 이르지 않는 곳이 없으며, 사대주(四大洲)의 각국을 제압하고 있다.’²¹⁾ 그렇다면 서양이 강해진 까닭은 무엇인가? 이 문제에 대해 와타나베 카잔은 정확하게 지적했다. ‘서양인들은 물리학에 집중했기 때문에 천지사방을 신중하게 살펴볼 수 있으며, 일개 국가로 천하를 삼는 것이 아니라 천하를 천하로 삼기 때문에 널리 규모를 확장할 수 있는 풍조를 갖추고 있다.’ (『외국사정서(外國事情書)』) 요약하면 ‘궁리(窮理)정신’과 ‘세계시야(視野)’이다. 그렇다면 급변하는 세계 속에서 일본은 어떻게 대처해야 하는가? 이에 대해 와타나베 카잔은 서양을 배워서 급변하는 세계 흐름에 적응해야 한다고 주장했다. 서양도 변하고 있고, 세계도 변하고 있으며 일본 역시 반드시 변해야 한다. 우리들은 와타나베 카잔의 양학 저서 속에서 다음과 같은 변혁을 향한 그의 열망을 볼 수 있다. 즉, 과거의 한민족과 이민족을 구분[화이지변(華夷之辯)] 하는 ‘우물 안 개구리의 식견’(『신기론(慎機論)』)이 바뀌어 ‘천하를 천하로 삼아야’ 하고 (『외국사정서(外國事情書)』), ‘고매하고 공허한 학문’이 ‘만사에 관

19) 시바 코오칸: 춘파루필(春波樓筆), 일본수필대』 제1기 2권 게재, 길천홍문관(吉川弘文館) 1975년.

20) 시바 코오칸: 춘파루필(春波樓筆)

21) 와타나베 카잔: 외국사정(外國事情). 다음은 와타나베 카잔 논문에 관한 인용문으로 모두사토 쇼스케(佐藤昌)의 교주에서 가져왔다. 카잔초에이(高長)논이와나미서 1979년)판본

한 의론이 모두 이치를 밝히는 데 집중하도록 바뀌어야' 한다. 동양에 대한 서양의 공세에 직면하여 '당산(唐山) 어용(御戎)에 관한 논의와 우리나라의 신펡지설(神風之說)을 믿고 의지하기에 부족'하기 때문에 '내환에 집중하고 외환을 고려하지 않는' (『제국건지초도(諸國建地草圖)』) 해양방어 체제 역시 변해야 한다. 그리고 '아프지도 가렵지도 않은 세계'(일본 국내 상황을 가리킴)는 '국정을 근심하고 국내외적으로 신중하고 조심스러운' 국면으로 변해야 한다. (『외국사정서(外國事情書)』) 난학지식에 근거한 와타나베 카잔의 사회현실 비판, 개혁 의식은 지금까지의 모든 난학자보다 뛰어넘는 수준이자, 개국 이래 난학의 사회비판 의식 발전의 최고봉이다.

(三)

만약 16세기까지 인류 문명발전에 끼친 과학사의 영향이 그다지 중요하지 않다고 한다면, 17,18세기에 들어와 서양과학 혁명은 최고조에 도달했다. 이러한 혁명역량의 자극 하에 18세기 유럽 계몽사상이 유행하기 시작했고 산업 혁명이 유럽 각국에서 일어났다. 이로서 인류역사의 면모가 크게 변했고, 과거 수천년 문명사의 발전 법칙과는 다른 새로운 방향을 인류에게 지시했다. 중국은 이러한 역사의 중요한 시기에 서양 근대 문명의 흡수 경로를 차단했다. 이러한 의미에서 볼 때 서양 문화에 대한 중일 양국의 태도가 역전한 것이 바로 양국이 근대에 각기 다른 길을 걷기 시작한 발단이라고 할 수 있다.

일본 난학의 발전은 세계역사 대전환의 중요한 시기에 이루어진 것으로 일본 민족의 역사에 있어 큰 행운이라 하지 않을 수 없다. 일본학자들은 난학 이전의 일본과학에 대해 '근세 이전의 일본 문화 중 과학 사상은 지극히 희박하고 부족했으며'²²⁾, '일본은 예로부터 과학이라고 부를 만한 것이 없었으며, 난학을 통해 일본인이 과학과 접촉하게 되었다.'²³⁾라고 여겼다. 난학의 눈에 보이는 성과로 보자면 역사 하나만 놓고 봐도 1744년에서 1852년까지 총 480부에 달하며, 번역에 참가한 사람의 수는 115인이나 된다²⁴⁾. 오츠키 죠덴(大槻如電)의 통계에 따르면 메이지 초년까지 출간된 역서는 700종이라고 한다²⁵⁾. 당시 구미 국가를 제외하고 이러한 역서의 수량은 실로 놀랍다고 할 것이다. 이 외에 일본학자들의 기타 통계에 따르면 메이지 유신 이전에 34곳의 난학 사숙에서 9000여 명의 사숙생을 교육했다고 한다²⁶⁾.

역사적 전환기를 거치면서 일본은 백 여년의 난학 발전을 통해 과학기술과 관념에 있어 메이지 유신 이후 세계로 진출하는데 있어 역사적 기초를 닦았다. 반면 청나라

22) 와타나베 도시(渡邊敏):『근세일본천문학』 상, 항성사후생각(恒星社厚生閣) 1986년, 서언

23) 家永 이에나사부(家永 伊豆)『불합격일본사검정(不合格日本史)』, 산이치서방(三一書房) 1980년, 161쪽

24) 일본수정주인(穗亨主)『서양학자역술목록(西洋學者算術目録)』, 도서간행회편 『문명원류총』 제3, 명저간행회 1969년, 465-481쪽.

25) 과선지조(過善之)『일본문화VI』, 춘추사 1955년, 293쪽.

26) 청목세행(靑木歳)『신농난학의 전개상』, 실학사연 I 게재. 사문각 출판, 138-139쪽

는 이러한 중요한 시기에 신문명 밖에 자신을 가두어 두었으며, 중화민족의 선진문명에 대한 열정은 더 이상 존재하지 않았고 학계는 침체기에 빠져 있었다. 소위 건륭제의 성세(盛世) 때에도 학술적 성과는 고작 훈고와 고증 분야에 국한되었다. 그러나 이러한 학문으로는 근대 서양 문명의 도전에 대처할 수 없다. 한 민족에게 있어 가장 비극적인 일은 역사 변혁의 중요한 시기에 그 발전 방향과 자신이 처한 위치를 모르는 일이다. 수 십년의 쇠국정책 때문에 중국의 지식계는 외부 세계의 변화를 전혀 접할 수 없었고 외부 세계에 대한 정확한 판단과 반응 능력을 상실했으며, 어이없게 영국을 위시한 서양 각국을 ‘조공국(朝貢國)’의 명단에 포함시켰다. 중국은 이러한 이적관(夷狄觀)과 ‘화이질서(華夷秩序)’ 관념에 영향 하에 서양 세력의 두 번째 충격을 받아 들인 것이다.

건륭 58년(1793년), 영국 정부는 이러한 ‘화이질서’를 무너뜨리고 중국을 자본주의 체계에 편입하기 위해 사절단을 중국에 파견했다. 7월 대고(大沽)에 상륙한 매킨트니(George Macartney)를 대표로 하는 사절단이 9월에 건륭제를 알현하고 서양총과 당시 영국 거함의 모형을 바치면서 통상에 관한 6가지 요구를 제시했다. 1년 전 러시아 사절 락스만(Laxman)이 통상을 요구하기 위해 일본을 방문했었다. 이러한 역사적 도전 앞에 중일 양국의 반응은 완전히 달랐다. 일본은 난학을 통해 축적한 외국지식을 기반으로 역사의 도전에 적극적으로 반응했다. 막부의 로쥬(老中) 마츠다이 라 사다노부(松平定信)는 친히 관리를 파견하여 양서를 수집하고 서양의 ‘이(理)’를 학습하면서, 서구 국가 질서와 쇼군(將軍)외교 체제가 전혀 다른 성격을 가지고 있음을 알게 되고 민족위기감을 느끼게 되었다. 그는 유럽의 도전에 대처하기 위해서는 해상 방어를 강화하는 길밖에 없다고 판단하고 구체적인 조치를 취하기 시작했다. 반면 건륭제는 영국의 근대 산업기술과 무기, 그리고 화이질서를 무너뜨리려는 이중 도전 앞에서 영국 왕에게 중국의 어리석음을 드러냈다. ‘천조(天朝)는 사해를 거느리고 있으며, 진귀한 보물이 귀하지 않다. 그러나 그대 나라의 왕이 여러 공물을 바치기 위해 멀리서 가져온 성의를 생각하여 특별히 관아에게 명하여 받도록 하겠다. 사실 천조의 덕이 널리 퍼져 있어 만국에서 조정에 배알하러 찾아오고 있으니... 그대의 나라가 이렇게 할 필요가 없다. 그대 나라의 국왕은 오로지 짐의 뜻을 잘 헤아려 더욱 노력하여 성의를 보이고 영원히 순종할 것을 맹세해야 할 것이며 ... 태평의 복을 같이 누리게 될 것이다.’²⁷⁾이에서 보이듯 건륭제의 눈에 영국은 전통적 오랑캐 국가와 동등한 조공국에 불과하며, 이것이 서구 돌격의 시작임을 알지 못했다. 황제의 이 유지는 사실상 근대 중국의 악운을 선포하는 것이나 마찬가지였다. 아편전쟁이 발발하기까지 도광제와 여러 신하들은 영국이 어디에 있는지도 몰랐다. 당시 비교적 서양 문물에 지식이 있었던 조정 관리 요영(姚瑩)은 다음과 같이 말했다. ‘우리 중국은 해외의 사정에 관심을 가지는 자가 아무도 없다. 무력 충돌까지 갈 것 없이 승부는 이

27) 대청고종황제실』 권1435, 11-14쪽 I

미 결정되었다.’²⁸⁾

이로서 알 수 있듯이 일본은 여러 세기에 걸쳐 축적한 근대 문명 기반과 건전한 세계관에 따라 민족 흥망의 중요한 시기에 시대와 더불어 발전하며, ‘주로 서구에서 들어 온 문명의 주요 요소가 일본으로 대량 유입될 때, 일본은 이미 마음대로 누비며 지배할 수 있는 조종사가 존재했다.’²⁹⁾ 이로서 일본은 자본주의 발전의 길로 접어들었다. 반대로 중국이 수세기 동안 축적한 것은 외부세계에 대한 무지와 자만이며, 상당히 오랜 시간 동안 발전이 늦추어졌다. 노신(魯迅)은 청말 대외 문화에 대한 일반 중국인의 태도를 다음과 같이 묘사했다. ‘당시 글을 읽어 과거에 응시하는 것이 올바른 길이었으며, 소위 양무(洋務)를 배우는 것은 사회에서 막다른 골목에 다다른 사람이나 하는 것이라 생각했다. ... 더더욱 비웃고 배척했다.’³⁰⁾ 그리하여 청말의 평범한 문인정객들은 눈과 귀를 막고 ‘만약 아시아의 지리와 구미의 정치학을 물으면 눈과 입을 크게 뜬 채 어떻게 말을 해야 할 지 몰랐다.’³¹⁾ 세계의 선진문명을 거들떠 보지 않는 무지함 때문에 중화민족은 역사의 기회를 놓쳤고 아편전쟁 이래 굴욕의 한 세기를 겪을 수 밖에 없었다.

28) 요:동명문후집(東溟文后集) 권8. 왕효추(王曉秋)의 『근대중일계시록』에서 인용, 북경출판사 1987년, 24쪽

29) 우메사오 다다오(梅棹忠治, 왕자금(王子今)역 『문명적 생태사관』, 상해삼련서점 1988년, 95쪽

30) 노신: 『남喊』, 인민출판사 1973년, 2쪽

31) 강유위(康有爲), 풍천유(馮天瑜)의 『명청문화사산론』에서 인용, 화중공학원출판사, 1986년, 160쪽

日露戦争とナショナルヒストリ

■ 中村 政則 (一橋大) ■

日露戦争とナショナルヒストリ

中村 政則 (一橋大)

〈目 次〉

- はじめに
- 1. 『坂の上の雲』とは何か
- 2. 明治維新と自由民権運動
- 3. 日清戦争
- 4. 日露戦争
- 結 論

はじめに

ナショナルヒストリ"という言葉を日本語に一译すと、①国家史、②国民史と二通りに一译せる。国家史は国家という制度"E机构の側面に焦点を"一てた場合、国民史は、国民が国家を支えあるいは抵抗する側面を重視した表現である。それゆえにナショナルヒストリ"[をテ"[マとする場合、「上から」と「下から」のアプロ"[チをとる必要がある。

日本におけるナショナルヒストリ"[は、1900年代、つまり日清戦争と日露戦争の間に「完成」した。ナショナルヒストリ"[は産業革命、帝弓主义、国民国家の形成とパラレルに作られる。国民国家の経済的基础は産業革命であり、制度的には宪法の形成、国会の开设、国语(标准语としての日本語、明治30年代、1900年前後)の成立と不可分である。

言い換えれば、(1) 明治維新、(2) 自由民権運動、(3) 日清"E日露戦争3段階を経て、日本の国民国家は成立した。この过程でナショナリズムが強化され、对外膨張的・帝国主义的な军事・経済・政治・教育(国家主义的メンタリティ)が成立する。

このテーマを时代小说として描いたのが、司马辽太郎の『坂の上の雲』(単行本全6卷、1968~1971)である。同书は数百万の读者を持ち、2009年11月から3年間にわたり、NHKから放映される予定である(2012年まで合計13回放映)。同番組は「日本海海战」で終わる予定なので、バブル崩坏以降閉塞状态にある日本人を元気にさせ、ナショナリズムを煽る可能性がある。

1. 『坂の上の雲』とは何か

同书は日清・日露戦争を題材に、その中で坂の上にかがやく一朵(いちだ)の云を見つめながら、一心不乱に坂を登ってゆく若者たちの青春物語を描いたものである。さらに明治維新、日清戦争、日露戦争とは何かを考える历史小说であり、はては国家とは何か、日

本人とは何かを問い続けた作品である。作品の対象は、すこぶる広く、戦争・軍人・教育・時代の精神的(エー)雰囲気(トスから、登場人物の個人的性格におよぶ。あるときは「余談だが」などの挿入句をいれて、帝国主义、産業革命、国民国家、ヨーロッパ、アジアにまたがる世界情勢の記述にいたる。

その中で、私が注目するのは外圧の問題である。

司马辽太郎によれば、ロシアは一八世紀以来、満州・朝鮮を自己の支配下におこうという野望を持っていた。隙あらば日本を占領し、支配したがっていた。これに対し、日本は対露恐怖の感情で、怯(おび)え反感を持っていたという。司马はロシアのバルチック艦隊を全滅させた東郷平八郎の首席参謀・秋山真之(あきやま さねゆき)をして、こう語らせている。

『『日本というのは悲痛な国よ』と、真之はいった。(日本は農業のほかろくな産業もないくせに)ヨーロッパの一流国とおなじ海军をつくろうとしている。

「それも超一流の軍艦をそろえたがる」と、真之はいった。「『そのエネルギーのひとつは恐怖だ。外国から侵されるかもしれぬという恐怖が明治維新をおこし、維新後はこのような海军をもつにいたった(略)』」(単行本『坂の上の云』第二巻)。

私の判断では、この文章の中に、『坂の上の云』の核心がある。つまり、明治時代の政治、軍事、教育、エートスそしてナショナリズムも、この外圧(外国から侵略されるかもしれないという恐怖)に由来するというのである。「朝鮮半島は日本の肋腹に突き刺さった刃(やいばだ)」という言葉も同じである。

だが、これは一步間違えれば、林房雄の「大东亚战争肯定論」と同じになる。林はペリーの炮艦外交に脅されて日本は开国したが、その肋威・恫喝に対する民族的反抗、つまり「百年戦争」が大东亚戦争であると主張し、肯定したのである。しかし外圧といっても、主観的外圧と客観的外圧の二つがある。ペリー来航に当たってペリー艦隊と折衝した幕府役人は、いまにも炮击にさらされるかもしれないという恐怖に怯えた。だがペリー提督はフィルモア大統領から大砲を撃つことを禁じられており、两国の間で戦争がおこる可能性は、きわめて低かった。事実、日米和亲条約は一発の銃声を聞くこともなく、実現したのである。

だが林房雄の「大东亚战争肯定論」は、主観的外圧と客観的外圧を区別することなく、いわば日本側の恐怖心(主観的外圧)を強調することにより、「百年戦争」としての大东亚戦争を日本の運命の必然として、肯定したのであった。

これと同じように司马には主観的外圧を強調する傾きが強い。『坂の上の云』で、司马は、日露戦争は「祖国防卫戦争である」というテーゼを繰り返し書くが、それは私のいう「主観的外圧」論と不可分の関係にあるのである。ただし司马は林房雄と違って、「大东亚戦争」を「自卫とアジア解放」の戦争とは見ない。むしろ「大东亚戦争」はアジアに対する侵略戦争であったという。

2. 明治維新と自由民権運動

明治維新とは1853年のペリー来航（开国）から1877年の西南戦争までを指す。最近（2000年代）の幕末維新研究は、羽仁五郎⇒井上清⇒芝原拓自へと系がる研究史とは全く違う明治維新像を描き出している。とくに注目したいのは、幕府役人の外交能力を高く評価し、アメリカから威圧的な「炮艦外交」に直面しながら、巧みに民族的独立を守ったという。また著名な歴史家・服部之总の言うように、「攘夷運動の实践」ではなく、「攘夷運動の突然の停止」こそが植民地化の危機から日本を救出したというのである（攘夷主義から开国主義への素早い转换、石井寛治『日本経済史』东京大学出版会、1991年）。

明治維新の課題は、殖産兴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の3つであったが、欧米の経済发展、军事力、铁道・电信などの文明の摄取と思想・教育制度の导入などによって、急速に「近代化」をなし遂げた。司马辽太郎の明治維新观は、ほぼこれ（アメリカ人学者・ロストウ、ライシャワーらの近代化论）に近く、「日本はアジアで唯一近代化に成功した国」という評価と一致した。司马の『龙马がゆく』は、土佐藩下级武士の坂本龙马を主人公に、幕府を倒し、近代的国民国家を树立する若者の群像を描いて、数百万の读者を獲得した。この小说は日本の高度成长の绝顶期と重なっており、大企業や中小企業の经营者や中坚サラリーマン、大学生たちに勇气と自信を与えた。

だが、実際に出来上がった維新政权は、萨长藩閥中心の有司（官僚）专制の政权であった。著名な自由民権家・植木枝盛（Ueki Emori）は次のように述べている（「明治第二の改革を希望するの论」1877年）。

明治維新は第一の変革であったが、それは政府と政府の変換、つまり治める者との政权移动にすぎなかった。だから第二の変革を行なって、独裁の政体から立宪の政体へ转换せしめ、人民が政权を握り、人民の利益・幸福・权利・自由を扩张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いう。この自由民権运动に直面して、萨長の藩閥官僚势力は「明治14年（1881）政変」で、イギリス的议会制度を构想していた大隈重信（大藏卿、大臣の呼称は明治19年から）を阁外に追放して、プロシヤ型の政治体制の构筑に向かった。

日本では明治宪法を指して、绝对主义的宪法あるいは近代的立宪主义宪法という相对立する见解があるが、私の考えによれば、明治宪法はイタリアの代议制的君主政（*monarchia rappresentativa*）とロシアの无制限专制君主制（ツァーリ体制）の中间に位置する近代的专制の一形态（立宪的专制）である。したがって私は「明治維新は未完の近代革命」であると规定してきた（中村政则「明治維新の世界史的位置—イタリア、ロシア、日本の比较史」中村編『日本の近代と资本主义』东京大学出版会、1992年）。

明治宪法第1～3条は、天皇の万世一系性、世袭主义、神圣不可侵性をかかげ、天皇の绝对主义的性格を明确にした。だが他方で明治宪法は、ごく狭い范围にせよ国民の参政权を認め、议会に予算审议权と立法权の一部を認めた。また第4条では「天皇ハ国ノ元首ニシテ统治权ヲ总揽シ此ノ宪法ノ条规ニ依リ之ヲ行フ」と规定されている。第4条は天皇主权を否定しないが、君主权が宪法によって制限されているとみてよい。後年、この第4条を根据に宪法学者・美浓部达吉が天皇机关说（天皇を绝对君主ではなく、「机关」とみる

民主主義的解釈)を主張したことはよく知られる。自由民権運動は敗北に終わったとはいえ、明治憲法の立憲主義的解釈を可能にさせるような条項を憲法に中に盛り込ませたのである。また国民の働きかけいかんによっては、その専制的性格に一定の変更を迫りうるような可能性(大正デモクラシー、普通選挙制度など)をのちの時代に残したのである。そして翌1890年に国会が開設された。初期議会には、伊藤博文ら藩閥官僚の予想に反して、民権派が多数出席し、民力休養、経費節減を主張し、藩閥政府に対抗した(第四議会まで)。その意味で、1889~90年は日本における国民国家の成立を画す重要な転機となった。

3. 日清戦争

日清戦争(1894~95)は、日本が明治維新以来初めて経験した近代的対外戦争であった。日清戦争は、「最後まで最も強く宗属関係をもっていた朝鮮のそれを日本がたちきった戦争だった」(井口和起『日露戦争の時代』吉川弘文館、1998)、換言すれば朝鮮を日本の支配下に置くことを目的とした侵略戦争であった(原田敬一『日清・日露戦争』岩波新书、2007)。当時、アジア世界では中华帝国を中心とする華夷秩序(冊封体制)が支配しており、朝鮮は清国の意思を無視して独自の軍事・外交政策を展開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陸奥宗光外相、川上操六参謀次長は开战に積極的な强硬派で、清国からの朝鮮の独立を名目に朝鮮半島への出兵の機会をねらっていた。

1894年8月1日、「朝鮮の独立を守り、東洋平和を維持する」を目的とする明治天皇の「清国ニ対スル宣戦ノ詔」が出された。だが7月25日、日本艦隊の軍艦数隻は宣戦布告をまたずに仁川港外丰岛沖で清国軍艦と交戦し、清国巡洋艦を降伏ないし自沈に追い込んだ。その2日前、日本軍はソウルの朝鮮王宮を占領し、抵抗する国王を事実上捕虜にした。参謀本部の公式の日清戦争史(『明治廿七八年日清战史』1904)は、この事実に触れていないが、近代史家の中冢明が福島県立図書館の佐藤文库の資料により、その真相を明らかにした(『歴史の偽造をただす』高文研、1997年)。日本の政府・軍部の侵略性は明らかである。

だがこれに対し、司馬は陸奥宗光・川上操六らが戦争を主導したことを認める一方で、こう書く。「そろそろ戦争の原因にふ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原因は朝鮮にある。といっても、韩国人や韓国に罪があるのではなく、罪があるとすれば、朝鮮半島という地理的存在にある」(第一巻、241頁)。

要するに、朝鮮半島の位置が悪いというのである。この地政学的説明を読んだとき、私はまっさきに「これでは、朝鮮人はたまらないし、怒るだろうな」と思った。この地政学的アプローチというものは、ヒトラーなどファシスト国の指導者が、ポーランドなど近隣

諸国を侵略したさいに、侵略を合理化する論理として用いたものである。司馬はこうも

いう。

「韓国自身どうにもならない。李王朝はすでに五百年もつづいており、その秩序は老化しきっているため、韓国自身の意思と力でみずからの運命をきりひらく能力は皆無とってよかった」（第一巻、二四二頁）。これも朝鮮人の主体性を無視した書き方で、この当時の韓国人の独立協会運動や義兵斗争に触れようとはしない。清国に対しても、著者は似たようなことを書いている。

「要するに日清戦争は、老朽しきった秩序（清国）と、新生したばかりの秩序（日本）とのあいだでおこなわれた大規模な実験というような性格をもっていた」（第一巻、309頁）。日清戦争当時、清国には統一された国民意識はなかったが、日本人に国家と国民というものはどういうものであるかを一挙に実物教育した（第1巻、287頁）。

日清戦争は一年足らずで終わり、下関条約で日本は辽东半島、台湾、澎湖諸島を割譲させ、賠償金2億両（テール）を得た。日本はアジアで最初の帝国主义国（植民地領有国）となった。

日清戦争勝利後、日本国民の天皇制と軍部に対する亲近感が一層強まり、逆に中国人、朝鮮人への蔑視意識が強まった。日本のナショナルヒストリーの中核に天皇制が置かれ、天皇制イデオロギーが日本国民を捕えていった。天皇制ぬきのナショナルヒストリーはないのである。

4. 日露戦争

1895年4月、ロシア、ドイツ、フランスの3国が、下関条約で日本が得た辽东半島を清国に返還せよと勧告した（三国干渉）。日本は軍事的に対抗しても、これら列強との戦争に勝つ自信はなかった。日本政府・軍部は一種の政治的恐怖に陥った。著名な言論人・徳富蘇峰が三国干渉のとき、「精心的にほとんど別人になった」と述べ、平民主義者から国粹主義に転向したことはよく知られる（『蘇峰自伝』）。世界は弱肉強食の論理が支配する帝国主义の時代に突入したのである。

三国干渉以後、政府も国民も「卧薪尝胆」を合言葉に、ロシアとの戦争に備えた。中国では腐敗した清国政府と欧米列強の中国分割に反対する義和団の民众蜂起が起こった。1900年には勢力を広げ鉄道を破壊し、教会を焼き、北京の外国公使館を包囲した。列強が動いた。米・英・仏・独・露・日本など八か国連合軍は反乱を鎮圧する一方で、北京を占領して清国政府を降伏させた。このとき日本は連合軍兵力の3分の2にあたる2万2000名を送り込み、その主力となった。日本がイギリスなど欧米列強から「極東の宪兵」としての地位を認められたのは、このときの「功績」による。

開戦外交

日清戦争が朝鮮をめぐる清国との戦争だったのに対し、日露戦争は朝鮮と満州をめぐるロシアとの戦争であった。戦死者の数は約8万人で日清戦争の8倍、戦費は約19億圓で、日

清戦争の約20倍であった。他方、ロシアの戦死者は約11万5000、戦費は約22億圓であった。両国とも経済力を上まわる規模の戦争であり、奉天会戦のころには机关銃、炮弹が不足し、両軍内部に厌戦気分が広がった。こうした中で、セオドア・ルーズベルト米大統領の斡旋で、日露講和（ポーツマス条約）が締結された。

开战原因について、司马辽太郎はロシア（ニコライ二世）が八分、日本が二分と述べていた。あるいは、「ロシアは後世の史家がどう弁解しようと、極東に対し、濃厚すぎるほどの侵略意図をもっていた」という（第2巻、259頁）。

だが最近の日本外交史や日露戦争史では、ロシアの侵略性をこれほど過度に強調はしない。そのポイントだけを紹介すれば、ロシアには日露戦争を断固主張する强硬派はいなかった。たしかにニコライ二世は、日本を猿（マカーキ）と呼び、野蛮な国といった。この遅れた民族がヨーロッパ最大の陸軍大国ロシアに戦争を仕掛けてくる力はない、と見ていた。ニコライ二世のほかに、アレクセーエフ極東总督、ベゾブラゾフ宫廷顧問官、ラムズドルフ外相、クロバトキン陸相などの主戦派、非戦派のウィッテ蔵相などに分かれ、必ずしも統一した国家意思があるわけではなかった。ロシア史の専門家和田春樹によれば、日本との戦争をのぞむ「信念を持った强硬派はいなかった」という。（和田「日露戦争—开战にいたるロシアの動き」『ロシア史研究』2006年5月）。結局、1903年8月に比較的穏健（慎重）と言われたクロバトキン陸相とウィッテ蔵相が失脚した。これにより皇帝ニコライ二世の専制権力は強められ、側近のベゾグラゾフを中心に、積極的な対日政策が決まったのである（山田朗『世界史の中の日露戦争』吉川弘文館、2009年）。

ロシア側は、戦力において大差のある日本陸海軍が、よもや开战に踏み切ることあるまいと高をくくっていた節がある。他方、日本側も山县有朋、大山岩、儿玉源太郎ら陸軍首脳や小村寿太郎などは、开战を主張したが、ロシアに勝てるとは思っていなかった。

1903年6月23日、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大山岩、松方正義、井上馨の五元老と桂首相、寺内正毅陸相、山本权兵衛海相、小村寿太郎外相の四閣僚が集まった御前会議で決まったのは、（1）清韓両帝国の独立および領土保全を尊重すること、（2）ロシアは韓国における日本の優勢なる利益を承認すること。そのかわり日本はロシアの満州における鉄道経営の特殊利益を承認する、というものであった。

以後の交渉は、満州問題と朝鮮問題を軸に進むが、その過程を逐一追う余裕はない。

要するに、日露の争点は、満州におけるロシアの利益をどこまで認めるか、逆にロシアは朝鮮半島における日本の利益を、鉄道建設や商業圏に限定するか、軍事的使用を認めるか否かなどで争ったわけで、ギリギリの最終段階にあっては、ニコライ二世は日本側提案の「満韓交換」を認めるところまで行ったのである。この全交渉過程で、結局最後まで揉めたのは、韓国に対する「占専権」であった。

経済史家の石井寛治は、日本側が日露开战に踏み切った最大の理由は、韓国における利権であったという。利権の中心は鉄道や銀行への投資であり、釜山、元山、ソウルなどの居留地の日本人数も1895年の1万人台から日露开战の前年（1903年）には3万人弱へと急増していた。日清戦争の時代と違って、日本の海外における利権は、はるかに拡大していた（『日本の産業革命—日清・日露戦争から考える』朝日選書、1997）。

それに加えて、私のいう主観的外圧論に日本政府も民众も引きずられた。つまり日露戦

争は相互の認識が食い違ったまま、戦争に突入したのである。ロシア側は日本の軍事力を植民地程度のもつと見くびり、かつロシア上层部の統帥も分裂していた。日本は日本で、ロシア内部の統帥の分裂状態を知らず、巨大な熊がいまにも襲いかかってくるようなイメージを抱いていた。それゆえに日本はロシアの戦争体制がととのう前に、陸と海から先制攻撃をかけ、緒戦で優位に立つ作戦をとったのである（陸軍の仁川上陸、海軍の旅順港攻撃）。このイメージギャップは、开战意思をきめ、戦争を長引かせる要因となった。つまり私のいう主観的外圧が客観的外圧を圧倒し、両国の政治指導者・軍部や国民を巻き込んでいったのである。

世論の構造

また当時の世論は日露开战に沸騰していたと考えられがちであるが、子細に見ると、もっと複雑であった。世論にも強硬論と非戦論があり、陸軍内部にも开战に消極的な高級将校と主戦派の中堅将校との違いがあった。日本の新聞も、ロシア内部に統帥の分裂があることは知らず、ロシアが満洲に居座り続け、今にも戦争が起こりそうな報道を流していた。とくに、1903年4月8日、ロシアは（満洲撤兵条約で約束した）二度目の撤退期限が来ても、ロシアは満洲から撤退しなかったし、1903年5月には、韓国北方（鴨緑江口）の龍（りゅう）岩（がん）浦（ぼ）を軍事的に占拠する事件があった。これに対し、『時事新報』ほか多くの新聞は龍岩浦事件を何回も取り上げ、戦争の危機を訴えた（誤報。実際は森林伐採権を得ただけ）。同事件をきっかけに、それまで非戦論を唱えていた『万朝報』も开战論に転じた。『万朝報』が主戦論にかかわると、幸徳秋水、堺利彦らは退社し、『周間平民新聞』を出し、社会主義の立場から戦争反対の論陣を張った。日清戦争のときは「義戦」と称していた内村鑑三も『万朝報』を辞め、キリスト教の立場から非戦論を主張した。

同年6月10日には東京帝大法科大学教授の戸（と）水（みづ）寛（ひろ）人（んどら）七博士が桂首相と会い、政府の弱腰を痛論し、「戦略战术からみてもいま起ちあがらねば战机を逸します」と、軍事専門家のようなことをいった。

1903年8月、韓国は局外中立を宣言、清国も翌年2月12日に局外中立を宣言したが、日露両政府とも自国の都合で交渉を進めた。戦争となれば、満洲と朝鮮が戦場となることは目に見えていたが、清、韓二国の意思が無視され続けたところに日露戦争の本質があった。

だが他方で、政府・軍部と世論との関係は、かならずしも一蓮托生というものではなかった。日露开战（宣战布告）の翌日、原敬（のち首相）は、日記（1904年2月11日）に次のように記している。

「我国民の多数は戦争を欲せざりしは事実なり。政府が最初七博士をして露国讨伐論を唱えしめ、また対露同志会などを組織せしめて頻（しき）りに強硬論を唱えしめたるは、かくしてもって露国を威圧し、因（よつ）てもって日露協商を成立せしめんと企てたるも、意外にも开战に至（つ）てしまった）。しかして一般国民、なかんづく実業者は最も戦争を厭（いと）うも、表面これを唱うる勇氣なし。かくのごとき次第にて国民心ならずも戦争に馴致（じゅんち）せしものなり」。

当時財界は、日露戦費のために税負担が増大しており（軍事公債割当、非常特別税の創設、米糶輸入税の増額など）、开战に消極的ないし反対であった。

日露开战外交を詳細に研究した千叶功『旧外交の形成』（勁草书房、2008）によると、当時陆军参谋本部員だった福田雅太郎少佐は、のちに次のように回想している。

「其当時、陆军部内に於ても、議論が様々であつて、中には露西亚に対して戦を挑んでも勝算は無いと見て居る人が尠（すく）なくなかつた。高级将校即ち将官以上の方々には、斯う云うつては如何かと思ふけれども、到底露西亚に対して戦争は出来ないといふ主義の人が多かつたのである。唯中佐、少佐即ち参谋本部なり、陆军省なりの中堅に居る所の青年将校は、悲憤慷慨の余り、或は余り激烈であつたかも知れぬけれども、开战论者が多かつたのである」（同書116頁）。

相互イメージ

以上みてきたように、日露戦争をめぐる世論は決して一枚岩ではなく、また日露双方とも相手に対する認識ギャップがあった。このイメージ・ギャップは开战意思を決めるとともに、开战以後も戦争を長引かせる要因となった。つまり私のいう主観的外圧が客観的外圧を圧倒し、実際の危機以上の危機感を、国民のなかに増幅させたのである。

1980年代に、アメリカではmutual images（相互イメージ）の研究が盛んになるが、1941年12月の日米戦争前後に、米国のメディアは日本人を眼鏡をかけた猿のように描き、日本はアメリカ人を鬼畜生のようにイメージした（鬼畜米英）。双方互いに相手国を一枚岩のイメージで敵への憎しみを掻き立てたのである。これが日米戦争への動きを加速させた。ジョン・ダワーの『容赦なき戦争』（War without mercy）は、この問題を解明していて参考になる。

ちなみにブッシュ政権は「サダム・フセインが大量破壊兵器を所持している」とみて（のちCIAの誤認とわかった）、バクダッド攻撃に出たが、のち国連査察団が調査に入ったとき、フセインが大量破壊兵器をもつ証拠はなんら見つからなかった。要するに、当事国同士が相手国をどう見るかは、外交関係や戦争の帰趨を決める大問題なのである。現在では北朝鮮の金正日政权をどう見るかをめぐって世界的にもホットな議論が続けられているが、どれが本当でどれが過大宣伝なのか、紛らわしい。

日露戦争のときも同じで、対露同志会、「七博士」、陆军中堅将校などが、开战を煽り、新聞・雑誌がその傾向に拍車をかけた。

日本ではmutual images研究は立ち遅れているが、最近、姜徳相編『錦絵の中の朝鮮と中国』（岩波書店、2008）が、今後の研究への手掛かりを与えている。今後の研究の発展に期待したい。

結 論

『坂の上の云』は、現在、日本における最大のナショナルヒストリーである（戦前では吉

川英治の『宮本武蔵』が最大のナショナルヒストリーであった)。ここでもう一度、司馬の主張をふり归ってみよう。

日露戦争は侵略的なロシアに対する「祖国防衛戦争」であり、戦争はきわどい勝利であったが、アジアの黄色人種が白人帝国主義を打ち破った最初の戦争であった。この勝利は山县有朋、伊藤博文、大山岩、东乡平八郎など政治家・军人のリーダーシップが優れていたためであるが、地方出身の若い知識人・学生達が献身的に国家に忠誠を尽くしたことにある。世界最強のロシア・コサック騎兵隊を打ち破った秋山好古、バルチック艦隊を全滅させた秋山真之の兄弟は、若い明治の青春を代表しており、まさしく「坂の上の云」を目指して、奋斗した(もう一人の主人公・正岡子規は1902年に死去し、日露戦争は知らない)。

だが他方で、この作品は中国、朝鮮などが日清・日露戦争で被った被害については、ほとんど語らない。これが同書の最大の弱点であることは否定できない。

2009年11月から放映される『坂の上の云』を担当したNHKプロデューサーは、記者の質問に答えて「いま閉塞状況にある若者たちに対し、明治日本にもこういう元気の出る物語があったことを知って欲しいし、元気を出して欲しい」と、この番組の意図を述べている。放映が始まれば、おそらく数百万人の視聴者がテレビに惹きつけられるはずである。3年間、13回にわたって放映される『坂の上の云』が「日本海海戦」で終わっていることは、日本人のナショナリスチックな感情を高めるのに役立つに違いない。

では戦争に負けたロシア、あるいは戦争の舞台となった朝鮮や中国のナショナルヒストリーはどのような内容になるであろうか。この問題を突き詰め、話し合うことは、学問的にも意義のあることである。ナショナルヒストリーはナショナル・インタレストが絡むだけに、史実を踏まえた冷静な議論が必要である。

今回の国際会議が実りある成果を上げることを期待したい。

(本稿は「韓国并合100周年記念国際シンポジウム」2009年10月6日、ソウル開催)の報告原稿である)。

러일전쟁과 내셔널 히스토리

나카무라 마사노리 (一橋大)

〈목 차〉

- 시작하며
 1. 『언덕 위의 구름』이란 무엇인가
 2. 메이지 유신과 자유민권운동
 3. 청일전쟁
 4. 러일전쟁
 결론

시작하며

내셔널 히스토리라는 말을 일본어로 번역하면 ①국가사(國家史), ②국민사(國民史) 두 가지로 번역할 수 있다. 국가사는 국가라는 제도·기구 측면에 초점을 맞춘 경우이며, 국민사는 국민이 국가를 지탱하거나 저항하는 측면을 중시한 표현이다. 그렇기 때문에 내셔널 히스토리를 테마로 하는 경우, ‘위에서’와 ‘아래에서’ 접근할 필요가 있다.

일본에 있어서의 내셔널 히스토리는 1900년대, 즉 청일전쟁과 러일전쟁 사이에 ‘완성’되었다. 내셔널 히스토리는 산업혁명, 제국주의, 국민국가의 형성과 병행하여 만들어졌다. 국민국가의 경제적인 기초는 산업혁명이며, 제도적으로는 헌법의 형성, 국회의 개설, 국어(표준어로서의 일본어, 메이지(明治) 30년대, 1900년 전후)의 성립과 불가분의 관계에 있다.

바꿔 말하면 (1) 메이지 유신, (2) 자유민권운동, (3) 청일·러일전쟁의 3단계를 거쳐 일본의 국민국가(國民國家)는 성립되었다. 이 과정에서 내셔널리즘이 강화되어 대외 팽창적·제국주의적 군사·경제·정치·교육(국가주의적 멘탈리티)이 성립된다.

이 테마를 시대소설로 그려낸 작품이 시바 료타로(司馬遼太郎)의 『언덕 위의 구름』(단행본 전6권, 1968~1971)이다. 본 소설은 수백만의 독자 층을 확보하고 있어서 2009년 11월부터 3년간에 걸쳐 NHK에서 방영될 예정이다. (2012년까지 총 13회 방영) 본 프로그램은 ‘쓰시마 해전’을 마지막으로 끝날 예정이라 버블 붐과 이후 폐색감이 짙어지는 사회 분위기 속에 있는 일본인들에게 활력을 주어 내셔널리즘을 부채질할 가능성이 있다.

1. 『언덕 위의 구름』이란 무엇인가

본 소설은 청일·러일전쟁을 소재로, 그 속에서 언덕 위에 빛나는 한 떼의 구름을 바라보면서 일심불란히 언덕을 올라가는 젊은이들의 청춘 이야기를 그린 작품이다. 또한 메이지 유신, 청일전쟁, 러일전쟁이란 무엇인지를 생각하게 하는 역사소설이며, 결국은 국가란 무엇인지, 일본인이란 무엇인지에 대해 계속 질문을 던지는 작품이다. 작품의 대상은 매우 넓어 전쟁·군인·교육·시대의 정신적인 분위기(에토스)에서부터 등장인물의 개인적인 성격에까지 이른다. 어떤 때에는 ‘여담이지만’ 등의 삽입구를 넣어 제국주의, 산업혁명, 국민국가, 유럽, 아시아에 걸친 세계정세를 기술하기까지에 이른다.

그 속에서 내가 주목하는 부분은 외압의 문제이다.

시바 료타로에 의하면 러시아는 18세기 이후 만주·조선을 자기 지배 하에 두고자 하는 야망을 가지고 있었다. 기회만 있으면 일본을 점령하여 지배하고 싶어했다. 이에 대해 일본은 대러시아 공포로 두려워하여 반감을 가지고 있었다고 한다. 시바 료타로는 러시아의 발틱 함대를 전멸시킨 도고 헤이하치로(東郷平八郎)의 수석참모인 아키야마 사네유키(秋山真之)를 통해 이렇게 이야기하고 있다.

“일본이란 나라는 비통한 나라라네” 라고 사네유키는 말했다. (일본은 농업 외에는 제대로 된 산업도 없는 형편에) 유럽의 일류국과 같은 수준의 해군을 만들려 하고 있다. “그것도 초일류의 군함을 갖추고 싶어하네” 라고 사네유키는 말했다. “그 에너지의 하나는 공포다. 외국이 침략해 올지도 모른다는 공포가 메이지 유신을 일으켰고, 유신 후에는 이러한 해군을 보유하게 되었다 (생략).” 단행본 『언덕 위의 구름』 제2권)

내 판단에는 이 문장 안에 『언덕 위의 구름』의 핵심이 있다. 즉, 메이지 시대의 정치, 군사, 교육, 에토스 그리고 내셔널리즘도 이 외압(외국이 침략해 올지도 모른다는 공포)에 유래한다는 것이다. “한반도는 일본의 옆구리에 꽂힌 칼날이다” 라는 말도 마찬가지다.

그러나 이는 자칫 한 발이라도 잘못 디디게 되면 하야시 후사오(林房雄)의 ‘대동아전쟁 긍정론’과 같아진다. 하야시는 일본이 페리의 포함외교에 위협당해 개국했지만, 이러한 위협에 대한 민족적 반항, 즉 ‘백년전쟁’이 대동아전쟁이라고 주장하며 긍정적인 것이다. 그러나 외압이라고 해도 주관적인 외압과 객관적인 외압의 두 가지가 있다. 페리 내항에 즈음하여 페리 함대와 절충한 막부 관리들은 당장에라도 포격에 휩싸일지 모른다는 공포에 떨고 있었다. 그러나 페리 제독은 필모어 대통령으로부터 대포

발사 금지 명령을 받고 있어서 양국간에 전쟁이 발발할 가능성은 극히 낮았다. 사실 미일화친조약은 한 발의 총성도 울리지 않고 실현된 것이다.

그러나 하야시 후사오의 ‘대동아전쟁 긍정론’은 주관적 외압과 객관적 외압을 구별하지 않고, 소위 일본 측의 공포심(주관적 외압)을 강조함으로써 ‘백년전쟁’으로서의 대동아전쟁을 일본의 필연적인 운명으로 긍정했던 것이다.

이와 마찬가지로 시바 료타로에게는 주관적 외압을 강조하는 경향이 강하다. 『언덕 위의 구름』에서 시바 료타로는 러일전쟁은 ‘조국방위 전쟁이다’라는 테제를 반복해서 쓰지만, 이는 내가 말하는 ‘주관적 외압’론과 불가분의 관계에 있다. 단, 시바 료타로는 하야시 후사오와는 달리 ‘대동아 전쟁’을 ‘자위와 아시아 해방’의 전쟁으로는 보지 않는다. 오히려 ‘대동아전쟁’은 아시아에 대한 침략전쟁이었다고 한다.

2. 메이지 유신과 자유민권운동

메이지 유신이란 1853년의 페리 내항(개국)으로부터 1877년의 세이난전쟁(西南戰爭)까지를 가리킨다. 최근(2000년대)의 막부 말기 유신연구는, 하니 고로(羽仁五郎) ⇒ 이노우에 기요시(井上清) ⇒ 시바하라 다쿠지(芝原拓自)로 이어지는 연구사와는 전혀 다른 메이지 유신상을 그리고 있다. 특히 주목하고자 하는 부분은 막부 관리의 외교능력을 높이 평가하여 미국의 외압적인 ‘포함 외교’에 직면하면서도 능란하게 민족적 독립을 지켰다고 하는 부분이다. 또 저명한 역사가인 핫토리 노후사(服部之總)가 말하는 것처럼 ‘양이 운동의 실천’이 아니라 ‘양이 운동의 갑작스런 정지’야말로 식민지화의 위기에서 일본을 구했다는 것이다. (양이주의에서 개국주의로의 신속한 전환, 이시이 간지(石井寛治) 『일본경제사』 도쿄대학 출판회, 1991년)

메이지 유신의 과제는 식산흥업·부국강병·문명개화로 세 가지였지만, 구미의 경제발전, 군사력, 철도·통신 등의 문명 수용과 사상·교육제도의 도입으로 인해 급속하게 ‘근대화’를 이룩했다. 시바 료타로의 메이지 유신관은 거의 이에(미국인 학자 로스토 라이샤워 등의 근대화론) 가까워, ‘일본은 아시아에서 유일하게 근대화에 성공한 나라’라는 평가와 일치한다. 시바 료타로의 『료마가 간다』는 도사변 하급무사인 사카모토 료마(坂本竜馬)를 주인공으로, 막부를 타도하고 근대적인 국민국가를 수립하는 젊은이의 군상을 그려 수 백만의 독자를 사로잡았다. 이 소설은 일본의 고도성장 절정기에 나와 대기업과 중소기업 경영자, 중견 샐러리맨, 그리고 대학생들에게 용기와 자신감을 주었다.

그러나 실제로 완성된 유신 정권은 사쓰마·조슈 한바쓰(藩閥: 메이지 유신 때 공을 세운 번 출신의 유력자들이 만든 정치적인 파벌) 중심의 유사(관료) 전제 정권이었다. 저명한 자유민권가인 우에키 에모리(植木枝盛)는 다음과 같이 기술하였다. (「메이지 제2의 개혁을 희망하는 론」 1877년)

메이지 유신은 제1의 변혁이었지만 이는 정부와 정부의 변환, 즉 통치하는 자 사이의 정권이동에 불과했다. 그렇기 때문에 제2의 변혁을 이루어 독재정체에서 입헌정체로 전환시켜 인민이 정권을 잡아 인민의 이익·행복·권리·자유를 신장해야 한다고 했다. 이러한 자유민권운동에 직면하여, 사쓰마·조슈 번 한바쓰 관료 세력은 ‘메이지 14년(1881) 정변’을 통해 영국식 의회제도를 구상하고 있던 오쿠마 시게노부(大隈重信: 대장경, 대신의 호칭은 메이지 19년부터)를 내각 밖으로 추방하고 프러시아식의 정치체제를 구축해 나갔다.

일본에서는 메이지 헌법을 둘러싸고 절대주의적 헌법 혹은 근대적 입헌주의 헌법이라는 서로 대립되는 견해가 있지만, 내 생각에 메이지 헌법은 이탈리아의 대의제적 군주정(monarchia rappresentativa)과 러시아의 무제한 전제군주제(차르 체제)의 중간에 위치하는 근대적 전제의 한 형태(입헌적 전제)이다. 따라서 나는 ‘메이지 유신

은 미완의 근대 혁명'이라고 규정해 왔다. (나카무라 마사노리 「메이지 유신의세계사적 위치-이탈리아, 러시아, 일본의 비교사」 나카무라 편 『일본의 근대와자본주의』 도쿄대학 출판회, 1992년)

메이지 헌법 제1~3조는 천황의 만세일계성, 세습주의, 신성불가침성을 내걸어 천황의 절대주의적 성격을 명확히 했다. 그러나 한편으로, 메이지 헌법은 매우 좁은 범위인 국민 참정권을 인정하여 의회에 예산심의권과 입법권의 일부를 인정했다. 또 제4조에서는 '천황은 나라의 원수로서 통치권을 총람하여 이 헌법의 조규에 의거하여 이를 행한다.'로 규정되어 있다. 제4조는 천황주권을 부정하지는 않지만 군주권이 헌법에 의해 제한되어 있다고 봐도 좋다. 후에 이 제4조를 근거로 헌법학자 미노베 다쓰키치(美濃部達吉)가 천황기관설(천황을 절대군주가 아니라 '기관'으로 보는 민주주의적 해석)을 주장한 사실은 잘 알려져 있다. 자유민권운동은 패배로 끝났다고는 하나, 메이지 헌법의 입헌주의적 해석을 가능하게 할 수 있는 조항을 헌법 안에 포함시켰던 것이다. 또한 국민의 요구 여하에 따라서 전체적 성격에 일정한 변경을 강요할 수 있는 가능성(다이쇼 데모크라시, 보통선거제도 등)을 후세에 남긴 것이다. 그리고 다음해인 1890년에 국회가 개설되었다. 초기 의회에는 이토 히로부미(伊藤博文) 등의 한바쓰 관료의 예상과는 반대로, 민권파가 다수 의석을 확보하여 민력휴양(民力休養), 경비절감을 주장하여 한바쓰 정부에 대항했다. (제4 의회까지) 그런 의미에서 1889~90년은 일본에 있어서 국민국가의 성립에 획을 긋는 중요한 전기가 되었다.

3. 청일전쟁

청일전쟁(1894~95)은 일본이 메이지 유신 이래 처음으로 경험한 근대적인 대외전쟁이었다. 청일전쟁은 '최후까지 가장 강력한 종속관계를 가지고 있었던 조선의 그것을 일본이 끊은 전쟁이었다.' (이구치 와키(井口和起) 『청일전쟁의 시대』 요시카와코분칸(吉川弘文館), 1998), 바꿔 말하면 조선을 일본의 지배 하에 두는 것을 목적으로 한 침략전쟁이었다. (하라다게이이치(原田敬一) 『청일·러일전쟁』 이와나미신쇼(岩波新書), 2007) 당시 아시아에서는 중화제국을 중심으로 한 화이질서(책봉 체제)에 의해 지배되고 있어서 조선은 청국의 의사를 무시하고 독자적인 군사·외교정책을 전개할 수 없었다. 무쓰 무네미쓰(陸奥宗光) 외무대신, 가와카미 소로쿠(川上操六) 참모차장은 개전에 적극적인 강경파로 청국으로부터의 조선 독립을 명목으로 한반도 출병 기회를 노리고 있었다.

1894년 8월1일, '조선의 독립과 동양 평화 유지'를 목적으로 하는 메이지 천황의 '청국에 대한 선전의 조칙'이 나왔다. 그러나 7월25일, 일본 함대의 군함 몇 척은 선

전포고를 기다리지 않고 인천항 밖의 풍도 앞바다에서 청국 군함과 교전하여 청국 순양함을 항복 혹은 침몰시켰다. 이 풍도 해전 이틀 전에 일본군은 서울에 있는 조선 왕궁을 점령하여 대항하는 국왕을 사실상 포로로 삼았다. 참모본부의 공식적인 청일 전쟁사(『메이지27~28년 청일전사』 1904)에서는 이 사실을 언급하고 있지 않지만, 근대사가인 나카쓰카 아키라(中塚明)가 후쿠시마 현립 도서관에 있는 사토분코(佐藤文庫)의 자료를 근거로 이러한 진상을 명백히 밝혔다. (『역사의 거짓을 바로잡다』 고분켄(高文研), 1997년) 일본 정부·군부의 침략성은 명백하다.

그러나 이에 대해 시바 료타로는 무쓰 무네미쓰·가와카미 소로쿠 등이 전쟁을 주도한 사실을 인정하는 한편 이렇게 썼다. ‘슬슬 전쟁의 원인에 대해 언급해야 한다. 원인은 조선에 있다. 그렇다고는 해도 한국인이나 한국에 죄가 있다는 것이 아니라, 죄가 있다면 한반도라는 지리적 존재에 있다’ (제1권, p. 241)

요컨대 한반도의 위치가 나쁘다는 것이다. 이 지정학적 설명을 읽었을 때, 나는 이런 식의 명으로는 한국인은 참을 수도 없으며 화가 치밀 거라는 생각이 곧바로 들었다. 이 지정학적 접근이라는 것은 히틀러 등 파시스트 국가의 지도자가 폴란드 등의 근린국가들을 침략했을 때 침략을 합리화하는 논리로 이용한 것이다. 시바 료타로는 이렇게도 말했다.

‘한국 자신도 어쩔 도리가 없었다. 이씨 왕조는 이미 오백 년이나 계속되어 질서가 완전히 노화되었기 때문에, 한국 자신의 의사와 힘으로 스스로의 운명을 개척할 능력은 전혀 없다고 봐도 되었다.’ (제1권, p. 242) 이 또한 조선인의 주체성을 무시한 저술 방법으로, 당시 한국인의 독립협회운동이나 의병투쟁에 대해서는 언급하려 하지 않았다. 청국에 대해서도 저자는 비슷한 내용을 썼다.

‘결국 청일전쟁은 완전히 노후된 질서(청국)와 새롭게 막 탄생한 질서(일본) 사이에서 행해진 대규모 실험과 같은 성격을 지니고 있다.’ (제1권, p. 309) 청일전쟁 당시에 청국에는 통일된 국민의식은 없었으나, 일본인은 국가와 국민이 무엇인지에 대해 단번에 실물교육을 받았다. (제1권, p. 287)

청일전쟁은 일년도 되지 않아 종결되어, 시모노세키 조약을 통해 일본은 랴오둥 반도(遼東半島), 타이완, 평후 섬(澎湖諸島)을 할양 받고 배상금 2억 량(테일)을 획득했다. 일본은 아시아에서 최초의 제국주의국(식민지 영유국)이 되었다.

청일전쟁 승리 후에 일본 국민들은 천황제와 군부에 대해서는 친근감이 한층 강해진 반면, 중국인과 조선인에 대해서는 멸시 의식이 강해졌다. 일본의 내셔널 히스토리의 핵심에 천황제가 놓여 있어 천황제 이데올로기가 일본 국민을 사로잡아 갔다. 천황제 없는 내셔널 히스토리는 없는 것이다.

4. 러일전쟁

1895년 4월, 러시아·독일·프랑스의 3국이 시모노세키 조약으로 일본이 획득한 라오둥 반도를 청국에 반환할 것을 권고했다. (삼국간섭) 일본은 군사적으로 대항해도 이들 열강과의 전쟁에 이길 자신이 없었다. 일본 정부·군부는 일종의 정치적 공황에 빠졌다. 저명한 언론인 도쿠토미 소미네(徳富蘇峰)가 삼국간섭을 받았을 때, '정신적으로 거의 판사람이 되었다.'고 하여 평민주의자에서 국채주의로 전향한 사실은 잘 알려져 있다. (『도쿠토미 소미네전』) 세계는 약육강식의 논리가 지배하는 제국주의 시대로 들어선 것이다.

삼국간섭 이후, 일본 정부도 일본 국민도 '와신상담'을 구호로 러시아와의 전쟁에 대비했다. 중국에서는 부패한 청국 정부와 구미열강의 중국 분할에 반대하는 의화단의 민중봉기가 일어났다. 1900년에는 세력을 넓혀 철도를 파괴하고 교회를 불태우고 베이징의 외국공사관을 포위했다. 열강이 움직였다. 미국·영국·프랑스·독일·러시아·일본 등 8개국 연합군은 반란을 진압하는 한편, 베이징을 점령하여 청국 정부를 항복시켰다. 이 때 일본은 연합군 병력의 3분의 2에 해당하는 2만2000명을 보내 주력 병력이 되었다. 일본이 영국 등의 구미열강으로부터 '극동의 헌병'으로서의 지위를 인정받게 된 것은 이 때의 '공적'에 의한다.

개전외교

청일전쟁이 조선을 둘러싼 청국과의 전쟁이었던 것에 비해, 러일전쟁은 조선과 만주를 둘러싼 러시아와의 전쟁이었다. 전사자 수는 약8만으로 청일전쟁의 8배, 전비는 약19억 엔으로 청일전쟁의 약 20배였다. 한편, 러시아의 전사자는 약 11만 5천명, 戰費는 약 22억엔이었다. 양국 모두 경제력을 상회하는 규모의 전쟁이었으며 선양 전투 무렵에는 기관총, 포탄이 부족하여 양군 내부에 전쟁을 꺼리는 분위기가 확산되었다. 이러한 가운데 시어도어 루즈벨트 미 대통령의 알선으로 러일강화조약(포츠머스 조약)이 체결되었다.

개전 원인에 대해서 시바 료타로는 러시아(니콜라이 2세)가 80%, 일본이 20%라고 기술했다. 혹은 '후세의 역사가가 아무리 변명하려 해도 러시아는 극동에 대해 지나치게 농후할 정도로 침략의도를 가지고 있었다.'고 했다. (제2권, p 259)

그러나 최근의 일본 외교사나 러일전쟁사에서는 러시아의 침략성을 이 정도로 과도하게 강조하지 않는다. 중요 내용만을 소개하자면, 러시아에는 러일전쟁을 단호하게 주장하는 강경파는 없었다. 확실히 니콜라이 2세는 일본을 원숭이(마카키)라고 부르며 야만국이라 했다. 이 후진적인 민족이 유럽 최대의 육군대국인 러시아에 전쟁을 걸 힘은 없다고 보고 있었다. 니콜라이 2세 외에 알렉세예프 극동총독, 베조브라조프 궁정고문관, 람즈도르프 외무장관, 쿠로파트킨 육군장관 등의 주전파와 비전파(非戰派)인 위테 재무장관 등으로 나뉘어, 반드시 통일된 국가의사가 있었다고는 할 수

없다. 러시아사 전문가인 와다 하루키(和田春樹)에 의하면 일본과의 전쟁을 원하는 '신념을 가진 강경파는 없었다.'고 한다. (와다 하루키 「러일전쟁-개전에 이르는 러시아의 움직임」 『러시아사 연구』 2006년 5월) 결국 1903년 8월에 비교적 온건파(신중파)로 알려진 쿠로파트킨 육군장관과 위테 재무장관이 실각했다. 이로써 황제 니콜라이 2세의 전체권력이 강화되어 측근인 베조브라조프를 중심으로 적극적인 대일 정책이 결정되었다. (야마다 로(山田朗) 『세계사 속의 러일전쟁』 요시카와코분칸, 2009년)

러시아는 전력 면에서 큰 차이가 있는 일본 육해군이 설마 개전을 단행할 리는 없다고 일본 부분이 있다. 한편, 일본도 야마가타 아리토모(山県有朋), 오야마 이와오(大山巖), 고다마 겐타로(児玉源太郎) 등의 육군 수뇌부와 고무라 주타로(小村寿太郎) 등은 개전을 주장했지만 러시아를 이길 거라고는 생각하지 않았다. 1903년 6월 23일, 이토 히로부미, 야마가타 아리토모, 오야마 이와오, 마쓰카타 마사요시(松方正義), 이노우에 가오루(井上馨)의 다섯 원로와 가쓰라 총리, 테라우치 마사타케(寺内正毅) 육군장관, 야마모토 곤베이(山本権兵衛) 해군장관, 고무라 주타로 외무장관의 네 각료가 참석한 어전회의에서 결정된 것은 (1) 한·청 양 제국의 독립 및 영사 보전을 존중할 것, (2) 러시아는 한국에 있어서의 일본의 우세한 이익을 승인할 것. 그대신 일본은 러시아의 만주에 있어서의 철도경영에 관한 특수이익을 승인한다는 것이었다.

이후의 교섭은 만주 문제와 조선 문제를 축으로 진행되었지만 그 과정을 상세하게 살펴 볼 여유는 없다.

요컨대 일본과 러시아의 쟁점은, 만주에서 러시아의 권익을 어디까지 인정할 것인지, 반대로 러시아는 한반도에서 일본의 권익을 철도건설과 상업권에 한정할 것인지, 군사적 사용을 인정할 것인지 그 여부를 둘러싸고 맞섰던 것으로, 거의 최종단계에 이르러서는 니콜라이 2세가 일본 측 제안인 '만주와 한국의 교환'을 인정하는 데까지 간 것이다. 이 모든 교섭과정에서 결국 최후까지 옥신각신했던 것은 한국에 대한 '점령 전권(占專權)'이었다.

경제사가인 이시이 간지(石井寛治)는 일본 측이 러일전쟁을 단행한 최대의 이유는 한국에 대한 이권 때문이었다고 한다. 이권의 중심은 철도와 은행에 대한 투자이며, 부산, 원산, 서울 등에 거주하는 일본인 수도 1895년의 1만 명 정도에서 러일전쟁 발발 전년(1903년)에는 약 3만 명으로 크게 늘어났다. 청일전쟁 때와는 달리 일본의 해외에 있어서의 이권은 훨씬 확대되어 있었다. (『일본의 산업혁명-청일·러일전쟁에서 생각하다』 아사히센쇼(朝日選書), 1997)

이와 더불어 내가 말하는 주관적 외압에 일본 정부도 일본 민중도 끌려갔다. 즉, 러일전쟁은 쌍방의 인식이 다른 채로 전쟁에 돌입하게 된 것이다. 러시아 측은 일본의 군사력을 식민지 정도의 군사력으로 일본 데다 러시아 상층부의 통수도 분열되어 있었다. 일본은 일본 내에서—러시아 내부의 통수가 분열되어 있는 상황을 모르는 채—

거대한 꿈이 지금이라도 덮쳐 올 것 같은 이미지를 안고 있었다. 그렇기 때문에 일본은 러시아의 전쟁체제가 갖추어지기 전에 육지와 바다에서 선제공격을 하여 서전에서 우위에 서는 작전을 취했던 것이다. (육군의 인천상륙, 해군의 여순항 공격) 이러한 이미지 껍은 개전의사를 결정하고 전쟁을 장기전으로 끌고 가는 요인이 되었다. 즉, 내가 말하는 주관적 외압이 객관적 외압을 압도하여 양국의 정치지도자와 군부, 그리고 국민을 끌어 들였던 것이다.

여론의 구조

또한 당시 여론은 러일 개전에 대해 들끓어 올랐을 것으로 생각되는 경향이 있으나 자세히 보면 더 복잡한 양상이었다. 여론에도 강경론과 비전론(非戰論)이 있었으며, 육군내부에도 개전에 소극적인 고급장교와 주전파인 중견장교와의 사이에 껍이 있었다. 일본 신문도 러시아 내부의 통수가 분열되어 있다는 사실을 모른 채, 러시아가 만주에 계속 주둔하여 당장이라도 전쟁이 일어날 것처럼 보도를 하고 있었다. 특히 1903년 4월8일 러시아는 (만주철병조약에서 약속한) 2번째의 철수기한이 도래해도 만주에서 철수하지 않았으며, 1903년 5월에는 한국 북방(압록강 하구)의 용암포를 군사적으로 점거하는 사건이 발생했다. 이에 대해 『시사신보』 외 다수의 신문은 용암포 사건을 몇 번이나 거론하여 전쟁의 위기감을 호소했다. (이는 오보로 사실은 산림 벌채권을 획득했을 뿐임) 이 사건을 계기로 그 때까지 비전론을 주장했던 『요로즈쵸호(萬朝報)』도 개전론으로 돌아섰다. 『요로즈쵸호』가 주전론으로 바뀌자 고토쿠수스이(幸徳秋水)、사카이 도시히코(堺利彦) 등은 퇴사하여 『주간평민신문』을 출간하여, 사회주의의 입장에서 전쟁 반대 논진을 폈다. 청일전쟁 때에는 ‘의전(義戰)’으로 칭했던 우치무라 간조(内村鑑三)도 『요로즈쵸호』를 사직하고 그리스도교 입장에서 비전론을 주장했다.

같은 해 6월10일에는 도쿄테이코쿠대학 법과대학교수인 도미즈 히론도(戸水寛人) 등 7인의 박사가 가쓰라 총리를 만나 정부의 소극적인 태도에 대해 신랄하게 논의하며, “전략전술 면에서 보더라도 지금 일어나지 않으면 싸울 기회를 놓칩니다.”라며 군사전문가와 같은 말을 했다.

1903년 8월 한국은 국외중립을 선언하며, 청국도 다음 해 2월12일에 국외중립을 선언하지만 러·일 양 정부 모두 자국의 편의대로 교섭을 진행했다. 전쟁이 벌어지면 만주와 조선이 전쟁터가 될 일은 눈에 보듯 뻔하지만, 청·한 양국의 의사가 계속 무시되었던 점에 러일전쟁의 본질이 있었다.

그러나 한편으론 정부·군부와 여론과의 관계가 반드시 일련탄생(一蓮托生)인 것은 아니었다. 러일 개전(선전포고) 다음 날, 하라 다카시(原敬: 후일 총리)는 일기(1904년 2월11일)에 다음과 같이 썼다.

‘우리 국민 다수는 전쟁을 원하지 않는 게 사실이다. 정부가 처음에 7명의 박사를

통해 러시아 토벌론을 주창하고, 또 대러시아 동지회 등을 조직하여 끊임없이 강경론을 주장한 이유는 이를 통해 러시아를 위압하여 러일 협상을 성립시키려 하였으나 의외로 개전으로 치닫고 말았다. 하지만 일반 국민, 그 중에서도 실업가들은 전쟁을 가장 싫어하는데도 이를 표면적으로 주장할 용기가 없다. 이러한 배경으로 국민이 원치 않는데도 전쟁에 길들여지게 된 것이다.’

당시 재계는 러일 전쟁비용 충당을 위해 세 부담이 늘어나(군사공채 할당, 비상특별세 창설, 쌀·벼 수입세 증액 등) 개전에 소극적이거나 반대하는 입장이었다.

러일 개전외교를 상세하게 연구한 지바 이사오(千葉功) 『구 외교의 형성』(계소쇼보, 2008)에 의하면 당시 육군참모본부원이었던 후쿠다 마사타로(福田雅太郎) 소사는 후에 다음과 같이 회상하였다.

‘그 당시 육군내부에서도 여러 가지 논의가 있었는데, 그 중에는 러시아에 전쟁을 걸어도 승산이 없다고 보는 사람이 적지 않았다. 고급장교 즉 장관 이상은—이렇게 말하는 게 어떨 지 몰라도—러시아와의 전쟁은 도저히 불가능 하다고 하는 사람들이 많았다. 단, 중사·소사 즉 참모본부와 육군성의 중견 위치에 있는 청년 장교는 비분강개한 나머지—혹은 너무 격렬했는지도 모르지만—개전론자가 많았던 것이다.’ (『구 외교의 형성』 p. 116)

상호 이미지

이상에서 본 것처럼 러일전쟁을 둘러싼 여론은 결코 통일된 것이 아니었으며, 러일 쌍방 모두 상대에 대한 인식의 차이가 있었다. 이러한 이미지 갭은 개전의사를 결정하게 하며, 개전 후에도 전쟁을 장기전으로 끌고 가는 요인이 되었다. 즉 내가 말하는 주관적 외압이 객관적 외압을 압도하여 실제의 위기 이상의 위기감을 국민들에게 증폭시켰던 것이다.

1980년대에 미국에서는 mutual images(상호 이미지)에 대한 연구가 활발해졌는데, 1941년 12월의 태평양 전쟁 전후에, 미국의 미디어는 일본인을 안경을 쓴 원숭이처럼 묘사하였으며, 일본은 미국인에 대해 마귀와 짐승의 이미지를 떠올렸다. (귀축미영(鬼畜米英): 전쟁 중 적국이었던 미국과 영국을 업신여겨 일컫는 말) 서로가 상대국에 대해 동일한 이미지를 가지면서 적에 대한 증오를 부추겼던 것이다. 이것이 태평양 전쟁 발발을 가속화시켰다.

존 다우어의 『자비 없는 전쟁』(War without mercy)은 이 문제를 명확히 하고 있어 참고가 된다.

이와 관련하여, 부시 정권은 사담 후세인이 대량살상무기를 소유하고 있다고 하여(후일 CIA의 오인으로 드러남) 바그다드 공격에 나섰지만, 후에 UN 사찰단이 조사하러 갔을 시에 후세인이 대량살상무기를 보유했다는 증거는 아무것도 발견되지 않았다. 요컨대, 당사국들이 상대국을 어떻게 보는가 하는 문제는 외교관계나 전쟁의

귀추를 결정하는 데 있어서 큰 문제가 된다. 현재는 북한의 김정일 정권을 어떻게 볼 것인가를 둘러싸고 전세계에서 뜨거운 논의가 계속되고 있지만, 어느 것이 진실이고 어느 것이 과대선전인지는 구별하기 어렵다.

러일전쟁 때도 마찬가지로 대러시아 동지회, '7박사', 육군중견장교 등이 개전을 부추겼으며 신문·잡지가 그러한 경향에 박차를 가했다.

일본에서는 mutual images에 대한 연구는 뒤쳐져 있지만, 최근에 강덕상 『니시키에(다색도 관화) 속의 조선과 중국』(이와나미쇼텐, 2008) 교수가 향후의 연구에 대한 실마리를 주고 있다. 향후 연구 발전에 기대하고 싶다.

결론

『언덕 위의 구름』은 현재 일본에서 최대의 내셔널 히스토리이다. (제2차 세계대전 이전에는 요시카와 에이지(吉川英治)의 『미야모토 무사시』가 최대의 내셔널 히스토리였다) 여기서 다시 한번 시바 료타로의 주장을 되짚어 보기로 하자.

러일전쟁은 침략적인 러시아에 대한 '조국 방위 전쟁'이며, 전쟁은 아슬아슬한 승리였지만 아시아의 황색인종이 백인 제국주의를 무찌른 최초의 전쟁이었다. 이 승리는 야마가타 아리토모, 이토 히로부미, 오야마 이와오, 도고 헤이하치로와 같은 정치가와 군인들의 리더십이 출중했기 때문이기도 하지만, 지방출신의 젊은 지식인과 학생들이 헌신적으로 국가에 충성을 다했기 때문에 거둘 수 있었다. 세계 최강의 러시아 코사크 기병대를 무찌른 아키야마 요시후루(秋山好古), 발틱 함대를 전멸시킨 아키야마 사네유키(秋山真之) 형제는 젊은 메이지의 청춘을 대표하고 있으며, 확실히 『언덕 위의 구름』을 향해 분투했다. (또 한 명의 주인공인 마사오카 시키(正岡子規)는 1902년에 서거하여 러일전쟁은 모른다)

그러나 한편으론 이 작품은 중국, 조선 등이 청일·러일 전쟁으로 입은 피해에 대해서는 거의 언급하고 있지 않다. 이 점이 이 책의 최대의 약점이라는 점을 부인할 수 없다.

2009년 11월부터 방영되는 『언덕 위의 구름』을 담당하는 NHK 프로듀서는 기자의 질문에 대해, "지금 폐색감이 짙어지는 사회 분위기 속에 있는 젊은이들이 메이지 시대의 일본에도 이렇게 활기 찬 이야기가 있었다는 점을 알아 주었으면 하고 힘을 냈으면 한다."라고 이 프로그램의 의도를 말했다. 방영이 시작되면 아마 수백만 명의 시청자가 이 프로그램에 매료될 것이다. 3년간 13회에 걸쳐 방영되는 『언덕 위의 구름』이 '쓰시마 해전'을 마지막으로 끝나는 점은 일본인의 내셔널리스트틱한 감정을 고양시키는 데 틀림없이 도움이 될 것이다.

그렇다면 전쟁에 진 러시아, 혹은 전쟁의 무대가 된 조선과 중국의 내셔널 히스토

리는 어떤 내용일까? 이 문제를 깊게 파고 들어 서로 논의를 하는 것은 학문적으로도 의의가 있다. 내셔널 히스토리는 내셔널 인터레스트가 얽혀있는 만큼 역사적 사실을 바탕으로 한 냉정한 논의가 필요하다.

이번 국제회의가 내실 있는 성과를 거둘 수 있기를 바란다.

(본고는 「한국병합 100주년기념 국제 심포지엄」 (2009년 10월6일, 서울 개최)의 보고 원고이다)

日俄战争与“National History”

中村政則（一橋大）

〈目 次〉

前 言
一、《坂上之云》是什么？
二、明治维新与自由民权运动
三、日清战争
四、日俄战争
结 语

前 言

所谓“National History”，以日语译之，有两种译法：(1)国家史；(2)国民史。国家史是聚焦于所谓国家之制度、机构侧面的表现，而国民史则是侧重于国民支持或抵抗国家之侧面的表现。惟其如此，在以“National History”为主题的情况下，必须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方法。

在日本，National History是在1900年代、即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之际“完成的”。National History是与产业革命、帝国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形成并驾齐驱而产生的。民族国家的经济基础是产业革命，而在制度方面则与宪法的制定、国会的开设、以及国语(作为标准语的日语，在明治三十年代即1900年前后)的确立是不可分的。

换言之，经历(1)明治维新、(2)自由民权运动、以及(3)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三个阶段，日本的民族国家最终成立。在此过程中不断强化民族主义，并逐渐确立对外扩张的、帝国主义的军事、经济、政治和教育(国家主义的心态)。

以该主题为时代小说而创作的作品，是司马辽太郎的《坂上之云》(单行本全6卷，1968～1971年)。该书拥有数百万的读者，其影视作品预定由NHK自2009年11月开始、用三年时间播放(至2012年共分13次播放)。由于该节目预定以“日本海海战”为落幕，因此可能鼓舞陷入自泡沫经济崩溃以来之封闭状态的日本人，并煽动其民族主义情绪。

一、《坂上之云》是什么？

《坂上之云》是以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为题材的作品，该书描写了在战争期间一边眺望着在坡顶上熠熠生辉的一朵云彩，一边专心致志地向坡顶攀登的青年的青春故事。不仅如此，该书也是思考明治维新、日清战争、日俄战争是什么的历史小说，进而还是探寻国家是什么、日本人是什么的作品。作品的对象非常广泛，从战争、军人、教育、时代精神的氛围出

发，涉及登场人物之个人性格。间或插入“余谈”之类的段落，记述帝国主义、产业革命、民族国家、欧洲、亚洲等世界情势。

其中，我所关注的是外压的问题。

在司马辽太郎看来，俄罗斯自18世纪以来一直怀有将满洲和朝鲜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的野心。若有机会，甚至企图占领和支配日本。对此，日本因对俄恐怖的感情而怀有胆怯的反感。司马借用全歼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的东乡平八郎的首席参谋秋山真之之口，如此说道：

“日本是一个悲痛的国度。”真之说。（日本农业过度开发，而且没有产业，）日本想创建与欧洲一流国家并驾齐驱的海军。“那可是装备超一流的军舰，”真之说。“其动力之一就是恐怖。由于对外国可能入侵的恐怖而发起了明治维新，维新后拥有了这样的海军(后略)。”(单行本《坂上之云》第二卷)

根据我的判断，这个段落包含《坂上之云》的核心。亦即，明治时代的政治、军事、教育、精神气质以至民族主义，都是源自外压(对外国可能侵略的恐怖)而产生的。所谓“朝鲜半岛是刺入日本腹部的利剑”之言辞，也是一样的。

虽然略有不同，但是这与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是相同的。林房雄认为，由于培理炮艇外交的威胁，日本虽然开国，但是针对其威胁和恫吓而展开民族反抗，即“百年战争”，他将这场“百年战争”视为大东亚战争并予以肯定。然而，所谓的外压，有主观的外压和客观的外压两种。在培理来航之际负责与培理舰队交涉的幕府官员，由于随时可能遭受炮击的恐惧而忧心忡忡然而，培理海军准将被菲摩尔总统禁止发射大炮，因此两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事实上，《日美亲善条约》是在未发一枪的情况下缔结的。

尽管如此，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没有区别主观的外压和客观的外压，而一味强调所谓日本方面的恐怖心(主观的外压)，因此将作为“百年战争”的大东亚战争视为日本命运的必然而给予肯定。

与此类似，司马也比较倾向于强调主观的外压。在《坂上之云》中，司马不厌其烦所描写的主题是所谓日俄战争即“祖国保卫战争”，而这与我所说的“主观的外压”论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尽管如此，司马与林房雄不同，没有将“大东亚战争”视为“自卫和解放亚洲”的战争。毋宁说，“大东亚战争”是对亚洲的侵略战争。

二、明治維新与自由民権運動

所谓明治维新，是指从1853年培理来航(开国)到1877年西南战争。最近(2000年代)的幕末维新研究已经超越羽仁五郎→井上清→芝原拓自系列的研究史，描绘了与过去研究大相径庭的明治维新像。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高度评价幕府官员的外交能力，认为他们在直面“炮舰外交”的同时，巧妙地保持民族的独立。再者，不是如著名历史学家服部之总所言的，“攘夷运动的实践”，而正是“攘夷运动的突然停止”，将日本救出殖民地化的危机(关于从攘夷主义到开国主义的急速转换，参见石井宽治：《日本经济史》，东京大学出版会，1991年)。

虽然明治维新的课题是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三项，但是由于吸取欧美的经济发

展、军事力、铁路、电信等文明以及引进思想、教育制度，因此急速地达成“现代化”。司马辽太郎的明治维新观与此(美国学者罗斯托和赖肖尔等的现代化论)大体一致，其评价称“日本是亚洲唯一成功地达成现代化的国家”。司马的《龙马前进》以土佐藩下级武士坂本龙马为主人公，描绘了推翻幕府、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青年群像，从而获得数百万的读者。这部小说的发表正值日本高度成长的顶峰时期，因此赋予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经营者以及工薪阶层、大学生以勇气和自信。

然而，实际出现的维新政权是以萨长藩阀为中心的有司(官僚)专制政权。著名的自由民权活动家植木枝盛如此论述称(《希望明治第二次改革论》，1877年)：

明治维新是第一次的变革，但只是政府与政府的变换、即治理者之间的政权移交而已。因此，必须进行第二次的变革，实现从独裁政权到立法政体的转换，让人民掌握政权，并扩张人民的利益、幸福、权利和自由。面对这一自由民权运动，萨长的藩阀官僚势力(通过明治十四年政变)将构想英国议会制度的大隈重信(大藏卿，自明治十九年改称大藏大臣)驱逐出内阁，而转向构筑普鲁士式的政治体制。

在日本存在针对明治宪法而认为其与绝对主义的宪法或近代的立法主义宪法相对立的观点，但是在我看来，明治宪法是处在意大利的代议制君主制与俄罗斯的无限专制君主制之间的近代专制的一种形态。因此，我将明治维新定性为：“明治维新是未完成的近代革命”(中村政则：〈明治维新的世界史的位置——意大利、俄罗斯与日本的比较史〉，中村编：《日本的近代与资本主义》，东京大学出版会，1992年)。

明治宪法第一至第三条规定天皇之万世一系性、世袭主义和神圣不可侵犯性，明确了天皇的绝对主义性格。然而，在其他方面，明治宪法尽管是在极其狭小的范围，但是承认国民的参政权，而且还承认议会的预算审议权和部分立法权。再者，第四条规定：“天皇为国家之元首，总揽统治权，依此宪法之条规而行之。”由此可见，第四条虽然没有否认天皇主权，但是君主权力根据宪法规定而受到限制。众所周知，后来宪法学者美部达吉根据这项第四条规定而倡导“天皇机关说”(即不是将天皇视为绝对君主而是视为“机关”的民主主义解释)。自由民权运动以失败而告终，因为宪法中加入了可能对明治宪法进行立宪主义解释的条款。再者，由于国民运动一如既往而不断，因此存在在以后的时代迫使其专制的性格发生一定变化的可能性(大正民主运动、普通选举制度等等)。接着，翌年即1890年开设了国会。在初期的议会，与伊藤博文等藩阀官僚的预想相反，民权派多数出席，他们主张休养民力、节减经费，对抗藩阀政府(直至第四届议会)。在这种意义上，1889~1890年成为区划日本国民国家之成立的重要转折点。

三、日清战争

日清战争(1894~1895年)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初次经历的近代对外战争。日清战争是“日本最后切断了维持最强有力的宗属关系之朝鲜与中国关系的战争”(井口和起：《日俄战争之时代》，吉川弘文馆，1998年)，换言之，是以将朝鲜置于日本的支配之下为目的的侵略战

争(原田敬一：《日清、日俄战争》，岩波新书，2007年)。当时，在亚洲区域世界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册封体制)占支配地位，朝鲜不可能无视清国的意思而展开独立的军事和外交政策。陆奥宗光外相、川上操六参谋次长等积极谋求开战的强硬派，寻求以朝鲜摆脱清国独立的名义向朝鲜半岛出兵的机会。

1894年8月1日，明治天皇发布《对清国宣战诏书》，称其目的是“保守朝鲜之独立，维持东洋之和平”。然而，早在7月25日，日本舰队的数艘军舰在尚未接到宣战布告的情况下，已经在仁川港外丰岛海域与清国军队交战，虽然未能降服清国巡洋舰，但是迫使其自沉。此前两日，日军占领首尔(汉城)的朝鲜王宫，意图抵抗的国王事实上成为俘虏。参谋本部编纂的官方版日清战争史(《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1904年)虽然没有触及这些事实，但是近代史学家中冢明根据福岛县立图书馆佐藤文库的资料，已经阐明其真相(《纠正历史之伪造》，高文研，1997年)。日本政府、军部的侵略性是确凿无疑的。

尽管如此，司马在承认陆奥宗光、川上操六等主导战争的同时如此写道：“战争的原因必须慢慢地涉及。原因在于朝鲜。怎么说呢，不是因为韩国人和韩国有罪，如果有罪的话，那么是在于所谓朝鲜半岛的地理存在。”(第一卷，第241页)

要言之，朝鲜半岛的位置是罪恶之源。在阅读这种地缘政治学说明的时候，我最先想到的是：“朝鲜人肯定受不了，一定大怒吧。”这种地缘政治学逻辑方法，在希特勒等法西斯国家领导者侵略波兰等邻国的时候，被作为将侵略合理化的理论逻辑而加以利用。司马也没有两样。

“韩国自身毫无办法。李氏王朝已经存在五百年，其秩序已经逐渐老化，凭借韩国自身的思想和力量，显然完全没有改变自己命运的能力。”(第一卷，第242页)这也是无视朝鲜人主体性的书写方式，根本没有触及当时韩国人的独立协会运动和义兵斗争。对于清国，作者的描写大同小异：

“要言之，日清战争具有陈腐老朽的秩序(清国)与刚刚新生的秩序(日本)之间所进行的大规模实验的性格”(第一卷，第309页)。日清战争时，清国缺少统一的国民意识，而日本人一举受到国家和国民究竟是什么的教育(第一卷，第287页)。

日清战争不足一年而结束，根据《下关条约》，清国向日本割让辽东关岛、台湾、澎湖列岛，日本还获得2亿两战争赔款。日本在亚洲成为最早的帝国主义国家(殖民地占有国)。

日清战争胜利后，日本国民对天皇制和军部的亲近感进一步加强，而相反地，对中国人、朝鲜人的蔑视意识也强化了。天皇制被置于日本民族主义的中核，天皇制意识形态控制着日本国民。没有天皇制的“National History”是不存在的。

四、日俄战争

1895年4月，俄国、德国、法国三国劝告日本将根据《下关条约》获得的辽东关岛归还清国(三国干涉)。日本即使想展开军事对抗，也缺乏在与这些列强的战争中获胜的自信。日本政府、军部陷入一种政治恐怖之中。众所周知，著名的评论家德富猪峰在三国干涉之际宣称“精心地获得的几乎成为别人的”，从平民主义者转向国粹主义(《苏峰自传》)。世界进入了弱肉强食的逻辑所支配的帝国主义时代。

三国干涉以后，无论是政府还是国民，都以“卧薪尝胆”为誓言，准备与俄国的战争。在中国，爆发反对腐败的清国政府和欧美列强瓜分中国的义和团民众起义。1900年，义和团扩张势力，破坏铁路，烧毁教堂，包围北京的外国公使馆。列强展开行动。美、英、法、德、俄、日本等八个国家组建联军镇压叛乱，占领北京，降伏清国政府。此时日本派遣了相当于联军三分之二兵力的22000人，成为其主力。日本由英国和欧美列强承认其作为“远东的宪兵”的地位，正是由于此时的“功绩”。

开战外交

日清战争是围绕着朝鲜而与清国的战争，而日俄战争是围绕着朝鲜和满洲而与俄国的战争。日本战死者约8万人，是日清战争的8倍；战费约19亿日元，是日清战争的约20倍。另一方面，俄国战死者为 万人，战费达 亿卢布。这是达到两国经济力上限规模的战争，奉天会战之际机枪子弹和大炮药弹不足，两军内部充斥厌战气氛。在此过程中，由于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斡旋，两国缔结《日俄条约》（《朴茨茅斯条约》）。

关于开战的原因，司马辽太郎称俄国(尼古拉二世)占八分，日本有二分。此即所谓，“无论后世的史家如何辩解，俄罗斯对于远东总是怀有过于浓厚的侵略意图”(第二卷，第259页)。

然而，在最近的日本外交史和日俄战争史中，并没有如此过度地强调俄国的侵略性。在此仅介绍其要点，即俄国不存在顽固地主张日俄战争的强硬派。尼古拉二世确实称日本为猿猴，是野蛮之国。他认为，如此落后的民族是没有与欧洲最大的陆军大国俄罗斯进行战争的力量。除了尼古拉二世之外，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宫廷顾问贝佐格拉佐夫、外交部长拉姆斯兹多夫、陆军部长库罗帕特金等为主战派，而财政部长维特是反战派，可见俄国内部是分裂的，未必具有统一的国家意志。俄国史专家和田春树认为，俄国“不存在具有希望与日本开战之信念的强硬派”(和田：〈日俄战争——开战前俄罗斯之动向〉，《俄国史研究》2006年5月)。结果，1903年3月，据说比较稳健(慎重)的库罗帕特金陆军部长和维特财政部长失势，尼古拉二世的专制权力获得加强，以其亲信贝佐格拉佐夫为中心，确定积极的对日政策(山田郎：《世界史之中的日俄战争》，吉川弘文馆，2009年)。

在俄国方面，普遍认为在战斗力方面存在巨大差距的日本陆海军恐怕还不至于下定决心开战。而在日本方面，虽然山县有朋、大山岩、儿玉源太郎等陆军首脑和小村寿太郎等主张开战，但是并没有期望赢得俄国。1903年6月23日，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大山岩、松方正义、井上馨等五元老和桂太郎首相、寺内正毅陆相、山本权兵卫海相、小村寿太郎外相四阁僚出席的御前会议决定：(1) 尊重清韩两帝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2) 俄国承认日本在韩国的优势利益，作为交换，日本承认俄国在满洲之铁路经营的特殊利益。

以后的交涉以满洲问题和朝鲜问题为基轴展开，在此无暇逐一追踪其过程。

要言之，日俄争端的焦点是，日本对于俄国在满洲的权益承认到何种程度，而俄罗斯对于日本在朝鲜半岛的权益究竟是限定在铁路建设和商业范围，还是承认其军事性的使用。几经谈判而达到最终阶段，尼古拉二世最后决定接受日本方面的提案即“满韩交换”。在整个交涉过程中，始终争论不休的是对韩国的“专占权”。

经济史学家石井宽治认为，日本方面下定决心进行日俄战争的最大原因是在韩国的利权。利权的核心是对铁路和银行的投资，釜山、元山、首尔等居留地的日本人数也已经从1895年的约1万人急增为日俄开战前一年(1903年)的略少于3万人。与日清战争时代不同，日本在

海外的利权已经大为扩大(《日本之产业革命——从日清战争、日俄战争进行思考》，朝日选书，1997年)。

不仅如此，我所说的主观的外压论也为日本政府和民众所高度关注。亦即，日俄战争是在相互认识发生抵牾的情况下突然进入战争状态的。俄国方面依然认为日本的军事力仅为殖民地程度，而且俄国最上层的统帅部也处于分裂状态。日本方面，虽然不清楚俄国内部统帅之分裂情形，但是却怀有巨熊行将来袭的印象。惟其如此，日本决心在俄国完善战争体制之前从陆海两方面采取先发制人的攻击，以期在初战确立优势(陆军在仁川登陆，海军攻击旅顺港)。这种认知差距成为决定战争意志，进而导致战争爆发的要因。亦即，我所说的主观的外压压倒客观的外压，并将两国的政治领导者、军部以及国民卷入其中。

舆论的构造

再者，当时的舆论虽然一般认为因日俄开战而激昂沸腾，但仔细考察可知还是比较复杂的。不仅舆论有强硬论与非战论之分，而且陆军内部也有对开战持消极态度的高级将校与主战派中坚将校之别。日本的报纸不知道俄国内部存在统帅的分裂，流于报道俄国继续盘踞满洲，如今战争行将爆发。尤其是，1903年4月8日，俄国(根据满洲撤兵条约所约定的)第二轮撤兵期限已经到来，但是俄国没有从满洲撤兵；1903年5月，发生俄国从军事上占领韩国北方(鸭绿江口)龙岩浦事件。对此，除《时事新报》以外，多数报纸三番五次提起龙岩浦事件，诉说战争的危机(误报。实际上只是获得森林采伐权)。以该事件为契机，此前倡导非战论的《万朝报》也转向开战论。随着《万朝报》转为主战论，幸德秋水、堺利彦等退出，创刊《周刊平民新闻》，从社会主义的立场鼓吹反对战争的舆论。在日清战争之时称其“义战”的内村鉴三，也从《万朝报》辞职，从基督教的立场主张非战论。

同年6月10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院教授户永宽人等七博士会见桂首相，痛斥政府优柔寡断，并以军事专家的口吻表示：“从战略战术的角度看，现在如不奋起，将痛失战机。”

1903年8月，韩国宣布局外中立；翌年2月12日，清国也宣布局外中立，但是日俄两国政府都根据本国的情况继续推进交涉。尽管战争一旦爆发，满洲和朝鲜成为战场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清国和韩国两国的意志却始终被视而不见，日俄战争的本质即在于此。

另一方面，政府、军部与舆论的关系并不一定是所谓一莲托生的关系。日俄开战(宣战)的翌日，原敬(后任首相)在日记(1904年2月11日)中记述如下：

“我国民之多数不欲战争乃是事实。政府最初使七博士鼓吹俄国讨伐论，且组织对俄同志会等，频频鼓吹强硬论，如斯威压俄国，以求达成日俄协商，而意外地竟至于开战。但是，一般国民、尤其实业家最厌倦战争，表面上没有倡导之勇气。如此，国民心也次第为战争所驯服。”

当时财界因为日俄战费导致税负大增(军事公债分摊、非常特别税的创设、米粮输入税的增加等)，而不无消极地反对开战。

根据千叶功详细研究日俄开战外交的著作《旧外交之形成》(劲草书记，2008年)，当时担任陆军参谋本部军官的福田雅太郎少佐后来回忆如下云：

“当时，甚至陆军内部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认为挑战俄国并无胜算者为数不少。在高级将校即将官以上者中间，不管如何说如何想，到底是以持对俄国不发生战争之主义的人居多。唯独中佐、少佐，即身处参谋本部或陆军省之中坚的青年将校过于悲愤慷慨，抑或

过度群情激烈，以开战论者居多”（《旧外交之形成》，第116页）。

相互印象(mutual image)

如上所见，围绕着日俄战争的舆论决不是铁板一块，而且日俄双方对于敌手的认知差距也是存在的。这一印象差距在促成决定开战意志的同时，还成为开战以后导致战争长期化的要因。亦即，我所说的主观的外压压倒客观的外压，造成超越实际的危机之危机感在国民之中大幅度扩大和蔓延。

1980年代，相互印象(mutual images)之研究在美国流行。其结果显示，在1941年12月日美战争前后，美国媒体将日本人描绘为戴眼镜的猕猴，而日本则将美国人刻画成鬼畜生(鬼畜美英)。由于双方相互之间对对手国之根深蒂固的印象，从而煽动了对敌人的憎恨。这加速了走向日美战争的步伐。约翰·达姆的《无情的战争》(War without mercy)阐明这个问题，值得参考

附带提及，布什政府宣称“萨达姆·侯赛因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后来确认是中央情报局的错误情报)，发动对巴格达的攻击，但是后来联合国调查团介入调查时，并没有发现任何萨达姆·侯赛因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要言之，当事国人士如何看待对手国是决定外交关系和战争趋向的重大问题。如今围绕着如何看待北朝鲜金正日政权，依然是全世界众说纷纭的热点，但是何者为客观的真实、何者为言过其实的宣传，也仍然莫衷一是。

日俄战争之时也是如此，对俄同志会、“七博士”、陆军中坚将校等煽动开战，报纸和杂志紧随其后，推波助澜。

在日本，相互印象研究还比较滞后，最近姜德相编《锦绘之中的朝鲜与中国》(岩波书店，2008年)将为今后的研究提供线索。我期待着未来研究的发展。

結語

如今，《坂上之云》是日本最大的“National History”(战前，吉川英治的《宫本武藏》是最大的“National History”)。下面接着回头来看司马的主张。

日俄战争是针对侵略性之俄国的“祖国防卫战争”，虽然战争只是勉强获胜，但是这是亚洲的黄色人种击败白人帝国主义的第一次战争。这场胜利虽然是因为山县有朋、伊藤博文、大山岩、东乡平八郎等政治家和军人领导能力卓越不凡，但是地方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为国家尽忠献身的行动也功不可没。击破世界上最强大的俄国哥萨克骑兵的秋山好古、全歼波罗的海舰队的秋山真之兄弟代表着年轻的明治青年，他们确实是以“坂上之云”为目标而奋斗(主人公之一正冈子规已于1902年死去，不知道日俄战争)。

但另一方面，这部作品对于中国、朝鲜等因日清战争、日俄战争而蒙受灾难，几乎没有言及。无可否认，这是该书最大的弱点。

NHK将从2009年11月开始播放《坂上之云》，其制片人面对记者的质问阐述其节目的意图称：“对于目前处于闭塞状态的青年而言，我们要知道明治日本是有这种振作精神的故事的，我们要振奋人心。”节目开播后，恐怕会有数百万的观众被电视屏幕所吸引。历时3年、

分13次播放的《坂上之云》将以“日本海海战”而告终，这无疑将促进日本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

倘若如此，在战争中败北的俄国，以及成为战场的朝鲜和中国，其“National History”将具有何种内容呢？提出这个问题并进行讨论，在学术上也是有意义的。“National History”不只是与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密不可分，根据史实的冷静讨论是必不可少的。

我期待这次国际会议取得丰硕的成果。

(本文为提交“韩国吞并100周年纪念国际研讨会”<2009年10月6日·首尔>的报告原稿)

顏智在台灣

：1920年代台灣反殖民運動的國際主義契機

■ 陳偉智 (New York University) ■

顏智在台灣

— 1920年代台灣反殖民運動的國際主義契機 —

陳偉智 (New York University)

〈目次〉

- 一、前言
- 二、1924年治警事件审判的插曲
- 三、弱小民族论的空间与时间
- 四、从民族解放到社会革命的可能性
- 五、结论

A colonized people is not alone. In spite of all that colonialism can do, its frontiers remain open to new ideas and echoes from the world outside.

— Frantz Fanon¹⁾

一、前言

1920年代开始的台湾人非武装反抗运动，在其政治论述中，常引用爱尔兰、印度、菲律宾等例子。其中，几乎是同时代的在英国统治印度下领导反殖民运动的圣雄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 (1869-1948)，成为许多台湾反殖民运动者的崇拜偶像之一。当时台湾的语言使用，是多语并存的状态。Gandhi，在这样的多语环境中，以「颜智」（汉文台语）、「甘地」（汉语白话文）、「ガンヂイ」（日语）在媒体中登场。²⁾其中「ガンヂイ」，是转用日语中的译名，而「甘地」则是沿用中国进口的白话文书报上对于Gandhi的译名。至於「颜智」则是台湾人以汉字台语注音的方式翻译的译名。「颜智」的汉语白话文发音为「Yan Zhi」，台湾语发音为「Gan-Ti」。

这些译名的使用，不单单只是反应台湾多语的现状，以及翻译译名的多元来源而已，「颜智」这一个翻译Gandhi的台语注音汉文译名，具有更深远的意义。「颜智」译名的使用，所

1) Frantz Fanon, "Concerning Violence."

2) 大致上在1927年留學中國北京的張我軍返台接任《台灣民報》的編輯後，才漸漸的以中國白話文的翻譯「甘地」取代顏智。張我軍在一篇譯介甘地的文章前言，寫著「甘地即為台灣的顏智」。

预设的媒体读者，是使用台语的读者。当时的台湾，台语使用者占台湾人口的大多数。在1920年代台湾人反殖民运动所经营的媒体，如《台湾青年》、《台湾》的汉文版，或是《台湾民报》，主要采用「颜智」的译名。在「甘地」与「ガンヂイ」之间，「颜智」译名的登场，不仅仅让台湾反殖民运动找到了在中国来源与日本来源之外的可能性，同时这个建立在台湾本地社会语言使用状况的可能性，也进一步的显示出当时的台湾反殖民知识份子，一方面试图建立从本地经验出发的语言与国际经验之间的可翻译性（the translatability），乃至在对本地读者的预先想定上，将具有世界史意义的符号、概念，以本土使用的语言翻译时，一并扩大本土语言所能表述的语汇内容。

进一步而言，基於印度与台湾，虽然殖民母国不同，但同属殖民地的位置，台湾人选择印度的反殖民经验的领导人物介绍进台湾当时的论述空间（discursive space），「颜智=Gandhi」之间具有的可翻译性本身，其之所成立之共同被殖民的同时代经验，也成为对一个对台湾人来说，就当下与未来，在思想上与行动上具有可比较性的参考架构。

本文透过颜智在台湾的反殖民运动论述的个案分析，讨论反殖民运动的国际主义契机。在台湾的1920年代的反殖民运动中，透过「颜智」所呈现的，以「弱小民族」为政治解放论述的想像性资源，在日本殖民地统治的脉络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後开启的新的历史时间中，形成中的台湾民族主义所曾经显现的国际主义契机。在「弱小民族」论的国际主义契机中显露的可能性，有可能使形成中的民族主义，既不是建立在虚构的共同血缘下，最终以汉民族认同回收为目的的族群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也不是基於现实主义的原则，在承认帝国主权，朝向「变成日本人」的状况下，争取政治参与的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而是一个非以国家政权取得为目的，在整体的社会改造中，作为当时的全球问题之一的「弱小民族」全体的解放运动之一环。³⁾

当然，这样的解放运动历史，其目的在当时并没有实现。但是，一条最後没有选择的历史道路，并不代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道路选择不曾出现过。这并不是反历史的探究，而是「可能性」的历史探究，重新提取被後来的历史发展所压抑的可能性。将曾经拥有过的国际主义契机，从国民国家历史的发展主义论述中，从被局限在既定的国家范围内的一国民族想像中，解放出来。

二、1924年治警事件审判的插曲

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後，日本的殖民地统制体制，展开了制度上的变革。在朝鲜的统治，从武断政治变成文化政治。在台湾，则是制订法律第三号，实施限制性的地方自治，并以内地延长主义以及同化主义为此次制度变革方针。台湾人因应这样的新局势，在法律第三号修改前夕，发起台湾议会请愿运动，按照帝国宪法所赋予的请愿权，向帝国议会提出请愿，希望

3) 以族群民族主義，也就是，漢民族民族運動，來定義台灣的反殖民運動，最先開始的，不是戰後的中國民族主義者，反而是日本殖民統治當局。見《警察沿革誌》。晚近以國民帝國，或是帝國公民權的取得或是給予為分析視角的研究，將台灣人的非武裝反殖民運動，似乎是視為殖民地的民權運動。這樣的看法，預設了帝國的政體（日本），以及公民身份（日本人）為最終的目標。

能成立台湾议会，要求殖民地的参政权。同时，台湾人也成立了台湾文化协会，作为对台湾人自己的启蒙运动团体。此後持续性的议会请愿运动以及作为台湾人反殖民运动联合战线的台湾文化协会的活动与後续的组织变革、分裂，开启了1920年代开始台湾的非武装反殖民运动。

1923年12月16日，台湾总督府以违反治安警察法的结社禁止命令，全岛性的逮捕、检举参与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的成员。此次治警事件，以违反治安警察法的结社禁止命令追诉，最後的求刑亦属轻刑度，是台湾总督府试图透过法律手段进阻止台湾人的政治活动。当然，事件并没有摧毁台湾人的反抗，反而在事後更加深化了反殖民运动。

在治警事件的法庭控辩攻防过程中，发生了一个插曲。台北地方法院检察官长三好一八在1923年8月1日，一审进行的第四日，在法庭上提出的控诉状中提出了与此一结社禁止违反案件毫无关连的政治陈述：

印度英国的治下，百五十年始有付与自治权，台湾於日本领台後不过二十五年，即得自治权。但是印度能够受得自治权有相当的理由。大战当时印度对英国非常尽忠诚，致於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始得设立中央议会州议会，被告中多有崇拜印度的颜智，现台北港町文化协会的读报社，有揭颜智的写真。而颜智是亲英主义的人，南阿弗利加战争的时候，有受勋章。他反抗英国，别有相当的理由。被告等不学其善处，独效其恶处，是真不解颜智的为人，必先有相当的诚意向本国尽力，若不见容然後可似颜智的愤怒。现在台湾可称如颜智的人物，只有辜显荣一人可以当的。⁴⁾

三好一八检察官长，以台湾人崇拜的印度圣哲颜智为例，希望台湾人能「学其善处」。而这里的「善处」，指的是颜智在南非波尔战争(Boer War)、祖鲁战争(Zulu War)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组织印度救护队(Ambulance Corp)等战争动员活动，支援英国。据此，三好一八称台湾人所崇拜的印度独立运动领导人颜智为「亲英主义」者。并指称若以「相当的诚意向本国尽力」的表现来看，台湾「可以称如颜智的人物，只有辜显荣一人可以当的。」

其中提到的辜显荣(1866-1937)，是在1895年协助日本接收台北城有功的人物，以协助日本领台有功获得日本政府赠勋，在日本统治下成为仕绅，并获得不少总督府给予的专卖特权，在当时是协力者的代表。1923年并总督府的授意下，与其他协力者仕绅组成公益会，用以抗抗衡台湾文化协会，并公开指摘议会请愿运动并非台湾人全体的意愿。

三好一八检察官并非不清楚颜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後领导的印度反抗运动（即在控词中所

4) 〈治安警察法違反嫌疑事件第一審公判特別號〉，《台灣民報》2(16): 2, 1924.9.1. 另見〈治警法違法事件公判〉，《台灣日日新報》，1924.8.2，第二版。《台灣民報》為全中文記錄法庭辯論過程控、辯雙方，以及被告的發言記錄。《台灣日日新報》為日文記事，報導公判第四日(1924.8.1)上午開庭台北地方法院檢察官長三好一八的控詞。兩者記錄，基本一致。

谓的台湾人「效其恶处」)的主张,但是将英国统治下殖民地的政治权利的获得,加上时间的因素(统治一百五十年之後)以及对母国协力後的政治交换的结果。在控词中引用英国的印度殖民地统治的例子,是为了要证明台湾人还没有资格。印度的例子,在日本殖民者眼中,变成了台湾的「自由解放」、「要求权利的民众运动」,「立脚地与民情」尚未成熟,「有过早的可憾」的例证。

颜智在殖民者眼中,变成了一个亲英主义的殖民协力者,并且被比附为日本培养的台湾协力者辜显荣。在审判的进行中,立即遭遇到辩护律师与被告的反驳,除了在法庭中表示反对之外,也成为在法庭外台湾人讽刺殖民者与协力者的题材。例如《台湾民报》立即以「最近我们台湾也出了一个颜智,但是印度的真颜智,乃是自由神,台湾的假颜智,却是太平犬。」⁵⁾加以讽刺。同时民间舆论也有「辜显荣比颜智/蕃薯签比鱼翅/破尿壶比玉器」对比呈现丑陋与崇高的熟语出现。最後,在1924年治警事件三审判决确定後,对於台湾的反殖民运动只受到轻刑度的判刑,台湾人则自比不如颜智当时因为一连串的Satyagraha运动,在1922年被英国印度殖民当局判刑六年下狱而感到惭愧。⁶⁾

环绕在三好一八检察官长的控词中提出的「印度颜智=协力者=台湾辜显荣」成为治警事件中的一个语言行动(speech act)的插曲。这一个语言行动,表面上看起来与原先的起诉目的违反结社禁止令无关,更不单单只是殖民者对「颜智」事迹与形象择其所好的挪用而已。其目的在於更进一步的争夺已经在台湾反殖民运动的政治论述中,作为反殖民运动者形象而被崇拜的「颜智」此一符号,在殖民地的论述空间中的表述意义(the signified)。换言之,殖民者希望在「印度颜智=反殖民运动」的台湾人反抗政治论述中,以「印度颜智=协力者=台湾辜显荣」这种透过直喻(simile)的语言效果发挥转喻(metonymy)功能的语言行动,试图在论述中推翻台湾人反殖民运动的论理。

在治警事件审判过程中,「颜智」意外的成为一个插曲。这个插曲之所以成立,是建立在台湾人反殖民运动自1920年代初期以来,透过对其他同属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的关注,而形成的同属世界弱小民族的自我认同,一个同命运的各弱小民族在世界史中的位置的历史自觉。「颜智」是呈现这种弱小民族的世界史位置的自觉的参照座标之一。类似的人物或是弱小民族的符号,还有孙中山、礼宁(Le-Leng=Lenin)、ケマル(Kemal)、波斯、爱尔兰(Ai-Lan=Ireland)、菲律宾、朝鲜、中国、乃至犹太复国运动(Zionism)等。一个认同弱者的「弱小民族」论,就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在台湾登场。⁷⁾

5) 〈編輯餘話〉,《台灣民報》2(15): 16, 1924.8.11.

6) 治警事件判決確定後,《台灣民報》的編輯評論:「治警法之公判 這回殆受有罪之判決,最重者不過四個月之輕禁錮而已,然若與印度真實顏智較之,實在慚愧多多!」見〈編輯餘話〉,《台灣民報》2(23): 22, 1924.11.11

7) 例如當時反殖民運動領導人蔣渭水(1890-1931)看到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動搖時代」中,存在的「最幸福時代」,因為「今日的動搖,即為明日的進步」,如同戰後土耳其與波斯的復興運動,或是印度的「ガンヂイ」,雖然都是弱者,但是為了弱者而起,為弱者而發聲,主張應主張的權利。因此,「在這個動搖時代中在掠奪的帝國主義崩解的同時,也意味著受虐的弱者解放」。見蔣渭水,〈動搖時代の臺灣〉,《台灣》3(9): 47-49, 1922.

以「顏智」為例，从一开始在《台灣民報》的前身《台灣青年》、《台灣》上面介紹顏智的活動外，也進一步評論顏智的運動跟學說，甚至將顏智列為台灣人所應當要「見賢思齊」的歷史與當代的重要人物之一。⁸⁾甚至如同三好一八檢察官指出的，在台灣文化協會的場所，懸掛顏智的照片。可以說，在治警事件發生以前，顏智，乃至印度反殖民主義運動，不論是運動過程，或是指導運動的理論，就已經進入了台灣人的政治論述空間中了。在一篇題名為〈顏智和辜顯榮〉的時事短評中，很清楚的顯示對顏智的Satygraha（當時台灣人翻譯成「把持真理」或「把握真理」）思想、Swaraj（「自治」、「自主」、「完全獨立」）、Swadeshi（「獎勵國產」）、non-cooperation（「不協調」）、ahimsa（「無抵抗的愛」）等顏智反抗哲學的概念的掌握。⁹⁾

在治警事件中登場的對於「顏智」的爭奪，使顏智意外成為一個一個協力與反殖民主義意義爭奪的場所。同時，這個場所的存在，也說明了台灣人反殖民主義運動對弱小民族論的自我認同。

三、弱小民族論的空間與時間

如果我們進一步檢視治警事件審判中對顏智的挪用，並不只是一時的時空錯置作強解而已。三好檢察官的陳述中，除了協力者的故意誤讀外，其實反應了存在在帝國殖民地統治與反殖民主義運動之間更為複雜的層面：

一是，統治與反抗的全球二元結構：三好一八檢察官長引用英國的印度殖民地統治歷史，作為日本台灣統治的政治辯護。類似的在帝國之間流通的統治模式的学习，在統治技術的交流、殖民理論與政策的交換上，是自更早統治初期在形成殖民地統治政策中，就已經存在。這個存在於帝國之間的網絡，或許可以稱之為帝國主義的全球生產（global production of imperialism）的網絡。不同的帝國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中葉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間的互相共作的帝國形成（co-imperial formation）。¹⁰⁾也因為這樣「上層」結構的存在，使得各個帝國統治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們，以在這個結構中生成的一個相對於強權乃至帝國的社会—政治範疇：「弱小民族」而成立。¹¹⁾最後呈現一種全球規模的二元結構：殖民母國與殖民母國／殖民地與殖民地。三好一八援引英國殖民統治前例證明台灣的殖民地民權運

8) 治警事件之前的「顏智」介紹文獻，例如，《台灣》雜誌曾經轉介早稻田大學教授武田豐四郎〈新文化的預言者ガンヂイ〉，《台灣》3(5): 16-24, 1922，台灣反殖民運動重要人物之一的王敏川，也曾發表〈社會改造家之顏智（ガンヂイ）〉，《台灣》4(4):1-10, 1923。文末，王敏川特別提到：「顏氏一生之活動，關於時局非輕，無人當留意考察之」。另，《台灣民報》曾於社論中列舉顏智、他臥兒（Tagore）等人，激勵台灣人自覺進取。見〈見賢思齊〉，《台灣民報》3:1, 1923.5.15。另外，在個別文章中也有不少舉顏智為例者。

9) 〈（時事短評）顏智和辜顯榮〉，《台灣民報》2(17):7, 1924.9.11

10) 從十九世紀末開始的high imperialism時期，直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民族國家的世界體系被成為國際關係的政治架構的這個階段，各個不同的帝國國家（imperial state）彼此互相影響，不論是戰時或是平時。參見Ann Laura Stoler, Carole McGranah and Peter Perdue ed. *Imperial Formations*, (Santa Fe: School for advanced Research Press, 2007).

11) 從這個角度來看，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際，1919年列寧成立的第三國際可以看成表現在制度上的弱小民族結盟並試圖發揮其世界史歷史行動者力量，改變世界。1928年在上海成立的台灣共產黨，即是第三國際的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

动时候未到，而同时台湾人可以援引颜智或是其他的弱小民族的前例或是当下的现例，以「见贤思齐」。

二是，殖民地统治的时间逻辑。就各殖民母国来说，彼此的时间是一样的。因此可以互相学习。就殖民母国与殖民地之间来说，则是被设定了时间差（time lag）。此一时间差，成为合法化殖民地统治的依据。三好检察官控词中以英国的印度统治为先例，指出统治一百五十年後，始赋予自治权。因此，日本统治台湾才二十多年，赋予自治权等相关平等权利「时期尚早」。也因此，殖民者要求台湾人要先检视自己的「立脚点与民情」是不是符合资格。就殖民者而言，殖民地统治是建立在时间落差上的时期尚早的时间（temporality of a “not-yet”），对反殖民运动的台湾人来说，则是争取同一时间的平等的现在时间（temporality of the “now”）。

以台湾人反殖民运动所要求的同时间政治来说，在1920年代展开的政治运动中，从联合战线到分裂成左右派，进一步形成不同的政治运动团体，从要求地方自治，到无政府运动乃至组织台湾共产党，可以看成是立基於「弱小民族」论的同一时间的政治诉求的不同表现形式。不论这一个同时间性的达成，是在帝国范畴之内（作为在帝国内部改革运动的地方自治运动），或是与其他世界上同样命运的弱小民族在反抗中分享同时间性，试图达成在帝国之外与之後的独立与解放（无政府运动与共产党）。也是在这样的同时间性的基础上，在弱小民族论中，产生台湾反殖民运动的亚洲想像。当时进入台湾人政治论述中弱小民族，除了在当时成立的爱尔兰自由国（Irish Free State）之外，无一例外的，从中国、印度、菲律宾到波斯、到土耳其乃至巴勒斯坦，都在亚洲的弱小民族范畴中。

这里要强调的是，弱小民族论既是一个空间性的概念（反抗帝国主义强权的统治与反抗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同时也是一个时间性的概念（反抗的同时代性，以及要求一个在不平等的现状之後的一个平等解放的未来）。弱小民族论也因此让台湾在反殖民运动中形成的民族主义，具有了国际主义的契机。

四、從民族解放到社會革命的可能性

台湾人在1920年代形成的弱小民族论，并没有停留在自我单一的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的视野而已。弱小民族论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全球规模的扩张中产生的经济剥削弱势，一方面是在帝国领土争夺中产生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因此，在弱小民族的觉醒与运动中，一方面在时间上重新夺回世界史主体（world-historical subject）的位置，同时也在空间上从资本主义空间上再生产的连结中独立，若进一步与母国的被剥削阶级合作，使整体性的社会变革具有了可能性。这个从民族解放到世界整体的变革的历史可能性，也在当时台湾的弱小民族论中进一步发展。这个发展，同样的也是透过「颜智」的媒介而展开。以下简短讨论台湾反殖民运动中的社会主义诗人王白渊（1902-1965）的观点。

1920年代中期後王白渊发表了〈吾们青年的觉悟〉（1927）与〈ガンヂーと印度の独立

运动》(1930)。¹²⁾在《吾们青年的觉悟》中王白渊的从帝国资本主义的扩张规定了当下的弱小民族的问题点的历史性,把受到「帝国主义渐进东洋」侵害的「东方民族」,放在「十九世纪的外观宛然被西欧的科学文明所征服一样」以来的脉络中。对王白渊来说,1920年代呈现在他眼前的印度的国民独立运动,中华的国民革命运动,都是「东洋的黎明运动」,「皆是发於民族自觉之所致」。而弱小民族独立的目的是「以恢复吾们的面目、精神的自由、经济政治的权利地位」为主。在文章中,王白渊提到他阅读圣雄甘地传记与受难的原理後,「同病相怜」,「深知甘地的心中痛苦」。赞扬印度在受英国殖民变成了奴隶之後,「在甘地出现後,印度的国民独立运动至白热的顶点。提倡非共同,实行经济的断绝」等,作为东方民族觉醒的例证。王白渊文中的「非共同」即是non-cooperation,经济的断绝则是Swadeshi运动。最後呼吁青年应该负担起受压迫民族的民族复兴运动。

在《ガンヂーと印度の独立运动》一文中,王白渊进一步讨论ガンヂー与印度独立运动,也将弱小民族的民族解放,扩大到整体的社会变革。王白渊在文中重新定义民族运动的性质,「民族运动在本质上乃是普罗阶级运动的衍生物或里程碑、、现代民族的对立,其特质乃是与资本主义社会同时发生,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没落同归于消灭。」於是弱小民族的解放,「并非单单只是印度一国的民族运动,而是世界普罗阶级运动的一环,具有重大的世界史任务,於其他正在骚动的社会里,我们依然可以从浪潮中听得到ガンヂー的心声。」王白渊对颜智与印度独立运动的评价的改变,如同後来Fanon在讨论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时强调的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与全球性的社会革命必须同时进行,在民族解放的同时,也必须同时进行社会革命。

从1920年代初期台湾人的反殖民运动形成了弱小民族论。而这个弱小民族论,也是之後不同的政治运动团体所共有的对殖民地台湾人的历史位置与社会政治范畴的自觉。其中,「颜智」的存在,提供了台湾人反殖民政治论述一个同时跨越既有政治边界与思想边界的想像资源。透过「颜智」,台湾人想像了弱小民族的历史主体可能性。透过「颜智」,一个以弱小民族觉醒的亚洲黎明时代的解放的亚洲想像成为可能。透过「颜智」,一个从单一民族解放的政治独立运动展开到共同的全体解放的社会革命的世界史历史可能性进入了台湾反殖民运动的政治想像的视野。

五、結論

本文透过1920年代台湾反殖民运动中对於共同命运的弱小民族论述,建构在台湾史上国际主义契机中浮现的历史视域,特别是以想像的弱小民族身份作为历史行动者,所开创出来的亚洲想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後的1920年代,就台湾的历史发展而言,即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契机。

1920年代殖民地台湾在「颜智」这个场所上,看到了两种同时并存的不同国际想像:帝国

12) 王白渊,《吾们青年的觉悟》,《台湾民报》163: 10-11, 1927.6.26。另《ガンヂーと印度の獨立運動》一文,收於王白渊,《棘の道》,(盛岡:久保庄書店,1930),頁:103-152。

之间的殖民交换与被殖民者的弱小民族国际想像。一个台湾人论述的弱小民族论的国际主义在这样的系谱中呈现。某个程度上，台湾人也在这个系谱中，来看中国以及邻近区域的变革，乃至形成台湾反殖民运动的亚洲想像。

最後在文末附加一言。在二十一世纪当代的历史情境中，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也超过了十九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後的型态。帝国主义也不再是广域的国家政体形式，以领土占领为主的殖民地统治，在二次世界大战後的国民国家的国际政治架构中，也已成为历史。以「民族」为单位的弱小民族论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经济上资本主义发展型态改变，经济剥削的社会形式更复杂，政治上「弱小民族」几乎变成了一国国民国家内部的「少数民族」问题，除了被消除了广域结盟，从国内少数变成全球主体（global subject）的可能性外，似乎也不再是重要的世界史范畴。在这样的历史状况下，重新提取「弱小民族」论所能提供的历史可能性，在政治上，重述非以国家政体为单位的广域结盟，在经济上，则是重视在不断的自我更新的资本主义全球发展过程中，被不断的排除出去的社会底层。回顾曾经存在过的「少数民族论」，是我们学习或是重温，由下往上，观看亚洲，观看世界的一个激进的好位置。

한국전쟁의 기억과 탈냉전: 한국전쟁 사진집을 중심으로

■ 鄭根埴 (서울대 사회학과) ■

한국전쟁의 기억과 탈냉전: 한국전쟁 사진집을 중심으로

鄭根埴 (서울대)

〈목 차〉

1. 문제의 제기
2. ‘우리가 본’ 한국전쟁
3. ‘그들이 본’ 한국전쟁
4. 전쟁기억의 성찰과 재구성
5. 전쟁기억의 탈냉전화를 향하여

1. 문제의 제기

한국전쟁의 기억은 오늘날의 새로운 동아시아(공동체)를 구상하는데 있어서 매우 중요한 쟁점중의 하나이다. 한국전쟁은 내전이면서 국제전이었고, 그 상흔은 현재까지도 한국사회 내부에, 남한과 북한 사이에, 그리고 남북한을 둘러싼 미국, 중국, 일본, 러시아, 나아가 국제연합군으로 참전한 국가 모두에 남아 있다. 동아시아 냉전체제의 지연되고 있는 해체의 핵심에는 한국전쟁의 경험과 기억이 자리잡고 있다. 따라서 한국전쟁의 기억을 어떤 방식으로 재현하고 재구성하는가는 동아시아가 상호이해와 평화로 나아가는가 아니면 긴장과 갈등의 관계를 재생산하는가에 중요한 영향을 미친다.

한국전쟁의 기억은 무엇보다도 전쟁당사자의 경험 속에 깃들여 있지만, 전쟁 후 60년이 가까워오는 현재의 관점에서 보면, 전쟁의 간접경험의 다양한 방식들에 주목해야 한다. 전쟁의 기억은 전쟁당시 생산되었던 사진이나 심리전 뼈라에 담겨져 있으며, 이들의 재현과 재구성은 문자매체나 시각매체, 또는 물질적 재현으로서의 기념물을 통해 이루어진다. 문학작품이나 다큐멘터리, 영화, 기념물 조성과 기념의례 등은 과거의 기억을 재생산하는 핵심적 장치들이다. 당시에 만들어진 사진이나 뼈라를 수집하여 하나의 일목요연한 사진집이나 자료집을 편찬하는 것도 전쟁기억을 재생산하고 재구성하는 유력한 수단이다. 특히 사진은 그것이 가진 특성, 즉, 실제로 과거에 어떤 일이 있었는가를 보여줌으로써 시각적으로 재현된 현실이 곧 진실이라고 믿도록 하는 힘이 강하다는 점 때문에 기억의 재구성에서 매우 중요한 위치를 점한다.

근래에 한국에서는 한국전쟁을 다시 바라보게 하는 사진집들이 많이 출간되었다. 특히 개인적 기록사진은 한국전쟁이 끝난 지 약 40여년이 지난 1990년대 후반부터 개인사진집으로 출판되고 있다. 또한 전쟁직후에 외국에서 출간되었던 사진집들이 번

역출간되고, 미국 국립문서보관청이 소장하고 있는 전쟁사진들도 재발견되어 새로운 사진집으로 출판되고 있다.

나는 이 글에서 한국에서 근래에 발행된 한국전쟁사진집들을 분석함으로써 한국전쟁기억의 특징과 그 변화상을 제시하려고 한다. 한국의 전후 분단체제하에서 전쟁기억이 남북한간에 지속된 심리전과 국가보안법체제, 그리고 ‘특별국민들’에 대한 통제를 통해 관리되었다면, 한국전쟁사진들도 이런 거시적 관리체제하에 놓여 있었는데, 2000년 이후에 급증하고 있는 한국전쟁사진집 출간은 기존의 한국전쟁에 대한 국민국가적 관리체제의 균열을 나타내는 지표이자 탈국민국가적 관점을 확보하려는 시민주의적 현상으로 해석할 필요가 있다.

2. ‘우리가 본’ 한국전쟁

1) 냉전하 공식적 기억들

국가나 국민주의적 언론들은 사진을 통해 국민적 기억을 창출하여왔는데, 이런 수단의 하나가 전쟁사진과 사진집이었다. 전쟁은 개인과 국가의 운명을 일치시키고 사회적 질서를 재구성하는 중요한 정치적 사건이고, 이에 대한 기억은 ‘국민’의 창출에 큰 영향을 미친다. 또한 사진은 이를 통해 재현된 모습을 실제로 각인시키는 효과가 있으므로, 특정한 기억을 망각시키고, 또 다른 특정한 기억을 공식화시켜 국가적 기억으로 전환시킨다.

한국전쟁후의 사회체제, 즉 냉전은 전쟁기억을 특정한 방식으로 재구성하는 요인이자 조건으로 작용하였다. 냉전은 물리적 전투와 살육이 없고, 또한 지리적 전선의 변화가 없는 대신, 전쟁에서 이루어진 심리전이 지속되고, 전쟁이 일어날 수 있다는 가능성을 늘 강조하면서 상대방을 적으로 삼는 ‘적대’와 ‘체제경쟁’이 지속되는 상태를 말한다.

그렇다면, 냉전하에서 한국전쟁사진들은 어떻게 취급되었는가. 한국전쟁 사진집에 대한 체계적 연구는 의외로 최근에 와서야 이루어지고 있다. 이 분야에서 이룬 새로운 성과로서 김형곤의 연구(2007)를 단서로 하여 한국전쟁이후의 한국에서의 한국전쟁 기억을 살펴보기로 하자.

김형곤은 한국전쟁에 관한 공식기억의 변화를 추적하기 위하여, 1950년대 후반부터 2004년까지 발행된 8개의 사진화보집을 선택하여 이들의 변화양상을 분석하였다. 또한 그는 이 화보집과 함께 매년 발행된 주요 일간지의 6월 25일자 신문에 실린 한국전쟁관련 사진의 변화를 주로 반공이념의 변화라는 시각에서 분석하였다. 그는 전쟁후 냉전시기에 한국전쟁사진집들이 재현하고 있는 전쟁기억은 반공의 기억, 기념대

상으로서의 전쟁, 그리고 수난자로서의 정체성이라고 요약하였다. 반공이미지의 경우, 북한의 남침을 시각화하고, 인민재판과 인민군에 의한 ‘양민학살’을 부각시키며, 피난민 이미지를 활용하였다. 이런 반공이치는 1990년대부터 크게 약화되었다. 또한 1950년대부터 1970년대까지의 한국전쟁의 기억을 드러내주는 사진집들에는 각종 현충탑과 기념비 사진을 통해 국가를 위한 희생의 고귀함을 부각시켰으며 전쟁 초기 6개월을 집중적으로 부각시켜 ‘승리’의 이미지를 창출하려고 노력하였다. 이와 반대로 이 시기에는 ‘수난자로서의 민간인’이라는 이미지는 거의 출현하지 않았고, 군인들의 영웅적 전투를 중심으로 하는 사진이 강조되었다. 이런 경향은 1980년대 이후 변화되어 남북한 주민 모두가 겪었던 전쟁의 고통이 강조되고 있다고 주장하였다.

내가 보기에 1950-70년대 사이에 출판된 한국전쟁사진들의 특징은 대부분 한국전쟁이 한국현대사의 커다란 분수령이지만, 한국전쟁 자체만을 집중적으로 다루지 않고 있다는 점이다. 한국전쟁을 집중적으로 다룬 사진집 중의 하나가 1970년 휘문출판사 편집국이 발행한 <눈으로 보는 한국전쟁>이다. 전사편찬위원장의 추천사가 붙어 있는 이 사진집은 냉전기 한국전쟁기억의 한 모델을 제시하고 있다. 이 사진집은 한국전쟁 20주년을 기념하여 편집 출판한 것으로, “북괴의 극악무도한 만행에 몸서리쳐지고, 조국의 명맥과 자유를 수호하려는 십자군의 의연한 모습에 숙연”해진다는 서문을 달았다.

휘문출판사는 신문과 방송을 통해 한국전쟁 사진을 수집하였고, 약 2,000여매의 사진을 수집하여 ‘세상에 알려지지 않은 사진을 중심으로 1000매’를 골라 편집하였다. 이 사진집은 ‘북위 38도선’, ‘아! 6.26’, ‘낙동강의 혈전’, ‘인천상륙작전’, ‘태극기는 올랐다’, ‘평양입성’, ‘아쉬움을 남기고’, ‘노병은 죽지 않는다’, ‘휴전회담’ 등 9개 부분으로 구분하였다. 사진들의 촬영자와 시간 장소들은 밝히지 않고 있으며, 사진마다 캡션을 달았다. 전형적으로 전쟁 초기 6개월의 사진들이 대부분을 차지하고 있다. 맨 마지막에는 전쟁기간 3년동안 ‘영광과 오욕으로 수놓은 격전장’ 20곳을 선정하여 표시하고 있다.

이후 한국전쟁사진만을 다룬 화보집은 1985년 출판된 <사진으로 보는 수난의 민족사>이다. 이 시기에 이르면 전쟁후 한 세대가 지났다는 시간적 경과와 함께 ‘기억의 퇴색’이 거론되기 시작했고, ‘수난사’로서의 한국전쟁관이 부각되기 시작했음을 알 수 있다. 이와 동일한 사진집이 1987년 ‘사진으로 본 한국전쟁의 실상’으로 한국언론인 동우회에서 발행되었다. 한국전쟁 40주년이 되던 1990년, KBS는 상당한 양의 자료조사를 통하여 다큐멘터리 ‘한국전쟁’을 방영하였고, 이 때 수집된 사진들을 모아 1991년에 ‘다큐멘터리 한국전쟁’으로 출판하였다. 여기에는 총 846매의 사진이 실려 있는데, 분단/남과 북, 미소군 철수와 38선 충돌, 폭풍, 북진, 또 다른 전쟁, 협상의 비활, 후방전쟁, 휴전, 에필로그(반성)등 9개 부분으로 구성되었다. 이 사진집은 남북 관계를 적대관계로 바라보는 것으로부터 조금씩 벗어나고 있는 현상을 보여주고 있는데, 이 시기가 세계적으로 냉전체제의 해체기였다는 점에서 시간적 감각의 차이를

면밀히 평가해볼 필요성을 느낀다.

2) 국방부 정훈국 사진대의 활동

한국전쟁이후 전쟁사진들은 수없이 국민적 기억의 창출에 활용되었지만, 정확하게 그것을 찍은 사진가나 촬영 일시와 장소에 대한 질문은 별로 제기되지 않았다. 사진을 이미지로 취급했기 때문이다. 한국에서 전쟁사진을 생산한 주체는 대부분 국방부 정훈국 보도과의 사진대와 각 부대 소속 중군사진가들이었다.¹⁾ 그럼에도 불구하고 이에 대한 구체적 연구가 이루어지지 않았다.

한국전쟁사진집 출판을 주도해온 눈빛 출판사는 2005년, <그들이 본 한국전쟁>이라는 제목하에 중국과 미국에서 1950년대 출간된 사진집 3권을 번역 출간한 후, 2008년에는 ‘그들이 본 것’과 대비될 수 있도록, ‘우리가 본 한국전쟁’이라는 사진집을 출간했는데,²⁾ 이는 1950년 당시 국방부 정훈국 사진대 대장이었던 임인식이 남긴 사진들을 모은 사진집이다.

임인식 사진집은, 서문(6)과 함께, 전쟁발발(31), 인천상륙작전과 서울수복(34), 전쟁의 상흔과 동족상잔(27), 북진과 평양입성(12), 전란에 내몰린 민간인들(29), 끝나지 않은 전쟁(18) 등 6장으로 편집되었는데, 총 123장의 사진이 수록되어 있다. 이 책은 다른 사진집과 구별되는 몇가지 특징을 갖는다. 첫째 이 사진집은 서문에 임정의의 아버지에 대한 회고와 함께 각 장에 해당되는 임인식의 일기가 6월 24일부터 10월 21일까지의 일기가 부분적으로 제시되어 있어서, 사진을 찍고 있는 상황에 대한 맥락이 구체적으로 드러난다는 점이다. 둘째, 이 책의 가장 큰 특징은 당시 정훈국 사진대, 또는 대장 임인식이 전선을 따라 어떻게 움직였는지를 잘 알 수 있다. 전쟁발발부터 1950년 10월 평양탈환(점령)시까지의 사진들은 최전선을 모습을 매우 생생하게 담고 있으며, 특히 평양의 주민동향이 잘 표현되어 있다.

셋째, 임인식의 사진집에는 1950년 말기 즉, 1.4후퇴로 대변되는 중국군 참전이후의 전투사진들은 실려있지 않고, 다만 1951년부터 시작된 휴전회담에 관련된 사진들만 수록되어 있다. 이것은 1950년부터 1980년대까지의 한국의 공식기억을 담은 사진집들이 가진 공통점이기도 한데, 공식사진집들이 이념적인 요인에 의해 북진 국면까지의 사진들을 주로 보여주고, 2차 후퇴기 이후의 사진들을 생략하는 경향이 있다면, 임인식 사진집도 동일한 요인에 의해 편집상 생략한 것인지, 아니면 당시에 정훈국 사진대나 임인식이 더 이상 위험한 전선에 투입되지 않았기 때문인지 명확하지

1) 이들이 촬영한 사진은 한국군의 ‘政訓’ 업무를 위한 것으로, 한국에서 정훈은 군인들에 대한 공보 Troop Information, 대민 공보 Public Information, 군일반 교육 Troop Education, 그리고 심리전을 포함하는 것이다.

2) 이 출판사가 처음부터 한국전쟁사진들을 ‘우리가 본’ 것과 ‘그들이 본’ 것으로 구분하여 출판할 것을 기획했는지는 알 수 없지만, 한국전쟁을 바라보는 시선의 차이를 인식하고 있을 뿐 아니라 시선의 교차를 통하여 한국인들이 가진 한국전쟁의 경험이나 이미지를 객관화하려는 노력의 일환임에 틀림없다.

않다.

넷째, 비록 임인식이 정훈국 사진대 대장으로 1950년부터 1952년 5월까지 활동하였지만, 그가 찍은 사진들이 모두 정훈국으로 이관되지는 않은 듯 하다. 당시의 정훈국 사진대원들은 자신들이 찍은 사진의 일부를 개인 사진으로 생각했거나 개인 카메라를 별도로 휴대했을 수도 있다. 이 때문에 종종 자신의 모습을 담은 사진을 갖고 있었다.

임인식의 사진집 출간에 힘입어 정훈국 사진대에 관한 연구가 김윤정(2009)에 의해 이루어졌다.³⁾ 그녀의 연구에 기초하여 말한다면, 정훈국 보도과의 사진대는 한국전쟁 발발 이전에 조직되어 있었음을 임인식의 일기에서 확인할 수 있다. 초기의 사진대원들은 8월 28일 서울 후퇴시 임인식을 제외하고는 빠져 나오지 못했다. 대구로 후퇴할 때까지의 사진은 거의 임인식이 남긴 것이다. 특히 7월 10일 충남 연기군 전의면에서 파괴된 북한군 T34 전차의 모습을 찍었다. 이 때 양손이 전깃줄로 묶인 채 총살된 미군의 시신도 찍었으며, 이를 AP통신의 신화봉 기자에게 주어 7월 12일 세계의 언론에 실리게 되었다.

이경모는 사진대가 “육군본부가 대구에 주둔할 때 시작되었다”고 증언하였다.⁴⁾ 이경모가 사진대에 합류하는 과정을 보면, 사진대장이 전국적으로 알려진 사진가를 불러들여 사진문관으로 종군하도록 권유하였음을 알 수 있다. 정훈국 보도과는 처음 서울의 명동에 있다가 대구로 옮긴 후 다시 부산으로 후퇴하였고, 이들은 9월 23일 인천으로 상륙하여 군인들이 작전하는 모습을 찍었다. 평양에서는 서순삼이라는 유명한 사진가의 삼정사진관을 중심으로 취재활동을 하였고, 종군사진가들도 증가하였다. 정훈국 사진대가 찍은 사진들은 전쟁에 관한 교육과 선전에 활용되었다.⁵⁾ 미국 공보원에서 자주 화보 전시회가 열렸다.

한국인 사진가들은 대체로 1-2년 또는 수개월의 종군작가로서의 임무를 수행하였고, 이런 임무가 끝난 다음에는 다시 민간 사진가로 돌아왔는데, 이들에게는 한국전쟁이 자신이 살고 있던 생활세계의 파괴였으므로, 이국적인 매혹이나 전쟁의 공포를 전달하는 객관적 전달자의 입장을 넘어서서 자신을 기록하고 성찰하는 작가로서의 입장을 갖게 되었다.

한편, 한국전쟁에 관한 사진을 논의할 때 중요한 주제의 하나가 검열이다. 한국정부는 전쟁이 발발하자마자 비상사태하의 범죄처벌특별조치령(특조령)을 공포하였고, 7월에는 전국 계엄령과 언론출판에 관한 특별조치령을 발표하였다. 국방부 정훈국 보도과는 11월, 신문이나 잡지는 물론이고 벽보, 포스터 등 모든 출판물을 사전검열의 대상으로 삼는다고 발표하였다. 이로 미루어보면, 한국전쟁 초기에는 비교적 자유

3) 김윤정, 다큐멘터리 한국전쟁, 서울대 고고미술사학과 석사학위논문, 2009.

4) 최인진, 광복과 분단, 한국전쟁의 영상, 김윤수 외, 한국미술 100년 1, 한길사, 2006.

5) 정훈국 사진대 소속의 사진가들이 제작한 사진들은 <국제보도연맹>이라는 단체가 발행한 한글잡지 <국제보도>나 영문잡지 <Pictorial Korea 픽토리얼 코리아>에도 종종 실렸다. <국제보도>는 1945년 11월에 창간된 시사화보잡지로 화가였던 宋政勳이 편집 겸 발행인이었다. 자세한 것은 김윤정(2009)를 볼 것.

롭게 사진을 언론에 보도한 셈이다. 당시 신문들은 사진을 게재할 때 촬영한 사진가나 장소, 일시 등에 관한 정보를 소홀하게 다루었고, 짧고 공식적인 익명의 출처를 밝히는 경우가 많았다. 사진검열연구에서 한가지 난점은 한국의 사진가들이 찍은 사진들에는 검열의 흔적을 담은 사례가 별로 없다는 점이다. 오히려 미국 국립문서보관소에서 발굴된 사진들에는 사진 위에 제한(restricted)되었거나 제한되었다가 해제되었다는 표시가 있는 것들이 발견된다. 명백히 이것은 이 사진들이 보도사진에 속하고 사진검열의 대상이 되었다는 것을 의미한다. 미국측 사진들에 대한 검열의 기제가 당시 한국군 정훈국의 검열과 동일한 것이었는지는 아직까지 확실하지 않다.

사진을 포함한 출판물 일반에 대한 군사검열은 군사비밀의 유지나 심리전의 차원에서 고려되었다. 전쟁사진은 그것이 담고 있는 현실의 일부를 포착한 것으로, 현실의 반영이자 변형일 뿐 역동적으로 움직이는 현실 그 자체를 재현하지 못한다. 그럼에도 불구하고, 전쟁사진이나 전단은 가장 강력하고 중요한 심리전의 수단이 된다. 특히 사진을 활용한 전단은 그것이 가진 진정성 때문에 널리 활용되었다. 이 사진들은 종종 아군과 적군을 용맹함과 비굴함, 승리와 패배, 풍부함과 배고픔, 군림함과 휴머니즘 등 각종 이원적 대비에 적용시킴으로써, 아군의 정당함과 적군의 비열함을 강조하여 내부적 단합과 외부적 교란이라는 이중적 목적을 달성하려고 하였다.

3. ‘그들이 본’ 한국전쟁

1) 미국의 한국전쟁사진들

2005년 눈빛 출판사는 ‘그들이 본 한국전쟁’ 시리즈의 2권과 3권으로, 미국 참전용사회가 1951년과 1954년에 간행한 사진집, 그리고 유엔군 사령관이었던 맥아더와 그의 후임이었던 리지웨이와 클라크 장군의 보고서를 함께 편집하여 출판하였다. 제2권은 1945년 해방부터 1950년말 북한지역으로부터의 후퇴장면까지를 담고 있는데, 전쟁의 배경, 초기 국면(6.25-7.31), 해안교두보 확보, 전세의 일변(인천상륙작전), 침략의 좌절(북한의 기진맥진), 새로운 침략, 철수(38선 이남으로의 후퇴), 반격(적의 소탕), 의회연설 등 9개 국면으로 구성되었다. 여기에는 미군정기에 촬영된 사진과 전쟁발발 후 미군의 활동상을 근접촬영한 것들이 많다.

제3권은 1951년부터 1953년까지의 미군과 유엔군의 활동을, 선전포고하지 않은 전쟁, 제한된 전쟁, 1951년 봄과 여름, 1952년 봄, 1952년 여름과 가을, 1952-53년 겨울, 1953년 봄과 여름, 휴전협상 등 9개 국면으로 구분하였다. 제3권에는 미군의 압도적인 무기와 북한지역에 대한 폭격의 모습, 포로수용소의 모습 등을 충실하게 보여주는 사진들로 구성되었다.

이 사진집의 한국어판 편집자는 이 사진들이 대부분 미군 소속 사진병과 군속사진

가들이 찍은 것이며, 항공사진은 미공군이 찍은 것이라고 설명하고, 이 사진집에 수록된 사진들이 미국 국립문서보관소에 보관되어 있을 것으로 추정하였다. 1951년과 54년 당시에 이 사진집들은 당시 해외 참전군인들에게 배포되었을 것으로 추정하나 증거는 제시되어 있지 않다. 한국어판 편집자는 이 전쟁사진이 대부분 한국에 처음 공개되는 것이며, 여기로부터 피난민과 전쟁고아의 모습을 주목하고 나아가 전쟁의 실제 피해자가 누구인가를 우리에게 묻고 있다고 썼다. 즉, 미군이 기록한 사진들을 통해서 한국인들의 희생과 고통을 읽으려고 하는 것이 이 사진집 재출간의 목표라고 판단된다.

미군측 사진집이 한국에서 ‘그들이 본’ 것으로 분류된 것에 관하여 언급할 필요가 있다. 오늘날 한국에서 미국을 대할 때 ‘그들’로 표현하는 것이 일반적이지만, 한국전쟁 당시에는 그렇지 않았다. 한국인들이 한국전쟁의 기억에서 미군이나 유엔군을 ‘그들’로 표현하는 것은 커다란 변화에 속한다.

한편, 이 사진집을 이해하는데 있어서 당시의 미군을 포함한 서방측 사진촬영의 상황을 검토할 필요가 있다. 레빈스키는 전쟁사진의 역사를 설명하면서, 전쟁사진가들이 ‘먼 곳의 목격자’(1848-1912), ‘객관적 관찰자’(1차대전-스페인내전), ‘입대한 군인’(2차대전), ‘친밀한 친구’(한국전쟁-북아일랜드 전쟁), ‘핑방한 탐험가’(베트남 전쟁)로 변화했다고 보았다.⁶⁾ 한국전쟁은 사진가들이 전투하는 군인들과 함께 활동하면서 사진을 찍었던 중요한 계기였다는 것이다.

미국이나 서방측 사진가들은 군에 소속된 사진가(사진병)와 언론보도를 위하여 종군한 사람들로 구별된다. 현재까지의 연구에 따르면, 한국전쟁을 찍은 비한국인(외국인) 종군사진가들은 대부분 언론사의 의뢰로 종군하여 대중매체에 게재하기 위하여 사진을 촬영했다는 점에서 이들의 사진은 포토저널리즘의 성격이 있었다. 한국전쟁에서 미국의 시각을 대변하는 것으로 간주되어 온 대표적인 사례가 1951년에 간행된 덩컨(D.D.Duncan)의 사진집 <이것이 전쟁이다 This is War>와 그를 포함하여 라이프 지 종군기자들이 찍은 사진을 기초로 1975년에 발간된 <전쟁에서의 삶 Life at War>이라는 사진집이다. 잡지 라이프 지의 사진가로 활동한 더글러스 덩컨은 매우 유명한 사진가로 그의 사진집에 실린 미군의 이미지가 후에 워싱턴 DC 국립박물관 한국전 참전용사 기념물의 모델이 되었다. 그는 전쟁사진의 새로운 장르를 개척했다고 평가된다.

2) 중국군의 사진집과 시각의 교차

한국전쟁이 휴전상태로 들어간 이후, 중국인민지원군은 곧 바로 중국으로 귀환하지 않고, 북한의 전후재건사업에 동원된 후 1958년에 중국으로 귀환하였다. 한국전쟁에

6) J. Lewinski, *The Camera at War: a history of war photography from 1848 to the present day*, NY: Simon and Schuster, 1978.

참전한 중국군의 시각은 중국 해방군화보사에서 1959년에 발간한 ‘영광스러운 중국 인민지원군’이라는 사진집에 잘 나타나 있다.⁷⁾

이 사진집은 1950년 중국 지원군의 모집과정으로부터 한국전쟁 참여하여 활동하는 장면, 그리고 휴전 이후 북한의 재건에 참여하는 장면, 1958년 중국으로 귀환하기까지의 장면을 담은 연대기적 활동보고서의 성격을 지닌다. 이 사진집은 중국과 북한과의 우정 또는 ‘혈맹관계’가 특별히 강조되어 있다. 이들의 우정은 국가간 관계 뿐 아니라 군민관계를 가로지르는 것이다. 이 사진집에 포함되어 있는 사진 중에는 중국군이 북한과의 국경선인 압록강을 건너기 전에 북한을 바라보는 시선이 매우 인상적이며, 미군의 비인도적 전쟁수행을 ‘세균전’ 관련 사진을 통해 강력히 비판하고 있다는 특징을 갖고 있다.

이 사진집도 중국의 국민국가적 시각에서 구성되었기 때문에 이 사진을 찍은 주체는 밝혀져 있지 않다. 또한 당시 중국인민지원군으로 참전했다가 중국으로의 귀환을 거부하고 대만으로 돌아간 포로들에 대하여 전혀 언급이 없다. 미군이나 한국군의 사진집에는 휴전회담 당시의 포로들에 대한 처리문제, 특히 반공포로들에 대한 사진기록이 매우 많고, 그 중에는 중국인 포로들에 대한 사진이 매우 상세하게 나타난다.

오늘날의 관점에서 더 중요한 것은 이 사진집이 한국어로 번역되어 한국에서 출판되고 많은 독자들이 이를 읽었다는 점이다. 눈빛출판사는 이 책을 <그들이 본 한국전쟁 1>로 명명하여 출판하였다. 이 사진집의 한국어 출판은 몇가지 점에서 중요한 의미를 지닌다.

첫째, 이 책의 한국어 출판담당자는 과거에 중국에서 출간된 사진집을 다시 한국에서 출간하는 과정에서 사진의 선정과 배열, 편집, 사진설명 등에서 원자료에 충실하게 출판해야 하므로 “잘못하면 편향된 시각에 노출될 위험이 있다”는 점을 지적하고, 이 책이 한국에서 출간될 수 있었던 것은 한국 “사회가 그만큼 민주화했고, 독자들이 어느 한 관점에 일방적으로 휘둘리지 않을 만큼 성숙했다는 자신감”이 있기 때문이라고 썼다.

둘째, 동아시아의 탈냉전과 전쟁기억의 재구성에서 국민국가를 넘어서는 텍스트의 인정과 이를 통한 ‘과거’에 대한 객관적 이해, 그리고 ‘적대적 관점’에 대한 객관적 이해를 증진시키고 있다는 점이다. 한국전쟁사진들은 전선으로 양분된 지역에서 상대방 진영을 투사하는 방식으로 생산되었으므로, 명백히 시각과 사각이 구분된다. 인식주체에서 보면 ‘상대방에게 비취진 나’나 ‘그들 내부’는 일종의 사각에 속하여 정확한 모습을 알 수 없다. 공포와 불안이 많은 경우 무지로부터 발생했다면, 최소한의 오해는 관점의 교차를 통해 극복될 수 있다.

셋째, 이런 관점의 교차를 통하여 동아시아 냉전체제가 가진 문제점들에 대한 성찰이 가능해진다. 한국전쟁후 형성된 동아시아 냉전체제는 크게 두 차례에 걸쳐 변화되

7) 중국해방군화보사, 光榮的中國人民志願軍, 1959 (노동환 외 역, 그들이 본 한국전쟁 1: 항미원조-중국인민지원군, 눈빛출판사, 2004.

었다. 첫째 계기는 1972년 이루어진 미중 수교와 미일수교, 그리고 오키나와의 일본으로의 복귀/귀속이었고, 두 번째, 계기는 1990년 한러수교와 1992년의 한중수교였다. 이 두 계기들을 통하여 동아시아 분단체제의 일부가 허물어졌다. 그럼에도 불구하고 중국의 한국전쟁 참여와 그것이 남긴 문제들은 여전히 거론하기 어려운 금기에 영역에 놓여 있다. 이 사진집의 출간은 이런 금기를 깨는 초기적 노력의 하나로 간주할 수 있다.

4. 전쟁기억의 성찰과 재구성

2000년 6월, 한국의 김대중 대통령은 북한을 방문하여 역사적인 남북정상회담을 함으로써, 한국의 탈냉전화가 본격적으로 시작되었다. 이 무렵 한국전쟁을 바라보는 시각도 확실히 변화하였다. 이를 대표하는 연구성과의 하나가 김동춘의 ‘전쟁과 사회’(2000)이다. 그는 이 책에서 한국전쟁을 피란, 점령, 학살이라는 세가지 키워드로 보는 시각을 제시했다. 이런 관점의 변화는 이후의 한국전쟁사진집에 영향을 미쳤다.

박도는 미국 국립문서보관청에서 한국전쟁에 관한 480여 매의 사진을 편집하여 2004년 6월, <지울 수 없는 이미지>라는 제목의 사진집을 냈다. 이 사진집은 전쟁의 시간적 순서에 따라 사진을 배열하지 않고, 주제별 대상별로 구분하고 있다. 각 장의 소제목들은 1945-49, 미군과 유엔군, 국방군과 인민군, 전화에 휩싸인 한반도, 학살, 피란민과 전쟁고아, 포로, 정전회담과 휴전 등이다. 이전에 볼 수 없었던 사진들도 많이 포함되었다. 이 때문에 사진집에 대한 대중적 반응이 매우 컸다. 그는 2005년에 다시 미국에 가서 770매의 사진을 수집하여, 2006년에 동일한 제목의 사진집 후속편을 출간하였다. 이 책은 소제목의 구분없이 ‘전쟁에 신음하는 사람들’로 묶었다.

이 사진집과 함께, 그는 자신이 수집한 사진들 중에서 가장 충격적인 사진들 100매를 선택하여 <나를 울린 한국전쟁 100장면>이라는 제목의 사진집으로 출간하였다. 나는 이 사진집에 실린 사진을 바라보는 시각과 선택의 기준들이 최근에 한국사회에서 변화하는 한국전쟁기억을 보여주는 지표로 간주될 수 있다고 생각한다. 이 사진집은 어떤 기준으로 사진들을 선택하였는지 밝히지 않았으므로, 이를 조금 자세히 분석할 필요가 있다. 이 책은 7개의 부분으로 구분되어 있는데, 각 부분에는 별도의 소제목을 붙이지 않았으므로, 구분기준과 각 부분들에 대한 의미를 해석해야 한다. 이 책의 사진구성을 분석해보면, 전쟁기억에서 군인보다는 일반시민들의 모습에 훨씬 많은 비중이 주어지고 있고, 주제별로 보면, 포로, 학살, 폐허 속의 희망 등이 새로운 의제가 되고 있음을 알 수 있다. 아울러 이념적 분단을 넘어서서 국가폭력에 자신의 몸을 드러내야 했던 인간의 모습을 부각시키고 ‘국민’보다는 ‘시민’ 또는 ‘개인’을 새롭게 주목하고 있다는 점이 두드러진다.

2000년 이후에 출간된 한국전쟁사진집이 새로운 성찰을 향한 것만 있는 것은 아니다. 한국의 상황을 여전히 국민국가의 차원에서 바라보고, 과거의 경험이 회색되는

것을 염려하는 관점도 강력하게 남아있다. 1998년부터 2007년까지의 이른바 ‘민주정부’하에서 진행되고 있던 탈냉전과 전쟁기억의 재구성 경향에 대하여 비판적 시각이 없었던 것이 아니며, 이런 관점은 “진보개혁주의와 온건한 중도보수의 화합과 상생” 또는 “과거의 경험이 존중”론으로 나타나거나 보다 뚜렷하게 ‘뉴 라이트’를 표방하는 조직도 나타났다.

길광준은 약 1600장의 사진과 사진으로 설명되지 않는 당시 연합군의 작전 및 상황요도를 묶어서 <사진으로 읽는 한국전쟁>를 출간했는데, 그는 자신의 책의 서문에서 이런 입장을 피력하였다. 그는 “남과 북이 대치하고 이는 상황에서 한국전쟁에 대한 말하기 쉽지 않은 예민한 진실들”이 존재하고 이를 글로 쓰기에는 아직 이른 감이 있기에 “사진집으로 대신 말한다고 썼다. 이처럼 사진집은 때때로 의견과 입장에 대한 완곡하고 간접적인 표현수단이기도 하다.

5. 전쟁기억의 탈냉전화를 향하여

2009년 10월, 한국의 유공자 법 개정을 둘러싸고 발생한 한국과 베트남간의 작은 마찰, 즉 ‘베트남전쟁에 대한 표현문제’나 북한을 방문한 중국의 원자바오 총리가 ‘인민지원군 열사능원’을 방문하여 북한과 중국의 관계를 상기시킨 에피소드들은 과거의 전쟁기억들이 현재의 동아시아에 어떻게 작용하고 있는가를 잘 보여주는 것이다.

전쟁사진들은 분명히 전쟁의 기록이지만 대상을 포착하는 위치(position)과 시선(perspective)은 적대하는 어느 한쪽에 속해있다. 전쟁사진은 전선 또는 경계선을 사이에 두고 적대하는 상황에서 한쪽 진영에 서서 찍을 수 있는 장면만을 담고 있다. 또한 전쟁사진은 의도적인 사진촬영의 목적에 종속된다. 이들은 오랫동안 국민주의적 입장과 동아시아분단체제를 지탱해왔다.

2000년 이후 이런 상황은 상당히 바뀌었다. 한국전쟁사진을 대체로 보도사진, 또는 포토저널리즘으로 이해하여 왔다면, 최근에는 한국전쟁에 관한 사진 모두가 보도를 위한 사진은 아니었다는 점에 주목하고 특히 한국인 사진가들의 자기성찰의 측면을 강조하면서 기록사진으로서의 의미를 강조하기 시작하였다(김윤정, 2009).

한국전쟁의 기억문제는 단지 한국내의 진보 대 보수의 대립과 갈등의 영역속에 있는 것만이 아니라, 전쟁에 참여한 국가들간에 존재하는 경쟁과 갈등의 영역 속에도 존재한다. 동아시아의 평화나 공동체적 인식을 강화하기 위해서는, 국민국가 단위를 넘어서서 동아시아 전체를 시야에 넣고, 이들을 비교 검토하는 작업이 필요하다. 관점의 교환은 한편으로는 그들의 관점을 이해하도록 하지만 동시에 전쟁자체를 넘어서서 평화를 보다 적극적으로 상상하게 한다. 동아시아에서 평화와 공동의 번영을 달성하기 위해서는 ‘과거’에 대한 관점의 교환과 이를 통한 객관화가 좀더 진전되어야 한다.

韩国战争之记忆与脱冷战：以韩国战争写真集为中心

郑根植（首尔大学）

〈目 次〉

- 一、问题的提起
- 二、“我们看到的”韩国战争
- 三、“他们看到的”韩国战争
- 四、战争记忆之反省与重构
- 五、走向战争记忆之脱冷战化

一、问题的提起

韩国战争之记忆在今日新东亚(共同体)建构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争论焦点之一。韩国战争既是国内战争又是国际战争，其伤痕至今还留存在韩国社会、南韩与北韩之间，以及围绕着南北韩的美国、中国、日本、俄罗斯，乃至作为联合国军成员参战的所有国家。东亚冷战体制长期存在而未解体，其核心即在于韩国战争之经验与记忆。惟其如此，韩国战争之记忆以何种方式再现和重构，对于东亚之走向相互理解及和平、抑或重新形成紧张和矛盾关系，具有重要的影响。

韩国战争之记忆虽然莫过于战争当事人的经验中所包含的，但是从战后近六十年的现在观点看，关于战争之间接经验的多样形式也是必须注意的。战争记忆保存在战争当时所生产的写真或心理战传单之中，它们的再现和重构通过文字媒体或视觉媒体，抑或作为物质再现形式的纪念品而实现。文学作品以及实录、影视、纪念物建设和纪念仪式等，是重现过去之记忆的核心方式。收集当时创作的写真或传单并编纂为一目了然的写真集或资料集，也是重现和重构战争记忆的有力手段。特别是写真以其所具有的特征、即通过显示过去实际发生何种事情，令人相信视觉上再现的现实就是真实，因此在记忆的重构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近来在韩国，重新审视韩国战争的写真集大量地出版发行。特别是个人的记录写真在韩国战争结束约40年后的1990年代后半期开始以个人写真集的形式出版。再者，战后在外国出版的写真集也被翻译出版，美国国立档案馆收藏的战争写真也被重新发现并编辑为新的写真集出版发行。

我在本文拟通过分析韩国近年发行的韩国战争写真集，揭示韩国战争记忆的特征及其变化。在韩国战后的分裂体制下，战争记忆通过南北韩之间持续不休的心理战和国家安全法体制、以及对“特别国民”的统制而被管理，韩国战争写真集也被置于这种宏观的管理体制之下，2000年以后急增的韩国战争写真集之出版刊行是显示国民国家对韩国战争的管理体制之

分裂的指标，必须解读为确保脱国民国家观点的市民主义现象。

二、“我们看到的”韩国战争

(一)冷战下官方的记忆

国家或者国民主义舆论通过写真创出国民的记忆，其手段之一是战争写真和写真集。战争是使个人与国家达成命运一致并重新建构社会秩序的重要政治事件，战争记忆对于“国民”的创出过程产生重大影响。再者，写真具有实际刻印通过其所再现的面貌的效果，从而促使忘却某些特定的记忆，抑或导致其他特定的记忆公式化而转换为国家的记忆。

韩国战争后的社会体制即冷战，作为以特定方式重构战争记忆的要因和条件而发生作用。冷战没有物理的战斗和杀戮，也没有地理战线的变化，取而代之，是指在战争中实施的心理战持续不休，反复强调战争爆发之可能性并以对手为敌的“敌对”或“体制竞争”继续进行的状态。

既然如此，在冷战下韩国战争写真集是如何处理的呢？出乎意料的是，对于韩国战争写真集的研究是直至最近才展开的。金亨坤的研究(2007)是在这个领域所取得的新成果，在此以其为线索考察韩国战争以后韩国的韩国战争记忆。

김형곤为了追踪关于韩国战争的官方记忆的变化，选取从1950年代后半期到2004年发行的8种写真画报集，并分析其变化情形。与此同时，他还主要从反共理念之变化的视角，分析每年发行的主要日报之6月25日版所登载的韩国战争关联写真的变化。他将战争后冷战时期韩国战争写真集再现的战争记忆概括为反共的记忆、作为纪念对象的战争，以及作为受难者的认同。以反共意象(image)而言，将北韩南侵视觉化，刻画人民审判和人民军实施的“虐杀良民”，并充分利用罹难者形象。这种反共意识从1990年代开始大为削弱。再者，在呈现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的韩国战争记忆的写真集中，通过各种显忠塔和纪念碑写真刻画为国家牺牲之高贵，特别是集中地刻画战争初期的6个月，努力创造出“胜利”的印象。与此相反，该时期所谓“作为受难者的民间人”的形象几乎没有出现，而以军人们的英勇战斗为中心的写真得到重视。这种倾向到1980年代以后发生变化，南北韩居民一起经受的战争痛苦得到重视。

在我看来，1950~70年代出版发行的韩国战争写真集的特征在于，大部分虽然将韩国战争视为韩国现代史的重要分水岭，但是并不只是集中地描述韩国战争本身。集中描绘韩国战争的写真集之一是，1970年代淸文出版社编辑部出版发行的《我眼中看到的韩国战争》。该写真集由战史编纂委员长撰写推荐辞，展现了冷战时期韩国战争记忆的一个范式。该写真集是为了纪念韩国战争20周年而编纂出版的，其序言写道：“因北傀之极恶无道的妄行而心惊肉跳，为守护祖国的命脉和自由的十字军的毅然面貌而肃然起敬”。

淸文出版社通过新闻报纸和广播电视收集韩国战争写真，共收集约2000幅写真，最后以“不为人知的写真为中心”挑选1000幅编辑成册。该写真集分为“北纬38度线”、“啊，6·26”、“洛东江血战”、“仁川登陆作战”、“太极旗升起来”、“平壤入城”、“留下遗憾”、“老兵不死”、“停战谈判”等9个部分，写真的拍摄者以及拍摄时间和场所没有说明，每幅写真附有解说词。其特别是战争初期6个月的写真占大部分。最后部分选定并标示了3年战争期间20个“以光荣

和耻辱铸成的激战场”。

此后，只收录韩国战争写真的画报集是1985年出版的《从写真看到的受难的民族史》。由此可见，到该时期，随着时间的流逝，战后一个世代已经离去，“记忆的退色”开始成为讨论的对象，作为“受难史”的韩国战争观也开始得到描绘。与此相同的写真集是1987年由韩国言论人同友会刊行的《从写真看到的韩国战争之真相》。在韩国战争40周年的1990年，KBS（韩国放送协会）通过相当数量的调查，播放文献纪录片《韩国战争》，并且汇编此时收集的写真于1991年出版《韩国战争纪实》。该写真集共收录846幅写真，由分裂/南与北、美苏扩军与38线冲突、暴风、北进、另一场战争、谈判之비판、后方战争、停战、尾声（反省）等9个部分构成。该写真集展现了略微摆脱将南北关系视为敌对关系的现象，从该时期是世界冷战体制解体时期的角度看，已经意识到必须细致地评价时间感觉的差异。

（二）国防部政训局写真队的活动

韩国战争以后战争写真被无数地运用于创造出国民的记忆，但是对于拍摄这些写真的摄影家以及拍摄时间和场所的疑问却没有被特别明确地提出来。因为写真是被视为印象对待的。在韩国，生产战争写真的主体大部分是国防部政训局报道课的写真队（摄影队）以及各部队所属的从军摄影家。尽管如此，对此问题的具体研究至今尚未进行。

主导韩国战争写真集之出版发行的是빛出版社，于2005年以《他们看到的韩国战争》为题，翻译出版中国和美国1950年代出版刊行的写真集3卷，其后于2008年为了与“他们看到的”对比，出版题为《我们看到的韩国战争》的写真集，这是收集1950年国防部政训局写真队队长임인식留下的写真编辑而成的写真集。

林仁植写真集除序言(6)之外，分战争爆发(31)、仁川登陆作战与收复首尔(34)、战争的伤痕与同族相残(27)、北韩与平壤入城(12)、战乱驱逐的民间人(29)、没有结束的战争(18)等6章编辑而成，共收录123幅写真。该书具有不同于其他写真集的若干特征。第一，除序言收录对임정의父亲的回顾之外，各章收录林仁植的日记，分别摘录从6月25日到10月21日的日记，具体展现关于拍摄写真的脉络。第二，该书的最大特征是清楚展现当时政训局写真队及其队长林仁植如何随着战线而移动的情形。从战争爆发到1950年占领平壤时的写真非常生动地刻画了最前线的面貌，特别是很好地表现了平壤居民的动向。

第三，林仁植写真集没有收入1950年末期、即因1·4撤退而发生重大变化的中国军队参战以后的战斗写真，而只收录涉及从1951年开始的停战会谈的写真。这是表现1950年代至1980年代韩国的官方记忆的写真集的共同点，官方的写真集因为理念性的原因而存在这种倾向，即主要展示截止北进局面的写真，而省略第二次撤退期以后的写真。林仁植写真集究竟也是因为相同的原因而进行编辑上的省略，抑或是因为政训局写真队以及林仁植没有投入更危险的前线，不得而知。

第四，尽管林仁植作为政训局写真队队长活动于1950年至1952年5月，但是他拍摄的写真似乎并未全部移交政训局。当时的政训局写真队队员认为自己拍摄的一部分写真是个人写真，特别是还有携带个人照相机的，因此有展现各种个人面貌的写真。

政训局写真队对于林仁植写真集之出版刊行功不可没，关于其研究是由김윤정(2009)进行的。根据她的研究，政训局报道课写真队是在韩国战争爆发前组建的，这通过林仁植的日记

可以确认。初期的写真队队员在8月28日首尔撤退时，除林仁植之外全部未能脱身。向大邱撤退以前的写真几乎都是林仁植留下，特别是7月10日在忠清南道燕歧郡全义面拍摄到被击毁的北韩军T34坦克。此时还拍摄到两手被用电线绑住并被枪杀的美军尸体，这幅写真交给AP通讯社的记者신화봉后，于7月12日 为世界各地的新闻媒体登载。

이경모提出证言称，写真队是“从陆军总部驻扎大邱时开始活动”的。从이경모与写真队会合的过程看，写真队队长是征召全国知名的摄影家，劝说其从军担任写真文官。政训局报道课最初设在首尔的明洞，后转移到大邱，然后再撤退到釜山，他们于9月23日在仁川登陆，拍摄军人作战的形象。在平壤，以著名摄影家서순삼의 삼정사진관为中心进行取材活动，从军摄影家也增多了。政训局写真队拍摄的写真被用于关于战争的教育和宣传活动。美国新闻处也经常举办画报展示会。

韩国摄影家大体从事1~2年或几个月时间的从军作家工作，完成任务后重新回归为民间摄影家。对于他们而言，韩国战争打破了自己的生活世界，因此他们超越传播异国魅惑以及战争恐怖之客观的传达者立场，具有作为记录自己并进行反省的作家的立场。

另一方面，在探讨关于韩国战争的写真时，重要的主题之一是审查。韩国政府在战争爆发后立即公布非常事态下犯罪处罚特别措施令(特措令)，7月发表全国戒严令和关于言论出版的特别措施令。国防部政训局报道课11月宣布，不仅报纸和杂志，而且墙报、传单等全部出版物均为事前审查的对象。由此推测，韩国战争初期言论界还是比较自由地报道写真。当时报纸刊载写真时，忽略了关于拍摄写真的摄影家以及拍摄场所、时间之类的信息，多数只标明简短的和公式化的匿名出处。在写真审查研究中的一个难点是，在韩国的摄影家拍摄的写真中没有留下审查痕迹的事例。相反地，从美国国家档案馆发掘出的写真中，发现在上面标注“限制级(restricted)”或“解除限制”。显而易见，这意味这些写真属于报道写真并成为事前审查的对象。美国方面对于写真的审查完毕与当时韩国军政训局的审查是否一样，依然不得而知。

对于包括写真在内的所有出版物进行军事审查，是从保守军事秘密的心理战层面进行考虑的。战争写真捕抓住其所展现的现实的一部分，只是现实的反映或变形，而不能再现动态的现实本身。尽管如此，战争写真和传单依然是最强有力的和重要的心理战手段。特别是采用写真的传单因为其所具有的真实性而被广泛地采用。这些写真从勇猛与卑屈、胜利与失败、富庶与饥谨、专制与人文等各种二元对立的视角展现我军与敌军的面貌，强调我军之正当与敌军之卑劣，以达成对内团结和对外扰乱的双重目的。

三、“他们看到的”韩国战争

(一)美国的韩国战争写真

2005年，눈빛出版社以《他们看到的韩国战争》丛书之第2卷和第3卷为题，编辑出版美国参战勇士会1951年和1954年刊行的写真集，以及联合国军司令官麦克阿瑟及其后任李奇微和克拉克将军的报告书。第2卷展现从1945年解放开始至1950年底从北韩地区后退的场面，由战争的背景、初期局势(6月25日至7月31日)、确保海岸桥头堡、战局之一变(仁川登陆作战)、侵略的挫折(北韩之精疲力竭)、新的侵略、撤退(向38线以南之后退)、反击(敌军之扫

荡)、议会演说等9个部分构成。该书收录许多美军政机关拍摄的写真以及战争爆发后近距离拍摄的美军活动写真。

第3卷涉及从1951年到1953年美军和联合国军的活动,分为不宣而战的战争、被限制的战争、1951年春天和夏天、1952年春天、1952年夏天和秋天、1952~53年冬天、1953年春天和夏天、停战谈判等9个部分。第3卷是由充实地展现美军压倒优势的武器以及对北韩地区炮击的场景、俘虏收容所的面貌等的写真构成的。

该写真集韩国语版的编辑者表示,这些写真大部分是美军所属的摄影兵以及非军人摄影家拍摄的,航空写真是美空军拍摄的,并认定该写真集收录的写真是由美国国家档案馆保管的,但是没有提出推测在1951年和1954年这些写真集发送给当时的海外参战士人的证据。韩国语编辑者写道,这些战争写真大部分是初次在韩国公开的,由此我们将关注难民和战争孤儿的面貌,进而提问战争的实际受害者究竟是谁。亦即,通过美军记录的写真解读韩国人的牺牲和痛苦,可谓该写真集重新出版发行的目标。

在此需要言及的是,美军方面的写真在韩国被分类为“他们看到的”。虽然如今在韩国对美国一般采用“他们”之表现形式,但是在韩国战争时并非如此。韩国人在韩国战争的记忆中以“他们”来表现美军和联合国军,属于重大的变化。

另一方面,在解读该写真集时,还需要探讨当时包括美军在内的西方写真摄影的情况。列宾斯基阐述战争写真的历史,认为战争摄影家经历了从“远距离的目击者”(1848~1912年)到“客观的观察者”(第一次世界大战到西班牙战争)、“入伍的军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亲密的朋友”(韩国战争到北爱尔兰战争)、“伟大的探险家”(越南战争)的变化。韩国战争是摄影家与战斗中的军人一起活动并拍摄写真的重要契机。

美国和西方的摄影家可以分为隶属军队的摄影家(摄影兵)和为了新闻报道而从军的人。根据目前的研究,拍摄韩国战争的非韩国人(外国人)从军摄影家,大部分是因新闻社委托而从军、并为了在大众传媒刊登而拍摄写真的,由此可见他们的写真具有写真新闻(photojournalism)的性格。在韩国战争中被看作反映美国视角的代表性事例,是1951年刊行的敦坎(D. D. Duncan)的写真集《这就是战争(This is War)》,以及以包括敦坎在内等《生活》杂志从军记者拍摄的写真为基础而于1975年刊行的题为《战争中的生活(Life at War)》的写真集。作为《生活》杂志的摄影家展开其活动的道格拉斯·敦坎是非常有名的摄影家,他的写真集登载的美军形象后来成为华盛顿特区美国国家博物馆韩国战争参战勇士纪念物的样板。他被评价为开拓了战争写真的新形式(genre)。

(二)中国军的写真集与视角交叉

在韩国战争进入停战状态以后,中国人民志愿军没有立即撤回中国,而是被动员参与北韩的战后重建工作,然后于1958年撤回中国。在韩国战争中参战的中国军的视角,充分展现在中国解放军画报社1959年刊行的题为《光荣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写真集。

该写真集展现从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征兵过程开始到参与韩国战争的活动场面以及停战后参与北韩重建的场面、1958年撤回中国之前的场面,具有按年代顺序编纂的活动报告书的性格。该写真集特别强调中国与北韩的友谊以及“血盟关系”。他们的友谊不只是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且还是超越国民关系的。在该写真集收录的写真中,中国军渡给与北韩的国界鸭

绿江前眺望北韩的视线令人印象深刻，而且还通过“细菌战”关联写真，强烈批判美军非人道的战争行为，这也是其所具有的特征。

该写真集是从中国的国民国家的视角编辑而成的，因此没有说明拍摄写真的主体。再者，对于最初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但是后来拒绝遣返中国而前往台湾的俘虏，全然没有涉及。在美军和韩国军的写真集中，对于停战谈判时的俘虏处理问题、特别是对反共俘虏的写真记录非常多，其中关于中国俘虏的写真非常详细。

从今天的观点看更重要的是，该写真集翻译为韩国语在韩国出版，并且为许多读者所阅读。눈빛出版社将该书命名为《他们看到的韩国战争》第1卷出版。该写真集韩国语版的出版在几方面有重要意义。第一，该书韩国语版出版者指出，在将过去中国出版发行的写真集重新在韩国出版刊行过程中，在写真的选定以及排列、编辑、解说等方面，都必须忠于原著，“若非如此，就有可能暴露偏向化的视角之危险”；并且还写道，该书之所以能够在韩国出版，是因为韩国“社会已经民主化并且具有自信感，读者已经足够成熟，不会因某一种观点而晕头转向”。

第二，在东亚脱冷战和战争记忆重构过程中，超越国民国家的教科书之认定和通过它们对“过去”的客观认知，以及对“敌对观点”的客观理解，诸如此类都得到重视。韩国战争写真是在两军对阵的地区、以投射对方阵营的方式生产的，彼此视角然大相径庭。从认识的主角看，“被对方照出的我”和“他们内部”属于一种视角，是不可能认知正确的面貌的。恐怖和不安在许多情况下是因为无知而产生的，最少的误解也可以通过观点的交叉加以克服。

第三，通过这种观点的交叉，对东亚冷战体制所具有的问题点进行反省逐渐变成可能。韩国战争后形成的东亚冷战体制大体经历两次变化。第一次契机是1972年实现的美中建交以及美日建交、冲绳归还/归属日本；第二次契机是1990年韩俄建交和1992年韩中建交。通过这两次契机，东亚冷战体制的一部分逐渐瓦解。尽管如此，中国参与韩国战争及其所遗留的问题，依然属于难以探讨的禁忌领域。该写真集的出版发行可以看作打破这种禁忌的初期努力之一。

四、战争记忆之反省与重构

2000年6月，韩国金大中总统访问北韩并举行历史性的南北首脑会谈，韩国的脱冷战化从此正式开始。值此之际，观察韩国战争的视角也确实发生变化，其代表成果之一是김동춘的《战争与社会》。他在书中提出以避难、占领、屠杀三个关键词观察韩国战争的视角。这种观点的变化也影响到此后的韩国战争写真集。

박도编辑美国国家档案馆关于韩国战争的480余幅写真，于2004年6月出版题为《无法忘却的印象》的写真集。该写真集不是根据战争的时间顺序排列写真，而是根据主题和对象进行区分。各章的小标题分别是1945~49年、美军与联合国军、国防军与人民军、战火笼罩的韩半岛、屠杀、难民与战争孤儿、俘虏、停战谈判与停战等。该写真集包括许多以前看不到的写真。惟其如此，大众对该写真集的反应非常强烈。他于2005年再次前往美国，收集770幅写真，后于2006年出版刊行同一题目的写真集续篇。该书没有小标题之分，全部汇集为“在战争中呻吟的人们”。

与此同时，他还从自己收集的写真中选择最具冲击性的写真100幅，出版刊行以《令人哭泣之韩国战争的100个场面》为题的写真集。我认为，该写真集收录的写真的观察视角和选择标准可以视为显示最近韩国社会变化中的韩国战争记忆的指标。该写真集没有说明选择写真的标准，因此需要对其略加详细分析。该书分为7个部分，各部分没有小标题，因此需要对其区分标准和各部分的意义加以解读。分析该书写真的构成可知，在战争记忆中，较诸军人确实给予普通人的面貌以更多的比重；从各主题分类来看，俘虏、屠杀、废墟中的希望等成为新的议题。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超越理念的分裂，刻画不得不把自己的身体袒露在国家暴力面前的人们的面貌，而且以崭新的视角关注“市民”和“个人”，而不是“国民”。

2000年以后出版发行的韩国战争写真集，不只是面向新的方向进行反省。从国民国家的立场观察韩国的情况，而且忧虑过去的经验被冲淡的观点，也依然强有力地存在着。对于在1998年至2007年所谓“民主政府”下进行的脱冷战与战争记忆重构，也并不是没有批判的声音，这种观点不仅表现为“进步改革主义与稳健的中道保守之和合和相生”或“过去经验尊重论”，而且还出现比较明确地标榜“新光明(new light)”的组织。

길광준汇编约1600张的写真以及未说明为写真的当时联合国军作战及其情况略图，出版刊行《根据写真解读的韩国战争》。他在自己书的序言中表明这样的立场，他写道：“在南北对峙的情况下关于韩国战争之不容易言说的敏感真相”是存在的，但是将其撰写成文为时尚早，故取而代之，以写真集加以说明。由此可见，写真集偶尔也成为意见和立场之婉转和间接的表现手段。

五、走向战争记忆之脱冷战化

2009年10月，围绕韩国的有功者法之修订而发生的韩国与越南间的小摩擦、即“越南战争的表述问题”，以及访问北韩的中国总理温家宝祭扫中国人民志愿军陵园使人想起北韩与中国关系的插曲，很好地显示了过去的战争记忆是如何对现在的东亚发生作用的。

虽然战争写真分明只是战争的记录，但是捕抓拍摄对象的立场(position)和视角(perspective)是属于相互敌对的某一方的。战争写真只留下在双方以前线或警戒线对峙的情况下，站在一方阵营所能拍摄到的场面。再者，战争写真也服从于别有意图的写真摄影的目的。它们在很长时期支撑着国民主义的立场以及东亚的分裂体制。

2000年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虽然韩国战争写真一直被理解为报道写真抑或新闻写真(photojournalism)，但是最近已经注意到关于韩国战争的写真并不都是为了报道而拍摄的写真，在特别强调韩国人摄影家自我反省侧面的同时，也开始强调其作为记录写真的意义(김윤정, 2009)。

韩国战争的记忆问题不仅存在于韩国国内进步与保守之间对立和矛盾的领域内，而且还存在于参与韩国战争的国家之间竞争和矛盾的领域内。为了强化东亚的和平和共同体认识，超越国民国家单位，放眼东亚整体，并对其进行比较探讨，这种工作是必不可少的。观点的交流一方面促使他们理解对方的观点，另一方面促使他们超越战争本身，并比较积极地构想和平问题。在东亚，为了达成和平和共同繁荣，必须进一步推进对于“过去”的观点交换以及通过这种交换的客观化。

朝鮮戦争の記憶と脱冷戦

—朝鮮戦争写真集を中心に

鄭根植 (ソウル大学校社会学科)

〈目次〉

1. 問題の提起
2. 「われわれが見た」朝鮮戦争
3. 「彼らが見た」朝鮮戦争
4. 戦争記憶の省察と再構成
5. 戦争記憶と脱冷戦化に向けて

1. 問題の提起

朝鮮戦争の記憶は、現在の新たな東アジア（共同体）を構想するにあたり、とても重要な争点の一つである。朝鮮戦争は内戦であると同時に国際戦争であり、その伤痕は現在まで韓国社会内部に、大韓民国（韓国）と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国（北朝鮮）の間に、そして南北朝鮮を囲む米国、中国、日本、ロシア、さらには国連軍として参戦した国家すべてに残っている。東アジアの冷戦体制の解体が遅れていることの核心には朝鮮戦争の経験と記憶が位置している。したがって朝鮮戦争の記憶をどのように再現し、再構成するのは、東アジアが相互理解と平和を実現するのか、あるいは緊張と葛藤の関係を再生産するのかという点に重要な影響を及ぼす。

朝鮮戦争の記憶は何よりも戦争当事者の経験に宿っているが、戦後60年になろうとする現在の観点から見ると、戦争を間接的に経験する多様な方式に注目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戦争の記憶は、戦争当時生産された写真や心理戦ピラに含まれており、これらの再現と再構成は文字媒体や視覚媒体、または物質的再現としての記念物を通じて成り立っている。文学作品やドキュメンタリー、映画、記念物の造成、記念式典などは過去の記憶を再生産する核心的装置である。当時作られた写真やピラを収集し、一目了然な形で提示する写真集や資料集を編纂するのも戦争の記憶を再生産し、再構成する有力な手段である。特に写真はそれがもつ特性、すなわち過去に実際にどのようなことがあったのかを見せることにより、視覚的に再現された現実がそのまま真実であると信じさせる力が強いために、記憶の再構成においてとても重要な位置を占めている。

最近韓国では、朝鮮戦争を振り返る写真集が数多く出版された。特に、個人的な記録写真が、朝鮮戦争終了後40年あまりが過ぎた1990年代後半から個人写真集として出版されている。また戦争直後に外国で出版された写真集が翻訳出版され、また米国国立文书保管庁が所蔵している戦争写真も再発見され、新しい写真集として出版されている。

私は本稿で、韓国で最近刊行された朝鮮戦争写真集を分析することにより、朝鮮戦争の記憶の特徴とその変化像を提示しようと考えている。韓国の戦後分断体制下において戦争の記憶が、南北朝鮮間に持続した心理戦や国家保安法体制、そして「特別国民」に対する統制を通じて管理されたとすれば、朝鮮戦争の写真もこのような巨視的な管理体制下に置かれていたが、2000年以後急増する朝鮮戦争写真集の出版は、既存の朝鮮戦争に対する国民国家的管理体制の亀裂を表す指標であり、脱国民国家的观点を確保しようとする市民主義的现象として解釈する必要がある。

2. 「われわれが見た」朝鮮戦争

1) 冷戦下の公式的記憶

国家や国民主義的言論は、写真を通じて国民的記憶を創り出してきたが、こうした手段の1つが戦争写真と写真集だった。戦争は、個人と国家の運命を一致させて社会的秩序を再構成する重要な政治的事件であり、これに対する記憶は「国民」の創出に大きな影響を及ぼす。また写真はこれを通じて再現された姿を、実際に確認させる効果があるため、特定の記憶を忘却させ、また他の特定の記憶を公式化させて国家的記憶に轉換させる。

朝鮮戦争後の社会体制、すなわち冷戦は、戦争の記憶を特定の方式で再構成する要因であると同時に、条件として作用した。冷戦は、物理的な戦闘と殺戮がなく、また地理的な戦線の変化がない代わりに、戦争で構成された心理戦が持続され、戦争が起こりうるという可能性を常に強調しながら、相手を敵とみなす「敵対」と「体制競争」が持続される状態をいう。

そうだとすれば、冷戦下で朝鮮戦争の写真はどのように取り扱われたのであろうか。朝鮮戦争の写真集に対する体系的な研究は、意外にも最近になってなされた。この分野でなされた新たな成果である金亨坤の研究(2007)を糸口にして朝鮮戦争以後の韓国での朝鮮戦争の記憶を明らかにしよう。

キム・ヒョンゴンは、朝鮮戦争に関する公式的記憶の変化を追迹するために、1950年代後半から2004年まで発行された8冊の写真画報集を選び、これらが変化する様相を分析した。またキムは、この画報集とともに、主要日刊紙各年版の6月25日付新聞に掲載された朝鮮戦争関連写真の変化を、主に反共理念の変化という視角から分析した。キムは、戦争後の冷戦期に朝鮮戦争の写真集が再現する戦争の記憶は、反共の記憶、記念対象としての戦争、そして受難者として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であると要約した。反共イメージの場合、北朝鮮の南侵を視覚化し、人民裁判と人民軍による「良民虐殺」を浮き彫りにさせ、避難民のイメージを活用した。このような反共イメージは1990年代から大きく弱まった。また1950年代から1970年代までの朝鮮戦争の記憶を表わす写真集には各種の显忠塔と記念碑の写真を通じて国家のための犠牲の尊さを浮き彫りにさせ、戦争初期の6カ月間を集中的に取り上げて「勝利」のイメージを創り出そうと努力した。これとは反対に、この時期には「受難者としての民間人」というイメージはほとんど出現せず、軍人の英雄的戦斗

を中心にした写真が強調された。こうした傾向は1980年代以後変化し、南北朝鮮の住民すべてが体験した戦争の苦痛が強調されていると主張した。

私が見るところ、1950～70年代の間に出版された朝鮮戦争の写真の特徴は、そのほとんどが、朝鮮戦争は韓国現代史の大きな分岐点であるが、朝鮮戦争だけを集中的に取り扱わないという点である。朝鮮戦争を集中的に取り扱った写真集のうちの1つが、1970年の徴文出版社編集局が発行した『目で見る朝鮮戦争』である。戦史編纂委員長の推薦辞がついたこの写真集は、冷戦期の朝鮮戦争の記憶について1つのモデルを提示している。この写真集は、朝鮮戦争20周年を記念して編集出版されたもので、「北傀の極悪非道な蛮行に身を震わせ、祖国の命脈と自由を守護しようとする十字軍の毅然とした姿に肅然」とさせられるという序文をつけている。

徴文出版社は、新聞と放送を通じて朝鮮戦争の写真を収集し、2000枚あまりの写真を集めて「世の中に知らされなかった写真を中心に1000枚」を選び編集した。この写真集は、「北纬38度線」、「ああ！6・26」、「洛東江の血戦」、「仁川上陸作战」、「太极旗は揚がった」、「平壤入城」、「无念を残して」、「老兵は死なず」、「休战会谈」など9つの部分で区分されている。写真の撮影者と時間や場所は明らかにされず、写真ごとにキャプションがついている。典型的に、戦争初期6カ月間の写真が大部分を占めている。いちばん最後には戦争3年間の「光荣と汚辱でつむがれた激战场」20カ所を選定し、示している。

それ以後、朝鮮戦争の写真だけを扱った画報集は、1985年に出版された『写真で見る受難の民族史』である。この時期になると、戦争後一世代が過ぎたという時間的経過とともに、「記憶の退色」が議論され始め、「受難史」としての朝鮮戦争観が浮き彫りになり始めたことを知ることができる。これと同じ写真集が、1987年、「写真で見た朝鮮戦争の実状」として韓国言論人同友会から発行された。朝鮮戦争40周年となった1990年、KBSは相当な量の資料調査を通じて、ドキュメンタリー「朝鮮戦争」を放映し、このとき収集された写真を集めて1991年に「ドキュメンタリー朝鮮戦争」として出版した。ここには全846枚の写真が載せられているが、分断/南と北、米ソ軍の撤収と38度線の衝突、爆風、北進、また別の戦争、協商の批判、後方戦争、休戦、エピローグ（反省）など、9つの部分から構成されている。この写真集は、南北関係を敵対関係でとらえることから少しずつ抜け出している現状を示しているが、この時期が世界的に冷戦体制の解体期だったという点で、時間的感覚の違いを綿密に評価する必要性を感じる。

2) 国防部政訓局写真隊の活動

朝鮮戦争以後、戦争写真は数えきれないほど国民的記憶の創出に活用されたが、それを撮ったカメラマンや撮影日時、場所についての正確性への疑問はそれほど提起されなかった。写真をイメージとして取り扱ったためである。韓国で戦争写真を生産した主体は、ほとんどが国防部政訓局報道課の写真隊と各部隊所属从軍カメラマンであった¹⁾。それにも

1) 彼らが撮影した写真は、韓国軍の「政訓」業務のためのものであり、韓国で正訓は軍人たちに対する公報 Troop Information、大民公報 Public Information、軍一般教育 Troop Education、そして心理戦を

かわらず、これに対する具体的研究はほとんどなされなかった。

朝鮮戦争写真集の出版を主導してきたヌンピッ (눈빛) 出版社は2005年、『彼らが見た朝鮮戦争』というタイトルで、中国と米国で1950年代に刊行された写真集3冊を翻訳発刊した後、2008年には「彼らが見たもの」と対比されるように、「私たちが見た朝鮮戦争」という写真集を発刊したが²⁾、これは1950年当時、国防部政訓局写真隊隊長だったイム・インシク (임인식) が残した写真を集めた写真集である。

イム・インシクの写真集は、序文 (6) とともに、戦争勃発 (31)、仁川上陸作戦とソウル収復 (수복) (34)、戦争の伤痕と同族間の争い (27)、北進と平壤入城 (12)、戦乱で追い出された民間人 (29)、終わらなかった戦争 (18) など、6章で編集され、全123枚の写真が収録されている。この本は他の写真集と区別される数種類の特徴を持っている。まず、この写真集は、序文にイム・チョンイ (임정의) の父親に対する回顧とともに、各章に該当するイム・インシクの日記が6月24日から10月21日まで部分的に提示されており、写真を撮っている状況に対する文脈が具体的に表れているという点である。二つめは、この本の最大の特徴であるが、当時の政訓局写真隊、または隊長イム・インシクが戦線に从ってどのように動いたのかがよくわかるという点である。戦争勃発から1950年10月の平壤奪還 (占領) 時までの写真は、最前線の様子を非常に生き生きと表しており、特に平壤住民の動向がよく表現されている。

三つめに、イム・インシクの写真集には、1950年末、すなわち1・4後退に代弁される中国軍参戦以後の戦闘写真は掲載されておらず、単に1951年から始まった休戦会談にかかわる写真だけが収録されている。これは1950年から1980年代までの韓国の公式的記憶を表す写真集がもつ共通点でもあるが、公式写真集が理念的な要因によって北進の局面までの写真を主に表し、2次後退期以後の写真を省略する傾向があるとすれば、イム・インシクの写真集も同様の要因によって編集上省略されたからなのか、あるいは当時、政訓局写真隊やイム・インシクがこれ以上危険な前線に投入されなかったからなのかは明確ではない。

四つめに、イム・インシクは、政訓局写真隊隊長として1950年から1952年5月まで活動したが、イムが撮った写真すべてが政訓局に移管されたわけではなかったようである。当時の政訓局写真隊員は、自分たちが撮った写真の一部を個人写真と考えたり、個人のカメラを別に携帯したりすることができたのかもしれない。そのため、たびたび自分の姿を表した写真もっていた。

イム・インシクの写真集出版の助力も受けて、政訓局写真隊に関する研究がキム・ユンジョン (2009) によってなされた³⁾。キムの研究にもとづけば、政訓局報道科の写真隊は朝鮮戦争勃発以前に組織されていたことがイム・インシクの日記から確認することができる。初期の写真隊員たちは、8月28日のソウル後退時、イム・インシクを除いては脱出す

含むものである

2) この出版社が、はじめから朝鮮戦争の写真を、「私たちが見た」ものと「彼らが見た」ものとに区分して出版することを企画したのかどうかはわからないが、朝鮮戦争を眺める眼差しの違いを認識しているのみならず、
眼差しの交差を

通して韓国人たちもった朝鮮戦争の経験やイメージを客観化しようとする努力の一环であるに違いない

3) 김윤다큐멘터리 한국전서울대 고고미술사학과 석사학위논문, 2009年

ることができなかつた。大邱へ後退するときまでの写真は、ほとんどイム・インシクが残したのである。特に7月10日、忠清南道ヨンギ（연기）郡チョニ（전의）面で破壊された北朝鮮軍のT34戦車の姿を撮った。このとき、両手を電線で縛られたまま銃殺された米軍の死体も撮影し、これをAP通信のシン・ファボン（신화봉）記者に預け、7月12日、世界に発信された。

イ・キョンモ（이경모）は、写真隊は「陆军本部が大邱に駐屯したときに始まった」と証言した⁴⁾。イ・キョンモが写真隊に合流する過程を見ると、写真隊長が全国的に知られたカメラマンを呼び入れて写真文官として从軍するように勧誘したことがわかる。政訓局報道科は、はじめソウルの明洞にあったが、大邱へ移動した後、さらに釜山へ後退したが、彼らは9月23日、仁川へ上陸して軍人たちが作战する姿を撮影した。平壤ではソ・スンサム（서순삼）という有名なカメラマンのサムジョン（삼정）写真館を中心に取材活動をし、从軍カメラマンたちも増加した。政訓局写真隊の撮った写真は戦争に関する教育と宣伝に活用された⁵⁾。米国公報院ではよく画報の展示会が開かれた。

韩国人カメラマンたちは、おおよそ1～2年または数カ月の从軍作家としての任務を遂行し、このような任務が終わった後にまた民間カメラマンに戻ったが、彼らにとって朝鮮戦争は、自分が住んでいた生活世界の破壊であったので、異国的な魅惑や戦争の恐怖を伝える客観的伝達者という立場を超え、自分を記録し省察する作家としての立場をもつようになった。

一方、朝鮮戦争に関する写真を議論するとき重要なテーマの1つが検閲である。韩国政府は、戦争が勃発すると同時に非常事態下の犯罪処罰特別措置令（特措令）を公布し、7月には全国戒严令と言論出版に関する特別措置令を发表した。国防省政訓局報道科は11月、新聞や雑誌はもちろん、張り紙ポスターなどすべての出版物を事前検閲の対象とすると发表した。ここから推測すると、逆に、朝鮮戦争初期には比較的自由に写真を言論で報道したことになる。当時の新聞は、写真を掲載するとき撮影したカメラマンや場所、日時などに関する情報に无頓着であり、短く公式的な匿名の出处を示す場合が多かった。写真検閲研究での难点の1つは、韩国のカメラマンが撮った写真には検閲の痕迹を表す事例がほとんどないという点である。むしろ、米国国立文书保管所で发掘された写真には、写真の上に制限（restricted）されたり、制限されたが解除されたりした表示があるものが見られる。これは明らかに、この写真が報道写真に属し、写真検閲の対象になったということの意味する。米国側の写真に対する検閲の仕組みが当時の韩国军政訓局の検閲と同じだったかどうかはまだ定かではない。

写真を含む出版物一般に対する军事検閲は、军事秘密の维持や心理戦の次元から考虑された。战争写真はそれが表している现实の一部を切り取ったものとして、现实の反映であると同時に变形であるだけに、跃動的に動く现实そのものを再現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にもかかわらず、战争写真やピラは、最も強力な重要な心理戦の手段となる。特に写真を活

4) 최인광복과분한국전쟁의 영김윤수 한국미술 100년한길200年

5) 政訓局写真隊所属のカメラマンが制作した写真は、「国际报道连盟」という団体が発行したハングル雑誌『国际报道』や英文雑誌『Pictorial Korea픽토리컬리』たびたび掲された。『国际报道』は、1945年11月に创刊された时事画报杂志で、画家だった宋政勋が編集兼发行人であった详召윤（2009）参照

用したビラは、それがもった真相性ゆえに広く活用された。これらの写真は、たびたび我军と敌军を勇猛さと卑屈、勝利と敗北、丰かさとひもじさ、君臨とヒューマニズムなど、さまざまな二元的対比に適用させることで、自軍の正当性と敌军の卑劣さを強調して内部的な団結と外部的な攪乱という二重の目的を果たそうとした。

3. 「彼らが見た」朝鮮戦争

1) 米国の朝鮮戦争写真

2005年、ヌンピツ出版社は、「彼らが見た朝鮮戦争」シリーズの2巻と3巻で、米国参战勇士会が1951年と1954年に刊行した写真集、そして国连军司令官だったマッカーサーと彼の後任だったリッジウェイ、クラーク将军の報告書を一緒に編集し、出版した。第2巻は、1945年の解放から1950年末、北朝鮮地域からの後退の場面までを載せているが、戦争の背景、初期の局面（6.25—7.31）、海岸桥头堡の确保、战势一変（仁川上陆作战）、侵略の挫折（北朝鮮の疲労困怠）、新たな侵略、撤収（38度线以南への後退）、反击（敌の扫讨）、议会演说など、9つの局面で構成されている。ここには米军政期に撮影された写真や、战争勃发後の米军の活动状况を间近から撮影したものが多い。

第3巻は、1951年から1953年までの米军と国连军の活动を、宣战布告无き战争、制限された战争、1951年の春と夏、1952年春、1952年の夏と秋、1952-53年冬、1953年の春と夏、休战交渉など、9つの局面に区分している。第3巻は、米军の压倒的な武器と北朝鮮地域に対する爆击の様子、虏收容所の様子などを忠実に示した写真で構成している。

この写真集の韩国语版編集者は、この写真のほとんどは米军所属写真兵と军属カメラマンたちが撮ったものであり、航空写真は米空军が撮ったものだと说明し、この写真集に收录された写真はアメリカ国立文书保管所に保管されているものと推定している。1951年と54年当时、これらの写真集は当时の海外参战军人に配布されたものと推定するが、その证据は提示されていない。韩国语版編集者はこの战争写真の大部分が韩国に初めて公开されるものであり、ここから避难民と战争孤儿の様子に注目し、さらに战争の实际の被害者が谁なのかをわれわれに寻ねていると書いた。すなわち、米军が记录した写真を通じて韩国人たちの犠牲と苦痛を読み取ろうとするのが、この写真集再刊の目的と判断される。

米军側の写真集が、韩国で「彼らが見た」ものとして分类されたことに关して言及する必要がある。今日の韩国では、米国に対するとき、「彼ら」と表现するのが一般的であるが、朝鲜战争当时はそうではなかった。韩国人が朝鲜战争の记忆において米军や国连军を「彼ら」と表现するのは大きな变化に属する。

一方、この写真集を理解するにあたって、当时の米军を含めた西側阵营の写真撮影の状况を検討する必要がある。レビンスキ（Lewinski）は战争写真の历史を说明しながら、战争カメラマンたちが「远い所の目击者」（1848—1912）、「客观的观察者」（第1次世界大战—スペイン内战）、「入队した军人」（第2次世界大战）、「亲密な友达」（朝鲜战争—北アイルランド战争）、「素晴らしき探険家」（ベトナム战争）へ变化したと見てい

る6)。朝鮮戦争は、カメラマンたちが战斗する軍人たちとともに活動しながら写真を撮った重要な契機であったというのである。

アメリカや西側陣営のカメラマンは、軍に属したカメラマン（写真兵）とマスコミ報道のために从軍した人々に区別される。現在までの研究によれば、朝鮮戦争を撮影した非韓国人（外国人）从軍カメラマンの大部分は、マスコミ各社の依頼で从軍し、マスコミに掲載する目的で写真を撮影したという点で、これらの写真はフォトジャーナリズムの性格があった。朝鮮戦争でアメリカの眼差しを代弁すると見なされてきた代表的な事例が、1951年に刊行されたダンカン(D.D.Duncan)の写真集『これが戦争だ This is War』と、彼を含めたライフ志の从軍記者たちが撮った写真を基礎にして1975年に発刊された『戦争での生 Life at War』という写真集である。雑誌ライフ志のカメラマンとして活動したダグラス・ダンカン是非常に有名なカメラマンであり、彼の写真集に載せられた米軍のイメージが、後にワシントンDC国立博物館韓国戦参戦勇士記念物のモデルになった。彼は戦争写真の新しいジャンルを開拓したと評価される。

2) 中国軍の写真集と眼差しの交差

朝鮮戦争が休戦状態に入って以後、中国人民支援軍（中国义勇军）は、すぐに中国に归还せず、北朝鮮の前後再建事業に动员された後、1958年に中国に归还した。朝鮮戦争に参戦した中国軍の眼差しは、中国の解放军画报社から1959年に発刊された「輝かしい中国人民支援軍」いう写真集によく表れている7)。

この写真集は、1950年の中国支援軍の募集过程から朝鮮戦争に参加し、活動する場面、そして休戦以後、北朝鮮の再建に参加する場面、1958年に中国へ归还するまでの場面を載せた年代記的活動報告書の性格をもっている。この写真集は、中国と北朝鮮との友情または「血盟关系」が特に強調されている。これらの友情は、国家間関係のみならず军民関係を貫くものである。この写真集に含まれている写真では、中国軍が北朝鮮との国境線である鴨緑江を渡る前に北朝鮮を眺める視線が非常に印象的で、米軍の非人道的戦争遂行を「細菌战」関連写真を通じて強く批判しているという特徴をもっている。

この写真集も、中国の国民国家的眼差しから構成されているために、この写真を撮った主体は明らかにされていない。また当時、中国人民支援軍に参戦してから中国への归还を拒否し、台湾に帰った捕虜たちについてまったく言及がない。米軍や韓国軍の写真集には、休戦会谈当時の捕虜たちに対する処理問題、特に反共捕虜たちに対する写真記録が非常に多く、そのなかには中国人捕虜たちに対する写真がとても詳細に表れている。

今日の観点でより重要なのは、この写真集が韓国語に翻译されて韓国で出版され、多くの読者がこれを読んだという点である。ヌンビツ出版社はこの本を『彼らが見た朝鮮戦争1』と名づけて出版した。この写真集の韓国語出版はいくつかの点で重要な意味をもって

6) J.Lewinski, The Camera at War: a history of war photography from 1848 to the present day, NY: Simon and Schuster, 1978

7) 中国解放军画报社『光荣的中国人民志愿军』959年노동환 외 그들이 본 한국전쟁 1: 항미원조 중국인민지원군빛출판200年

いる。

第一に、この本の韓国語の出版担当者は、過去に中国で刊行された写真集を韓国で出版する過程で、写真の選定と配列、編集、写真説明など原資料に忠実に出版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ので、「下手すると、偏向された眼差しを露出させる危険がある」という点を指摘し、この本を韓国で出版することができたのは、韓国「社会がそれほど民主化し、読者がある1つの观点に一方的に振り回されないほど成熟したという自信」があるからだとしている。

第二に、東アジアの脱冷戦と戦争記憶の再構成において、国民国家を超えたテキストの認定と、これを通じた「過去」に対する客観的理解、そして「敵対的观点」に対する客観的理解を増進させているという点である。朝鮮戦争の写真は、戦線で二分された地域で相手の陣営を投射する方式で生産されたため、明確に見えるものと死角とが区分される。認識主体から見ると、「相手に照らされた私」や「彼ら内部」は一種の死角に属しており、その正確な姿はわからない。恐怖と不安が、多くの場合无知から発生するとすれば、最小限の誤解は眼差しの交差を通じて克服しうるのである。

第三に、このような观点の交差を通じて東アジア冷戦体制が帯びていた問題点に対する省察が可能になる。朝鮮戦争の後に形成された東アジア冷戦体制は、大きく二度にかけて変化した。最初のきっかけは、1972年に成立した米中修交と日米修交、そして沖縄の日本への復帰/帰属であり、次のきっかけは、1990年の韓口修交と、1992年の韓中修交であった。この二つのきっかけを通じて東アジア分断体制の一部が崩れた。にもかかわらず、中国の朝鮮戦争参加とそれが残した問題は、相変わらずその言及が困難なタブーの領域に置かれている。この写真集の発刊は、こうしたタブーを打ち砕く努力の第一歩の1つと見なすことができる。

4. 戦争記憶の省察と再構成

2000年6月、韓国の金大中大統領が北朝鮮を訪問して歴史的な南北会談をすることにより、韓国の脱冷戦化が本格的に始まった。この頃、朝鮮戦争への眼差しも确实に変化した。これを代表する研究成果の1つが金東椿の「戦争と社会」（2000）である。彼はこの本で、朝鮮戦争を非難、占領、虐殺という3種類のキーワードで見る視角を提示した。こうした观点の変化は、以後の朝鮮戦争写真集に影響を及ぼした。

パク・ト（박도）は米国国立文書保管庁の朝鮮戦争に関する480枚あまりの写真を集めて編集し、2004年6月、『消し去りえないイメージ』というタイトルの写真集を出した。この写真集は、戦争の時間的順序によって写真を配列するのではなく、主題別、対象別に区分している。各章の小見出しは、1945-49、米軍と国連軍、国防軍と人民軍、战火に包まれた朝鮮半島、虐殺、避難民と戦争孤儿、捕虜、停戦会談と休戦、などである。今まで見られなかった写真も数多く含まれている。そのため、写真集に対する大衆的反応は非常に大きかった。彼は、2005年にまた米国へ行き、770枚の写真を集めて2006年に同じタイトルの写真集の後続編を刊行した。この本は小見出しの区分なく、「戦争に呻く人々」とまとめられている。

この写真集とともに、パクは自分が収集した写真のなかで最も衝撃的な写真100枚を選び、「私を泣かせた朝鮮戦争の100場面」というタイトルの写真集として出版した。私は、この写真集に載せられた写真を眺める眼差しとその選択の基準とが、最近韓国社会で変化している朝鮮戦争の記憶を指し示す指標と見なすことができると思う。この写真集は、どのような基準で写真を選択したのかを明らかにしていないので、これを少し詳細に分析する必要がある。この本は、7つの部分に区分されているが、各部分には別に小見出しがつけられていないので、その区分の基準と各部分に対する意味を解釈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この本の写真構成を分析してみると、戦争の記憶において、軍人よりは一般市民たちの様子により大きな比重が与えられており、テーマ別に見ると、捕虜、虐殺、废墟のなかの希望、などが新たな議題となっていることがわかる。同時に、理念的分断を超えて、国家暴力に身を置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かった人間の姿を浮き彫りにさせ、「国民」よりは「市民」または「個人」に新たに注目しているという点が目を引く。

2000年以後に発刊された朝鮮戦争写真集が新たな省察を向けたものだけがあるのではない。韓国の状況を、相変わらず国民国家の次元から眺め、過去の経験が希薄になることを忧虑する観点も強力に残っている。1998年から2007年までのいわゆる「民主政府」下で進められていた脱冷戦と戦争記憶の再構成の傾向に対し、批判的眼差しがなかったのではなく、このような観点は「進歩改革主義と穏健な中道保守の和合と相生」または「過去の経験を尊重」論として現われたり、よりはっきりと「ニューライト」を標榜する組織も現われたりしている。

キル・クァンジュン（길광준）は、約1600枚の写真と写真で説明されない当時の連合軍の作战および状況要図をまとめて『写真で読む朝鮮戦争』を発刊したが、キルは序文で次のような立場を披瀝した。キルは「南と北が対峙している状況では、朝鮮戦争について容易に語りえない鋭敏な真実」が存在しており、これを文章にするにはまだ時機が至らない気がするので、「写真集で代弁する」と書いた。このように、写真集は、ときに意見と立場に対する婉曲的で間接的な表現手段でもある。

5. 戦争記憶と脱冷戦化に向けて

2009年10月、韓国の有功者法の改定をめぐって発生した韓国とベトナム間の小さな摩擦、すなわち「ベトナム戦争に対する表現問題」や北朝鮮を訪問した中国の温家宝総理が「人民支援軍烈士陵园」を訪問し、北朝鮮と中国の関係を想起させたエピソードは、過去の戦争記憶が現在の東アジアにどのように作用しているかをよく示すものである。

戦争写真は、確かに戦争の記録であるが、対象を捕捉する位置（position）と視線（perspective）は、敵対するどちらか一方に属している。戦争写真は、戦線または警戒線を間に置き、敵対する状況で一方の陣営に立って撮ることができる場面のみを表している。また戦争写真は、意図的な写真撮影の目的に属する。これらは長い間、国民主義的立場と東アジア分断体制を支えてきた。

2000年以後、こうした状況はかなり変化してきた。朝鮮戦争の写真を、それまでは、

概して報道写真、またはフォトジャーナリズムとして理解してきたとすれば、最近では朝鮮戦争に関する写真すべてが報道のための写真ではなかったという点に注目し、特に韓国人カメラマンたちの自分省察の側面を強調しながら記録写真としての意味を強調し始めた（김윤정、2009）。

朝鮮戦争の記憶問題は、単に韓国内の進歩対保守の対立と葛藤の領域のなかだけにあるのではなく、戦争に参加した国家間に存在する競争と葛藤の領域のなかにも存在する。東アジアの平和や共同体的認識を強化するためには、国民国家の単位を超えて東アジア全体を視野に入れ、これらと比較検討する作業が必要である。眼差しの交流は、一方では彼らの眼差しを理解できるようにするが、同時に戦争自体を超えて平和をより積極的に想像できるようにする。東アジアで平和と共同の繁栄を果たすためには、「過去」に対する眼差しの交流と、これを通じた客観化がもう少し進めら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中日战争初期日本的“东亚新秩序”

■ 臧运祜（北京大學歷史學系 副教授） ■

中日战争初期日本的“东亚新秩序”

— 以“兴亚院”为中心的考察

臧运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副教授）

〈目 次〉

- 一、第一次御前会议、第一次近卫声明之后建设“东亚新秩序”目标的提出
- 二、关于设立“对华院”的酝酿
- 三、第二次近卫声明、第二次御前会议、第三次近卫声明与建设“东亚新秩序”国策的确立
- 四、“兴亚院”的正式成立
- 五、尾语：“兴亚院”之与日本“东亚新秩序”

近代日本第一次将建设“东亚新秩序”作为对外政策目标提出、作为国策而确立，是在中日战争开始之后的1938年，与此同时，日本也开始酝酿设立统一的对华中央政府机关，最后成立了“兴亚院”。鉴于迄今为止的中、日两国学界对此问题并无更多深入的研究成果，本文在笔者此前有关论著的基础上，¹⁾继续进行以下的简要论述。

一、第一次御前会议、第一次近卫声明之后建设“东亚新秩序”目标的提出

日本自1937年9月2日将全面侵华战争定名为“中国事变”之后，到年底，尽管日军侵占了太原、上海和中国首都南京，但由于中国政府继续领导全国抗战，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战略企图并未实现，“中国事变”仍未解决。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军部首先考虑处理“中国事变”的政策。在华中方面军12月13日攻占南京、华北方面军14日在北平扶植了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之后，15日，大本营陆军部制订了两个处理“中国事变”的方案。第一个是与现中国中央政府解决事变的方案，其主要方针是“伴随着当前战果的扩大与强化，迅速与现中央政府一道，全面解决日中之间的全部问题”；但同时又表示：“在确认不可能达到上述目的，或者现中央政府实际上已沦为一个地方政权之时，就要决意转向持久战争。”²⁾这等于说，如果现在的中国中央政府不能按日方要求，“全面解决日中之间的全部问题”，日本就要使之沦为一个地方政权。第二个方案就是适应上述“否认以往中央政府之后”的方案，它规定此时日本处理“中国事变”的方针为“否认以往的中国中央政府，在华北树立亲日满、防共政权，并对其加以指导，使之成为新生之新中国的中心势力。

1) 臧运祜著：《近代日本亚太政策的演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臧运祜：《“兴亚院”与战时日本的“东亚新秩序”》，《日本学刊》2006年第2期

2) 《现代史资》“日中战”，东京みすず书房，1964年55页

与此同时，在各方面树立亲日(或不抗日)反共的政权；在全中国，对抗日共产政权实施压迫、消灭的策略。”³⁾可见，军部此时的处理“中国事变”政策实际上是树立伪政权、否认中国中央政府的方针。

日本政府也与之相呼应。在12月14日华北伪政权树立之时，日本政府发表了如下声明：“攻占南京，目的在于使中国方面重返日中提携的大道。然而，如果国民政府不加反省，日本将与亲日政权合作，彻底惩罚抗日政权，并以此根本解决日中问题。”⁴⁾此后，日本政府对于10月1日四相会议决定的《中国事变处理纲要》进行了重新研究，并参考了大本营陆军部的上述第二个方案，于24日“阁议”决定了《处理中国事变纲要(甲)》，规定今后处理“中国事变”的宗旨是“不必期待与南京政府的谈判成功，要另寻别途，收拾时局；要随着事态发展，配合军事行动，对付南京政府的长期抵抗。”为此，该《纲要》详细规定了日本今后的“华北处理方针”和“上海方面处理方针”。⁵⁾此次“阁议”决定，已经近乎军部的上述方案，其中已经隐约地表明了日本“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

在军部与政府分别制定了有关政策之后，为了统一确立日本的侵华政策，1938年1月11日，昭和天皇裕仁在皇宫，主持召开了日中战争期间的第一次御前会议。参加者有参谋总长、次长，军令部总长、次长，内阁的首相、陆相、海相、外相、内相、藏相各大臣，以及枢密院议长。在近卫首相的主持下，广田外相就《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方案进行了说明。参谋总长、军令部总长、枢密院议长，分别在会上陈述了各自的意见，并表示赞成上述方针。会议最后决定的《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是统一了政府与军部的意志而达成的日本最高级别的国策，也是侵华战争以来日本第一次以国家形式决定的处理“中国事变”的国策。

第一次御前会议决定的上述文件，首先规定日本的国是：“同满洲国与中国合作，形成东亚和平的核心，并以此核心，对世界和平作出贡献。”据此，日本处理“中国事变”的最后目标是“消除日中两国之间过去的一切矛盾，从大局出发，重建两国邦交，互相尊重主权及领土，实现融和一致。”而在当前，为预防事变的重演，应建立必要之保障，并在两国间确实约定以下各项：“1、日、满、华三国完全停止破坏相互友谊的政策、教育、贸易及其他一切措施，并禁绝可能招致上述恶果的行动；2、日、满、华三国互相共同进行文化合作，实现防共政策；3、日、满、华三国关于产业经济，根据取长补短、互通有无的精神，约定实行共同互惠。”为了实现上述方针，要求日本各方要密切运用政略和战略，实施以下对策：1、当中国中央政府以诚意求和时，则根据附件(甲)即此前决定的“日中讲和谈判细目”(共九条)进行谈判，且日本将解除上述条件中的保障条款即附件(乙)；2、如果中国中央政府不来求和，则今后日本不以此政府为解决事变的对手，将扶植新政权并与之调整国交，而且将设法使现中央政府崩溃，或者归并于新政权之下。⁶⁾

根据上述方针，在日本要求中国政府给予答复之最后期限的1月15日，中国政府仍未答复，日本乃认定这是中国无求和的诚意。16日，经昭和天皇批准，近卫首相发表了“不以国民

3) 《现代史资》“日中战”，55页

4) 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战史丛书·中国事变陆军作战》），东京：朝云新闻社197年，46页

5) 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文书”下卷，原书房197年，3838页。以下所引该书简称《主要文书》(下)

6) 《主要文书》(下)，3838页

政府为对手”的政府声明，内称：“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18日，近卫首相又发表了一项《补充声明》称：“所谓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较之否认该政府更为强硬。……这次开国际法上的新例，在否认国民政府的同时，把它彻底抛弃，……不需要发布宣战布告。”⁷⁾这就是第一次“近卫声明”。

第一次御前会议和第一次近卫声明之后不久，1月20日近卫内阁阁议决定了一份《国策大纲》，将今后数年(大约到1941年)定为日本的“非常时期”，并决定了日本在这一时期的对外与对内国策大纲。其对外国策是“实现日、满、华的巩固合作，确立东亚的永远和平，对世界和平做出贡献。”具体而言就是“坚持日、满两国密不可分的关系，完成对满重要政策；积极努力，实现对华政策；努力发展南方经济。”⁸⁾虽然这份文件在当时是“禁止公布”的，但是，22日，广田外相在第73次帝国议会上发表的外交方针演说，对此主旨已有所发挥。他说：“我希望有关各国，正视中国的新局面，并与此相适应，理解帝国当前正在或者今后将要进行的合理调整的要求，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⁹⁾这是广田外相在“中国事变”后的第一次日本议会上，第一次公开提出了日本在对外政策上建设“东亚新秩序”的目标。

与此同时，日本军部同时也表明了这一个愿望。参谋本部第一部第二课（作战课）于1月20日起草、并于30日形成的一份《1938年以后战争指导计划大纲方案》，提出以1938—1941年为期，完成对苏、中两国的战争准备，并提出了以下方针：“以此次中国事变为转折，帝国周围出现了新形势。帝国的国防政策就是要有计划地准备东亚的长期战争，且对此加以自主指导，以实现作为我国国是的东亚经纶。”¹⁰⁾这个方案“虽是一个课内方案，并未形成陆军省部的定案，但在了解当时政策精神上还是很有意义的。”¹¹⁾这就是因为它所提出的日本国防政策上的“东亚经纶”目标，与日本政府的“建设东亚新秩序”的方针是一脉相通的。

上述表明，日本在第一次御前会议决定了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并由第一次近卫声明予以宣示之后不久，就已经决定在继续处理“中国事变”的同时，实现1941年之前的日本对外国策，而其目标就是要实现所谓日、“满”、华合作的“东亚新秩序”。

二、关于设立“对华院”的酝酿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扶植伪满傀儡政权之后，1934年9月14日，冈田启介内阁“阁议”通过《关于调整对满有关机构的文件》，决定在内阁设立“对满事务局”。¹²⁾经过枢密院的审议，12月26日，日本政府公布施行《对满事务局官制》。¹³⁾“对满事务局”直到1942年11月

7) 《主要文书》(下)，3838页

8) 美国国会图书馆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 S48S1112, 188188页

9) 《日本外务省档案》S48S1112, 4344页

10) 《现代史资“日中战”》24页

11) 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东京：朝云新闻社196年，53页

12)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伪满傀儡政权》，中华书局，1994年，第41—43页。

13) 《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东京：みすず书房，1964年，第600—601页。

合并于新成立的“大东亚省”（作为该省的“满州事务局”），历时八年。

发动全面侵华的“中国事变”以后，仿照上述“对满事务局”的先例，在日本的中央政府设置一个统一的机关，专门处理“中国事变”的有关事务，这成为日本统治集团的共识。

“中国事变”开始后不久，近卫首相就考虑设置一个“对华中央机构”，来谋求对华政策的一元化。¹⁴⁾第一次近卫声明发表后的1938年1月19日，企划院第三委员会的干事会通过了一份《关于调整对满、对华有关机关的文件》，作为“阁议”决定的方案，拟订在内阁设立“东亚事务局”。¹⁵⁾但是这个“东亚事务局”的方案，因受到了外务省方面的强烈反对而最后作罢。¹⁶⁾

3月初，近卫内阁的法制局又拟订了一个“对华局”的方案，准备交付“阁议”。它拟议在以首相为会长的“对华审议会”之下，设立一个“对华局”，其下设政治、经济、文化三个部门，分别担负调整对华事务的业务。¹⁷⁾外务省虽然赞成设立“对华审议会”，但是又反对设立“对华局”，故“对华局”方案仍然被搁置。

5月26日宇垣一成就任外相之后，近卫内阁以“五相会议”作为对华政策的最高决策机构，设置对华中央机关一事，暂时停顿了下来。但到了8月间，陆军方面又提出了设立“对华院”的方案。¹⁸⁾对此，外务省方面仍然予以抵制。9月29日的五相会议上，宇垣外相因此愤而提出辞呈，并直言：“对华中央机关方案，已使外交系统失去了核心。若将它加于外交界，颇感蒙受一大侮辱。而将此侮辱掩藏于时局重大、举国一致等等美名之下的某部（即指军部——笔者）的态度，真是所谓‘挂羊头、卖狗肉’。”¹⁹⁾

热衷于设立对华中央政府机构的近卫首相，一意孤行，不但接受了宇垣外相的辞职，由自己暂时兼任之，并且以陆军的上述方案为基础，在10月1日的“阁议”上决定了《关于设立对华院的文件》，规定对华院是“在中国事变期间设置的、以首相为总裁，以外、藏、陆、海四相为副总裁的对华中央机关”；还规定要在中国当地设立各个“分局”，并且要吸纳日本民间的有能有识之士，组成一个“对华委员会”。²⁰⁾

根据上述“阁议”决定，近卫内阁的法制局与各省进行协商，开始起草“对华院”的官制方案，但直到11月中旬才最后定稿。由于这时的日本驻华官员们强烈反对“对华院”的名称，因此，近卫内阁拟议设立的“对华院”，一直处于“挂羊头”的阶段，并未正式宣布成立。

三、第二次近卫声明、第二次御前会议、第三次近卫声明与建设“东亚新秩序”国策的确立

1938年春夏，日本根据“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继续发动了徐州会战、武汉会战，10月底攻占了广州、武汉。在日军侵占了大半个中国、而中国政府仍然继续抗战的情况下，

14) 矢治：《》，东京读社，1976年，42页

15) 支中机置问一件兴）》外务省外交史料A.1.1.0.31

16) 田弘伝刊行编行：田弘毅》，东京：1966年，31页

17) 《昭和十三年三月支スル件兴院）国立公书2A-40-）356。

18) 《主要》（下）3939页

19) 宇垣一成：《宇垣一成日记》，东京：みすず书房，1970-1971年，126页

20) 《主要》（下），3939页

日本在被迫转入军事战略上的持久阶段之后，开始了在政略上的对华进攻。伴随着日本的对华政略进攻，“东亚新秩序”的目标呼之欲出。

日本对华转入政略进攻的标志是11月3日近卫首相发表的第二次声明。²¹⁾这个以“不拒绝国民政府”为宗旨的声明，改变了近卫第一次声明中的立场。同时，它又在第一次声明之后，明确提出了日本处理“中国事变”的新目标，即建设“东亚新秩序”。它声称“建设东亚新秩序，渊源于我国的建国精神，完成这一任务，乃是现代日本国民的光荣任务。”并向世界宣布：建设“东亚新秩序”乃是日本开国以来的一贯国策，且日本将继续努力实现之。关于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内容，它提出“应以实现日、满、华三国合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建设连环互助关系为根本，以确立东亚国际正义，实现共同防共、创造新文化、实现经济结合为目的。”日本“对中国的期望，就是分担上述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责任。”这表明日本要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实现日、“满”、华合作的所谓“东亚新秩序”。

担任近卫内阁陆相的板垣征四郎，此前曾根据近卫首相的意愿，在6月17日提出的《指导中国事变的说明》中表示：日本今后积极处理此次事变的目的是“确立帝国的东亚盟主地位，重建邻邦中国，且以此为契机，适应不断发展的长期的东亚经纶，促进培养实力。”²²⁾第二次声明发表后，近卫首相在对该声明的解释中，对此继续进行了明确。²³⁾他宣称：所谓“东亚新秩序”，就是针对欧美势力在华及全世界构筑的旧秩序而言的；日本的最终目标，也就是要建设世界新秩序，并将与德国、意大利携手；而日本的这项大业，乃是“明治天皇的遗业”(11月3日为明治圣节——笔者)。

第二次近卫声明发表的另一个对华背景，是日本在宇垣外相的对华“和谈”失败后，由陆军方面继续进行的“和谈”。这次主要在上海进行(又称为“重光堂会谈”)，中方的主持者为受汪精卫指派的高宗武、梅思平，日本方面主要为影佐祯昭(陆军省军务课长)、今井武夫(参谋本部中国班长)等人。日本以高宗武的日本人化名，将此项和谈命名为“渡边工作”。到11月20日，双方经过密谈，已形成建设“东亚新秩序”的一系列日华协议文件(又称“重光堂协定”)，并分别向日本政府和汪精卫进行了报告。²⁴⁾

还在上述“和谈”工作进行的同时，日本统治集团就开始考虑确立“东亚新秩序”形势下的日中关系，即所谓“日中新关系”。大本营陆军部早在4月就拟订了调整“日中新关系”的方针，并移交给陆军省；到了8月底，陆、海、外、藏四省当局已就此达成了一致意见。

在上海达成了“重光堂协定”之后，为了使四省当局的上述方针成为日本坚定不移的国策，经过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及阁议的审议，11月30日，日本召开了第二次御前会议，决定了《调整日中新关系的方针》。²⁵⁾第二次御前会议的决定表明建设“东亚新秩序”已成为日本新的国策方针。该方针规定的“日中新关系”是：“日、满、华三国应在建设东亚新秩序的理想之下，为友好邻邦而互相结合，并以形成东亚和平的轴心为共同目标。”关于这种日中之间的这种“新关系”，又规定了三项原则及其具体事项，即：1、“善邻友好原则的事项”；2、“共同防卫原则的事项”；3、“经济合作的事项”。因此，第二次御前会议决定的国策，实际上是以上述三项原则来构筑日“满”华新关系，再以这种新关系，形成“东亚和平的核心”，进而以之建设

21) 《主要》(下)，第401页

22) 《太平洋战へ》“资料编”东京：朝日新闻社，1963年版2626页

23) 参：黄美真、张云《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年，99页

24) 关于“渡边工作”，详见：《太平洋战へ道》“资料编”2727页及《主要文书》(下)4040页

25) 以上过参见：《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5757页；文件见《主要文书》(下)4040页

“东亚新秩序”。这是针对广州、武汉作战后中国中央政府行将“垮台”、“渡边工作”正在酝酿新的日中关系这一新情况，而由日本最高统治集团决定的对华政策方针。第二次御前会议表明此时的日本，已经确立了建设“东亚新秩序”作为最高国策的地位。《调整日中新关系的方针》，则是日本“作为法西斯主义外交观念的东亚新秩序具体化为外交政策”的产物。²⁶⁾

12月20日汪精卫逃离重庆到达河内之后，近卫首相于22日发表了第三次声明，公开了第二次御前会议决定的上述方针：“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结合起来，以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并就上述三条原则分别进行了阐述，还声称这三条原则“是日本要求于中国的一个大纲。……实际上，日本只要求中国作出必要的最低的保证，为履行建设东亚新秩序而分担职责。”²⁷⁾第三次近卫声明确立的三项原则，是日本在对华政策上取代七七事变以前的“广田三原则”而产生的，故又被称为“近卫三原则”。

在日军占领广州、武汉之后的1938年底，以第二次近卫声明、第二次御前会议与第三次近卫声明的出笼为标志，日本的侵华战争转入“政略进攻”的时期。日本确立的直到1941年之前的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国策，以及期间酝酿提出的日“满”华三国“经济圈”与“国防圈”等具体目标，²⁸⁾这些直接奠定了太平洋战争后日本提出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以及“大东亚共荣圈”政策的基础。

第三次近卫声明发表后，中国最高领导人蒋介石于12月26日在重庆的中国国民党纪念周上，发表了驳斥该声明的讲话，他将日本的“东亚新秩序”概括为：“这是个推翻东亚的国际秩序，造成奴隶的中国，以遂其独霸太平洋，宰割世界的总名称。”还断定该声明的出笼表明：“日本的政策，现在已由他的大陆政策扩充到海洋政策，由他的北进政策改进到南进政策。简言之，日本现在的侵略政策是大陆与海洋同时并进，双管齐下了，在吞并中国的企图中，同时更要推翻国际秩序、独霸东亚、驱逐欧美的势力。”²⁹⁾

四、“兴亚院”的正式成立

随着1938年底建设“东亚新秩序”国策的确立，“兴亚院”的设立也水到渠成。

11月3日的近卫第二次声明发表后，日本的驻华官员们根据这个新的对华政策目标，将此前拟议中“对华院”的名称，进行了修改，并设计了以下8个名称，供内阁选择使用：1、东亚院；2、大陆院；3、东方院；4、东大陆院；5、新东亚院；6、兴亚院；7、新亚院；8、事变处理院。³⁰⁾据此，近卫内阁最后决定采用第6个“兴亚院”的名称，并于11月18日的“阁议”上决定了有关“兴亚院”的敕令案。³¹⁾

26) [日信夫清三编、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日本外交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63页

27) 《主要文书》(下)，40页

28) 1932日五相会议决定《从内部指导中国政权的大纲》，提出日、“满”、华三国在经济方面应“努力地完成三国经济圈而向前迈进”(《主要文书》，39页) 11日大本营陆军部及陆军省、参谋本部决定的193年秋季以后的战争指导方针》，提出解决中国事变“当前的目标，至少应把日、满、华作为一体，以主动地建立国防圈为重点”(《现代史资》，54页)

29)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外交，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55页

30) 《昭和十三年三月支設スル件(兴院) 日国立公书2A-40-1) 356。

枢密院随后对此进行了审议。在第二次御前会议之后的12月7日，在昭和天皇亲临的情况下，枢密院最后通过了《兴亚院官制》、《兴亚院联络部官制》等文件。³²⁾12月16日，日本政府发布了有关“兴亚院”官制的若干敕令，并同时任命柳川平助为总务长官、铃木贞一为政务部长、日高信六郎为经济部长、柳川平助代理文化部长。“兴亚院”从此宣布成立。

从上看来，“兴亚院”是在近卫第二、三次声明之间及第二次御前会议前后，日本最高统治集团确立了“建设东亚新秩序”国策之后的产物。12月26日，中国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在他发表的斥责《近卫声明》的讲话中，对于日本之成立“兴亚院”，曾有如下的评述：³³⁾

“对支院”已经是够侮辱、够可怕的一个名称了，改称了‘兴亚院’，简直是给全亚洲人以一种重大的侮辱。他这种做法，是要使整个中国支离灭裂，不止亡中国，也要危及整个的亚洲。……这是执行一切灭亡中国计划的总机关，也可以说是集日本从前在中国到处制造罪恶的种种特务机关之大成的一个总特务机关。……他长期的执行灭亡中国的计划，不达到目的永不停止，现在他的办法也有了，机关也有了，这也可算是图穷匕现，丝毫无隐了吧！

《兴亚院官制》规定的日本设置该院的目的是：“在中国事变中，在内阁总理大臣的管理下，设置兴亚院，掌管下列事务，但有关外交的事务除外：1、关于中国事变过程中，需要在中国处理的政治、经济及文化事务；2、有关上述事项的各种政策的制订事务；3、监督在中国以事业为目的、依照特别法律而设立的公司的业务，统制在中国有事业者的在华业务；4、统一、保持各厅有关中国的行政事务。”³⁴⁾

关于“兴亚院”官制的一系列“敕令”公布后，日本分别在东京和中国，开始组建中央总部和现地各联络部。

“兴亚院”在东京的总部机关，设置如下：

(一) 主要官员：

总裁，一人，由内阁总理大臣担任，“统理院务、统督所部职员、专行判任官之进退”。

副总裁，四人，由外相、藏相、陆相、海相担任，“辅佐总裁”。

总务长官，一人，“辅佐总裁与副总裁，掌理院务”。

(二) 下属部门：

总裁官房

政务部 下设：第一课（1、关于制订对华政策的事务，2、关于各部事务的联络调整事务，3、关于联络委员会、兴亚委员会的事务）、第二课（1、关于对中国新政权进行政治合作的事务，2、关于统一各厅对华行政事务的事务）、第三课（1、关于在华进行政治、经济及文化调查的事务，2、关于收集情报与启发宣传的事务）。

经济部 下设：第一课（1、关于中国经济开发计划的事务，2、关于对中国新政权实施、准备经济产业合作的事务，3、关于联络调整各课事务的事务）、第二课（1、关于监督华北经济开发有限公司及华中振兴有限公司的事务，2、关于统制在华企业的事务，3、关于在华开拓殖事业的事务）、第三课（掌管关于日中及在华交通及通讯的事务）、第四课（1、关于在华金融、财政、币制及税务的事务，2、关于对华贸易的事务）。

31) 《东置关一件》第一卷，日外务省外交史料M.1.1.0.7.

32) 《枢密会议》，第九十昭和篇四十，东京大学出版会199年，2830页

33)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外交，5—57页

34) 兴院部：《兴执提要》，东京，1940年1月，第37页。

文化部 下设：第一课（1、关于对中国新政权实施、准备文化合作的事务，2、关于民生的事务）、第二课（掌管关于卫生、防疫、医疗、救恤的事务）、第三课（掌管关于思想、教育、宗教、学术的事务）。

技术部

（三）各专门委员会

联络委员会

兴亚委员会

技术委员会

“兴亚院”在中国的各联络部，根据1939年3月10日日本政府以“敕令”、“阁令”的规定，“兴亚院”在中国的各机关，设置如下：

（一）日本在中国设立各联络部及派出所：

名 称	设 置 地 点	负 责 区 域
兴亚院华北联络部	北 京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辖区
兴亚院蒙疆联络部	张 家 口	蒙疆联合委员会的辖区
兴亚院华中联络部	上 海	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的辖区
兴亚院厦门联络部	厦 门	厦门岛及其附近
兴亚院华北联络部 青岛派出所	青 岛	青岛特别市公署的辖区

(二) 各联络部及派出所的具体事务部门设置如下：

华北联络部：官房、政务局、经济第一局、经济第二局、文化局。

华北联络部青岛派出所：官房、政务班、经济班、文化班。

华中联络部：官房、政务局、文化局、经济第一局、经济第二局、经济第三局。

厦门联络部：政务部第一班、政务部第二班、政务部第三班、政务部第四班、经济部第一班、经济部第二班、经济部第三班。

5、蒙疆联络部：总务课第一班（庶务）、总务课第二班（会计）、总务课第三班（调查）、政务课、经济课第一班、经济课第二班、文化课。

3月11日，日本政府公布了兴亚院各联络部的主官：华北联络部长官喜多诚一，蒙疆联络部长官酒井隆，华中联络部长官津田静枝，厦门联络部长官水户春造，华北联络部青岛派出所所长官柴田弥一郎。

至此，从东京的中央到中国的各地方，日本“兴亚院”全部地成立起来了。

五、尾语：“兴亚院”之与日本“东亚新秩序”

综上所述，中日战争初期的1938年，日本之提出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对华政策目标并将其确立为国策，与“兴亚院”的设立，几乎是同一个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东亚新秩序”与“兴亚院”，是日本对外政策上互为表里的历史产物。

1、对于“興亞院”，我們可以有如下的歷史判断：

关于“兴亚院”的构成。无论是东京的总部，还是中国当地的各联络部，其上下对应的主要部门都是关于中国的政务、经济、文化事务的部门；而且又以政务、经济两部门为重点。在中国各联络部，因为其所辖之中国占领区与伪政权具有不同的战略地位，日本的施策也有所侧重：大致说来，日本“兴亚院”在华的重点是华北、华中地区，为此均设置了高于其他联络部的政务、经济、文化三“局”（而蒙疆联络部为“课”、厦门联络部及青岛派出所为“班”）；而且对于在华中的经济事务尤其重视。可见，“兴亚院”是战时日本对于中国占领区制定与实施各项政策的总机关，也就是日本在政治上亡华的总机关。

关于“兴亚院”的性质。1938年11月18日近卫内阁通过“兴亚院”的有关敕令案时，还通过了绝密的了解事项，规定了军部的优越地位：“有关军事及警备对于中国有关机关的指导，根据陆海军最高指挥官的任务及协定而实施之。兴亚院的指导，乃是在上述范围之外的关于政务的指导。……兴亚院联络部次长以下的职员，必要时，可以由配属当地的陆海军司令部的胜任的武官兼任之。”³⁵⁾1939年4月11日上午的兴亚院第一次连络部长官会议上，政务部长铃木贞一的发言，再次道出了该院的性质：由于“兴亚院是事变中的机构”、属于“战时机关”，“故不得不适应军部的活动而发挥其作用”。³⁶⁾据此，就“兴亚院”主要官员的构成来看，东京本部的主要官员：总务部长柳川平助、政务部长铃木贞一，均是陆军中将。在华各联络部长官则是清一色的军部出身人员：华北联络部长官喜多诚一为陆军中将（前华北方面军特务部

35) 兴关敕令案》（1938年11月18日），《昭和十三年三月支スル件兴院）日国立公书：2A-40-）356

36) 兴院第一连长议记》（1939年4月10、11日），支中机关设置问一件兴设》，日外务省外交史料A.1.1.0.31

长)，蒙疆联络部长官酒井隆为陆军少将（前张家口特务机关长），华中联络部长官津田静枝为海军中将，厦门联络部长官水户春造、华北联络部青岛派出所长官柴田弥一郎分别为海军少将。因此可以说“兴亚院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主要由陆军军人指导下的政府机关。”³⁷⁾这就印证了蒋介石先前所斥责的兴亚院是“集日本从前在中国到处制造罪恶的种种特务机关之大成的一个总特务机关”。

因此，日本在侵华战争进入政略进攻阶段后，为了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设立的“兴亚院”，确是一个“挂羊头、卖狗肉”的机关。它实际上是一个在军部特务机关的把持下，对于中国占领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各项政策的决策与实施的总机关。与“对满事务局”一样，“兴亚院”不过是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对中国占领区实行殖民统治，企图在政治上灭亡中国的总机关，因而是一个地道的“灭亚院”。

2、对于战时日本的“东亚新秩序”，我们可以有如下的历史认识：

东亚世界古代的国际秩序，是被称之为以中华帝国为首的“华夷秩序”。³⁸⁾近代以后，“华夷秩序”因遭受欧美列强的历史性挑战而逐渐瓦解。近世的日本，曾长期游离于“华夷秩序”之外，并企图在东亚构筑自己的小型“华夷秩序”。³⁹⁾明治维新以后的近代日本，“脱亚入欧”，迅速加入到西方列强共同打破“华夷秩序”的行列之中。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朝鲜的亡国，“华夷秩序”彻底崩溃了，东亚世界建立起可以被称为“列强共管”的帝国主义的国际秩序。⁴⁰⁾在上述过程中，日本通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等，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历史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美列强无暇东顾，东亚国际秩序遭到了日本的破坏。一战结束之后，欧美列强重返东亚，建立起以美国为首的“华盛顿体系”。日本虽然在1920年代一度奉行“协调外交”，但终于以九一八事变为开端，正式挑战“华盛顿体系”，并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正式提出建立“东亚新秩序”，在太平洋战争之后提出了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可见，在两次世界大战及其战间期的东亚世界，日本对外政策的目标追求，已不仅在于共同或单独打破旧秩序，而更主要的是要建立日本式的国际“新”秩序。

如果相对于“华夷秩序”、“列强共管秩序”及“华盛顿体系”等东亚世界旧有的国际秩序而言，近代日本的政策目标或许在形式上可以被称为“新秩序”。但是，如果结合“兴亚院”，我们在实质上又不能不指出这是地地道道的日本造“旧秩序”。1941年1月15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发表的声明中，就指出了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所谓“新秩序”的实质：

在政治上，由一个国家全盘控制；在经济上，利用该地区的资源为该国的经济利益服务，

37) 官书报告（1938年12月31日），参考关系件《兴关》，日外务省外交史料H.7.2.0.4 8

38) 除了“华夷秩序”之外，又可以被称为“宗藩体制”或“朝贡体系”等

39) 也有日本学者称之为“大君外交”。但相当的中国学者则认为这不过是小型“华夷秩序”的翻版，或称“日夷秩序”

40) 此处所称“列强共管”的国际秩序，系笔者的个人之见。但应该说明的是，它不同于内藤湖南（1866—1934）在民国初年提出的“国际共管论”。中国学界最近关于后者的专论，参见：钱婉约著《内藤湖南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及《从汉学到中国学——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的有关部分。日本学界在战后以东方史学者为主，也有人对于内藤湖南的有关思想进行了批判，认为其导致了日本

侵华正当化（参见：谷川道雄《有关战后的内藤湖南批判——增渊龙夫的个案》，[日]内藤湖南研究会编著、马彪等译《内藤湖南的世界》，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第345—372页）

使该地区的其他国家陷于贫困，并将外国的利益排斥出去；在社会生活上，破坏个人自由，把被征服国家的人民降为二等公民。⁴¹⁾

自日中战争到太平洋战争期间存在的“兴亚院”，不但验证了战时日本所谓“东亚新秩序”的本质，也为我们今天的历史认识问题，提供了又一个极好的“物证”。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近代日本的“东亚新秩序”所留给东亚世界的，完全是负面的历史遗产。

41)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partment of States: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1931-1943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D.C., 1943. Vol. II., p330.

중일전쟁 시기 일본의 “동아시아 신질서”

— “흥아원(興亞院)”을 중심으로 고찰함 —

쟡원후 (北京大)

〈目 次〉

1. 제1차 어전(御前)회의와 제1차 근위성명(近衛聲明) 후 제기된 “동아시아 신질서” 건설 목표
2. “대화원(對華院)” 설립 준비
3. 제2차 근위성명과 제2차 어전회의 및 제3차 근위성명, 그리고 “동아시아 신질서” 건설이라는 국책(國策) 확립
4. “흥아원”의 정식 설립
5. 맺음말 : “흥아원”과 일본의 “동아시아 신질서”

근대 일본이 최초로 “동아시아 신질서” 건설을 대외정책의 목표로 제시하고 국책으로 확립한 것은 중일 전쟁이 시작된 후인 1938년의 일이었다. 이와 동시에 일본은 또 통일된 대중국 중앙정부기관 설립을 준비하기 시작하여 마침내 “흥아원”을 설립하였다. 지금까지 이 문제에 관한 중일 양국 학계의 심도 깊은 연구 성과가 많지 않다는 점을 감안하여, 본 글은 필자의 예전 관련 저서에 기초하여¹⁾ 간단히 아래와 같이 이야기 하고자 한다.

1. 제1차 어전회의와 제1차 근위성명 후 제기된 “동아시아 신질서” 건설 목표

1937년 9월 2일 일본이 대중국 전면전을 “중국사변(中國事變)”이라고 명명한 후 연말까지, 일본군은 타이위엔(太原)·상하이(上海)와 중국의 수도인 난징(南京)을 함락하였다. 그러나 중국 중부가 지속적으로 전국적인 항전을 주도하고 있었기에 “3개월 안에 중국을 멸망시킨다.”는 일본의 전략은 실현되지 못했으며 “중국사변”도 해결되지 못했다.

이런 상황에서 일본 군부는 “중국사변”을 처리할 정책을 우선적으로 고려하게 되었

1) 臧運祐 : 근대 일본의 아시아 태평양 정책의 변화(近代日本亞太政策的演), 베이징대학출판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년 ; 臧運 : 흥아과 전시 일본의 동아시아 신질“興亞院”與戰時日本的“東亞新秩序”》, 일본학간(日本學刊) 200년 기(期)

다. 화중(華中) 지역의 군대가 12월 13일 난징을 함락시키고, 화북(華北) 지역의 군대가 14일 베이핑(北平)에 괴뢰정권인 “중화민국 임시정부”를 세운 후, 15일에 최고 사령부 육군부(陸軍部)는 2개의 “중국사변” 처리 방안을 제정하였다. 첫째는 당시 중국 중앙정부와 함께 사변을 해결하는 방안으로, “전쟁의 성과가 확대되고 강화됨에 따라 신속하게 현 중앙정부와 함께 중일간 모든 문제를 전면적으로 해결한다.”는 것이 주요 방침이었다. 그러나 이와 동시에 또 “상술한 목적 달성이 불가능하다고 확인되거나 현 중앙정부가 실질적으로는 지방정권이 되었다고 확인될 경우, 결연히 지구전으로 전향해야 한다.”²⁾라고 하였다. 이는 당시의 중국 중앙 정부가 일본의 요구에 따라 “중일간 모든 문제를 전면적으로 해결”하지 못한다면, 일본이 중앙 정부를 일개 지방 정권으로 만들겠다는 것이다. 두 번째 방안은 바로 앞에서 이야기했던 “기존의 중앙 정부를 부인한 후”의 방안으로, 이때 일본의 “중국사변” 처리 방침을 “기존의 중국 중앙 정부를 부인하고 화북에 친일·반공 정권을 수립하여 이를 새로 태어나는 신중국의 중심세력이 되도록 지도한다. 동시에 각 분야에 친일(혹은 항일이 아닌) 반공 정권을 수립하여 중국 전역에 걸쳐 항일 공산 정권에 압력을 가하고 이들을 소멸시키는 정책을 펼친다.”³⁾라고 규정했다. 이 당시 군부의 “중국사변” 처리 정책이 실제로는 괴뢰정권을 세우고 중국 중앙 정부를 부인하는 정책이었음을 알 수 있다.

일본 정부 역시 이에 호응하였다. 12월 14일 화북 괴뢰정권이 수립되었을 때, 일본 정부는 다음과 같은 성명을 발표하였다. “난징 함락의 목적은 중국이 중일 협력의 길로 되돌아오게 하기 위함이다. 그러나 국민 정부가 반성하지 않는다면 일본은 친일 정부와 협력하여 항일 정권을 철저히 처벌함으로써 중일 문제를 근본적으로 해결할 것이다.”⁴⁾라는 내용이였다. 그 후, 일본 정부는 10월 1일 4상회의(四相會議)에서 결정된 《중국사변 처리 요강(中國事變處理綱要)》을 다시 연구하고 앞에서 언급한 최고 사령부 육군부의 2번째 방안을 참고하여, 24일 “내각 회의”로 《중국사변 처리 요강(갑) (中國事變處理綱要(甲))》을 결정하고, 그 후 “중국사변” 처리의 취지는 “난징 정부와의 담판이 성공할 것이라고 기대할 필요 없이 다른 방법을 찾아 시국을 수습해야 한다. 사태 발전에 따라 군사 행동과 함께 난징 정부의 장기적인 저항에 대처해야 한다.”라고 규정하였다. 이를 위해 이 《요강》은 그 후 일본 정부의 “화북 처리 방침”과 “상하이 처리 방침”을 상세하게 규정하였다.⁵⁾ 이 “내각 회의” 결정은 이미 군부의 상술한 방안에 근접해 있었으며, 거기에는 “국민 정부를 상대하지 않겠다.”는 일본의 방침이 은연중에 드러나 있었다.

군부와 정부가 각각 관련 정책을 제정한 후, 일본의 중국 침략 정책을 통일시켜 확

2) 현대사 자료9《現代史資》일중전쟁2日戰, 도 : 미즈書房, 196년, 55

3) 현대사자료 《일중전》, 55

4) 방위청 방위연구소 전사실防衛廳防究所戰史室) 저(著) : 전사총중국사변 육군 작전戰史叢書·中國事變陸軍作戰)) , 도 : 朝云新聞社, 17,46

5) 외무성外務省) 편찬 : 일본 외교년표 및 주요 문서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書》, 문서文書) 하권(下卷), 原書房, 17,3838쪽. 이하 이 책 인용시주요문서主要文書》 하 (下) .

립하기 위해 1938년 1월 11일 히로히토(裕仁) 쇼와(昭和) 천황이 중일 전쟁 기간 중 최초의 어전회의를 소집 주재하였다. 참모총장(參謀總長)·차장(次長), 군령부총장(軍令部總長)·차장, 내각의 수상·육상(陸相)·해상(海相)·외상(外相)·내상(內相)·장상(藏相)의 각 대신, 그리고 추밀원(樞密院) 의장이 회의에 참가했다. 근위 수상(近衛首相)의 주재 하에, 히로타 외상은 《중국 사변 처리의 근본 방침(處理中國事變的根本方針)》 방안에 대해 설명했다. 참모 총장·군령부 총장·추밀원 의장이 각각 회의석상에서 각자의 의견을 이야기하고 이 방침에 찬성했다. 회의에서 최종 결정된 《중국 사변 처리의 근본 방침》은 정부와 군부의 의지를 통일시켜 달성한 일본 최고위급 국책이자, 대중국 침략 전쟁 이후 일본이 최초로 국가 형식으로 결정한 “중국사변” 처리에 관한 국책이었다.

제1차 어전회의에서 결정된 상술한 문건은 우선 일본의 국시(國是)를 “만주국 및 중국과 협력하여 동아시아 평화의 핵심을 형성하고, 이 핵심으로 세계 평화를 위해 공헌한다.”라고 규정하였다. 이에 따라 일본의 “중국사변” 처리의 최종 목적은 “중일 양국간 과거의 모든 문제를 해소하고, 대세를 위해 양국의 외교를 다시 수립하여 서로의 주권과 영토를 존중함으로써 융화를 이루는 것”이 되었다. 그리고 현재, 사변의 재발 방지를 위해 필요한 보장을 하고 양국간에 이하의 각 항을 확실히 약정해야 한다고 하였는데, “1, 일본과 만주 및 중국 3국은 서로의 우의를 파괴하는 정책·교육·무역 및 기타 일체의 조치를 중지하고 상술한 나쁜 결과를 초래할 수 있는 행동을 금지한다. 2, 일본과 만주 및 중국 3국은 서로 함께 문화 협력을 하여 방공 정책을 실현한다. 3, 일본과 만주 및 중국 3국은 산업 경제에 있어서 서로의 장점은 취하고 단점을 보완한다는 원칙과 상호 소통의 정신에 입각하여 서로 호혜관계를 실시할 것을 약정한다.”는 내용이였다. 위에서 말한 방침을 실현하기 위해 일본의 각 분야가 정략(政略)과 전략을 긴밀히 운영하여 아래의 대책을 실시할 것을 요구하였다. 1, 중국 중앙 정부가 진심으로 강화(講和)를 요구할 때, 별첨 자료 갑(甲)과 그 전에 결정된 “중일 강화 담판 세목(日中講和談判細目)”(총9조)에 따라 담판을 진행하고, 일본은 상술한 조건 중의 보장 항목 즉 별첨 자료 을(乙) 해제한다. 2, 중국 중앙 정부가 강화를 요구하지 않을 경우, 이후 일본 정부는 중국 중앙 정부를 사변 해결의 대상으로 보지 않으며, 새로운 정권을 세워 새로운 정권과 국교를 조정하고 현재의 중앙 정부를 붕괴시키거나 새로운 정권에 귀속되도록 방법을 강구한다⁶⁾는 것이다.

위에서 이야기 한 방침에 따라 일본이 중국에게 답변을 요구한 최종 기한은 1월 15일 이었지만, 중국 정부는 답변을 하지 않았고 일본은 중국이 강화를 요청할 마음이 없는 것이라고 판단했다. 16일, 쇼와 황제의 비준을 거쳐 근위 수상이 “국민 정부를 상대하지 않겠다.”는 정부 성명을 발표하였다. 그 내용을 보면 “제국 정부는 오늘부터 국민 정부를 상대하지 않겠으며, 진정으로 제국과 협력할 수 있는 중국의 새로

6) 주요문),3838

은 정권이 수립되고 발전하기를 희망한다. 또한 앞으로 이 새로운 정권과 양국의 외교를 조정해 나갈 것이고, 부흥하는 신중국 건설에 협력할 것이다.”라고 하였다. 18일, 근위 수상은 또 《보충성명(補充聲明)》을 발표하여 “소위 오늘 이후 국민 정부를 상대하지 않겠다는 것은 이 정부를 부인하는 것보다 더 강경한 것이다.……이번에 국제법 상의 새로운 일례를 만들어 냈으니, 국민 정부를 부인함과 동시에 철저하게 버렸다…… 선전포고를 할 필요가 없다.”⁷⁾라고 하였다. 이것이 바로 제1차 “근위성명(近衛聲明)”이다.

제1차 어전회의와 제1차 근위성명이 있는 후 얼마 지나지 않은 1월 20일, 근위 내각은 내각 회의를 통해 《국책대강(國策大綱)》을 결정하였는데, 향후 몇 년간(대략 1941년까지)을 일본의 “비상 시기”로 정하고 이 시기 일본의 대외 및 대내 국책 대강을 결정하였다. 그 대외 국책은 “일본과 만주 및 중국의 협력을 공고히 하여 동아시아의 영원한 평화를 확립시킴으로써 세계 평화를 위해 공헌한다.”는 것이다. 구체적으로 말해, “일본과 만주 양국의 밀접한 관계를 유지하여 만주에 대한 중요 정책을 완성하고, 적극적으로 노력하여 대중국 정책을 실현시키며, 남방 경제 발전을 위해 노력한다.”⁸⁾는 것이다. 비록 이 문건은 당시 “공포가 금지된” 것이었지만, 22일 히로타 외상이 제73차 제국 의회에서 발표한 외교 방침 관련 연설에 이러한 취지가 이미 잘 나타나 있었다. 히로타 외상은 “나는 관련 각국이 중국의 새로운 국면을 직시하고, 또 이에 맞추어 제국이 현재 진행하고 있는 혹은 미래에 하려고 하는 합리적인 조정이라는 요구를 이해하여, 동아시아 신질서를 함께 건설하기를 바란다.”⁹⁾라고 하였다. 이는 히로타 외상이 “중국사변” 이후 처음 열린 일본 의회에서 최초로 “동아시아 신질서” 건설이라는 일본의 대외정책 목표를 공개적으로 제시한 것이다.

동시에 일본 군부 역시 이러한 희망을 밝혔다. 참모본부 제1부 제2과(작전과(作戰課))가 1월 20일 초안을 작성하고 30일에 완성한 《1938년 이후 전쟁 지도 계획 대강 방안(1938年以後戰爭指導計劃大綱方案)》에서는 1938-1941년 사이에 대소련 및 대중국 전쟁 준비를 마칠 것을 제시하고, 아래와 같은 방침을 제기하였다. “1. 이번 중국 사변을 계기로 제국 주변에 새로운 형세가 나타났다. 제국의 국방 정책은 계획적으로 동아시아 장기전을 준비해야 하며, 이를 주도적으로 지도함으로써 우리 나라 국시인 동아시아 경륜(經綸)을 실현시켜야 한다.”¹⁰⁾는 것이다. 이 방안은 “비록 일개과의 내부 방안에 불과하고 육군성부(陸軍省部)의 방안으로 확정되지는 못했지만, 당시 정책의 정신을 이해하기는 데에는 그래도 의미가 있다.”¹¹⁾ 이는 바로 이 내부 방안이 제시한 일본 국방 정책의 “동아시아 경륜”이라는 목표가 일본 정부의 “동아시아

7) 주요문),3838

8) 미국 국회 도서관 편찬, 중국 국가 도서관 소장 :일본 외무성 과일(日本外務省檔案) 마이크로 필름,S48,S1112,188188

9) 일본 외무성 과),S48,S1112,4344

10) 현대사자》일중전”,24

11) 방위청 방위연구소 전사실 : 전사총최고사령부 육군부戰史叢書·大本營陸軍部》), 도 : 朝云新聞社, 16,53

신질서 건설”이라는 방침과 일맥상통하기 때문이다.

위의 내용을 살펴보면, 일본은 제1차 어전회의에서 “중국사변” 처리의 근본 방침을 결정하고 제1차 근위성명에서 이를 선포한 지 얼마 되지 않아 바로 “중국사변”을 계속 처리하기로 결정하였으며, 이와 동시에 1941년 이전에 일본의 대외 국책을 실현 시키고자 하였다. 또한 그 목표는 바로 이른바 일본과 “만주” 및 중국의 협력이라는 “동아시아 신질서”를 실현시키는 것이었다.

“대화원” 설립 준비

일본이 9·18사변을 일으키고 만주 괴뢰 정부를 수립한 후, 1934년 9월 14일 오카다 게이스케(岡田啓介) 내각은 “내각 회의”로 《만주 관련 기관 조정에 관한 문건(關於調整對滿有關機構的文件)》을 통과시켜, 내각에 “만주 사무국(對滿事務局)”을 설립할 것을 결정하였다.¹²⁾ 추밀원의 심의를 거쳐 12월 26일 일본 정부는 《만주 사무국 관제(對滿事務局官制)》의 실시를 공포하였다.¹³⁾ “만주 사무국”은 1942년 11월에 새로 성립된 “대동아성(大東亞省)”(이 성의 “만주 사무국”)에 합병될 때까지 8년간 유지되었다.

전면적인 대중국 침략이었던 “중국사변”을 일으킨 후, 일본 통치 집단에서는 앞에서 이야기한 “만주 사무국”의 선례를 따라 일본 중앙 정부에 전문적으로 “중국사변” 관련 사무를 처리하는 통일된 기관을 설치해야 한다는 공감대가 형성되었다.

“중국사변”이 시작된 지 얼마 후, 근위 수상은 “대중국 중앙 기구” 설치하여 대중 정책의 일원화를 모색하고자 하였다.¹⁴⁾ 제1차 근위성명이 발표된 후인 1938년 1월 19일, 기획원(企劃院) 제3위원회 간사회(幹事會)는 《만주 및 중국 관련 기관 조정에 관한 문건(關於調整對滿、對華有關機關的文件)》을 통과시켜, “내각 회의” 결정 방안으로 삼고 내각에 “동아시아 사무국”을 설치하기로 입안했다.¹⁵⁾ 그러나 이 “동아시아 사무국” 방안은 외무성측의 강력한 반대로 결국 중지되었다.¹⁶⁾

3월 초, 근위 내각 법제국(法制局)은 또 다시 “대화국(對華局)” 방안을 입안하여 “내각 회의”에 제출할 준비를 하였다. 이는 수상을 회장으로 하는 “대중국 심의회(對華審議會)” 산하에 “대화국”을 설치하고, 그 아래에 정치·경제·문화 3개 부문을 설치하여 각각 대중국 사무 조정의 업무를 분담하는 것이었다.¹⁷⁾ 외무성이 “대중국 심

12) 중앙당안관中央檔案館), 중국 제2 역사당안관(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지린성 사회과학원(吉林省社會科學院) 공동 편찬 일본 제국주의 중국 침략 파일 자료 선정 편 만주 괴뢰 정권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 偽滿傀儡政權), 중화서국(中華書局), 199,41—4

13) 현대사자료 만주사변現代史資7滿洲事變》,도 : 미즈書, 196,600—60

14) 矢部貞治 : 《近衛文麿》,도 : 読新聞社, 197,42

15) 대중국 중앙기관 설치 문제건(홍아원 설치)對支中置問一件 (院)》, 외무성 외교사료관外務省外交史料), A.1.1.0.3

16) 히로타 고키 전기 발행회廣田弘毅傳記刊行會) 편집 및 발행 : 히로타 고키廣田弘毅》,도 : 196,31

의회” 설립은 찬성했지만 “대화국” 설립은 반대하였기에 “대화국” 방안은 여전히 보류되었다.

5월 26일, 우가키 가즈시게(宇垣一成)가 외상에 취임한 후, 근위 내각은 “5상회의(五相會議)”를 대중국 정책의 최고 결정 기구로 삼고, 대중국 중앙 기관 설치건을 잠시 중지하였다. 8월에 육군측에서 또 “대화원” 설치 방안을 제시하였지만,¹⁸⁾ 외무성측이 여전히 거절하였다. 9월 29일의 5상회의에서 우가키 가즈시게는 이 때문에 분노하여 사직서를 제출하였고 “대중국 중앙 기관 방안으로 이미 외교 계통의 핵심이 사라졌다. 그것을 외교계 탓으로 돌린다면 매우 모욕적이다. 그리고 이러한 모욕은 시국이 중대하며 전국이 일치되었다는 등등의 미명 하에 있는 어떤 부(군부를 지칭함-필자)의 태도에 숨겨져 있으니, 매우 기만적인 것이다.”¹⁹⁾라고 직언했다.

대중국 중앙 정부 기구 설치에 열중했던 근위 수상은 자신의 뜻을 굽히지 않고 우가키 가즈시게 외상의 사직으로 인해 잠시 외상을 겸직했을 뿐만 아니라, 육군이 앞에서 이야기 한 방안을 기초로 하여 10월 1일의 “내각 회의”에서 《대화원 설립에 관한 문건(關於設立對華院的文件)》을 결정하고 대화원은 “중국사변 기간에 설치된, 수상을 총재로 하고 외상·장상·육상·해상을 부총재로 하는 대중국 중앙 기구”라고 규정하였다. 또한 중국 현지에 각 “분국”을 설치할 것을 규정하였고, 일본 민간의 유능한 사람을 흡수하여 “대중국 위원회(對華委員會)”를 설립하겠다고 하였다.²⁰⁾

앞에서 이야기 한 “내각 회의” 결정에 따라, 근위 내각 범제국은 각 성과 협상하여 “대화원”의 관계 방안 초안을 작성하기 시작했지만, 11월 중순에야 확정되었다. 이 시기 일본 주중 관원들이 “대화원”이라는 명칭을 강력하게 반대했기 때문에, 근위 내각이 입안 설립한 “대화원”은 줄곧 “명칭”만 있을 뿐, 정식으로 설립이 선포되지 못했다.

2. 제2차 근위성명과 제2차 어전회의 및 제3차 근위성명, 그리고 “동아시아 신질서” 건설이라는 국책 확립

1938년 봄, 일본은 “국민 정부를 상대하지 않겠다.”는 방침에 따라 계속해서 쉬저우전(徐州會戰)과 우한전(武漢會戰)을 일으켜, 10월 말 광저우(廣州)와 우한을 점령했다. 일본이 중국의 대부분을 점령하였지만 중국 정부가 여전히 항전을 계속하고 있는 상황에서, 일본은 어쩔 수 없이 군사전략상의 지구전 단계로 전환하고 정략적인 대중국 공략을 시작했다. 일본의 대중국 정략적 공략에 따라 “동아시아 신질서”라는 목표가 수면 위로 떠올랐다.

일본이 정략적 공략으로 전환했다는 것은 11월 3일 근위 수상이 발표한 제2차 성

17) 《昭和十三年三月對支院スル件(院), 國立公書2A-40-1》 35

18) 주요문》(하), 3939

19) 우가키 가즈시게宇垣一: 우가키 가즈시게 일 宇垣一成日記》, 도: みすず書房, 1970-197, 126

20) 주요문), 3939

명을 통해 알 수 있다.²¹⁾ 이 “국민 정부를 거절하지 않는다”는 취지의 성명은 제1차 근위 성명의 입장을 바꾼 것이었다. 또한 이 성명은 제1차 성명 이후 일본의 “중국사변” 처리의 새로운 목표, 즉 “동아시아 신질서” 건설이라는 목표를 명확히 제시하였다. 성명에서 “동아시아 신질서 건설은 우리 나라의 건국 정신에 뿌리를 두고 있으며, 이 임무를 완성하는 것은 현대 일본 국민의 영광스러운 임무이다.”라고 하였다. 또한 세계를 향해 “동아시아 신질서” 건설은 일본 건국 이래 일관된 국책이며, 일본은 이를 위해 지속적으로 노력하여 이를 실현할 것이라고 선포했다. “동아시아 신질서” 건설의 내용에 관해서는 “일본과 만주 및 중국 3국이 협력하여 정치·경제·문화 등 각 분야에 걸친 연계 협력 관계 건설을 근간으로 삼아, 동아시아 국제 정의를 확립하고 공동 방공(防共)·신문화 창조·경제 결합 실현을 목적으로 한다.”라고 하였다. 일본의 “중국에 대한 기대는 바로 상술한 동아시아 신질서 건설의 책임을 나누는 것”이다. 이는 일본이 정치·경제·문화 등 각 분야에서 일본과 “만주” 및 중국이 협력하는 이른바 “동아시아 신질서”를 실현시키겠다는 것이다.

근위 내각의 육상 이타가키 세이시로(板垣征四郎)은 일찍이 근위 수상의 뜻에 따라 6월 17일 제출한 《중국사변을 지도하는 설명(指導中國事變的說明)》에서 이후 일본이 적극적으로 이번 사변을 처리하는 목적은 “제국의 동아시아 맹주 지위를 확립하고 이웃 나라인 중국을 재건하며, 이를 계기로 끊임없이 발전하는 장기적인 동아시아 경륜에 적응하고 실력 배양을 촉진시키는 것”²²⁾이라고 하였다. 제2차 성명이 발표된 후, 근위 수상은 이 성명에 대한 설명에서 이를 더 명확히 하였다.²³⁾ 그는 이른바 “동아시아 신질서”는 바로 구미 세력이 중국과 전세계에 구축한 구질서와 대조되는 것으로서, 일본의 최종 목표는 바로 세계 신질서를 확립하고 독일 및 이탈리아와 협력하는 것이며, 일본의 이러한 대업은 “메이지 천황의 유업”이라고 하였다. (11월3일은 메이지 천황 탄신일—필자)

제2차 근위성명을 발표된 또 다른 중국쪽 배경은 바로 일본 우가키 가즈시게 외상의 대중국 “평화 회담”이 실패한 후 육군측이 계속해서 진행했던 “평화 회담”이었다. 이번에는 주로 상하이에서 진행되었으며(“중광당 회담(重光堂會談)”)이라고도 함), 중국측 주최자는 왕징웨이(汪精衛)가 파견한 가오쥙우(高宗武)와 메이쓰핑(梅思平), 일본측은 주로 가게사 모도아끼(影佐禎昭, 육군성 군무 과장)와 이마이 다케오(今井武夫, 참모본부 중국 반장) 등이었다. 일본은 가오쥙우의 일본 가명을 빌어 이 평화 협상을 “와타나베 공작(渡邊工作)”)이라고 이름 지었다. 11월 20일, 양측은 비밀 회담을 통해 “동아시아 신질서”를 건설하는 일련의 중일 협의 문서(“중광당 협정(重光堂協定)”)이라고도 함)를 작성하고 일본 정부와 왕징웨이 정부에 각각 보고하였다.²⁴⁾

21) 주요문),40

22) 《太平戰への道資料》,도 :朝日新聞社, 196년, 2626

23) 참 :황메이진(眞美), 장원운)이 편찬한왕징웨이 집단의 투항汪精衛集團投敵》, 상하이인민출판사(上海人民出版社), 18,99

24) 와타나베 공에 관해서 《太平洋戰爭への道》“資料編 2727쪽 주요문 (하) 40 40 참조

위에서 말한 “평화 회담”을 진행함과 동시에 일본 통치 집단은 “동아시아 신질서” 형세 하에서의 중일 관계 확립, 즉 이른바 “새로운 중일 관계”의 확립을 고려하기 시작했다. 최고 사령부 육군부는 일찍이 4월에 “새로운 중일 관계” 조정 방침을 입안하고 육군성에 인도하였으며, 8월 말에는 육성·해성·외성·장성 당국이 이미 의견 일치를 이루었다.

상하이에서 “중광당 협정”을 맺은 후, 4성 당국의 상술한 방침이 일본의 지속적인 국책이 되도록 하기 위해, 최고 사령부와 정부의 연석회의 및 내각 회의의 심의를 거쳐 일본은 11월 30일에 제2차 어전회의를 개최하여 《새로운 중일 관계 조정 방침(調整日中新關係的方針)》을 결정했다.²⁵⁾ 제2차 어전회의의 결정은 “동아시아 신질서” 건설이 이미 일본의 새로운 국책 방침이 되었음을 표명하는 것이었다. 이 방침에서 규정한 “새로운 중일 관계”란 “일본과 만주 및 중국 3국이 동아시아 신질서 확립이라는 이상을 가지고, 우방을 위해 서로 협력하며 동아시아 평화의 주축 형성을 공통의 목표로 삼는 것”이다. 중일간 이러한 “새로운 관계”에 관해서 또 3가지 원칙과 구체적인 사항을 규정하였는데, 첫째는 “선린 우호 원칙 사항”이고, 둘째는 “공동 방위 원칙 사항”이며, 셋째는 “경제 협력 사항”이다. 따라서 제2차 어전회의에서 결정된 국책은 사실상 상술한 3항의 원칙으로 일본과 “만주” 및 중국의 새로운 관계를 건설하고, 이러한 새로운 관계로 “동아시아 평화의 핵심”을 이루어 더 나아가 “동아시아 신질서”를 확립한다는 것이다. 이는 광저우와 우한 전쟁 후 중국 중앙 정부가 “와해”되고 “와타나베 공작”으로 새로운 중일관계가 준비되고 있는 상황에서 일본 최고 통치 집단이 결정한 대중국 정책 방침이었다. 제2차 어전회의는 이 시기의 일본이 이미 “동아시아 신질서” 확립을 최고 국책으로 삼았다는 것을 보여주었다. 《새로운 중일 관계 조정 방침》은 바로 일본의 “과시즘 외교개념인 동아시아 신질서가 외교 정책으로 구체화 된” 산물인 것이다.²⁶⁾

12월 20일 왕징웨이(汪精衛)가 충칭(重慶)을 탈출하여 하노이에 도착한 후, 근위 수상은 22일에 제3차 성명을 발표하여 제2차 어전회의에서 결정한 상기 방침을 공개하였다. “일본과 만주 및 중국 3국이 동아시아 신질서 확립이라는 공동 목표를 위해 협력하여 상호 선린 우호와 공동 방공 및 경제 협력을 실현시켜야”한다는 것이다. 또한 상술한 3개의 원칙에 대해 각각 설명하였는데, 이 3개 원칙은 “일본이 중국에 요구하는 중점 사항이다.실제로 일본은 단지 중국이 동아시아 신질서 확립을 이행하기 위한 직책 분담이라는 일본이 필요로 하는 최저의 보장을 해주기만을 바란다.”라고 하였다.²⁷⁾ 제3차 근위성명에서 확립된 3개 원칙은 일본의 대중국 정책에서 7·7사변 이전의 “히로타 3원칙(廣田三原則)”을 대체하는 것이기에 “근위 3원칙(近衛三原則)”이

25) 이 과정은 전사총최고 사령부 육군》(1), 5757쪽 참조. 문건은주요문), 4040쪽 참조

26) [日]信 편찬, 텐진사회과학원(天津社會科學院) 일본문제연구소 역: 일본외교사(日本外交史)》하(下), 상무인서관(商務印書館), 198,63

27) 주요문), 40

라고도 한다.

일본군이 광저우와 우한을 점령한 후인 1938년 말, 제2차 근위성명과 제2차 어전 회의 및 제3차 근위성명 발표를 기점으로 일본의 중국 침략 전쟁은 “정략적 공격” 시기로 접어들었다. 일본이 확립한 1941년 이전에 “동아시아 신질서”를 확립한다는 국책 및 이 기간에 제시된 일본과 “만주” 및 중국 3국 “경제권(經濟圈)”과 “국방권(國防圈)” 등의 구체적인 목표는²⁸⁾ 태평양 전쟁 후 일본이 제시한 “대동아 신질서” 및 “대동아공영권” 정책의 직접적인 기초가 되었다.

제3차 근위성명이 발표된 후, 중국 최고 지도자 장제스(蔣介石)는 12월 26일에 충칭의 중국 국민당 기념주(紀念周)에서 이 성명을 반박하는 연설을 하였다. 그는 일본의 “동아시아 신질서”는 결국 “동아시아의 국제 질서를 전복시키고 중국을 노예로 만들어 일본이 태평양을 제패하고 세계를 분할하는 것”이라고 하였다. 또한 이 성명의 발표로 “일본의 정책이 이미 대륙 정책에서 해양 정책으로 확대되었으며, 북진(北進) 정책에서 남진(南進) 정책으로 변환되었다. 간단히 말해, 일본의 현재 침략 정책은 대륙과 해양을 동시에 넘보는 것으로 두 가지를 함께 병행하고 있는 것이다. 중국을 삼키려고 시도하면서 국제 질서를 전복하고 동아시아를 제패하며 구미 세력을 축출하고자 하는 것이다.”라고 단정하였다.²⁹⁾

3. “홍아원”의 정식 설립

1938년 말 “동아시아 신질서” 건설이라는 국책이 확립됨에 따라 “홍아원”의 설립도 자연스럽게 진행되었다.

11월 3일의 제2차 근위성명 발표 후, 일본의 주중 관원들은 이러한 새로운 대중국 정책 목표에 따라 과거 입안되었던 “대화원”이라는 명칭을 수정하고 동아원(東亞院), 대륙원(大陸院), 동방원(東方院), 동대륙원(東大陸院), 신동아원(新東亞院), 흥아원(興亞院), 신아원(新亞院), 사변처리원(事變處理院)이라는 8개 명칭을 만들어 내각이 선택하도록 하였다.³⁰⁾ 이에 따라 근위 내각은 최종적으로 “홍아원”이라는 명칭을 사용하기로 결정하고, 11월 18일의 “내각 회의”에서 “홍아원” 관련 칙령안을 결정하였다.³¹⁾

28) 1938년 7월 22일 5상회의에서 내부에서부터 중국 정권을 지도하는 대강部指導中國政權的大綱을 결정하고, 일본과만 및 중국 3국이 경제 분야에서 3국 경제권 완성을 위해 매진하도록 노력해야 한다고 제기하였다. 주요 문), 39쪽. 11월 18일 최고사령부 육군부 및 육군성과 참모본부가 결정한 《1938년 가을 이후의 전쟁 지도 방침 193年秋季以後의戰爭指導》에서 중국사변 해결을 위한 현재 목표는 적어도 일본과 만주 및 중국을 하나로 하고 주동적인 국방권 건설에 중점을 두는 것이라라고 제시하였다. 현대사자》, 54쪽

29) 중국 제2 역사당안관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편찬 : 중화민국사 파일 자료 총집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 제5집 제2외교, 장쑤고적출판사江蘇古籍出版社), 19, 55

30) 《昭和十三年三月以後 對支院設置スル件 (院), 日國立公文書館2A-40- (資) 35

31) 《省一件제1, 日外務省外交史料M.1.1.0.7.

뒤이어 추밀원이 이를 심의하였다. 제2차 어전회의 후인 12월 7일, 쇼와 황제가 직접 참석한 상황에서 추밀원은 《흥아원 관제(興亞院官制)》와 《흥아원 연락부 관제(興亞院聯絡部官制)》 등의 문건을 최종 통과시켰다.³²⁾ 12월 16일, 일본 정부는 “흥아원” 관제와 관련된 몇몇 칙령을 발표하고 야나가와 헤이스케(柳川平助)를 총무장관(總務長官), 스즈키 데이이치(鈴木貞一)를 정무부장(政務部長), Hidaka Shinrokuro(日高信六郎)를 경제부장으로 임명하고, 야나가와 헤이스케가 문화부장을 대리하도록 하였다. 이로써 “흥아원” 설립이 선포되었다.

위의 내용을 보면 “흥아원”은 제2차와 3차 근위성명 사이 및 제2차 어전회의 전후에 일본 최고 통치 집단이 “동아시아 신질서 건설”을 국책으로 확립한 후 나타난 산물이다. 12월 26일, 중국 최고 지도자 장제스는 《근위성명(近衛聲明)》에 대한 반박 연설에서 일본의 “흥아원” 설립을 다음과 같이 이야기했다.³³⁾

“대지원(對支院)”도 이미 충분히 모욕적이고 무서운 명칭인데 이를 “흥아원”으로 바꾼 것은 진실로 전체 아시아인들에 대한 중대 모독이다. 일본의 이러한 작태는 전체 중국을 분열시키려는 것으로 중국의 패망에 그치지 않고 전체 아시아에도 위협이 미치게 된다. ……이는 중국을 멸망시키려는 모든 계획을 집행하는 총기관으로, 과거 중국 곳곳에서 죄악을 일삼던 일본의 각종 특무기관을 모아놓은 총특무기관이라고 할 수 있다. ……일본은 장기적으로 중국 멸망 계획을 실시하고 목적을 이루지 않는 한 멈추지 않을 것이다. 지금 그들은 방법도 생각해냈고, 기관도 만들었으니, 이 역시 숨김 없이 비수를 드러냈다고 할 수 있지 않겠는가?

《흥아원 관제(興亞院官制)》에서 규정한 일본의 흥아원 설치 목적은 “중국사변 중, 내각 총리 대신의 관리 하에 흥아원을 설치하여 아래의 사무를 관장한다. 단, 외교 관련 사무는 제외된다. 1, 중국사변 과정에서 중국에서 처리 할 필요가 있는 정치와 경제 및 문화 사무. 2, 상술한 사항과 연관된 각종 정책 제정 사무. 3, 사업 목적으로 중국에 설립되었거나 특별 법률에 의거해 설립된 회사를 감독하는 업무로 중국에 사업체가 있는 자의 재중국 업무 총괄. 4, 각 청(廳)의 중국 관련 행정 사무의 통일 및 유지.”³⁴⁾였다.

“흥아원” 관제에 관한 일련의 “칙령”들이 공포된 후, 일본은 도쿄와 중국에 각각 중앙 총부와 현지 각 연락부를 조직하기 시작했다.

“흥아원”의 도쿄 총부 기관의 조직은 다음과 같다.

- 주요 관원

총재 : 1인. 내각 총리 대신이 역임. “흥아원의 원무를 총괄하고 소속 직원을 총감독하며, 관직의 수여와 박탈을 판단한다.”

32) 《樞密院會議議》, 제90昭和篇四十, 東京大學出版會, 19,2830

33) 중화민국사 파일 자료 중》 제5집 제2편외,5-5

34) 院政務部 : 《院執務提要》, 도쿄, 1940年1月,3

부총재: 4인. 외상·장상·육상·해상이 역임. “총재를 보좌한다.”

총무장관: 1인. “총재와 부총재를 보좌하고 흥아원의 원무를 관장한다.”

• 하위 부처

총재관방(總裁官房)

정무부 산하: 제1과(1, 대중국 정책 제정에 관한 사무. 2, 각부 사무의 연락 조정 관련 사무. 3, 연락 위원회와 흥아위원회 관련 사무.), 제2과(1, 중국 신정권에 대한 정치 협력에 관한 사무. 2, 각 청의 대중국 행정 사무에 관한 사무.), 제3과(1, 재중 정치 경제 및 문화 조사 관련 사무. 2, 정보 수집과 선전 계발 관련 사무)

경제부 산하: 제1과(1, 중국 경제 개발 계획 관련 사무. 2, 중국 신정권에 대한 경제 산업 협력 실시 및 준비에 관한 사무. 3, 각 과의 사무를 연락 및 조정하는 사무), 제2과(1, 화북 경제 개발 유한공사 및 화중 진흥 유한공사 감독 관련 사무. 2, 재중 기업 통제 관련 사무. 3, 중국 식민 사업 개척 관련 사무), 제3과(중일 및 중국 교통과 통신에 관한 사무 관장), 제4과(1, 중국 금융·재정·화폐제도 및 세무 관련 사무. 2, 대중국 무역 관련 사무)

문화부 산하: 제1과(1, 중국 신정권에 대한 문화 협력 실시 및 준비 관련 사무. 2, 민생 관련 사무). 제2과(위생·방역·의료·구휼 관련 사무 관장), 제3과(사상·교육·종교·학술 관련 사무 관장) 기술부

• 각 전문 위원회

연락 위원회

흥아위원회

기술위원회

“흥아원”의 재중 각 연락부는 1939년 3월 10일 일본 정부가 “칙령”과 “각령(閣令)”으로 규정했으며, “흥아원”의 각 기관의 조직은 다음과 같다.

일본이 중국에 설립한 각 연락부 및 파출소

명 칭	설 치 지 점	책 임 지 역
흥아원 화북 연락부 (興亞院華北聯絡部)	베이징	중화민국 임시정부 관할구역
흥아원 명장 연락부 (興亞院蒙疆聯絡部)	장자커우(張家口)	명장(蒙疆)연합위원회 관할구역
흥아원 화중 연락부 (興亞院華中聯絡部)	상하이	중화민국 유신 정부 관할구역
흥아원 샤먼 연락부	샤먼(廈門)	샤먼도 및 그 부근

(興亞院廈門聯絡部)		
홍아원 화북 연락부 칭다오파출소 (興亞院華北聯絡部 青島派出所)	칭다오(靑島)	칭다오특별시공서(公署) 관할구역

각 연락부와 파출소의 구체적인 사무 부서 설치는 다음과 같다.

화북연락부 : 관방, 정무부, 경제 제1국, 경제 제2국, 문화국

화북 연락부 칭다오 파출소 : 관방, 정무반, 경제반, 문화반

화중 연락부 : 관방, 정무국, 문화국, 경제 제1국, 경제 제2국, 경제 제3국

샤먼 연락부 : 정부부 제1반, 정부부 제2반, 정부부 제3반, 정부부 제4반, 경제부 제1반, 경제부 제2반, 경제부 제3반

명장 연락부 : 총무과 제1반(서무), 총무과 제2반(회계), 총무과 제3반(조사), 정무과, 경제과 제1반, 경제과 제2반, 문화과

3월 11일, 일본 정부는 홍아원 각 연락부의 책임자를 발표하였다. 화북 연락부 장관은 Kita Seiichi(喜多誠一), 명장 연락부 장관은 Sakai Takashi(酒井隆), 화중 연락부 장관은 Tsuda Shizue(津田静枝), 샤먼 연락부 장관은 水戸春造, 화북 연락부 칭다오 파출소 장관은 Shibata Yaichiro(柴田弥一郎)이었다.

이로써 도쿄의 중앙에서부터 중국 각 지방까지 일본의 “홍아원”이 전부 성립되기 시작했다.

5. 맺음말 : “홍아원” 과 일본의 “동아시아 신질서”

이상의 내용을 종합해보면, 중일전쟁 초기인 1938년에 일본이 “동아시아 신질서” 건설이라는 대중국 정책의 목표를 제시하고 그것을 국책으로 확립시킨 것은 “홍아원”의 설립과 거의 동일한 역사적 과정이었다 이 과정 속에서 “동아시아 신질서”와 “홍아원”은 일본 대외 정책에 있어서 서로 보완 관계에 있는 역사적 산물이었다.

“홍아원”에 대해 우리는 다음과 같은 역사적 판단을 할 수 있다.

“홍아원”의 구성. 도쿄의 총부나 중국 각지의 각 연락부 모두 그 상하로 대응되는 주요 부서들은 전부 중국 관련 정무와 경제 및 문화 사무 부서이며, 또한 정무와 경제 두 부서를 중점으로 삼았다. 중국의 각 연락부는 그 관할 구역의 중국 점령구가 괴뢰 정권과는 전략적 지위가 달랐기 때문에, 정책을 실시할 때 일본은 다소 이 지역에 치중하였다. 대체로 말하자면, 일본 “홍아원”의 중국 중점 지역이 화북과 화중 지역이었기 때문에 다른 연락부보다 높은 정무와 경제 및 문화 3국(局)(명장 연락부는 “과(課)”, 샤먼 연락부 및 칭다오 파출소는 “반(班)”)을 설치하였고, 대중국 경제

사무를 특히 중시하였다. 이로써 “홍아원”이 일본이 전시에 중국 점령구에 대한 각종 정책을 제정하고 실시하던 총기관, 즉 일본이 정치적으로 중국을 멸망시키려고 했던 총기관이었음을 알 수 있다.

“홍아원”의 성격. 1938년 11월 18일 근위 내각이 “홍아원” 관련 칙령안을 통과시킬 때, 기밀 조사 사항도 통과시켜 군부의 우월적인 지위를 규정하였다. “중국 관련 기관에 대한 군사 및 경비 지도는 육해군 최고 지휘관의 임무 및 협정에 따라 실시한다. 홍아원의 지도는 상술한 것 이외의 정무에 관한 지도이다. ……홍아원 연락부 차장 이하의 직원은 필요할 경우 현지 육해군 사령부에 배속되어 무관을 겸임할 수 있다.”³⁵⁾는 것이다. 1939년 4월 11일 오전의 홍아원 제1차 연락부 장관 회의에서 정무 부장인 스즈키 데이이치는 “홍아원은 사변 중의 기관”이기 때문에 “전시 기관(戰時機關)”에 속하므로 “군부의 활동에 적응하여 역할을 할 수 밖에 없다.”³⁶⁾라고 발언을 함으로써, 다시 한 번 홍아원에 성격에 대해 이야기하였다. 이에 따라 “홍아원” 주요 관원의 구성을 살펴보면, 도쿄 본부의 주요 관원인 야나가와 헤이스케 총무 부장과 스즈키 데이이치 정무 부장이 모두 육군 중장이었다. 중국 연락부 장관은 모두 군부대 출신들로 화북 연락부의 Kita Seiichi(喜多誠一) 장관은 육군 중장(전 화북 방면 군 특무 부장), 명장 연락부 Sakai Takashi(酒井隆) 장관은 육군 소장(전 장자커우 특무기관장), 화중 연락부 Tsuda Shizue(津田静枝) 장관은 해군 중장, 샤먼 연락부 水戸春造 장관과 화북 연락부 칭다오 파출소 Shibata Yaichiro(柴田弥一郎)은 모두 해군 소장이었다. 따라서 “홍아원은 어찌 되었든 주로 육군 군인의 지도 하에 있는 정부 기관이었다.”³⁷⁾ 이로써 홍아원이 “과거 중국 도처에서 악행을 일삼던 일본의 각종 특무기관을 집합시켜 만들어진 총특무기관”이라던 장제스의 비난이 입증되었다.

따라서 일본의 중국 침략 전쟁이 공격 단계로 접어든 후, “동아시아 신질서” 건설을 위해 설립된 “홍아원”은 확실히 결과 속이 다른 매우 기만적인 기관이었다. 홍아원은 실질적으로는 군부 특무기관의 통제 속에서 중국 점령구의 정치와 경제 문화 각 정책을 결정하고 실시하던 총기관이었다. “만주 사무국(對滿事務局)”과 마찬가지로 “홍아원”은 일본의 중국 침략 전쟁 속에서 중국 점령구를 식민 통치하여 중국을 정치적으로 멸망시키고자 했던 총기관이었기 때문에 진정한 의미의 “멸아원(滅亞院)”이었다.

전시 일본의 “동아시아 신질서”에 대해 우리는 다음과 같은 역사적 인식을 갖는다.

동아시아 세계의 고대 국제 질서는 중화 제국을 수장으로 하는 “화이 질서(華夷秩序)”³⁸⁾였다. 근대 이후, “화이질서”는 구미 열강의 역사적인 도전을 받고 점차 와해되었다. 근세의 일본은 오랫동안 “화이질서”와 동떨어져 있었을 뿐만 아니라 동아시아

35) 《敕令案》(193년1월1), 《昭和十三年三月支院スル件(院),日本國立公書:2A-40-1) 35

36) 《院第一回連絡部長官會議》(193년월10-1), 《對支中央設置問題一件(院設置)》,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A.1.1.0.31

37) 崎書記官報告書(193년1월3), 考資件 係,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H.7.2.0.4-

38) 화이질외에중번체제宗藩體制혹조공체계朝貢體系” 등이라고도 한다.

아에 자신들만의 작은 “화이질서”를 구축하고자 시도하였다.³⁹⁾ 메이지 유신 이후의 근대 일본은 “아시아를 벗어나 유럽으로 진출”하기 위해 “화이질서”를 공동으로 타파하려 하는 서양 열강 대열에 신속히 합류하였다. 19세기 말에서 20세기 초까지 조선의 멸망과 함께 “화이질서”가 철저히 붕괴되었고, 동아시아 세계에 “열강이 공동으로 관리”한다고 할 수 있는 제국주의 국제 질서가 세워지기 시작했다.⁴⁰⁾ 이 과정에서 일본은 갑오 청일 전쟁과 러일 전쟁 등을 통해 독특하고 중요한 역사적 역할을 하였다. 제1차 세계 대전의 발발로 구미 열강이 동아시아에 신경을 쓸 수 없게 되자, 동아시아 국제 질서는 일본에 의해 파괴되었다. 제1차 세계 대전이 종식된 후, 구미 열강은 다시 동아시아로 돌아와 미국을 수장으로 하는 “워싱턴 체제”를 세우기 시작했다. 일본이 1920년대에 일시적으로 “협력 외교”를 신봉하기는 했지만, 결국 9·18 사변을 시작으로 “워싱턴 체제”에 정식으로 도전하여 중국 침략 전면전을 일으킨 후 “동아시아 신질서” 건설을 공식적으로 제기하였고, 태평양 전쟁 후에는 “대동아 신질서” 건설을 제시하였다. 이로써 두 차례에 걸친 세계 대전과 그 전쟁 기간의 동아시아에서, 일본 대외 정책의 목표이자 지향점은 이미 공동 혹은 단독으로 구질서를 타파하는 것만이 아니라 일본식 국제 “신”질서를 건설하는 것을 더 중점으로 삼았다는 점을 알 수 있다.

“화이질서”와 “열강이 공동 관리하는 질서” 및 “워싱턴 체제” 등 동아시아 세계의 기존 국제 질서와 비교해볼 때, 근대 일본의 정책 목표는 형식적으로는 “신질서”라고 할 수 있을지도 모른다. 그러나 여기에 “홍아원”을 결합시킨다면 실제로 이것은 진정한 일본식 “구질서”라고 지적하지 않을 수 없다. 1941년 1월 15일, 미국 코델 헬(Cordell Hull) 국무 장관은 하원 외교 사무 위원회에서 발표한 성명에서 일본이 말하는 태평양 지역 “신질서”의 실상을 지적하였다.

정치적으로는 한 국가가 전적으로 통제하고, 경제적으로는 이 지역의 자원을 이용해 일본의 경제적 이익을 위해 봉사하여 지역의 다른 국가들이 빈곤해지고 외국의 이익을 배척하며, 사회 생활 측면에서는 개인의 자유를 파괴하고 피정복국 국민을 2등 국민으로 강등시킨다는 것이다.⁴¹⁾

중일 전쟁부터 태평양 전쟁 기간에 존재했던 “홍아원”은 전시 일본의 이른바 “동아

39) 어떤 일본 학자는 대군외교(大君外交라고도 한다. 그러나 상당수의 중국학자들은 이는 화질의 소형 복사본에 불과하다고 여기고 일이 질서(日夷秩序라고도 부른다.

40) 여기에서 이야기하는 열강이 공동으로 관리하는列強共 국제 질서는 필자 개인의 의견이다. 그러나 민국 초년에 Nai Kona 藤湖南, 1866—1934)이 제시한 국제공관론(共管論과는 다르다. 후자에 대한 중국 학계의 최근 글은 찬완위에(錢婉約) 저 Nai Kona 연구(藤湖研究)》(중화서국(中華書局), 200년) 및 한학에서 중국학까지 근대 일본의 중국 연구(從漢學到中國學——近代日本の中究)》(중화서국, 200년)의 관련 부분 참조. 일본 학계는 전후 동방사 학자를 중심으로 일본의 중국 침략을 정당화 했다고 Nai Kona의 관련 사상을 비판하기도 했다. (다나가와 미치오(谷川道雄)의 전후 Nai Kona 비론의 사례에 有關戰後藤湖南批判——龍夫의個案)》, [日 Nai Kona 연구(藤湖研究) 편저, 마바오마) 등 역 Nai Kona의 세계(藤湖南의世, 시안시 : 산진출판사三秦出版), 200, 345—37

41)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partment of States :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Japa : 193194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D.C., 1943. Vol. II., p330.

시아 신질서”의 본질을 입증하였을 뿐만 아니라 오늘날 우리의 역사 인식 문제에 매우 훌륭한 “물증”을 제공했다. 우리가 근대 일본의 “동아시아 신질서”가 동아시아 세계에 남긴 것은 완벽하게 부정적인 역사적 유산이라고 생각하는 이유가 여기에 있다.

「中日戦争初期における日本の「東亜新秩序」

— 「興亜院」の考察を中心として—

臧运祜（北京大学）

〈目 次〉

1. 第1次御前会议・第1次近卫声明後における「東亜新秩序」建設目標の提出
2. 「対華院」設立の醸成について
3. 第2次近卫声明・第2次御前会议・第3次近卫声明と「東亜新秩序」建設の確立
4. 「興亜院」の正式設立
5. 結語：「興亜院」と日本の「東亜新秩序」

近代日本が、初めて「東亜新秩序」を対外政策の目標としてうちだし、国策として確立したのは、中日戦争開始後の1938年のことであり、これと同時に、日本でも統一した対中国中央政府機関が醸成され始め、「興亜院」が設立されるに至った。今に至るまで、中・日両国の学会でこの問題を深く追求した成果は全く提出されていない。本報告は、筆者がこれまでに発表した論著に基づいて¹⁾、要点をまとめた形でおこなうものである。

1. 第1回御前会議・第1次近衛声明後における「東亜新秩序」建設目標の提出

1937年9月2日、日本が全面的な中国への侵略戦争を「中国事変」と名付けて以降、日本軍は年末までに太原・上海・中国の首都南京を占領したにもかかわらず、中国政府が全国の抗战を指導したために、「3ヶ月で中国を歼滅する」という戦略目標はまったく果たされず、「中国事変」は未解決のままだった。

このような状況下、日本軍部はまず「中国事変」に対処するための政策を考案した。12月13日に华中方面軍が南京を占領し、14日に华北方面軍が北平において偽「中华民国临时政府」を樹立すると、15日に大本营陸軍部は「中国事変」に対処するための2つの政策を制定した。1点目は現中国中央政府と事変に対処するための案で、主な方針は「現戦果を拡大強化しつつ速に現中央政权と日支全般問題を一括解決することに諸般の措置を統合す」というものである。但し、「持久戦争移行の爲の決意の時期は方針第一項の目的を達

1) 臧运祜『近代日太政策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臧运祜「兴”战日本东新秩《日本学刊》2006年第2期

すること能はざる実情を確認したるとき又は現中央政权が実力上一地方政权たるに至りし時」と付け加えられている²⁾。換言すると、もし現中国中央政府が日本側の要求、すなわち「日支全般問題を一括解決する」に応じない場合には、中国中央政府を一地方政权におとしめさせ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る。2点目の方案は上述した「従来の支那中央政权を否认し」た後の方案に対応しており、この時の日本の「中国事变」への対処方針を「従来の支那中央政权を否认し北支に亲日满防共の政权を树立し之を更正新支那の中心勢力たらしむる如く指导し之と连系して各方面共亲日（または非抗日）反共政权を树立し支那全局面に於て抗日共产政权に対する压缩坏灭を策す」としている³⁾。このことから、この時軍部が行った「中国事变」への対処策とは、事実上、伪政权の树立と、中国中央政府の否认の方針をとっていたことがわかる。

日本政府もこれに呼応して、12月14日の河北伪政权树立の際に、「南京攻击は、中国側に日支提携の大道に返ることを求めたものである。しかるに国民政府になんら反省の色なきにおいては、日本は亲日政权との提携、抗日政权の徹底的膺懲によって日支問題の根本的手術を决意」⁴⁾すると声明を发表している。この後、日本政府は改めて10月1日の四相会议で决议した《中国事变対処要纲》の检讨をすすめ、上述した大本营陆军部の2点目の政策を参考として、24日に《中国事变対処要纲（甲）》を「阁议」决定し、今後「中国事变」への対処法の主旨を「必スシモ南京政府トノ交渉成立ヲ期待セス之ト别个ニ时局ノ收拾ヲ计リツツ事态ノ进展ニ备ヘ军事行动ト相俟チ南京政府ノ长期抵抗ニ対応スル」と定めた。この《要纲》において日本の今後の「北支处理方针」と「上海周边处理方针」が詳細に定まった⁵⁾。この度の「阁议」决定は、上述した軍部の方案に近いものであり、この時すでに日本は「国民政府ヲ对手トセス」の方針をかすかながらも表明していたのである。

軍部と政府がそれぞれ关系する政策を制定して後、日本の中国への侵略政策を确立・一本化するために、1938年1月11日、昭和天皇裕仁主导で皇居において日中战争期の第1回御前会议が開かれた。参加者は参谋总长・次长・军令部总长・次长・内阁总理大臣・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外务大臣・内务大臣・大藏大臣の各大臣および枢密院议长であった。近卫首相の司会で、广田外相が《「支那事变」处理根本方针》方案について説明を行い、参谋总长・军令部总长・枢密院议长はそれぞれの意見を述べ上記の方針に対する賛意を表した。会议の最後に决定した《「支那事变」处理根本方针》は政府と軍部との意思統一によってもたらされた日本で最も重要な国策であり、また中国への侵略战争开始以降初めて日本が国家レベルで决定した「中国事变」处理の工作であった。

第1回御前会议で决定した上述の《「支那事变」处理根本方针》は、まず日本の国是を「満州国及ヒ支那ト提携シテ东洋平和ノ枢轴ヲ形成シ、之ヲ核心トシテ世界ノ平和ニ贡献スルニアリ」と定めた。これによると、日本は「中国事变」対処の最终目标を「日支两国间过去一切ノ相克ヲ一掃シ、两国国交ヲ大乘的基础ノ上ニ再建シ、互ニ主权及ヒ领土ヲ尊

2) 『現代史史料9・日中戦争2』（東京、みすず書房、1964年、54-55頁）

3) 『現代史史料9・日中戦争2』（56-58頁）

4) 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支那事变陆军作战1』（東京、朝云新闻社、1975年、468頁）

5) 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文书」下卷（原书房、1978年、381-384頁以下に本书を引用するときは、『主要文书』下略する）

重シツツ、渾然融和ノ实ヲ举グル」としている。しかしながら当面、事変が再び勃発することを予防するために、それに必要な保障を作り上げるべきであり、事実两国間において以下の各項すなわち「(一)日滿支三国ハ相互ノ好谊ヲ破坏スルカ如キ政策、教育、交易其他凡ユル手段ヲ全废スルト共ニ右种ノ恶果ヲ招来スル虞アル行动ヲ禁絶スルコト(二)日滿支三国ハ互ニ相共同シテ文化ノ提携防共政策ノ实现ヲ期スルコト(三)日滿支ハ产业經濟等ニ关シ长短相补有无相通ノ趣旨ニ基キ共同互惠ヲ约定スルコト」が取り結ばれた。これらの方針を実現するためには、各方面に政略と戦略を入念に用いさせる必要があり、以下のような対策が実施された。1. 中国の現中央政府が诚意を持って讲和を求める場合は、別紙(甲)すなわち以前取り決めた「日支媾和交渉条件细目」(全9条)に准据して交渉し、さらに上述した条件における保障条項別紙(乙)を解除する。2. もし中国中央政府が讲和を求めない時は、日本はこの政府を事変解決の相手とはせず、新政权の樹立を助け、この新政权と国交の調整を協議するだけではなく、現中央政府を坏滅し、新政权の傘下に置く⁶⁾。

日本が中国政府に示した回答の最終期限である1月15日になっても、中国政府が回答しなかったため、上述の方針にしたがって日本は中国側に讲和を求める诚意がないとして、16日の昭和天皇の批准を経て、近卫首相は「国民政府ヲ对手トセス」との政府声明を发表した。その内容は「帝国政府ハ尔後国民政府ヲ对手トセス、帝国ト真ニ提携スルニ足ル新兴支那政权ノ成立发展ヲ期待シ、是ト两国国交ヲ调整シテ更生新支那ノ建设ニ协力セントス」というものであった。18日、近卫首相はさらに《补足的声明》で「尔後国民政府ヲ对手トセスト云フノハ同政府ノ否认ヨリモ強イモノテアル。……今回ハ国际法上新例ヲ开イテ国民政府ヲ否认スルト共ニ之ヲ抹杀セントスルノテアル。……又国民政府ヲ对手トセヌ建前カラ宣战布告モアリ得ヌワケテアル」⁷⁾と述べている。これがすなわち、第1次「近卫声明」である。

第1回御前会议と第1次近卫声明の後まもなくの1月20日に近卫内閣は《国策大纲》を閣议決定し、今後数年(およそ1941年まで)を日本の「非常時」とし、この时期における対外的・対内的な基本方針を決めた。対外的基本方針は「日滿華の強固な協力を実現し、东亚における永远の平和、世界平和への贡献を果たす」ことであった。具体的には、「日滿两国の密接な関係を堅持し、重要な对滿州政策をやり遂げる。積極的に努力して、对中国政策を実現させる。南方經濟の发展に力を注ぐ」⁸⁾と述べている。この文书は当时「公布禁止」であったけれども、22日、广田外相が第73回帝国议会で行った外交方針演说には、すでにこの主旨について触れている部分がある。彼は、「关系诸国が中国の新たな局面、またこれと呼応する形で、帝国が当面あるいは今後まもなくの間に、理にかなった形に調整した要求を行い、东亚新秩序をともに建设するところを見ていただきたい」⁹⁾と述べている。これは「中国事变」後に初めて开かれた议会で、广田外相が初めて公に日本の外交政策における「东亚新秩序」建设を目標に掲げたものである。

6) 『主要文书』下(385-386頁)

7) 『主要文书』下(386-387頁)

8) アメリカ国会図書館編・中国国家図書館蔵『日本外務省档案』マイクロフィルム、S489、S1110-27、1883-1888

9) 『日本外務省档案』S487、S1110-27、431-437

広田の外交方針演説と期を同じくして、日本軍部も同様の望みを示している。参謀本部の第1部第2課（作战課）が1月20日に起草し、30日に完成させた《昭和十三年以降の爲の戦争指導計画大綱案》は、1938年から1941年までを区切りとして、ソ連・中国に対する戦争準備を整えると述べるとともに、「今次支那事変ヲ转机トシテ发展スヘキ帝国四圍ノ新情勢ニ処スル帝国ノ国防方策ハ东亚长期ニ亘ル戦争ニ対シ计划的ニ准备シ且之ヲ自主的ニ指導シ以テ我国是ニ基ク东亚経ヲ遂行スルニ在リ」¹⁰⁾という方針を打ち出している。この方案は、「全く課内の一案であって、省部の成案となったものではないが、当時の施策の精神を知るためには意義深いものである」¹¹⁾。これこそ日本の国防政策上打ち出された「东亚経綸」の目標であり、そのため日本政府の「东亚新秩序建設」の方針と一脉通じるものがある。

先述した軍部の表明は、第1回御前会議で「中国事変」対処の根本方針が定められ、第1次近衛声明が発表されてまもなくの時期になされ、この時すでに継続して「中国事変」の対処に当たることが決定されていた。と同時に、1941年以前における日本の対外政策（その目標はいわゆる日「満」華が協力して「东亚新秩序」を打ち立てること）が実現された。

2. 「対支院」設立の醸成について

日本が九一八事変を引き起こし、偽滿傀儡政权を樹立して後の1934年9月14日に、《対滿关系机构の調整に关する件》が岡田启介内閣の「閣議」を通過し、「対滿事務局」を内閣に設立することが決定した¹²⁾。さらに枢密院の审议を経て、12月26日に日本政府によって《対滿事务员局官制》が公布されている¹³⁾。《対滿事務局》は1942年11月に新しく成立した「大东亚省」に（当省の「満州事務局」として）合并されるまで、8年にわたり存续することになる。

全面的な中国への侵略を意味する「中国事変」が起こって以降、上述の「対滿事務局」の先例に仿って、日本の中央政府に「中国事変」に関する事务を専門的に处理する统一机关が設置することが、日本の首脳部の共通认识となった。

「中国事変」が起こってからしばらくして、近衛首相は「对华中央机关」の設置を考え、对中国政策の一本化を目指した¹⁴⁾。第1次近衛声明发表後の1938年1月19日に、《対滿・对华关系机关の調整に关する件》が企画院第三委员会の干事会を通過し、「閣議」決定した方案として、内閣において「东亚事務局」を設置することが合議の上決められた¹⁵⁾。しかしながら、この「东亚事務局」の方案は、外务省の強い反对を受け、結局废案となった¹⁶⁾。

10) 『现代史史料9』「日中戦争2」（240頁）

11) 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东京、朝云新闻社、1976年、532頁）

12) 中央档中国第史档吉林省社会科学合『日本帝国档选伪傀儡』（华局1994年、41-43頁）

13) 『现代史资料7・満州事変』（东京、みすず书房、1964年、600-601頁）

14) 矢部贞治『近卫文麿』（东京、读卖新闻社、1976年、427頁）

15) 『对支中央机关设置问题一件（兴亚院设置）』外务省外交史料A.1.1.0.3

3月初め、近卫内閣の法制局はさらに「对支局」の方案をかため、「阁议」に引き渡す算段をしていた。これは首相を会长とする「对支审议会」のもとに「对支局」を设立し、その下に政治・経済・文化の3部門を設け、それぞれ中国に関する事务的業務を担当することを立案したものであった¹⁷⁾。しかし外务省は「对支审议会」の设置には賛成したものの、「对支局」の设置には反対したために、「对支局」方案は据え置かれたままとなった。

5月26日宇垣一成が外相に就任すると、近卫内閣は「五相会议」を対中国政策の最高决议机关とし、対中国中央机关设置の問題についての動きはしばらくの間中断された。しかしながら、8月になると、陆军がさらに「对支院」の设立方案を提出し¹⁸⁾、外务省がそれを拒否する事态となったため、9月29日の五相会议の席上で、宇垣外相は憤って辞表を提出し、「対中国中央机关の方案は、外交系统の中核を失わせるものである。もしこれを外交界に付したならば、大きな侮辱を受けたと感ずるであろう。このような侮辱が时局の重大・举国一致などの美名の下に某部（军部を指す—笔者）の态度を覆い隠すならば、いわゆる羊头狗肉である」と赤裸々に述べた¹⁹⁾。

対中国中央政府机构の设置に热心な近卫首相は我意を張り、宇垣外相の辞意を受け自らがしばらくの間外相を兼任しただけではなく、陆军の方案をもとに、10月1日の「阁议」で《「对支院」设置に関する件》を决议し、对支院を「支那事变中内閣总理大臣ヲ总裁トシ外务、大藏、陆军及海军ノ四大臣ヲ副总裁トスル对支中央机关」と定めた。この规定の中には、中国现地にそれぞれの「支局」を設置し、あわせて日本の民间にいる有能・有识者を采用し、「对支委员会」を组织することも記されている²⁰⁾。

「阁议」決定を基に、近卫内閣の法制局と各省とが协议して「对支院」の官制方案の起草を開始し、11月中旬にやっと定稿が完成した。この时「对支院」の名称は日本の驻中国の政府职员らの強い反对にあったため、近卫内閣が设立を目论んだ「对支院」は、ずっと「羊头を掲げた」段階のままで、正式发表には至らなかった。

3. 第2次近衛声明・第2回御前會議・第3次近衛声明と「東亜新秩序」建設政策の確立

1938年の前半、日本は「国民政府ヲ对手トセス」の方針に従って、引き続き徐州会戦・武汉会戦を始め、10月末には广州・武汉を占拠した。日本軍が中国の大部分を占拠しながらも、中国政府は依然として抗战し続けており、日本は军事战略上持久戦の段階に持ち込まれたため、政治上の中国进攻を開始した。日本の対中国政略に伴って、「東亜新秩序」の目標が鮮明になってくる。

16) 广田弘毅伝记刊行会編集『广田弘毅』(东京、广田弘毅伝记刊行会发行、1966年、317页)

17) 『昭十月以後对支院设置ニ关スル件(兴亚院)』国文馆2A 40 (资) 35

18) 『主要文书』下(392-393页)

19) 宇垣一成『宇垣一成日记2』(东京、みすず书房、1970-1971年、1262页)

20) 『主要文书』下(392-393页)

日本の対中国政略における進攻の轉換は、11月3日に行われた近衛首相の第2次声明にあらわれている²¹⁾。「国民政府と虽ども拒绝せざる」ことを主旨としたこの声明は、第1次近衛声明の立場を改めるとともに、第1次声明の後に明らかとなった日本の「中国事変」対処の新たな目標、すなわち「东亚新秩序」の建設をうたったものであった。この声明では、「东亚ニ於ケル新秩序ノ建设ハ、我カ肇国ノ精神ニ渊源シ、コレヲ完成スルハ、现代日本国民ニ課セラレタル光荣アル义务ナリ。」と表明するとともに、「东亚新秩序」の建設は日本开国以来一贯した国策であって、日本は努力し続けてこれを實現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と世界に向けて宣言している。「东亚新秩序」建設に関する内容は、この声明が「日滿支三国相携へ、政治、經濟、文化等各般ニ亘リ互助连环ノ关系ヲ树立スルヲ以テ根干トシ、东亚ニ於ケル国际正义ノ确立、共同防共ノ达成、新文化ノ创造、經濟結合ノ实现ヲ期スルニアリ」としているように、日本が「支那ニ望ム所ハ、コノ东亚新秩序建设ノ任务ヲ分担センコトニ在」った。これは日本が政治・經濟・文化などの分野で、日「滿」華合作のいわゆる「东亚新秩序」を實現しようとして表明するものであった。

近衛内閣陸相の板垣征四郎は、これに先んじて近衛首相の望みをもとに、6月17日に提出した《中国事変指導の説明》の中で、今後日本が積極的にこの事変に対処するための目標として「帝国カ东亚ノ盟主タル地歩确立ト友邦支那ノ再建トニ資シ且之ヲ转机トシテ发展スヘキ东亚长期ニ亘ル經綸ニ応シ得ル実行力培养ヲ促进ス」ることを設定している²²⁾。また、第2次声明が出された後、近衛首相はこの声明についての解釋の中で、これを繼續して進めることを明らかにし²³⁾、以下のように述べている。いわゆる「东亚新秩序」は欧米勢力が中国や全世界に築いた旧秩序に対応したものとと言える。日本の最終目標は世界新秩序の建設にこそあり、ドイツやイタリアとともに手を携えてこれを行う。日本のこの大業は「明治天皇の遺業」（11月3日は明治節—筆者）なのである。

第2次近衛声明が出された別の背景には、宇垣外相の対中国「和談」が失敗して以降は陸軍で繼續して「和談」を進めていたことがある。今回の「和談」は主として上海で進められ（「重光・堂会谈」ともよばれる）、中国側の代表は汪精衛に派遣された高宗武・梅恩平で、日本側は影佐禎昭（陸軍省軍務課長）・今井武夫（参謀本部中国班長）などであり、日本は高宗武の日本名を用いてこの和談を「渡辺工作」と名付けた。11月20日に至って、双方は密談を経て、すでに「东亚新秩序」建設の一連の日中協定文書（「重光・堂協定」ともよばれる）を作成し、それぞれ日本政府と汪精衛に報告している²⁴⁾。

前述の「和談」工作と平行して、日本首脳部は「东亚新秩序」确立の情勢下における日中関係、いわゆる「日中新関係」について考え始めていた。大本营陸軍部は早くも4月には「日中新関係」調整の方針を立案し、陸軍省に提出していた。8月末になると、陸・海・外・藏四省の当局がこれについての意見をまとめている。

上海で「重光・堂協定」が結ばれた後、四省の当局が出した上述の方針を揺るぎない国策とし、大本营—政府連席会议及び閣議の審議を経て、11月30日に開かれた第2回御前会

21) 『主要文書』下 (401頁)

22) 『太平洋戦争への道・資料編』（東京朝日新聞社、1963年版、262-263頁）

23) 黄美真『汪』（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96-98頁）を参のこと

24) 「渡辺工作」について、詳しくは『太平洋戦争への道・資料編』（275-279頁）及び『主要文書』下 (401-404頁) に書かれている

议で《日支新关系调整方针》が决议された²⁵⁾。この决议は「东亚新秩序」の建设がすでに日本の新たな国策方针となっていることを表している。この方针で定められた「日中新关系」とは、「日满支三国ハ东亚ニ於ケル新秩序建设ノ理想ノ下ニ相互ニ善邻トシテ结合シ东洋平和ノ枢轴タルコトヲ共同ノ目标ト为ス」という関係をいう。この日中間における「新关系」に関して、更に3つの原则およびその具体事项が定められた。すなわち、1. 「善邻友好ノ原则ニ关スル事项」。2. 「共同防卫ノ原则ニ关スル事项」。3. 「经济提携ノ原则ニ关スル事项」である。これにより、第2回御前会议で决议された国策とは、事実上上記の3つの原则によって日「满」华の新たな関係を筑くことであり、さらにこの新关系によって「东洋平和の枢轴」を构成し、「东亚新秩序」の建设を進めることであることがわかる。广州・武汉作战後に中国中央政府が行った「垮台」・「渡辺工作」によって、新たな日中关系はこのように一新される可能性をはらんでおり、それは日本の首脳部が決定した对中国政策の方针に基づいていた。そして、第2回御前会议は、当時の日本がすでに「东亚新秩序」の建设を最高国策の地位として确立していたことを表明したのである。そこで决议された《日支新关系调整方针》とは、日本が「ファシズムの外交观念である东亚新秩序を具体的に外交政策とした」産物なのであった²⁶⁾。

12月20日に汪精卫が重庆からハノイに逃れた後の22日に、近卫首相は3度目の声明を発表し、第2回御前会议で决议された「日满支三国ハ东亚新秩序ノ建设ヲ共同ノ目的トシテ结合シ、相互ニ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ノ实ヲ举ケントスルモノテアル」という方针を明らかにした。これにあわせて上述の3つの原则をそれぞれ明確に述べた後に、この3つの原则は「日本ノ支那ニ求ムルモノノ大纲」であり、「日本ハ实ニ支那カ新秩序建设ノ分担者トシテノ职能ヲ实行スルニ必要ナル最小限度ノ保证ヲ要求セントスルモノテアル」とさらに述べている。²⁷⁾第3次近卫声明で确立した3つの原则は日本の对中国政策上、七七事变以前の「广田三原则」に取って代わって生み出されたものであり、「近卫三原则」と称される。

日本が广州・武汉を占领した1938年末、第2次近卫声明・第2回御前会议と第3次近卫声明が次々となされたことは、日本の中国への侵略戦争が「政略进攻」の时期に转换したことを示している。日本が确立して1941年まで一贯して国策であった「东亚新秩序」の建设、またこの时期までに醸成されて掲げられた日「满」华三国の「经济圈」や「国防圈」などの具体的目标は、²⁸⁾太平洋战争开始後に掲げられた「大东亚新秩序」や「大东亚共荣圈」政策の直接的な础となっていく。

第3次近卫声明发表後、中国の最高指導者蒋介石は12月26日重庆で行われた中国国民党纪念周において、この声明に反駁し、日本の「东亚新秩序」を「これは东亚の国际秩序を

25) 以上の流れについては、『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575-576頁）を参照されたい。また文书は『主要文书』下（405-407頁）に收められている

26) [日]信夫清三郎編・天津社会科学院日问研究所译『日本外交史』下册（书1980年、632頁）

27) 『主要文书』下（407頁）

28) 1938年7月22日の五相会议で决定された「支那政权内面指导大纲」には日「满」华三国が经济分野で「三国经济圈ノ完成ニ迈进ス」とある。（『主要文书』下、391頁）11月18日大本营陆军部及び陆军省・参谋本部が决定した「十三年秋以降战争指导方针」では、中国事变解决「当面の目标は少くも日满北支を一環とする国防圈の自主的确立を以て主眼となし」としている。（『现代史资料9』、549頁）

覆し、中国を奴隷化するものであり、日本が太平洋を制覇することで、世界侵略とするこの総称である」と概括している。さらに近衛声明を判定して「現在、日本の政策は大陸政策から海洋政策にまで拡張し、北進政策が南進政策へと変わって来ている。つまり、日本の現在における侵略政策は大陸と海洋において同時並行的に進行しており、中国を并呑しようとするもくろみの下、国際秩序の転覆、东亚の制覇、ならびに欧米勢力の駆逐を目指すものである」と表明している²⁹⁾。

4. 「興亜院」の正式設立

1938年末に「东亚新秩序」建設の国策が确立するに伴って、「興亜院」も自ずから設立されることとなる。

11月3日に行われた2度目の近衛声明の後、駐中国の日本政府職員たちは新たな対中国政策目標をもとに、先に立案された「对支院」の名称を新たに、1. 东亚院、2. 大陆院、3. 东方院、4. 东大陆院、5. 新东亚院、6. 兴亜院、7. 新亚院、8. 事变对处院という8つに改めて、内閣が选べるように提供した³⁰⁾。これによると、近衛内閣は6つ目の「兴亜院」の名称を採用したことになり、あわせて11月18日の「閣議」において「兴亜院」に関する敕令案が决议された³¹⁾。

まもなく、枢密院はこれについて审议を行っている。第2回御前会议後の12月7日、昭和天皇临席のもと、ついに枢密院は《兴亜院官制》・《兴亜院连络部官制》などの件を审议通过させている³²⁾。12月16日、日本政府は「兴亜院」の官制に関するいくつかの敕令を发布すると同時に、柳川平助を总务长官に、铃木贞一を政务部长に、日高信六郎を经济部长に、柳川平助を文化部长代理にそれぞれ任命している。「兴亜院」はこの敕令发布によって成立したのである。

上記の点からすれば、「兴亜院」は近衛の第2次・第3次声明发表の間、そして第2回御前会议の前後の期間、日本の首脳部が「东亚新秩序建设」という国策を确立した後に产み出されたものである。12月26日、中国最高指導者である蒋介石は《近卫声明》を纠弾する中で、日本の「兴亜院」成立について、以下のように述べている³³⁾。

すでに「对支院」の名称は侮辱するに、また恐れるに足るものであったために「兴亜院」と改称されたが、これはまるで全てのアジア人を大きく侮辱するようなものである。日本のこのようなやり方は、中国全土を分散させ、中国の灭亡に歯止めをかけないばかりか、亚细亚全土に危机を及ぼすものである。……これは中国を灭ぼす計画の统括机关であり、また日本が中国のいたる所で行ってきた罪恶であるところの诸々の特务机关をあつめた统括特务机关である。……长期的に行われてきた中国灭亡計画は、目的を达成するまで

29) 中国第史档编《民国史档汇》第第・外交（古籍出版社1997年、55・59页）

30) 『昭十月以後对支院设置ニ关スル件（兴亜院）』国文书馆2A 40（资）35

31) 『大东亚省设置关系一件』第一卷、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M1.1.0.

32) 『枢密院会议议事录』第九十卷（昭和编四十八）（东京大学出版会、1996年、287-305页）

33) 『民国史档汇』第第・外交56-57页

止まることはない。現在、その方法も存在し、机关も存在する、これは日本の意図するところが明らかになったとみることができ、いささかも隠蔽されてはいないのである。

《兴亚院官制》では日本の「兴亚院」設置の目的を「中国事变のさなか、内阁总理大臣の管理のもと兴亚院を設置し、以下の事務をつかさどる。但し外交事務に関するものは除く。1. 中国事变ニ当リ支那ニ於テ处理ヲ要スル政治、経済及文化ニ关スル事务。2. 前号ニ掲グル事项ニ关スル诸政策ノ树立ニ关スル事务。3. 支那ニ於テ事业ヲ为スヲ目的トシテ特别ノ法律ニ依リ设立セラレタル会社ノ业务ノ监督及支那ニ於テ事业ヲ为ス者ノ支那ニ於ケル业务ノ统制ニ关スル事

(一) 主要职员

总裁：1人。内阁总理大臣が担当し、「院务ヲ统理シ所部ノ职员ヲ统制シ判任官ノ进退ヲ专行ス」

副总裁：4人。外相・藏相・陆相・海相が担当し、「总裁ヲ辅佐ス」

总务长官：1人。「总裁と副总裁の辅佐、院务の处理を行う」

(二) 下级部门

总裁官房

政务部：第一课（1. 对中国政策制定に関する事务。2. 各部事务の连络调整に関する事务。3. 连络委员会・兴亚委员会に関する事务）第二课（1. 对中国新政权との政治协力に関する事务。2. 各厅における对中国行政事务の一本化に関する事务）第三课。（1. 中国において行われる政治・経済・文化调查に関する事务。2. 情报収集と启发宣伝に関する事务）

經濟部：第一课（1. 中国经济开发計画に関する事务。2. 中国新政权が実施・准备する経済产业の提携に関する事务。3. 各课事务の连络调整に関する事务）。第二课（1. 华北経済开发有限会社及び华中振兴会社の监督に関する事务。2. 中国企业の统制に関する事务。3. 中国における拓殖事业に関する事务）。第三课（日中及び中国における交通・通信に関する管理事务）。第四课（1. 中国における金融・财政・货币制度及び税务に関する事务）。

文化部：第一课（1. 中国新政权が実施・准备する文化提携に関する事务。2. 民生に関する事务）。第二课（卫生・防疫・医疗・救济に関する管理事务）。第三课。（思想・教育・宗教・学术に関する管理事务）

技术部

(三) 各专门委员会

连络委员会

兴亚委员会

技术委员会

「兴亚院」の中国における各连络部は、1939年3月10日に日本政府が发布した「敕令」

「閣令」の規定に基づいており、「興亜院」の中国における各机关は以下のように設置された。

(一) 日本が中国に設置した各連絡部及び出張所

務。4. 各厅ノ支那ニ关系スル行政事务ノ统一保持ニ关スル事务」としている³⁴⁾。

명 칭	設置地点	管轄地域
興亜院華北連絡部	北京	中華民國臨時政府の管轄地域
興亜院蒙疆連絡部	張家口	蒙疆連合委員會の管轄地域
興亜院華中連絡部	上海	中華民國維新政府の管轄地域
興亜院厦門連絡部	厦門	厦門島及びその付近
興亜院華北連絡部 青島派出所	青島	青島特別市公署の管轄地域

(二) 各連絡部及び出張所の具体事務部門は以下のように設置された。

1. 华北連絡部：官房、政务局、經濟第1局、經濟第2局、文化局
2. 华北連絡部青島出張所：官房、政务班、經濟班、文化班
3. 华中連絡部：官房、政务局、文化局、經濟第1局、經濟第2局、經濟第3局
4. 厦門連絡部：政务部第1班、政务部第2班、政务部第3班、經濟部第1班、經濟部第2班、經濟部第3班
5. 蒙疆連絡部：总务課第1班（庶務）、总务課第2班（會計）、总务課第3班（調査）、政务課、經濟課第1班、經濟課第2班、文化課

3月11日、日本政府は興亜院各連絡部の长官人事を公布した。：华北連絡部長官喜多誠一、蒙疆連絡部長官酒井隆、华中連絡部長官津田静枝、厦門連絡部長官水戸春造、华北連絡部青島出張所長官柴田弥一郎

ここに至って、東京の中央から中国のそれぞれの地域にわたる全てに日本の「興亜院」が設立されたのである。

5. 結語：「興亜院」と日本の「東亜新秩序」

上述したところをまとめると、中日戦争初期の1938年に、日本は「東亜新秩序」建設という对中国政策目標を提出し、それを確立させ国策とした。これは「興亜院」の設立とほぼ同じ歴史過程をたどっている。その過程における「東亜新秩序」と「興亜院」は、日本

34) 興亜院政务部『興亜院執務提要』（東京、1940年1月、37頁

の对外政策上表里一体をなす歴史的な産物である。

1. 「興亜院」に対する我々の歴史判断

「興亜院」の構成に関して、東京の本部はもちろん、中国現地の各連絡部においても、主要部門は全て中国の政务・経済・文化事務に関する分野のものであり、政务・経済の両部門に重点がおかれている。中国現地の各連絡部は管轄する中国の占领地域と偽政权とが異なる戦略地位を有しているために、日本の施策は偏重したものとなっていた：おおよそを述べるならば、日本の「興亜院」が重点を置いたのは中国の华北・华中地域であり、他の連絡部より地位の高い政务・経済・文化三「局」（蒙疆連絡部は「課」で、厦門連絡部と青島出張所では「班」）が設置されている：さらに华中地域の経済事務を最も重視している。「興亜院」は戦争中に日本が中国占领地域に対して制定・実施した政策の総合机关であり、日本の政治上中国を灭ぼすための総合机关であると言える。

「興亜院」設置の性格に関して、1938年11月18日近卫内閣が「興亜院」に関する敕令案を通過させた際、极秘の了解事項、すなわち军部に勝る地位が次のように規定されていた。「军事及び警备に关して中国关系机关の指导は、陆海军の最高指挥官の任务及び协定に基づいて、実施する。兴亜院の指导とは上述の範囲を除く政务に关する指导のことである。……兴亜院連絡部次长以下の职员は、必要な場合、配属された现地陆海军司令部担当の武官を兼务することができる」³⁵⁾。1939年4月11日午前に行われた兴亜院第1回連絡部长官会议における政务部长铃木贞一の「兴亜院は事变中の机构」・「战时机关」であるために、「やむを得ず军部の活动と适应しない形でその机能を果たすことがある」³⁶⁾という发言は、より「兴亜院」という机关の性格を物語っている。これにもとづいて、「兴亜院」の主要职员の構成を見てみると、東京本部の主要职员である总务部长の柳川平助・政务部长の铃木贞一はともに陆军中将であった。在中国各連絡部长もおしなべて军部出身で、华北連絡部长官喜多诚一は陆军中将（前华北方面军特务部长）、蒙疆連絡部长官酒井隆は陆军少将（前张家口特务机关长）、华中連絡部长官の津田静枝は海军中将、厦門連絡部长官の水戸春造と华北連絡部青島出張所長官の柴田弥一郎はそれぞれ海军少将であった。これによると「兴亜院はいずれにしても主として陆军军人の指导下にある政府机关」と言うことができる³⁷⁾。このことは先に蒋介石が兴亜院を「日本が中国のいたる所で行ってきた罪恶であるところの诸々の特务机关をあつめた统括特务机关である。」とした糾弾からも里付けられる。

このように、中国への侵略戦争が政略进攻の段階に入った後、「东亚新秩序」建设のために「兴亜院」は設立された。これは確かに「羊头狗肉」の机关と言えよう。事实、これ

35) 『兴亜院关系敕令案』（1938年11月18日）、『昭和13年3月以後对支院设置ニ关スル件（兴亜院）』国文书馆2A 40（资）35

36) 『兴亜院第一回連絡部长官会议记录』（1939年4月10・11日）、『对支中央机关设置问题一件（兴亜院设置）』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A.1.1.0.3

37) 『宫崎书记报告书』（1938年12月31日）、『参考资料关系杂件 兴亜院关系』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H.7.2.0.4

は軍部特务机关把握のもと、中国占领地域に対する政治・経済・文化の各政策の方針を決定し実施する总机关であった。「対满事務局」と同様に、「兴亚院」は中国への侵略戦争時、中国占领地域に対する殖民统治を行い、政治上中国の灭亡を企てた总合机关であり、そのため正真正銘の「灭亚院」と言うことができる。

2. 戦時日本の「東亜新秩序」に対する我々の歴史認識

東アジア世界における古代の国際秩序は、中华帝国を顶点とした「华夷秩序」とよばれている³⁸⁾。近代以降「华夷秩序」は欧米列強の歴史性の挑战を受けて徐々に瓦解していった。近世の日本は、かつて「华夷秩序」から離れ、東アジアに自らの小型「华夷秩序」を構築しようと目論んだ³⁹⁾。明治維新後の近代日本は「脱亜入欧」して、速やかに欧米列強と共同して「华夷秩序」を打破するという行列に参加した。19世紀末から20世紀初頭にかけての時期は、朝鮮の灭亡に伴って「华夷秩序」が徹底的に崩壊し、東アジア世界は「列強共管」と称する帝国主義的国际秩序を打ち立てた⁴⁰⁾。上述した过程の中で、日本は甲午戦争・日露戦争などを経て、独特で重要な歴史作用を發揮した。第1次世界大戦が始まると、欧米列強は東に目を向ける余裕がなくなり、東アジア国際秩序は日本によって破壊された。第1次世界大戦終結後、欧米列強は再び東アジアに戻って、アメリカを顶点とした「ワシントン体制」が樹立された。日本は1920年代に「协调外交」路线をとったが、ついに九一八事変を起点として「ワシントン体制」に対して正式に挑战し、全面的な中国への侵略戦争の戦端を開いた後、正式に「東亜新秩序」の建設を打ち出し、太平洋戦争が始まってからは「大東亜新秩序」の建設を打ち立てた。2度の世界大戦及びその間における東アジア世界において、日本の対外政策が追求した目標とは、単に共同もしくは単独で旧秩序を打破するだけではなく、むしろ重要なのは日本式の国际「新」秩序を建設することであった。

もし「华夷秩序」、「列強共管秩序」及び「ワシントン体制」などの東アジア世界旧来の国際秩序と比較するならば、近代日本の政策目標は、あるいは形式的には「新秩序」と呼べるかもしれない。しかしながら、「兴亚院」と結びつけて考えるならば、われわれは事実上この秩序は正真正銘日本が作り出した「旧秩序」であることを指摘せずにはいられない。1941年1月15日、アメリカ国务長官コーデル・ハルは上院外交事務委員会における声明の中で、太平洋地域における日本のいわゆる「新秩序」の実態を以下のように指摘し

38) 「华夷秩序」の他に、「宗藩体制」や「朝贡体系」などとも称される

39) 日本の学者もこれを「大君外交」と称している。但し多く中學者はこれを小型の「华夷秩序」の焼き直しに過ぎないとみており、「日夷秩序」とすこともある

40) ここで述べている「列強共管」の国際秩序は、筆者个の見解である。但し内藤湖南(1866-1934)が民国初年に提出した「国际共管論」と異なること言及しておくべきであろう。中国学会における後者についての専論は『内藤湖南研究』(华局2004年)及び『学到中国——近代日本の中研究』(华局2007年)の関係部分を参照のこと。日本の学界では主に戦後の東洋史の学者が、内藤湖南の思想について中国への侵略戦争を正当化したとの

批判を加えている。(谷川道雄「关后的内藤湖南批——増夫の个案[日]内藤湖南研究会编著彪等译『内藤湖南的世界』所收(西安:三出版社、2005年、345-372页))を参された

ている。

政治上においては、1つの国家によって全てが統制されている；経済上においては、東アジア地域の資源を利用して日本の経済的利益とし、東アジア地域のその他の国家を貧困に陥れている。また外国の利益を排斥している；社会生活においては、個人の自由を損ない、征服されている国家の人民を二等公民としている⁴¹⁾。

日中戦争から太平洋戦争にいたるまでの期間存续した「兴亚院」によって、戦時における日本のいわゆる「东亚新秩序」の本质が検証できるだけではなく、今日の世界認識問題のために、最高の「物证」が提供される。これによって、近代日本の「东亚新秩序」が東アジア世界に遺したものは完全に負の歴史遺産であったと、われわれが考える理由が存するのである。

41)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partment of States: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Japan:1931-194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Washington,D.C.,1943.Vol.,p330

「満洲」の中国化

:19世紀後半から20世紀前半期の
奉天地域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形成

■ 上田貴子 (近畿大學) ■

「満洲」の中国化

—

19世紀後半から20世紀前半期の奉天地域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形成 —

上田 貴子 (近畿大學文芸學部)

〈目 次〉

1. はじめに
2. 奉天における地域社会
3. 商会の変遷と奉天地域社会 ① 混乱期 (一九〇五—一九一一年)
4. 商会の変遷と奉天地域社会 ② 安定期 (一九一一年—一九二四年)
5. 商会の変遷と奉天地域社会 ③ 変動期 (一九二四—一九三一年)
6. おわりに

1. はじめに

中国東北地域はかつて「満洲」（以下括弧省略）と呼ばれていた。満洲ということばは本来、満洲族をさす。江戸時代の日本では集団名をもってその勢力圏をさすことがあったため、満洲族が実効支配した地域が満洲とよばれた。この満洲という語が書かれた日本の地図が、江戸時代にシーボルトの手をへてヨーロッパに伝わった。これによってヨーロッパでは満洲が地名を指すと認識され、マンチュリアと呼ばれるようになった〔中見 一九九三〕〔中見 一九九九〕〔中見 二〇〇四〕。

このかつて満洲とよばれた地域は一九世紀から二〇世紀にかけて、山海关以南から漢族が移住したことによって、漢族の習慣・文化があたりまえのものとなり、中国東北地域としての実質を整えていった。本稿ではこの過程において、そこに住む住民の意識をとりあげ、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ありようについて考察をおこなう。特に、当該地域の中心都市のひとつ奉天（瀋陽）の地域有力者が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をどこに置くかについて注目したい。

2. 奉天における地域社会

奉天は明代には瀋陽中卫とよばれ、明軍の卫所がおかれ、塞外の軍事据点のひとつだった。これを女真族を束ねたヌルハチが一六二一年に攻めおとし、後金の都として整備した。一六二五年に遷都、瀋京とし、一六三四年にヌルハチの子ホンタイジが満洲語で隆盛を意味する「ムクデン」を都の名とした。この名は汉语では「天眷盛京」と译され、そこ

からこの都は一般には「盛京」とよばれるようになった。一六三六年女真族を満洲族に、後金を大清と改称した。これによってこのまちは満洲族が支配する領域の中心としての地位が与えられた。大清の都が一六四四年が北京に移って後も、東北地域は満洲族の出身地として特別視され、このまちは盛京奉天府、あるいは奉天とよばれて陪都とされた。さらに、二〇世紀になると、奉天は張作霖の据点となった。彼は一九一六年の袁世凱死後には、在地有力者の支持を集め、奉天省の政治・軍事を掌握した。一九二四年に第二次奉直戦争の勝利により、張作霖は中央政界に影響力を行使するようになった。このようなまちな歴史は奉天にすむ漢族の自己認識にも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た。

奉天の街は方形の内城と圓形の外城から構成されている。大清の都とされたことによって、奉天の内城は八旗の居住区と定められた。当初、八旗と民間人とのすみわけを明確にしていたが、時代を経るにしたがってあいまいになっていった。内城の宮殿の里にあたる通りは四平街、俗に中街とよばれ、両端には鐘楼と鼓楼が置かれた。この通りは、商業地として発展し、多くの老舗が軒をつらね、現在に至るまで、主要な繁華街となっている。

清末になると、この地の地域社会は、奉天の当初の主である満洲族よりは、漢族商工業者が中心となるものになっていった。彼らは公议会そしてそれを改組した商会（奉天总商会）として結集し、権力者に対して、地域社会の要求をつきつける存在となっていった。

清末の地方志によれば、当時の商業資本は、山西商人が最も資本規模が大きく、福建からの商人がこれに次ぎ、山東商人は経営規模の小さい零細資本とみなされていた¹⁾。山西商人は、資本規模の大きなものは、票庄を經營し、政府財政を預かる政商が中心的存在だった。福建商人は海运による地域間交易に携わり、营口などの港や満洲における大消費地奉天に据点を持っていた。山東商人といえば、店舗や、行商も含めた小売商が想起された。彼らの商売は農民への雑貨供給、都市民への奢侈品の販売だった。このように漢族の商人は外地から来た客商である。

奉天の商人たちは、四帮、五行、十六道街という基準で分類できる。四帮とは直隶・山東・山西・在地²⁾の同乡集团、五行とは钱行・粮栈・丝房・皮货・山货の同业集团〔『东三省政略』 一九八九：下 一五八四頁〕、十六道街とは、鐘楼东大街・鐘楼南大街・鐘楼北大街・大北关大街・鼓楼南大街・鼓楼西大街・鼓楼北大街・中街大街・大西门里大街・大东关大街・小东关大街・大南关大街・小北关大街・小南关大街・大西关大街・小西关大街という开业地ごとの集团である。十六道街の各街は水龙（消火用ポンプ）を所有し、消防の目的から組織化され、その組織は公议会とよばれた。十六の公议会は长安寺で合議を行った。狭義に公议会という場合はこの合議組織をさし、十六の街区ごとの公议会は分会と位置づけられた〔刘 一九八二：一六四一六五頁〕。

奉天における出身地と業種の対応は、山西帮については、先にみたように票庄・钱行が多い。他には烧锅（烧酎醸造業）、船店（河川运输業）など一定の資本を必要とする業種に山西帮が多くみられた。山東帮は丝房（雑貨製造卸小売）、料理店、山货舗³⁾について

1) 奉天省城と長春の中間点に位置する平野部の昌図の地方志には「下等之小本营业不可枚举多山东人」という山東人観が記載されている〔『昌図县志』 一九一六：卷三 三七丁〕

2) 『东三省政略』では吉林とされているが、実際の商工業者の出身地をみるかぎり、むしろ奉天周辺の在地資本と考えるほうが妥当である。

3) 主に东山（永陵・通化・怀仁など東部の山地）から産出される山地での生産物を扱った。元蘑（きのこ

はほぼ独占状態だった。直隶帮の独占傾向が強い業種はないが、丝房以外の杂货舗、钱舗、粮行に直隶帮が経営するものがみられた〔外务省 一九〇七：二四八頁、二八〇頁〕〔奉天总商会 一九二五〕。在地の商人が特定の業種を独占することはなかったが、粮行、旅店、船店には在地商人が経営するものも多かった〔外务省 一九〇七：二四八頁〕。

3. 商会の変遷と奉天地域社会① 混乱期（一九〇五—一九一一年）

ではこれらのうち地域社会のなかで主導的な地位にあったグループは何か？この点については、商会の変遷とそこで指導層をみることで可能になる。

奉天总商会の変遷は大きく分けて、混乱期（一九〇五—一九一一年）、安定期（一九一一—一九二四年）、変動期（一九二四—一九三一年）の三つに分けられる。一九〇五—一九一一年の混乱期には、商会設立の母体となった公议会から商会への改組が行われた。この時期は清末の諸改革に対し、商人層が反発と受け入れのなかで揺れた時期である。政权側の意向を商人側が受け入れる際に衝突があり、商会长が短期的に交代し、指導層が混乱した。一九一一—一九二四年の安定期になると、指導層は安定した。一九一一—一九一七年に孙百斛、一九一八—一九二四年には鲁宗煦が長期にわたって商会长職についた。安定期は奉天地方政权の担当者と商会に代表されるような在地社会との間で、相互に支持しあう関係があっはじめて政权が維持された時期である⁴⁾。一九二四—一九三一年の変動期には张氏政权の商会への干渉が強まるとともに、南京国民政府の商会改組の影響を受けた。強力になった张作霖政权によって、今まで支える側であった商会が逆に政权の支配を受けるようになった。商会长はいずれも短期間で交替し、制度の改編も頻繁に行なわれた。

では、混乱期の地域社会のありようはどのようなものだったか検討したい。

四帮五行十六道街公议会からなる経済界の情况は、当時の政府からは改善すべき余地あるものとみなされていた。例えば、初代东三省总督であった徐世昌は、商会成立以前の商工業者の問題点として、以下の三点をあげている。①「涣散之弊」、同业团体同乡团体ごとに集まり、全体としてのまとまりがとれない。②「闭塞之弊」、商业振兴のための改革を行おうという意識が乏しい。③「阻挠之弊」、不当な中抜きをしたり、民众を誘って官に反抗的な態度をとるものがある〔『东三省政略』 一九八九：下 一五八四頁〕。ここには、商工業者は同乡・同业集团ごとの結束が固く、官と積極的に関係をもとうとはしていない姿がみられる。これに対して、官の側からは商工業者は团结して官のための経済振兴を支援するべきであるという考えが背後にみられる。

この情况に対して、东北では盛京将军の赵尔巽がさまざまな改革を行った。そのひとつが公议会の商会への改組である。赵は光绪三二年三月（一九〇六年）商务总局の設立を上奏した。奉天商务总局の役割は奉天全省の商政を管理することだった。商务总局設置の二ヶ月後には奉天の商会として商务总会の组织整備が行われた。同時に地方各县へ人員を

の一種、蜂蜜、人参などが取扱商品である〔外务省 一九〇七：二五五頁〕。ただし、『民国十三年奉天省城商工名録』、『満洲华商名録』（一九三二年）にあらわれる山货舗は民国期创业で直隶帮の経営によるものがほとんどである。

4) 当該时期の张作霖政权と在地社会の研究については〔松重 一九九〇〕〔松重 一九九一〕〔松重 一九九四〕〔涩谷 一九九七〕等を参照のこと。

派遣して商会開設を押し進め、六ヶ月後には従来存在した公议会などの商人団体を商会に改組させ、一部の県では新たに商人に商会を組織させた。その結果、奉天省全体で五〇个所余りの商会が成立した。その内訳は奉天・安东・营口の三总商会と三八个所の分会、一六六个所の分所からなっていた⁵⁾。

しかし実際には商会への改組には公议会側の抵抗があったことがみうけられる。奉天の場合は一九〇六年二月一日（旧暦一月一八日）に长安寺に商务总会が設立された。その長である会頭には孫百斛が選ばれた。表向きは商工業者の推薦によるとされている。『商务官報』（光緒三二年第四期一七丁）には孫百斛⁶⁾が总理（商会长に相当）、梁维康⁷⁾が协理（副会长に相当）に選ばれ、商务总会が機能しはじめたと記載されている。他方、孫百斛による商会が設立されたことを伝える『南満洲に於ける商业』は、同時に公议会も并存していたとしている。これを記録した日本人調査員は、公议会で会員から話を聞き、公议会側は商会の設立を不本意なものと考えていたことを伝えている〔外務省 一九〇七：三一四頁〕。おそらく、公议会が商会の体裁に改組できないので、商务总局が官吏出身の孫百斛を長とする形で、公议会とは別に商会を設立したと考えられる。

これは、史料によって商会长の异同がある点からも推測される⁸⁾。同時代史料である『商务官報』と『南満洲に於ける商业』は孫百斛を商会长としている。しかし、その後編まれた『沿革』〔満洲中央銀行調査課 一九三六：一頁〕では公议会改組を一九〇二年とし、孫百斛が商会长に就任した年を一九〇八年にしている。一九〇二年の商会长には田子超⁹⁾副会长に甘益堂¹⁰⁾、一九〇五年には商会长に赵国廷¹¹⁾副会长に杨化霖¹²⁾の名前が挙げられている。彼らのほとんどは『南満洲に於ける商业』が公议会幹部として挙げている¹³⁾。

これらの史料内容の混乱から、公议会改組の過程は以下のように考えられる。光緒三二（一九〇六）年時点の改組では公议会と商务总局の管理下にある商会とが一時的に并立していた。商务总局は孫百斛を中心に商业会议所をモデルとした总商会を组织しようと試みた。总商会の設置場所を公议会と同じく长安寺としているところから、理想的には公议会

5) 『东三省政略』『纪商会』、本文以外の付表には四二个所の分会、一一个所の分所が記載され、付表と本文の内容に异同がある〔『东三省政略』 一九八九：下 一五八五 一五八六頁〕。

6) 孫百斛、字鼎臣、祖籍は天津、父の代に瀋陽に移住する。一八九〇年の进士で、翰林院編修。一九〇〇年义和团事件のおり、故乡である瀋陽にもどり、东三省官銀号总办、谘议局省议会议长などを歴任する〔『奉天通志』 一九八二：四六二四頁〕

7) 梁维康、記載によっては康は宣とも裕民銀号經理〔刘 一九八二：一六九頁〕

8) 以下の商会干事の异同については、次の史料を比較した『商务官報』第四期一七丁「商部奏奉天设立商务总会摺」（光緒三二年四月二日具奏奉）、満洲中央銀行調査課『本邦农工商会調査 奉天省之部』（一九三六年）一頁「沿革」外務省『南満洲に於ける商业』（一九〇六年）三〇九頁、三一三頁、三一四頁。

9) 田子超、天合东丝房經理〔刘 一九八二：一六八ページ〕。

10) 甘益堂、記載によっては堂は棠とも。また甘志謙とも。瀋陽で200年余の歴史をもつ最も古い药舗宝和堂經理。商会では田子超と同じ時期に副会长職にあり、彼の助手的存在〔刘 一九八二：一六八頁〕〔外務省 一九〇七：三〇九頁〕。

11) 赵国廷、記載によっては赵清玺とも。南烟行の兰茂厚を經營する。また1907年创业の日中合弁会社瀋陽马车铁道公司の总理〔刘 一九八二：一六八頁〕〔外務省 一九〇七：三〇七頁〕

12) 杨化霖、銀号經理〔刘 一九八二：一六八頁〕

13) 『南満洲に於ける商业』では光緒三二年時点（一九〇六年）の公议会役員として甘益堂、刘贤基（田子超と同じ商店天合东のもの）、张玉书、玉聚干、赵国廷の五人があげられている

を吸収改組するつもりだった。しかし、公议会の反発を受けたため、改組は容易には進まなかった。また最終的には孫百斛が赵尔巽と対立したこともあり〔涩谷 一九九七：六五頁〕、孫百斛は商会长を退いた。公议会の指導部も一步ゆずり、赵国廷に商会长を任せることで、商会と公议会との間で妥協が成立し、一つの組織として奉天总商会が成立した。

しかし、商会設立にともなう対立は、元公议会干事を商会长としたことでは収まらなかった。一九〇八年夏から秋にかけて、奉天では都市民の間で抗房捐运动がおこった。省政府は新政実施経費のために商工業者への増税を決め、それへの反発が営業ボイコットや北京への直訴にエスカレートした。この過程で、商会設立時に政府からの妥協を引き出し、商会长となった赵国廷は政府に反対する商人達を説得する側にまわり、商人層から游离せざるをえない状況におかれた。逆に商会設立時には政府が商会长に派遣しようとした孫百斛が抗房捐派と政府の仲介に入り、商工業者に受け入れ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盛京时报』八月九日〕。

この事件の結果、孫百斛は赵国廷の辞任後に商会长に就任した。本来商会长は旧历一月の年会での選挙で決定されるものだが、それ以前に農工商部からの指示で着任した。翌年には、商会长職は商工業者代表の田子超にかわり、孫百斛は地方议会の前身にあたる谘议局に商会代表として参加した。その後も辛亥革命までの間、商会长職は官と商人との対立で紛糾することが多かったと文史資料では指摘されている¹⁴⁾。

この時期の奉天地域社会では、特に力をもつ集団の突出はみられない。むしろ、山西系の金融資本と山東系の杂货資本、さらに在地に基盤をもつ孫百斛のような存在がほぼ同じような力関係をもっていたといえる。また客商たちは、出身地にも基盤をもつために、各自の商取引を調整するために合意をすることはあっても奉天経済界としての結束は小さい。だからこそ、徐世昌が『东三省政略』でなげくような状況にあった。しかし、民国期になると地域社会のなかに东北人意識ともいべきものがみられるようになる。

4. 商会の変遷と奉天地域社会② 安定期（一九一一—一九二四年）

辛亥革命後には、商会人事は安定をみるようになった。商会长については、一四年間の間に交代は一度しかなかった。一九一一年から孫百斛が、その死後一九一八年からは魯宗煦がつとめた。前半に商会长をつとめた孫百斛は抗房捐运动や谘议局での活動を通じて地域社会の信頼を獲得していた。魯宗煦は一九〇九年から总务商会の干事職にあった¹⁵⁾。魯

14) 赵国廷は兰茂厚という南烟行の商店を經營しつつ、日露戦争時の戦争成金的な成功を収め、日本との合弁で、奉天の马车铁道經營に参与した、後発の商人であった。また、従来の主流派五行（粮棧・钱行・丝房・皮貨・山貨）でもなく、財力はあるものの少数派であったと考えられる〔刘 一九八二：一六九頁〕。

15) 魯宗煦、棣琴ともいう。定员外生員の資格を持つ。一九一二年から日本の大倉組との合弁で經營されていた渾阳马车铁道公司の經理の職につく〔田辺 一九二四：一〇七頁〕。また一九一四年に設立された華猪公司の經理でもある〔『奉天省公署档案』 三一三六〕。一九一五年には王永江が組織した东省兴利公

宗煦は山东省蓬莱县出身で、自身は杂货商の経営者ではなかったが、その支持基盤は山东出身の杂货商である丝房だった。混乱期には、银号などの民間金融機関の経営者が商会长や副会長に選出されていた。しかし、その後は減少し、民間金融業者は奉天总商会での立場は弱くなった。

この時期の奉天总商会の安定は地域社会の発展を反映したものといえる。安定期には経済界の花形業種として杂货業が成長した。一九二三年奉天总商会名簿にみられる幹部は杂货三〇人（うちわけ丝房一六人、その他杂货等贩卖が一四人）、金融关系九人（うちわけ质屋五人、金店二人、官银号一人、钱舗一人）、それ以外では药舗六人である。計七一人の幹部のうち、杂货贩卖業の多さは留意に値する。この杂货業が取り扱っている商品は、绵糸布・海产物・药品・その他杂货で、主に上海・天津・大阪から仕入れた商品である。杂货業は第一次大战後の东アジアでの轻工业の发达にともない、その市場である中国东北地域への商品輸移入を扱い繁栄した。

この時期に発展した杂货商としての山东帮は強い結束力を有していた。杂货商の中で「丝房」を名乗ることが可能だったのは山东帮だけだった。一九三三年の調査でも山东出身者の集る山东会馆は布商つまり丝房のみが構成員で、調査年時点で七〇余の商店数を数えている〔枝村 一九三三：七-八頁〕。丝房全体での店舗の増加も、他の杂货商に比べて堅実だった。奉天では第二次奉直戦争後の好景気に杂货商の开业が急増した。このとき増加した杂货商の多くは、丝房と同様の商品を扱う他の地域出身者が経営するものだった。その後、一九二七年の奉天票暴落による不況となると、この時期に増加した多くの杂货商が倒産した。しかし、丝房からの倒産は少ないという結果がみられた〔拙稿 二〇〇一〕。

このような丝房を中心とした山东帮のあり方は、ほかの商工業者の反感をかうこととなった¹⁶⁾。一九二三年の商会选举が終わったあとで、省政府に匿名の鲁宗煦告发状が送られてきた。それによれば、一九二三年五月の选举で、鲁宗煦当选のために代理投票や脅迫が行われた。このような不正が可能だったのは鲁宗煦以外の二人の副会長とも山东帮で、商会内部が山东人に牛耳られていたためであると告发している。また一九二二年奉直戦争時に、鲁宗煦は张作霖の敌である吴佩孚と同乡であることで疑惑を持たれるとの心配から精神を病み、このような人物に商会を任せられない、とも指摘している〔『奉天省公署档案』 三六一七〕。この告发全ては信じられないが、鲁宗煦はさきに指摘したように、山东帮の一人だった。

この背景には、奉天における在地意識の形成があった。一九二〇年代には、日本や上海からの杂货輸入による杂货商の勢力拡大があったと同時に、近代的な轻工业の萌芽がみられた。このような轻工业への投資を行ったのは、籍贯を奉天におく在地化した人々だった。

の股东として四万元を出資している〔『奉天省公署档案』 三一四三〕。一九一九年创业の永丰庆と米粮行の経営者でもあった〔奉天总商会 一九二五：一七九頁〕

16) 日本側の調査では山东帮に対する姿勢として以下のような報告もされている。「先年奉直戦後ヨリ奉天ニ於テハ暗ニ山东出身者ヲ压迫スルノ观アリ尚其後市政公所ノ创立ヲ见ルヤ益々此傾向ヲ明了ニシタリ現ニ奉天总商会会长鲁宗煦氏（山东人ニシテ吴佩孚ト同乡ナリ）ノ如キ事ニ托シテ之ヲ檢束シ近々改选ノ举ニ出ヅルト云フ」〔拙稿 鹿 一九二四〕。

工業製品を生産する企業は「実業振興」をスローガンとして清末民国初期からさかんに設立されていたが、ほとんどは「満洲国」期になって行われた調査にあがらず、倒産したと推測される。この「実業振興」が実を結びはじめるのが一九二〇年代になってからである。一九三一年時点の資料ではこの時点で奉天に存在した主要な工場制生産の多くは东三省官銀号、辺業銀行、奉天儲蓄会といった东北地方政权の官僚と関係の深い金融机关から资金融資をうけ、同時に政府关系者自身が資本出资者となっている。このため免税などの優遇措置をうけることが多かった。業種はマッチや紡績業など、それまで輸入にたよっていた轻工業が多く、輸入代替をめざしていた。その経営者たちの多くは一九二〇年代後半に盛んになる国産品販賣促進运动である「国货运动」や、日本製品ボイコット运动の中心的存在となっていた〔拙稿 二〇〇三〕。

5. 商会の変遷と奉天地域社会③ 変動期（一九二四 一九三一年）

商会の変動期は、これらの轻工業資本による、山东帮からの実権夺取によって始まった。

轻工業資本は、輸入代替化を計ることを目指していたため、輸入により利益を蓄積してきた安定期の商会指導层である杂货业とは利害の対立が存在していた。また轻工業資本の育成は政权の殖産兴业政策の一环であることから、経済界の指導者层の交代は张作霖张学良政权の後ろ盾のもとになされた。

安定期最後の商会长鲁宗煦は、任期途中で不正を告发され、商会长職を退いた。一九二四年四月七日および一三日の『盛京时报』の报道によると、商会では参事たちの求めに応じて、一九二三年一月から一九二四年一月までの收入三万余元支出四万余元の会计报告を公开した。これには约一万元の赤字があり、原因を明らかにするために、四月一日の会议で監査を行うことが決定された。当初、鲁宗煦会長の选んだメンバーによって監査委員が组织されようとしたが、章程の規定にないと异议が唱えられ、参事间での推荐によって選ばれたメンバーが監査を行った。その結果、不正経費がみつき、鲁宗煦会長のこの責任を問われた。四月一七日に省政府に不正のリストが提出された〔『奉天省公署档案』 三六一七〕。この事件によって鲁宗煦以下干部四人が警察厅に拘束され、商会董事と商会长の选举が行われた。省政府は今回の問題は会长が小資本经营者と徒党を組んで会務をほしのままにしたとして、会長の被选举权を营业资本额五万元に、董事の被选举权を4万元に引きあげ、选举权は一万元以上と指示を出した〔『奉天省公署档案』 三六一七〕。この規定に基づき、选举权被选举权の有资格者リストがつくられ、五月一九日に董事选举、二一日に董事内の互选によって议事が選ばれ、二六日には正副会长选举が行われた。その结果五八人の董事が選ばれ、会长には张志良が、副会长には吴玉麟と赵保安が选出された。

鲁宗煦失脚後に商会长となった张志良は、浑阳县衙门につとめ、一九一二年には奉天督军署の監印官に就任、その後张作霖政权において巡阅使・督军・省長の監印官を一九二四

年までつとめ、張作霖の秘書的役割を果たした。同時に新興の軽工業資本の経営者でもあり、一九二一年に八王寺啤酒汽水公司、一九二二年に惠臨火柴公司を創業している。その財源は、一九一七年に張学良を名誉会長に迎えて、彼が发起した奉天儲蓄会だった。儲蓄会とは会員から集めた株を資本とし会員にのみ資金を融資する信托預金机关であった。一九二三年当時月一元ずつあるいは年一元ずつの拂い込みで会員資格が得られ、幅広い社会阶层から資金を集めることが可能だった。また奉天儲蓄会は他の儲蓄会とは異なり、新興の軽工業のうち有望なものの株式を積極的に引き受けていた。この業務の枠組で張志良の八王寺啤酒汽水公司や惠臨火柴公司への資本提供がなされた。さらにこれらの企業以外にも肇新窑业公司や东兴色染织公司、奉天纺纱厂にも資本提供をおこなっていた。また亲银行として东三省官銀号の後ろ盾を有していた [『满铁调查时报』一九二三年三卷一〇号一一二四頁]。

魯宗煦から張志良に商会长がかわったことは商会内部での政争というだけでなく、地域社会のリーダーが新しいものに代わったことを意味する。同時に、地域社会の意識の変化の現れでもある。それまでの丝房という流通業で経済力を築いてきた山东帮は、あくまで自己を山东人であると認識し、その多くが郷里の山东に家庭を持っていた。これに対し、新興の軽工業資本家たちは、張作霖政权との関係を持ち、奉天を中心とした地域認識を張作霖政权と共有していた。この段階で、奉天地域社会において地域主義を意識する在地意識の一定の成長があったことがいえる。

変動期の後半には、地域主義に加えて、商会の指導層がナショナリズムを強く主張するようになる。一九二七年には臨江日本領事館分館設置事件がおこった。当時の商会幹部の丁广文・杜重远らを中心に外交後援会が組織され、反日運動が高揚した。この反日運動はそれまで商会が対日强硬姿勢をとらなかったことに比べると、大きな方針轉換だった。

6. おわりに

中国本部からみた外にあたり、清朝によって封禁政策の対象となった満洲で最も大きな都市である奉天において、清末まではそこに住む漢族商人はあくまで客商であった。漢族地域社会も各地から来た客商の合議によって支えられていた。民国期になると国際経済に組み込まれ、貿易に携わる山东帮の杂货輸入商が経済界において力を持つようになった。彼らの成功の一因には同郷の結束があったが、そのため山东との関係も強固に持っており、奉天地域社会に対するアイデンティファイは弱かった。このため地域社会全体のなかでの在地意識が強まると、地域社会の代表としての地位を追われることになった。かわって地域社会のリーダーシップをとるようになったのはすでに籍貫を奉天とした新興資本家たちだった。彼らは張作霖政权との距離も近く、張作霖政权と地域認識を共有しているといえる。そこにあるのは、満洲という外地に仮住まいする存在という従来の客商の認識とは違い、东三省の中心である奉天地域社会を支え発展させていくという地域主義である。この地域主義は都市の名としての一地方都市の名ではなく、都たりえる奉天という名に対するこだわりも見せた。一九二九年に南京国民政府の指示によって都市名を渾陽に変える

ことを求められ、商会もその名を奉天总商会から瀋阳市商会に変えなければならなくなった。しかし、一地方都市の商会を示すだけのその名に対して商会内では強い抵抗があった〔『奉天省公署档案』 一二〇三三〕。

一九世紀末から二〇世紀にかけて、この地域は大量の汉族移民を受け入れた。そのなかで急速に地域経済が发展し、そこから利益を得た存在が地域社会の代表者となっていった。またこの経済力に支えられて成長したのが张作霖政权である。その結果として住民が归属意識を持つに値する奉天地域社会が形勢されたのである。

文献リスト

上田貴子 二〇〇一年 「一九二〇年代後半期华人资本の倒産からみた奉天都市経済」
（『现代中国』第七五号）

上田貴子 二〇〇三年 『近代中国东北地域に於ける华人商工业者资本の研究』 大阪外国语大学言語社会学会

枝村荣 一九三三年 一〇月 「奉天に於ける会馆に就いて」（『满铁调查月报』第一三卷第一〇号）

外务省 一九〇七年 『南满洲に於ける商业』 金港堂

钜鹿贯一郎 一九二四年五月 『支那ニ於ケル商会法ト商事公断处章程』 辽东事情研究会

涩谷由里 一九九七年 『张作霖政权の研究：「奉天文治派」からみた历史的意义を中心』
博士学位论文、京都大学

田辺种治郎編 一九二四年 『东三省官紳録』 东三省官紳録刊行局

中见立夫、一九九九、「地域概念の政治性」、沟口雄三・浜下武志・平石直昭・宫岛博史
編『アジアから考える [一] 交错するアジア』 东京大学出版会

中见立夫、一九九五、「“北东アジア”からみた“东アジア”」、浜下武志編『东アジア
世界の地域ネットワーク』 山川出版社

中见立夫、二〇〇四、「“北东アジア”はどのように、とらえられてきたか」、『北东ア
ジア研究』 七号

松重充浩 一九九〇年三月 「「保境安民」期における张作霖地域政权の地域统合策」
（『史学研究』一八六号）

松重充浩 一九九一年六月 「张作霖による奉天省权力の掌握とその支持基盘」（『史学研
究』一九二号）

松重充浩 一九九四 「奉天における市政导入とその政策意図について」（今永清二編著
『アジアの地域と社会』 劲草书房）

满洲中央银行调查课 一九三六 『本邦农工商会调查 奉天省之部』

奉天总商会経済部调查股編 一九二五年一二月 『民国十三年奉天省城商工名录』 [奉天总商
会と略す]

刘恩涛 一九八二年 「瀋阳商会七十五年（1874-1948）」（『瀋阳文史资料』第1辑）。
『东三省政略』（吉林文史出版社版）。

『奉天通志』（东北文史丛书編集委员会版）。

『昌図县志』 一九一六年

南満洲鉄道庶務部調査課『満鉄調査時報』三卷一〇号（一九二三年一〇月）

【辽宁省档案馆所藏档案】奉天省公署档案

案卷番号三一三六「周作孚設立華茂猪毛公司請立案」

案卷番号三一四三「王永江等为興办实业組織東三省興利公司」

案卷番号三六一七「奉天省城總商會章程」

案卷番号一二〇三三「省城商會改組附送章冊」

「만주」의 중국화

－ 19세기 후반부터 20세기 전반기에 걸친 봉천(奉天)지역의 정체성 형성 －

우에다 다카코 (近畿大學)

〈目 次〉

1. 시작하며
2. 봉천에 있어서의 지역사회
3. 상회의 변천과 봉천지역사회 ① 혼란기(1905~1911년)
4. 상회의 변천과 봉천지역사회 ② 안정기(1911~1924년)
5. 상회의 변천과 봉천지역사회 ③ 변동기(1924~1931년)
6. 마지막으로

1. 시작하며

중국동북지역은 일찍이 「만주」 (이하 괄호 생략)로 불리었다. 만주라는 말은 원래 만주족을 가리킨다. 에도 시대에 일본에서는 집단 명으로 세력권을 지칭했기 때문에 만주족이 실효 지배한 지역이 만주로 불리었다. 이 만주라는 단어가 쓰인 일본의 지도가 에도 시대에 시볼트의 손을 거쳐 유럽으로 전해졌다. 이 때문에 유럽에서는 만주가 지명을 가리키는 말로 인식되어 만츄리아로 불리게 되었다. [나카미(中見) 1993] [나카미 1999] [나카미 2004]

일찍이 만주로 불린 이 지역은 19세기부터 20세기에 걸쳐 산하이관[山海關] 이남 지역에서 한족이 이주함에 따라 한족의 습관·문화가 당연한 것으로 인식되어 중국동북지역으로서 실질적인 면모를 갖추어 나갔다. 본고에서는 이러한 과정에서 동북지역에 사는 주민의 의식을 살펴 정체성에 대해 고찰하기로 한다. 특히 해당지역의 중심 도시 중 하나인 봉천(선양)의 지역 유력자들이 정체성을 어디에 두었는지에 대해 주목하고자 한다.

2. 봉천에 있어서의 지역사회

봉천은 명나라 때에는 선양중위(瀋陽中衛)로 불리어 명나라 군의 위소(衛所)가 설

치되어, 변방의 군사거점 중의 하나였다. 여진족을 통솔한 누르하치가 1621년에 함락시켜 후금의 수도로 정비했다. 1625년에 천도하여 심경(瀋京)이라 하였는데, 1634년에 누르하치의 아들 홍타시가 만주어로 융성을 의미하는 「무크텐」을 수도 이름으로 정했다. 이 이름은 중국어로는 「천권성경(天眷盛京)」으로 번역되어 이 때부터 이 도시는 일반적으로 「성경(盛京)」으로 불리게 되었다. 1636년에 여진족을 만주족으로, 후금을 대청(大清)으로 개칭했다. 이로 인해 이 도시는 만주족이 지배하는 영역의 중심지라는 지위를 얻게 되었다. 대청의 수도를 1644년에 북경으로 옮긴 후에도 동북지역은 만주족의 출신지로 특별히 여겨져, 이 도시는 성경봉천부(盛京奉天府) 혹은 봉천으로 불리어 배도(陪都:수도 이외에 별도로 설치한 도시)가 되었다. 또한 20세기에는 봉천은 장쥘린[張作霖]의 거점이 되었다. 장쥘린은 1919년의 위안스카이[袁世凱] 사후에 지역 유력자들의 지지를 모아 봉천성(奉天省)의 정치·군사를 장악했다. 1924년의 제2차 봉직전쟁(奉直戰爭)의 승리로 인해 장쥘린은 중앙정계에 영향력을 행사하게 되었다. 이러한 도시의 역사는 봉천에 사는 한족들의 자기인식에도 큰 영향을 미쳤다.

봉천의 시가지는 방형의 내성과 원형의 외성으로 이루어져 있다. 대청의 수도가 됨에 따라 봉천의 내성은 팔기(八旗: 청나라가 17세기 초부터 설치한 씨족제에 입각한 군사·행정제도)의 거주지로 정해졌다. 처음에는 팔기와 민간인의 거주지를 명확하게 구별했지만 시간이 지나면서 모호해졌다. 내성의 궁전 뒤에 있는 거리는 사평가(四平街), 흔히 중가(中街)로 불리었는데 양 끝에는 종루(鐘樓)와 고루(鼓樓)가 있었다. 이 거리는 상업지로 발전하여 오랜 전통을 지닌 점포가 많아 오늘에 이르기까지 중심 변화가를 이루고 있다.

청 말기가 되면 이 곳 지역사회는 원래 봉천의 주인이었던 만주족보다는 한족 상공업자가 중심이 된다. 한족 상공업자는 공의회와 이를 조직 개편한 상회(봉천총상회)로 결집하여 권력자에게 지역사회의 요구를 주장하는 존재가 되어 간다.

청 말기의 지방지에 따르면 당시의 상업자본은 산시[山西] 상인이 가장 자본규모가 크고, 복건(福建) 상인이 그 뒤를 잇고, 산둥[山東] 상인은 경영규모가 작은 영세자본으로 간주되었다¹⁾ 산시 상인 중에 자본규모가 큰 상인은 표장(票莊)을 경영하여, 정부재정을 맡는 정상(政商)이 중심적인 존재였다. 복건 상인은 해군을 이용한 지역간 교역에 종사하여 잉커우[營口] 등의 항구나 만주의 대소비자인 봉천에 거점을 두고 있었다. 산둥 상인이라고 하면 점포나 행상을 포함한 소매상이 연상되었다. 산둥 상인의 장사는 농민에게는 잡화를 공급하고 도시민에게는 사치품을 판매하는 것이었다. 이처럼 한족의 상인은 외지에서 온 객상(客商)이었다.

봉천의 상인²⁾들은 사방(四幫), 오행(五行), 십육도가(十六道街)라는 기준으로 분

1) 봉천성 성(城)과 장춘(長春)의 중간 지점에 위치하는 평야 지대인 창도(昌圖)의 지방지에는 ‘하등지소본영업불가매거다산동인(下等之小本營業不可枚舉多山東人)’라는 산둥인권이 기재되어 있다. [『창도현지』 1916: 3권 37정]

류할 수 있다.

사방(四幫)이란 직례(直隸)·산둥·산시·재지(在地)²의 동향집단, 오행이란 전행(錢行)·양잔(糧棧)·사방(絲房)·피화(皮貨)·산화(山貨)의 동업집단 [『동삼성정략(東三省政略)』 1989: 하 p. 1584] , 십육도가란 종루동대가(鐘樓東大街)·종루남대가(鐘樓南大街)·종루북대가(鐘樓北大街)·대북관대가(大北關大街)·고루남대가(鼓樓南大街)·고루서대가(鼓樓西大街)·고루북대가(鼓樓北大街)·중가대가(中街大街)·대서문리대가(大西門里大街)·대동관대가(大東關大街)·소동관대가(小東關大街)·대남관대가(大南關大街)·소북관대가(小北關大街)·소남관대가(小南關大街)·대서관대가(大西關大街)·소서관대가(小西關大街)라는 개업지 별로 모인 집단이다. 십육도가의 각 거리는 수룡(水龍: 소화용 펌프)을 소유하여 소방 목적으로 조직화되었는데, 이 조직은 공의회(公議會)로 불리었다. 16개소의 공의회는 장안사(長安寺)에서 합의를 했다. 협의의 의미의 공의회는 이 합의조직을 가리키며, 16개소의 시가지마다 있는 공의회는 분회였다. [유은도(劉恩濤) 1982: p. 164~165]

봉천에 있어서 출신지와 업종을 대응시켜 보면 산시방(山西幫)은 앞서 본 것처럼 별장·전행이 많다. 그 외 소과(燒鍋: 소주양조장), 선점(船店: 하천운송업) 등 일정한 자본을 필요로 하는 업종에서 산시방을 많이 볼 수 있다. 산둥방(山東幫)은 사방(잡화제조 도소매), 요리점, 산화포(山貨鋪)³의 경우는 거의 독점상태였다. 직례방(直隸幫)은 독점경향이 강한 업종은 없지만 사방 이외의 잡화포, 전포(錢鋪), 양행을 경영하였다. [외무성 1907: p. 248~280] [봉천총상회1929] 재지(在地)의 상인이 특정 업종을 독점하는 일은 없었지만 양행, 여점(旅店), 선점은 재지(在地) 상인이 경영하는 경우가 많았다. [외무성 1907: p. 248]

3. 상회의 변천과 봉천지역사회 ① 혼란기(1905~1911년)

그렇다면 이들 중에 지역사회에서 주도적인 지위에 있었던 그룹은 어디일까? 이 점에 대

해서는 상회의 변천과 그에 따른 지도층을 보면 알 수 있다.

봉천총상회(奉天總商會)의 변천은 혼란기(1905~1911년), 안정기(1911~1924년), 변동기(1924~1931년)로 크게 세 시기로 나눌 수 있다. 1905~1911년의 혼란기에는 상회 설립의 모체가 된 공의회에서 상회로 조직 개편이 이루어졌다. 이 시기는 청 말

2) 『동삼성정략』에는 지린[吉林]으로 되어 있지만, 실제 상공업자 출신지를 보면 오히려 봉천 주변의 재지자본(在地資本)으로 생각하는 편이 타당하다.

3) 주로 동산(東山: 영릉(永陵)·통화(通化)·회인(懷仁) 등 동부의 산지)에서 나오는 산악지대의 생산물을 취급했다. 느타리버섯, 꿀, 인삼 등이 취급상품이다. [외무성 1907: p. 255] 단, 『민국13년 봉천성성 상공명부』, 『만주화상명부』(1932년)에 나오는 산화포는 민국기에 창업한 것으로 직례방이 경영하는 경우가 대부분이다.

기의 모든 개혁에 대해 상인 층의 반발과 수용이 반복되는 가운데 불안정했던 시기이다. 상인 층이 정권 층의 의향을 수용할 시에 충돌하여, 상회장(商會長)이 단기간에 교체되어 지도층에 혼란이 있었다. 1911~1924년의 안정기에 이르러 지도층은 안정되었다. 1911~1917년에 손백곡(孫百斛), 1918~1924년에는 노종후(魯宗煦)가 장기간에 걸쳐 상회장 직을 역임했다. 안정기는 봉천 지방정권의 담당자와 상회로 대표되는 재지사회(在地社會) 사이에, 상호간에 서로 지지하는 관계가 형성되고 나서야 비로소 정권이 유지된 시기이다⁴⁾. 1924~1931년의 변동기에는 상회에 대한 장쥘린 정권의 간섭이 강화됨과 아울러 난징국민정부[南京國民政府]에 의한 상회 조직 개편의 영향을 받았다. 강력해진 장쥘린 정권으로 인해 지금까지 지탱하는 층이었던 상회가 반대로 정권의 지배를 받게 되었다. 상회장은 누가 되든 단기간에 교체되었고 제도의 조직개편도 빈번히 이루어졌다.

그렇다면 혼란기의 지역사회의 정황에 대해 검토하고자 한다.

당시 정부는 사방·오행·십육도가 공의회로 이루어진 경제계의 정황이 개선할 여지가 있다고 간주했다. 예를 들면 초대 동삼성(東三省) 총독이었던 쉬스창[徐世昌]은 상회 성립 이전의 상공업자의 문제점으로 다음의 세 가지를 들었다. ① 「환산지폐(渙散之弊)」, 동업단체 동향단체별로 모여 있어 전체적으로 통합되지 않는다. ② 「폐색지폐(閉塞之弊)」, 상업진흥을 위해 개혁을 하려는 의지가 빈약하다. ③ 「조요지폐(阻撓之弊)」, 부당하게 이익을 빼돌리거나 민중을 현혹하여 관에 반항적인 태도를 취하는 자가 있다. [『동삼성정략』 1989: 하 p. 1584]

여기서 보면 상공업자에게서는 동향·동업 집단 별로 결속력이 강해서 관과 적극적인 관계를 가지려 하지 않는 모습이 보인다. 이에 대해 관에서는 상공업자들이 단결해서 관을 위한 경제진흥을 지원해야 한다는 사고방식이 배후에 보인다.

이러한 정황에 대해 동북에서는 성경(盛京) 장군인 조이손(趙爾巽)이 여러 개혁을 단행했다. 그 중 하나가 공의회를 상회로 조직 개혁하는 것이다. 조이손은 광서(光緒) 32년 3월(1906년) 상무총국 설립을 상주(上奏)했다. 봉천상무총국(奉天商務總局)의 역할은 봉천의 모든 성의 상업과 정사를 관리하는 것이었다. 상무총국이 설치된지 2개월 후에는 봉천의 상회로서 상무총회의 조직정비가 이루어졌다. 동시에 지방의 각 현에 인원을 파견하여 상회 개설을 추진하여 6개월 후에는 기존에 있었던 공의회와 같은 상인단체를 상회에 개편시키고, 일부의 현에서는 상인들이 상회를 새로 조직하게 했다. 그 결과 봉천성 전체에서 약 50개소의 상회가 설립되었다. 그 내역을 보면 봉천·안동(安東)·잉커우[營口]의 삼총상회(三總商會)와 38개소의 분회(分會), 16개소의 분소(分所)로 구성되었다⁵⁾.

4) 해당 시기의 장쥘린 정권과 재지사회의 연구에 대해서는 [마쓰시게 1990] [마쓰시게 1991] [마쓰시게 1994] [시부타니 1997] 등을 참조할 것.

5) 『동삼성정략』 「기상회(紀商會)」, 본문 이외의 부표에는 42개소의 분회, 11개소의 분소가 기재되어 있어 부표와 본문의 내용에 차이가 있다. [『동삼성정략』 1989: 하 p. 1585~1586]

그러나 실제 상회로 개편하는 데에는 공의회 측의 저항이 있었던 것으로 보인다. 봉천의 경우에는 1906년 2월11일(음력 1월18일) 장안사에 상무총회가 설립되었다. 상무총회의 우두머리인 회두(會頭)에는 손백곡(孫百斛)이 선출되었다. 표면적으로는 상공업자들의 추천에 의한 것으로 되어 있다. 『상무관보(商務官報)』(광서 32년 제 4기 17정)에는 손백곡⁶⁾이 총리(상회장에 상당), 양유강(梁維康)⁷⁾이 협리(協理(부회장에 상당))에 선출되어 상무총회가 기능하기 시작했다고 기재되어 있다. 한편 손백곡에 의한 상회 설립을 전하는 『남만주에 있어서의 상업』에서는 상회와 함께 공의회도 존재했다고 전하고 있다. 이를 기록한 일본인 조사원은 공의회에서 회원들로부터 들은 이야기에 따르면, 공의회 측은 상회 설립을 바라지 않았다고 전하고 있다. [외무성 1907: p. 314] 아마도 공의회를 상회 체재로 개편할 수 없기 때문에 상무총국이 관리출신인 손백곡을 우두머리로 하는 형태로 공의회와는 별도로 상회를 설립한 것으로 여겨진다.

이는 사료(史料)에 따라 상회장 이름에 차이가 있는 점을 보아도 추측할 수 있다⁸⁾. 동시대 사료인 『상무관보』와 『남만주에 있어서의 상업』은 손백곡을 상회장으로 기록하고 있다. 그러나 그 후에 편찬된 「연혁」 [만주중앙은행 조사과 1936: p. 1]에서는 공의회 개편을 1902년, 손백곡이 상회장으로 취임한 해를 1908년으로 기록하고 있다. 1902년의 상회장은 전자초(田子超)⁹⁾, 부회장은 감익당(甘益堂)¹⁰⁾, 1905년에는 상회장은 조국정(趙國廷)¹¹⁾, 부회장으로는 양화림(楊化霖)¹²⁾의 이름을 들고 있다¹³⁾.

이처럼 사료의 내용이 서로 다른 점으로 미루어 보아 공의회 개편 과정은 아래와 같을 것으로 생각된다. 광서 32년(1906)의 개편 시점에는 공의회와 상무총국의 관리하에 있었던 상회가 일시적으로 동시에 존재했다. 상무총국은 손백곡을 중심으로 상업회의소(商業會議所)를 모델로 한 총상회(總商會)를 조직하려 했다. 총상회의 설치장소를 공의회와 같은 장안사로 하려 했던 점에서, 이상적으로는 공의회를 흡수 개편

6) 손백곡, 자정신(字鼎臣)은 본적은 텐진으로 아버지 대에 선양으로 이주함. 1890년에 진사로 한림원 편수. 1900년 의화단 사건으로 고향인 선양으로 돌아가, 동삼성관은호 총판, 자의국 성의회 의장 등을 역임. [『봉천통지(奉天通志)』 1982: p. 4624]

7) 양유강(梁維康), 강(康)자 대신에 선(宣)자로 기재되기도 함. 유민은호(裕民銀号) 경리 [유은도(劉恩濤) 1982: p. 169]

8) 이하의 상회 간부의 차이에 대해서는 다음의 사료를 비교했다. 『상무관보』 제4기 17정 「상부주봉천설립상무총회집(商部奏奉天設立商務總會摺)」 [광서32년 4월22일 구주봉(具奏奉)], 만주중앙은행조사과 『중국농공상회조사 봉천성지부』(1936년) p. 1 「연혁」. 외무성 『남만주에 있어서의 상업』(1906년) p. 309, p. 313, p. 314.

9) 전자초, 천합동사방(天合東絲房) 경리 [유은도 1982: p. 168]

10) 감익당(甘益堂), 당(堂)자가 당(棠)자로 기재되기도 함. 또 감지겸(甘志謙)이라고도 함. 선양에서 가장 오래된 약200년의 역사를 가진 약포보화당(藥舖寶和堂) 경리. 상회에서는 전자초와 같은 시기에 부회장 직을 역임하여 전자초의 조수적인 존재임. [유은도 1982: p. 168] [외무성 1907: p. 309]

11) 조국정, 조청새(趙淸壘)라고도 기재됨. 남연행(南煙行)의 난무후(蘭茂厚)를 경영함. 또 1907년 창업한 중일합작회사인 마차철도공사(馬車鐵道公司)의 경리. [유은도 1982: p. 168] [외무성 1907: p. 307]

12) 양화림, 은호 경리 [유은도 1982: p. 168]

13) 『남만주에 있어서의 상업』에서는 광서32년 시점(1906년) 공의회 임원으로 감익당, 유현기(劉賢基, 전자초와 같은 상점 천합동(天合東) 사람), 장옥서(張玉書), 옥취간(玉聚干), 조국정의 5명이 나와 있다.

할 의도였다. 그러나 공의회의 반발을 샀기 때문에 개편은 쉽사리 진전되지 않았다. 또 최종적으로는 손백곡이 조이손과 대립한 경위도 있어 [시부타니(澁谷) 1997: p. 65], 손백곡은 상회장 직을 물러났다. 공의회의 지도부도 한발 양보하여 조국정에게 상회장을 맡김으로써 상회와 공의회가 타협을 이뤄 하나의 조직으로 봉천총상회(奉天總商會)가 성립되었다.

그러나 상회설립에 따른 대립은 전 공의회 간사를 상회장으로 임명하는 것으로는 수습되지 않았다. 1908년 여름부터 가을에 걸쳐, 봉천에서는 도시민 사이에 항방연 운동(抗房捐運動)이 일어났다. 성정부는 신정(新政) 실시를 위한 경비 때문에 상공업자에게 증세하기로 결정하자 이에 대한 반발이 영업 보이콧과 북경에 대한 직소(直訴)로 치달았다. 이 과정에서, 상회 설립 시에 정부로부터 타협을 끌어내어 상회장이 된 조국정은 정부에 반대하는 상인들을 설득하는 입장에 놓이게 되어 상인 층으로부터 유리될 수 밖에 없는 상황이었다. 반대로 상회 설립 시에 정부가 상회장으로 파견하고자 했던 손백곡은 항방연과 정부를 중재하게 되어 상공업자들이 받아들일 수 있게 되었다. [『성경시보』 8월 9일]

이 사건으로 인해 손백곡은 조국정 사임 후에 상회장에 취임했다. 원래 상회장은 음력 1월에 열리는 연회에서 선거로 결정되지만 그 이전에 농공상부의 지시로 취임했다. 다음 해에 상회장직은 상공업자 대표인 전자초로 바뀌고, 손백곡은 지방의회의 전신인 자의국(諮議局)에 상회대표로 참가했다. 그 후 신해혁명(辛亥革命) 때까지 상회장 직은 관과 상인 간의 대립으로 인해 분규가 발생하는 일이 많았다고 문사자료에 지적되어 있다¹⁴⁾.

이 시기의 봉천지역사회에서는 특히 힘을 가진 집단의 갑작스런 등장은 보이지 않는다. 오히려 산시계의 금융자본과 산동계의 잡화자본, 그리고 재지(在地)에 기반을 둔 손백곡과 같은 존재가 거의 대등한 역학관계를 가지고 있었다고 할 수 있다. 또 객상들은 출신지에도 기반을 두려고 했기 때문에, 각자의 상거래를 조정하기 위해 합의를 하는 경우는 있어도 봉천 경제계 차원에서 결속하는 경우는 적었다. 그렇기 때문에 쉬스창이 『동삼성정략』에서 개탄할 정도였다. 그러나 민국기(民國期)가 되면 지역사회 안에 동북인 의식이라 할 만한 모습이 보이게 된다.

4. 상회의 변천과 봉천지역사회 ② 안정기(1911~1924년)

신해혁명 이후에 상회 인사는 안정되었다. 상회장은 14년간 한번 밖에 교체되지 않았다. 1911년부터 손백곡이 역임했으며, 손백곡의 사후 1918년부터는 노종후(魯宗

14) 조국정은 남연행에 있는 난무후라는 상점을 경영하면서 러일전쟁 시에 전쟁 벼락부자로 성공을 거둬, 일본과의 합작으로 봉천에 있는 마차철도경영에 참여한 후발 상인이었다. 또 기존의 주류파인 오행(양잔·전행·사방·피화·산화)이 아니라서 재력은 있지만 소수파였던 것으로 여겨진다. [유은도 1982: p. 169]

煦)가 역임했다. 전반에 상회장을 역임한 손백곡은 항방연운동과 자의국의 활동을 통해 지역사회의 신뢰를 얻었다. 노종후는 1909년부터 총무상회의 간사직을 역임했다¹⁵⁾. 노종후는 산둥성 봉래(蓬萊)현 출신으로 본인은 잡화상 경영자는 아니었으나, 지지기반은 산둥 출신의 잡화상인 사방이었다. 혼란기에는 금호(金號)와 같은 민간금융기관의 경영자가 상회장과 부회장에 선출되었다. 그러나 그 후에는 감소하여 봉천총상회에서 민간금융업자의 지위는 약해졌다.

이 시기의 봉천총상회의 안정은 지역사회의 발전을 반영한 것이라 할 수 있다. 안정기에는 경제계의 인기업종으로 잡화업이 성장했다. 1923년 봉천총상회 명부에서 볼 수 있는 간부는 잡화 30명(내역 사방 16명, 그 외 잡화 등 판매가 14명), 금융관계 9명(내역 전당포 5명, 금점(金店) 2명, 관은호(官銀號) 1명, 전포(錢鋪) 1명), 그 외 약포(藥鋪) 6명이다. 총 71명의 간부 중에 잡화판매업이 많은 점은 유의할 만하다. 이 잡화업이 취급하는 상품은 면사 및 포목, 해산물, 약품, 그 외 잡화는 주로 상하이·텐진·오사카에서 구입하는 상품이다. 잡화업은 제1차 세계대전 이후 동아시아에서 경공업이 발전함에 따라 그 시장인 중국동북지역에 상품을 수입 및 이입하면서 번창했다.

이 시기에 발전한 잡화상인 산둥방은 강한 결속력을 지니고 있었다. 잡화상 중에서 ‘사방’이라는 이름을 달 수 있었던 것은 산둥방 뿐이었다. 1933년의 조사에서도 산둥 출신자들이 모이는 산둥 회관은 포상(布商) 즉 사방만이 그 구성원으로, 조사 시점에는 약 70개의 상점이 있었다. [에다무라(技村) 1933: p. 7~8] 사방 점포의 전체적인 증가도 다른 잡화상에 비해 견실했다. 봉천에서는 제2차 봉직전쟁 이후의 호경기에 잡화상 개업이 급증했다. 이 때 증가한 잡화상의 대부분은 다른 지역 출신자가 경영하는 잡화상으로 사방과 동일한 상품을 취급하였다. 그 후 1927년의 봉천 표폭락(奉天票暴落)으로 불황이 되자, 그 시기에 증가한 대부분의 잡화상이 도산했다. 그러나 사방의 도산은 적었다는 결과를 볼 수 있다. [본고 2001]

이처럼 사방을 중심으로 한 산둥방의 존재는 다른 상공업자의 반감을 사게 되었다¹⁶⁾. 1923년의 상회선거가 끝난 후에 성정부 앞으로 익명의 ‘노종후 고발장’이 보내졌다. 고발장에 따르면 1923년의 5월 선거에서 노종후 당선을 위해 대리투표와 협박이 있었는데, 이러한 부정이 가능했던 것은 노종후 이외의 2명의 부회장도 산둥방으로 상회 내부가 산둥인들에게 좌지우지되었기 때문이라고 하였다. 또 1922년의 봉

15) 노종후, 체금(楛琴)이라고도 함. 정원 외 생원(生員)의 자격을 지님. 1912년부터 일본의 오쿠라구미(大倉組)와 합작하여 경영되던 선양마차철도공사의 경리 직에 오름. [다나베 1924: p. 107] 또 1914년에 설립된 화무저모공사(華茂猪毛公司)의 경리이기도 함. [『봉천성공서당안』 3136] 1915년에는 왕영강(王永江)이 조직한 동성흥리공사(東省興利公司)의 고등(股東)으로 4만 위안을 출자함. [『봉천성공서당안』 3143] 1919년 창업한 영풍경(永豐慶)이라는 미량행(米糧行)의 경영자이기도 함. [봉천총상회 1925: p. 179]

16) 16 일본 측 조사에는 산둥방에 대해 다음과 같은 보고도 있다. ‘몇 년 전의 봉직전쟁 이후부터 봉천에서는 암암리에 산둥 출신자를 압박하는 것처럼 보인다. 그 후 시정공소가 창립되자 이러한 경향이 더욱 뚜렷이 나타나고 있다. 실제로 봉천총상회 회장인 노종후 씨(산둥인으로 오패부와 동향임)처럼 이 일을 빙자하여 그를 검속하여 가까운시일 내에 다시 선거를 치를 것이라고 한다.’

직전쟁 당시에 노종후는 장쥘린의 적인 오패부(吳佩孚)와 동향이라서 의혹을 살 것이라고 우려해 정신병을 앓았는데, 이러한 인물에게 상회를 맡길 수 없다고도 지적하였다. [『봉천성공서당안(奉天省公署檔案)』 36이 고발을 전부 믿을 수는 없지만 노종후는 앞서 지적한 것처럼 산둥방의 일원이었다.

이러한 배경에는 봉천에 있어서의 재지의식(在地意識)의 형성이 있다. 1920년대에는 일본과 상하이로부터 잡화 수입을 통해 잡화상의 세력 확대가 있었던 점과 아울러 근대적인 경공업의 맹아가 보였다. 이러한 경공업에 투자를 했던 사람은 적관(籍貫)을 봉천에 둔 재지화(在地化)한 사람들이었다.

공업제품을 생산하는 기업은 「실업진흥」을 슬로건으로 청 말 민국 초기부터 활발하게 설립되었지만, 대부분은 「만주국」 시기에 실시된 조사에 나타나지 않아 도산한 것으로 추측된다. 이 「실업진흥」이 결실을 맺기 시작한 것은 1920년대에 이르러서이다. 1931년 시점의 자료에는 이 시점에 봉천에 존재했던 주요 공장제 생산업의 대부분은 동삼성관은호(東三省官銀號), 변업은행(邊業銀行), 봉천저축회(奉天儲蓄會)와 같이 동북지방정권의 관료와 관계가 깊은 금융기관으로부터 자금유자를 받았고, 동시에 정부관계자 자신이 자본 출자자가 되었다. 이 때문에 면세 등의 우대조치를 받는 일이 많았다. 업종은 성냥과 방적업 등 그 당시까지 수입에 의존했던 경공업이 많아 수입대체를 목표로 했다. 이들 경영자들의 대부분은 1920년대 후반에 활발해진 국산품 판매촉진운동인 「국화운동(國貨運動)」과 일본제품 보이콧 운동의 중심적인 존재가 되어 갔다. [본고 2003]

5. 상회의 변천과 봉천지역사회 ③ 변동기(1924~1931년)

상회의 변동기는 이들 경공업 자본이 산둥방이 가졌던 실권을 탈취함으로써 시작되었다. 경공업 자본은 수입대체화를 목표로 했기 때문에 수입을 통해 이익을 축적해 온 안정기의 상회 지도층인 잡화업과는 이해관계가 대립되었다. 또한 경공업 자본 육성은 정권의 식산흥업정책의 일환인 점에서, 경제계 지도자 층의 교체는 장쥘린·장쉐량[張學良] 정권의 후원 하에 이루어졌다.

안정기 최후의 상회장 노종후는 임기 도중에 비리를 고발당해 상회장 직을 물러났다. 1924년 4월7일 및 13일자 『성경시보』의 보도에 따르면, 상회에서는 참사(參事)들의 요구에 따라 1923년 1월부터 1924년 1월까지의 수입 약3만 위안, 지출 약4만 위안에 대한 회계보고를 공개했다. 이 회계보고에는 약1만 위안의 적자가 발생했는데, 원인을 규명하기 위해 4월11일자 회의에서 감사를 실시하기로 결정했다. 당초 노종후 회장이 선출한 멤버로 감사위원을 조직하려 했으나, 이는 세칙의 규정에 없다는 이의가 나와 참사들의 추천으로 선발된 멤버가 감사를 실시했다. 그 결과 부정한 경비가 드러나 노종후 회장이 그 책임을 물었다. 4월17일에 성정부에 부정 리스트가

제출되었다. [『봉천성공서당안』 3617] 이 사건으로 노종후 이하 간부 4명이 경찰청에 구속되어 상회 동사(董事)와 상회장 선거가 치러졌다. 성정부는 회장이 소자본경영자와 작당하여 제멋대로 회무를 처리한 것이 문제라 하여 회장의 피선거권을 영업자본액 5만 위안으로, 동사의 피선거권을 4만 위안으로 인상하고, 선거권은 1만 위안 이상으로 인상할 것을 지시했다. [『봉천성공서당안』 3617] 이 규정에 의거하여 선거권 및 피선거권의 자격자 리스트가 만들어져 5월19일에 동사 선거, 21일에 동사 관계자들의 선거로 의사(議事)가 선출되고, 26일에는 정회장·부회장 선거가 실시되었다. 그 결과 58명의 동사가 선출되고, 회장에는 장지량(張志良)이, 부회장에는 오옥린(吳玉麟)과 조보안(趙保安)이 선출되었다.

노종후 실각 후에 상회장이 된 장지량은 선양현 아문(衙門)을 역임하고, 1912년에는 봉천 독군서(督軍署)의 감인관(監印官)에 취임하였으며, 그 후 장쥘린 정권 하에서는 순열사(巡閱使)·독군(督軍)·성장(省長)의 감인관을 1924년까지 역임하여 장쥘린의 비서 역할을 했다. 이와 동시에 그는 신흥 경공업 자본의 경영자이기도 하여, 1921년에 팔왕사비주기수공사(八王寺啤酒汽水公司), 1922년에 혜림화시공사(惠臨火柴公司)를 창업하였다. 그 재원은 1917년에 명예회장으로 영입한 장쥘량이 발기한 봉천저축회였다. 저축회란 회원으로부터 모은 주식을 자본으로 하여 회원들에게만 자금을 융자하는 신탁예금기관이었다. 1923년 당시 한 달에 1 위안씩 혹은 일년에 1 위안씩 납입하면 회원 자격을 얻을 수 있어 폭넓은 사회계층으로부터 자금을 모을 수 있었다. 또한 봉천저축회는 다른 저축회와는 달리 신흥 경공업 중에 유망한 기업의 주식을 적극적으로 인수했다. 이 업무 틀 안에서 팔왕사비주기수공사와 혜림화시공사에 대한 장지량의 자본제공이 이루어졌다. 그리고 이러한 기업 이외에도 조신요업공사(肇新窯業公司)와 동흥색염직공사(東興色染織公司), 봉천방사창(奉天紡紗廠)에도 자본을 제공했다. 또한 모은행인 동삼성관은호의 후원을 받고 있었다. [『만철조사시보(滿鐵調查時報)』 1923년 3권 10호 p. 1~24]

노종후에서 장지량으로 상회장이 교체된 일은 상회 내부의 정쟁일 뿐만 아니라 지역사회의 리더가 새롭게 바뀐 사실을 의미한다. 동시에 지역사회의 의식의 변화를 나타낸 것이기도 하다. 그 당시까지 사방이라는 유통업에서 경제력을 쌓아온 산둥방은 어디까지나 본인을 산둥인으로 인식하여, 산둥인의 대부분이 고향인 산둥에 가정을 두었다. 이에 비해 신흥 경공업 자본가들은 장쥘린 정권과 관계를 가지며 봉천을 중심으로 한 지역인식을 장쥘린 정권과 공유하고 있었다. 이 단계에서 봉천지역사회에서의 지역주의를 의미하는 재지의식(在地意識)에 일정한 성장이 있었다고 할 수 있다.

변동기 후반에는 지역주의와 더불어 상회의 지도층이 내셔널리즘을 강력하게 주장하게 된다. 1927년에는 임강일본영사관 분관설치사건(臨江日本領事館分館設置事件)이 발생했다. 당시의 상회 간부인 정광문(丁光文)·두중원(杜重遠)을 중심으로 외교후원회가 조직되어 반일운동이 고양되었다. 이러한 반일운동은 그 당시까지 상회가 대

일 강경자세를 취하지 않았던 점에 비하면 큰 방침 전환이었다.

6. 마지막으로

중국 본부에서 봤을 때 변방이며 청조의 봉금정책(封禁政策)의 대상이었던 만주에서 가장 큰 도시인 봉천에서는, 청 말기까지는 봉천에 사는 한족 상인은 어디까지나 객상이었다. 한족 지역사회도 각지에서 온 객상들의 회의에 의해 지탱되고 있었다. 민국기가 되자 국제경제에 편입되어 무역에 종사하는 산둥방의 잡화 수입상이 경제계에서 힘을 가지게 되었다. 이들이 성공을 거둔 요인에는 동향인의 결속이 있었는데, 이 때문에 산둥과의 관계는 견고하였으나 봉천지역사회에 대한 정체성은 약했다. 이로 인해 지역사회 전체 안에서 재지의식(在地意識)이 강해지자 지역사회 대표의 지위에서 밀려나게 되었다. 그 대신 지역사회의 리더십을 가지게 된 것은 이미 적관을 봉천으로 한 신흥 자본가들이었다. 신흥 자본가들은 장쭤린 정권과의 거리 또한 가까워 장쭤린 정권과 지역인식을 공유하고 있었다고 할 수 있다. 그 곳에는 만주라는 외지에 임시로 거주하는 존재라는 기존의 객상들의 인식과는 달리, 동삼성의 중심인 봉천지역사회를 지탱하여 발전시켜 나간다는 지역주의가 있었다. 이 지역주의는 도시 이름에 대해서도, 하나의 지방도시 이름으로서가 아니라 수도의 이름이 되기도 할만한 봉천이라는 이름에 대해서도 애착을 보였다. 1929년에 난징국민정부(南京國民政府)가 도시명을 선양으로 바꿀 것을 지시하여 상해도 봉천총상회에서 선양시 상회로 개칭할 수 밖에 없었다. 그러나 하나의 지방도시의 상회를 나타낼 뿐인 이 명칭에 대해 상회 내부에는 강력한 저항이 있었다. [『봉천성공서당안』 12033]

19세기 말부터 20세기에 걸쳐 이 지역은 대량의 한족 이민을 받아들였다. 그러한 가운데 지역경제가 급속히 발전하여, 지역경제 발전으로 이익을 얻은 존재가 지역사회의 대표자가 되어 갔다. 또한 이러한 경제력에 힘입어 성장한 것이 장쭤린 정권이다. 그 결과 주민이 귀속의식을 가질 만한 봉천지역사회가 형성된 것이다.

문헌 리스트

- 우에다 다카코(上田貴子) 2001년 「1920년대 후반기 화인자본의 도산에서 본 봉천 도시경제」 (『현대중국』 제75호)
- 우에다 다카코(上田貴子) 2003년 『근대 중국동북지역에 있어서의 화인상공업자 자본에 대한 연구』 오사카외국어대학 언어사회학회
- 에다무라 사카에(技村栄) 1933년 10월 「봉천에 있어서의 회관에 대하여」 (『만철

- 조사월보(滿鐵調査月報)』 제13권 제10호)
- 외무성 1907년 『남만주에 있어서의 상업』 긴코도[金港堂]
- 교로쿠 간이치로(鉅鹿貫一郎) 1924년 5월 『중국에 있어서의 상회법과 상사공단처
장정(商事公斷處章程)』 요동사정연구회(遼東事情研究会)
- 시부타니 유리(澁谷由里) 1997년 『장쥘린 정권에 대한 연구: 「봉천문치과」에서
본 역사적 의의를 중심으로』 박사학위 논문, 교토대학
- 다나베 다네지로 편(田辺種治郎編) 1924년 『동삼성관신록(東三省官紳錄)』 동삼
성관신록 간행국
- 나카미 다츠오(中見立夫)、1999년、 「지역개념의 정치성」、 미조구치 유조(溝口雄
三)·하마시타 다케시(浜下武志)·히라이시 나오아키(平石直昭)·미야지마 히로시
(宮嶋博史) 편 『아시아에서 생각하다 [-] 교착하는 아시아』 도쿄대학 출판
회
- 나카미 다츠오、1995년、 「“동북아시아”에서 본 “동아시아”」、 하마시타 다케시 편
『동아시아세계의 지역 네트워크』 야마카와 출판사[山川出版社]
- 나카미 다츠오、2004년、 「“동북아시아”는 어떻게 자리매김되어 왔는가」、 『동북아
시아연구』 7호
- 마쓰시게 미쓰히로(松重充浩) 1990년 3월 「「보경안민(保境安民)」 기의 장쥘린 지
역정권의 지역통합책」 (『사학연구』 186호)
- 마쓰시게 미쓰히로 1991년 6월 「장쥘린에 의한 봉천성 권력장악과 지지기반」
(『사학연구』 192호)
- 마쓰시게 미쓰히로 1994년 「봉천에 있어서의 시정도입과 정책의도에 대하여」 (이
마나가 세지(今永清二) 편저 『아시아의 지역과 사회』 계소쇼보[勁草書房])
- 만주중앙은행조사과 1936년 『중국농공상회조사(本邦農工商會調査) 봉천성지부(奉
天省之部)』
- 봉천총상회경제부조사과편(奉天總商會經濟部調査股編) 1925년 12월 『민국13년 봉
천성성상공명록(民國十三年奉天省城商工名錄)』 [봉천총상회로 생략함]
- 유은도(劉恩濤) 1982년 「심양상회 75년(1874-1948)」 (『심양문사자료(瀋陽
文史資料)』 제1집)
- 『동삼성정략(東三省政略)』 (지린문사출판사판(吉林文史出版社版))
- 『봉천통지(奉天通志)』 (동북문사총서편집위원회판(東北文史叢書編集委員會版))
- 『창도현지(昌圖縣志)』 1916년
- 남만주철도서무부조사과(南滿洲鐵道庶務部調査課) 『만철조사시보』 3권10호 (1923
년 10월)
- 【랴오닝성당안관소장당안(遼寧省檔案館所藏檔案)】 봉천성공서당안(奉天省公署檔
案)
- 안권번호(案卷番号) 3136 「주작부설립화무저모공사청입안(周作孚設立華茂猪毛公司

請立案)」

안권번호 3143 「왕영강등위흥판실업조직동삼성흥리공사(王永江等為興辦實業組織東三省興利公司)」

안권번호 3617 「봉천성성총상회장정(奉天省城總商會章程)」

안권번호 12033 「성성상회개조부송장책(省城商會改組附送章冊)」

“满洲的中国化”

— 从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前半期奉天地区认同的形成 —

上田贵子（近畿大學）

一、前言

中国东北地区旧称“满洲”(以下省略引号)。所谓满洲一词原来是指满洲族。江户时代的日本习惯以集团名指称其势力范围，因此满洲族实际支配的地区被称为满洲。标记着满洲一词的日本地图，在江户时代经西博尔德之手传到欧洲。惟其如此，欧洲认为满洲是指地名，而称其为Manchuria(中见，1993；1999；2004)。

这一曾被称为满洲的地区，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由于汉族从山海关以南移民而来，汉族的习惯和文化自然随之而来，从而逐渐具备作为中国东北地区之实质。本文拟以在此过程中住在满洲的居民的意识为对象，对其所具有的认同加以考察。特别希望探究的是，该地区中心城市之一奉天(沈阳)的地方实力人物将认同置于何处。

二、奉天的地方社会

奉天在明代称为沈阳中卫，设有军的卫报，是塞外军事据点之一。努尔哈齐整饬女真族后于1621年攻占该地，经整備后作为后金的都城。1625年，迁都并改称沈阳；1634年，努尔哈齐之子皇太极以满语意为兴隆的“Mukden”为都城之名。这个名称汉语译为“天眷盛京”，从此这个都城一般称为“盛京”。1636年，女真族改称满洲族，后金改称大清。于是该地被赋予作为满洲族所支配的地区之中心的地位。大清首都于1644年迁至北京后，东北地区作为满洲族的发祥地依然受到特别重视，该地称为盛京奉天府，亦称奉天，被视为陪都。进入20世纪后，奉天成为张作霖的据点。他在1916年袁世凯死后，获得在地实力人物的支持，掌握了奉天省的政治和军事。由于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的胜利，张作霖对中国政界也发挥了影响力。惟其如此，该地区的历史对于住在奉天的汉族的自我认识也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奉天的街道是由方形的内城和圆形的外城构成的。由于被视为大清的都城，奉天的内城规定为八旗的居住区。虽然当时八旗与民间人士的居住区之间泾渭分明，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迁模糊不清。位于内城宫殿里的大道是四平街，俗称中街，其两端设有钟楼和鼓楼。这条街道是作为商业区而发展的，许多老店鳞次栉比，时至今日依然是主要繁华街道。

到了清末，该地的地区社会已经从奉天时代初期主要为满洲族转变为以汉族商工业者为中心。他们先是组织公议会，接着改组公议会而设立商会(奉天总商会)，联合对抗当权者，并提出地区社会的要求。

根据清末的地方志，当时的商业资本以山西商人资本规模最大，来自福建的商人次之，山

东商人只有经营规模小的零碎资本。1)山西商人资本规模庞大，是经营票庄、代理政府财政之政商的核心。福建商人从事通过海运的地区间贸易，在营口等港口和大消费市场奉天拥有据点。而提及山东商人，则只能联想起小店铺以至行商之类的小商业。他们的商业活动是向农民供给杂货，向都市居民贩卖奢侈品。由此可见，汉族商人是从外地来的客商。

奉天的商人可以根据所谓四帮、五行、十六道街的标准进行分类。所谓四帮，是指直隶、山东、山西、在地²⁾之同乡集团；所谓五行，是指钱行、粮行、丝房、皮货、山货之同业集团(《东三省政略》，1989，下，1584页)；所谓十六道街，是指钟楼东大街、钟楼南大街、钟楼北大街、大北关大街、鼓楼南大街、鼓楼西大街、鼓楼北大街、中街大街、大西门大街、大东关大街、小东关大街、大南关大街、小北关大街、小南关大街、大西关大街、小西关大街等开业地方的集团。十六道街之各街道都设有小龙(消防水管)，并出于消防目的而进行组织，其组织称为公议会。十六个公议会在长安寺举行联席会议(合议)。从狭义的角度看，所谓公议会是指这一联席会议(合议)组织，而十六个街区的公议会则处于其分会的地位(刘，1982：164~165页)。

在奉天，出身地与行业的对应关系是，以山西帮而言，如前所述是票庄和钱行居多。此外，在烧锅(烧酒酿造业)、船店(河川运输业)等必需一定资本的行业，山西帮也很多。山东帮在丝房(杂货制造兼批零)、饮食店、山货铺³⁾领域，几乎处于垄断状态。虽然直隶帮没有垄断倾向强的行业，但是在丝房之外的杂货铺、钱铺、粮行等可见直隶帮经营的店铺(外务省，1907：248、280页；奉天总商会，1925)。当地商人没有垄断特定的行业，在粮行、旅店、船店方面，在地商人经营者为数不少(外务省，1907：248页)。

三、商会的变迁与奉天地区社会之一：混乱期(1905~1911年)

那么，在这些地区社会中居主导地位集团是谁呢？关于这点，可以从商会的变迁及其领导层进行考察。

奉天总商会的变迁大体可以分为混乱期(1905~1911年)、安定期(1911~1924年)、变动期(1924~1931年)三个时期。在1905~1911年的混乱期，成其为商会设立之母体的公议会改组为商会。该时期是对于清末各项改革，商会阶层摇摆于反对和接受之间的时期。商人方面在接受政权方面的意向之际存在冲突，商会会长任期短而更替频繁，领导层处于混乱中。到了1911~1924年的安定期，领导层趋于稳定。1911~1917年孙百斛、1918~1924年鲁宗煦长期担任商会会长职务。安定期是奉天地方政权的负责人与商会代表的在地社会之间保持相互支持关系，从而得以维持其政权的时期。⁴⁾在1924~1931年的变动期，随着张氏政权

1) 位于奉天省城与长春中间之平原地昌图地方志记载其山东人观称：“下垂之小本营业不可枚举，多山东人”(《昌图县志》，1916年，卷三，3)

2) 《东三省政略》称之吉林，但是仅从实际的商工业者的出身地看，毋宁视之为奉天周边在资本更为妥当

3) 主要处理东山(、怀仁等东部山地)出产的山地产品。元蘑(蘑菇的一种)、蜂蜜、人均交易商品(外务省，1907：255页)。尽管如此，见诸《民国十三年奉天省城商工名录》和《满洲华商名录》的山货铺几乎都是民国时期创业而由直隶帮经营的

4) 关于该时期张作霖政权在社会的研究，参照松重(1990,1991,1994)、涉谷(1997)等

强化对商会的干涉，商会受到南京国民政府之改组商会的影响。由于张作霖政权日趋强大，此前能够独立支撑的商会反而受到政权的支配。商会会长任期都比较短，制度的改编也频繁进行。

下面接着考察混乱期之地区社会的形态。

由四帮五行十六道街公议会所构成的经济界的情况是，当时的政府认为不无改善的余地。例如，首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针对商会成立以前之商工业者的问题提出以下三点：(1)“涣散之弊”，即每每聚结为同业团体同乡团体，而没有作为全体的整合；(2)“闭塞之弊”，即缺乏为了振兴商业而进行改革的意识；(3)“阻挠之弊”，即采取不当的消极姿态，并诱使民众反抗官府的态度(《东三省政略》，1989：下，1584页)。商工业者之巩固其同乡、同业集团，而不积极维持与官府的关系的姿态由此可见。惟其如此，官方认为商工业者应该团结，支持官方振兴经济的措施。

针对这种情况，盛京将军赵尔巽在东北进行各种改革。其中之一是将公议会改组为商会。赵氏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三月奏请设立商务总局。奉天商务总局的作用是管理奉天全省的商政。商务总局设置两个月后，为成立奉天的商会而进行商务总会的组织准备工作。与此同时，还向地方各县派遣人员推进设立商会的工作。六个月后，将原已存在的公议会等商人团体改组为商会，而在一部分县则由商人新建商会。其结果，在奉天全省成立五十余个商会，其中包括奉天、安东、营口3个总商会以及38个分会、16个分所。⁵⁾

但是，实际上向商会的改组遭到公议会方面的抵抗。在奉天，1906年6月11日(旧历一月十八日)于长安寺设立商务总会，选举孙百斛为其会长即会头。这在表面上是由商工业者所推荐的。《商务官报》(光绪三十二年第四期十七页)记载，选举孙百斛⁶⁾为总理(相当于商会会长)、梁维康⁷⁾为协理(相当于副会长)，商务总会开始行使其职能。另一方面，《南满洲的商业》称商会是由孙百斛设立的，而且与公议会并存。记载此事的日本人调查仅仅是在公议会听其会员言论，认为公议会方面不满意商会的设立(外务省，1907：314页)。由此可见，恐怕是由于公议会无法改组为商会，商务总局采取以官吏出身的孙百斛为会长的形式，与公议会相区隔而设立商会。

根据史料，可以推测商会会长之异同。⁸⁾根据同时代的史料《商务官报》和《南满洲的商业》，孙百斛为商会会长。但是根据后来编纂的“沿革”(满洲中央银行调查课，1936：1页)，公议会改组是1902年，而孙百斛就任会长是1908年。1902年的商会会长是田子超⁹⁾，副会长是甘益堂¹⁰⁾；1905年商会会长为赵国廷¹¹⁾，副会长为杨化霖¹²⁾。他们几乎都是《南

5) 《东三省政略》<纪商会>在正文之外的附表记载42个分会、11个分所，附表与正文内容不同(《东三省政略》，1989：下，1585~1586页)

6) 孙百斛，字鼎臣，祖籍天津，父辈移居沈阳。1890年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1900年义和团事件爆发后返回故乡沈阳，历任东三省官银号总办、谘议省议会议长等(《奉天通志》，1982：4624页)

7) 梁维康文献记又康又宣。裕民银号经理(刘，1982：169页)

8) 以下关于商会干事的异同，比较如下之史料。《商务官报》第四期十七页<商部奏奉天设立商务总会摺>(光绪三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奏奉)、满洲中央银行调查果《本邦农工商会调查·奉天省之部》(1936年)第一页<沿革>。外务省《南满洲的商业》(1906年)第309、313、314页

9) 田子超，天合东丝房经理(刘，1982：168页)

10) 甘益堂，据文献记载堂亦作棠，又作甘志谦。沈阳具有二百余年历史的最古老的药铺宝和堂经

11) 赵国廷，据文献记亦作赵清玺。经营南烟行兰茂厚，还是1907年创业的日中合作公司沈阳马车铁路公司的总理(刘，1982：168页；外务省，1907：307页)

满洲的商业》列举的公议会干部。¹³⁾

由于这些史料内容之混乱，因此公议会的改组过程可作如下观察。由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的改组，公议会与商务总局管理之下的商会一度并存。商务总局试图以孙百斛为中心，组织商务会议所模式的总商会。由于总商会的设置场所与公议会同为长安寺，因此理想的形式是吸收并改组公议会。但是因为受到公议会的反对，改组并不容易进行。再者，最后孙百斛还与赵尔巽反目(涉谷，1997：65页)，孙百斛辞去会长一职。公议会的领导层也最终让步，由赵国廷出任商会会长，商会与公议会达成妥协，单一的组织奉天总商会宣告成立。

但是，随着商会设立而来的对立，并没有因为原公议会干事出任商会会长而告结束。从1908年夏天到秋天，奉天市民爆发抗房捐运动。省政府为了募集实施新政的经费而决定向商工业者增税，市民的反弹从罢市升级为向北京抗诉。在此过程中，商会设立时获得政府妥协而成为商会会长的赵国廷，想方设法游说反对政府的商人，从而陷入不得不游离出商人层的状况。相反地，商会设立时政府欲派遣为商会会长的孙百斛，则介入而成为抗房捐派与政府之间的中间人，而为商工业者所接受(《盛京时报》，8月9日)。

这一事件的结果是，孙百斛在赵国任辞职后出任商会会长。虽然本来商会会长是在旧历一月的年会选举产生的，但是在此之前孙氏根据农工商部的指示已经到任。翌年，商会会长职务改由商工业者代表田子超担任，孙百斛作为商会代表参加地方议会的前身谘议会。诚如文史资料所指出，此后直至辛亥革命期间，商会会长职务因官厅与商人的对立而发生纠纷的情况为数不少。¹⁴⁾

在该时期的奉天地区社会，特别具有力量的集团尚不突出。毋宁说，山西系的金融资本与山东系的杂货资本，以及在在地拥有基础的孙百斛之类的集团，形成大体势均力敌的力学关系。再者，各路客商因为在出身地也拥有地盘，也因为各自调整其商业交易，所以即使需要协商也与奉天经济界联系不多。这就是诚如徐世昌在《东三省政略》所悲叹的情况。但是到民国时期，在地区社会中堪称东北人意识的东西已然萌生。

四、商会的变遷与奉天地区社会之二：安定期(1911~1924年)

辛亥革命后，商会人事逐渐稳定。在商会会长方面，14年时间只有一次交替。从1911年开始由孙百斛担任，他死后1918年由鲁宗煦接任。在前半期担任商会会长的孙百斛，通过抗房捐运动及其在谘议局的活动而获得地区社会的信赖。鲁宗煦从1909年开始担任商务总会的干事。¹⁵⁾鲁宗煦是山东省蓬莱县人，虽然他自己不是杂货商的经营商，但是其支持基础却是山

12) 杨化霖，银号经理(刘，1982：168页)

13) 《南满洲的商业》列举光绪三十二年时(1906年)的公议会干部为甘益堂、刘贤基(与田子超同为天合东的东家)、张玉书、王聚干、赵国廷5人

14) 赵国廷经营以兰茂厚为名的南烟行，在日俄战争时期大发战争财而获得成功，并与日本合作参与奉天的马车铁路经营，是后起的商人，他不属于原来的主流派五行(粮行、钱行、丝房、皮货、山货)，而是拥有财力的少数派(刘，1982：169页)

15) 鲁宗煦，棣琴。拥有定额之外的生员身份。从1912年担任与日本大仓组合作经营的沈阳马车铁路公司的经理(田边，1924：107页)还是1914年设立的华茂猪毛公司的经理(《奉天省公署档案》，

东出身的杂货商——丝房。在混乱时期，银号等民间金融机构的经营者被选为商会会长和副会长。但是此后其逐渐减少，民间金融业者在奉天总商会的势力每况愈下。

该时期奉天总商会的安定反映了地区社会的发展。在安定期，作为经济界的著名行业，杂货业不断成长。1923年见诸奉天总商会名簿的干部为杂货30人(其中丝房16人，其他杂货等贩卖14人)，金融关系9人(其中当铺5人，金店2人，官银号1人，钱铺1人)，此外为药铺6人。值得注意的是，在71人的干部中杂货贩卖业者人数之多。杂货业所交易的商品是棉布、海产品、药品以及其他杂货，主要是从上海、天津和大阪购入的商品。杂货业是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东亚轻工业的发展，而促使其产品向其市场——中国东北地区输入而繁荣起来的。

作为该时期发展起来的杂货商，山东帮具备强有力的凝聚力。在杂货商中，以“丝房”自称的可能只有山东帮。即使根据1933年的调查，山东出身者集结的山东会馆仅以布商即丝房为其会员，调查年当时其商店数达七十余家(枝村，1933：7~8页)。丝房整体的店铺之增加，也比其他杂货商更为坚实。在奉天，由于第二次直奉战争后的景气，杂货商的开业急增。此时增加的杂货商，多数是由与丝房交易同样商品的其他地区出身者经营的。此后，随着1927年奉天票暴跌而导致的萧条，该时期增加的许多杂货商破产。尽管如此，丝房中破产者为数不多(上田，2001)。

山东帮以丝房为中心的经营方式招致其他商工业者的反感。¹⁶⁾在1923年的商会选举结束后，省政府接到对鲁宗煦的匿名告发状。根据告发状，在1923年5月的选举中，为了鲁宗煦当选而出现代理投票和付诸威胁的情况。告发状称这种不正情形是可能的，因为除鲁宗煦以外的两个副会长都是山东帮，商会内部为山东人所掌控。告发状还指出，在1923年直奉战争时，鲁宗煦因为忧虑其是张作霖的敌人吴佩孚的同乡而遭到怀疑，所以发生精神病，这种人不适合担任商会会长(《奉天省公署档案》，3617)。虽然这一告发不可全信，但是鲁宗诚如刚刚指出的，是山东帮的一员。

这一背景中包含着奉天的在地意识的形成。在1920年代，与从日本及上海输入杂货的杂货商势力扩大同时，近代的轻工业也出现萌芽。对这类轻工业进行投资的，是籍贯在奉天的在地化的人。

虽然生产工业制品的企业以“振兴实业”为口号，在清末民初普遍设立，盛极一时，但是几乎没有见诸“满洲国”时期进行的调查，估计是已经破产了。因为这项“振兴实业”开花结果的时期是在1920年代。在1931年的资料中，奉天所存在的工厂制产业大多从东三省官银号、边业银行、奉天储蓄会等与东北地方政权官僚关系密切的金融机构接受资融资，与此同时政府关系者本身也是出资者。惟其如此，享受免税等优惠待遇的情况为数不少。其行业以火柴、纺织业等此前信赖进口的轻工业居多，以进口替代为目标。其经营者许多成为1920年代后半期盛极一时的促进国产品销售运动之“国货运动”以及抵制日货运动的中心人物(上田，2003)。

3136)。1915年作为王永江所组建的东省兴利公司的股东出资4万元(《奉天省公署档案》，3149此还是1919年创业的名为永丰庆之米行的经营者(奉天总商会，1925：179页)

16) 在日本方面的调查中，对山东帮态势报告如下：“先直战争后，奉天暗中压迫山东出身者之事，以后市政公所之创立视之，益可明了此倾向。现奉天总商会会长鲁宗煦氏(山东人，与吴孚同乡托此事以检束之，改选近举行云”(钜鹿，1924) 齋者之事，尚以后市政公所之创立视之，则益可明了

五、商会的變遷与奉天地区社会之三：變動期(1924~1931年)

商会的变动期是由这些轻工业资本夺取山东帮手中的实权而开始的。

轻工业资本因为以谋求进口替代化为目标，与安定期通过进口以积累利益的商会领导层——杂货商存在利害对立关系。再者，因为轻工业资本之扶持乃是政府殖产兴业政权的一环，所以经济界领导层的交替是以张作霖、张学良政权的支持为背景的。

安定期最后的商会会长鲁宗煦，在任期间因被告发不正，而辞去商会会长职务。根据1924年4月7日和13日的《盛京时报》的报道，商会应参事们的要求，公开1923年1月至1924年1月之收入3万余元和支出4万余元的会计报告。其中存在约1万元的赤字，为了查明其原因，4月11日的会议决定进行监查。虽然最初选举鲁宗煦为会长的委员寻求组成为监查委员，但是不同的意见认为不符合章程的规定，因此由根据参事间推荐而选举的委员进行监查。其结果，发现涉及不正之经费，而鲁宗煦会长需要承担其责任。4月17日，向省政府提出涉及不正之名单(《奉天省公署档案》，3617)。由于该事件，鲁宗煦以下干部4人被警察扣留，并举行商会董事和会长的选举。省政府以这次的问题是会长与小资本经营者结党操纵会务为理由，指示将会长的被选举权提高为营业资本额5万元，董事的被选举权为4万元，选举权为1万元以上(《奉天省公署档案》，3617)。根据这项规定提出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之资格者的名单，并于5月19日选举董事，21日通过董事内互选选举议事，26日举行正副会长选举。其结果是选举58人的董事，选出张志良为会长，吴玉麟、赵保安为副会长。

在鲁宗煦下台后出任会长的张志良，曾任职于沈阳县衙门，1912年出任奉天督军署的监印官，其后至192年在张作霖政权下历任巡阅使、督军、省长的监印官，扮演了张作霖秘书的角色。与此同时，他还是新兴的轻工业资本的经营者，1921年创建八王寺啤酒汽水公司，1922年创建惠临火柴公司。而其财源则是1917年迎接张学良出任名誉会长、并由他发起组织的奉天储蓄会。所谓储蓄会，乃是以向会员募集的股份为资本，且只向会员提供融资的信托金融机构。1923年时每月交1元或每年交1元即可获得会员资格，因此能够从广泛的社会阶层募集资金。再者，奉天储蓄会与其他储蓄会不同，还积极地承揽新兴轻工业中发展前景良好者的股份。这种业务框架为张志良的八王寺啤酒汽水公司和惠临火柴公司提供了资金。进而，在这些企业之外，还向肇新窑业公司以及东兴色染公司、奉天纺纱石也提供了资本。此外，作为新银行，还获得东三省官银号的支持(《满铁调查月报》1923年第3卷第10号，1~24页)。

从鲁宗煦到张志良之商会会长的交替，不能仅仅视为商会内部的政争，而是意味着地区社会的领导权(leadership)向新人物的过渡。与此同时，还是地区社会之意识变化的表现。此前凭借丝房等流通业而构筑了经济力的山东帮，终究自认为是山东人，其多数在故乡山东维持着家庭。与此相对，新兴的轻工业资本家不仅保有与张作霖政权的关系，而且与张作霖政权共有以奉天为中心的地区的意识。由此可见，在此阶段，在奉天地区社会，意识到地区主义的在地意识已经获得一定程度的成长。

在变动期的后半阶段，除了地区主义之外，商会的领导层还强烈地主张民族主义。1927年发生临江日本领事馆分馆设置事件。以当时的商会干部丁广文、杜重远为中心组成外交拒后

援会，倡导反日运动。较诸此前商会始终没采取有对日强硬姿态，这一反日运动无疑是巨大的方针转变。

六、結語

在中国本部之外、即成其为清朝封禁对象之满洲的最大城市奉天，直至清末在此地居住的汉族商人终究是客商。汉族的地区社会也是通过来自各地的客商的合议而维持的。到民国时期，参与国际经济并从事贸易活动之山东帮杂货进口商在经济界逐渐拥有力量。他们成功的原因之一在于同乡的凝聚力，因此顽强地维持与山东的关系，而对奉天地区社会的认同薄弱。惟其如此，随着地区社会整体中在地意识的强化，其作为地区社会代表的地位遭到驱逐。取而代之，获得地区社会领导权的是以奉天为籍贯的新兴资本家。他们与张作霖政权关系比较密切，并与张作霖共有地区意识。其中存在的意识与原来客商之暂住所谓满洲之外地的认识不同，是维持并发展东三省中心之奉天地区社会的地区主义。这种地区主义不仅见诸作为城市名的一个地方城市的名称，而且还见诸对于作为都城的奉天之名的坚持。1929年根据南京国民政府的指示，城市名要变更为沈阳，商会名也要从奉天总商会变更为沈阳市商会。尽管如此，对于仅仅显示一个地方城市的商会名称，商会内部存在强烈的抵制（《奉天省公署档案》，12033）。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该地区接收大量的汉族移民。在此过程中地区经济急速发展，从中获利的人成为地区社会的代表，而在这种经济力支持下发展壮大的是张作霖政权。其结果是，居民认为值得具有归属意识的奉天地区社会因运而生。

参考文献

- 上田贵子：〈从1920年代后半期华侨资本的破产所见之奉天都市经济〉，《现代中国》第75号，2001年。
- 上田贵子：《近代中国东北地区华人商工业者资本之研究》，大阪外国语大学语言社会学会，2003年。
- 枝村荣：〈关于奉天的会馆〉，《满铁调查月报》第13卷第10号，1933年10月。
- 外务省：《南满洲的商业》，金港堂，1907年。
- 钜鹿贯一郎：《支那商会法与商事公断处章程》，辽东事情研究会，1924年5月。
- 涉谷由里：《张作霖政权之研究：以从“奉天文治派”所见之历史的意义为中心》，京都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7年。
- 田边种治郎编：《东三省官绅录》，东三省官绅录刊行局，1924年。
- 中见立夫：〈地区概念之政治性〉，沟口雄三、滨下武志、平石直昭、宫岛博史编：《从亚洲来思考(一)交错的亚洲》，东京大学出版会，1999年。
- 中见立夫：〈从“东北亚”所见之“东亚”〉，滨下武志编：《东亚世界的地区网络》，山川出版社，1995年。
- 中见立夫：〈所谓“东北亚”如何认知？〉《东北亚研究》7号，2004年。
- 松重充浩：〈“保境安民”期张作霖地区政权之地区统合政策〉，《史学研究》186号，1990年3月。
- 松重充浩：〈张作霖之掌握奉天省权力及其支持基础〉，《史学研究》192号，1991年6月。
- 松重充浩：〈关于奉天之市政导入及其政策意图〉，今水清二郎编：《亚洲的地区与社会》，劲草书房，1994年。
- 满洲中央银行调查课：《本邦农工商会调查·奉天省之部》，1936年。
- 奉天总商会经济部调查股编：《民国十三年奉天省城商工名录》（略称奉天总商会），1925年12月。
- 刘恩涛：〈沈阳商会七十五年(1874~1948)〉，《沈阳文史资料》第1号，1982年。
《东三省政略》（吉林文史出版社）。
《奉天通志》（东北文史丛书编辑委员会版）。
《昌图县志》，1916年。
- 南满洲铁道庶务部调查课：《满铁调查月报》3卷10号，1923年10月。
- 辽宁省档案馆所藏档案：《奉天省公署档案》
卷宗号3136：〈周作孚设立华茂猪毛公司请立案〉。
卷宗号3143：〈王永江等为兴办实业组织东三省兴利公司〉。
卷宗号3617：〈奉天省城总商会章程〉。
卷宗号12033：〈省城商会改组附送章册〉。

近代上海日本居留民社会中的妇女团体

■ 樂 敏 (復旦大學中外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 ■

近代上海日本居留民社会中的妇女团体

樂 敏 (復旦大)

〈目 次〉

- 一、日本居留民人口的增长和妇女从业的多样化
- 二、日本妇女运动和居留民妇女团体的出现
- 三、居留民妇女团体类型与职能的转变
- 四、上海时局妇人会与日本侵华战争

日本居留民是近代上海外侨中极为重要和特殊的一个群体，它既是日本吸收西方文化的载体，也是日本实施大陆政策的工具。但长期以来，这一历史似乎被人们努力地遗忘和掩盖。日本学者虽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有关于上海史的著作出版，但没有过多关注上海日本居留民这一社会群体。由于日本较晚进入世界殖民国家的行列，其强权和影响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尚未超出亚洲范围，因此在沪日本居留民群体在西方史学家的眼中也成了“沉默的日本人”。而在将日本人作为侵略者的中国，他们更是从未出现在学者的视野中。¹⁾ 这种局面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所转向，深入研究上海日本居留民社会已经成为上海史、殖民主义史和中日关系史的重要课题之一，当时日本政府为保护居留民的利益而建立的各种自治机构也成为学者研究的重点。但作为这些自治团体重要组成部分的妇女团体，学者对其的论述并不多，²⁾ 对其建立、发展的过程、从事的活动进行梳理，探讨其性质，无疑将使在沪日本居留民社会生活史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更为清晰地呈现出来，也将使我们进一步了解妇女在近代亚洲社会历史中角色的变迁。

1) 还可参见安克强，《上海的“小日本”：一个与外界隔离的社团（1875—1945）》，熊月之等编：《上海的外国人（1842—1949）》，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2) 高纲博文的《上海的日本人居留民》一文（见熊月之等编：《上海的外国人（1842—1949）》）对上海日本人居留民的主要组织进行了研究，但并未涉及妇女团体问题。陈祖恩的《上海日侨社会生活史（1868—1945）》（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对在沪日侨的基层组织和社团进行了研究（见第76—81、109—138页），其中提到了四个妇女团体：“大和妇人会”、“日本艺妓联”及两个宗教妇女团体，即东本愿寺设立的妇人恳话会和高野山出张所举办的妇人会（见第130、140、273—274、366、370页）。安克强的《上海的“小日本”：一个与外界隔离的社团（1875—1945）》（熊月之等编：《上海的外国人（1842—1949）》）提及了“妇女紧急行动委员会（Shanghai jikyoku fujinkai）及其组织和主要活动（第187页）。美国学者傅佛果对上海居留民团的起源及演变过程进行了梳理，并对上海居留民团与中国其他城市的日本居留民团进行了比较，见Joshua A. Fogel, Shanghai Japa: The Japanese Resident Association of Shanghai,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 Vol. 59, No. 4 (Nov., 2000), pp. 927—950。作为日本妇女团体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历史阶段，即战时日本妇女团体，日本学者有不少成果，但比较系统、全面和更为深入的研究尚显不足；关于日本学者在此问题上的研究状况及中国学者的研究见胡澎的《战时体制下的日本妇女团体（1931—1945）》（吉林大学出版社，2005年），该书对战时体制下的日本妇女团体进行了比较全面和系统的剖析，但并未涉及战时日本妇女团体的海外分支机构。我国学者刘晶辉的《民族、性别与阶层——伪满时期的“王道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研究了日本妇女团体在伪满洲国的建立及其活动。

一、日本居留民人口的增長和婦女從業的多樣化

近代中日外交关系始于1871年9月《中日修好条规》之签订，但在此之前已有日本居留民在上海出现，据1870年工部局的登记，当时的日本居留民仅有区区7人，在公共租界的1666名外国人中几乎可忽略不计。³⁾ 1905年之前，日本居留民人数的增长十分缓慢，“从明治元年到明治十四、五年，上海的日本居留民人数从10人增至100人，平均每年增加5、6人。而且，不论在什么时代，男女比例大致是1比2。”⁴⁾ 1890年时日本居留民的人数增加到644人，男性居留民人数（339人）才第一次超过女性（305人）。1899年末，日本居留民的人数超过1000人；1904年末超过3000人，其中男性1959人，女性1080人。⁵⁾ 日俄战争后，以纺织业为首，制粉、机械、榨油等日本资本开始正式进入上海，与此同时，上海的日本居留民也急剧增加。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国家从中国撤退，日本资本在上海突飞猛进，1915年居住在上海的日本人达到11457人，超过了英国人而位列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人人数的第一。进入20年代后，随着上海-长崎定期航线的开设，日本居留民持续增加，在1926年突破2万人，根据1927年12月末的调查，居住在上海的日本人有25827人，占上海外国人总数54388人的47%。⁶⁾

随着日本居留民人口的增多，居留民社会的构成也越来越复杂，早期来沪的日本人中“男性大多数是杂货、陶器、小百货店的商人，还有一些是商社职员和官吏，女性中十有六七做的是以外国人为对象的性买卖。……他们成为日本居留民在上海的先驱者”⁷⁾ 而到20世纪初年，日本人从事的职业越来越多样化，1904年1月2日，日本居留民办的《上海新报》刊登了《上海在留日本人营业指南》，展现了初期上海日本人从业的全貌。从中可以看到，上海开始有了从事护士、接生婆等职业的日本女性。⁸⁾ 而随着日本居留民社会的不断扩大，这种趋势也在不断发展。1928年10月末，上海日本领事馆对在沪日本人的职业进行了一次调查，其结果显示，在当时的10228名女性当中，有从事学艺、娱乐、装饰品制造业者3人，从物品销售员者73人，从事印染洗濯业者1人，从事被服日用品制造者53人，从物品租赁存放业者3人，作为公司职员、银行职员、商店员、事务员者94人，从事旅馆餐馆租房艺妓业游戏场演艺场业者77人，艺妓娼妇陪酒女及其他者628人，从事理发浴室业者42人，从事其他商业者6人，从事邮政电信电话业者3人，宗教人员2人，教育人员22人，医务业224人，从事新闻杂志、文学艺术、摄影者7人，其他自由职业者11人，其他有职业者146人，家庭佣人542人，未申报职业的其他有职业者749人。⁹⁾ 从中可见，到20世纪20年代，上海日本居留民中

3) 米泽秀夫：《上海史话》，东京亩傍书房，昭和十七年，第93页

4) 上海居留民团创立三十五周年纪念志编纂委员会：《上海居留民团三十五周年纪念志》，1942年，第42页。

5) 《上海新报》，第一期，转引自高纲博文：《上海的日本人居留民》，熊月之等编：《上海的外国人（1842—1949）》，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上海居留民团三十五周年纪念志》，第76、84—85页。

6) 转引自高纲博文：《上海的日本人居留民》。

7) 《上海居留民团三十五周年纪念志》，第42页。

8) 参见陈祖恩：《上海日侨社会生活史（1868—1945）》，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67—76页

9) 高纲博文：《上海的日本人居留民》，第158—161页

从事艺妓娼妓陪酒的女子仅占女性总数的6%。而从事其他各种职业者在沪日本女性居留民中约占1/5。这不仅反映出日本居留民社会的生活需求，更与20世纪初期日本国内妇女思想解放运动及妇女就业的兴起是一致的。

二、日本婦女運動和居留民婦女團體的出現

20世纪初，在西方妇女运动的影响下，日本国内出现了妇女思想解放的潮流和妇女政治运动，建立了日本基督教妇人矫风会、新妇人协会、妇选获得同盟、女医会、至诚会、处女会、大日本联合女子青年团、友爱会妇人部、赤澜会、关东妇人同盟、全国妇人同盟、爱国妇人会等一系列妇女团体。¹⁰⁾ 与这种趋势相呼应，上海居留民社会中也开始出现类似的妇女组织。大约在1905年5月成立了“爱国妇人会”；1915年11月31日由东本愿寺发起成立了“妇人恳谈会”；1918年10月12日，田添幸枝发起成立了“大和妇人会”，并在日本小学校举行了成立仪式。这一时期出现的妇女团体还有上海妇人会、矫风会、樱枫会、佛教妇人会等。根据记载，20世纪初至20年代的上海日本居留民社会中共出现过大约17个妇女团体。¹¹⁾

虽然目前尚无足够的史料可以窥见当时这些妇女组织的人数和规模，但从已经发现的史料看来，这些妇女团体在当时的居留民社会中是具有较大影响的。比如1905年6月15日下午在靶子路赵子花园内召开的“爱国妇人会”总会就有140人出席。在此次会议召开之前，爱国妇人会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募集了274名会员，¹²⁾ 这在当时总数仅1592人的日本女性居留民中是非常可观的。

这一时期所成立的妇女团体，其主要活动一是组织居留民妇女之间的交流，组织提高妇女技艺的培训活动。如1915年组织的“妇人恳谈会”在成立之初就明确其宗旨是“为了在留邦人的友好交流及其道德完善和妇女技艺的提高”。又如“大和妇人会”，该组织设有研究、社交、人事等部，每月发行《上海妇女》杂志，论述有关日本妇女、中日妇女交流等问题，组织有关妇女思想解放的演讲会等。1925年2月19日，新渡户稻造博士作为国际联盟事务局的和平特使，在赴任途中来沪，并在由上海妇人会和日中基督教青年会主办的演讲会上发表演讲。¹³⁾

当时居留民妇女团体的另一项主要任务就是组织慈善救助活动。各个妇女团体都组织过各种类型的慈善活动。比如1920年3月13日，大和妇人会在日本小学校举行实践躬行会，为幼儿制作简单的服装。1923年9月1日，日本发生了关东大地震，同时发生了火灾和海啸，死者9万余人。大和妇人会募集各类救灾服装4413件，于9月16日由“北野丸”号运输到日本；还于12月1日向日本灾区送去了正月年糕。其他日本各妇女团体也在日夜兼程募集各类衣服。上海妇人会募集了救灾资金和毛毯千余条，于9月10日送往日本。¹⁴⁾

这一时期日本居留民妇女团体的慈善救助对象不仅包括上海居留民社会的日本人和国内重

10) 参见胡澎：《战时体制下的日本妇女团体（1931—1945）》，吉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4—41页；西川祐子：《总体战与女性：向战争的倾斜与翼赞“妇女”们》，秋山洋子、加纳实纪编辑：《战争与性别——日本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11) 详见附表，参见《上海居留民团三十五周年纪念志》；岛津四十起编：《支那在留邦人人名录》，金风社，1934年，第288—290页

12) 《上海居留民团三十五周年纪念志》，第122页

13) 《上海居留民团三十五周年纪念志》，第431页

14) 《上海居留民团三十五周年纪念志》，第418、423、416页

大灾害地区的日本民众，还包括中国民众。1920年9月，中国华北发生旱灾，上海各界都举行了慈善救助活动。当时日本居留民也发起了华北救灾会，10月17日，日本艺妓联举行演艺会，将所得银1000余元捐给中国灾区¹⁵⁾ 1921年3月26日，为救助中国贫民，中日公理教会妇人会慈善音乐会募集了4974弗5角。12月1日，大和妇人会为收容教育中国孤儿及贫困妇人免费生产成立了明星社，募集经费10万元。¹⁶⁾

除组织日本妇女之间的交流和慈善捐助活动之外，在沪日本居留民妇女团体还有一项十分重要的活动，就是在中日关系紧张之际为日本居留民社会自身（包括上海及在长沙、青岛等其他中国城市的日本居留民）以及日本在华部队做后方支援。1911年10月31日，西本愿寺附属佛教妇人会为保卫汉口日侨的第三舰队及义勇队员征集慰问袋。1915年末，袁世凯和日本政府签订《二十一条》后，中国各地多次兴起排日风潮。在排日运动中，日本居留民社会开始组织起来，谋求保护自身利益，在沪日本居留民妇女团体也参与到其中。1920年8月2日，上海妇人会、上海樱枫会对第一遣外舰队赠送了慰问袋。1923年6月1日，长沙发生了排斥日货运动，当地的中国学生和日本海军陆战队发生了冲突，导致学生数十人死亡，北京政府对日进行了强烈抗议。当时上海的七个妇女团体基督教妇人会、大和妇人会、上海樱枫会、矫风会、佛教妇人会、中日公理教会妇人会、上海妇人会联合起来，募集了慰问金寄给长沙的日本居留民。¹⁷⁾ 可见居留民社会中妇女团体相继建立及展开活动，既在居留民中发挥了社会中间组织所应有的积极作用，也逐渐开始加入到日本政府的军事侵略行动之中。

三、居留民妇女团体类型与职能的转变

在日本国内，20世纪初所兴起的众多妇女团体大致可以分为自由主义妇女团体、社会主义妇女团体、国家主义妇女团体和普通社交团体、同业协会及宗教妇女团体几种类型。比如，日本最早的妇女团体——日本基督教妇人矫风会即被归为自由主义妇女团体，以“矫正社会弊端及不良风气、修养道德、禁酒禁烟、提升妇女品位”为目的，对培训女子劳动者、废娼运动、妇女参政运动等方面也十分关注，在日俄战争爆发后也有配合当局政策的活动。友爱会妇人部、赤澜会、关东妇人同盟、全国妇人同盟则属于社会主义妇女团体，主要活动是进行社会主义宣传，争取8小时工作制、男女同工同酬，以及争取妇女参政权等。成立于1901年的爱国妇人会则属于国家主义妇女团体，是日本第一个体制内的官方妇女团体，最初是作为一个军事援助团体而成立的，发起人是主张大陆出兵路线的奥村五百子，并得到贵族院议长近卫文麿和东伏见宫、闲院宫等皇族、贵族的首肯；其主要活动是在各地举办演讲会和对战死者、战争中病死者家属、因患病或负伤导致残疾的军人和病弱军人们进行救援。¹⁸⁾

而在海外的居留民社会，妇女组织的类型显然同在国内有一些差异。虽然由于史料的局限，我们无从得知一部分妇女团体的具体活动，但根据现有史料可以看到，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成立的居留民妇女团体有这样几种类型：一、普通社交团体；二、自由主义团体；三、

15) 陈祖恩：《上海日侨社会生活史（1868—1945）》，第140页

16) 《上海居留民团三十五周年纪念志》，第385、390

17) 《上海居留民团三十五周年纪念志》，第256、376、410页

18) 参见胡澎：《战时体制下的日本妇女团体（1931—1945）》，第28—41页。

国家主义团体；四、宗教团体；五、同业协会。¹⁹⁾ 可以看到，居留民社会中没有在日本相当活跃的社会主义团体，这显然同日本在海外居留民社会的特性有关。虽然日本国内有些社会主义妇女团体如全国妇人同盟力图将职业妇女、农业妇女、护士等都组织起来，但社会主义妇女团体的主要成员还是工厂女工；而海外居留民社会的中下层主要由小所有者构成，缺乏社会主义团体存在的基础。

而且，居留民社会中的妇女团体与日本国内妇女团体在实际职能上的差异可能比其表面上的差异更大。日本国内各种类型的妇女团体，其主要活动和职能虽然有相互重叠的领域，特别是在妇女思想解放和妇女参政权方面，但互相之间仍然有着相当大的差异。而根据前述居留民妇女团体的主要活动来看，作为日本当时国内妇女团体之要务的妇女解放思想之宣传、维护妇女自身权益等问题在居留民妇女团体中并不受到过多关注，而作为国内妇女团体最大政治目标的争取妇女参政权运动，由于海外居留民社会的特殊性，则根本不是自由主义妇女团体关注的对象。相比之下，这些居留民妇女团体的职能是比较单一的。它们除作为居留民妇女之间的社交平台之外，主要职能就是进行慈善救助活动和在居留民群体与外界关系紧张时进行后方支援，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妇女团体都是如此，互相之间有很大的同一性。

不过，居留民妇女团体在一个问题上同日本国内的妇女团体是完全一致的。就是随着中日之间冲突的不断升级，它们都开始支持并参与到战时体制中，最终其他民间妇女团体都被整合到国家主义的官方妇女团体中，其职能也从中日关系比较平稳时期的社交平台、慈善捐助组织和后方支援组织，转变成为完全为日本侵华战争服务的组织。下面我们就以“上海时局妇人会”为例，来看看侵华战争中的日本居留民妇女团体。

四、上海時局婦人会与日本侵華戰爭

上海时局妇人会是战时上海日本居留民社会中最重要、也是中日战争期间最为活跃的居留民妇女团体。上海是中国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城市，也是日本侵略势力最早侵入中国的地区之一。自20世纪初以后，日本在华利益猛增，它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是对华投资占对外投资比例最高者，而上海在其对华投资当中所占地位又日益重要。²⁰⁾ 1931-1932年，日军先后挑起了“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其间上海的居留民也积极活动，促使日本政府使用武力保护在沪日人利益。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日军又不断在上海挑衅，并于8月13日开始大规模侵犯上海。在沪日本各团体在“七·七”事变后就召开会议，组织紧急委员会以应对时局；在沪日本居留民也大量撤离上海，一度仅余4900人。²¹⁾ 但在1937年11月中国军队西撤之后，上海租界以外华界地区及部分租界全部落入日军之手，日本移民也被允许返回上海，并且还有大量新移民不断到来。1938年2月5日，在居留民团的协调下，各宗教团体所属的妇人会及其他妇人会联合成立了上海时局妇人会。

19) 详见附表1。

20) 20世纪30年代初，英国对华投资占其对外投资比例最高，但也仅为总额5.9，美国1.3。而日本对华投资占对外投总额81.9。特别是1914年后；1914年和1930年，日本在华人口中约80%在东北，7%在上海，而在上海的企业投资总额却从1914年的7.8%增加到1930年的24.6%。参雷麦：《外人在华投资》，商务印书馆1955年，5页，第353-35页。

21) 《申报》，1937年7月29日；《上海居留民团三十五周年纪念志》，67页。

时局妇人会是一个组织相当严密、高效的妇女团体。它在建立之初由选举产生的常任干事负责妇人会的日常事务以及为日本军人的服务。但随着日本侨民回国的增加，会内的联络工作碰到了困难。因此在同年7月举行的工作会议上对组织方式进行了改革，设置了会长、副会长和总务若干人；设置了13个部分别管理各方面事务，各部设立部长及副部长；在各町内会成立了分会，各分会设立分会长和副分会长及干事若干人，并把相居邻近的日本人每5人分为一班，每班都有班长。妇人会的所有工作计划都首先在总务会上进行研究，再通知各部部长及分会会长进行实施。1938年末，妇人会募集资金5000元修建会馆，于次年2月5日正式落成。妇人会聘请了总领事和居留民团团长为顾问，并邀请若干军界及民间的著名人士担任咨询员。到1942年，上海时局妇人会的会员总人数已超过1万。²²⁾

通过上海居留民团所保留的史料，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时局妇人会”是日本政府通过居留民团在上海进行国民总动员，为侵华的日本军队提供全面支援的工具。它所设立的十三个部中，服务部、慰问部、卫生部等8个部是特别重要的。

- 一、服务部：主要任务是为侵华日军部队提供休息处所和食堂。1938年2月8日开始，妇人会就在虹口菜场设立了军人休息所接待日本军人，所内备有茶水、点心和新闻杂志等。后因菜场内商店增加，于3月5日移到废弃的北四川路虹口旅馆内，那里设有浴场和理发所，还备有留声机，成为功能完备的日军休息所。妇人会会员每日有4-5人，甚至12、3人来此服务。日军来此休息的也从最初的每日四、五百人增加到超过一千人。妇人会的各分会也利用寺院的空房间等处设立日军休息所，备有糕点、茶水等接待、慰问日军。每逢节日还为日本军人提供日本风味的各种点心。各处休息所都为日本军人提供同样的服务。1939年后，出于经费上的考虑，各分会共同出资在吴淞路军队卡车停车场中设立了共同休息所，将原来的北四川路休息所及一些分会休息所集中起来，于10月底正式开始服务。1940年1月3日开始，共同休息所和智恩院北四川路、杨树浦路分会休息所为军人免费提供各种料理，后来吴淞路休息所还根据日本军队的请求开始运营付费食堂，每日有二、三百名，有时达一千名以上军人用午餐。每年正月有1万人以上的军人在各休息所免费享用各种料理。服务部在1938年7月3日后还负责通过火车和汽车运送日军的接待工作。²³⁾
- 二、慰问部：主要以学习过演艺和舞蹈的青年女子会员组成，工作是每星期六和星期日在上海及附近的各部队慰问演出，有时也放映电影。各分会也有各自的文艺演出，还携带各种慰问品前往各部队。1941年3月开始，慰问部不仅借用中华大戏院进行一般的慰问演出，还向社会进行公开演出，将一部分收入捐给日本军队，一部分则充作慰问资金。1942年3月，慰问部与居留民团社会科合作，到现场为出征、入伍及战死者家属等进行演艺慰问大会。²⁴⁾
- 三、交际部：主要任务为在接到神社参拜及祭奠亡灵的通知时，部长及各分会代表出席参拜仪式，慰问士兵及战死者亡灵；为出征将士送日本太阳旗等。当总力报国会成立

22) 《上海居留民团三十五周年纪念志》，第1231—1232页。时局妇人会的组织设置详见附表2，参见上海每日新闻社编：《华中现势》，1942年，第1274页

23) 《上海居留民团三十五周年纪念志》，第1232—1234页

24) 《上海居留民团三十五周年纪念志》，第1234—1235页

后，交际部协助总力报国会参加大诏奉戴日的遥拜式。²⁵⁾

四、卫生部：主要负责协助日本军队制作卫生用品和进行防疫工作。1938年5月开始，有20名会员为深谷部队进行两星期的绷带制作。1938年5-9月，每日为深谷部队、黑田部队制作药包，并协助陆战队医院的防疫工作。每年为防疫班协助注射预防流行病霍乱、伤寒等疫苗，并出版相关书籍，宣传相关卫生防疫知识。²⁶⁾

五、手工艺部：主要工作是为上海及附近的侵华日军部队修补军服，利用旧棉布制作为清扫枪管用的布供军队使用。在武汉战场沦陷后，手工艺部制作绉纸花17000余朵庆祝胜利。还为军队医院制作纸花慰问伤病员，制作枕头3000个送往各部队的医院。在妇人会会馆开办利用废物制造玩偶以供慰问部队之用的讲习会。²⁷⁾

六、社会部：通过各种途径募集资金，支援日本军队。1939年6月开始，社会部利用中国人为其进行废品回收，并把所得用于国防经费。截止1940年2月便已达到15000余元。在这年的海军纪念日，社会部举行了向军队贡献机枪车三辆（以时局妇人会报国号命名），陆战机枪一部的仪式。在1941年3月10日的陆军纪念日上，又为军队贡献新兵器费用2万余元。1939年11月开始，社会部同青年部、手工艺部举行了家庭不经常使用物品的交换会，将所得资金充当表忠塔的绿化费用以及日军休息所的服务费用、慰问金和新兵器费用贡献给陆军。²⁸⁾

七、粮食部：主要工作是与服务部合作，在上海事变后为日军休息所、食堂和日军赴前线作战部队提供粮食，并为时局妇人会各种活动，如敬老会和演艺大会的演出者提供便当，为马尼拉在留日本人在沪期间提供食品。²⁹⁾

八、储蓄部：1940年5月以后提倡实行爱国储蓄活动，储蓄资金达97110元。这一工作在1941年秋得到了兴亚院华中联络部的表彰。另外1938年8月13日，即“八一三事变”一周年纪念日，陆军举行了毛毯募集运动，第一次储蓄部为陆军提供新旧毛毯1161条，第二次提供了纯毛毛毯805条，棉毯3000条。储蓄部自建立以后还进行了十次街头资金募集工作。³⁰⁾

时局妇人会自成立以来，不但为日本侵华军队进行直接的服务，为其提供饮食、衣物、慰问品和休息场所，而且为日本军队直接、间接提供了大量资金。她们的行为不但在物质上支持了战争体制，而且对军人起到了激励和鼓动作用，在精神上也支持了战争体制，实际上成为日本侵华战争的重要辅助机构。时局妇人会因此多次得到日本陆海军大臣、外务大臣及各部队指挥官的感谢和表彰。³¹⁾

25) 《上海居留民团三十五周年纪念志》，第1235页。总力报国会成立于1942年1月17日，由日本驻沪总领事馆组织，以上海的10万日本人为核心，以统治当时在沪中国市民及各国侨民为目标。并统辖总领事馆、在沪日本居留民各团体、日本特务机关、商工会议所、海军武官府等各机构。

26) 《上海居留民团三十五周年纪念志》，第1235—1236页

27) 《上海居留民团三十五周年纪念志》，第1236页

28) 《上海居留民团三十五周年纪念志》，第1236—1237页

29) 《上海居留民团三十五周年纪念志》，第1237—1238页

30) 参见《上海居留民团三十五周年纪念志》，第1238—1239页

31) 参见《上海居留民团三十五周年纪念志》，第1239页。

20世纪初，随着上海日本居留民社会的发展，居留民妇女团体开始出现。它们在建立之初类型虽然还比较多样化，但其主要职能则集中于慈善捐助和为军队服务方面，已经出现单一和同化的趋势。而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各种类型的居留民妇女团体在上海居留民团这一接受外务省机构监督的“自治团体”的主导下，与“日本人各路联合会”这样的“草根法西斯”组织³²⁾互相结合，形成了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全面动员居留民社会的工具，其职能也完成转变成为日本侵华军事行动提供全面支援。上海日本居留民妇女团体的这一发展过程，从另一个角度为我们揭示了日本政府在侵华战争中对国民的全面统制，以及日本妇女在战争中与日本政府紧密站在一起这一事实，也从一个方面回答了近年来学者对女性与战争的关系这一主题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提出的一个问题：日本女性是不是在作为体制的受害者的同时也是体制的共谋？³³⁾

32) 参见高纲博文：《上海的日本人居留民》，第158—161页。

33) 秋山洋子、加纳实纪代编：《战争与性别——日本视角》，前言

附表1： 在沪日本居留民妇女团体概况

团体名称	成立时间	地点	类型
爱国妇人会	1905年前	不详	国家主义团体
妇人悬谈会	1915年	不详	普通社交团体
大和妇人会	1918年	不详	自由主义团体
上海妇人会	1909年前	不详	不详
上海樱枫会	1920年前	不详	不详
妇人矫风会	1923年前	不详	自由主义团体
西本愿寺附属佛教妇人会	1911年前	不详	宗教团体
中日公理教会妇人会	1921年前	不详	
长德院曹洞宗妇人会	不详	不详	
东本愿寺真宗妇人会	不详	武昌路三八〇号东本愿寺内	
净土宗华顶妇人会	不详	窦乐安路二七〇号净土宗知恩院内	
上海佛教妇人会	1908年	同上	
同朋青年妇人会	不详	武昌路乍浦路角	不详
上海护士会	不详	狄思威路八二号	同业协会
大和护士会	不详	吴淞路三三二弄三四号	
家政妇人会	不详	北四川路麦拿里三九号	
日本艺妓联	不详	不详	
上海时局妇人会	1938年	不详	

附表2： 上海时局妇人会组织结构

会长	总务长	总务	— 社会部（各部设正副部长及委员）
副会长	总务次长	十名	— 青年部
			— 服务部
			— 交际部
			— 粮食部 下属分会35个
			— 慰问部 各分会设有会长
			— 手工艺部 及副会长
			— 卫生部 下设干事班长
			— 会计部
			— 储蓄部
			— 会馆部
			— 记录部
			— 华道部

근대 상하이 일본 거류민 사회 속 여성단체

러민(復旦大)

〈목 차〉

1. 일본거류민인구의 성장과 여성 직업의 다양화
2. 일본여성운동과 거류민여성단체의 출현
3. 거류민여성단체 유형 및 직능의 전환
4. 상하이시국부인회와 일본의 중국침략전쟁

일본거류민은 근대 상하이해외교포 중 중요하고 특수한 단체로 일본이 서방문화를 흡수하는 데 있어 매개체가 되었을 뿐만 아니라 일본 대륙정책의 도구이기도 했다. 하지만 이러한 역사는 사람들에게 의해 오랫동안 의식적으로 잊혀지고 감추어져 온 것 같다. 1940년대 상하이역사에 관한 일본학자의 저작과 출판이 있긴 했지만 상하이 일본거류민이라는 사회단체에 관심을 많이 가진 적은 없었다. 세계식민국 대열로의 진입을 늦게 시작한 일본은 그 강권과 영향력이 1930년대 이전 아직 아시아를 벗어나지 못했기 때문에, 서방 사학자들의 눈에 상하이 일본거류민단체는 ‘침묵하는 일본인’이었다. 일본인을 침략자로 보는 중국에서 학자들의 시야 속에 드러난 적은 더더욱 없었다.¹⁾ 그런데 이러한 상황은 1980년대 후 다소 바뀌어 상하이일본거류민사회에 대한 심도 깊은 연구가 상하이역사, 식민주의역사 및 중일관계사의 중요 과제 중 하나가 되었으며, 당시 일본정부가 일본거류민의 이익을 보호하기 위해 세운 각종 자치기구 또한 학자들의 연구핵심이 되었다. 하지만, 이러한 자치단체의 중요구성부분이었던 여성단체에 대한 학자들의 논저가 많지 않아,²⁾ 이러한 여성단체의 수립과 발

1) 안커창安克상하이의작은 일: 외부와 격리된 커뮤니티上海的“小日本”:一個與外界隔離的社(1875-1945)》송웨즈熊月)등: 상하이의 외국인上海的(1842-1949)》상하이고적출판사上海古籍出版, 200년 참고

2) 다카즈나 히로후미(高綱博文)의상하이의 일본인거류민上海的日本人居留民)》송웨즈 등: 상하이의 외국인上海的人(1842-1949)》참에서 상하이일본거류민의 주요조직에 대한 연구가 이루어졌지만 여성단체문제에 대해서는 다루지 않았다. 천주언陳祖恩상하이 일본인교포사회생활사上海日僑社會生活史(1868-1945)》상하이사서출판사上海書出版社, 200에서는 상하이일본인교포의 기층구조와 커뮤니티에 대한 연구를 하였고(76-81, 109-13) 그 중 네 여성단체를 언급하였다. 즉, 대화부인회大和婦人會, 일본예기련(日本藝 및 히가시혼간지(東本願寺)가 설립한 부인간화회(婦人懇話會)와 고야산출장소(高野山出張所)가 연 부인회 등 두 여성종교단체이다.130, 140, 27-39, 366, 37쪽) 안커창의 《상하이의작은 일: 외부와 격리된 커뮤니티(1875-1945)》(송웨즈 등 편: 《상하이의 외국인(1842-1949)》)에서는여성긴급행동위원회(婦急行動委員會:Shanghai jikyoku fujinkai) 및 그 조직 및 주요활동을 언급하였다(187쪽). 미국학자 포겔(Fogel) 상하이거류민단체의 기원과 변천과정에 관한 정리를 하였고 또 상해거류민단체를 중국기타도시일본거류민단체와 비교하였다.Joshua A. Fogel,Shanghai-Japa: The Japanese Resident Association of Shanghai,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 Vol. 59, No. 4 (Nov., 2000), pp. 927-950참조. 일본여성단체 발전사의 핵심적인 역사적 단계인 전시 일본인여성단체에 대한 일본학자들의 성과물은 많지만 체계화되고 포괄적이며 심도깊은 연구는 아직 부족하다. 이 문제에 대한 일본학자들의 연구상황 및 중국학자의 연구에 있어 후평胡)의전시체제하의 일본

전과정, 그 활동에 대한 정리 및 성격연구는 상하이일본거류민사회의 생활사에 있어 빠져서는 안될 한 부분을 더욱 더 뚜렷이 드러낼 것이며, 근대아시아 사회역사에 있어 여성 역할의 변천에 대해서도 이해를 한층 도울 것임이 틀림없다.

1. 일본거류민인구의 성장과 여성 직업의 다양화

근대 중일외교관계는 1871년 9월 《중일수호조규(中日修好條規)》 체결에서 시작되었지만, 그 전에도 일본거류민이 상하이에 나타났다. 1987년 공부국(工部局)의 기록에 따르면 당시 일본거류민은 7명에 불과해 공공조계(公共租界)내 1,666명의 외국인 중 거의 없는 것이나 마찬가지였다.³⁾ 1905년 이전 일본거류민수의 성장은 매우 더디게 이루어져, ‘명치(明治) 원년에서 14,5년까지 상하이일본거류민수는 10명에서 100명으로 매년 평균 5,6명씩 늘어났다. 또, 어떤 시대를 막론하고 남녀성비는 대략 1:2였다.’⁴⁾ 1890년 일본거류민수는 644명까지 늘어났는데 남성거류민(339명)이 처음으로 여성(305명)을 넘어섰다. 1899년 말에는 일본거류민이 1,000명을 넘어섰다. 1904년 말에는 3,000명을 넘어섰는데 그 중 남성이 1,959명 여성이 1,080명이었다.⁵⁾ 러일전쟁 이후 방직업을 선두로 해 제분, 기계, 착유 등 일본자본이 상하이로 직접 유입되기 시작하면서 상하이 일본거류민 또한 급격히 늘어나게 되었다. 1914년 1차 세계대전 발발 이후 유럽국가가 중국에서 물러나고 일본자본이 상하이에서 급속히 활약하였으며, 1915년 상하이에 거주하는 일본인이 11,457명에 달해 영국인을 제치고 상하이 거주 외국인 중 1위를 차지하였다. 1920년 들어 상하이-나가사키 정기항로 개설에 따라 일본거류민이 지속적으로 늘어나 1926년에는 1만 명을 돌파하였다. 1927년 12월 말 조사에 따르면 상하이에 거주하는 일본인은 25,827명으로 상하이 총외국인 54,388명 중 47%를 차지하였다.⁶⁾

일본거류민인구의 증가에 따라 거류민사회의 구성 또한 갈수록 복잡화되었는데, 초기 상하이로 온 일본인 중 ‘남성은 대다수 잡화, 도기, 소형백화점의 상인이거나 상사 직원 및 관리였으며, 여성 중 열에 여섯·일곱은 외국인을 대상으로 하는 성매매에 종사하였다. ……그들은 상하이일본거류민의 선구자가 되었다.’⁷⁾ 그러다 20세기 초에

여성단체戰時體制下的日本婦女團1931-1945)》길림출판대학, 200에서는 일본체제하의 일본여성단체에 대한 비교적 포괄적이고 체계적인 해부가 이루어졌지만 전시일본여성단체의 해외지국에 대해서는 다루지 않았다. 중국학자 리우창웨이(劉晶)민족, 성별 및 계층 위만기기의왕도정民族、階——時期的“王道政治》사회과학문헌출판사, 2004는 위만주국 일본여성단체의 설립과 활동을 연구하였다

3) 요네자와 히데오(秀) : 《상하이사화上海史》 도쿄 우네비쇼보東京畝傍書), 쇼와(昭)17년, 93쪽

4) 상하이거류민단 창립 35주년 기념지 편찬위원회上海居留民立三十五周年纂委員 : 상하이거류민단 35주년 기념지上海居留民團三十五周年念》, 194년, 42쪽

5) 상하이신보上海, 1기, 다카즈나 히로후미(高綱博文) : 《상하이의 일본인거류민上海的日本人居留》(송웨즈熊月) 등 상하이의 외국인上海的的(1842-1949)》상하이고적출판사上海古籍出版, 200년 인용. 상하이거류민단 35주년 기념지上海居留民團三十五周年念》, 7,84-8쪽

6) 다카즈나 히로후미(高綱博文) : 《상하이의 일본인거류민(上海的日本人居留民)》 인용

와서는 일본인의 직업이 갈수록 다양화되었다. 1904년 1월 2일 일본거류민이 만든 《상하이신보(上海新報)》에는 《상하이재류일본인영업지침서(上海在留日本人營業指南)》을 기재하였는데 초기 상하이일본인의 종사업종을 잘 보여준다. 여기에서 상하이에 간호사, 산파 등의 직업에 종사하는 여성이 생겨났음을 알 수 있다.⁸⁾ 일본거류민사회의 끊임없는 확대에 따라 이러한 추세 또한 계속 발전하였다. 1928년 10월 말, 상하이일본영사관은 상하이일본인의 직업을 1차 조사하였는데, 그 결과 당시 10,228명의 여성 중 학예(學藝), 오락, 장식품제조업 종사자가 3명, 물품판매업은 73명, 날염세탁업 1명, 피복일용품제조업 53명, 물품임대보관업 3명, 회사직원·은행직원·상점원·사무원 94명, 여관식당임대유희연예업종사자 77명, 유희매춘 및 기타 628명, 이발목욕업 42명, 기타 상업종사자 6명, 우정전신전화업 3명, 종교인 2명, 교육업 22명, 의무업 224명, 신문잡지·문학예술·촬영업종사자 7명, 기타 자유직업종사자 11명, 기타 직업 146명, 가정부 542명, 직업신고를 하지 않는 기타 직종 749명으로 나타났다.⁹⁾ 여기에서 볼 때 1929년대까지 상하이일본거류민에서 유희매춘종사여성이 여성전체의 6%를 차지하는 것을 알 수 있다. 이는 다른 직업종사자의 약 1/5을 차지한다. 이는 일본거류민사회의 생활적 수요를 반영할 뿐만 아니라 20세기 초 일본국내 여성사상해방운동과 여성취업 움직임과 일치되는 것이다.

2. 일본여성운동과 거류민여성단체의 출현

20세기 초 서방 여성해방운동의 영향으로 일본국내에는 여성사상해방의 조류와 여성정치운동이 나타났으며, 일본기독교부인교풍회(日本基督教婦人矯風會), 신부인협회(新婦人協會), 부선희득동맹(婦選獲得同盟:여성참정권확보동맹), 여의회(女醫會), 지성회(至誠會), 처녀회(處女會), 대일본연합여자청년단(大日本聯合女子青年團), 우애회부인부(友愛會婦人部), 적란회(赤瀾會), 관동부인동맹(關東婦人同盟), 전국부인동맹(全國婦人同盟), 애국부인회(愛國婦人會) 등 일련의 여성단체가 세워졌다.¹⁰⁾ 이러한 추세에 발맞추어 상하이거류민사회에서도 유사한 여성조직이 나타나기 시작했다. 1905년 5월쯤 ‘애국부인회(愛國婦人會)’가 설립되었고, 1915년 11월 31일 히가시혼간지(東本願寺)가 발기하여 ‘부인간담회(婦人懇談會)’를 설립하였다. 1918년 10월 12일에는 타조에 유키에(田添幸枝)가 발기하여 ‘대화부인회(大和婦人會)’를 만들

7) 《상하이거류민단 35주년지(上海居留民團三十五周年志)》, 42쪽.

8) 천주언陳祖: 상하이일본교포사회생활사上海日僑社會生活1868-1945), 상하이사서출판사上海辭書出版), 2009년, 7-7쪽 참조

9) 다카즈나 히로후미高綱博文 : 상하이의 일본인거류민上海的日本人居留, 158-16쪽

10) 후평胡: 전시체제하의 일본여성단체戰時體制下的日本婦女團1931-1945)》지린대학출판사吉林大學出版), 2005년, 14-4쪽. 니시카와 유코西川祐: 총체전과 여성: 전쟁으로의 치우침과여들을 익찬하며總戰女性: 戰婦, 야키야마 요코秋山洋·카노 미키요(加納實紀代) : 전쟁과 젠더-일본시각—日, 사회과학문헌출판사出版), 2007년 참조

어 일본소학교에서 창립식을 가졌다. 이 시기에 나타난 여성단체로는 상하이부인회(上海婦人會), 교풍회(矯風會), 앵풍회(櫻楓會), 불교부인회(佛教婦人會) 등이 있다. 기록에 따르면, 1900년대 초에서 1920년대까지 상하이일본거류민사회에는 약 17개의 여성단체가 나타난바 있다.¹¹⁾

현재 당시 이러한 여성조직의 수와 규모를 엿볼 수 있는 충분한 사료가 존재하지는 않지만 이미 발견된 사료로부터 이러한 여성단체가 당시 거류민사회에서 비교적 큰 영향력을 가졌음을 알 수 있다. 예를 들어 1905년 6월 15일 오후 바즈로(靶子路) 자오즈화원(趙子花園) 안에서 열린 애국부인회(愛國婦人會)총회에 140명이 출석하였다. 이 회의가 열리기 전 애국부인회는 한 달로 안 되는 기간 동안 274명의 회원을 모집하였는데,¹²⁾ 당시 일본여성거류민이 총 1592명에 불과했다는 것을 볼 때 매우 큰 규모였다.

이 시기 성립된 여성단체는 주로 거류여성간의 교류를 조직하고 여성기예교육을 조직·향상시키는 것을 주된 활동으로 했다. 예를 들어 1915년에 조직된 ‘부인간담회(婦人懇談會)’는 설립 초기 ‘재류자국인의 친선교류와 도덕성 함양 및 여성기예의 향상’을 설립취지로 분명히 하였다. 또 ‘대화부인회(大和婦人會)’ 조직은 연구부, 사교부, 인사부 등을 두었으며, 매월 《상하이여성(上海婦女)》 잡지를 발행하여 일본여성, 중일여성교류 관련 문제를 저술하고, 여성사상해방과 관련한 강연회 등을 조직하였다. 1925년 2월 19일 새로 상하이로 건너온 이나조(稻造) 박사가 국제연맹사무국의 평화특사로 부임 도중 상하이에 들러 상하이부인회와 일중기독교청년회가 주최하는 강연회에 참석하여 연설을 하였다.¹³⁾

자선구조활동의 조직은 당시 거류민여성단체의 또 다른 핵심업무였다. 여성단체마다 각종 형식의 자선활동을 조직하였다. 예를 들어, 1920년 3월 13일 대화부인회는 일본소학교에서 실천궁행회(實踐躬行會)를 열어 유아들을 위한 간단한 의복을 제작하기도 했다. 1923년 9월 1일 일본에서 관동대지진이 발생하면서 화재와 쓰나미가 발생하여 9만 여명이 사망하였다. 대화부인회는 각종 구재의류 4,413점을 기부 받아 9월 16일 ‘키타노마루(北野丸)’호로 일본까지 운송하였다. 또 12월 1일에는 일본재해지역에 정월 떡을 보내기도 했다. 다른 일본여성단체들로 주야로 각종 의류를 기부 받았다. 상하이부인회는 구재자금과 모포 1천 여 점을 기부 받아 9월 10일 일본으로 보냈다.¹⁴⁾

이 시기 일본거류민여성단체의 자선구조대상으로는 상하이거류민사회의 일본인 및 국내대형재해지역의 일본민중 뿐만 아니라 중국민중도 포함되었다. 1920년 9월 중국 화북지역에 가뭄이 발생하자 상하이 각계에서 모두 자선구조활동을 펼쳤다. 당시 일

11) 첨부 표 참조. 상하이거류민단 35주년기념지《上海居留民團三十五周念志, 시마즈津四十》: 지나재류방인인명록 支那在留邦人人錄, 금풍사), 288-29쪽

12) 상하이거류민단 35주년기념지《上海居留民團三十五周念志》 12쪽

13) 상하이거류민단 35주년기념지《上海居留民團三十五周念志》 43쪽

14) 상하이거류민단 35주년기념지《上海居留民團三十五周念志》 41,42,41쪽

본거류민 또한 화북구재회(華北救災會)를 받기하여었는데, 10월 17일 일본예기련(日本藝妓聯)은 연예회(演藝會)를 열어 수익금1,000여 원을 중국재해지역¹⁵⁾에 기부하였다. 1921년 3월 26일 중국빈민구재를 위해 중일공리교회부인회 자선음악회(中日公理教會婦人會慈善音樂會)는 4,974.5불을 모금하였다. 12월 1일 대화부인회는 중국 고아교육 및 빈곤여성 무료분만을 위해 명성사(明星社)를 설립하고 경비 10만 원을 모금하였다.¹⁶⁾

일본여성간의 교류와 자선모금 활동조직 외에도 상하이일본거류민 여성단체는 또 다른 매우 중요한 활동을 하였는데, 바로 중일관계가 긴장되었을 때 일본거류민사회 자신(상하이 및 창사, 칭다오 등 중국 기타 도시의 일본거류민 포함) 및 재중일본인 부대를 후방 지원하는 것이었다. 1911년 10월 31일 니시혼간지(西本願寺) 부설 불교부인회는 한커우(漢口) 일본인교포를 보위하는 제3함대 및 의용대를 위해 위문품을 모으기도 했다. 1915년 위안스카이(袁世凱)와 일본정부가 《21조(二十一條)》를 체결한 후 중국 각지에서 반일움직임이 여러 차례 일어났다. 반일운동 속에서 일본거류민사회는 조직되기 시작해 자신들의 이익 보호를 도모하였는데 상하이일본거류민여성단체 또한 이에 참여하였다. 1920년 8월 2일 상하이부인회, 상하이앵풍회는 제일 해외과견함대에 위문품을 증정하였다. 1923년 6월 1일 창사(長沙)에서는 일본제품 불매운동이 일어났으며, 현지 중국학생과 일본해군해병대간의 충돌이 발생하여 학생 수 십 명이 사망하여 베이징 정부가 일본에 강력 항의하였다. 당시 상하이의 7개 여성단체, 즉 기독교부인회, 대화부인회, 상하이앵풍회, 교풍회, 불교부인회, 중일공리교회부인회, 상하이부인회가 연합하여 위문금을 모금해 창사의 일본거류민에게 전달하였다.¹⁷⁾ 거류민단체사회 속 여성단체의 연이은 설립과 활동은 거류민 사회중견조직이 해야 할 적극적인 역할을 발휘하였을 뿐만 아니라 일본정부의 국사침략활동에도 점차 참여하기 시작했음을 할 수 있다.

3. 거류민여성단체 유형 및 직능의 전환

일본 국내에서 20세기 초 일어난 여러 여성단체들은 대략 자유주의여성단체, 사회주의여성단체, 국가주의여성단체과 일반사교단체, 동종협회 및 종교여성단체 등의 유형으로 나눌 수 있다. 예를들어, 일본의 최초의 여성단체인 일본기독교여성교풍회(日本基督教婦人矯風會)는 자유주의여성단체로 ‘사회의 폐단과 부조리 교정, 도덕수양, 금주와 금연, 여성품위향상을 목적으로 하여, 여성노동자교육, 매출폐지운동, 여성참정운동 등 분야에 매우 주목하였으며 러일전쟁 발발 이후에도 당국의 정책활동에 협

15) 천주언祉: 상하이일본교포사회생활사(上海生活1868-1945)》, 14쪽

16) 상하이거류민단 35주년기념지(上海居留民團三十五周年志)》 38,39쪽

17) 상하이거류민단 35주년기념지(上海居留民團三十五周年志)》, 256、376、41

조하였다. 우애회부인회, 적관회, 관동부인동맹, 전국부인동맹은 사회주의여성단체에 속하는데, 사회주의홍보와 8시간 노동제 및 남녀임금평등 쟁취 및 여성참정권쟁취 등을 주요 활동으로 했다. 1901년에 설립된 애국부인회는 국가주의여성단체로 일본 최초의 체제내 관영여성단체로 처음에는 군사원조단체로 설립되었는데, 대륙출병노선을 주장하는 오쿠무라 이오코(奥村五百子)가 발기인으로 귀족원 의장 고노에 후미마루(近衛文麿)과 히가시후 시미노미야(東伏見宮)·간닌노미야(閑院宮) 등 황족, 귀족의 수공을 얻었다. 이 단체의 주요활동은 각지 강연회 개최와 전사자, 전쟁 중 병사자 가족, 질병 또는 부상으로 인해 장애군인 및 병약군인들을 원조하는 것이었다.¹⁸⁾

재외 거류민사회에서 여성조직의 유형은 국내의 그것과는 일정한 차이를 보인다. 사료의 제한성으로 인해 일부 여성단체의 구체적인 활동을 알 수는 없지만 현존하는 사료를 보면 1920년대 이전 설립된 거류민여성단체는 다음과 같은 몇 가지 유형이 있다는 것을 알 수 있다. 1) 일반사교단체, 2) 자유주의단체, 3) 국가주의단체, 4) 종교단체, 5) 동종협회이다.¹⁹⁾ 여기에서 거류민사회에는 당시 일본에서 상당히 활발하게 이루어지고 있었던 사회주의단체가 없었음을 볼 수 있는데 이는 일본재외거류민사회의 특성과 뚜렷한 관련이 있다. 일본국내에 일부 사회주의여성단체, 예를 들어 전국부인동맹은 직업여성, 농촌여성, 간호사 등을 조직화하려는데 힘썼지만, 사회주의여성단체의 주요회원은 역시 공장여공이었다. 또 해외거류민사회의 중하위층은 주로 소소유자(小所有者)로 구성되어 사회주의단체 존재의 기반이 부족하였다.

뿐만 아니라 거류민사회여성단체와 일본국내여성단체의 실제 직능상의 차이는 표면적인 차이보다 더 클 수도 있다. 일본국내 여러 유형의 여성단체는 그 주요활동과 직능에 있어 상당히 중첩되는 분야, 특히 여성사상해방과 여성참정권분야도 있지만 여전히 서로 상당히 큰 차이점을 가지고 있었다. 그런데, 앞서 말한 거류민여성단체의 주요 활동을 보면 당시 일본국내여성단체의 핵심업무였던 여성해방운동선전, 여성자신의 이익보호 등은 거류민여성단체의 충분한 관심을 받지 못했고, 국내여성단체의 최대 정치목표인 여성참정권쟁취운동은 해외거류민사회의 특수성으로 인해 자유주의 여성단체가 주목하는 대상이 근본적으로 되지 못했다. 이와 상대적으로 이런 거류민여성단체의 직능은 단순한 편이다. 그들은 거류민여성간의 사교무대 외에도 자선구조 활동을 펼치고 거류민단체와 외부관계가 긴장되었을 때 후방을 지원하는 것이 주요 직능이었다. 어떤 유형의 여성단체를 막론하고 모두 그러하였으며 서로 큰 동일성을 가졌다.

하지만, 거류민여성단체는 한 가지 문제에 있어서는 일본국내 여성단체와 완벽한 일치성을 보였다. 바로 중일 충돌이 계속 심화되자 전시체제를 지원하고 참여하여 시작하여 결국 다른 민간여성단체 모두 국가주의의 관영여성단체에 합병된 것이다.

18) 후평胡 : 전시체제하의 일본여성단체戰時體制下的日本婦女團(1931-1945) ,28-4쪽

19) 표1 참조

또, 그 직능 또한 중일관계가 안정적이었을 때에는 사교무대, 자선모금조직 및 후방 지원조직이었던 것에서 일본의 중국침략전쟁을 위해 봉사하는 조직으로 전환된 것이다. 아래에서는 ‘상하이시국부인회(上海時局婦人會)’를 예로 들어 중국침략전쟁 중 일본거류민여성단체를 살펴보기로 하겠다.

4. 상하이시국부인회와 일본의 중국침략전쟁

상하이시국부인회(上海時局婦人會)는 상하이일본거류민사회에서 가장 중요한 여성단체로, 중일전쟁시기 가장 활발했던 일본거류민여성단체이기도 하다. 상하이는 중국의 중요한 경제문화중심도시이며 일본침략세력이 가장 먼저 중국을 침략한 지역 중 하나이기도 하다. 20세기 초 이후 중국에서의 얻는 일본의 이익이 급증하게 되었는데, 세계자본주의국가중 해외투자에 있어 대중국투자비율이 가장 높은 국가였다. 이에 따라 일본의 대중국투자 중 상하이가 차지하는 역할도 갈수록 중요해졌다.²⁰⁾ 1931~1932년, 일본군이 ‘9·18 만주사변’과 ‘1·28 상하이사변’을 일으키는 동안 상하이의 일본거류민도 일본정부가 무력을 사용해 상하이거류일본인의 이익을 보호하도록 적극 촉구하였다. 중일전쟁이 전면화된 이후에도 일본군은 계속 상하이에서 도발을 하여, 8월 13일 대규모로 상하이를 침략하기 시작했다. 상하이거류일본인단체들은 ‘7·7 노고규사변’ 이후 회의를 개최해 긴급위원회를 조직, 시국에 대응하고자 했다. 또 상하이거류민은 상하이에서 대량 철수하여 한때 4900명만 남기도 했다.²¹⁾ 하지만 1937년 11월 중국군이 서쪽으로 철군한 후 상하이조계외 화계(華界)지구 및 일부조계가 전부 일본군들의 손에 넘어가자 일본이민 또한 상하이 귀환을 허가받았으며 새로운 이민자들도 대량으로 몰려왔다. 1938년 2월 5일 거류민단의 협조하에 종교단체 소속의 여러 부녀회 및 기타부녀회가 연합하여 상하이시국부인회를 설립하였다.

시국부인회는 조직적으로 상당히 엄밀하고 고효율적인 여성단체였다. 설립초기 선거를 통해 선출된 상임간사가 부인회의 일반사무 및 일본군인들을 위한 봉사를 책임졌다. 하지만, 일본교민의 귀국이 증가함에 따라 부인회의 내부연락이 어려움에 부딪혔다. 이 때문에 같은해 7월 열린 업무회의에서 조직방식을 개혁, 회장, 부회장 및 총무 약간 명을 두었으며, 13개 부(部)를 설립하여 분야별 사무를 각각 담당하고, 부마다 부장과 부부장을 두었다. 또 초나이카이(町内會)에는 분회를 두고 분회별로 분회장과 부분회장 및 간사 약간 명을 두었으며, 또 이웃에 사는 일본인 5명을 한 반(班)

20) 1930년대 초 영국의 해외투자비율 가운데 대중국투자가 가장 많았음에도 총금액의 5.9%밖에 되지 않았으며 미국은 1.3%에 불과했다. 하지만, 일본의 대중국투자는 해외투자총액의 81.9%를 차지했다. 특히, 1914년 이후에는 더욱 그러했는데, 1914년과 1930년, 일본의 중국주재인구 중 약 80%가 동북지역에, 7%가 상하이에 있었지만, 상하이주재 일본기업의 투자총액은 1914년의 7.8%에서 1930년에는 24.6%로 늘어났다. 레머(Remer : 외국인의 중국투) 상무인서관, 95년5353-35쪽 참조

21) 신보(申報, 1937년7월29일 ; 상하이거류민단 35주년기념지上海居留民團三十五周年志》 67쪽

으로 나누어 반별로 반장을 두었다. 부인회의 모든 업무계획은 먼저 총무회에서 검토를 거친 후 다시 각 부 부장 및 분회 회장에게 통보되어 실시되었다. 1938년 말, 부인회는 자금 5,000원을 모금하여 회관을 지었으며 이듬해 2월 5일 정식 완공하였다. 부인회는 총영사와 거류민단체장을 고문으로 초빙하고, 또 군 및 민간의 저명인사 몇 명을 자문위원으로 모셨다. 1942년까지 상하이시국부인회의 총회원수는 이미 1만을 넘어섰다. 22)

상하이거류민단의 보유하고 있는 사료를 통해 우리는 ‘시국부인회’가 일본정부가 거류민단체를 통해 상하이에서 국민총동원을 실시하여 중국을 침략한 일본군을 전폭 지원하는 데 있어 ‘시국부인회’가 도구가 되었음을 분명히 알 수 있다. 시국부인회에 설립된 13개 부 중, 복무부, 위문부, 위생부 등 8개 부가 특히 중요하다.

- 1) 복무부(服務部) : 중국침략일본군을 위한 휴식처 및 식당 제공이 주요 임무이다. 1938년 2월 8일을 시작으로 부인회는 홍커우(虹口) 시장에 군인휴식소를 설립하여 일본군을 접대하였으며, 휴식소 내에 차와 간식 및 신문잡지 등을 구비하였다. 후에 시장 내에 상점이 늘어나자 3월 5일 폐기된 베이쓰촨로(北四川路) 홍커우여관(虹口旅館) 안으로 이를 이전하고 샤워장과 이발소를 설치하고 유성기를 구비시켜 기능을 완비한 일본국휴식소가 되었다. 부인회 회원 4,5명이 심지어 12,3명이 매일 이곳에 나와 봉사를 했다. 이곳에서 휴식을 하는 일본군 또한 처음 매일 사오백명에서 천 명으로 늘어났다. 부인회의 여러 분회들도 사원(寺院)의 빈 방 등에 일본군 휴식소를 설치하고 떡과 차를 준비해 일본군을 접대하고 위문하였다. 명절이 돌아올때면 일본군인들에게 일본풍의 각종 간식을 제공하였다. 모든 휴양소는 일본군에게 같은 서비스를 제공하였다. 1939년 이후 경비고려차원에서 분회들이 공동으로 출자해 우송로(吳淞路) 군용트럭정차장에 공동휴양소를 설치하여 원래의 베이쓰촨로휴양소 및 일부 분회휴양소를 모아 10월 말 공식 서비스를 시작하였다. 1940년 1월 3일부터 공동휴양소와 치온인(智恩院) 베이쓰촨로(北四川路)·양수푸로(楊樹浦路)의 분회휴양소가 군인들에게 각종요리를 무료 제공하였으며, 후에 우송로휴양소는 또 일본군대의 요청으로 유료식당운영을 시작해 매일 이삼백명, 어떨때는 천 명이상의 군인이 이곳에서 점심을 이용하였다. 매년 정월에는 만 명 이상의 군인이 각 휴양소에서 각종 요리를 공짜로 즐겼다. 복무부는 1938년 7월 3일 이후 기차와 자동차운송 일본군의 접대업무도 책임졌다. 23)
2. 위문부(慰問部) : 주로 연예와 춤을 배운 적 있는 청년여성회원으로 구성되어 토요일과 일요일마다 상하이 및 부근의 각 부대에서 위문공연을 하였고 영화를 방

22) 상하이거류민단 35주년기념지《上海居留民團三十五周念志》 1231-123쪽. 시국부인회의조직구성은 표2참조. 상하이매일신문사 : 화중현세(華中現勢) 194, 127쪽 참조

23) 상하이거류민단 35주년기념지《上海居留民團三十五周念志》 1232-123쪽

영하는 경우도 있었다. 각 분회도 자체 문예공연을 열었으며 또 각종 위문품을 가지고 부대를 방문하였다. 1941년 3월부터 위분부는 중화대희원(中華大戲院)을 빌려 일반 위문공연을 하였으며 또 일반사회에 공개되는 공연을 열기도 해 그 수익금 일부를 일본군에 기부하고 일부는 위문자금으로 충당했다. 1942년 3월 위분부는 거류민단사회과와 협력하여 현장을 방문 출정·입대 및 전사자가족 등에게 연예위문대회를 진행하였다. 24)

3. 교제부(交際部) : 주요 임무는 신사참배 및 망령추모 통보 접수시 부장 및 각 분회대표가 참배의식에 참석하여 사병과 전사자의 망령을 위문하는 것과, 또 출정장병과 사병에게 일본 태양기를 보내는 것 등이다. 총력보국회(總力報國會) 설립 이후, 교제부는 총력보국회에 협조하여 일본국왕에게 충성을 맹세하며 절을 하는 대조봉대일 요배식(大詔奉戴日遙拜式)에 참가하였다. 25)
4. 위생부(衛生部) : 주로 일본군의 위생용품제작 및 방역작업진행 협조를 책임진다. 1938년 5월부터 20여명의 회원이 심곡(深谷)부대를 위한 2주간의 봉대제작을 진행하였다. 1938년 5~9월에는 매일 심곡부대와 흑전(黑田)부대를 위한 약봉지를 제작하였으며 육전병원의 방역작업을 도왔다. 매년 방역반을 위해 콜레라·장티푸스 등의 백신예방접종을 실시하고 각종서적을 출판하여 위생방역지식을 홍보하였다. 26)
5. 수예부(手藝部) : 주요 업무는 상하이 및 부근의 중국침략일본부대를 위한 군복수선 및 재활용면포로 총기청소용포를 만들어 군대에 제공하는 것이었다. 우한(武漢) 함락이후 수예부는 주름종이꽃 17,000여 송이를 만들어 승리를 경축하였다. 또 군병원을 위해서는 환자 위문용 종이꽃을 제작하였고, 배계 3,000개를 만들어 각 부대 병원에 보냈다. 부인회회관에서는 폐품을 이용한 부대위문용 인형만들기 강습회를 개설하기도 했다. 27)
6. 사회부(社會部) : 각종 경로를 통해 자금을 모집해 일본군대를 지원하였다. 1939년 6월부터 사회부는 중국인을 이용, 폐품을 회수하여 그 수익을 국방경비에 사용하였다. 1949년 2월까지 15,000여 원에 달했다. 그해 해군기념일 사회부는 군대에 기관총차 3개(‘시국부인회국보호’로 명명), 육전기관총1기 헌납의식을 거행하였다. 1941년 3월 10일 육군기념일에는 또 신병기 비용 2만여 원을 헌납하였다. 1939년 11월부터 사회부는 청년부, 수예부와 함께 집에서 잘 사용하지 않는 물품을 바꿔쓰는 행사를 열어 수익금으로 표충탑이 녹화비용 및 일본 군휴식소의 복무비, 위문금 및 신병기비용으로 사용, 이를 육군에게 헌납하였

24) 상하이거류민단 35주년기념지上海居留民團三十五周念志》 1234-123쪽

25) 상하이거류민단 35주년기념지上海居留民團三十五周念志》 123쪽. 총력보국회는 1942년 1월 17일 설립되었으며, 상하이주재인본총영사관이 조직하였다. 상하이의 10만 일본인이 핵심이 되어 당시 상하이중구시민과 각국 교민을 통치하는 것을 목표로 하였다. 또, 총영사관, 상하이일본거류민 각 단체, 일본특무기관, 상공회의소, 무관부 등 각 기관을 통할하였다

26) 상하이거류민단 35주년기념지上海居留民團三十五周念志》 1235-123쪽

27) 상하이거류민단 35주년기념지上海居留民團三十五周念志》 123쪽

다.²⁸⁾

7. 식량부(糧食部) : 복무부아 협력하여 상하이사변이후 일본휴양소, 식당 및 일본군 전선작전부대에 식량을 제공하고 또 경로회와 연예대회등 시국부인회 각종 행사 공연자를 위한 도시락 제공과 마닐라주재일본인들의 상하이체류기간 식품 제공을 주로 하였다.²⁹⁾
8. 저축부(儲蓄部) : 1940년 5월 이후 애국저축활동실시를 제창하여 저축금액이 97,110원에 달했다. 이 일은 1941년 가을 흥아원(興亞院) 화중연락부(華中聯絡部)의 표창을 받았다. 이 밖에 1938년 8월 13일, 즉 '8·13사변'1주년 기념일 육군이 모포기증운동을 실시하였는데, 1차로 저축부는 육군에 새 모포 및 헌 모초 1,161장을 제공하였고 2차로 순모모포 805장, 면담요 3,000장을 제공하였다. 저축부는 설립 이후 또 10차례의 가두자금모금을 진행하였다.³⁰⁾

시국부인회는 성립이후 일본의 중국침략군에 직접적인 서비스를 제공하여 식음료, 의복, 위문품 및 휴식처를 제공하였을 뿐만 아니라 일본군에 대량의 자금을 직간접적으로 제공하였다. 물질적으로 전쟁체제를 지원하였을 뿐만 아니라 아리나 군인을 격려하고 고무시켜 정신적으로도 전쟁체제를 지원해 실질적으로 일본의 중국침략전쟁의 중요한 보조기구가 되었다. 시국부인회는 이 때문에 여러 차례 일본해군대신, 외무대신 및 각 부대지휘관의 감사와 표창을 받았다.³¹⁾

20세기 초 상하이일본거류민사회의 발전에 따라 거류민여성단체가 나타나기 시작했다. 설립초기의 단체의 유형은 다양한 편이었지만 그 주요기능은 자선보금과 군인 지원에 집중되어 이미 단일화, 동일화되는 추세가 나타났다. 중일전쟁 발발이후 여러 유형별 거류민여성단체는 상하이거류민단이라는 외무성기관의 감독을 받는 '자치단체'의 주도하에 '일본인각로연합회(日本人各路聯合會)'와 같은 이러한 '풀뿌리(草根)파시스트'조직³²⁾과 서로 결합하여 일본의 중국침략전쟁시기 거류민사회를 전명동원하는 도구를 형성하였으며 그 기능또한 중국침략군사행동을 전면지휘하는 것으로 완전히 변화하였다. 상하이일본거류민여성단체의 이러한 발전 과정을 또 다른 각도에서 살펴보면 중국침략전쟁중 일본정부가 국민을 전면적으로 통제하였다는 것과 전쟁 중 일본여성이 일본정부와 아주 가까히 서 있었다는 사실을 우리에게 알려준다. 또 한편으로 여성과 전쟁과의 관계라는 주제에 대한 최근 학자들의 연구과정에서 제시되는 한가지 문제점, 즉 일본여성은 체제의 피해자인 동시에 또한 체제의 공모자가 아닌가?³³⁾라는 질문에 답을 한 것이다.

28) 상하이거류민단 35주년기념지《上海居留民團三十五周紀念志》1236-123쪽

29) 상하이거류민단 35주년기념지《上海居留民團三十五周紀念志》1237-123쪽

30) 상하이거류민단 35주년기념지《上海居留民團三十五周紀念志》1238-123쪽 참조

31) 상하이거류민단 35주년기념지《上海居留民團三十五周紀念志》123쪽 참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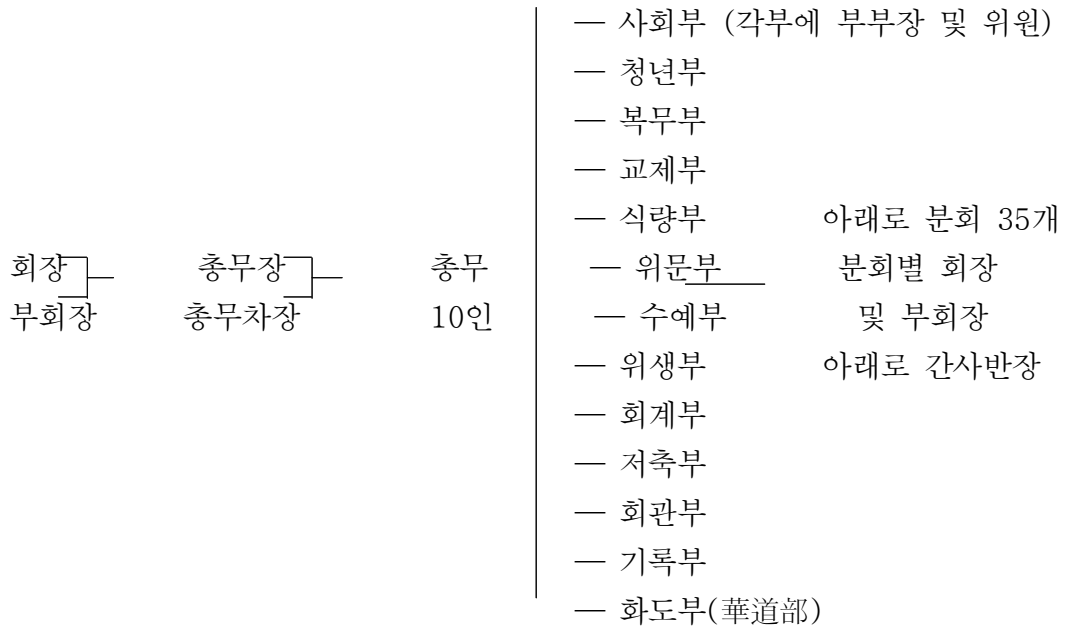
32) 다카즈나 히로후미高綱博文 : 상하이의 일본인거류민上海의日本人居留158-16쪽 참조

33) 야키야마 요코秋山洋·카노 미키요(加納實紀代) : 전쟁과 젠더-일본시각——日머릿

표1 : 상하이일본거류여성단체 개황

단체명	설립시기	지역	유형
애국부인회(愛國婦人會)	1905년전	불명	국가주의단체
부인간담회(婦人懇談會)	1915년	불명	일반사회단체
대화부인회(大和婦人會)	1918년	불명	자유주의단체
상하이부인회(上海婦人會)	1909년전	불명	불명
상하이앵풍회(上海櫻楓會)	1920년전	불명	불명
부인교풍회(婦人矯風會)	1923년전	불명	자유주의단체
니시혼간지부속불교부인회 (西本愿寺附属佛教婦人會)	1911년전	불명	종교단체
중일공리교회부인회 (中日公理教會婦人會)	1921년전	불명	
장덕원조동종부인회 (長德院曹洞宗婦人會)	불명	불명	
히가시혼간지진종부인회 (東本愿寺真宗婦人會)	불명	우창로 360호 히사시혼간지내(武昌路三八〇號東本愿寺内)	
정토봉화정부인회 (淨土宗華頂婦人會)	불명	더우러안로 270호 정토종지은사내(突樂安路二七〇號淨土宗知恩院内)	
상하이불교부인회 (上海佛教婦人會)	1908년	상동	
동봉청년부인회 (同朋青年婦人會)	불명	우창로 조프르(武昌路乍浦路角)	불명
상하이간호사회(上海護士會)	불명	덱스웰로 82호(狄思威路八二號)	동종협회
대화간호사회(大和護士會)	불명	우송로 332농34호(吳淞路三三二弄三四號)	
가정부인회(家政婦人會)	불명	베이쓰촨로마이나라리39호(北四川路麥拿里三九號)	
일본예기련(日本藝妓聯)	불명	불명	
상하이시국부인회(上海時局婦人會)	1938년	불명	국가주의단체

표2 : 상하이시국부인회 조직구성



兩岸和諧時代, 臺灣의 正體性과
東아시아

■ 白池雲 (仁荷大) ■

양안화해시대, 대만의 정체성과 동아시아

백지운 (仁荷大)

〈목 차〉

1. 일본거류민인구의 성장과 여성 직업의 다양화
2. 일본여성운동과 거류민여성단체의 출현
3. 거류민여성단체 유형 및 직능의 전환
4. 상하이시국부인회와 일본의 중국침략전쟁

1. 대만에 동아시아가 있는가

한국의 중국사학자 백영서는 일찍이 “중국에 아시아가 있는가”를 물은 적이 있다. 20세기 초 문명론이나 지역연대론의 축으로 다양한 ‘아시아’론이 제출되었음에도 결국 중국이라는 국민국가로 환원되어버리는 과정을 비판한 그의 글¹⁾은, 단지 역사 분석을 넘어 오늘날 여전히 동아시아적 사고가 결여되어 있는 중국 지식계에 대한 질타의 뉘앙스를 담고 있다. 그런데 같은 질문을 대만에 대해서도 해 볼 수 있다. 대만 학자 장 쿨장(張崑將)은 대만 지식계에 오랫동안 동아시아적 사유가 부재해온 원인을 중국이라는 ‘수퍼 타자’의 존재에서 찾았다. 그는 서구와 대만 사회에 퍼져있는 ‘중국위협론’을 단순논리라 비판하면서, 민진당의 탈중국화 정책에도 불구하고 많은 대만 사람들이 자신을 중국인이자 대만인이라는 이중 정체성을 받아들이고 있음에 주목한다. 중국에 대한 ‘동일시’와 ‘두려움’이라는 양자가 오늘날 대만 사람들의 이율배반적 중국의식을 이루고 있으며, 그것이 대만 사회에 동아시아와 중국 담론을 출현을 원천적으로 봉쇄하고 있다는 것이다.²⁾

한편, 형식적으로 국민국가의 자격도 제대로 갖추지 못하면서 동아시아를 거론하는 것은 사치라고 하면서도, 다른 한편으로는 중국과는 또다른 형태의 제국의 중심을 꿈꾸는 상상들이 대만 학계에 비등하는 현황은,³⁾ 주변/중심 콤플렉스가 혼재하는 대만의 이중성을 여실히 보여준다. 대만 역사학계에 심심치 않게 등장하는 ‘해양입국론’이나 ‘同心圓史觀’ 등이 복제하는 제국상상에 대해, 대만학자 천 광성(陳光興)은 “舊(서구 혹은 일본) 제국주의적 문화상상을 모방한 ‘下位’ 제국주의”이자 동시에 대만 國族主義라고 해석한 바 있다.⁴⁾ 그러나 다른 한편 생각해보면, 이는 단순히 서구나 일본

1) 白永瑞, 「중국에 ‘아시아’가 있는가?: 한국인의 시각」 『동아시아의 귀환』 창비, 2000.

2) 張崑將, 「如何從臺灣思考東亞」 『思想』 3호, 2006, 181-201면.

3) 백영서, 「대만에게 동아시아론은 사치?」 瑞南通信, 2007.9.27

4) 陳光興/백지운 외 역, 『제국의 눈』 창비, 2003, 35-110면.

제국주의에 대한 모방만은 아니다. 이를 태면, 1990년대 본토주의자들에 의해 제출된 ‘南進담론’은 자신을 중심에 두고 세계를 보는 ‘중화’적 세계인식의 대만 버전이라 할 수 있다. 그런 점에서, 대만의 민족주의는 중국의 억압적 대국주의에 대한 저항 혹은 부정이기도 하지만, 동시에 그것의 모방이자 연속인 측면도 간과할 수 없다. 대만에서 동아시아적 사고가 원천적으로 부재하는 이유는, 이처럼 중국이라는 ‘수퍼 타자/자아’와의 관계 속에서 자신의 정체성을 규정하는 이원론적 사유틀에 있다고 할 수 있다.

2. 대만의 딜레마, 동아시아

요 몇 년 동아시아가 대만 학계의 담론 속에 환기되는 것은 주목할 만한 현상이다. “이탈한 지 오래인 ‘동아시아’의 궤도로 되돌아가 ‘동아시아’의 존재를 새롭게 발견함으로써, 동아시아로 하여금 대만의 존재를 발견”(張, 196)하게 하자는 장 쿤장의 주장에서 보이듯, 국제사회에서 오랜 고립에 대한 불안감이 결국은 동아시아를 대만에 불러들이게 된 것이다. 그런데 대만이 동아시아와 ‘접속’하기 위해서는, 먼저 중국과의 관계를 어떤 식으로든 정리하지 않으면 안 된다. 오랜 적대관계 속에 있던 중국을 어떤 방식으로든 자기 안으로 받아들이지 않고 곧바로 동아시아와 접속할 수는 없기 때문이다. 그 대표적인 예가 문학연구 영역에서 발견된다. 대만문학 연구의 원로이자 臺獨派의 대표였던 천 광밍(陳芳明)은 최근 어느 글에서 대만문학연구가 직면해야 할 중요한 과제로서 ‘중국공포증(sinophobia)’과 ‘외국공포증(xenophobia)’의 극복을 제기했다. 그에 따르면 ‘중국공포증’은 지난 몇 십 년간의 “과도한 본토화”에서 비롯된 것이고 ‘외국공포증’은 自文化에 대한 자신감의 상실에서 연원한다.⁵⁾ 1990년대 후반까지도 천 광밍은 1945년에서 1987년까지는 중국(국민당)에 의한 제2의 식민기간으로 규정했었다. 지난 100년간 일본 제국주의와 중국 제국주의에 의해 잃어버린 언어와 기억을 회복하는 것이 대만 포스트콜로니얼의 주요 과제로 주장함으로써, 대만 민족주의의 이론적 기반을 마련했던 것이다.⁶⁾ 그런 그가 최근 어느 글에서, 중국(현대)문학을 대만문학의 유산을 받아들이자며 사고의 전환을 보여주었다.

魯迅 외에도 나는 ‘中國新文學’에 관한 대만문학의 연구를 통해 대만문단이 어떻게 郁達夫, 沈從文, 徐志摩 나아가 梁實秋를 흡수했는지를 기쁘게 보고 있다. 한 작가의 문학생애를 관찰하는 데는 전체적 맥락이 바탕이 되어야지 임의로 잘라내어 고립시

5) 陳芳明, 「東亞作爲一種方法」, 『臺灣文學的東亞思考』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2007, 12면.

6) Fang-ming Chen, 'The problems of constructing Taiwan's postcolonial discourse' paper delivered in Writing Taiwan Conference, Columbia University, 30 April-3 May 1998, Ping-hui Liao, "Postcolonial studies in Taiwan: issues in critical debates," *Postcolonial Studies*, vol2, no.2, 1999 pp.206-207에서 재인용.

켜서는 안 된다. (중략) 우리는 중국을 제대로 정시해야 할 때에 이르렀다. 우리에게 자기문화에 대한 자신감이 있다면 배척할 필요가 없다.⁷⁾

바로 이 지점에서 천 광밍은 ‘동아시아적 시각’의 중요성을 제기한다. 대만문학이 중국신문학을 배제했던 심리 저변에는 대만(문학)이 어디에 속하느냐라는 정체성 시비가 작용하고 있었다. 그런데 “동아시아라는 시야에서 대만문학을 보게 되면 이처럼 ‘대만문학이 어느 신성한 영역의 일부인가’라는 소속문제를 근심하지 않아도 되”(陳, 13)는 것이다. 여기서 동아시아는 “동아시아 및 서구 식민사의 재인식”(14)이라는 큰 틀에서 대만문학의 위치를 가늠케 하는 중요한 방법이다.

그런데 천 광밍이 대만문학에 동아시아적 시야를 끌어오는 근본적인 동기에 대해 생각해 보면, 역시 앞서의 장 쿤장이 그렇듯 고립에 대한 불안감이 작용하고 있음을 알 수 있다. 국제사회에서 대만문학에 대한 관심이 제한되어 있고 “아무도 우리와 대화하지 않는” 상황에서 “자기만족적인 학문” 연구에 안주할 수 없기 때문이다.⁸⁾ 말하자면, 대만문학이 세계문학에서 자기의 위치를 얻기 위해서는 우선 고립의 상태에서 벗어나야 하고 그러기 위해서는 중국문학과 대화하지 않을 수 없는 상황에서, 동아시아라는 범주의 필요성이 제기된 것이다.

대만의 동아시아로의 회귀는 매우 복잡한 역사적 문화적 의미를 지닌다. 1946년, 중국과 일본 어디에도 귀속되지 못한 채 일본과 대륙 등지를 떠돌다 결국 광인이 되고마는 대만 청년 후 타이밍(胡太明)의 삶을 그린 우 쥬류(吳濁流)의 『아시아의 고아』 이래, ‘고아의식’은 대만의 실존적 위기를 대표하는 용어가 되어왔다. 지난 수십 년 동안 극성을 부렸던 대만민족주의는 뒤집어보면 이 고아의식의 또다른 발현에 다름아니다. 이를 극복하기 위해서는 먼저 중국과의 관계를 정립하지 않으면 안 되는데, 바로 이러한 세를 타고 오랫동안 부재했던 동아시아가 대만 지식담론에 개입하게 된 것이다. 그런 점에서, 대만에서 동아시아는 중국 담론과 떼려야 뗄 수 없이 긴밀하게 연결되어 있다.

3. 민족, 포스트국족, ‘중국인’

양안문제와 동아시아가 긴밀히 연결되어 있는 이러한 특성으로 인해 대만 지식담론에 동아시아의 출현은 이중적 의미를 지닌다. 즉, 그것은 지역의 평화공존이라는 큰 틀로부터 국내의 폐쇄적이고 소모적인 민족갈등을 해결하게 하는 긍정적 효과를 기대하게 하는 반면, 양안관계에 제한되어 동아시아 지역을 고르게 보는 균형감각을 결핍 우려를 안고 있다. 그러나 통/독 양 진영 간의 정치싸움이 거의 사회 전체를 양

7) 陳芳明, 앞의 글, 13면.

8) 陳芳明, 같은 글, 9면.

분하고 있는 대만으로서의 양안문제 해결의 돌파구를 마련하는 것이 무엇보다 시급하다. 양안문제를 편협한 민족주의 논쟁으로 떨어지지 않는 생산적 토론으로 끌어올리기 위해서는, 양안이라는 양자관계를 넘어서는 사고틀이 필요하다. 동아시아적 시야가 중요해지는 것은 이런 맥락에서다.

그런 면에서 주목할 만한 시도가 올해 대만 지식계에 있었다. ‘대만사회연구’ 창립 20주년 기념호에 한국 학자 白樂晴의 ‘分斷體制論’을 양안체제에 접목하는 시험적 논문들을 담은 ‘초극분단체제론’ 특집이 기획된 것이다. 1990년대 초반에 제출된 백낙청의 분단체제론은 한반도의 분단을 근대 세계체제의 일환으로 보되 “특정한 시기와 동아시아라는 특정 지역에 자리잡은 독특한 下位體制”⁹⁾로서 인식하기 위한 방법론적 개념이다. 한국의 사회운동 담론에서 그의 분단체제론은 두 가지 점에서 의미를 띠는데, 하나는 민족통일과 민주변혁이 사실상 하나의 과제라는 인식을 제시했다는 점이고, 다른 하나는 분단체제의 극복을 한반도 내부의 과제가 아닌 근대 자본주의체제를 극복하는, 세계사적 의미를 띤 운동의 일환으로 보는 인식을 제시했다는 것이다.

물론 한반도의 분단과 양안의 분단을 동일선상에 두고 비교하기는 어렵다. 그럼에도 분단을 안으로는 사회의 민주 발전을 제약하고 밖으로는 근대 자본주의세계 체제를 유지, 강화하는 하나의 ‘시스템’으로 보는 이러한 관점은, 중국과의 오랜 對峙 상황에서 사회 분열이 가속화된 대만의 난국을 돌파하는 유용한 방법론이 될 수 있다는 것이 그들이 문제의식이다. 이 특집의 기획자 천 광성이 가장 답답해하는 대만사회의 고질적인 병폐는 정치담론과 민간담론이 좀처럼 구별되지 않는다는 데 있다. 필경 국민당과 민진당 간의 ‘黨爭’에 불과한 성적논쟁에 지식계를 포함한 대만 사회 전체가 휘말림으로써, 정치담론으로부터 자율적인 민간담론의 공간이 좀처럼 열리지 않는다는 것이다.¹⁰⁾ 그런 점에서 분단극복의 과제를 국가간의 문제로 한정하기보다 민중의 일상적 차원의 변혁운동으로 끌어올리는 ‘분단체제론’의 시각은, 양안문제를 협소한 국가주의 혹은 민족주의 논쟁에서 벗어나 대만사회의 민주변혁과 나아가 동아시아 지역 평화를 위한 운동으로 인식하게 하는 중대한 계기를 마련해 주었다고 할 수 있다.

문제는 대만에서 ‘분단체제’ 극복의 議題가 중국과의 통일이라는 가장 민감한 정치적 이슈를 건드리고 있다는 것이다. 따라서, 어떻게 하면 “분단체제의 분석과 초극의 토론이 양안문제에서 필연적으로 통일을 지향하지 않을 수 있는가” 라는 것이 과제로 떠오른다. 이에 대해 천 광성은 “統獨의 문제를 고립시키기보다 사회 민주와 제국주의 및 자본주의의 극복이라는 맥락에 두었을 때 더 큰 시야를 확보할 수 있다”고 말한다. 통일이냐 독립이냐를 궁극적 목적으로 둘 것이 아니라, 대만 사회의 자주와 탈제국, 자본주의 착취의 해소로 가는 하나의 과정으로 보자는 것이다(陳, 36-37). 양안체제에 관한 토론이 협소한 민족주의 담론에 갇히지 않기 위해서는 대만-중국의

9) 백낙청, 「분단체제의 인식을 위하여」(1992) 『분단체제 변혁의 공부길』 17-18면.

10) 陳光興, 「白樂晴의‘超克“分斷體制”論」 『臺灣社會研究季刊』 74, 2009.6, 6면.

이원관계를 넘어 근대세계체제에 대한 저항운동이라는 거시적 시야를 필요로 한다는 것은 분명하다. 그러나 중국의 문제를 건너뛰고 곧바로 대만과 세계를 직결시킨다면 그 또한 추상화의 오류를 범하기 어렵다. 여기에 양안문제에 관한 중대한 딜레마가 발생한다. 소모적인 민족 논쟁으로 빠지지 않기 위해서는 중국-대만의 이원관계를 넘어서야 하지만, 그럼에도 불구하고 중국과의 관계를 직시하지 않고서는 구체적인 토론에 진입할 수 없으며, 이 경우 다시 논의가 중국-대만의 이원관계 속으로 빠져들 위험이 발생하기 때문이다.

이 대목에서 천 광싱이 양안문제의 가장 민감한 주제인 ‘민족’에 穿鑿하는 데 주목할 필요가 있다. 그는 양안문제가 지닌 딜레마의 가장 심층으로 돌입하고 있는 것이다. 백낙청에게 “분단체제 극복 주제인 민중은 지역 역사의 속성을 띤 것이며 이 점에서 필연적으로 ‘민족문제’로 연결된다”(陳, 38)고 말함으로써, 천 광싱은 민족문제가 분단문제와 직결되어 있음에 착목한다. 특히, 백낙청의 민족 개념에 들어있는 “제3세계와의 강렬한 연대의식”에 주목하면서(陳, 17), 천 광싱은 ‘중국인’이라는 민족 개념을 새롭게 재구성할 것을 제안한다.

국민당의 중국민족주의와 민진당의 대만민족주의로 인해 재난을 겪은 대만사회에 민족을 다시 불러들인다는 것은 분명 위험한 시도이다. 그러나 천 광싱은 ‘민족’에 대한 정서적 거부감으로 “역사를 상실한 주체”가 되어버린 오늘날 대만의 현실을 타개하기 위해서는, “그것이 저야할 이후의 부정적 효과를 충분히 認知”하더라도 “민족이 존재해온 역사적 필요성”을 환기함으로써 “중국인이라는 역사의 縱深을 지닌 포스트국족의 주체위치를 되찾아야 한다”고 주장한다(陳, 39). 말하자면 그는 ‘민족’을 양안관계라는 常套에 갇히지 않고 제3세계와의 횡적 연대를 담지하는 개념으로, 동아시아적 틀에서 재구축하는 방법을 구상하고 있었던 것이다. 바로 이 대목에서 이 글뿐 아니라 이 기획 전체를 관통하는 가장 논쟁적인 주제인 “중국인을 문제화하자(將中國人問題化)”(陳, 39)는 제안이 제출된다.

대만의 일그러진 주체의식을 바로잡기 위해서는 “대만인을 중국인이라는 정체성 바깥으로 배제하는” “반역사적”(陳, 40) 오류를 극복해야 한다는 이 제안은, 중국이라는 타자의 상을 통해 자아정체성을 구축해 온 대만의 정체성에 대한 반성일 뿐 아니라, 양안 민중간의 교류의 역사를 되찾아 담보상태에 놓인 양안문제를 전향적으로 돌파할 입각점을 모색하게 해 준다는 점에서 의미있는 것이다. 그럼에도 불구하고, “중국인을 문제화하자”는 의제는 양안문제가 중국-대만의 이원론을 초월하려 하면서도 결국은 그 내면으로 빠져들고 마는 딜레마의 아찔한 경계선상 위에 놓여 있다. 여기서 주목할 것은, “민족주의와 국제주의의 결합”이라는 제3세계론의 핵심을 바탕으로 하는 백낙청의 민족문학론¹¹⁾으로부터 출발하고 있음에도(陳, 110-117), 결국은 논의가 “중국인”의 문제로 귀결되고 마는 현상이다. 민족주의와 국제주의의 공존이라는

11) 백낙청, 같은 글, 171면

“일견 모순에 찬 입장”¹²⁾으로서 민족문학론의 이중성을, “포스트국족”으로서의 “중국인” 개념이 충분히 체현해낼 수 있을까. 바꿔 말하면 백낙청의 ‘민족’ 개념이 포괄하는 국제성(제3세계성)과 민중성, 그리고 보편성을 ‘중국인’ 개념이 어떻게 담보해낼 수 있을까.

중국과의 관계 속에서 대만의 정체성을 다시 보자는 천 광성의 문제제기는 다른 세 편의 주제 논문에서도 대체로 일관되게 전개되었다. 취 완원(瞿宛文)은 대만사회에 널리 유포되어있는 일본의 식민지근대화론을 비판하면서, 대만이 전후 기적적인 경제 발전을 이룩할 수 있었던 데에는 20세기 중화민족주의가 결정적인 역할을 했다고 주장했다. 개발도상국의 경우 경제발전에는 ‘발전의 의지’가 중요한 축을 이룬다는 이론적 전제 하에, 그는 중국과의 경쟁체제를 대만 경제발전의 강력한 동력으로 보았다. 이러한 분석은 대만의 경제를 중국을 포함한 하나의 “경제공동체”의 관점에서 보아야 한다는 결론으로 이어진다.¹³⁾ 한편, 역사문화 분야에서 정 홍성(鄭鴻生)은 ‘대만인’이라는 정체성의 허위성을 주장했다.¹⁴⁾ 대만민족주의의 표상인 閩南語가 사실 普通話보다 더 중국의 古言語적 성격을 잘 보존하고 있다는 것이나 중국인이 수 천 년간 大混血의 과정을 겪어온 역사 들을 미시적으로 분석해나가면서, 그는 ‘중국인’이라는 개념 자체가 雜種의이고 非實體의인 개념으로서 오늘날 대륙이 ‘중국’의 대표성을 독점하는 상황은 친미반공의 분단체제가 만들어낸 근대적 산물에 불과하다고 말한다(鄭, 116-128).

분단 이래 중국을 적대시함으로써 구축해온 대만인 정체성을 비판적으로 해체하는 이 같은 작업은 분명 의미있고 또 필요한 것이다. 그런데 여기서 생각해 볼 문제는 대만인 정체성을 해체하는 작업이 필경 중국과의 관계 속에서 진행되어야 하되 현실 중국을 피해가야 하는 상황에서, 결국은 ‘중국’ 혹은 ‘중국인’이라는 한층 더 추상적인 정체성 관념으로 귀착되고 마는 것 아닌가 하는 것이다. 이를 테면, 대만인이라는 허위적 정체성을 해체하는 정 홍성의 논리는 결과적으로 ‘우리(대만)도 중국인이다’라는 것으로 귀결하고 만다. 물론 이 때의 중국인이 현재 대륙에 살고 있는 14억 인민을 지시하는 것은 아니다. 정 홍성의 말을 빌자면 그것은 누구에 의해서도 “독점되지 않는” “개방적이고 미래지향적인 중국인 정체성”이며(鄭, 132-133), 더 구체적으로는 “19세기 중국의 근대화민족운동 중 산생한 새로운 명칭”인 “중화민족”이다(鄭, 136). 결국, 정 홍성이 제시한 “개방적 중국인”이란 단일민족의 상상을 극복한 잡종성, 즉, 20세기 초반에 孫文이 제시했던 五族共和의 현대적 버전에 近似한 것이다.

자오 강(趙剛)이 제기한 “방법론으로서의 중국인”이나 닝 잉빈(寧應斌)의 “역사문화로서의 중국” 개념도 마찬가지다. 물론 이 개념들이 단순히 전통회귀를 의미하는 것은 아니다. 그러나 “중화민국’과 ‘중화인민공화국’이라는 험애한 정치 대립과 역사 단절

12) 백낙청, 같은 글, 170면

13) 瞿宛文, 「臺灣經濟奇蹟的中國背景」 『臺灣社會研究季刊』 74기, 2009, 53-54, 83-90면 참조.

14) 鄭鴻生, 「臺灣人如何再作中國人」 『臺灣社會研究季刊』 74기, 2009.

하의 정체성을 초월하여 분단체제보다 더 높고 크고 빛나는 정정당당한 중국인 정체성”을 만들자는 주장¹⁵⁾이나, “정치로서의 중국이라는 민족주의로부터 역사문화로서의 중국/중국인 담론을 구출하는 것이 분단체제 극복을 위한 방법”¹⁶⁾이라는 이들의 주장에 대해서는 앞서 정 홍성의 “개방적 중국인” 개념과 더불어, 그 필요성과 당위성은 충분히 인정하더라도, 그것이 천 광성이 제출한 ‘포스트국족’의 의미를 충분히 담을 수 있을까 하는 의문이 여전히 남는 것이다.

무엇보다 문제삼아야 할 점은 이들이 말하는 ‘중국인’ 개념의 추상성이다. 분단체제 극복의 토론이 양안간의 통일로 직결되는 것을 피해야 하는(陳, 36) 대만의 담론 환경을 고려할 때, 이들이 말하는 ‘중국인’이 현재 대륙에 살고 있는 구체적 실체로서의 중국인이 되지 못하는 상황은 이해할 수 있는 일이다. 그렇다 하더라도 실체로서의 중국인을 논의의 磁場 밖으로 배제한다면 그들이 애초에 비판했던 정체성 담론의 허위성을 정면으로 돌파할 수 없다. 말하자면, 이들이 말하는 “개방적”, “방법적”, “역사문화적” ‘중국인’ 개념이 대만 정체성을 해체하는 데는 효과적일 수 있지만, 막상 그것을 해체하고 나면 또다른 수퍼-정체성 안에 다시 갇혀버리는 딜레마로부터 어떻게 벗어날 수 있을까. 더 중요한 문제는 이러한 ‘중국인’ 개념이, 그들의 의도와 무관하게 대륙의 관방담론 안으로 흡수될 수 있다는 데 있다. 토론자 리 상런(李尙仁)의 날카로운 지적처럼 “전통으로부터 자원을 끌어와 느슨한 정체성 개념으로 분단체제 극복의 주체를 구축하려 한다면, 제국으로부터 국민국가로 변신해온 중국의 역사적 과정을 재차 고구해야 한다.”¹⁷⁾ 국민국가와 제국의 성격이 복잡하게 공존하는 대륙의 정치적 문화적 실체를 구체적 토론 대상으로 삼지 않은 채 ‘중국인’으로서의 정체성의 회복에 논의를 집중한다면, 그것은 현재 중국 관방의 소수민족이나 대만에 대한 입장과 근본적인 차별성을 얻기 힘들다. 분단체제 극복이 곧 통일을 의미한다는 오해를 피하기 위해 애써 현실중국을 배제한 것이 결과적으로, 의도와 정 반대로, ‘國共和解’라는 대륙의 통일담론으로 흡수되어버릴 수도 있는 것이다. 따라서 대만민족주의와 함께 중국의 제국적 국가주의 담론을 동시에 견제하는 균형 감각이 절실하게 요구된다.

“양안문제 분석에서의 비대칭성”(李, 254)은 여러 가지 면에서 되새겨야 할 문제다. ‘방법론으로서의 중국인’ 틀로 대만민족주의를 비판한다면 역으로 ‘방법론으로서의 대만인’으로 중국의 국가-제국주의를 비판할 수 있어야 한다. 그러기 위해서는 대만 사회의 모순의 원인을 ‘냉전의 잔재’나 ‘親美反中’에서만 찾을 것이 아니라(李, 255), 중국 정부가 정치, 경제 각층에서 대만에 가해온 압력과 위협도 함께 문제삼아야 한다. 여기에 더 나아가, 개혁개방 이후 중국사회의 정치·문화에 대해 대만의 지식계가 더 적극적인 개입을 해 나갈 필요가 있다. 왕 샤오밍(王曉明)은 최근 중국사

15) 趙剛, 「以‘方法論中國人’超克分斷體制」『臺灣社會研究季刊』74기, 2009, 150면.

16) 寧應斌, 「中國人如何再作中國人」『臺灣社會研究季刊』74기, 2009, 227면.

17) 李尙仁, 「回應臺社同仁的分斷體制論」『臺灣社會研究季刊』74기, 2009, 254면.

회에 개인주의와 애국주의가 동시에 강화되는 기이한 현상에 대해, 사회주의 30년의 공과에 대한 반성적 사고의 결락을 심각한 원인으로 지적했다.¹⁸⁾ 마오시대 사회주의 기획에 대한 반성을 통해 오늘날 중국의 국가주의를 상대화하는 작업은 분단체제의 극복과 결코 무관하지 않으며, 따라서 전적으로 대륙 지식인들만의 몫은 아닌 것이다.

이 모든 문제의 근본적 원인은 타이셔(‘臺社’) 논자들의 분단체제 극복의 토론에 (천 광싱을 제외하고는) 동아시아가 좀처럼 발견되지 않는 데 있다. 분단체제의 분석을 위해서는 천 광싱의 말처럼 필경 “중국을 문제화”해야 한다. 그러나 ‘중국을 문제화’하는 과정에 제3세계나 동아시아 같은 매개가 개입되지 않는다면, 논의는 마치 피비우스의 띠처럼 중국-대만의 이원론을 끝내 벗어나지 못한다. 그리고 이 이원론은, 중국을 타자화함으로써 구축된 대만의 자아정체성을 비판적으로 해체하는 작업이 (현실중국에 대한 발언이 배제됨으로 인해) 결과적으로 ‘중국인’이라는 수퍼-자아로 귀착하고 만다는 점에서, 본질적으로 일원론이다. 이러한 딜레마에 빠지지 않기 위해서는, ‘포스트국족’으로서의 ‘중국인’이 一國的, 혹은 兩國的 관계에서가 아니라, 제3세계 혹은 동아시아적 상상과 연대를 중요한 정신적 축으로 삼는 개념으로 재구성되는 것이 관건이다. 동아시아라는 매개가 결코 자오 강의 우려처럼 “양안관계라는 특수하고 구체적인 문제”를 “회피하는 修辭”(趙, 205)가 아니라, 반대로 양안관계를 자아와 거울의 이원론에 가두는 상상계적 단계를 탈피하는 계기라는 전향적인 사고가 중요롭다.

4. 양안/분단 체제와 동아시아

양안문제를 이원론에서 벗어나 동아시아라는 영역으로 끌고나오는 것은 사실 ‘대만 사회연구’ 20주년 특집호 기획에 깔린 주제의식이기도 했다. 논의 전개 과정에서 동아시아가 소실된 점이 아쉽지만, 대만사회의 오랜 병통인 통독논쟁을 양안/분단 체제라는 巨視的인 시스템 속에서 바라보는 시야를 확보한 것은 분명 고무적이다. 이 과정에서 양안/분단 체제에 내포된 딜레마가 비교적 명확하게 드러나면서, 향후 논의의 진전을 위해 풀어야 할 과제들이 구체적으로 떠오르게 된 것도 소중한 성과이다.

먼저, ‘제3세계론’의 역사적 의미와 한계를 정리해야 할 필요성이 대두되었다. 이는 분단체제 극복의 주체로서 백낙청이 제기했던 ‘민족’이나 臺社의 논자들이 제출한 ‘중국인’ 개념의 의미와 한계를 짚는 작업과도 연관된다. 물론, 1970년대 백낙청이 제출했던바 안으로는 반제 반봉건의 요구에 부응하고 밖으로는 약소민족의 자주권과 자결권을 존중하는 제3세계적 자기인식과 결합하는 ‘민족(문학)론’이 지금도 그대로 유

18) 王曉明, 「爲甚麼就不能烏托邦一下子?」 『臺灣社會研究季刊』 74기, 2009, 268-269면.

효한지에 대해서도 깊이 있는 토론이 필요하다. 더 시급한 것은 1977년 대만에서 ‘鄉土文學論’의 진영을 이끌었던 천 잉진(陳映眞)의 제3세계적 자기인식이 1980년대 이후 급격히 本土主義로 대체되고 마는 상황¹⁹⁾이나 1960년대 중국에서 약소민족에 대한 우애로부터 출발한 제3세계론이 혁명수출론으로 변질, “중심 콤플렉스”를 배양하는 온상이 되어버린 맥락²⁰⁾에 관한 분석이다. 양안문제의 토론에 동아시아가 좀처럼 개입하지 못하는 목전의 현상에 대해, 대만과 중국의 역사 속에 실재했다 사라진 제3세계 인식의 행방을 추적하는 과정에서 그 문제의 실마리를 찾아낼 수 있을지 모르기 때문이다.

그런 맥락에서 6,70년대라는 문화공간은 동아시아적 시야에서 분단체제의 심층 원인을 찾고 극복 방안을 모색하는 데 중요한 연구 대상으로 떠오른다. 정 홍성이 70년대 향토문학론의 기초를 쌓은 “문예부흥기”로서 1960년대를 주목했다면(鄭, 130-132), 뒤 정후이(呂正惠)는 대만사회의 “각종의 복잡한 이데올로기적 요소”가 “混沌未分의 상태”로 잠복하여 일시적이거나 사회 각 주체의 통일전선을 가능케 한 “우연한 현상”으로 1970년대를 설명했는데(呂, 210-212), 양자의 관점이 다소 다르긴 하지만 60년대의 모더니즘적 자양과 70년대에 눈뜬 제3세계적 민족의식이 한데 어우러져 꽃피운 ‘향토문학론’의 역사적 의미와 한계를 되짚는 작업은 분명히 중요해 보인다. 특히 ‘향토문학론’의 지위가 곧바로 본토문학론에 찬탈당한 역사로 보아, 향토문학론으로부터 대만민족주의의 잠재적 연원까지 찾아낼 수 있으리라 생각된다. 오랜 연구의 공백으로 비어있는 중국 60년대의 문화적 상황에 대해서도 연구가 필요하다. 치엔 리첸(錢理群)의 글은 오늘날 중국의 고질적 병폐인 중국중심주의와 중-서 이원론의 문제를 푸는 열쇠가 60년대라는 문화공간에 있을지 모른다는 암시를 주었다고 할 수 있다.

마지막으로, 한국에서 ‘민족문학론’ 발생을 전후한 6,70년대의 문화공간을, 중국과 대만의 그것과 횡적인 연계선 위에 두고 새로이 주목하는 것도 의미있는 공부거리이다. ‘민족문학론’과 대만의 ‘향토문학론’ 그리고 중국의 제3세계론을 함께 펼쳐놓았을 때, 각각이 동아시아에서 갖는 역사적·문화적 의미와 한계를 보다 온전히 인식할 수 있다. 나아가 이는 유사한 역사적 맥락에서 태어났음에도 매우 다른 양상으로 진행된 한반도와 양안의 분단체제를 상호 연관 속에서 파악하게 함으로써, ‘분단체제’를 극복하는 한 방법으로서 동아시아의 축을 한층 풍요롭게 만들 것이다.

19) 呂正惠, 「戰後臺灣知識分子與臺灣文學」 『中國現代文學』 제7호, 1993, 209-210면 참조.

20) 錢理群, 「我們這一代人的世界想像」, 『臺灣社會研究季刊』 제57기, 2005, 260-268면 참조.

两岸和解时代、台湾的身份认同与东亚

白池云（仁荷大）

〈目次〉

- 一、在台湾有东亚吗？
- 二、台湾的困境、东亚
- 三、民族、后国族、“中国人”
- 四、两岸/分断体制与东亚

一、在台湾有东亚吗？

韩国的中国史学者백영서早已提出疑问——“在中国有亚洲吗？”尽管20世纪初从文明论或地区合作论的基轴提出多样的“亚洲论”，但是最终中国还是还原为所谓中国之国民国家，백영서的文章对此过程加以批判，这篇文章不仅超越历史分析，而且不无对今日依然缺少东亚思维的中国知识界加以叱咤的韵味。不仅如此，对台湾也可以提出相同的质问。台湾学者张昆将从所谓中国之“超级他者”的存在，寻找台湾知识界长期缺乏东亚思维的原因。他批判西欧和台湾社会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是简单的逻辑思维，同时也注意到尽管民进党推行去中国化政策，但是许多台湾人接受自己既是中国人又是台湾人的双重身份认同。所谓对中国的“认同”和“恐惧”之双重认识成为今日台湾人二律背反的中国意识，而这从根源上封锁了台湾社会出现东亚和中国之谈论。

一方面，在形式上绝对不具备国民国家之资格而谈论东亚未免奢侈；另一方面，对于与中国不同形态的帝国中心的幻想在台湾学界此起彼伏，这种现状如实地展现了存在边陲/中心心结之台湾的双重性。对于台湾历史学界不无肤浅地提出之“海洋立国论”或“同心圆史观”所复制的帝国想像，台湾学者陈光兴解读为“模仿旧(西欧或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想像的‘下位’帝国主义”，同时也是台湾国族主义。然而，从其他的角度思考，这并不是对西欧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简单模仿。换言之，1990年代本土主义者提出的“南进论”可谓以自己为中心看世界的“中华”世界认知的台湾版。从这种角度看，台湾的民族主义虽然可以称为对中国压迫性大国主义的抵抗或否定，但同时对其模仿和延续的侧面也不能视而不见。在台湾，东亚思维从源泉上不存在的理由，可谓在于在所谓中国之“超级他者/自我”的关系中规定自己的身份认同的二元论思维定式。

二、台湾的困境、东亚

这几年东亚在台湾学界的谈论中被唤起是值得瞩目的现象。诚如张昆将所主张，“重新返回

脱离已久的‘东亚’的轨道，重新发现‘东亚’的存在，从而使东亚发现台湾的存在”(张，196)，对在国际社会长期孤立的不安感最终促使将东亚引进台湾。然而，台湾为了与东亚“接续”，首先必须以某种方式整理与中国的关系。因为不以某种方式接受长期处于敌对关系的中国，是不可能直接与东亚接续的。其代表性的例子是在文学研究领域中发现的。台湾文学研究的元老、台独派的代表人物陈芳明最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中国恐惧症(sinophobia)”和“外国恐惧症(xenophobia)”之克服乃是台湾文学研究必须正视的重要课题。在他看来，“中国恐惧症”根源于过去数十年间“过度的本土化”，“外国恐惧症”渊源于对自身文化自信感的丧失。直至1990年代后半期，陈芳明还将1945年至1987年规定为中国(国民党)统治的第二次殖民时期；主张恢复过去100年间被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帝国主义抛弃的语言和记忆是台湾后殖民的主要课题，从而奠定了台湾民族主义的理论基础。尽管如此，他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将中国(现代)文学接受为台湾文学的遗产，显示其思想的转换。

除了鲁迅之外，我通过关于“中国新文学”的台湾文学研究，很高兴地看到台湾文坛是如何吸收了郁达夫、沈从文、徐志摩乃至梁实秋的。在观察一个作家的文学生涯时，必须以整体的脉络为基础，任意切断和孤立的作法都是不对的。(中略)我们已经到绝对必须正视中国的时候了。对于我们来说，只要对自己文化有自信感，就没有必要排斥。

正是在这篇文章中，陈芳明提出了“东亚视角”的重要性。在台湾文学排斥中国新文学的心理底线里，发挥着作用的是台湾(文学)究竟属于哪里之认同是非问题。然而，“如果从东亚的视野视其为台湾文学，也就不必忧虑‘台湾文学是何种神圣领域的一部分’这样的所属问题了”(陈芳明，13)。在此东亚乃是从所谓“东亚及西欧殖民史的再认识”之恢宏框架评估台湾文学的位置的重要方法。

然而，对陈芳明将东亚视角引入台湾文学的根本动机进行思考可知，诚如前述之张昆将，是对孤立的不安感发生作用。因为，在国际社会对台湾文学的关心备受限制、“谁也不我我们对话”的情况下，是不能因“自我满足的学问”研究而沾沾自喜的。换言之，台湾文学为了获得自己在世界文学中的位置，首先必须摆脱孤立状态，因此不得不与中国文学进行对话。在此情况下，所谓东亚之范畴的必要性终被提出。

台湾之回归东亚具有极其复杂的历史的和文学的意义。自1946年吴浊流发表《亚细亚的孤儿》，描绘既不归属中国也不归属日本、漂泊日本和大陆等地、最终成为狂人的台湾青年胡太明的生活，从此“孤儿意识”成为代表台湾的客观存在危机的用语。反思可知，过去数十年间一意孤行的台湾民族主义无疑正是这种孤儿意识的另一种表现。为了克服这种问题，首先必须确立与中国的关系；借此机会，长期不存在的东亚终于介入台湾的知识谈论。由此可见，在台湾，东亚与中国谈论是欲罢不能地紧密相连的。

三、民族、后国族、“中国人”

因为两岸问题与东亚紧密相相连这一特性，东亚在台湾知识谈论中的出现具有双重的意

义。即，一方面，这是期待从所谓区域和平共存的大框架出发解决国内封闭性的和消耗性的民族矛盾的积极效果；另一方面，这也是忧虑因受两岸关系限制而缺少正确地观察东亚地区的均衡感觉。然而，对于统独两个阵营间的政治斗争几乎将整个社会一分为二的台湾而言，寻求解决两岸问题的突破口是最为迫切的课题。为了不使两岸问题陷入狭窄的民族主义论争，而是将其引向建设性的讨论，超越所谓两岸之两者关系的思维框架是必不可少的。东亚视角之日渐重要乃是根源于这种脉络。

在这方面值得瞩目的努力在于今年台湾的知识界。《台湾社会研究》创刊20周年纪念特刊策划并推出特集“超克分断体制论”，汇编了多篇将韩国学者白乐晴的“分断体制论”嫁接到两岸体制的试验性论文。1990年代初期白乐晴提出的“分断体制论”，是为了认识韩半岛的分裂状况而提出的方法论概念，据此韩半岛的分断是现代世界体系的环，是“在特定的时期和所谓东亚之特定的地区确立的独特的下位体制”。在韩国的社会运动谈论中，白乐晴的分断体制论在两方面具有意义：其一是提出民族统一与民主变革在事实上是一个课题的认识；其二是提出分断体制之克服不是韩半岛内部的课题，而是具有克服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之世界史意义的运动之一环的认识。

毋庸赘言，韩半岛的分断与两岸的分断是难以相提并论的。尽管如此，这种观点认为分断体制是对内制约社会民主的发展、对外维持和强化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体制”，因此可以成为有助于突破在与中国长期对峙的情况下社会分裂加速化的台湾困局的方法论，这就是他们的问题意识。该特刊策划人陈光兴最忧心忡忡的台湾社会的痼疾弊端，在于政治谈论与民间谈论难以区隔。换言之，不过是国民党与民进党之“党争”的政绩论争，席卷包括知识界在内的全体台湾社会，从政治谈论出发并不容易打开自律的民间谈论的空间。由此可见，克服分断的课题不是限定为国家间的问题，而是引以为民众日常层次的变革运动——“分断体制论”这种视角，为将两岸问题从狭隘的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的论争中脱离出来，并视之为以台湾社会的民主变革以至东亚地区的和平为目标的运动，提供了重要的契机。

问题是，在台湾，“分断体制”的克服议题刺激着所谓与中国统一之最敏感的政治焦点。惟其如此，随之而来的课题是：“分断体制的分析和超克之讨论，在两岸问题中是否必然地指向统一呢？”对此，陈光兴指出：“不能将统独孤立来讨论，要放在社会权利与超克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语境中来辩论，这也会使既有的统独问题具有更高的视野。”“统一和独立都需要当成是过程，不能在此结束，而需要被视为走向社会主义、去帝国和消解资本主义剥削的一步。”（陈，36～37）显而易见，为了不使关于两岸体制的讨论受困于狭隘的民族主义谈论，需要超越台湾—中国的二元关系、针对现代世界体系的抵抗运动的宏观视野。然而，假如超越中国问题而将台湾与世界直接连接，则难以摆脱另一个抽象化的谬误。在此关于两岸问题的重大困境应运而生。因为为了不陷入消耗性的民族论争，必须超越中国—台湾的二元关系；尽管如此，如果不能正视与中国的关系并且不能进入具体的讨论，则再次陷入中国—台湾之二元关系中的危险是可能发生的。

在此必须关注的是，陈光兴对两岸问题最敏感的主题“民族”的解读。他进入两岸问题困境的最深层。陈光兴认为，对于白乐晴而言，“如果超克运动的主体是民众，而民众不是抽象的理论位置，而有其在地历史的属性，这里就必然会联系到所谓‘民族问题’”（陈，38），因此也着眼于民族问题与分断问题的直接联系。陈光兴特别注意白乐晴引入民族概念的“强烈的第三世界的连带意识”（陈，17），提出重新建构所谓“中国人”之民族概念。

在因国民党的中国民族主义和民进党的台湾民族主义而饱受灾难的台湾社会，重新唤起民族显然是危险的尝试。然而，陈光兴认为，由于对民族的“情绪性的反感”，今日之台湾已经变成“没有历史的主体”；主张为了打开这种现实局面，“要超克我们自身对民族与民族主义的情绪性反感，充分认知其存在的历史必要性及必须承担的后续负面效应，重新找回中国人这个具有历史纵深的后国族的主体位置”(陈，39)。换言之，他不是将“民族”困入所谓两岸关系之常套，而是视为包含与第三世界的横向连带关系的概念，构想在东亚的框架内重新建构“民族”的方法。正是在此关节，陈光兴提出了不仅在这篇文章而且在这集特刊一以贯之的最具争论性的主题“将中国人问题化”(陈，39)。

为了纠正台湾被扭曲的主体意识，必须克服“把台湾人排除在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之外的”“反历史的”(陈，40)谬误，这一建议具有的意义，不仅是对通过所谓中国之他者像建构自我身份认同的之台湾身份认同的反省，而且还令人回顾两岸民众间的交流历史，以摸索转向突破踏步不前的两岸问题的立脚点。尽管如此，所谓“将中国人问题化”之议题虽然旨在超越两岸问题之中国—台湾的二元论，但是结局在于陷入其中的困境之令人晕眩的警戒线之上。在此要注意的是，虽然从白乐晴以所谓“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结合”之第三世界论的核心为基础的民族文学论出发(陈，110~117)，但其结果是讨论归结为“中国人”之问题的现象。因所谓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共存之“充满异见矛盾的立场”而产生的民族文学论的两重性，作为“后国族”的“中国人”概念能够充分地体现吗？换言之，白乐晴的“民族”概念所包含的国际性(第三世界性)和民众性以及普遍性，“中国人”概念如何担保呢？

陈光兴从与中国的关系中考察台湾的身份认同提出的问题，也贯穿于其他3篇主题论文。翟宛文批判台湾社会泛滥的日本殖民地现代化论，主张台湾战后之所以能够实现奇迹般的发展，是因为20世纪中华民族主义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的意志”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基轴，以此理论为前提，他将与中国的竞争体制视为台湾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这种分析与必须从包括中国的一个“经济共同体”的观点认知台湾经济的结论是一脉相通的。另一方面，在历史文化领域，郑鸿生强调所谓“台湾人”之身份认为的虚伪性。他从微观角度分析台湾民族主义的表象——闽南语事实上比普通话更好地保存中国古代语言的性格以及中国人历经几千年大混血过程的历史，认为所谓“中国人”之概念本身是杂种的、非实体的概念，如今大陆独占“中国”的代表性的情况，不过是亲美反共的分断体制造成的现代产物而已(郑，116~128)。

从批判性的角度解构分裂以来通过敌视中国建构的台湾人身份认同，这一工作显然既有意义也有必要。然而，在此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台湾人身份认同之解构工作毕竟只能在与中国的关系中进行，而在必须避开现实中国的情况下，其结果难道不是归结为所谓“中国”或“中国人”之更抽象的身份认同概念吗？换言之，郑鸿生解构所谓台湾人之虚伪的身份认同的逻辑，最终是归结为所谓“我们(台湾人)也是中国人”。毋庸赘言，此时的中国人不是指目前居住在大陆的14亿人民。借用郑鸿生的话，这是谁也“不能独占的”、“开放的和未来指向的中国人身份认同”(郑，132~133)；更具体地说，是“19世纪中国的现代化民族运动中产生的新名称”“中华民族”(郑，136)。总之，郑鸿生提出的所谓“开放的中国人”是克服单一民族想像的杂种性民族，即近似20世纪初孙文提出的“五族共和”的现代版。

赵刚提出的“作为方法论的中国人”概念和甯应斌提出的“作为历史文化的中国”概念也一样。毋庸赘言，这些概念并不意味着单纯地回归传统。然而，他们主张超越在所谓“中华民国”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之狭隘的政治对立和历史断裂下的身份认同，造就比分断体制更加恢宏高远、辉煌灿烂和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身份认同”；并且认为“从所谓作为政治的中国之民族主义出发，建构作为历史文化的中国/中国人，乃是克服分断体制的方法。”他们这种观点与前述郑鸿生的“客观的中国人”概念一脉相通，即使承认其必要性和当为性，但是否能够充分地包含陈光兴提出的“后国族”的意义依然不无疑问。

最成其为问题的是，他们所说的“中国人”概念的抽象性。考虑到台湾关于克服分断体制的讨论必须避免与两岸间的统一直接相连接(陈，36)之谈论环境，就可以理解他们所说的“中国人”不能是作为目前居住在大陆的具体实体之中国人的情形。尽管如此，假如将中国人排除在讨论的磁场之外，是不可能正面突破他们最初批判的身份认同谈论的虚伪性的。换言之，他们所说的“开放的”、“方法的”、“历史文化的”“中国人”概念，在解构台湾身份认同方面虽然可能有效果，但是假如确实解构成功，又如何摆脱再次陷入另一个超级身份认同的困境呢？更重要的问题在于这种“中国人”概念被吸收入大陆的官方谈论中，虽然与他们的意图殊无关系。诚如讨论者李尚仁敏锐地指出，“假如要用从传统吸收资源之松散的身份认同概念构筑克服分断体制的主体的话，那么必须再次考究从帝国变身为国民国家之中国的历史过程。”在国民国家与帝国的性格混合共存的大陆政治体制尚未成为具体讨论对象的情况下，集中研讨作为“中国人”的身份认同的恢复问题，是难以取得与现在中国官方对少数民族或对台湾的立场根本不同的特性的。为了避免分断体制之克服就意味着统一之误解而竭力排挤现实中国，结果是与其意图和感情背道而驰，可能被吸收为所谓“国共和解”之大陆的统一谈论。惟其如此，与台湾民族主义一起，同时对中国的帝国式的国家主义谈论加以牵制的均衡感觉切实也是不可缺少的。

“两岸问题分析中的非对称性”(李，254)，在若干方面是需要反复琢磨的问题。如果以“作为方法论之中国人”批判台湾民族主义，相反地，也必须能够以“作为方法论的台湾人”批判中国的国家—帝国主义。惟其如此，台湾社会的矛盾原因就不能只从“冷战残余”和“亲美反共”中去寻找(李，255)。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在政治、经济各层面对台湾施加的压力和威胁也应该视为问题。更进一步，对于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台湾的知识界也必须更加积极地介入。王晓明针对最近中国社会中个人主义与爱国主义同时强化的奇异现象，指出对社会主义30年的功过缺乏反省性的思考是其深刻的原因。通过对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计划的反省并将当今中国的国家主义相对化，这一工作与克服分断体制决不是毫无关系，因此不完全只是大陆知识人的责任。

这一切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在“台社”论者克服分断体制的讨论中(陈光兴除外)难以发现东亚。为了分析分断体制，诚如陈光兴所说，必须“将中国问题化”。然而，在“将中国问题化”过程中，假如第三世界或东亚之类的媒介无法介入，讨论将如马奇·莫比乌斯(마치 뫼비우스)的腰带，最终是无法摆脱中国—台湾的二元论的。再者，这种二元论，从批判性解构通过将中国他者化建构的台湾自我身份认同(因为对现实中国的发言被排斥挤)、而结果归结为所谓“中国人”之超级自我的视角看，在本质上无疑是一元论。为了不至于陷入这种困境，作为“后国族”的“中国人”不是从一国的或者两国的关系出发，而是以第三世界或者东亚的想像和连带作为重要的精神基轴之概念进行重构，这是其关键。所谓东亚之媒介，决非如赵刚所忧虑，是回避“所谓两岸关系之特殊的和具体的问题”之“修辞”(赵，205)，相反地，是摆脱从自我与模仿的二元论对待两岸关系的最后阶段的契机，这种转向性的思考是非常重要的。

四、两岸/分断体制与东亚

摆脱二元论并将两岸问题引入所谓东亚之领域，事实上是《台湾社会研究》20周年特刊所蕴涵的主题意识。虽然东亚在讨论展开过程中消失了无疑令人遗憾，但是坚持将台湾社会长期的症结统独论争放在所谓两岸/分断体制之宏观体系中进行考察的视野显然令人鼓舞。在此过程中不仅两岸/分断体制所包含的困境比较明确地暴露出来，而且为了今后讨论进展必须解答的课题也具体地呈现出来，这是弥足珍贵的成果。

首先，必须整理“第三世界论”之历史意义和局限性的必要性抬头。这与针对作为克服分断体制的主体而由白乐晴提出的“民众”或由“台社”论者提出的“中国人”概念，指出其意义和局限的工作也是相互关联的。毋庸赘言，1970年代白乐晴提出的与对内呼应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对外尊重弱小民族的自治权和自决权之第三世界的自我认识相结合的“民族(文学)论”，时至今日是否依然有效，需要进行深度的讨论。更为紧迫的是针对如下发展脉络进行分析，即：在台湾，1977年率领“乡土文学论”阵营的陈映真的第三世界的自我认识，到1980年代以后急剧地被本土主义所取代；而在中国，1960年代从对弱小民族的友爱角度出发的第三世界论变质为革命输出论，成为培养“中心情结”的温床。因为对于当前东亚不容易介入两岸问题讨论的现象，是否能够从追踪台湾与中国历史中曾经存在而后消失的第三世界认识发展的过程中找到其问题的线索亦未可知。

由此可见，所谓1960、70年代之文化空间在从东亚的视角寻找分断体制的深层原因并摸索克服方法过程中上升为重要的研究对象。作为积累了1970年代乡土文学论基础的“文艺复兴期”，郑鸿生瞩目于1960年代(郑，130~132)；而作为台湾社会“各种复杂的意识形态要素”一时以“混沌未分的状态”潜伏、但能促成社会各主体的统一战线之“偶然的现象”，吕正惠聚焦于1970年代(吕，210~212)。虽然两者的观点多少有所不同，但是指出1960年代现代主义滋养与1970年代觉醒的第三世界的民族意识在一个地方和谐发展并开花结果之“乡土文学论”的历史意义和局限性，这项工作显然非常重要。特别是从“乡土文学论”的地位被本土文学论篡夺的历史过程看，从乡土文学论甚至可以找出台湾民族主义潜在的渊源。对于因长期研究空白而一无所知的中国1960年代的文化情况，研究也是必不可少的。钱理群的文章暗示，破解今日中国之痼疾弊端——中国中心主义和中西二元论问题的钥匙，也许是在所谓1960年代之文化空间。

最后，将韩国“民族文学论”产生前后的1960、70年代的文学空间，与中国和台湾的文学空间，放在横向的连接线上重新进行考察，也是不无意义的研究课题。将韩国的“民族文学论”和台湾的“乡土文学论”以及中国的第三世界论一起展现，能够比较完整地论认识它们各自在东亚具有的历史的、文化的意义和局限性。进而，通过从相互关联中把握从相似的历史脉络中产生而以非常不同的形式发展的韩半岛与两岸的分断体制，以克服“分断体制”的一个方法促使东亚的基轴更加充实。

兩岸和解時代、台湾の政治性と東アジア

白池雲 (仁荷大)

〈目次〉

1. 台湾に東アジアはあるか
2. 台湾のジレンマ、東アジア
3. 民族、ポスト国族、「中国人」

1. 台湾に東アジアはあるか

韓国の中国史学者・白永瑞はかつて、「中国にアジアはあるか」と問うたことがある。20世紀初めの文明論や地域连带論の軸として多様な「アジア」論が提出されたにもかかわらず、結局中国という国民国家に還元されてしまう過程を批判した彼の論文¹⁾は、単なる歴史分析を超え、現在、依然として東アジア的思考が欠如している中国の学界に対する叱咤のニュアンスを込めている。ところで、同様の質問を台湾に対してもしてみることが可能である。台湾学者・張昆将は、台湾の学界に長い間東アジア的思惟が不在であった原因を、中国という「スーパー他者」の存在に求めた。張は、西欧と台湾社会に広がっている「中国脅威論」を単純な論理だと批判しながら、民进党の脱中国化政策にもかかわらず、多くの台湾人が自分を中国人であると同時に台湾人であるという二重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を受け入れていることに注目する。中国に対する「同一視」と「恐れ」という両者が今日、台湾人の二律背反的中国意識をなしており、それが台湾社会に東アジアと中国についての議論を出現することを基本的に封鎖しているというのである²⁾。

一方、形式的に国民国家の資格も満足に整え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のに、東アジアを論ずることは贅澤だとしながらも、他方では、中国とはまた別の形態の帝国の中心を夢見る想像が台湾学界に沸き起こる現況³⁾、周辺/中心コンプレックスが混在する台湾の二重性を如実に示している。台湾歴史学界にときに登場する「海洋入国論」や「同心圓史観」が复制する帝国の想像に対し、台湾学者・陳光興は、これは「旧(西欧あるいは日本)帝国主義的文化想像を模倣した「下位」帝国主義」であると同時に、台湾の国族主義と解釋したことがある⁴⁾。しかし他方、考えてみると、これは単純に、西欧や日本の帝国主義に対する模倣だけではない。いってみると、1990年代の本土主義者たちによって提出された「南進談論」は、自身を中心に置いて世界を見る「中華」的世界認識の台湾バージョン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ができよう。そのような点で、台湾の民族主義は、中国の抑圧的大国主義に対

1) 白永瑞 중국에 '아시아'가 있는가?: 한국인의 시각 『동아시아의 귀환』 창, 2000年。

2) 昆如何从台湾思考东」思号200年、pp181 20

3) 白永 「대만에게 동아시아론은 사치」 瑞南通信、2007.9.27。

4) 陳光／白池ほ译 제국의 창200年、pp35 11。

する抵抗あるいは否定でもあるが、同時にその模倣であり、連続である側面も看過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台湾で東アジア的思考が源泉的に不在である理由は、このように中国という「スーパー他者/自我」との関係のなかで自分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を規定する二元论的思惟の枠組みにあるといえる。

2. 台湾のジレンマ、東アジア

ここ数年、東アジアが台湾学界における議論のなかで喚起されていることは注目に値する現象である。「離脱してから長い「東アジア」の軌道へ立ち返り、「東アジア」の存在を新たに発見することによって、東アジアをして台湾の存在を発見」（張、196）せしめようとする張昆将の主張に見えるように、国際社会で長く孤立してきたことに対する不安が、結局は東アジアを台湾に呼び入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のである。ところで、台湾が東アジアと「接続」するためには、まず中国との関係をどのような形であっても整理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长年敵対関係にあった中国を、何らかの方法で受け入れなくては、ただちに東アジアと接続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からである。その代表的な例が、文学研究の領域に見られる。台湾文学研究の元老であり台独派の代表だった陳芳明は、最近ある文章で、台湾文学研究が直面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重要な課題として「中国恐怖症 (sinophobia)」と「外国恐怖症 (xenophobia)」の克服を提起した。それによれば、「中国恐怖症」は過去何十年間かの「過度の本土化」から始まったのであり、「外国恐怖症」は自らの文化に対する自信の喪失に淵源する⁵⁾。1990年代の後半においても、陳芳明は1945年から1987年までは中国（国民党）による第2の植民期間であると規定した。過去100年間、日本帝国主义と中国帝国主义によって失われてしまった言語と記憶を回復するのが台湾ポストコロニアルの主要課題であると主張することで、台湾民族主義の理論的基盤を用意したのである⁶⁾。そのような彼が、最近ある文章で、中国（現代）文学を台湾文学の遺産として受け入れようとしながら、思考の轉換を示した。

魯迅のほかにも、私は「中国新文学」に関する台湾文学の研究を通じ、台湾文壇がどのように郁達夫、沈从文、徐志摩、ひいては梁实秋を吸収したのかを嬉しく見ている。一人の作家の文学の生涯を観察するには全体的な脈絡が土台にならなくてはならず、任意に切り捨てて孤立させてはならない。〔中略〕私たちは中国をまともに正視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きに至った。私たちに自己の文化に対する自信があるなら、排斥する必要がない⁷⁾。

5) 陳芳明「东亚作为一种方法台湾文学の东亚思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員200年、p1。

6) Fang ming Chen, 'The problems of constructing Taiwan's postcolonial discourse' paper delivered in Writing Taiwan Conference, Columbia University, 30 April 3 May 1998, Ping hui Liao, "Postcolonial studies in Taiwan: issues in critical debates," Postcolonial Studies, vol2, no.2, 1999 pp.206 20より再引用

7) 陳芳明前論、p.1。

まさにこの地点で陈芳明は「东アジア的视角」の重要性を提起する。台湾文学が中国新文学を排除した心理の底辺には台湾（文学）がどこに属するのかという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是非が作用していた。ところが「东アジアという視野から台湾文学を見るようになれば、このように「台湾文学がどの神圣な領域の一部なのか」という所属問題を心配しなくてもよい」（陈、13）というのである。ここで东アジアは、「东アジアおよび西欧植民史の再认识」（14）という大きな枠組みから台湾文学の位置を見きわめようとする重要な方法である。

ところで、陈芳明が台湾文学に东アジア的視野を導入する根本的な动机について考えてみると、やはり先述した张昆将が述べるように、孤立に対する不安が作用していることがわかる。国际社会において台湾文学に対する関心が制限されていて、「誰も私たちと対話しない」状況では「自己満足的な学问」研究に安住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からである⁸⁾。いわば、台湾文学が世界文学で自分の位置を得るためには、まず孤立の状態から脱しなければならぬし、そのためには中国文学と対話せざるをえない状況で东アジアという范畴の必要性が提起されたのである。

台湾の东アジアへの回归は、非常に複雑な历史的文化的意味をもつ。1946年、中国と日本のどちらにも归属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まま、日本と大陸などの地をさすらい、結局狂人になってしまう台湾青年・胡太明の生涯を描いた吴浊流の『アジアの孤儿』以来、「孤儿意识」は台湾の实存的危机を代表する用語になってきた。过去数十年の間、隆盛を極めた台湾民族主義は、翻ってみればこの孤儿意识のもう一つの表れに違いない。これを克服するためには、まず中国との関係を定立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が、そのままこのような勢いに乗じて、長い間不在だった东アジアが、台湾の知识谈论に介入するようになったのである。そうした点で、台湾における东アジアは、中国の议论と切っても切り离せず、緊密に连结されている。

3. 民族、ポスト国族、「中国人」

两岸问题と东アジアが緊密に繋がれているこのような特性によって、台湾知识谈论に东アジアの出现は二重の意味をもっている。すなわち、それは地域の平和共存という大きな枠組みから、国内の闭锁的で消耗的な民族葛藤を解決するようにする肯定的な効果を期待する半面、两岸关系到制限されて东アジア地域を选择的に見る均衡感觉を欠くのではないかという忧虑を抱いている。しかし统 / 独两阵营間の政治的争いがほぼ社会全体を二分している台湾としては、两岸问题の解决の突破口を准备するのが何より至急である。两岸问题を、偏狭な民族主义论争に陥らせず、生产的な讨论へ引き上げるためには、两岸という两者の关系を超えた思考の枠組みが必要である。东アジア的視野が重要になるのはこうした脉络からである。

そうした面で注目に値する試みが今年、台湾学界にあった。「台湾社会研究」创立20

8)陈芳明前掲論文、p。

周年記念号に、韓国学者・白乐晴の「分断体制論」を两岸体制に接合させる実験的な論文を掲載した「超克分断体制論」特集が企画されたのである。1990年代初めに提出された白乐晴の分断体制論は、朝鮮半島の分断を近代世界体制の一环として把握するが、「特定の時期と东アジアという特定地域に位置づいた独特の下位体制」⁹⁾として认识するための方法論的概念である。韓国の社会运动の议论において、白の分断体制論は2つの点で意味を帯びている。1つは民族統一と民主変革が事実上1つの課題であるという认识を提示したという点であり、もう1つは分断体制の克服を、朝鮮半島内部の課題ではなく、近代資本主義体制を克服する世界史的意味を帯びた运动の一环として把握する认识を提示したということである。

もちろん、朝鮮半島の分断と两岸の分断を同一線上で比べることは難しい。それでも分断を、内には社会の民主発展を制約し、外には近代資本主義世界体制を維持、強化する1つの「システム」と見るこのような观点は、中国と长年対峙してきた状況で社会の分裂が加速された台湾の難局を突破する有用な方法論となりうるというのが彼らの問題意識である。この特集の企画者である陈光兴が、最も閉塞した台湾社会の固執的な病弊は、政治の谈论と民间の谈论がほとんど区別されないという点にある。結局、国民党と民进党間の「党争」にすぎない成绩论争に学界を含めた台湾社会全体が巻き込まれることで、政治の谈论から自律的な民间の谈论の空間がめったに开かれぬというのである¹⁰⁾。そうした点で、分断克服の課題を、国家間の問題に限定するよりも、民众の日常的次元での変革运动へ引き上げる「分断体制論」の视角は、两岸問題を狭小な国家主義あるいは民族主義论争から脱し、台湾社会の民主変革と、ひいては东アジア地域平和のための运动として认识するような重大なきっかけを与えてくれたといえることができる。

問題は、台湾で「分断体制」克服の议题が、中国との統一という最も敏感な政治的イシューに触れ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る。したがって、どのようにすれば「分断体制の分析と超克の讨论とが、两岸问题において必然的に統一を志向しないようにしうるか」ということが課題として浮び上がる。これに対して陈光兴は、「统独の問題を孤立させることよりも、社会の民主化と帝国主义および資本主義の克服という脉络に置いたとき、より大きな視野を確保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という。統一なのか独立なのかを究極的な目的に置くのではなく、台湾社会の自主と脱帝国・資本主義榨取の解消に進む1つの过程として見ようというのである(陈、36-37)。两岸体制に関する讨论が狭小な民族主義の议论に陥らないようにするためには、台湾—中国の二元関係を超えて近代世界体制に対する抵抗运动という巨視的な視野を必要とするというのは明らかである。しかし中国の問題を飛び越えて、ただちに台湾と世界を直結させては、その抽象化の誤謬を抜け出しがたい。ここに两岸问题に関する重大なジレンマが発生する。消耗的な民族论争に陥らないためには中国—台湾の二元関係を超え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が、それにもかかわらず中国との関係を直视しなくては具体的な讨论に進むことはできないし、この場合、また论议が中国—台湾の二元关系到陥る危険が発生するためだ。

この局面で、陈光兴が两岸问题の最も敏感な主题である「民族」に穿凿することに注目す

9) 백낙분 단체제의 인식을 위하(1992) 단체제 변혁의 공부』 pp17-1

10) 陈光兴, 「白乐晴超分断体」论, 『台湾社会研究季刊』74期, 2009年p

る必要がある。陈は两岸問題がもつジレンマの最深层に突入しているのである。白乐晴に「分断体制克服の主体である民众は、地域の歴史の属性を帯びたものであり、この点で必然的に「民族問題」と連結される」（陈、38）と語ることに、陈光兴は民族問題が分断問題と直結されていることに着目する。特に、白乐晴の民族概念に入っている「第3世界との強烈な连带意識」に注目しながら（陈、17）、陈光兴は「中国人」という民族概念を新たに再構成することを提案する。

国民党の中国民族主義と民进党の台湾民族主義によって灾难を経験した台湾社会に、再度民族を呼び入れるというのは確かに危険な試みである。しかし陈光兴は、「民族」に対する情緒的拒否感によって「歴史を喪失した主体」になってしまった今日の台湾の現実を打開するためには、「その失敗後の否定的効果を十分に認知」してでも、「民族が存在してきた歴史の必要性」を喚起することによって「中国人という歴史の縦深をもったポスト国族の主体位置を取り戻さ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主張する（陈、39）。つまり彼は、「民族」を两岸关系という常套句に閉じ込められることなく、第3世界との横断的连带を担保する概念として、东アジア的枠組みから再構築する方法を构想していたのである。まさにこの局面で、この論文だけではなく、この企画全体を貫く最も論争的なテーマである「中国人を問題化しよう（将中国人問題化）」（陈、39）という案が提出される。

台湾の歪んだ主体意識を正すためには、「台湾人を中国人という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外側へ排除する」「反歴史的」（陈、40）誤謬を克服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いうこの提案は、中国という他者の上を通じて自我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を構築してきた台湾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に対する反省であるのみならず、两岸民众間の交流の歴史を取り戻し、足踏み状態に置かれた两岸問題を前向きに突破する立脚点を模索させてくれるという点で意味がある。それにもかかわらず、「中国人を問題化しよう」という議題は、两岸問題が中国—台湾の二元論を超越しようとしながらも、結局はその内面へ陥ってしまうジレンマの不安定な境界線上に置かれている。ここで注目すべきは、「民族主義とインターナショナリズムの結合」という第3世界論の核心を土台にする白乐晴の民族文学論¹¹⁾から出発している（陈、110-117）にもかかわらず、結局は議論が「中国人」の問題に归结してしまうという現象である。民族主義とインターナショナリズムの共存という「一見矛盾する立場」¹²⁾として民族文学論の二重性を、「ポスト国族」としての「中国人」概念が十分に体现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であろうか。言い換えれば、白乐晴の「民族」概念が包括する国際性（第3世界性）と民众性、そして普遍性を「中国人」の概念をどのように担保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であろうか。

中国との関係のなかで、台湾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を再度見ようという陈光兴の問題提起は、ほかの3編の主題論文でも、ほぼ一貫して展開されている。瞿宛文は、台湾社会に広く流布している日本の植民地近代化論を批判しながら、台湾が戦後奇迹的な経済を成し遂げることができたのには、20世紀の中华民族主義が決定的な役割を果たしたと主張した。发展途上国の場合、经济发展には「发展の意志」が重要な軸をなすという理論的前提の下に、彼は中国との競争体制を台湾经济发展の強力な動力と見た。このような分析は、台湾

11) 白乐晴前掲論文、p.17

12) 白乐晴前掲論文、p.10

の経済を、中国を含めた1つの「経済共同体」の観点で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いう結論につながる¹³⁾。一方、历史文化の分野で郑鸿生は、「台湾人」という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虚偽性を主張した¹⁴⁾。台湾民族主義の表象である闽南語が、実は普通话（標準中国語）よりもっと中国の古言語的な性格をよく保存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や、中国人が数千年間大混血の過程を経験してきた歴史を微視的に分析していきながら、彼は「中国人」という概念自体が雑種的で、非実体的な概念として、現在、大陸が「中国」の代表性を独占する状況は、親米反共の分断体制が作り出した近代的産物にすぎないと述べる（郑、116-128）。

分断以来、中国を敵対視することで構築されてきた台湾人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を批判的に解体しようとするこうした作業は、確かに意味があり、また必要なことである。ところで、ここで考える問題は、台湾人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を解体する作業が、結局、中国との関係のなかで進めら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が、現実には中国を避けなければならない状況であり、結局は「中国」あるいは「中国人」というより一層抽象的なアイデンティティ観念に帰着してしまうことではないかということである。いわば、台湾人という虚偽的な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を解体しようとする郑鸿生の論理は、結果的に「私たち（台湾）も中国人だ」ということに帰結してしまう。もちろんこのときの中国人は、現在大陸に住んでいる14億の人民を指し示すものではない。郑鸿生の言葉を借りれば、それは誰によっても「独占されない」「開放的で未来指向的な中国人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であり（郑、132-133）、より具体的には、「19世紀中国の近代化民族運動のなかで創生した新しい名称」である「中华民族」である（郑、136）。結局、郑鸿生が提示した「開放的中国人」とは単一民族の想像を克服した雑種性、すなわち20世紀初頭に孫文が提示した五族共和の現代的バージョンに近似したものである。

赵刚が提起した「方法论としての中国人」や甯应斌の「历史文化としての中国」概念も同様である。もちろんこの概念が単純に伝統回帰を意味するものではない。しかし「「中华民国」と「中华人民共和国」という狭隘な政治対立と歴史断絶下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を超越し、分断体制よりもっと高く大きくて輝く正々堂々な中国人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を作ろうという主張¹⁵⁾や、「政治としての中国という民族主義から历史文化としての中国/中国人の議論を助け出すのが分断体制克服のための方法」¹⁶⁾という主張に対しては、先述した郑鸿生の「開放的中国人」概念同様に、その必要性と当為性は十分に認定しても、それが、陈光兴が提出した「ポスト国族」の意味を十分に盛り込むことができるかどうかという疑問が依然として残る。

何より問題に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点は、彼らがいう「中国人」概念の抽象性である。分断体制克服の議論が两岸間の統一へ直結することを避けなければならない（陈、36）という台湾の論談環境を考慮するとき、彼らがいう「中国人」が、現在大陸に住んでいる具体的実体としての中国人となりえないという状況は理解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しかしそうだとした場合、実体としての中国人を論議の磁場の外へ排除すれば、彼らが最初に批判したアイ

13) 瞿宛文「台湾经济奇迹的中国背」『台湾社会研究季刊』74期、2009年、pp53-55、pp83-9参。

14) 郑鸿生「台湾人如何再作中国」『台湾社会研究季刊』74期、2009。

15) 赵刚「以‘方法论中国人’超克分断体制」『台湾社会研究季刊』74期、2009、p.15。

16) 甯应斌「中国人如何再作中国人」『台湾社会研究季刊』74期、2009年、p22。

デンティティの議論の虚偽性を正面から突破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いわば、彼らがいう「開放的」、「方法的」、「历史文化的」、「中国人」概念が台湾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を解体するには効果的でありうるが、実際にそれを解体してみると、もう1つのスーパー・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なかにまた閉じこめられてしまうジレンマからどのように脱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あろうか。より重要な問題は、このような「中国人」概念が、彼らの意図と无关系に、大陸の官房談論のなかに吸収されうるということにある。討論者の李尚仁の鋭い指摘のように、「伝統から資源を引っ張りだし、緩やかなアイデンティティ概念によって分断体制克服の主体を構築しようとするなら、帝国から国民国家へ変身した中国の歴史的过程を再び考究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¹⁷⁾。国民国家と帝国の性格が複雑に共存する大陸の政治的文化的实体を具体的な討論対象としないまま、「中国人」として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回復に議論を集中するのであれば、それは現在の中国官房の少数民族や台湾に対する立場と根本的な違いを得ることは困難である。分断体制克服が、すぐに統一を意味するという誤解を避けるために、わざわざ現実中国を排除したことが、結果的に意図と反対に「国共和解」という大陸の統一論議に吸収されてしまうこともありうる。したがって台湾民族主義とともに、中国の帝國的國家主義の議論を同時に牽制する均衡感覚が切实に要求される。

「两岸問題の分析での非対称性」(李、254)はさまざまな面で再考さ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問題である。「方法论としての中国人」の枠組みによって台湾民族主義を批判しするとすれば、逆に、「方法论としての台湾人」によって中国の国家—帝国主义を批判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そのためには台湾社会の矛盾の原因を「冷戦の残在」や「亲美反中」にばかり求めるのではなく(李、255)、中国政府が政治、経済各層で台湾に加えてきた压力と脅威も一緒に問題に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ここで一歩進んで、改革开放以後、中国社会の政治、文化に対して台湾の学界がもっと積極的な介入をしていく必要がある。王晓明は最近、中国社会で個人主義と爱国主义が同時に強化されている奇妙な現象に対し、社会主义30年の功罪に対する反省的思考の欠落を深刻な原因として指摘した¹⁸⁾。毛泽东時代の社会主义の企画に対する反省を通じて今日の中国の国家主義を相対化する作業は、分断体制の克服と決して无关系ではなく、したがって全面的に大陸知識人だけの任务ではないのである。

このすべての問題の根本的原因は、タイショ(台社)論者たちの分断体制克服の討論に(陈光兴を除いては)、东アジアがほとんど見出されないことにある。分断体制を分析するためには、陈光兴が言うように、結局「中国を問題化」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しかし「中国を問題化」する过程で第3世界や东アジアのような媒介が介入されないとすれば、議論はまるでメピウスの輪のように中国—台湾の二元論を遂に脱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そしてこの二元論は、中国を他者化することによって構築された台湾の自我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を批判的に解体する作業が(現実中国に対する发言が排除されることによって)、結果的に「中国人」というスーパー自我に归着してしまうという点で本質的に一元論なのである。このようなジレンマに陥らないためには、「ポスト国族」としての「中国人」が—

17) 李尚仁「回应台社同仁的分断体制论」『台湾社会研究季刊』74期、2009年、p25

18) 为甚麽就不能乌托邦一下?」台湾社会研究季74期2009年、p268-269。

国的あるいは両国的関係からではなく、第3世界あるいは東アジア的な想像と連帯を重要な精神的軸とする概念に再構成されることがキーポイントである。東アジアという媒介が決して趙剛が忧虑するように「两岸関係という特殊で具体的な問題」を「回避する修辞」（趙、205）ではなく、反対に两岸関係を紡ぎ、鏡の二元論に閉じこめる想像の段階を脱皮する契機ととらえる前向きな思考が重要である。

4. 两岸／分断体制と東アジア

两岸問題を、二元論から脱して東アジアという領域へ引き出してくることは、実は「台湾社会研究」20周年特集号の企画で下敷きにされていたテーマでもあった。議論の展開過程で東アジアが消失した点が惜しまれるが、台湾社会の長年の欠点である通読論争を两岸／分断体制という巨視的なシステムのなかで眺める視野を確保したことは確かに励みになる。この過程で两岸／分断体制に内包されたジレンマが比較的明確に現われ、今後の論議の進展のために解か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課題が具体的に浮び上がったのも重要な成果である。

まず、「第3世界論」の歴史の意味と限界を整理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必要性が台頭した。これは、分断体制克服の主体として白乐晴が提起した「民族」や、台社の論者たちが提出した「中国人」概念の意味と限界を突く作業とも連関する。もちろん、1970年代に白乐晴が提出した、内には反帝反封建の要求に沿い、外には弱小民族の自主権と自決圏を尊重する第3世界的自己認識と結合する「民族（文学）論」が今でもそのまま有効なのかどうかについても深い議論が必要である。より至急なのは、1977年、台湾で「乡土文学論」の陣営を率いた陳映真の第3世界的自己認識が、1980年代以後急速に本土主義に置き換えられてしまう状況や¹⁹⁾、1960年代、中国で弱小民族に対する友愛から出発した第3世界論が革命輸出論に変質し「中心コンプレックス」を培養する温床になってしまった脈絡に関する分析である。两岸問題を討論する際に東アジアがほとんど介入できないという目前の現象に対し、台湾と中国の歴史のなかに実在したが消えてしまった第3世界認識の行方を追跡する過程で、その問題の糸口を探し出すことができるかもしれないからである。

そうした脈絡から、60、70年代という文化空間は、東アジア的視野で分断体制の深层原因を探り、克服の方法を模索するのに重要な研究対象として浮び上がる。鄭鴻生が、70年代の乡土文学論の基礎を積んだ「文芸復興期」として1960年代に注目し（鄭、130-132）、呂正恵は、台湾社会の「各種の複雑なイデオロギー的要素」が「混沌未分の状態」に潜伏し、一時的にでも社会の各主体の统一战线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た「偶然な現象」として1970年代を説明したが（呂、210-212）、両者の観点は多少異なっているが、60年代のモダニズム的滋養と70年代に目覚めた第3世界的民族意識が一つになって花を咲かせた「乡土文学論」の歴史の意味と限界をあとづける作業は確かに重要に思える。特に「乡土文学論」の地位がただちに本土文学論に奪われた歴史から見て、乡土文学論から台湾民族主義の潜在的淵源まで探り出すことができるものと考えられる。研究の長い空白によっ

19) 呂正恵戦後台湾知识分子与台湾文『中国现代文学』号199年、pp209 21参照

て空白となっている中国の60年代の文化的状況についても研究が必要である。钱理群の論文は、今日の中国の固執的病弊である中国中心主義と中-ソ二元論の問題を解く鍵が60年代という文化空間にあるかもしれないという暗示を与えているといえる²⁰⁾。

最後に、韓国で「民族文学論」の発生を前後する60、70年代の文化空間を、中国や台湾のそれと横断的な連携線上に置いて新たに注目することも意味ある研究材料である。「民族文学論」と台湾の「乡土文学論」、そして中国の第3世界論を并べてみたとき、それぞれが東アジアでもつ歴史的文化的意味と限界をより完全に認識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ひいては、類似の歴史的脈絡で生まれたにもかかわらず、大きく別の様相を現わすこととなった朝鮮半島と两岸の分断体制を、相互連関のなかで把握することにより、「分断体制」を克服する一つの方法として東アジアの軸をいっそう豊かにさせるであろう。

20) 钱理「我们这一代人的世界想像」『台湾社会研究季刊』57期200年pp260-266参

International Conereence

역사적 관점에서

‘동아시아세계’의
아이덴티티와 다양성

국제학술회의 자료집(Ⅱ)

발행인 : 정 재 정(동북아역사재단 이사장)

발행일 : 2009년 11월

발행처 : 동아시아연구자포럼, 동북아역사재단
102-705 서울특별시 서대문구 의주로 77
전화 02-2012-6047

<http://www.historyfoundation.or.kr>

인쇄처 : 연화디앤피(02-2269-8620)

비매품